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剑桥插图德国史

GERMANY

Martin Kitchen

〔加拿大〕马丁·基钦 著

赵辉 徐芳 译

赵叙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目　录

导　论

放眼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醉心于历史辩论。事实上，德国人 所争论的，许多是在外人眼中并不重要的问题。甚至连德国历史起源于何时，人们也争论不休，而且往往还被掺进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不是起源于843年，即查理曼的三个儿子签订《凡尔登条约》，日耳曼人路易获得莱茵河以东地区？或者，它起源于887年，即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加洛林王朝？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是911年，即康拉德一世被推举为国王那一年；有人主张935年，即奥托大帝加冕为帝；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从962年算起，因为奥托一世在这一年前往罗马，接受教皇加冕。至于那些希望强调德国作为大陆强国地位者，赞成以查理曼统治时期作为德国史的起源，因为这位皇帝被称作"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任内向东方扩张，运用强制手段使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并在明斯特、帕德博恩、希尔德斯海姆、奥斯纳布吕克、不来梅和汉堡均设立了主教区。

"德意志"(deutsch。德意志的称谓问题非常复杂。德意志人称自己的国土为"德意志兰"Deutschland，中国人称之为"德国"，其他国家多称之为"日耳曼"Germany或其他名字。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为便于理解，"德意志"和"日耳曼"在某些段落混用，特此说明——译注）一词见诸文字，最初出自罗马教廷派往英格兰的使臣。公元813年，都灵的教会文件中第一次提及teotisca（该词当时的意思是莱茵河彼岸那些部落和部族所讲的方言——译注）。直到10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德意志人的土地"和"德意志王国"的提法。这个王国到1157年后改称"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但直到1512年，才在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时期，在国名中出现"德意志"字样："神圣帝国"改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不过，这个用语繁琐的称谓不仅令外界人士难以理解，就连德国本土的大多数学者，也无法作出明晰的阐释。

911年，东法兰克人中的四支，即法兰克人、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共同建立了德意志王国。925年，洛林人也加入了该王国，其中很多是讲法语的。这个王国的幅员，大体相当于冷战时期的西德，当年构成了基督教欧洲的东部边境。随着斯拉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匈牙利人相继皈依基督教，德意志人在文化上、政治上开始居于欧洲的中央地位。这一历史变化，在

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奥托王朝、萨利安王朝(1024—1125 年。根据日耳曼 - 法兰克的选举国王传统，1024 年萨克森王朝奥托家族男系绝嗣后，由诸公爵推举出萨克森王族女系后嗣、法兰克尼亚萨利安家族的康拉德二世为国王，三年后加冕为皇帝，史称萨利安王朝，亦称法兰克尼亚王朝——译注）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德意志在欧洲所居于的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东方实行基督教化和殖民政策，发展农业和采矿业，而大学则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然而，德意志王国存在着根本性的痼疾：它幅员太过辽阔，很难予以有效管理，可以说，它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某个组成部分分裂出去的威胁。王国并无固定首都，而且帝王们的统治合法性来自罗马教廷，因此需要深深地卷入到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去。巴伐利亚公爵威尔夫家族与士瓦本公爵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竞争，进一步削弱了德意志王国的力量。而且到 13 世纪初期，随着法国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德国开始出现政治真空局面，居于支配地位者变成了各地诸侯。

[10]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 (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公元 55—117 年或 120 年。他在公元 1 世纪末期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利用第二手资料，记述了公元前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译注）的著作，直到 1497 年才第一次在德国出版，但对日耳曼人了解其祖先的种族特性，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他们对书中有关古代日耳曼人道德纯正、诚实无欺、节欲、爱国、谦逊、勇敢、好客等品德的描绘深信不疑。至于这时的他们比起祖先们却相去甚远，他们将之归咎于腐化的罗马教廷的有害作用。在他们看来，只要摆脱教会的毒化和控制，日耳曼人便能回归其自然天性，与大自然保持亲密联系，并在道德上自我约束，从而像祖先们那样成为伟大的种族。因此，日耳曼人的民族情感建立在对浮华法国人、腐化罗马人的无比仇恨之上。反过来，外国人很乐于援引同一本《日耳曼尼亚志》，挑选出日耳曼人故意视而不见的那些段落，论证日耳曼人有着酗酒、贪婪、举止粗俗、行为残忍的特征，也就不足为怪了。

奥托三世加冕为皇帝，成为恺撒大帝的后任者。图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高卢人和罗马教廷的使者向奥托三世敬献礼品。



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从而为各地诸侯把更多权力揽到自己手中提供了新的机遇。[11] 帝国的瓦解，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正式确认。此后的德国，仅仅只是一个由众多事实上拥有主权的邦结成的松散邦联，而近代化和宗教改革活动也只是在部分邦提供的框架内进行。巧合的是，到 1789 年，德意志分裂为 1789 个独立的拥

有主权的实体,其中既有奥地利、普鲁士这样的欧洲强国,也有许多拥有自主权的小修道院、皇室庄园(1789个独立的政权,包括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但也有不完全相同的统计数字——译注)。诚如此,直到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约国于1779年达成一致,并(在法国调停下由普鲁士和奥地利双方)签订《帖欣和约》(the Treaty of Teschen)后,帝国境内的宪政改革才成其为可能。

拿破仑正式终结了德意志帝国的历史,重新规划了德意志政治格局:他创建并统治了"莱茵联邦地区"(拿破仑1801年把莱茵河左岸地区正式并入法国,使鲁尔区、萨尔区、莱茵-摩泽尔区、唐纳斯山区成为德意志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并对莱茵联邦地区施行统治——译注),包括16个邦,其中地位最重要的是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在法国的推动下,这些邦获得了改革动力,全面推行具有进步意义的《拿破仑法典》。而在普鲁士,旨在强化国家政权以打破法国枷锁的改革,则为德国在19世纪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对于民族主义而言,仇外主义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近代的德国民族主义,则是脱胎于对法国的强烈憎恨。拿破仑占领军令人无法接受的做法,更强化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德国人形成清晰的民族认同感,起始于18世纪,主要围绕着德意志人在文化和语言领域的独特性,具有世界大同主义、非政治化和深奥等特点,只是法国革命战争造成的影响,才让这种民族认同变了味:世界大同主义逐步转变为对文化使命的傲慢自大意识;非政治化变成了要回归经过美化了的日耳曼光辉历史的反动倒退;深奥化则成为国人藉由形而上学的玄奥逃避现实的通路。在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希望被唤醒之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又带来了当头棒喝:在这次会议上,德意志民族的愿望成了列强外交动机的祭品。

1815年时,大多数德意志的爱国主义者都希望帝国得到恢复和加强,但英、俄两国却更愿意看到德意志的分裂,因而采纳了一个所谓德意志联邦的方案:这个联邦(一译邦联——译注)是39个剩下来的德意志邦组成的松散联盟,既无中央政府亦无国家元首,而只设立一个联邦议会(Bundestag,由各主权邦的代表组成,主席由奥地利担任,设在法兰克福。议会分为两级,一是由11个主要邦组成的"小议会",另一是所谓全体会议,纯属表决机器——译注)。然而,德意志尽管乍看上去已无任何实力,内里却蕴藏着巨大潜力。在普鲁士领导下于1834年建立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形成了各邦的经济联盟,很快便对英国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德国要想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惟一的条件便是政治上的统一;如果它拥有一支舰队,甚至可以威胁到英国。

当全德意志国民议会的代表们1848年聚集在法兰克福(会议的任务是制订全德宪法,直到1849年3月才制订出一部帝国宪法——译注)时,他们必须回答一个终极问题,即"什么是日耳曼人"?问题也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德国在哪里?"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是,日耳曼人就是讲德语的人,而用民族

主义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的话来说，德意志是指“所有讲德语的地区”(Soweit die deutsche Zunge reicht)。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讲德语的阿尔萨斯人也是日耳曼人吗，哪怕他们都是法国公民？普鲁士占领下的波兰人也算是日耳曼人，仅仅因为波兰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了？还有，[12] 波希米亚是德意志联邦的一部分，但那里生活的捷克人应享有哪些权利？犹太人是否应予同等待遇，或者应当保护日耳曼民族免遭这些外来民族的威胁？

参加法兰克福议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希望建立一个“大德意志”，从而把奥地利包括进去，因为奥地利帝国地位强大，并拥有一支堪与英国皇家海军匹敌的舰队，因此这样一个统一的德国将成为世界强国。自由派希望联邦成为内部高度一体化的共同体，以便对外能够免遭邻国威胁，对内能够保护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此外，生活在法国、卢森堡、荷兰、石勒苏益格和瑞士的日耳曼人，都应被重新接纳到这个国家。与会代表担心会激起法国的反对，自然不敢更多谈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地位问题，但对于波兰问题，他们就不会如此自我克制了。曾几何时，自由派热烈声援波兰人应获得民族自决权，以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种主张如今被谴责为卖国行径，据说是要把波兰人这个德意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变成一个落后民族。在讨论到波希米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前途时，提出来的看法也与之类似。由于被民族自豪感所遮蔽，在健康的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此种权利已不予关心。然而，又有几个自由派分子能够想到，拒绝认同其他民族的权利将对他们自己构成威胁，而压迫民族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将加强反动势力的力量？究其原因，他们之所以犯下这个致命错误，是因为坚持把民族建立在种族基础上，而非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法律。甚至一直到了今天，仍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俄罗斯人，只要他的双亲都有日耳曼人的血统，哪怕他一句德语都不会说，仍然保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天然权利；反之，如其双亲系土耳其人，哪怕他生在德国，哪怕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国，哪怕他在德国上学，仍然无权加入德国国籍。

当俾斯麦刚刚实现德国统一的时候，给世人的感觉并不像后来的事实那样可怖。诚然，统一的实现建立在“铁与血”的基础之上，但这与意大利、希腊或塞尔维亚并无二致。它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且国会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不像社会主义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所形容的那样只是“专制主义的空白书签”。另一方面，德国的统一是在连续进行的三场战争基础上实现的，他们在这三场战争中都未得到外部的帮助。但一旦完成了统一，德意志帝国便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没用多长时间便在工业生产能力方面超越了英国。帝国人口从1871年的3800万迅速增加到1914年的6400万，也为这个民族国家增添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由于它地处欧洲中央地带的地理位置，它在陆上与法国、奥匈帝国、俄国接壤，在海上则与英国相望。虽然俾斯麦宣称德国已经“心满意足”，但他也深知，列强们对德国这个新生强国充满狐疑和不安心理。

帝国建立后，对其他地方作为少数民族的日耳曼人产生了强烈的磁吸效应。例如在奥匈帝国境内，居于少数地位的日耳曼人面对多数民族的威胁，充满孤立无助之感，因而激进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对他们具有越来越大的感召力。事实上，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没过多久，所有日耳曼人都应团结在一起的呼声便四处响起，而成立于1890年的“泛德意志人同盟”，甚至对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颇具吸引力。韦伯在弗赖堡所作的一次就职演说中宣称，如果德国不着手进行帝国的扩张，那么，1871年的统一将只是一场“闹剧”。然而，如果不进行大规模战争，无论是把所有日耳曼人（包括讲德语的瑞士人、荷兰人）都联合在一起的计划，还是帝国在海外的扩张，都注定是无法奏效的。因此，许多身居重要职位者，冷静地分析这一前景后，开始以同样冷静的手法，筹备这最后的决战。

13

俾斯麦的对外政策固然充满危险性，其对内政策也同样如履薄冰：为了纠合起自己的支持者，他向国人描绘的是一幅可怕的场景：“国家的敌人”正处心积虑地要扼杀新生的帝国，其中最主要的威胁当然首先来自社会主义者，但波兰人、法兰西人、阿尔萨斯人、丹麦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也同样有害。诚如此，被目为帝国的敌人者覆盖了大多数国民，因而纯正的德意志人似乎只剩下了普鲁士的新教徒。但真正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时，德国却实现了举国上下的空前一致，这表明在极端情况下，民族主义会散发出魔力，令国内此前的种种对立消弭于无形；然而，在这种空前团结的表象下面，社会的分裂和仇恨其实一天也没有消除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德国的战争目标越来越大，它最终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西部战线的迅速崩溃，令德国深感震惊，但通过把罪名推卸给联邦议会中的民主政党，最高统帅部巧妙地逃过了国民的指责。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一方面从德国割占了所有非日耳曼人居人口多数的边境地区，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奥地利和说德语的苏台德区加入德国，因为协约国知道，这样会导致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国家。虑及日耳曼民族的强悍特性，虑及和约对这个民族的羞辱，德国迟早要试图推翻这些安排，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德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胸中蕴藏着强烈的不满，都决心要反抗战胜国强加于他们的“绝对命令”，只是现在的德国太过虚弱，尚无法做到这一点罢了。当时，似乎没有多少德国人意识到，纵便德国的国土被《凡尔赛和约》压缩了很大一部分，但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1925年签署的《洛迦诺公约》，以及次年德国正式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标志着德国恢复了大国地位。但仅有这些，尚无法令大多数德国人满意。由于经济危机的挥之不去，由于政治上的僵局难以打破，阿道夫·希特勒的大肆煽动宣传，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效。希特勒先是建立了一党独裁制度，并通过恐怖手段迫使那些拒绝支持纳粹党的人士屈服。尔后，他开始一步步地撕毁《凡尔赛和约》，按照“大德意志”方案在1938年解决德国问

题,并在《慕尼黑协定》中得到了英、法两国的热烈回应。通过一点点的蚕食,《凡[14]尔赛和约》已被希特勒捅得千疮百孔:1935年,德国实施普遍兵役制;1936年,德国出兵占领莱茵兰;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区;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尔达维亚,并迫使立陶宛把梅梅尔区交还给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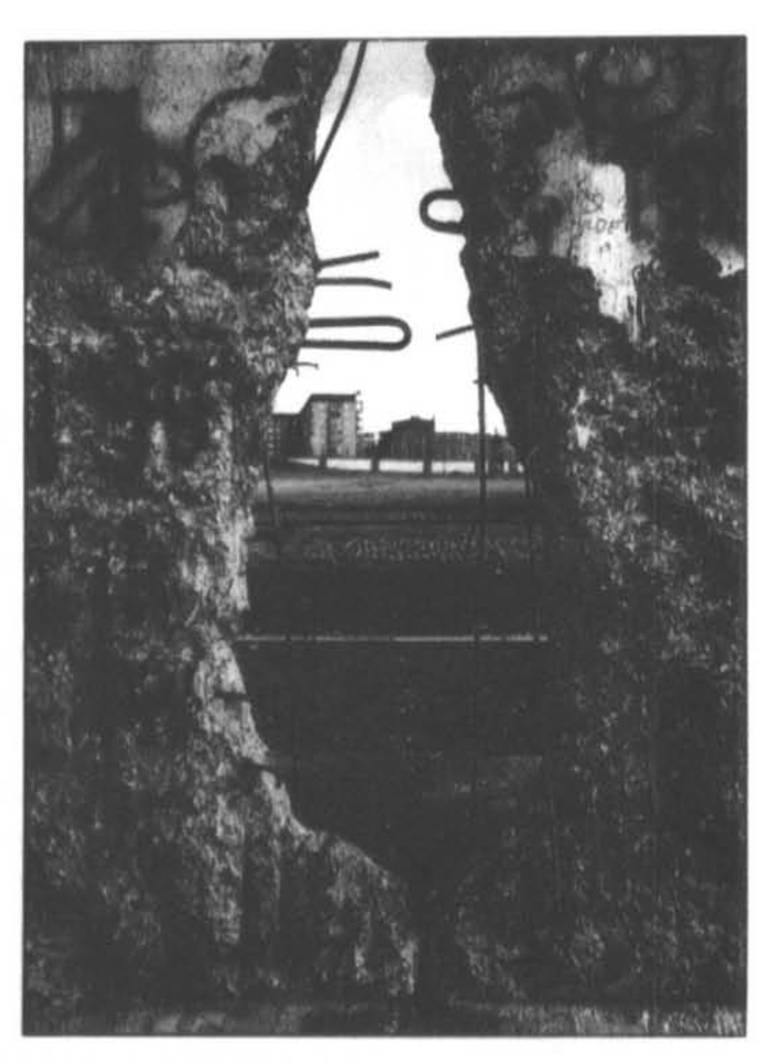
对"哪些人是德国人"这个终极问题,纳粹党人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俾斯麦目中的"帝国的敌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政治化了的基督徒、左翼自由派政治家等,要么被强行流放,要么被关进了集中营;日耳曼"种族共同体"必须清除一切外来的、有害的成份。因此,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疾者、同性恋者、刑事犯罪分子、吉卜赛人、犹太人,都要予以剥离和清洗出去,甚至一劳永逸地予以谋杀。

其实,希特勒并不想挑起全球性的对抗,如果能够把东欧吞并进来,他便可以志得意满了。但为了实现种族纯净和不朽帝国的更长远目标,除非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别无他途可寻。当英、法两国1939年9月3日向德国宣战时,纳粹政权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灾难终于降临了,但随着德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所有的怀疑便都消散了。作为希特勒的战略的重头戏,德国向苏联发动了进攻,在初期阶段的战事几乎像瑞士钟表一样精准无误。直到1942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沙漠的惨败,才宣告了纳粹德国行将走向失败。然而,对于业已惨死于史无前例的大恐怖之中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来说,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在这场浩劫中,最令希特勒感到得意的一点,正在于意识形态上的疯狂与官僚政治运作的有效性的结合。

1945年,德国再次成为一片力量真空。填补这一真空的占领国军队,把介于莱茵河与奥得河之间的这个小德意志,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后来,随着冷战大幕的揭开,德国被一分为二,一个是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的东德,一个是走民主化资本主义之路的西德。东德开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同时不得不接受苏联人的无情剥削:整座整座的工厂被拆除后运到苏联再重新建立起来,从东德掠夺的赔款总额远远超出了战时同盟国达成协议的金额。在东德1961年建造起柏林墙以前,几乎1/4的东德人口逃到了西方。

美、英、法这几个西方大国则以宽大为怀的态度对待"它们的"德国,就议会民主制的精神对西德人进行再教育,鼓励西德建设自由市场经济。西部的德国人给予了热烈而实用主义的响应。在取得经济腾飞的基础上,西德没用多少时间便被接纳为西方联盟的平等成员。为了清算纳粹统治的那段历史,西德人付诸了巨大努力。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战后西德更彻底地洗刷了其以往犯下的罪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接受了德国分裂的现状。同时,出于让普通东德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愿望,西德对东德的独裁政权给予了宽容。但到1983年时,东德事实上已走向了崩溃:为了粉饰太平,当局不得不编造经济统计数据;机器设备已经极度老化;大量的投资被消耗在毫无生产率可言的企业;社会福利成本过高,经济已不堪重负——如果没有来自西德[15]的巨额货款,东德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下去。因此,当苏维埃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后,东德作为最后一个残存的后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已处于奄奄待毙之困

境。1989年10月7日，东德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造访的贵宾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拒绝对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表示支持，反而对改革派鼓励有加。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辞去职务。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了自1932年以来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洛塔·德梅齐埃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后，制订出来了统一的具体步骤。10月3日，两个德意志国家重新实现了统一。



透过柏林墙观察到的边界地带和东柏林。"围墙啄木鸟"(Mauerspechte)们使用波兰商人提供的锤子和凿子，敲下柏林墙的石块，作为纪念品出售。

事态的发展如此迅速，令西德政坛人士完全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的西德人并不主张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知道，统一将使他们付出巨大代价。等到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被推倒，成千上万瓶香槟酒被打开庆祝之后，迎来了大规模的交割工作。东德人成群结队地涌入西部，而西德人对东德马克充满疑虑。这时，赫尔穆特·科尔总理抛开一切担忧，拒绝了大多数专家的保留意见，惟一一次听凭感性经验做出了决定：不要理会统一所需付出的天文数字般的成本，把强势的德国马克引入东部地区，尽可能快地实现两个国家的重新统一。没用多少天，人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德国留下的鸿沟了：很少有人能够事先预计到，东德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如此之落后，生态恶化情况如此之严重，国家公共卫生、住房体系如此残破不全，基础设施如此破败不堪。在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专制、秘密警察制度、新闻检查、社会压制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损失也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东边人"被富裕的"西边人"看作形象猥琐的穷亲戚，而东德人则觉得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贪婪的西德人的殖民地。

统一后的德国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而"德国问题"也依旧悬而未决。它必须拆除自1989年以来东、西部人民的头脑和心中新建立起来的"柏林墙"。既然在逾千年的德意志历史上，民族统一第一次被建立在民族原则的基础之上，它就必须负责任地发挥出统一所蕴含着的巨大能量。一个民主的、繁荣的德国，一个紧密地融合到欧洲中去的德国，一个摒弃了任何领土野心的德国，一个准备使自己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其他民族利益的德国，将不再对任何一个国家构成威胁，而是将造福于全世界。德 国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完全值得他们感到自豪。我们期望，这些成就将足以令他们永远不再被那些危险的野心所困扰——历史上，他们曾经被这些野心所煽动，引发了于人、于己的巨大灾祸。

第一章　德国史的起源

[16] 历史上，“什么是日耳曼人”这个问题，一向是不难回答的：所谓日耳曼人，就是指生活在一片范围明确的地理区域的讲德语的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公元 1 世纪末期的著作中，把“日耳曼尼亚”描述为北邻大海、南至多瑙河、西接莱茵河、东临维斯图拉河的这片土地。他声称，日耳曼人是自不可考年代以来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一群血统纯正的人。按照日耳曼人的传说，他们的民族神吐伊斯托就诞生于这块土地，吐伊斯托之子曼努斯（“日耳曼人”中的“曼”源于这个名字）又生育了三个儿子，后来构成了日耳曼人三大部落分支。与后世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似乎有某种相通之处，古代日耳曼人也把种族的纯正性奉为圭臬，一个例子便是，“日耳曼人”在拉丁语中是 germanus，在英语中是 german，均有“拥有同一祖先”、“关系密切”、“从同一根系发散开来”的含义。

与罗马的冲突

尤里乌斯·恺撒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像对付高卢那样，征服日耳曼尼亚并进行殖民。在塔西陀写作《日耳曼尼亚志》之前 150 年，恺撒便在《高卢战记》中写道，日耳曼尼亚是一片野蛮人居住的地带，茂密的森林里遍布着独角兽和其他神秘的生灵，因此最好不予理会这片永远无法殖民的土地。后来，塔西陀在他的书中也遵循了这一思路，虽然当时罗马商人已经走遍这一地区，与所谓的野蛮人进行贸易且获利甚丰。在罗马，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受到特别垂青，商人们遂沿着从马赛或威尼斯到汉堡，以及从阿奎拉伊阿到但泽的“琥珀路”，搜寻到数以吨计的原料，交由罗马的匠人制作成一件件精致的物件。

18 世纪的德国人类学家在诸多方面都洋溢着世界大同主义情怀，但独独对日耳曼尼亚的历史与文化，却认为与西欧其他地区存在很大差异性。他们心中的英雄人物是阿米尼乌斯（他们用德语称之为“赫尔曼”），据称曾于公元 9 年在今多特蒙德附近的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队。因此，赫尔曼遂成为抵抗罗马暴政和外来影响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法国的历史学家认为，法兰西的历史根植于伟大而经典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

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制订了如何对付日耳曼尼亚的战略，并在此后沿用数个世纪之久：罗马军队沿莱茵河、多瑙河建立防御堡垒，并在图密善（51—96年）统治时期建筑了科布伦茨到累根斯堡的“利姆斯墙”（国界墙）。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受到哥特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的入侵——这些部落联盟的名称含义是“自由者”、“全体人”，反映出它们是由不同部落组成的联盟的统称。法兰克 17 人集中力量攻击罗马人在科隆的军营，阿勒曼尼人则发动对美因兹的包围。正是由于这一分兵原因，当罗马人放弃“利姆斯墙”时，把莱因河上游的日耳曼人称作阿勒曼尼人，而把莱因河下游的日耳曼人称作法兰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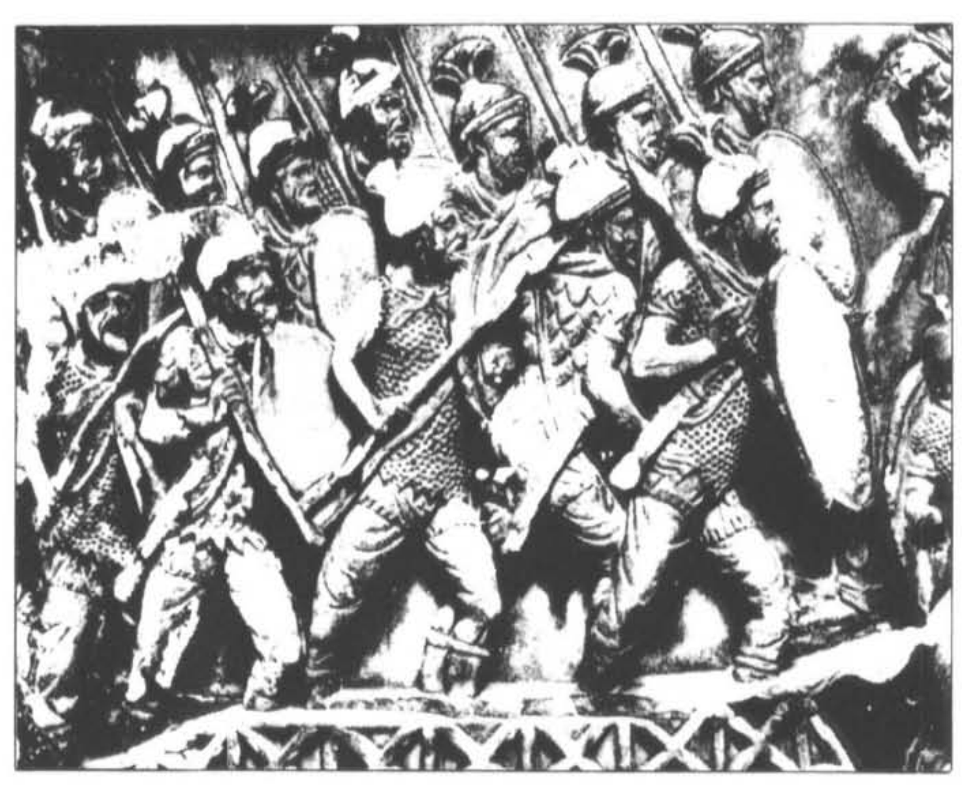
举着军徽的罗马士兵雕像。这幅铜质雕像当年是战马护甲的一部分，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1世纪。当时，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制订了如何对付日耳曼部族的战略，罗马军队沿莱茵河、多瑙河建立了防御堡垒。

在4世纪，部落与罗马军队之间爆发了数不胜数的战斗。当罗马帝国派驻前线的军队被召回国内，应付那里的局势后，这些部落对帝国边境地带的省份发动袭击，实施劫掠或勒索赎金。究其结果，便是这些以君主、军队首领或级别不一的贵族所统领的部落，彼此结成不解之仇怨，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争斗和战争。等到罗马的政治形势恢复稳定后，日耳曼人又被逐出了边界地区，在新的基础上签订了条约。公元357年，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附近进行的战斗中被击败，被迫放弃了莱茵河以西的居民点。罗马人还在莱茵河以东收复了图拉真（53?—117年，古罗马皇帝，任内发动侵略战争，向东方扩张领土，直抵波斯湾——译注）当年建筑的一座旧要塞，但根据与阿勒曼尼人签订的条约，其补给只能依赖当地人。

368年，阿勒曼尼人夺占了美因茨，但罗马人在瓦伦廷尼安一世（321—375年，西罗马帝国皇帝364—375年——译注）率领下发动反攻后，前者不得不顺着莱茵河回撤。次年，这位皇帝试图彻底消除阿勒曼尼人的威胁，但作战行动并未奏效。374年，瓦伦廷尼安一世与阿勒曼尼人国王麦克里安签订了一项条约，但他的这位新盟友在380年死于与法兰克人的战斗之中：杀死麦克里安的，是法兰克人国王米罗包得斯的军队。值得一提的是，米罗包得斯同时还是罗马帝国的一位高级军官，因而对于帝国来说既是仆人又是敌人。当时，在罗马军队效力、打击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法兰克人军官很多，且均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但米罗包得斯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从未切断自己与族人的联系，更不会像其他军官频频上演的那样把族人出卖给罗马。

许多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服役后，在文化上都经历了被同化的过程。在故土生活的日耳曼人，信仰的原始部落神名叫“沃坦”，他们的理想是成为英雄，进入沃瓦尔哈拉殿堂，得到圣洁女武神的接待。而在罗马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人接受了罗马人信奉的内容丰富的新柏拉图主义无神论，要么便皈依了基督教或犹太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生活的日耳曼人，其部落宗教和社会结构渐渐解体了。

最早接触基督教的，当属多瑙河流域的哥特人。由于劳动力严重不




马可·奥里利乌斯（公元121—180年，罗马皇帝兼斯多葛派哲学家——译注）的罗马军团一部利用浮桥越过河流。罗马军队沿莱茵河、多瑙河，在“利姆斯墙”构筑防御阵位，与日耳曼部落发生过数不胜数的边界冲突。也有不少日耳曼人在罗马军团效力，但他们的忠诚度往往存在疑问。

足，他们频繁袭击巴尔干半岛以抢夺俘虏，由此也从罗马帝国中基督教最为流行的地区带回了许多基督徒。这些俘虏很快便开始“把自己的主人变成兄弟”，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叫沃尔费拉斯（ “小狼” ）。此人约于310年生于多瑙河以北地区，但其家族来自阿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卡帕多西亚。341年，他成为安蒂奥克“哥特人之乡”持有正式册封文书的主教，这清楚地表明，基督教在当地已建立很大影响。沃尔费拉斯把《圣经》译成哥特文字。他信奉的是阿里乌（256?—336年，古代基督教神学家，阿里乌派创始人——译注）派教义，认为圣子（耶稣）并不是与圣父（上帝）地位相等的神灵，而只是人类中的最好的一员。此派教义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公元325年和787年在此地举行了两次 [18] 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译注）上被定为异端邪说。尼西亚会议上编订的《信经》坚持“本体同一论”，亦即耶稣基督与上帝圣父的本体是同一的。而沃尔费拉斯在哥特人中间传播的教义，在这方面恰恰与这相悖。

信奉基督教的哥特人由于来自当权的异教徒的迫害，不得不流亡他乡，而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二世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在今天的保加利亚一带为他们提供土地。沃尔费拉斯在383年去世前，一直在这些人中间担任主教，被康斯坦丁二世与摩西相提并论：他率领自己的族人走向了“希望之乡”。留在故土的基督徒仍旧遭受压制，并被斥为罗马人的盟友，但他们的人数和影响力仍得到了增长，甚至还有不少异教徒的首领人物皈依。

由于自东方的匈奴人的威胁越来越大，哥特人不得不与先前的敌人——已成为罗马人盟友的哥特基督徒杯释前嫌。许多哥特人迁往罗马帝

国境内，尔后效仿西部地区的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交出了手中的武器，宣誓将效忠于皇帝，并按规定交纳赋税。到了376年，又有更多的哥特人涌入帝国境内，当地官员已无法解除他们的武装，粮食短缺问题也应运而生。在色雷斯，当地驻扎的罗马军队由于许多部分被调至他处对付波斯人，已不足以应付哥特人的攻击。378年8月9日，罗马军队在亚德里亚堡被哥特人打败，皇帝瓦伦斯也在战斗中丧生。此后，罗马人迫于情势，不得不更加重视迁徙人群的同化问题。新任皇帝狄奥多西在帝国内允许哥特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从而增强了基督教世界抵御外来入侵者的能力。



路德维希·布乔恩（1770—1856年）在1850年前后雕刻的匈奴王、“上帝之鞭”阿提拉（公元406—453年）雕像。阿提拉于434年与其兄长一道成为双王后，率领纠合在一起的多个部落，控制了东起中国、西到莱茵河的广袤土地。447年，他在三次会战中打败了东罗马皇狄奥多西二世后，征服了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地区。451年，他侵入高卢，但在加泰卢尼亚平原受阻。次年，他对意大利北部展开报复，453年去世。

19 日耳曼人的入侵与迁徙

375年，位于俄罗斯西部地区的哥特人部落被匈奴人摧毁。后者并非一个单独的种族，而是来自亚洲的诸多部落的统称。匈奴人沿途吸收了很多日耳曼人部落，他们最杰出的首领名叫阿提拉，这其实是哥特人的姓名。但纵使伟大如阿提拉者，也无法把匈奴人团结成为一个整体，或者把权威延伸至所统辖的部落之外。事实上，许多匈奴人头领仍保持独立地位，对阿提拉的权威不予理会。但不管怎样，匈奴人入侵的结果是多个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匈奴人把东哥特人赶出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后者接着又把西哥特人驱赶至罗马帝国沿多瑙河一线的边境地带。罗马军队在亚德里亚堡遭受失败后，西哥特人开始在希腊定居。后来，在阿拉里克一世率领下攻入意大利，劫掠罗马城之后转向阿基坦，最后折向西班牙。来自西里西亚和蒂萨河谷的汪达尔人、苏维汇人、阿兰人于406年在美因茨渡过莱茵河，对高卢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复仇，尔后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

阿提拉公元444年（一说445年）谋杀了其兄长布来达(Bleda)后，成为匈奴帝国无可争议的领袖。447年，他的铁骑又蹂躏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地区，迫使康斯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向他交纳贡赋后，才止步于贝尔格莱德与克里斯托瓦之间的地方。451年，新任皇帝马西安拒绝向阿提拉纳贡，后者遂以此为借口，立即沿多瑙河进军，沿途把日耳曼人部落收编为同盟军。阿提拉的军队渡过莱茵河，向高卢发起攻击，与罗马人及其同盟军（主要是阿埃丘斯麾下的西哥特人）交战。双方在位于今天法国特鲁瓦与塞纳河畔夏龙之间的加泰卢尼亚平原进行会战，虽然这场战役并不具有决定性，但阿提拉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在他被迫撤向多瑙河的时候，他甚至想自杀：对于匈奴人领袖来说，一旦在战场上未能取胜，便不再有什么前途了。

次年即452年，阿提拉再次挥师征伐，侵入意大利北部，占据了帝国皇帝在米兰的皇宫。教皇利奥一世派出使臣，用西哥特人领袖、曾于公元

410年攻陷罗马但不久之后便命丧异乡的阿拉里克之先鉴警告阿提拉。其实，匈奴人已无需接受如此可怕的警告；此时，他们由于疾病的侵袭，不得不撤出意大利，返往潘诺尼亚（位今罗马尼亚境内——译注）。453年，阿提拉在日耳曼美女伊尔迪科（此女在日耳曼人传说中称作克里姆希尔德）的怀抱中，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去。而他与伊尔迪科的结合，虽然只是他一生中为数众多的婚礼中的一次，却已注定是最后一次。

阿提拉死后，他那数量众多的儿子们掀起相互仇杀，导致匈奴人群龙无首，遂被以阿尔达里希为首的部族同盟和日庇达人所征服。后者赢得这场竞争的胜利后，控制了匈牙利东部，并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王朝签定了条约。此后，匈奴人失去了其民族认同，逐渐被当地人所同化了。

从470至485年，西欧地区势力最强的人物之一是亚拉里克。他之所以能成为西哥特人的国王，使用的正是被那个时代所推崇的方式：谋杀兄弟。亚拉里克征服了西班牙大部，并跨越罗讷河，占领了普罗旺斯。居住在普罗旺斯的是罗马人，亚拉里克羡慕他们的先进文化，遂维持现行秩序、鼓励他们继续发展，并任命罗马人出任高级职务。他是西哥特王国第一位编纂法律的国王，而他于484年在阿尔的去世，也是历任国王中为数不多的得以善终者之一。至于他的儿子亚拉里克二世，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对手、法兰克王国的克洛维抗衡。507年，亚拉里克二世在普瓦蒂埃附近的会战中战败——相传他系被克洛维亲手杀死——法兰克人占领了波尔多和图卢兹。

墨洛温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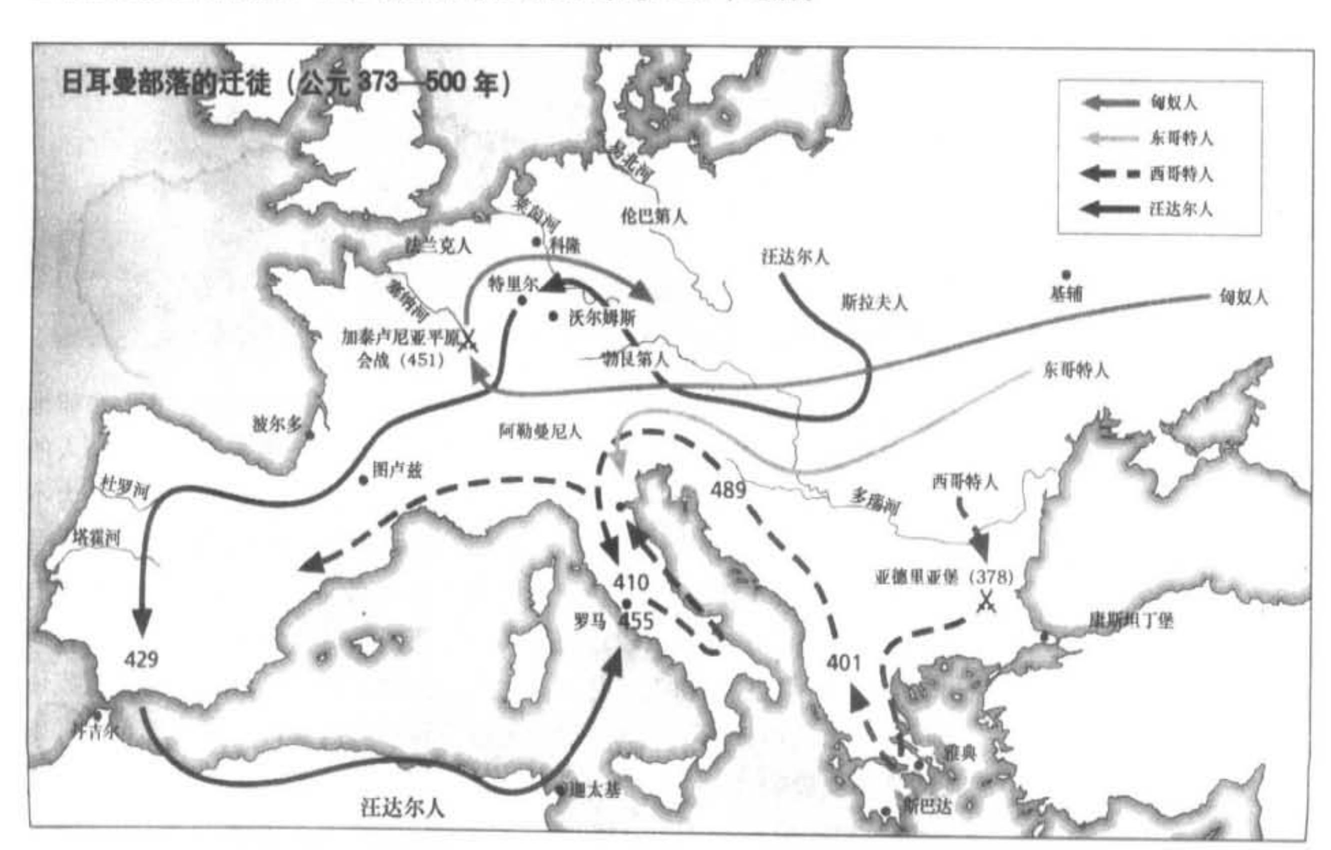
克洛维受其勃艮第人王后圣克洛提尔达（Saint Clotilda）的影响，此前已皈依基督教。虽然大多数日耳曼人的国王都信奉阿里乌派学说，但他却遵照尼西亚会议订立的教义，严格信奉正统的“本体同一论”。由于高卢和西班牙的普通人也是正统教徒，因此法兰克人的到来受到他们的欢迎。一个世纪以后，历史学家、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记载说：“万民热切盼望，无不期待着早日接受法兰克人的统治。”在正统教徒看来，亚拉里克二世的下场正是上帝对阿里乌派异端的惩罚。

墨洛温王朝把王朝的起源追溯到传说中的祖先墨洛温，并通过一个神奇的海怪为媒介，与诸神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王朝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但王国的扩张还是要靠展示军事威力才更具说服力。486年，克洛维在苏瓦松附近一举打败了罗马帝国最后一任高卢总督西阿格里乌斯；496年，他率军消灭了阿勒曼尼人；507年，他又打败了西哥特人。一连串的战功，使他在法兰克人的诸酋长中很快脱颖而出。他无情地杀死一切敢对自己提出挑战的其他酋长，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终于，他被抛掷到武

士们的盾牌之上，从而被正式拥戴为法兰克人唯一的王。因此，他既是一位神王，又是一位军事领袖。

王国建立后，克洛维在阿尔和卡尔卡松经受住了东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的岳父西奥多里克的军队的考验。511年，他在巴黎去世。在墨洛温王朝，他是统治高卢大部地区的第一位国王，而他皈依基督教之举，使法兰克人从此与高卢罗马人结成了盟友。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愈益普遍化，这片土地上的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已水乳交融在一起。虽然部落成份仍然存在着，但法兰克人已不再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而是已脱胎成为欧洲的一个民族。

克洛维去世后，他的每一个儿子似乎都继承了他的神圣性。人们认为，这些后代们血管里流淌着神的血液，因而也都具备种种魔力：他们只要在田间行走一趟，就能令谷物丰产；他们能够听懂鸟语、兽言；他们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前提仅仅是他们不要剪断头发。但在现实之中，法兰克王国已陷入分裂；克洛维的儿子们彼此相互残杀。至于这里生活着的人们，却看不出任何予以反对的理由：他们朴素地认定，具备魔力的人越多越好，至于那些被兄弟们杀死的克洛维后代，只能说明他们的魔力还欠缺了那么一点。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汪达尔人（the Vandals，这个名词的释义竟然是“肆意破坏”，但这并不符合史实）作为日耳曼人诸部落中唯一实行“长子继承权”制度的一支，却能确保权力的有序过渡，而墨洛温王朝要接受这种做法，却要等到克洛维皈依基督教200年之后。





圣卜尼法斯（公元680—754年）。原名温弗里斯，生于威塞克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位“日耳曼人的传道者”于718年来到德国传道，723年担任主教，732年升为大主教。754年，他辞去美因茨大主教一职，继续传道事业，后被异教徒的弗里斯兰人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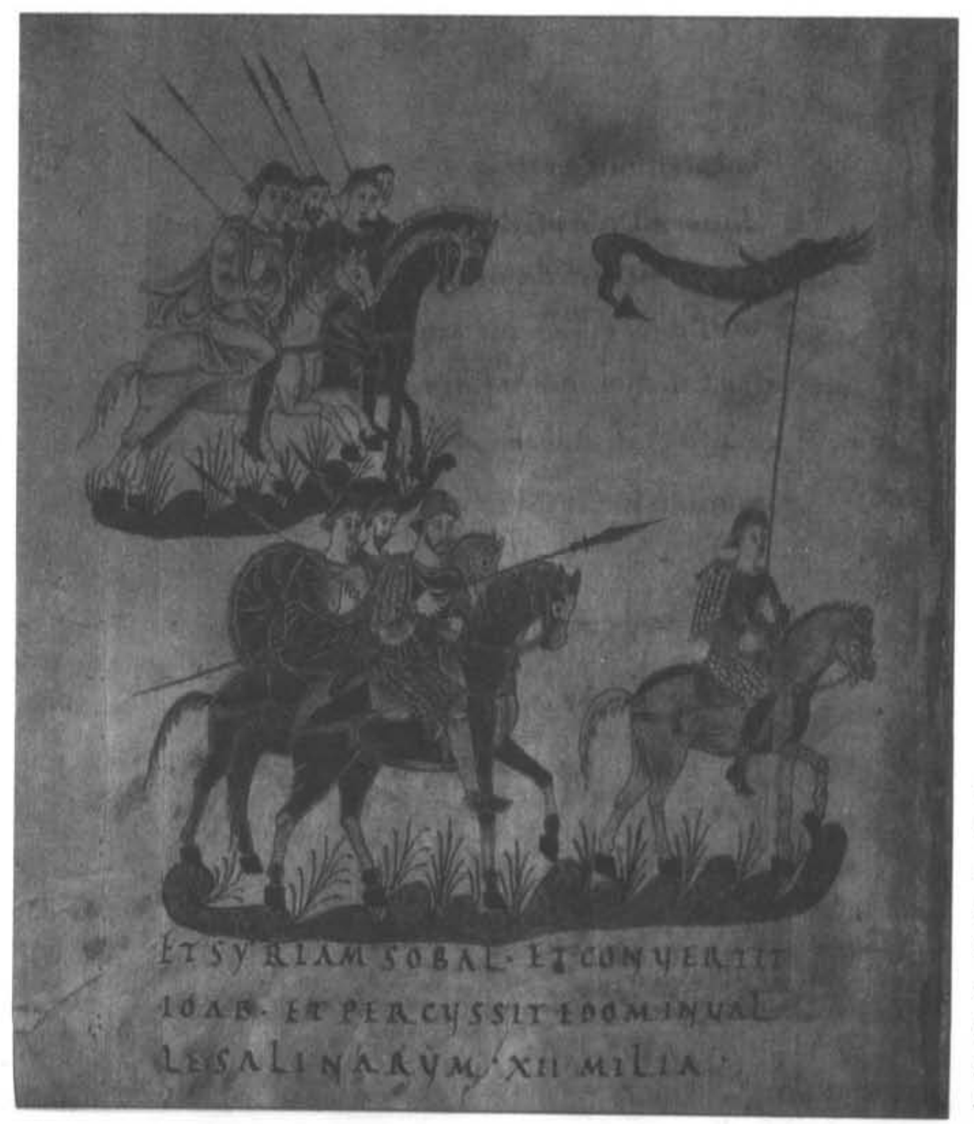
[21] 法兰克人被称作自由民，而在法兰克王国，只有自由民才享有法律地位。然而在现实中，作为统称、包括部族意义上法兰克人和高卢罗马人的集合名词“法兰克国民”，仍然依据其人身依附关系的层次，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至于奴隶，则完全被剥夺了国民资格。在宝塔形的等级体系中，介于国王和国民之间的是贵族阶级，他们既包括世袭贵族，也包括由军功而晋升者。贵族们以国民的名义向历任国王提供咨询、表示臣服，同时又在各自领地代行国王的意志。因此，强势的国王可以利用这些贵族使国民服从自己的旨意，而弱势的国王却不得不对这些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作出妥协。

基督教的影响

克洛维皈依基督教后，所有法兰克人遵循着日耳曼人的惯例，像他一样改信基督教。从此，克洛维的王国披上了一层宗教外衣，教会与王权展开了全面合作，其他民族的基督徒们则对他占领西哥特人的土地额首称庆。墨洛温王朝建有全国性的教会，由国王召集会议、任命主教，并利用教士出任官吏为王室效力。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主教最初都来自罗马元老院，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就是一例。

墨洛温王朝的基督教，抛开对神奇魔力的信奉外，其余的便大多是世俗的内容了。在这一方面，法兰克人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皈依基督教的民族一样，并没有发生多少实际的变化。改信基督教之后的克洛维，仍然大事劫掠和屠杀，根本不会受到什么清规戒律的制约。虽然异教徒的神灵已被贬为充满邪恶的精灵，但往昔的信徒们仍然要向其献出供品，以防精灵们

22



作于公元750年的一幅爱尔兰教士的画稿，圣高卢图书馆收藏。图中描绘的是墨洛温王朝的骑兵。这种重装甲的骑兵构成了法兰克人军队的内核。骑兵们身着轻型锁子甲的束腰外衣，头戴金属头盔，携带盾牌、短剑、长矛，一切装具都是当时最精良的，因此很具战斗力。

降下灾难。至于类似于审讯中加以严刑拷打等残忍做法，更是要持续多个世纪。

法兰克人的贵族把自己领地上的修道院和教堂看作一种投资、一种收入来源，因此对之予以严密的控制。他们可以任命和解雇教士，虽然这种做法每每遭到教会的抨击。不过，这并不妨碍基督教在这片土地上的盛行。信徒们把“图尔的圣马丁”视作英雄：此人原来是一位普通的士兵，后来担任了教士，并升为主教。人们相信基督曾化身为一个乞丐，遇见了“图尔的圣马丁”，后者与他共用一顶斗篷。后来，这顶斗篷成为墨洛温王朝时期最有号召力的一件信物。

[23] 在墨洛温王朝时期，教会的组织结构走向了瓦解，但仍然秉承了正统信仰，并将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公元751年建立）迅速得到了恢复。宗教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维系了经典教育的传统：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懂得拉丁文。为数不多的识字者，大多是教士们，后来才有为数寥寥的妇女接受了一些教育。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更不用说掌握经典文学了。而基督教吸收了大量文学作品，包括最初的希腊文学和后来的拉丁文著作，从圣保罗的时代开始，并将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学术界。教士们在布道中，阐释了信仰与理性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因此人们把七种文化艺术（语法、语言、演说、算术、几何、音乐与天文学）看作是通向形而上的神学真理的前提。

法兰克人吸收了高卢罗马人的应用技术，从后者那里学会了烤制面包、酿造葡萄酒、种植水果和蔬菜、烘焙砖头和砌墙、磨制镜子、在农业耕作中使用铁器。同时，法兰克人也提高了行政管理、经济和司法的技[24]能。正是拜基督教之赐，墨洛温王朝处理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能力才免于走向彻底混乱，但另一方面，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抵制作用则会导致法兰克人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的退步。要想使基督教和古典传统在这个社会牢牢扎下根来，必须具备来自外界的某种推动力。

为数众多的爱尔兰教士，对这个时代的欧洲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最早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位是圣科伦班。随后，盎格鲁-萨克森传教士开始接过他们的事业，并将作出更大的业绩。其中，英格兰本笃会教士圣威利布罗德作为先行者，于690年开到墨洛温王国。与爱尔兰人不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系受罗马人影响而皈依基督教，因此比前者更加严格和正统。他们的文化比爱尔兰人更加丰富和发达，无论是用拉丁文还是用当地语言的著述都可谓洋洋大观，因此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们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的成就，比起在日耳曼人中间传教的其他任何一支队伍都要大得多。

来自克莱迪顿的圣卜尼法斯，于718年来到弗里西亚，并在此后若干年中，在黑森、图林根、巴伐利亚、威斯特伐利亚、符腾堡建立了一系列传教基地，对改革法兰克人的教会做了大量工作，后于约754年被异教徒的弗里斯兰人杀害。死后，圣卜尼法斯葬于富尔达。随后不久，他的墓地

便吸引了许多教徒祭拜，富尔达的修道院也成为传教事业的一大中心。从此，法兰克人已不再需要外界帮助其传播福音，教会在圣卜尼法斯创立的基础上得到了稳定发展。

加洛林王朝

在历史的长河中，爱尔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教活动与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处于同一时期，是一件难得的幸事。这时，墨洛温王朝已是每况愈下，但王族血管里流淌的似乎仍然是充满魔力的血液。加洛林王朝的创建者们原系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或曰总督（奥斯特拉西亚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法国东北地区加上德国西部、中部的各一部分），逐渐成为法兰克人贵族家族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并且除了名义之外已经与国王毫无二致，而且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罗马教皇也是与他们而不是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打交道。因此，当“赫斯塔尔的丕平”成为法兰克王国唯一的宫相后，虽然统治权名义上仍然属于弱势的几任国王，但真正有效地施行治理的却是这位宫相。在他死后，其私生子查理接任宫相，先后打败了阿拉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并于732年在图尔与波尔图之间地区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把穆斯林赶了回去。5年后，他又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勃艮第和朗格多克。

查理之子“矮子丕平”先是使法兰克王国的贵族大会相信，墨洛温家族已失去了王家的尊严，后来又作出了取而代之的最终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他取得了教皇萨查里亚斯的允准，后者以教廷的名义授权丕平登上王位。751年，矮子丕平被贵族们推举为国王，法兰克人的主教们为他兴行了加冕礼，而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西尔代里克三世则被废黜。教皇萨查里亚斯在允准其登上王位时，借口是奥古斯都式的理由：“掌握实权的来当国王要比虚拥王位而无实权的为好。”

虽然丕平是以法兰克人的方式登上王位的，但却缺乏王族血统中那种 [25] 内在的魔力，因此需要求助于教会的祝福，通过一种独特的仪式，向世人显示自己的王位不是来自血缘继承关系，而是来自上帝。由此，他也成为第一位借助上帝名义施行统治的国王。为了突出彰显此举意义，“膏立礼”先后举行了两次，其中第二次是教皇斯蒂芬二世亲自主持，于公元754年为丕平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查理曼、次子加尔洛曼——行了“膏立礼”。这次仪式推出了“君权神授”的新的观念，而在日耳曼人的传统观念中，魔力则是通过血缘传递的。为防止王位世袭原则遭到任何侵犯，法兰克人中的头领们被威胁到，如果他们从另外一个家族中选择国王，就将被逐出教会。由此，加洛林王朝创立了一个“以上帝的名义”施行统治的世袭王朝。

对于加洛林王朝的君主而言，要想有效进行统治，贵族阶层必须接受其领导权。无论是以上帝名义进行统治的国王还是贵族们，都要服从同样

的法律，因此他们在政府中是伙伴，君主专制是注定行不通的。在这个王朝，权力主要集中于宫廷，这也是后来的中世纪欧洲的普遍模式。世俗的和教会中的重要人物来到宫廷，提出建议、接受命令，并寻求使自己加官晋爵的机会。另有一批人专门为王室服务，其担负的宫廷内部事务职能在他们的官职中便得到了反映，如司库、管事、祭酒、司仪等。宫相一职已予废弃，因为加洛林王朝正是借助这一职务篡夺王权的。但这些负责宫廷内部事务的职位，其权力没用不久便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展，如司库负责管理王室庄园和财产。又如司仪一职稍后改称巡按史，负责监督治安官，但后来又成为军队的指挥者。至于管事、祭酒等职务，则成为一种荣誉。到了奥托大帝时期，上述4种职位均作为贵族之于国王价值大小的象征，成为在国王加冕等正式场合使用的头衔。

国王和教会互为倚重。专门为王室服务的教士，最初是丕平三世在王宫附属教堂组织起来的。“附属教堂”（chapel）一词，概源于加洛林王朝最重要的圣物即主教圣马丁的披风（capella），即“收藏此一圣物的圣所”。到查理曼统治时期，政府中的所有抄写、档案事务均交由这些教士办理，原因在于当时很少有几个世俗人士懂得拉丁文，甚至连识字者也没有多少。抄写员由一位首相领导，而这位首相虽然名义上应听命于附属教堂大牧师，但很快便成为宫廷中最有权势的官员——值得一提的是，首相这个职务及其在政府中的重要地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查理大帝（查理曼）半身像。身体部分用金、银打造，并缀以宝石衣饰。1349年制作于亚琛。

无论是墨洛温王朝还是加洛林王朝，都曾试图获得所有臣民对国王个人的臣服，但也都未能做到这一点。由于很多贵族从古以来均享有不少权利和特权，因此对国王的要求不予理会，国王们便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从贵族中选择某些人，给予他们权力和财富，使之享有高于其他贵族的地位。这些效[26]命于国王的贵族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样做对自己最有利。只有王朝在9世纪后期衰败后，他们才挣脱王权的羁绊，追求自己的目标。

加洛林王朝的地方治理，在东部依靠古日耳曼人的“部落”，在西部



14世纪的一幅绘画，描绘的是查理大帝及其士兵乘坐巨型木质战车。

则是古罗马人统治时期的“部”（后改称“郡”）。在东部，当地贵族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在西部则由国王的使臣履行司法职能，其职务在拉丁文中是 comes （伯爵），在德语中是 grafio。伯爵们掌管大片庄园，往往还享有源于古代的权利和特权，其治下的郡几乎与采邑并无二致。他们把王室的土地为己所用，并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后来，贵族逐渐变成了世袭的身份。



一幅精美的象牙雕刻作品，作于约 800 年的莱茵地区，是加罗林王朝时期的艺术精品，曾经被用作书籍封面。作品反映的是天使米凯尔与恶龙搏斗。（译按：米凯尔是神话传说中上帝身边的首席战士，天使军团的首领）

征服与皈依：查理曼帝国

查理大帝即“查理曼”，生于公元 768 年，卒于 814 年。在他的统治时期，加洛林王朝复活了罗马帝国，把欧洲的大片土地收归囊中。查理大帝的法兰克王国，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由此造成了王权与地方贵族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他高度重视法兰克人教会的文化复兴，使之从墨洛温王朝时期的衰败中重新焕发活力。他深知国家极其需要受教育者的襄助，因此遍寻欧洲，搜罗知识分子为己所用，在朝廷集结了一大批伦巴第人、西哥特人、爱尔兰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亲身实践自己的要求和设想，在年事已高之际仍学习阅读和书写。丕平三世创建的宫廷附属学校，在他统治时期改为皇家学院，供天资聪颖的学生们接受良好教育。不过，当时掌握书写技能者在很大程度上仍限于教会，因而教士们在行政管理和司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 11 世纪，商人们才为了更有效做生意而学习阅读和书写。另一方面，虽然法兰克人自视为罗马人的真正传 [27] 人，但研究工作却是围绕日耳曼民族的语言和种族特点——正是在日耳曼人中，法兰克人才被公认为最发达的一支。786 年，第一次出现了“日耳曼语言”（lingua theodisca），查理大帝敕令编纂一部语法。794 年，王朝宣布该语言与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享有同等地位，并开始把拉丁文著作译成本地语言，不过直到 12 世纪，大多数人仍未把日耳曼语看成一种书面语。所谓“霍亨斯陶芬经典”，是用通行语言记载的，与口语并无联系。

查理大帝一生南征北伐，征战达 50 多次。他把这些战争看成是为了统一和保护基督教王国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在他即位之初的 3 年里，他与弟弟加尔洛曼共同统治法兰克王国，后来于 771 年（弟弟去世后）合并了后者的领土。772 年，他对萨克森人发动了战争，这在德意志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萨克森人虽然进行了激烈抵抗，但最终仍然不得不臣服了。777 年，王国在萨克森的帕德博恩举行大会，查理大帝水到渠成地把这片土地并入了法兰克王国。为了赶走侵略者，萨克森人再次发动起义，但在 782 年的那次血腥会战中再次被打败，共有 4500 萨克森战士被斩首。幸存者不得不皈依了基督教，所有萨克森人都被剥夺了财产，土地被查理大帝赏赐给了效命者。到 804 年，一切抵抗活动尽归平息，法兰克人的王国

已延伸到易北河。萨克森人最终被法兰克人所同化，并接受了他们的信仰。一个世纪以后，威杜金德对这场征服作了乐观主义的注释：“萨克森人曾经是法兰克人的同志和朋友，现在彼此成为了兄弟，并在基督教信仰的帮助下，共同组成了一个民族。”

774 年，应教皇阿德里安之要求，查理大帝吞并了伦巴第，并被教皇称作“罗马的保护者”（particius Romanorum）。这是他在加冕称帝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788 年，巴伐利亚公爵、伦巴第国王德西迪里厄斯之婿塔西洛三世遭到他的驱逐。791 年，居住在王国东南方、曾与巴伐利亚人结盟的阿瓦尔人，也被查理大帝打败。

尔后，查理大帝挥师西班牙，打败了兵力分散的阿拉伯人，从而把军事疆界延伸到了埃布罗河。而在东南方，他也把类似的边区一直建立到了巴拉顿湖（亦称匈牙利海，是中欧最大的湖泊——译注）和易北河南岸的马格德堡。此时的他，已成为欧洲的主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剩下遥远的拜占廷皇帝，以及更加遥远的巴格达的哈利发哈伦·拉希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786—809 年在位，“拉希德”意为“睿智者”——译注）了，而值得一提的是，查理大帝与拉希德保持着亲密的通信关系。终于，他于 800 年的圣诞节，在圣彼得教堂举行的盛大典礼上，戴上金冠加冕为“罗马人皇帝”。

查理大帝所要实现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成为“罗马人皇帝”，而且他还担心这顶皇冠可能招来康斯坦丁堡的那位皇帝的不满。在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 [28] 虑后，他找到了一种委婉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头衔：自己既是“统治罗马的皇帝”（imperator Romanum gubernans），同时又是“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他坚称是“由上帝加冕”的，藉以彰显自己的统治权利。这种把法兰克人、基督徒和罗马人的君主观合而为一的表述，终于令拜占廷王朝承认



了他的皇帝地位。812年，查理大帝和拜占廷皇帝彼此给予承认，不过迈克尔一世是“罗马人的皇帝”，而他这位法兰克国王仅仅只是“皇帝”。不久以后，两大帝国便分别被称作“东帝国”（imperium orientale）和“西帝国”（imperium occidentale）了。这一明晰的分界，被宫廷学者们大书特书，查理大帝遂被称作“欧洲之父”。这时的法兰克王国，与西部、与欧洲，已经牢不可分，只不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方式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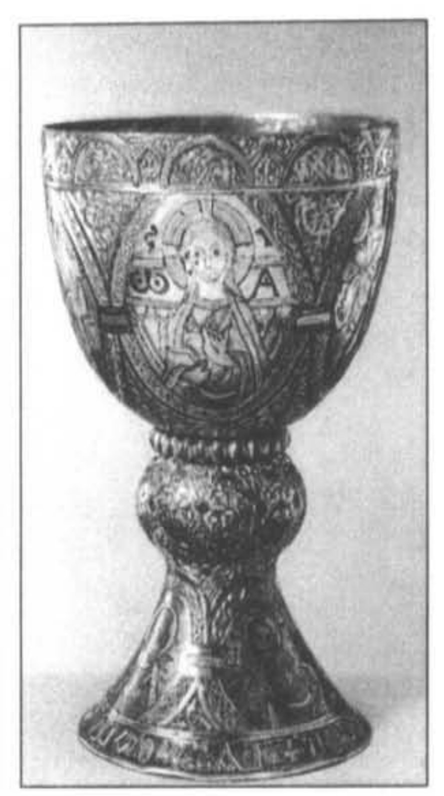
东法兰克王国的崛起

查理大帝同时兼具国王和皇帝的头衔，令其继承问题尤为棘手：虽然王位可以分割，但皇帝身份却只有一个。806年，他把自己的领土分别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但要求他们共同承担对教会的保护责任。810年，小儿子去世；次年，长子查理也撒手人寰。813年，查理大帝敕令在亚琛的宫廷附属教堂举行仪式，册封仅剩下的儿子“虔诚者路易”为副皇。查理大帝于814年去世，继任者“虔诚者路易”于817年宣布，帝国与罗马教会一样，不得分割。他策封长子洛泰尔为副皇。为了寻找神灵的指引，他下令连续三天禁食祈祷。至于洛泰尔的两个弟弟，一个是丕平，另一个是日耳曼人路易，分别册封为亲王。

823年，路易的第二个妻子朱迪思生下一个男孩，史称“秃头查理”。[29] 这位皇后生性贪婪，劝说丈夫推翻了817年的分封方案，改把帝国分为四个部分。封地缩水令洛泰尔、丕平和日耳曼人路易怒火中烧，也令大多数贵族和主教深为不满。这三个儿子遂起兵反抗，由此点燃了四年内战的战



洛希修道院的大门（史称“王宫”），建于9世纪下半叶。这座本笃会修院，被查理大帝擢升为皇家礼拜堂。东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多位国王葬于此地。



巴伐利亚公爵塔西洛于777年在克雷姆斯门斯特兴建了一修道院。图中所示，是这位公爵及其妻子、伦巴第人卢伊特贝加赠送给修道院的“塔西洛圣餐杯”，装饰极其精美。塔西洛原系地位独立的巴伐利亚公爵，但随着查理大帝加强中央集权，被迫放弃了公爵地位，遁入一座修道院，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火。“虔诚者路易”于840年郁闷而死（此前丕平已死——译注），而洛泰尔继位后，两个弟弟拒绝服从，并于841年在丰丹尼的会战中令洛泰尔军队遭受惨败。直到贵族们厌倦了无休止的冲突，迫使洛泰尔、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于843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兄弟们之间的冲突才告一段落。

条约规定，洛泰尔获得北起北海、南至意大利、西起索恩河和罗讷河、东到莱茵河的法兰克中部地区。日耳曼人路易获得莱茵河以东地区，而秃头查理获得帝国西部地区。虽然洛泰尔承袭了皇位，但实际上对两个弟弟的王国并无统辖权。随着他在855年去世，他所管辖的中部地区分给了儿子们，王国经受了又一次分割：路易二世继任皇帝，得到了意大利；查理获得普罗旺斯及勃艮第的一部分；其他地区则归洛泰尔二世，包括法兰克王国首都亚琛在内，这片地区后来为纪念他而被称为洛林。普罗旺斯的查理去世后，他名下的那片土地被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瓜分。

在经历上述几次分割后，帝国版图已不再与法兰克王国相等，而只剩下了意大利。而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各自管辖的地区事实上是独立王国。但日耳曼人路易最小的一个儿子查理三世（“胖子”），在其几个哥哥死去后，恢复了王国的领土完整。至于西法[30]兰克王国，后代子孙相继死去，只剩下了秃头查理的一个年纪幼小的孙子。胖子查理遂抓住机会，扩展自己的王国疆土。881年，他被推为皇帝，由此恢复了查理曼帝国，但胖子查理无力抵御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野蛮入侵，因此于887年被废黜，加洛林王国也被瓜分为五个公国（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图林根、士瓦本和巴伐利亚），其中只有东部的法兰克尼亚还属于加洛林王室传人名下，即胖子查理的外甥“卡林西亚的阿努尔夫”。其他几位国王篡位后，虽然名义上还尊奉着阿努尔夫，但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们还认同后者对加洛林王朝还保留多少敬意，而只是阿努尔夫在强迫他们这样做。作为加洛林王朝的君主，阿努尔夫几乎是最后一个还头顶皇冠者了。饶是如此，帝国的统一性却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阿努尔夫于896年加冕，3年后去世，接任者是“孩儿路易”。这时的帝国皇冠，已成为一顶空洞的象征物，只有一些不起眼的意大利贵族还在为它争斗，而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已没有什么人还对这一毫无价值的头衔感兴趣了。

这时的欧洲，陷入了贵族们相互争竞的内战中，并遭受外敌的多面入侵：在北方，是来自北欧的维金人（北欧海盗）；在南方，是阿拉伯人；在东方，则是匈牙利人。孩儿路易无力保护其臣民免于不幸命运，部落头领们遂把权力收到自己手中，并为提升地位而彼此争斗。匈牙利人对摩拉维亚和萨克森大事劫掠之后，907年在普雷斯堡打败了巴伐利亚的卢波尔德；3年后，又在奥格斯堡附近对孩儿路易的军队进行了大屠杀。命运多舛的这位国王，于911年去世，死因不详。

31

奥托一世加冕

用于奥托一世加冕（912？——973年）的皇冠。装饰用的薄金属板上的人物是智慧的象征——所罗门王。加冕仪式于962年举行。

奥托一世（奥托大帝）于936年8月7日举行加冕礼。他的父亲"捕鸟者"亨利，在最后一次患病期间，在埃尔富特召集宫廷大会，正式指定他为继人。贵族教士威杜金德对奥托在亚琛的加冕典礼曾作了详尽的记述：在教堂外面，来自各地的要人们在大厅集合，宣示效忠奥托，而在教堂里面，教会和世俗官员们等候着对奥托加冕齐声欢呼。美因茨大主教希德伯特引领着奥托来到聚集的人们前面："看哪，我把奥托王带来了。他是上帝所选中的、亨利大王所指定的、所有亲王一致推选为君主者！如果你们对这一选择感到满意，那么向天举起你们的右手！"人群立即以极其热烈的欢呼声，表达了他们的臣服。

尔后，奥托被引到圣坛前面，接受了帝王徽章：上面的宝剑，意味着他防备基督的敌人，为法兰克人维护和平；斗篷和手镯，是他作为基督教世界之王的权力象征；另外，上面还有（王位标志上的）宝球和节杖。随后是膏立礼，并戴上了王冠。教堂里响起了称颂查理大帝的弥撒曲，这是在揭示一个事实：奥托一世将复活加洛林王朝。典礼结束后，举行了极尽奢华的宴会，来自洛林、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势力强大的公爵们，负责行使司库、管事、禁酒、司仪等职能。出席这场欢宴的宾客们，得到了昂贵的礼品后，充满感激之情地离开了。

这场规模盛大、极富象征意味的典礼，给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今天仍然被视作中世纪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事件之一。除了当时在帝国东部边境地区担负防御任务的萨克森人将领"梅泽堡的西格弗里德"之外，所有地位重要的公爵无一缺席。举行这场典礼，旨在表明奥托继承其父亲的王位后，担任国王需要得到头领和人民的拥护，也需要上帝的保佑。

奥托一世的加冕礼，是对路易四世同年6月19日在拉昂的加冕仪式的直接回应，表示西法兰克王国今后将不得对奥托的王国提出任何要求，同时也象征着国内的团结一致。此外，它还显示了奥托将追随查理大帝的脚步，在罗马戴上皇冠。这次极尽铺排的膏立礼，使奥托的地位远远超越了公爵（部落首领）们，同时这些部落又都是王国固有的一部分。从此，不可分割性的王国与国王家族庄园，得到了清晰的区分：王室的庄园，尽可以在诸子之间分配。



用于奥托一世加冕（912—973年）的皇冠。装饰用的薄金属板上的人物是智慧的象征——所罗门王，加冕仪式于962年举行。

孩儿路易去世后，加洛林王国推举加洛林王族的"天真汉查理"（秃头查理之重孙）接替王位，但莱茵河以东的贵族们拒不接受。这些贵族利用持续经年的内战和边境袭击战之机，势力得到极大扩张，控制了萨克森、巴伐利亚和法兰克尼亚，并推举并非来自加洛林家族的、新近成为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康拉德一世担任新国王。康拉德决心把竞争对手全部消灭掉，但在918年死去而未能如愿——其死因盖由于其在对"巴伐利亚的阿努尔夫"的会战中的受伤。此后，来自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的贵族们在弗里茨拉尔集会，推举他们中间势力最强盛的"萨克森的亨利"为新王。亨利被称作"捕鸟者"，他深知自己不能寄希望于教会的支持，因此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拒绝接受美因茨大主教的膏立礼。登上王位后，他立即着手驱使贵族们尊奉自己，并通过一项承认公国所保留权力的封建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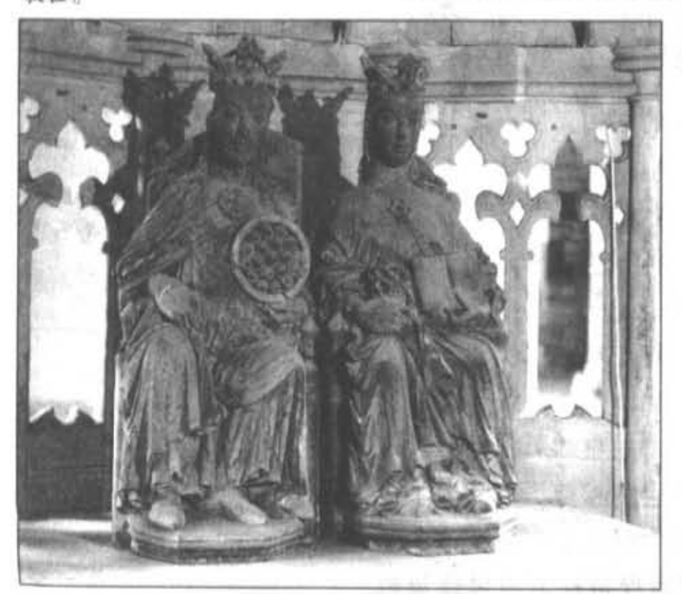
（“早期封建”，因为封建社会还在形成过程中——译注），把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士瓦本、巴伐利亚以及流亡境外的洛林公国连结在一起。他意识到自己需要贵族们的忠诚，而自己对他们的影响力又颇为有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各个公国自行其事。另一方面，他又决心维护这个新建立的“东法兰克王国”不久之后改称“德意志王国”）的政治统一，使之不会因为自己去世而崩溃。929年，他颁发诏令，任命自己的次子奥托为唯一的国王，从而打破了法兰克人由诸王子分享王位继承权的传统，转而建立了德意志王国单一继承人制度。

亨利通过谈判，维持了9年时间的休战状态（休战协定系亨利与马扎尔人所签订，起止时间为924至933年。马扎尔人原为芬兰－乌戈尔语系的游牧民族，从加洛林王朝起就连年侵扰德意志地区——译注），并利用[31]这一喘息之机，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城堡，大力训练王国骑兵。王国与斯拉夫人的边界位于易北河、萨尔河和波希米亚森林一带，亨利越过边界，发动了一系列战役，从斯拉夫人手中夺取了梅泽堡和迈森，并予以巩固，作为前沿防御区域之依托。933年，亨利撕毁了仅维系了6年的休战协定，发动了里亚德之战。面对实力占优的敌军，马扎尔人望风而逃，亨利遂不战而胜，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声名大振。他本已准备前往罗马，接受帝国的皇冠，但在936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32] 奥托王朝

亨利之子奥托（一称“奥托大帝”）于936年8月7日登上王座。根据其父亲929年的诏令，奥托已被正式指定为继承人。然而，对继承权仅由一个王子享受，他的两个兄弟塔克马尔和亨利却不予接受。此外，洛林和法兰克尼亚的公爵们也对国王强化君主集权的企图感到不安，因此支持塔克马尔和亨利发动叛乱，并成功地收买了萨克森的一些贵族。王国遂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奥托最终幸运地获得了胜利。至于他的两个兄弟，塔克马尔于938年死去，而奥托与亨利之间的纷争得到了平息，任命后者为巴伐利亚公爵。随着反对派的公爵们一个个死去，奥托把这些公国赏赐给了王族的一些成员：士瓦本给了他的长兄柳多夫，洛林则给了他的女婿康拉德（红色）。

马格德堡大教堂的一具建于13世纪的石雕。手持宝球和节杖者是奥托一世（大帝），另一位是他的妻子、英格兰公主埃奇莎。马格德堡是东部地区的传教活动中心，奥托大帝将之设为大主教区。



不过，王族的公爵们没用多久，便效法其前任们来了：洛林公爵“红色”康拉德于953年与柳多夫勾结起来，发动了“柳多夫叛乱”，并得到了很多贵族的支持。只是由于匈牙利人也支持叛军，而马扎尔人的大肆劫掠活动令人极其担

忧，才使得不少叛乱者中途退出了。955年，奥托在莱希费尔德大败匈牙利人，这场战役堪称10世纪最辉煌的一次，叛乱活动就此趋于平息。德意志终于从马扎尔人威胁中摆脱了出来，而匈牙利人也停止了来无影去无踪的四处侵扰，而开始了定居生活。此后，帕骚主教开始在匈牙利传播基督教，在奥托三世执政时期取得了成功。由此，匈牙利在文化上成为西欧的一部分。与之相比，俄罗斯却是另一种情况。奥托一世从这次叛乱中痛苦地却又是实实在在地汲取了教训：政权的巩固，并不能尽皆寄托于自己的家族。叛乱平息后，他转而寻求得到教会的支持。

他最年幼的弟弟布鲁恩从事圣职，担任科隆首相兼大主教，而在“红色”康拉德被废除后，还兼任了洛林大公（这个新设职位，把大主教与公爵集于一体）。奥托一世很信任这个弟弟，接受了他提出的颇有见地的建议。布鲁恩负责遴选和培训一些教士，尔后安排他们在奥托一世的宫廷担任高级职务。也就是说，这群新型精英同时兼任世俗和教会双重职能：主教和修道院长们既拥有司法裁判权，也有权收税、造币和管理当地的市场。这样，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形成了十分紧密的联系。

在忠诚的教士们管理下，教会占有的土地负责在法庭巡回至本地时提供资助。更重要的是，奥托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教会提供财力支持。



34 奥托一世向耶稣基督献上马格德堡大教堂模型。左一为奥托。陪同者是圣莫里修斯和一个天使，在场者还有圣彼得和为建造大教堂出资的两个圣徒。这具975年出品的象牙雕刻，可能来自意大利北部。

虽然这一机制在奥托执政时期运转颇为顺利，但也开始滋生冲突的种子：奥托和布鲁恩联手，令教会变得财力雄厚、权力巨大，但也因此变得更加贪婪，不久便令那些真诚而热心的改革者感到惊恐莫名了。奥托虽然强化了君主政治，但却部分地代替了教皇的职能。于是，一些主教开始大声疾呼，教会理应对世俗社会拥有主导权。

亨利一世虽然曾打败了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但这些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尚不足以令边境地区免于小股武装的劫掠。因此，奥托决心巩固[33]那些马克（边区。其行政长官称为“马克伯爵”——译注）。但他的军队在波希米亚人面前吃了败仗，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征服了这个颇为强盛的民族。在北方，奥托建立的日耳曼人对斯拉夫人的控制一直延伸到奥得河，并建立了两个庞大的马克。其中，跨易北河有比隆马克大体上包括荷尔斯泰因和马克伦堡，其征服者赫尔曼·比隆是与奥托关系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后来担任萨克森公爵者便是他的后人。而在南方，格罗大马克幅员更为辽阔，在马格雷夫·格罗于965年去世后，该马克被划分为若干个更便于管理的小边区。

奥托的东方政策，不仅依靠剑，也要借助十字架。对于异教徒的斯拉夫人，他采取强制措施使之皈依基督教，第一批受洗礼的往往便是斯拉夫人的亲王们。为了管理传教工作，他在勃兰登堡、哈费尔贝格、奥尔登堡均设立了主教区。当丹麦人皈依后，他又在奥尔胡斯、里彭、石勒苏益格设立了主教区。为了管理东方地区的传教事业，马格德堡被提升为大主教区，而俄罗斯如果不是女大公奥莉加的儿子更乐于接受拜占廷的传教士的话，本来也有希望成为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这种拒绝听从母亲意愿的做法令奥莉加颇为不满，并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将属于东方而非西方教廷，因此它将始终无法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当博列斯拉夫一世于950年臣服于奥托后，德意志传教士开始在波希米亚积极传教，并在美因茨大主教区下面新设了布拉格主教区。

东部马克的地域范围大体上与今天的奥地利相当。奥托一世对该马克的管理方式，与格罗、比隆马克相似，区别则在于对东部马克全面实行了德意志化。近千年以后，当希特勒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后，将之易名为“东部马克”，就是为了强调它在历史上就曾经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边疆省份。

951年，伊夫雷亚（位于都灵以北40英里处）的贝伦加尔夺取了意大利王座，前任国王洛泰尔的年轻遗孀阿德尔海特向奥托求助。奥托把握住这一机会，征服了伦巴第，并娶阿德尔海特为妻，戴上了“伦巴第国王”的王冠。他还向罗马教廷提出了加冕称帝的要求，但遭到后者怠慢。由于在北方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很多，奥托回到了德意志。十年后，当教皇乞求他出面对付贝伦加时，他将再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

962年2月2日，教皇约翰十二世在圣母玛利亚节这一天，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仪式，为奥托加冕。虽然称帝仪式刻意效仿当年的查理大帝，但

奥托并不能称作西欧的统治者，而只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962年称“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512年后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初始，神圣罗马帝国领有德意志兰、意大利和伦巴第——译注）。奥托一世虽被尊为“大帝”，但皇帝的头衔并不能自动传给每个德意志国王；德意志国王为得到皇帝称号和皇位，必须去罗马由 35 教皇加冕方可，没有加冕的只能称为“德意志国王”。诚如此，便需要皇帝与教皇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并必须介入意大利政治生活。在初期，皇帝系作为高级伙伴与教皇共同统治，而根据962年他与教皇之间达成的《奥托特权协定》（Ottonianum），皇帝取得了对教皇选举的决定性权力：希望当教皇者，必须保证忠于德意志国王；皇帝既是德意志国王，又是意大利国王，虽然它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王国，却又通过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私人联盟紧密联系在一起。到1032年以后，皇帝还同时是勃艮第国王（勃艮第仍保持独立地位，但被置于皇帝的个人统辖下）。

为了宣示自己对教皇和罗马教廷握有的权威，奥托废除了约翰十二世的教皇职位，迫使教廷服从自己的意志。在他刚刚离开之后，教廷便推选了另一位教皇。当他于966年第三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时，奥托把自己的权威扩展到意大利南部地区，打击了拜占廷王朝的影响力。在经历一系列会战后，阿普利亚被割让给拜占廷，而德意志则得到了卡普亚和贝内文托。至此，两大王朝宣布媾和，奥托一世之子、副皇奥托二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与拜占廷公主西奥芬诺结为夫妇。后来的历史证明，西奥芬诺将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皇后。最重要的是，德意志帝国终于得到了拜占廷皇帝的正式承认。

973年，奥托一世举行盛大仪式，接见来自世俗社会和教会的重要人物，以及来自拜占廷、罗马、俄罗斯、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丹麦甚至来自非洲的使臣。此后不久，他便去世了。此时，他所缔造的王朝正如日中天，但还远远谈不上安全无虞：继任者奥托二世不得不面对一系列贵族叛乱：叛乱起始于德意志南部地区，为首者是巴伐利亚公爵“争论者”亨利，继而又波及到士瓦本和洛林，接着是波兰和波希米亚。西法兰克人仍念念不忘要夺回洛林，派军队袭击了亚琛，但奥托二世脱险后组织反攻，一直追击到巴黎。在恢复了国内的稳定局势并击退西法兰克人之后，奥托二世前往意大利，帮助教皇对付反叛的罗马贵族。然而，在教皇的地位已得到稳固之后，他又轻率地做出了挥师南进的决定，打击拜占廷人以及从976年起袭击西西里的阿拉伯人。他先是在阿普利亚取得了对拜占廷人的巨大胜利，接着南下在卡拉布里亚与阿拉伯人对阵。结果，他在科隆角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只是自己捡回了一条命。祸不单行，他接着又得知消息说，斯拉夫人利用他前往意大利之机，收复了他们当年被奥托大帝在易北河以东地带夺取的几乎所有土地，而丹麦人也开始袭击德意志北部地区。就在他滞留在意大利期间，奥托二世被传染上了霍乱，于983年去世，死时年仅28岁。在所有德意志皇帝中，只有他被安葬在圣彼得大教堂。

第二章　从奥托王朝到萨利安王朝

36　983年，奥托三世尚未成年，但在其祖母阿德尔海特、母亲西奥芬诺及她们的谋臣美因茨公爵、沃尔姆斯公爵的掌控下，帝国仍有条不紊地维持着运转。她们努力安定了北方，使境内的斯拉夫人安然无事，并说服休·卡佩(法国国王)放弃了其祖先在洛林的领地。994年，奥托三世年满15岁而长大成人，立即宣布了自己对意大利和帝国的宏伟计划。他是一个富有朝气和活力、智力过人、有教养的年轻人，决心追随自己那些伟大祖先们的步伐。



《奥托三世的福音书》(公元1000年)插图局部。图上，奥托三世端坐在皇位上，大主教和教会头面人物分站两侧，接受代表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高卢人和罗马的代表敬献的礼物(现收藏于慕尼黑州立图书馆——译注)。

奥托王朝的终结

37



《班贝格福音书》(公元1010年)抄本插图。上半幅描绘的是基督为亨利二世和库尼贡德加冕，两旁的两个使者是圣徒彼得和圣徒保罗。下半幅描绘的是来自各民族和部族的代表，向这对夫妇致敬。居中的圣座代表罗马教廷，把统治全球权力的象征物交给皇帝。加冕仪式对于加强皇帝在宗教领域和世俗权力领域的地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996年，奥托三世前往意大利，接受贵族们的致敬。在他前往罗马接受加冕的路途上，教皇去世了，于是他任命了自己的堂兄弟和私人牧师卡林西亚的布鲁诺担任圣座，称为格雷戈里五世。这样，他的帝国与教皇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奥托被宣布为“罗马人的皇帝”。但一等到他离开意大利北上，前往他所钟爱的亚琛皇宫，罗马人便另行推选了一位教皇，并赶走了他的那位堂兄弟。奥托遂返往罗马，以极其残酷的手腕镇压了这场叛乱，尔后在帕拉坦山建造了皇宫。对于因此举而造成置《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ofConstantine，是约在查理曼时代出现的一份文件，内容叙述君士坦丁大帝因教皇西维斯特的祷告，麻疯病得以痊愈，在感激之余，他决定迁都至拜占廷即后世的君士坦丁堡，目的是为了不让俗世政府妨碍教皇的属灵政体。根据该文件，君士坦丁离开罗马时，下令所有教会圣职人员都要臣服于教皇西维斯特一世以及他的继承人，此外，君士坦丁还将罗马城和意大利所有的省份、地区和城市都转移给教皇——译注）之规定于不顾，奥托三世厚颜无耻地声称这份文件系出伪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教廷和罗马人的不满。1001年，罗马人发动暴乱，奥托三世被迫逃离。面对这种困顿局面，他认为这肯定是自己的错误遭到的天谴，不久之后宣布放弃罗马帝国皇帝头衔，过上了隐士生活。但他这份真诚悔过态度，似乎并未得到上帝的饶恕：第二年他便去世了，年仅22岁，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奥托三世去世后，继位者是巴伐利亚公爵“争论者”亨利的儿子亨利二世。新帝认识到，帝国的关键在于德意志而不是罗马，因此，任何复活罗马帝国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亨利二世在美因茨加冕后，着手巩固了自己在全德意志的王权。在内部的安全得到保证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波兰公爵博列斯拉夫·乔布里，后者在兼任波希米亚公爵后，正在东方构建一个庞大规模的王国，从而对亨利二世在德意志的权力构成了挑战。为了联合起来对付他，亨利二世与拒绝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部族结为盟友。这一苟且之举，曾令他不止一次地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只是在班贝格建起一座气势不凡的大教堂之后才稍稍缓和了这种情绪。经过一系列的会战之后，博列斯拉夫被其控制起来，虽然亨利二世允许他保留西里西亚的卢萨提亚马克（边疆地区），作为帝国的采邑。


装饰班贝格大教堂入口处的亨利二世和妻子库尼贡德的雕像。建造这座气势不凡的大教堂，部分原因是为了缓和因与拒绝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部族结为盟友引起的良心上的不安。由于波兰公爵博列斯拉夫·乔布里对亨利二世在德意志的权力构成了直接挑战，后者选择了与异教徒部族结为盟友。

1004 年，亨利在意大利进行作战行动后，在帕维亚被加冕为伦巴第国王。直到 10 年之后，他才前往罗马，加冕为帝国皇帝。在镇压了罗马的一次暴动之后，他于 1022 年在意大利南部展开对希腊人的作战，使萨莱诺、本内韦托、卡普亚回到了帝国版图之内。他恢复了《奥托特权协定》（指奥托大帝 962 年对《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效力的认可），从而抛弃了奥托三世把罗马从教廷剥离出来的做法。

亨利三世对勃艮第的政策，也是效仿奥托大帝：奥托曾娶过勃艮第国王的妹妹为妻，而亨利则是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三世的侄子。鲁道夫膝下无子，遂把亨利二世认为继承人，并把巴塞尔交给他，作为自己这一意愿的 [38] 证明。勃艮第的贵族们却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坚决反对鲁道夫的政策。为了落实自己的继承权利，亨利二世遂两次对勃艮第动武。尽管他死在了叔叔鲁道夫三世的前面，但他那精力充沛的继任者康拉德二世将把勃艮第王国纳入到德意志帝国。

亨利二世通过更紧密地关注教廷事务，不仅恢复了帝国的领土完整，而且强化了君主权力。他不仅监督对主教的选拔，而且可以对许多重要的教会人士的任用拥有决定权。亨利二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的人，而且很清楚地知道教会对教育帝国官吏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他鼓励教廷改革，并对一系列修道院进行了革新。对于属于教会的地产如果加以有效管理，可以产生良好经济效益，并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也一直保持关切。

亨利二世于 1024 年 7 月 13 日去世，葬在他钟爱的班贝格大教堂。由于奥托王朝男系绝嗣，他那精明能干的妻子库尼贡德在一段时间接替了他的位置，直到新任国王被推举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亨利二世生前便很信任妻子，在自己前往外地时常常把国务交由她来处理。当诸公爵推举出萨利安家族的康拉德二世即位后，库尼贡德遁入了一处本笃会女修道院。

萨利安王朝

王朝名称虽已更迭（康拉德二世系王族的女系后嗣，属于法兰克尼亚萨利安家族——译注），但康拉德二世的统治仍然遵照前朝旧制。1025年，他在康士坦茨接见来自帕维亚的代表，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当亨利二世去世时，帕维亚的一座王家城堡被夷为平地，这些代表便是前来请求康拉德二世原谅的。后者的回答是：“当国王去世时，王国仍然存在，就像舵手倒下的时候，船依旧在那里存在一样。”这句话清晰地界定了王国与国王的区别。

虽然在诸王子之间平分王国的法兰克人传统被废弃时，国家作为一个超越国王个人的概念即已形成，但清晰地阐明这一原则的第一人当数康拉德二世。他就王国所说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整个奥托帝国，但这一主张遭到了意大利的很多贵族的拒绝：他们提出，意大利国王应由法国国王之

子罗伯特二世继承；当罗伯特表示拒绝后，他们又提议王位由阿基坦公爵威廉之子继承，但同样遭到了拒绝。意大利教区大体上是忠于康拉德的，因此后者于1026年春开始，得以在有利的环境下展开意大利境内的作战行动。经过一年时间的作战，意大利王国被迫听从他的意愿，南方的诸马克也相继被征服。1027年复活节那一天，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为皇帝。英国和丹麦国王卡努特、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三世均出席了这一场面宏大的加冕典礼。由此，康拉德作为与奥托大帝、亨利二世等杰出前任相当的地位，得到了普遍承认。



奥格斯堡铸造的单面银币(薄片币，Bracteate)上的亨利二世头像。

作为亨利二世的继任者，康拉德二世要求得到勃艮第王位的继承权。虽然鲁道夫三世这时属意于另外一个人选，但鉴于康拉德的文治武功，还是被迫接受了这一要求。为了宣示自己得到勃艮第王国的决心，康拉德占领了巴塞尔，然而在鲁道夫三世于1032年9月去世后，康拉德的全部精力 [39] 都集中在萨克森，鲁道夫的侄子、香比尼公爵奥多二世宣称自己应继承王位，并得到了勃艮第的相当比例的贵族的支持。而这时来自勃艮第的代表们已经把王位献给了康拉德。后者遂立即展开反制措施，1033年2月在圣艾黛莉皇后（931－999年，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二世的女儿，原为意大利国王的妻子，意王死后改嫁给奥托二世——译注）建造于佩耶内（彼得林根）的一座教堂举行了加冕典礼。尽管康拉德与法国国王和米兰大主教均结成盟友，使自己占据了极其强势的地位，但真正把勃艮第纳入到自己控制之下，仍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勃艮第王国并不是那个属于法国一部分的勃艮第公爵领地。王国北起吕克瑟和巴塞尔，向南一直延伸到马赛和尼斯。康拉德把它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令帝国增加了相当一大片领土。虽然为了让那里的贵族们臣服，历任皇帝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仍值得他们不遗余力：只要勃艮第处在日耳曼人的手里，哪怕这种控制权并不牢固，帝国经阿尔卑斯山连通意大利的西部通道便可获得安全保证。因此，该王国对于日耳曼人在意大利的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康拉德二世（990—1039）在施佩耶建造的教堂。



康拉德为强化低级骑士阶层的地位，作了大量努力。一方面，这些低级骑士在军事上的贡献对他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为了对付势力强大的米兰大主教阿里伯特，他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低级骑士们要求使自己的服役领地变成为继承领地，以免封建领主一时心血来潮便能予以剥夺。而在这场贵族与低级骑士的斗争中，阿里伯特站在贵族们一边。当康拉德为解决这场争端前往意大利时，低级骑士们在伦巴第境内的康波马洛之战中获得的胜利，使斗争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这时，大主教的选择是向康拉德发起挑战。

在攻打米兰的图谋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康拉德1037年5月28日颁布了《领地诏令》，规定所有领地，不论占地多少，均享有继承权。新法令最初仅适用于意大利，但很快便推广到了德意志地区。它对低级贵族这个



亨利二世《金福音书》(1050年)中"圣马克福"一节的插图，描绘的是基督在治疗一位瘫痪病人。

介于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的新阶级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意义。在意大利，这个新阶级主要是由低级骑士构成的，而在德意志，则还包括家臣。这些家臣（侍从）虽非自由身份，但通过购置土地，事实上也跻身于低级贵族之列，只不过他们仍需效命于教会的和世俗的领主。在皇权的支持者之中，这些家臣是最坚定的一支。

利用康拉德远行意大利之机，他的老对手、香比尼公爵奥多二世向位于亚琛的皇宫发动了进攻。而在康拉德放弃对米兰的围困后，阿里伯特大主教将之理解为康拉德已经溃退，因此提出应由奥多二世担任意大利国王，甚至 40 还想把皇位交给他。不过，当地以戈兹罗一世公爵为首的贵族们仍然忠于皇帝。1037年11月15日，双方军队在巴勒杜克进行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会战，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大规模、最残酷的战事之一。奥多的军队被消灭殆尽，他本人战死，其使用的战旗则被送到意大利交给康拉德二世。

第33页图：亨利三世(1017—1056)带着鹰打猎。打猎是中世纪精英阶层最时尚的休闲活动，而品相不凡、受过高度训练的动物则不仅是主人们财富和特权的象征，也是展现他们技能与权威的手段。打猎不仅被视作艺术，还被看成一门科学，那时人们就打猎写下的许多论述，对动物学和鸟占术（根据鸟的飞翔和鸣叫占卜凶吉的占卜术——译注）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虽然未能征服米兰，康拉德二世却再也不会面临阿里伯特与奥多二世结盟的威胁了，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宣示自己在南意大利的权威。在返回德意志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处理教会问题。虽然出卖教会高级职位，为皇室聚敛财富的做法，被米兰大主教阿里伯特等教会中的反对者斥为"买卖圣职"，但他不为所动，仍全力支持改革运动，并为强化皇帝对教会的权势采取了大量行动。

在意大利进行了短暂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后不久，康拉德二世便于1039年6月去世，时年49岁。他被葬在他开始兴建的施佩耶教堂。后来，这座教堂成为萨利安王朝最重要的纪念场所，也是后继的日耳曼人皇帝们的安葬地。



亨利三世

为了使自己的儿子亨利三世继位，康拉德生前做了仔细的准备。1027年，亨利三世被推举为国王时，年仅10岁。除了从奥格斯堡主教布鲁恩、弗赖辛主教埃伊尔伯特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外，亨利三世还从宫廷牧师维波以及他那精力旺盛、聪明过人的母后吉泽拉那里学习了很多本领。42 1026年，他获任巴伐利亚公爵，并在14岁而成年后即独立掌管该公爵领地。1038年，他又成为士瓦本公爵，并加冕为勃艮第国王。因此，当父亲康拉德二世去世时，他已做好了充分的继位准备，没费吹灰之力便获得了推举。

根据传统，亨利三世继位后走遍帝国各地，宣示自己的权力和威严。德意志并无首都，皇帝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但凡成功的皇帝，都需要不停地巡游四方。虑及此点，对于中世纪时代两座最著名的雕像，即班贝格和马格德堡的两座，展现的都是皇帝骑在马上的形象，便不难理解了。皇后同样没有固定的住所，因此在丈夫出行时会跟随着，并作为皇帝精明强干的搭档，在国务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

帝国的重要决策，都是由高级教会人物和地位最尊贵的贵族出席的帝国大会（Reichstage，前身为在皇帝的倡议和主持下召开的由德意志主教和部分高级世俗贵族参加的“高级宗教会议”，后演化为帝国大会——译注）作出的。这类会议规模和会期不等，只有在商定真正重要的国务时，这一名称才会名符其实。教会事务则在“宗教会议”（synod，由枢机主教组成。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译注）上讨论，国王虽然是会议的名誉主席，但真正主持会议的一般是作为德意志教会首领的美因茨大主教，或者便是教皇的使臣甚至教皇本人。历代国王不论旅行到哪里，宫廷便随之迁至哪里，因此普通臣民可以请求国王恢复正义。

中世纪国王们的收入非常短缺，因此把宫廷设在“马背上”，在财政意义上很有必要。国王一行可以住在王家领地的世俗的或教会的租用者家中，把接待开支和租金作抵消。考虑到当时社会的交通、通信条件很落后，这种“旅行治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失为一种有效方式：从经济上看，它免除了剩余粮食运往皇家粮仓之费用；从政治上看，宫廷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一般每天旅行10至20英里，可以使国王真实掌握王国的情况。而当皇帝建立起固定的宫殿后，往往不要多长时间便会丧失对帝国的控制权。中世纪的平凡百姓认为他们的皇帝是上帝膏立的，具有代代相传的神奇力量，因此如果有幸见到皇帝，便可保障当地不会遭受恶劣天气、坏收成或瘟疫的侵袭。

当亨利三世巡游到东部时，眼前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局面。在波兰，梅什科二世公爵1034年去世后，陷入了一派混乱，公爵的遗孀及儿子

卡什米尔逃到德意志避难；在匈牙利，斯蒂芬国王 1038 年去世后，情况也大致相似；波希米亚公爵布雷提斯拉夫一世利用这一机会，对波兰发动进攻，把克拉科夫洗劫一空，并占领了波兰首府格涅兹诺，尔后带着布拉格第一任捷克主教圣阿达尔伯特的遗体回到了布拉格，希望使布拉格成为一个独立于美因茨的大主教区。对波兰公爵的后人提供庇护的亨利三世，敦促布雷提斯拉夫归还这一“战利品”。由于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于 1039 年派遣军队进攻波希米亚及其盟友匈牙利。虽然亨利三世的军队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到 1041 年 9 月，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布雷提斯拉夫不得不前往累根斯堡出席帝国大会，乞求亨利三世的饶恕。随后，[43] 卡什米尔返回波兰，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成为“复兴者”卡什米尔。不过，匈牙利仍然是亨利三世的一根肉中之刺。

1041 年，匈牙利废黜了效忠于亨利三世的国王彼得。在布雷提斯拉夫的波希米亚支援下，亨利对匈牙利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行动，打败了篡位的阿巴尔，使彼得恢复了王位，并在塞克什白堡举行了盛大的复位仪式。至此，亨利三世在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都有了忠实的属臣，因此帝国的东部诸马克已安全无虞。在牢牢树立了自己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后，他又结束了其父亲生前的与米兰大主教阿里伯特之间的不和关系。亨利三世娶了阿基坦公爵威廉五世的女儿艾格尼丝，强化了自己在勃艮第的地位。结婚 7 年并相继生育了 3 个女儿之后，他迎来了自己的儿嗣的降生，即未来的亨利四世。

1046 年，亨利三世前往罗马接受加冕。当时，号召加强教会和教皇权力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出现（在德意志，各主教都直接隶属于皇帝，并由皇帝授予职权。皇帝们往往出卖教会高级职位聚敛财富，并把一些原属教会的地产拨给自己的家臣和骑士。为了创立教会对世俗权力的独立性，10 世纪起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运动。由于系由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的教士们发起，因此亦称作“克吕尼派运动”——译注），但在圣彼得教堂尚无任何反应。对于亨利三世的到来，至少有三位历任教皇（本尼狄克九世、西尔韦斯特三世、格雷戈利六世）在等候着，而且他们分别拥有一支强大的帮派。

这里不妨交代一下背景：本尼狄克九世厌倦了教会生涯，渴望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结婚男子，因此把教皇职位出售给了得到罗马富甲天下的皮耶莱奥尼家族支持的约翰·格拉蒂阿努斯。格拉蒂阿努斯担任教皇后，称为格雷戈利六世。就任后，他立即显示出自己将严肃对待这一职位，并得到了枫丹阿韦拉纳修道院院长、意大利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彼得·达米安的支持。达米安激烈地抨击本尼狄克九世出售教皇职位的行为，称之为“出卖圣职的千头毒蛇”，宣称这条“毒蛇”已被踩在脚下，教会将在格雷戈利六世的主持下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但格雷戈利六世却没有这么自信：他知道，亨利三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对宗教事务非常重视，因此对后

者是否将认可自己接任教皇感到忐忑不安。

而亨利三世一向把自己视作基督的代理人、当代的大卫王，因此不可能对格雷戈利六世以如此令人不齿的方式成为教皇视若无睹。于是，在苏特里举行的宗教会议上，格雷戈利六世和西尔韦斯特三世均遭到罢免。此后，教会会议又在罗马召开，解除了本尼狄克九世的职务。亨利三世决心寻找一位并非罗马人的新教皇，以保证教廷不再卷人罗马政治生活，从而令其具有普世性质，并保障教会能够从中枢展开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无意于前往罗马的班贝格主教苏伊德格，听从了亨利三世这位世俗君王的意愿，被推举为新任教皇，改称克莱门特二世。他同时仍保持班贝格主教一职，因此可以继续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和日后生活的可靠保障，但付出的代价则是他已无法摆脱与亨利三世的结盟关系。

克莱门特接任教皇一职的第二天，即 1046 年的圣诞节，他在圣彼得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后的弥撒。他严词谴责买卖圣职之举，因而使自己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带头人。但是，由于他在 1047 年 10 月突然去世，克莱门特二世对这场改革未能发挥明显推动作用。尔后，新教皇又是由亨利三世选出的，他便是阿尔萨斯贵族、图尔主教布鲁恩。

44

布鲁恩遂成为利奥四世。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杰出的新教皇。他受到过良好教育，极具魅力，富有演说才能，性格坚强，上任后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宗教改革运动之中。他借鉴亨利三世的统治模式，不知疲倦地周游欧洲各地，巡游每一处主教区和修道院，召开宗教会议，以确保改革得以

卡诺萨之行

皇权与教权的斗争，由于皇帝亨利四世和教皇格雷戈利七世 1077 年在卡诺萨的会晤，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当时，教皇应德意志封建领主们的邀请，准备前往德意志调停他们与皇帝之间的争端。为使教皇取消此行，亨利不顾路途危险，在冬季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教皇得知他已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消息后，为审慎和保险起见，决定前往托斯卡纳边疆伯爵夫人马蒂尔达位于卡诺萨的城堡。被称作"圣彼得的女儿"的这位伯爵夫人，拥有巨额财富和权势，她那位遭人厌恶的丈夫已于上一年去世。她保持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宫廷，身边簇拥着一大批满嘴甜言蜜语的马屁精和油头粉面的空头理论家。

伦巴第的贵族们盼望着亨利的到来，能够使他们从醉心于权力的教皇那里获得解放，因此对这位国王的驾临热烈欢迎，盼望他前往罗马加冕后，用一个更加顺从的人选替换掉格雷戈利七世。为了保障亨利此行一举奏效，他们还做好了组织一支军队的准备。然而，亨利根本不理会他们的这种愿望，而是急切地希望向教皇忏悔，以换取后者对他在德意志恢复权威的谅解。前往卡诺莎城堡后，身披麻毡，双脚赤裸，在风雪中等候许久，教皇才允许他进入城堡相见。格雷戈利七世的处境也很尴尬：如果听任亨利独断专行，那么他将再也无力反制之；如果拒绝他的要求，则势必遭致报复，而自己并不能得到教众的支持。三天之后，教皇做了让步，给了这位忏悔者一个赦罪的吻。亨利承诺将尊重教皇就他与德意志封建领主之间斗争的裁决，并保证在自己的王国全境将不兴刀兵。然后，亨利匍匐在教皇面前，展开双臂，使全身呈十字形，接受了教皇的宽赦。在和解后举行的宴会上，这位国王一物不食、一言不发，只是郁闷地用指甲在餐桌上涂画些什么。

在教皇认可了其国王地位之后，亨利仍然希望打消教皇与德意志封建领主们会见的念头。而在格雷戈利这一边，虽然并未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却已结结实实地羞辱了亨利一番。然而，封建领主们却认为，教皇恢复亨利国王地位一举是对他们的背叛，因此不再把教皇视作自己有价值的盟友。伦

进行，并宣示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权威。不过，他的改革努力并未完全取得成功。他试图使罗马教廷对一切基督教信仰地区均取得支配地位，导致东正教（拜占廷）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爆发了严重分歧。为了扩展疆土，利奥四世纠集了一支由杀人犯和流浪汉组成的贱民军队，对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发动进攻，而亨利三世拒绝提供支持。这支贱民军队遭到了失败，利奥四世被诺曼人俘虏。1054 年，他被释放回到罗马后不久便去世了。

其继任者是他亲自选拔的艾赫斯塔特主教格布哈德，即维克托二世。后者全力协助亨利三世，抛弃了利奥四世奉行的与皇帝争夺权力的做法。与此同时，亨利三世统治下的帝国在边境地区不断出现分崩离析趋势：匈牙利脱离了帝国；帝国与法国的关系趋于恶化；洛林和佛兰德人爆发骚乱；斯拉夫人频频袭击东部诸马克。亨利三世当年上台执政时，曾被人们普遍视作一位 [45] 虔诚的、公正的、爱好和平的君主，但当他在 1056 年自己 38 岁那一年去世时，人们的看法已大相径庭，而这时帝国也损失了相当数量的人口。

自亨利三世以后，再也没有哪位皇帝像他那样既统治着教会又通过教会开展统治。不过就其本质而言，亨利三世其实更接近于一位军阀。在他统治时期，帝国的政治制度仍然相当粗陋，而他所喜爱的建在戈斯拉尔的宫殿既不是首都，也不是什么行政管理中心。司库、管事、祭酒、司仪主要负责处理皇帝的私人事务，监督宫廷人员，保证君主的人身安全。皇家

巴第的贵族们则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国王未能保护教会免遭格雷戈利这位野心勃勃的危险人物的荼毒，而是遭受了一次严重羞辱，因此"卡诺莎晋见"得不偿失。总体上看，虽然亨利的政敌们的地位遭到了削弱，但他在支持者中的声誉也遭到了损害，政治生命遭受了一次严重挫折。不用多久，事实便会证明他这次受辱并未换取到什么东西。

因此，卡诺莎晋见不仅被当时的人们视作一次难堪之行，直到今天仍不时被当作强权人物委曲求全的例证而频频谈及。奥托·冯·弗赖辛曾经写道，教廷通过把这位罗马国王视作普通意义上的违法犯科者而不是极具权势的统治者，一举摧毁了亨利四世的帝国。

1873 年 5 月，当普鲁士政府与天主教会的斗争达到高潮时，俾斯麦对议会说，"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他都永远不会有什么"卡诺莎之行"！



亨利四世单膝下跪，乞求托斯卡纳边疆伯爵夫人马蒂尔达及她的教父、克拉尼修道院院长胡戈在教皇格雷戈利七世那里代为说项。

私人礼拜堂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负责为主教管区秘书室充实人力，并负责提供记录员和公证人。不过，尽管该礼拜堂和秘书室在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均居于政权的中枢位置，但其制作的书面文献却少于加洛林王朝时期，而且留世的那些文献也基本上是关于教会事务的。在萨利安王朝时期，皇帝的私人助手们既不设档案，也不作文献登记，司库甚至从来不保留帐目记录。由于宫廷永远处于流动状态，所以不可能设立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下载到12世纪中叶，这种随意性很大的统治方式才试图注入一定程度的秩序。

亨利四世与通往卡诺莎之路

[46] 当其父亲去世时，亨利四世年方6岁，但已被推举为国王并举行了加冕礼。他的母后艾格尼丝代为摄政，由此招来了贵族派别的愤怒。在这些德意志贵族眼中，艾格尼丝这位阿基坦公爵威廉五世的女儿，是一个外来者。因此，她得到的全部支持仅限于教会的封建主。在她摄政期间，一大批大权在握的公爵得以在自己的领地自主行事，而不再听命于王室，而她所信任的许多封建主，包括士瓦本公爵鲁道夫、巴伐利亚公爵奥托、克劳滕公爵贝特霍尔德等，都变成了她儿子最危险的对手。其中，鲁道夫还绑架了亨利三世12岁的女儿，对她这位皇太后加以恫吓。

内部冲突遂在全德意志各地爆发，尤其是在莱茵河下游两岸，科隆大主教安诺与帕列丁伯爵亨利之间的争夺导致了多起流血事件。为了干涉围绕匈牙利王位继承权问题而起的争端，帝国派遣了一支军队但遭到失败，令王室的威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艾格尼丝摄政期间，在很大程度上对勃艮第和意大利不予过问。曾经在罢黜格雷戈利四世和利奥九世的教皇职位中均参与其事的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原为负责协助祈祷，后发展成为由强大的教会封建主组成的集团，日益左右罗马教廷的政策，并在选举教皇事务中，寻求排除罗马贵族和德意志皇权的干预——译注）团成员之一的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权势显赫的幕后人物。在他的推动下，教廷越来越脱离了皇权的控制。最后一位忠于德皇的教皇维克托二世于1057年去世后，洛林主教兼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院长弗德里德克被推举为新教皇，其间并未告知皇后艾格尼丝。弗德里德克成为教皇后，改称斯蒂芬九世。他推行反对皇权的政策，但其在位时间还不到一年时间。此后，罗马贵族主导了新教皇的选举，由本尼狄克十世接任，而枢机主教团成员们离开了罗马，其领袖希尔德布兰德则作为教廷使臣留驻德意志。当他返回意大利后，保证了佛罗伦萨主教被选举为教皇，改称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在1059年颁布《提名诏令》，规定枢机主教团有权提出教皇人选。由此，罗马贵族将排除在教皇推举程序之外，虽然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利在诏令中仍悬而未决。

尼古拉二世1061年去世后，枢机主教团在诺曼人军队的卫护下，要行使他们这项新得到的权利了。他们挑选出卢卡主教接任教皇，改称亚历山大二世。艾格尼丝拒绝接受这个人选。为了重新恢复皇权对教皇职位的推选权，她支持帕尔马主教卡达洛成为敌对教皇（anti - pope，旧译“伪教皇”，天主教中拥护某一教皇者加之于对立的另一教皇的贬称。该教认为同一期间合法的真教皇只能是一个，其他就是敌对教皇——译注），改称奥诺里厄斯二世。分别拥立亚历山大二世和奥诺里厄斯二世的两派遂在罗马展开内战，奥诺里厄斯二世被赶出罗马，在帕尔马度过了余生。

皇后艾格尼丝的反对派决定采取行动：这些人关心帝国的安全，对国务大权被交到一个女人的手中深恶痛绝，还妒忌艾格尼丝最亲密的顾问（相传是她的情人）、奥格斯堡主教亨利。1062年，科隆大主教安诺诱骗亨利四世乘船沿莱茵河而下到了科隆，然后劫持了他。在这场政变中，帝国御玺也落到了安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艾格尼丝辞去了帝国摄政一职，交由安诺大主教接替。但这个政治暴发户，很快便遭到了汉堡-不来梅大主教阿达尔伯特的竞争。后者来自一个希望成为“北方教皇”的古代 47 贵族家族。安诺还被迫同意了与美因茨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分享摄政权。德意志诸位主教之间激烈的权力之争，随着国王在戈斯拉尔皇家私人礼拜堂参加圣灵降临节弥撒，走向了戏剧化的顶峰：富尔达修道院院长和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御下的两支武装部队，在弥撒期间彼此把对方消灭殆尽，国王则逃到了他的城堡。

1065年3月29日，亨利四世15岁时在沃尔姆斯得到了骑士资格。但这位满脸病容的年轻国王，身边都是些出身卑微的年轻男子，根本无力摆脱科隆大主教安诺及其强大盟友的支配。1066年，安诺及其同盟中的伙伴把不来梅主教阿达尔伯特赶出了宫廷，从而去除了他们最具权势的竞争对手。亨利也被迫与他父亲生前挑选的、年方14岁的都灵的贝尔塔结了婚。不论是因为国王心中愤恨不平，还是因为对尚未成年的贝尔塔缺乏性的欲望，这桩婚事都是有名无实。亨利对这位新娘实施虐待，并在1069年要求离婚。然而，在教皇使臣彼得·达米安的阻挠下，离婚之诉未获通过。由此，教皇又一次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皇帝则再一次大丢面子。亨利接受了这项裁决，开始对贝尔塔尽夫君之礼。一年后，他们生育了一个女儿。

不来梅大主教阿达尔伯特被赶出宫廷之举，招致了斯拉夫民族的野蛮人对基督徒实施屠杀，不再皈依基督教而重新信奉异教，并蔑视国王的权威。当时，权势最大的领主“长胡子”戈德弗里，他控制着从洛林通往托斯坎尼的交通要道，维护国王的利益。在他1069年去世后，亨利在王国的边境地带遭遇了麻烦。不过，他成功地摆脱了这些麻烦：1069年，他对斯拉夫人发动军事攻势，虽然只是展示一番力量和决心，却足以挽回他的颜面了。“长胡子”戈德弗里之子、他的继承人“驼背者”戈德弗里，在作战中英勇威猛，对国王忠心耿耿，恢复了王国西部、南部边境地区的稳定。

在亨利四世未成年岁月及其亲政初期，贵族们一步步地蚕食皇家土地和皇室权利，使皇权不断遭到侵蚀。在阿达尔伯特大主教的劝说下，这位年轻的国王决定制止这种局面，遂着手在戈斯拉尔东南方的哈尔茨建立一个皇家领地（即后来归属于法国国王的“法兰西岛”），并建造了一系列坚固城堡加以保卫。对于萨克森贵族们来说，此举无异于暴君无视他们的利益，对他们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他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国王把这些城堡交由外来的暴发户们管理，其中大多数是士瓦本人，由后者对当地的农民进行盘剥。图林根人、萨克森人都满怀怨恨地声称，他们正被降为奴隶。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都希望对国王的做法迎头痛击。为了形成共同阵线，他们短暂地把内部的分歧抛到了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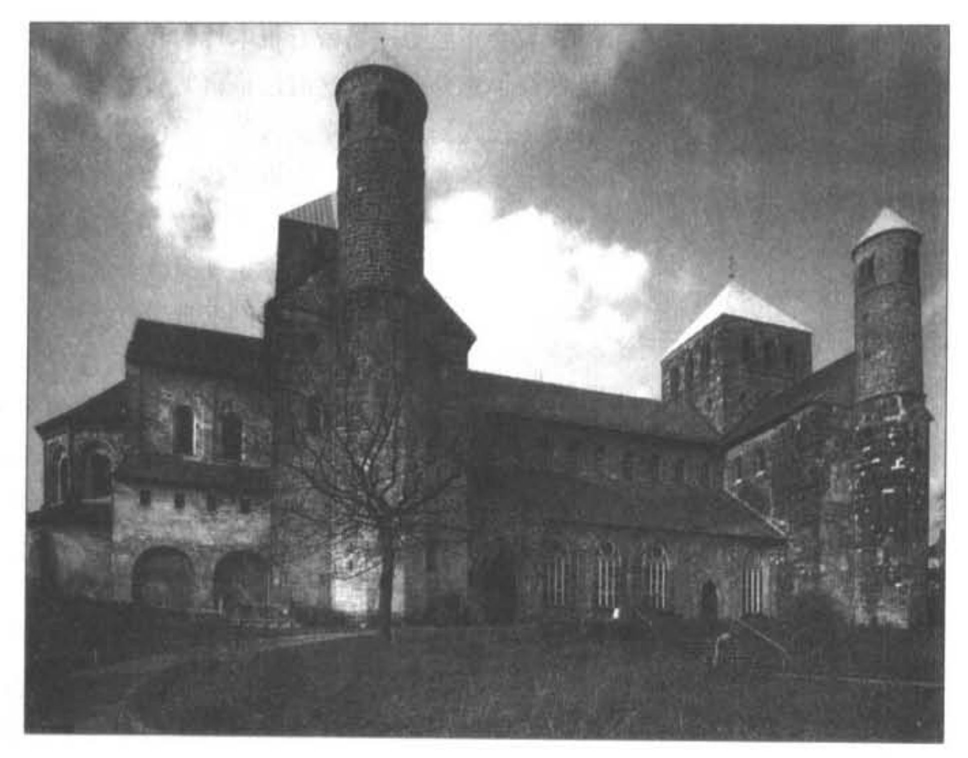
1073年，亨利四世下令调集军队对付波兰人，但有关他的真实动机是为了对付萨克森的流言却不胫而走。萨克森遂敦促国王解散军队、毁弃城堡、恢复在他们看来属于他们的那些权利和土地。上述要求遭到拒绝后，[48] 萨克森调集军队向戈斯拉尔进发。国王逃往其在哈尔茨堡的那座加固式城堡，随后遭到萨克森军队的重重围困。但亨利四世出乎意料地逃到了赫斯费尔德，得以与自己原本准备投入对波兰之战的军队会合。

国王的这支军队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叛军。直到6个月之后，亨利四世才提起胆子进攻萨克森。这时，反对派中的农民与贵族已陷入严重分裂，究其原因，便在于二者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反的。萨克森人当然不能接受因内部分化而被国王打败的命运，遂决定趁当下还占据上风之机，与国王展开谈判。1074年2月2日，双方签订了《格尔斯通根和约》。这份和约的条款极其苛刻，令亨利四世十分难以接受，但他还是同意毁弃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城堡、放弃戈斯拉尔、交还自己夺取的财产、承认萨克森人在古代时享有的权利，以及赦免所有参与叛乱者。

和约规定，哈尔茨堡的教堂将维持原状，因为国王的兄弟和儿子都葬在那里。但是，当地的农民把这座教堂视作萨利安王朝暴政的象征，聚众把教堂夷为平地，并掘出了王室坟茔中的尸体。这一事件明显违反了和约，亨利四世很快组织了一支大军，对萨克森进行惩罚。1075年6月9日，对垒的两支大军在洪堡附近展开激战，王军在“驼背者”戈德弗里的英勇指挥下获得了胜利。萨克森贵族们骑上马匹逃离了战场，听任由农民组成的步兵沦为王军大屠杀的祭品。不过，这场会战的结果，未必便能令亨利四世大畅其怀：虽然萨克森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但他这位国王却也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最忠诚的贵族。

裹挟胜利之威，王军继续向图林根和萨克森东部地带进击，但生性骄傲的萨克森人仍拒绝求和，直到1075年10月亨利四世率领增援部队赶到时，这场战争才告一段落。萨克森的大多数为首人物均遭到监禁，只有权势最大的诺歇姆公爵奥托得到了赦免，并出席了这一年圣诞节在戈斯拉尔的庆祝活动。正是在这次圣诞庆典上，出席者做出承诺：在亨利四世去世

后，将由他当时年仅2岁的儿子康拉德继位。



希尔德斯海姆的圣米夏埃尔教堂，是罗马式建筑的杰作。该教堂最初由贝恩沃德主教于1010年始修建。虽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损毁，但仍能鲜明地展现出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

教权与皇权之争

此时此刻的亨利四世，似乎正处于权力的最高峰，但没用多久，他便遭到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屈辱之一。1076年元旦，他收到了希尔德布兰德（他已于1073年被选举为教皇，改称格雷戈利七世）的一封信，信中警告说，如果亨利还不忏悔，而是继续与那些被革除了教籍的廷臣共事，那么他也将被逐出教会。教皇在这封信中还对亨利未经与之协商，便在米兰、费尔墨、斯波莱托授予主教职位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训诫。教皇声称，鉴于他是圣彼得的嫡系传人，国王必须服从他的教令。他在信中写到，亨利最近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完全是来自上帝的眷顾。

亨利四世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人。他把教皇的信件视作公开宣战，决定起而应战。1076年1月24日，他召集德意志主教们在沃尔姆斯召开会议，共有26位主教在《沃尔姆斯回绝决议》上签了名。该决议告知他们的“希尔德布兰德兄弟”，他们已不再接受他的权威，并就他犯下的一切恶行（包括与一位已婚女子通奸）予以谴责。作为罗马的统治者，亨利四世命令希尔德布兰德下台。国王的复信被大量抄写后，张贴在帝国的大街小巷，由此掀起了一场反对教皇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决议》在结尾时写道：“你呀，我们所有的主教以及我们大家都宣判你有罪，滚下来！离开你不配占有的使徒座位！应该让另外一个无需借助神圣教规的外义来掩盖恶行而以真正圣彼得的教谕教导人的人来登圣彼得的宝座。朕亨利，蒙上帝恩宠的国王，以及我们主教们全体都对你说，滚下来，滚下来！”——译注）。

49

格雷戈利七世拒绝接受这样的羞辱。在收到《沃尔姆斯回绝决议》后，他解除了德意志教区首领、美因茨大主教西格弗里德的职务，暂停所有在决议上签名的主教的权力，并把亲德意志的所有伦巴第主教及一大批法国主教革除教籍（这些主教出于各种原因，分别招致了教皇的不快）。似乎这一切还不够解气，他又剥夺了亨利四世对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治权，解除了所有基督徒对国王的效忠义务，并开除亨利的教籍。

教会正经历一场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为了与世俗政权争夺最高地位，它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这时的格雷戈利七世，似乎有着永不枯竭的精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建立教皇绝对的、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斗争中。他不仅要控制罗马教会，还要凌驾于一切世俗政权之上。毫无疑问，亨利四世正是这些世俗[50]政权中最强大的一个，如果能够战胜这位皇帝，教权必将迎来决定性的胜利。鉴于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对教会的支配权业已丧失殆尽，鉴于教廷已挣脱了帝国的羁绊，格雷戈利七世对自己将最终获胜充满信心。

而意大利的各个城市要求自治、自主任命主教，更令这场教权与皇权之争复杂化了。在所有城市中，米兰的斗争最为激烈。在米兰，无论是大主教还是控制这座城市的低级贵族（骑士）都效忠于皇帝。教皇利用宗教狂热主义，煽动起民众运动，以回应米兰人的反叛。最终，宗教狂热分子遭到了可怖的屠杀，拥戴教皇的派别遭到重创，令这场皇帝、教皇与米兰人之间的争斗达到了高潮。

在德意志的主教中，很少有哪几位准备支持皇帝对抗教皇。利用教皇免除了其效忠国王义务的天赐良机，南德意志和萨克森的贵族们发动了叛乱。两地的贵族结成同盟，决心摆脱帝国约束，选举一位新的国王。看到反叛者似乎成功在望，墙头草风格的诺歇姆公爵奥托再次改变立场，站在了萨克森叛乱者一边。此后，越来越多的德意志主教加入到了教皇的阵营。

但亨利的王冠却得以保留了下来。究其原因，既有诺歇姆公爵奥托与叛乱集团另一位头面人物——莱茵费尔德公爵鲁道夫——之间的争夺，也有格雷戈利七世的考虑在内：教皇想要的结果是亨利顺从于自己，而不是更换一个可能更难驾驭的新国王。德意志的封建领主反对派这时邀请教皇出席他们在奥格斯堡的集会，对他们与国王的纷争作出裁决。格雷戈利七世接受了邀请，准备踏上漫长而又危险的北上之路。

亨利四世迫切需要得到教皇对他整顿德意志纲纪的谅解，遂决定先发制人，阻止格雷戈利七世此行。他穿过勃艮第南下，在巴桑科度过圣诞节后，继续前往热那亚和蒙特希尼斯。天气非常恶劣，路途极其危险，但他一天也不敢停顿：教皇计划在2月2日与德意志诸封建领主们会面。

教皇得知他已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消息后，为审慎和保险起见，决定前往在他看来牢不可破的、托斯卡纳边疆伯爵夫人马蒂尔达位于卡诺萨的城堡。来到卡诺莎城堡后，亨利四世双脚赤裸，在风雪中等候了三天，教皇才允许他进入城堡，在圣母堂相见。

得知皇帝与教皇在卡诺萨相见的消息后，德意志的封建领主们于1077年3月13日召开会议，推举士瓦本公爵鲁道夫为新国王。不过，鲁道夫必须答应一个条件：王位将不再世袭，而是由主教们依教规选举。亨利四世遂调集军队讨伐，鲁道夫被迫逃到了萨克森。不过，虽然亨利主导了德意志中部，但鲁道夫仍然掌控着萨克森。两位国王之间展开血腥战争之际，教皇选择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直到1080年1月，亨利四世终于在图林根



《少女的镜子》(局部)。画上，克劳德·冯·赫尔绍（约13世纪）的遗孀们正在播种和收获。画上的女子们衣着华美，整幅画充满寓意。

的穆尔豪森附近的弗赖契海姆之战中打败了鲁道夫。获胜之战，他立即要求教皇剥夺竞争对手的教籍，并威胁说如果格雷戈里七世拒绝，他将另立 [51] 一位教皇。后者接受了这一挑战，再次把亨利逐出教会，并宣布鲁道夫为德意志国王。他完全无视德意志的政治现实，声称自己对一切世俗统治者拥有裁判权。稍后，格雷戈里七世甚至预言，如果亨利不在8月1日之前来到自己面前祈求饶恕的话，那么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但这一次格雷戈里七世太托大了。把亨利逐出教会一举的政治色彩太明显了，没有什么人会认真看待。亨利在布里克森召集宗教会议，谴责"愚鲁的希尔德布兰德"是一个亵渎上帝者、谋杀犯、巫师，并为他开列了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名，宣布予以罢免，另立拉瓦纳大主教维伯特为教皇。维伯特是一位正派而受人尊敬的改革者，改称克莱门特三世。

现在，既有了两位国王，又出现了两个教皇。所以无论是教廷还是国家，都陷入了严重分裂局面。1080年10月，亨利的军队在怀特埃尔斯特被打败，但鲁道夫被砍去了右臂，第二天便死去了，叛军遂群龙无首。不仅如此，由于鲁道夫曾经宣示效忠于亨利四世，其部下还把他损失右臂看成是来自上天的惩罚。

与此同时，亨利四世继续向罗马进军，以报卡诺萨的受辱之仇。1081年5月，大军进抵罗马，但罗马市民仍然忠于格雷戈里七世，一度让亨利觉得只能收兵。但他对叛军新的领袖、来自卢森堡公爵萨尔姆家族的赫尔曼已在圣诞节加冕称王的消息无动于衷，仍发动了对罗马这座"永生之城"的围攻。围攻战未能奏效，直到第二年春他才重新发动攻势，并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胜利。但教皇仍躲在一处严密设防的城堡内。

格雷戈里七世要求亨利再次效仿卡诺莎晋见先例求得饶恕，但此番形势已面目全非，他最有力的盟友马蒂尔达边疆伯爵夫人此番已无力给予他 [52] 多少帮助，而赫尔曼·冯·萨尔姆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教皇一派最有才华的军事指挥官诺歇姆公爵奥托则于1083年1月死去。格雷戈里七世原来希望得到诺曼·罗伯特·圭斯卡尔德的支援，但后者为了实现夺取拜占廷帝国的希腊这一野心过大的目标，正在全力交战，根本腾不出手来。在

失去这个唯一拥有强大实力的盟友支援的情况下，教皇的防线开始崩溃了。他的一味对抗做法，除了灾难之外什么也没有带给罗马人。厌倦了格雷戈里七世的罗马人遂打开了城门。1084年的濯足节（亦称“圣星期四”，指复活节前的星期四，纪念耶稣基督在受难前夕最后晚餐上为十二使徒洗脚及给他们持守互爱的诫命而创立圣餐礼。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一般指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译注），亨利四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罗马，并在复活节那一天，由敌对教皇克莱门特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举行了加冕为皇帝的仪式。

但是，留给亨利庆祝胜利的时间并不多。格雷戈里七世还在罗马，诺曼·罗伯特·圭斯卡尔德带着征尘离开了拜占廷，撒拉逊人（阿拉伯人的古称——译注）也在西西里加入了他的队伍，一同向罗马进发。为保险起见，亨利撤出了罗马，听凭这座城市接受诺曼人及其穆斯林盟友的发落。随后，城内掀起了强奸和劫掠的高潮，尔后又付之一炬，成千上万的罗马人被掳为奴隶。自从野蛮人入侵之后，这是罗马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灾难。

召来掠夺成性的诺曼游牧部落，令格雷戈里七世在道义上彻底破产。他逃离了罗马，在萨勒诺建立起自己的宫廷。在相隔一段安全的距离之后，他再次开除了亨利四世这个刻骨痛恨对手的教籍，并号召所有基督徒共同消灭这个敌人。不久以后，他便去世了，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没有饶恕亨利四世，不由得令为他送别的教士颇感失落。从这位教皇的口中吐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正义、仇视罪恶，所以我死于流亡之路。”

亨利四世终于摆脱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但他终生都未能从被开除教籍及遭受卡诺萨之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离开罗马后，他在德意志重申了自己的教籍，解除了一大批曾追随格雷戈里七世主教的教职，并追击诺曼·罗伯特·圭斯卡尔德，令后者逃亡到了丹麦。在南德意志，拥护教皇的反对派别的领袖是韦尔夫家族。1089年，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四世之子、年仅17岁的小韦尔夫，与时年43岁的托斯卡纳边疆伯爵夫人马蒂尔达结了婚。这桩纯属政治联姻的婚事，缔造了一个包括南德意志、洛林和托斯卡纳等广大地区的、势力强大的反皇权同盟。

1090年，亨利再次来到意大利，以扫除这个新出现同盟对自己构成的威胁。他夺取了马蒂尔达的大量城堡，迫使她撤至更加坚固的卡诺莎城堡。尔后，马蒂尔达劝说亨利之子康拉德背叛父亲，而恰在这时米兰大主教也改变了立场。因此，即由这位大主教为康拉德举行了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仪式。教皇乌尔班承诺，如果事实证明康拉德忠于教廷，自己将为他戴上皇冠，康拉德遂向教皇效忠。为了进一步把康拉德拴在自己阵营，教皇还为他安排了一桩婚姻，新娘是西西里公爵罗格一世的女儿。至此，意大利的米兰、克雷莫纳、皮琴察和洛迪等城市结成了第一次同盟，加入到反对帝国的阵营。这时的亨利四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且因为对手控制了阿尔卑斯山脉的通道，他也无法撤往德意志。祸不单行，他的皇后普拉希迪斯（亨利

四世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是都灵的贝尔塔——译注）又让他遭受了一次沉重的羞辱：普拉希迪斯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年轻寡妇，原先在道德上就 53 充满疑点，这时受马蒂尔达边疆伯爵夫人的引诱，来到在皮琴察召开的宗教改革会场，声讨自己的丈夫在性爱方面存在严重的性倒错倾向。

这时，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注意力转向了法国教会改革，并号召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罗马天主教会及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在反对异教、维护基督教旗帜掩护下，对地中海东岸诸国，主要是对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军事远征。东征战争从1096年至1270年延续近200年之久，前后进行了8次。因出征者均在衣服上缝有红十字作标记，故名十字军——译注），以挽救东方的基督教徒免遭伊斯兰势力推进之荼毒。亨利四世由此获得了喘息之机。同时，年轻的韦尔夫与马蒂尔达边疆伯爵夫人的联姻也不成功。二者的同盟破裂后，小韦尔夫的父亲、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四世已准备与皇帝和解了。1097年，在被困在意大利7年之后，亨利终于回到了德意志。

次年，亨利在美因茨召开的帝国大会上废除了不孝之子康拉德的继位资格。两年之后，康拉德在佛罗伦萨死去。1099年，他的弟弟亨利被推选为国王。而在教廷那一方，接替乌尔班二世出任教皇的帕斯卡尔二世决心继承前任的衣钵，为增强教权而斗争，遂再次宣布开除皇帝的教籍。亨利曾试图与这位新教皇和解，保证说如果能恢复教籍，他将参加十字军东征，但帕斯卡尔二世未予理会。

亨利四世支持低级骑士和城市自由民，帮助他们增进经济利益。通过不遗余力地制止社会动乱，他赢得了所有渴望和平与秩序、厌倦了贵族阶层内部永无休止纷争的人的支持。他惩处了那些在1096年的大屠杀中犯下罪行的人，从而为犹太人复了仇；他保护那些被强制皈依基督教的人，并希望能让这些人回归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然而，这样的政策必然遭来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们的诅咒。这些人还劝诫新近被立为国王的小亨利：如果他的父亲继续推行这种愚蠢的政策，他的皇位继承权将面临危险。教皇解除了小亨利对其父亲立下的效忠誓言的约束力。为了解决这场争论，帝国1105年再次在美因茨召开大会。然而，小亨利一点也不想冒失去继承权的风险，因此囚禁了自己的父亲，抢走了皇帝御玺，并于1106年1月由美因茨大主教加冕为皇帝。



一生多遭劫难的亨利四世，并不甘心束手待毙。他逃出了地牢，准备为夺回皇位而战斗。他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洛林地区的封建主们举剑发誓将为他而战。但在这场血腥内战展开之前，亨利四世在1106年8月7日去世了。离开人世之前，他饶恕了自己的所有敌人，包括他那背叛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位深得民心的国王，他的离世令人们普遍感到痛苦。虽然他生前被革除了教籍，那些贫寒的教士们仍为他的灵魂祈祷，而停放其灵柩的列日教堂也被普通士兵和武装平民们层层卫护起来。人们相信，他的

墓地将成为一片散发神奇力量的地方。尽管国王们未能使人民对和平、繁荣和公正的渴望化为现实，但人们仍然对他们顶礼膜拜，普通人仍然把希望和理想主要寄托在他们身上。

亨利五世与萨利安王朝的终结

54 亨利五世向教皇提出了和解建议：他对主教任命拥有否决权，在向新任主教授予指环和权杖后，主教应向国王宣誓效忠。诚如此，他便可摆脱买卖圣职和操纵教职任用的恶名，但又可以控制主教任命。在教皇看来，这样教会将继续屈服于国王，因此这一建议是不能接受的。

为了迫使教皇接受皇帝对主教的任命权，并在罗马加冕为帝，亨利五世于1110年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向意大利开拔。前不久，他与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征服者”威廉之子，英国诺曼底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第二任国王——译注）的11岁女儿马蒂尔达订了婚，并从英国这个新盟友那里得到了可观的收益。大军在意大利北部地区未遇到任何抵抗，甚至连马蒂尔达边疆伯爵夫人也谨慎地避免与之冲突。这时，教皇提议实行教权与国家分离：国王对主教任命将无任何发言权，但教会也将把其面积广大的庄园交给国王。由于对贵族们将如何看待把大量财富交由国王支配的建议没有把握，亨利五世遂表示，如果这项安排能够得到教会贵族的共同赞成，他将愿意接受。

教士们对教皇作此提议深感震惊，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们失去大多数财产和权力。另一方面，贵族们也表示反对，因为他们也将失去从教会那里作为采邑而得到的庄园，而且他们绝对不想看到国王的权力获得如此大幅度的增强。当亨利五世抵达罗马时，教皇公布了自己的这项出人意表的提议，街头上顿时爆发了流血事件。亨利五世立即下令囚禁教皇，并逮捕了一大批教会显要人物及为首作乱的罗马市民。由于得不到自己的诺曼人盟友的干预，教皇孤立无援，觉得除了接受亨利此先的建议已别无他策。于是，他发誓自己将永远不会开除国王的教籍，并为落实双方达成的协议，于1111年4月11日在蓬特马梅洛签订了条约。两天后，亨利五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为帝。为了克尽全功，这位皇帝还得到了教皇的允许，将为其父亲亨利四世在施佩耶教堂举行一次宗教葬礼。



十字军与色雷斯人交战场景。大凡说来，基督教军队组织更加严密、后勤补给更加完善，但穆斯林军队装备良好、训练有素，所以常常取得战斗的胜利。

条约签订后，立即招来了许多有权势的教士们的谴责。他们不顾教皇的反对，剥夺了皇帝的教籍。与此同时，德意志封建领主们也发动了叛乱，但遭到帝国军队镇压后便屈服了。愤于皇帝对敌人的残酷镇压，惮于其野心勃勃的权力欲望，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贵族发动暴乱，1115年2月在曼斯费尔德附近的韦尔费斯霍尔兹打败了帝国军队。为了重新建立自己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在马蒂尔达边疆伯爵夫人于这一年的7月去世后，亨利五世决定把她名下的庞大庄园据为己有，以在托斯卡纳建立一个权力基

地，从而可同时对教皇和德意志领主们构成威胁。他没费多大周折便接管了马蒂尔达的庄园，但在罗马，格雷戈利七世生前的支持者们占了上风，迫使教皇废除了与皇帝达成的条约。1117年的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译注），亨利五世是在罗马度过的，他那位年轻 55 的英国妻子马蒂尔达也由韦尔加大主教莫里修斯为其戴上了后冠。随后，教皇立即开除了这位大主教的教籍。此前，教皇因为在罗马两大为首的家族激烈冲突中支持了失败的一方，已经逃离了这座城市。

帕斯卡尔二世于1118年夏去世后，继任的格老秀斯二世拒绝承认《蓬特马梅洛条约》的有效性，作为反击，亨利五世立即任命听命于己的韦尔加大主教莫里修斯为教皇。后者遂改称格雷戈利八世，不过在罗马，人们都把他说成是“西班牙的驴子”。这时，德意志正因分别拥护皇权与教权的两派相争而陷入分裂，亨利五世因此返回德意志，率领军队讨伐维护教权一派的领袖、美因茨大主教阿达尔伯特。后者针锋相对，调来了萨克森的军队，但战斗终因双方在维尔茨堡的谈判而得以避免。根据谈判，双方同意帝国与教会的财产均应得到尊重，凡破坏和平者将予处死。


十字军骑士在祈祷。大多数十字军骑士都穿着这种锁子甲战衣。自查理大帝时代以来，这种战衣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战斗中，骑士们所戴的缀有红十字标记的头盔也是如此。

围绕教职授予权的斗争，直到新任教皇上任后才得到解决。新任教皇加里斯都二世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他派遣一个使团前往沃尔姆斯，与皇帝达成了下述协议：首先由皇帝向主教授予权标，作为领地上世俗权力的标志，但不再由皇帝授予主教指环和权杖，因为它们纯粹属于教权的象征。至此，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得到了清晰的区分，而君主也从此失去了对教会由来已久的控制权。在《沃尔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签署后举行的弥撒上，亨利五世接受了教皇使团的首领、枢机主教伦巴特的圣餐和和平之吻。对此，编年史学家、奥拉的埃克哈德写道，基督租来的束腰外衣如今得到了修补（此项《和约》规定，在德意志，皇帝有权干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举，国王对当选者先授予权标，然后由教廷授予指环和权杖，而在意大利和勃艮第，皇帝则无权干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举，由教廷对当选者授予宗教权力，6个月后皇帝方可授予世俗权力——译注）。

1124年，亨利五世在与英国国王亨利一世结盟后，决定发动对法战争。英国王太子威廉在英吉利海峡因沉船而溺毙，亨利五世的妻子、威廉的孪生姊妹成了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亨利五世希望，对法作战如获成功，将加大妻子承袭英国王位的发言权。但尚未提起对法战争激情的德意志领主们，却对这样一次冒险不感兴趣；事实上，如果这场战争取胜，国王的权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由于法国人决心保护祖国、打击入侵之敌，由于调集起来的军队人数甚少，也由于这时的亨利五世已患上了不治之症，他放弃了入侵法国的计划。1125年5月23日，他在乌特勒支去世。皇后马蒂尔达则回到英国，嫁给了昂儒公爵，并与布卢瓦公爵斯蒂芬展开了激烈的王位之争。1154年，马蒂尔达与昂儒公爵（格奥弗里·普兰他日奈）生下的儿子登上王位，史称亨利二世，成为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任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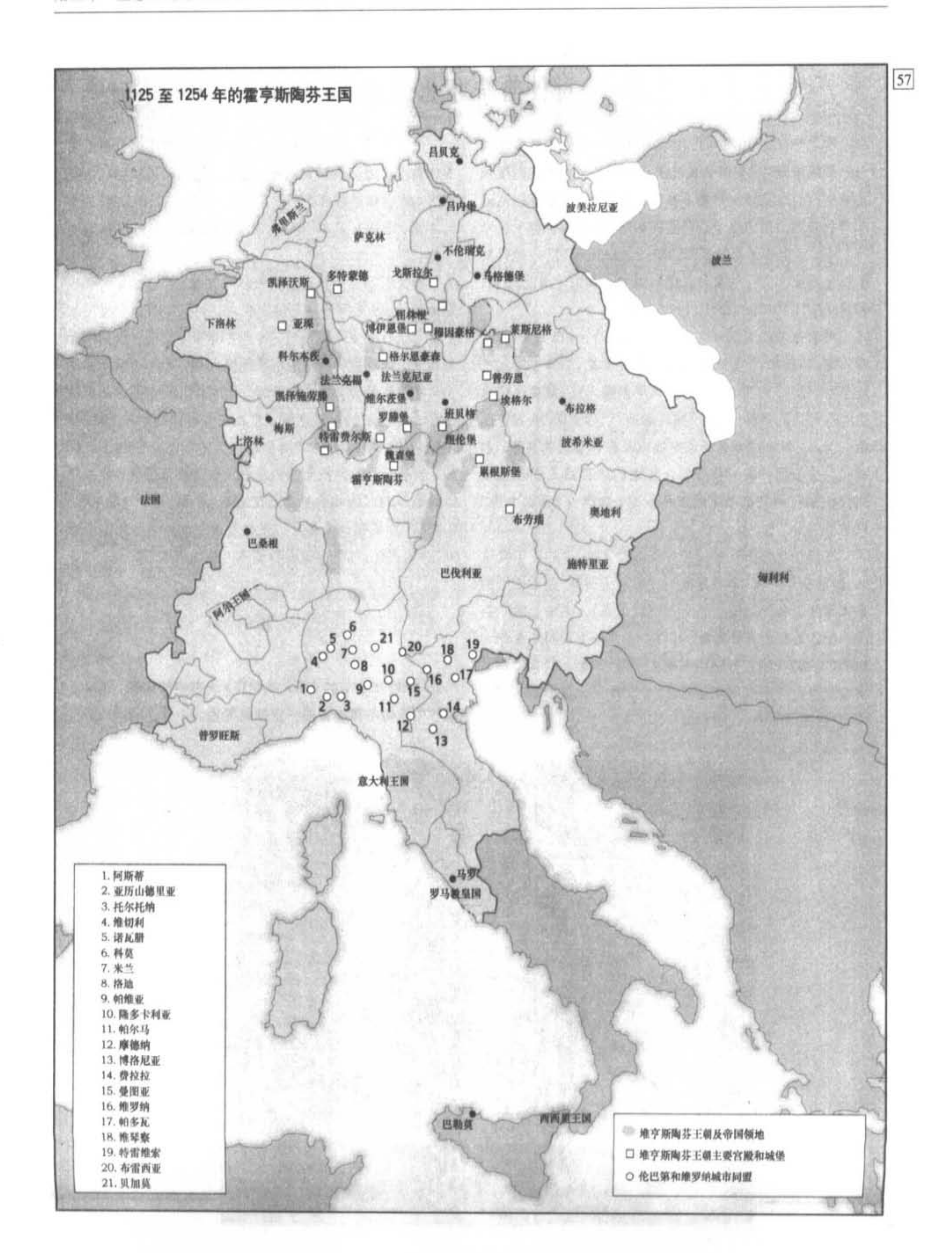
第三章　霍亨斯陶芬王朝与中世纪后期

[56] 萨利安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亨利五世去世时，并未留下子嗣。争夺王位的共有三个人，他们是士瓦本公爵弗里德里希、萨克森公爵洛泰尔，以及奥地利边疆伯爵利奥波德。推选大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几乎酿成了暴力冲突，但最终洛泰尔得以被推举上了王位。新国王把女儿嫁给了巴伐利亚公爵“骄傲的亨利”（这位女婿属于韦尔夫家族，其家族历史可追溯到古代的公元8世纪），从而获得了巴伐利亚人的支持。属于霍亨斯陶芬的士瓦本公爵弗里德里希则拒绝交出其从叔父亨利五世那里继承的国王领地。萨利安王族成员们也把各自私有领地与国王领地合并在一起，试图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王国，洛泰尔三世则决心重新控制这些土地。为了回击国王，士瓦本贵族1127年推举了弗里德里希公爵的弟弟康拉德三世为“敌对国王”（anti－king）。从此，霍亨斯陶芬家族与韦尔夫家族展开了持续多年的争斗。

国王与强大反对派的长期战争，一直持续到1135年方告结束：康拉德被迫宣布放弃“王位”，而洛泰尔则允许他保留自己的领地。洛泰尔1137年去世后，选侯们推选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敌对国王”康拉德三世。推选过程极其匆忙。康拉德成为国王后，教皇代表在亚琛为他举行了国王的加冕仪式，但王冠仍掌握在韦尔夫家族。康拉德三世是一个体格极其强壮的人，而他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也没花费多少时间。在对付完韦尔夫家族的竞争对手“骄傲的亨利”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国际舞台。1144年，穆斯林领袖岑齐占领了十字军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建立的埃德萨伯国。在西多会（天主教派别，1098年在法国创立——译注）的充满人格魅力的创始人、克莱沃克斯主教贝尔纳的劝说下，康拉德三世决定参加十字军东征，但在动身前往“圣地”（指巴勒斯坦——译注）之前，希望使自己的儿子能够被推选为国王。为此，他准许了萨克森封建领主自行对波美拉尼亚(中北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现分属波兰和德国——译注)、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的文德族（中世纪德意志人对西斯拉夫的称呼，即索布人——译注）自主地发动他们的十字军东征，从而使日耳曼人向东方的殖民迈出了重要的一个步骤。

康拉德三世所参加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十字军战士在小亚细亚连吃败仗，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告失败。1149年，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王康拉德三世回到了欧洲。此后不久，先后与诺曼人领

57


1125 至 1254 年的霍亨斯陶芬王国
吕贝克
吕内堡
波美拉尼亚
萨克林
不伦瑞克
多特蒙德
戈斯拉尔
凯泽沃斯
波兰
下洛林
亚琛
博伊恩堡
莱斯尼格
科尔本茨
格尔恩豪森
法兰克福
法兰克尼亚
普劳恩
维尔茨堡
埃格尔
布拉格
罗滕堡
班贝格
梅斯
特雷费尔斯
纽伦堡
上洛林
波希米亚
霍亨斯陶芬
法国
布劳瑙
奥地利
巴桑根
巴伐利亚
施特里亚
匈利利
意大利王国
普罗旺斯
马罗
罗马教皇国
巴勒莫
西西里王国
1. 阿斯蒂
2. 亚历山德里亚
3. 托尔托纳
4. 维切利
5. 诺瓦腊
6. 科莫
7. 米兰
8. 洛迪
9. 帕维亚
10. 隆多卡利亚
11. 帕尔马
12. 摩德纳
13. 博洛尼亚
14. 费拉拉
15. 曼图亚
16. 维罗纳
17. 帕多瓦
18. 维琴察
19. 特雷维索
20. 布雷西亚
21. 贝加莫
堆亨斯陶芬王朝及帝国领地
□ 堆亨斯陶芬王朝主要宫殿和城堡
○ 伦巴第和维罗纳城市同盟

58

宾根的希尔德加德

希尔德加德1098年出生于阿尔泽伊附近波默舍姆的一个贵族家庭。八岁时被送往施潘海姆的女修道院随院长尤塔修行。这所修女数量不多的女修道院，深受宾根附近本笃会的迪西博德格堡修道院的影响。希尔德加德一生修行，1141年担任了女修道院的院长。1150年前后，她修复了毁于诺曼人之手的鲁珀兹堡附近的圣鲁珀修道院，然后和修女们迁到那里，直至1179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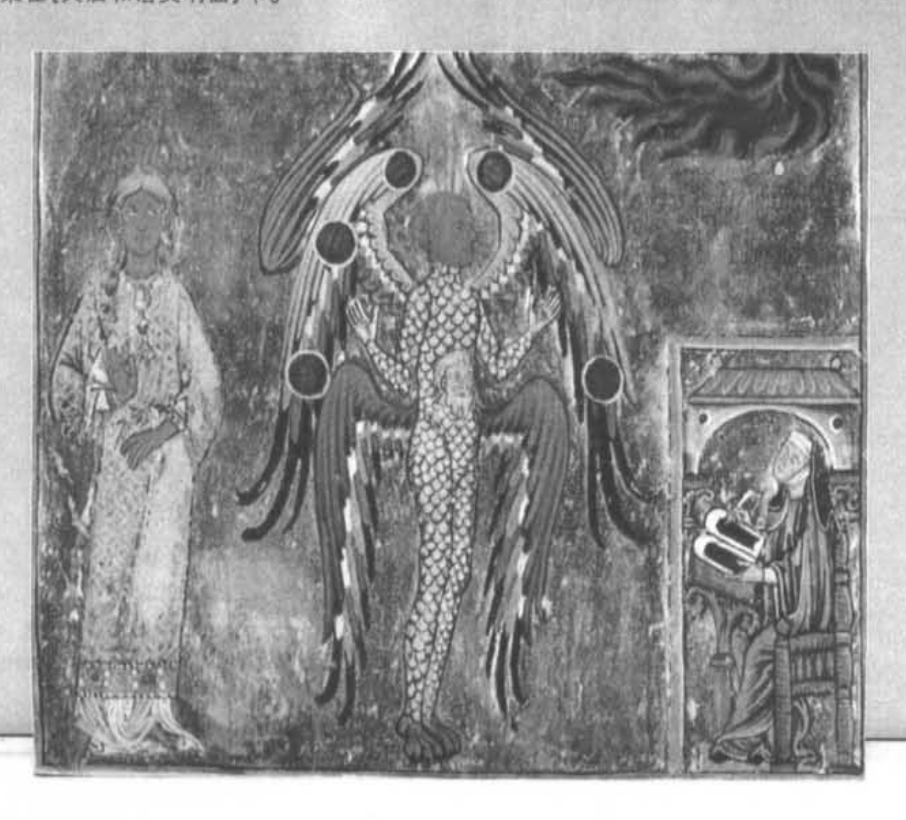
希尔德加德既是一位神秘主义者、诗人、自然主义者、音乐家、药剂师，又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名声在帝国各地不胫而走。虽然她的拉丁文水平差强人意，需要一位忠实的抄写员的帮助，但并不妨碍她同"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一世、克莱瓦克斯公爵伯纳德以及许许多多的皇帝、教皇和大主教们往来书信不断，各地的达官贵人们争相就从疗伤草药到宗教教义的各种问题，向这位"莱茵女巫"求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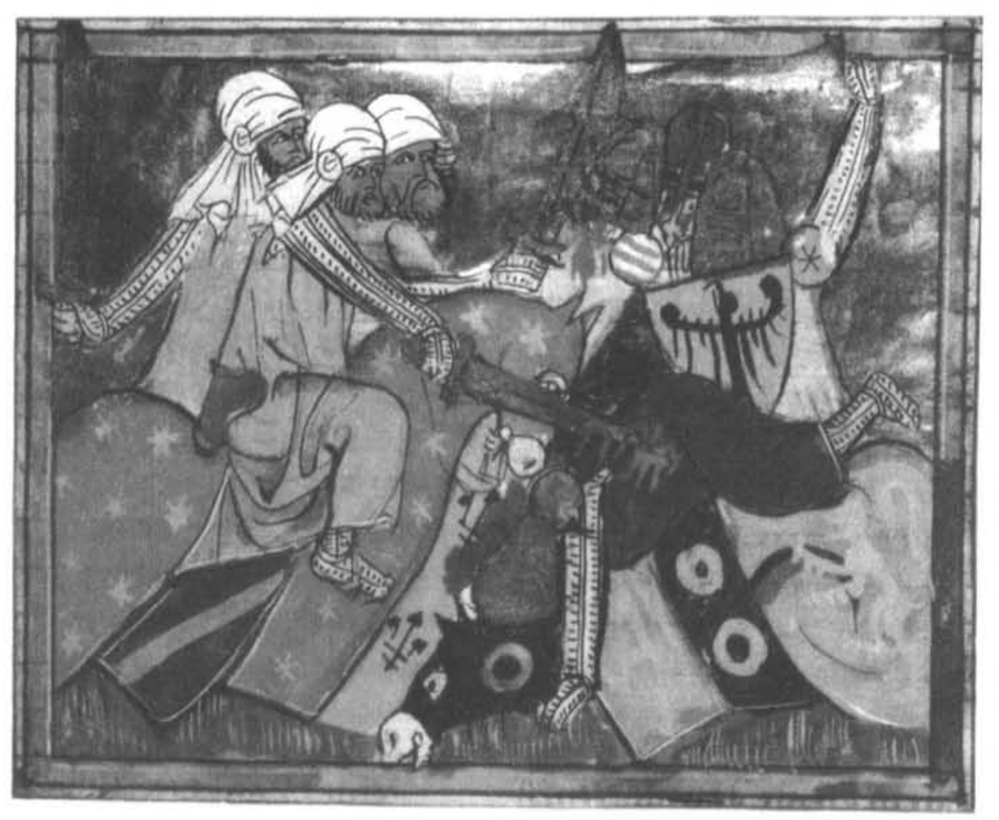
在担任女修道院院长那一天，即1141年的圣灵降临节，她经历了一次"神秘异象"：火焰从天而降，笼罩在她的身体周围。在此后的十年间，她在《求道》一书中记录了自己的数不胜数的神秘异象，并写下了两部主要科学著作。她的《美德》一剧首开道德戏剧之先河，其他人的类似作品将需要再过一个世纪才会问世。她创作了大量诗歌和音乐作品，后来收集在《天启和谐交响曲》中。

时至今日，人们把希尔德加德称作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曲家。她极具灵性的音乐作品，表达了她的神秘主义幻想。她创作的歌曲虽然是用中世纪的词汇写下的，却含义丰富、感情充沛，把深邃、飘渺与圣歌的宁静风格融为一体。

曾经有四位教皇提出把希尔德加德封为圣女，但都被她拒绝了。从她那不平凡的一生，人们可以发现，中世纪的女性可以在事业上取得何等卓越的成就。除了自己的修女身份外，她对宗教问题或哲学不感兴趣，而是迷醉于神秘主义和现实社会，并以她那个时代的典型方式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不过，虽然她是一个虔诚和平和的宗教女性，希尔德加德也不可避免地抱有她那个时代的一些偏见。例如，当被问及为何把交往对象限定在贵族阶层时，她的问题是这样的："有谁会把自己的家畜，牛啊、驴啊、绵羊啊、山羊啊，都关在一个圈里？"既然社会上的不平等是上帝所规定的，那么，对平等的召唤便是对神明的亵渎。

1230年出版的《凡人杰作集》一书中的插图，描绘了宾格的圣希尔德加德的一次神秘异象。





法国14世纪的一幅插图，描绘了十字军战士死于摩尔人骑兵的剑下。布依隆的戈德弗里（1060—1100）被称作"圣物匣的保护者"，被亨利三世任命为下洛林公爵。雄心勃勃的他，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99）的统帅，并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位基督徒统治者。

袖罗杰二世和路易七世结为盟友的韦尔夫家族，与康拉德展开作战。康拉德虽然得以脱围，但尚未等到在罗马举行加冕礼，他便于1152年2月去世了。自962年以来，他是第一个未曾加冕为皇帝的德意志国王。

"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一世

59

康拉德三世去世时，他的儿子亨利只有8岁。他生前曾经提出，将由自己的侄子、士瓦本公爵、人称"巴巴罗萨"（意为"红胡子"。他曾五次远征意大利，持续近30年，意大利人说弗里德里希的红胡子是用他们的鲜血染成的——译注）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继承王位。推出这一人选的意义，这里需要阐述一番：这不仅是因为巴巴罗萨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而且在于他的母亲来自韦尔夫家族，因而他出任国王，将为韦尔夫和霍亨施陶芬这两大相互竞争的家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巴巴罗萨继位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意大利。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对于他加冕为皇帝至关重要，而没有这顶皇冠，他在德意志的地位将遭到进一步削弱，二是因为意大利北部那些繁荣的城市是他的基本收入来源，他绝对不能听任这一地区落入敌对势力之手。1153年3月，他与教皇奥伊盖纽斯三世达成了《康斯坦茨协定》，承诺将支持教皇抵御诺曼人（诺曼人自11世纪晚期以来一直占领着意大利南部）。他还保证将帮助教皇对付罗马人的叛乱，以及防止拜占廷皇帝重新在意大利夺取桥头堡。作为回

报，下一任教皇海德里安四世答应将为巴巴罗萨加冕，并承认帝国的权利。

加冕仪式于1155年6月18日如期举行，但来自持不同政治主张的罗马人发动进攻，使仪式被迫中断。巴巴罗萨未能履行他在《康斯坦茨协定》中承诺的义务，既未能让罗马恢复秩序，也未曾南至抵御诺曼人，而是返回了德意志。不过，教皇自己与诺曼人达成了媾和协议，因此不再像先前那样依赖巴巴罗萨了。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于紧张。1157年10月，海德里安四世用拉丁文给巴巴罗萨写了一封信，为了让聚集在贝桑松的那帮贵族能够明白，需要把它翻译过来。当翻译到“beneficium”这个含有歧义的词汇时，皇帝的廷臣们认定它的意思是“封地”，因此带有皇帝是教皇附庸的意味（教皇后来宣称它纯粹表示“利益”或“善行”）。对该词的如是理解，似乎还能得到罗马拉特兰宫的一幅壁画的佐证：壁画上绘的是皇帝在为教皇牵马。贵族们勃然大怒，差点谋杀了教皇的两位使臣——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命悬一线侥幸逃生的使臣之一，便是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海德里安四世1159年去世后，后两任教皇依次是亚历山大三世和维克托四世，他们一上台便把对方革除了教籍。巴巴罗萨单凭一己之力是无法解决教廷的宗派冲突的，而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都无意在这个问题上助其一臂之力。

[60]



巴伐利亚1188年的一幅插图上，“巴巴罗萨”（1122—1190年）身着十字军战士军服。撒拉丁（1169—1193年）（埃及苏丹，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征服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1187年打败并俘获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团长——译注）1187年占领耶路撒冷后，控制了叙利亚大部分地区。西欧震惊，视之为基督教欧洲在正义之路上走向了迷失的证据。1188年，巴巴罗萨在美因茨帝国大会上宣誓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1年）。当这位皇帝率军赶到之前，撒拉丁军队从前方阵地上后撤了，但巴巴罗萨在渡过塞莱弗河时溺水而死。阿拉伯人编年史作者写道：“如果不是安拉以其仁慈之手，消灭了就要踏入叙利亚的德意志国王，人们便只能这样记录了：叙利亚和埃及曾经属于过伊斯兰。”

在这个民族国家开始涌现的世界上，德意志皇帝已不再被视作曾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英国教会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便曾质问，像日耳曼这样一个野蛮而未开化的民族，究竟是凭借谁的权威，居然号称要统辖一切民族？他指出，像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亨利二世与教会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在1170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莱遭到谋杀时达到高潮），尽可以在自己的王国把自己说成是国王、教皇使者、族长、皇帝，反正他把什么头衔加在自己身上都可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认为，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合乎理想的趋势，而且必然会导致暴政，但时势使然，不可避免。德意志为什么没能摆脱两个半世纪以来的传统，步英国和法国的后尘踏上民族国家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教皇需要一个普世帝国。

1162年，巴巴罗萨打败了带头反对帝国对意大利北部管辖权的米兰，并把可能蒙羞的三位先王的遗体运回到科隆大教堂。五年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罗马，亚历山大三世化装成地位卑微的朝圣者，匆匆逃离了这座城市。不过，巴巴罗萨的胜利并未持续几天：他的军队中染上了霍乱，被迫放弃了征服意大利南部的作战计划。北部地区的城市团结起来，共同构筑了一座城堡，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以示对教皇的尊崇。至于巴巴罗萨，他几乎难以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回到德意志。最终，在经过数次侥幸逃生之后，他才在一小队忠实的骑士保护下得以返回。1174年，他再次率军前往意大利，对亚历山大里亚实施围困，但未能夺取这座城堡，尔后在蒙蒂贝格缔造了一项临时协议。因为与伦巴第同盟之间无法达成妥

协，巴巴罗萨求助于表兄弟“狮子”亨利（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系“骄傲的亨利”之子，巴巴罗萨之母朱迪思是“骄傲的亨利”的妹妹——译注），但遭到了拒绝。他率领的这支规模不大的部队被米兰人打败后，逃至旷野，差点被敌人生擒活捉。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与教皇媾和之外别无他策，而为了媾和，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必须抛弃敌对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三世，必须放弃对罗马的统治权主张，必须舍弃托斯卡纳边疆伯爵头衔，必须与伦巴第同盟和诺曼人停止冲突。

在德意志内部，巴巴罗萨的注意力集中扩大王家领地的面积、增加收 [61] 入、修建一系列坚固城堡，以加强自己在王家领地内部的宗主权上，却不情愿与来自韦尔夫家族的强劲竞争对手“狮子”亨利对抗。当北德意志诸侯们对他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时，他也未能及时做出反应。当亨利拒绝出席宫廷，显然违犯了纲纪时，这位皇帝才在1180年的杰恩豪森大会上与帝国的诸侯们一道做出决定，把“狮子”亨利在德意志的领地一分为三：威斯特伐利亚交给科隆大主教；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下萨克森的那块土地交给安哈特·冯·维特尔斯巴赫；巴伐利亚交给奥托。这项决定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将一直统治巴伐利亚到1918年；直到今天，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诸州与下萨克森之间的州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杰恩豪森大会的决定密切相关。

“狮子”亨利被迫流亡至其岳父的英国宫廷。韦尔夫家族如今保有的领地，只剩下了不伦瑞克和吕贝克附近那些其拥有绝对所有权的地方。这些领地后来变成了一个公国，直到1866年被普鲁士部分兼并。巴巴罗萨在对付“狮子”亨利的斗争中，需要得到一些强大盟友的支持，反过来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由于皇权的弱化，德意志遂分为裂为一系列小邦。

巴巴罗萨的第二任妻子、勃艮第的比阿特丽斯为他生育了11个孩子，但只有5个儿女能够长大成人。1169年他的次子亨利在三岁时加冕为国王，19岁时与西西里国王叔叔的女儿、13岁的康斯坦丝订了婚。由于西西里国王1189年去世时并未留下子嗣，巴巴罗萨的继承人有权得到西西里。他的其他一些女儿和儿子，也先后与拜占廷皇帝、英国国王、卡斯蒂利亚国王、丹麦国王、匈牙利国王的儿子和女儿，以及法国国王的侄子订过婚，但最后因为皇家子女们不断夭折，真正结成夫妇的几乎没有。

1188年，巴巴罗萨在美因茨大会上提出，向“圣地”发动十字军东征。随后，他开始极其认真地准备这次军事行动，而不是仅仅出于宗教的狂热。1189年，他在累根斯堡集结了一支庞大军队，开始了向耶路撒冷的远征。1190年6月11日，巴巴罗萨在小亚细亚的萨利弗河洗澡时溺水身亡。在通向耶路撒冷征途中的突然去世，令他赢得了超出实际的某种神秘地位，而这是他以其它方式无法得到的，虽然他确实广为拥戴。

在巴巴罗萨率军队向耶路撒冷进发之前，“狮子”亨利为了夺回自己的领地，已经从英国返回了德意志。巴巴罗萨临行前，任命自己的儿子摄



12世纪后期的一座纪念碑，纪念对象可能是1154年阵亡的于格·德·范德蒙特。十字军骑士往往是一些恃强凌弱的机会主义者，但也有不少人是受到真正的（虽然是误入歧途的）宗教热忱的驱使。一些人逐渐受到伊斯兰文明的感召和吸引，从而丰富了欧洲文化。

政，并已继任国王之位，改称亨利六世。亨利六世无力保卫吕贝克这座北德意志唯一还处于王权控制之下的城市，遂被迫与“狮子”亨利媾和。尔后，他前往意大利，又向教皇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后，由年纪老迈的教皇塞莱斯廷三世加冕为皇帝。

[62] 诺曼人的十字军领袖唐克雷德夺取了西西里王位，并俘获了新任皇帝亨利六世的皇后。亨利的军队在那不勒斯与唐克雷德对垒时，因染上了瘟疫，被迫撤回德意志。韦尔夫家族（系现今英王族的祖先——译注）组织了一支反对帝国的军队，把南德意志的许多诸侯及很多势力甚大的主教都纠合在一起。这时的亨利六世地位已岌岌可危，但一桩突如其来的运气挽救了他：唐克雷德的盟友理查·克尔·德·利翁在返往英国途中，坐船在威尼斯附近遇难，故改走陆路，化装后想经由德意志前往英国。1192年12月，此人被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俘获，而这位公爵恰恰是他在十字军远征期间曾经严重冒犯过的仇人。公爵遂将利翁交给了皇帝。为求获释，利翁开始就释放条件与皇帝谈判。亨利六世从克尔·德·利翁这里得到巨额赎金后，财政情况大为改善，尔后再度讨伐意大利。唐克雷德兵败死亡后，亨利六世于1194年圣诞节在巴勒莫教堂加冕为西西里国王。第二天，他的儿子康斯坦丁出世了，这便是未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

德意志诸侯们一开始拒绝推选亨利六世之子为国王，迫使他放弃了王位世袭的念头。西西里的贵族们也密谋暗杀他们的这位新国王，阴谋失败后，亨利六世下令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处死了为首作乱者，还强迫其皇后亲眼目睹她曾与之亲密交往的这些贵族的死亡情景。其后，皇帝准备再次发动十字军远征，但因染上了霍乱，1197年9月28日在墨西拿去世，享年31岁。

弗里德里希二世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终结

亨利六世去世后，他那年仅3岁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继任了西西里国王，但在德意志，却推选出了两个相互竞争的国王来：霍亨斯陶芬家族选择的是巴巴罗萨的次子菲利普，而韦尔夫家族则选择了“狮子”亨利之子奥托四世。同样是在1198年，英诺森三世担任教皇。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教皇，他虽然自认为地位比不上神灵，但却坚称教皇要高于世间的任何一个人。对于两位国王并立现象，他决定加以干预。一开始，他还佯装是一个公平的调停者，但介入之后便开始提出条件了。韦尔夫家族开出的价码更高，于是奥托四世得到了教皇的祝福。这时，英诺森三世借机声称自己握有对皇帝人选的决定权，并向德意志的诸侯们暗示：如果任由他们推选，皇帝甚至可能会由异教徒或者白痴担任呢！

德意志的大多数诸侯都支持士瓦本的菲利普，但他遭到了维泰尔巴赫的奥托的谋杀。此后，形势很快变得有利于另一个王位的角逐者，即不伦

63

弗里德里希二世

在中世纪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人比弗里德里希二世更令人着迷，没有哪个人比他的一生更富有冒险色彩，没有哪个人的名声被正、反两方面的宣传弄得如此夸张，直至难以想象的地步。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甚至从他的出生经历便不同寻常：在生育他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40岁，婚后9年从未生育。虽然他的母亲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市场上生下他的，仍然有传闻说他其实是从一个屠夫那里抱养的孩子。就连他的出生地耶西小镇，也被时人当作了他生来便反对基督的一个证据。

由于继承权的不稳定，他的合法地位遭遇了严峻挑战。弗里德里希二世加冕为西西里国王时年仅两岁，而他的父亲亨利六世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反对西西里与神圣罗马帝国合并为一体的势力非常强大：西西里是一个世袭制王国，弗里德里希的母亲康斯坦丝并不怎么愿意成为德意志人，她所关心的只是儿子继承西西里王位；教皇一向不喜欢霍亨斯陶芬家族，而一旦该家族得到了西西里王位，将对教皇国形成包围之势；在德意志，也有一群实力不凡的贵族反对霍亨斯陶芬家族；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和伦巴第城市结成了反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同盟，迫使亨利六世的弟弟、受命掌管马蒂尔达边疆伯爵夫人领地的士瓦本公爵菲力普逃回了德意志。

弗里德里希二世恢复帝国完整的英勇壮举，也为他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很多人相信，他并不曾死去，而只是在高山之巅休息着，只要帝国需要，他随时会回来。随着时代的演进，后世的人们则宣称，他作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皇帝，克服了中世纪的时代局限性，为文艺复兴指明了道路。不管怎样，他确实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汲取了欧洲文化和东方文明的养料。他积极资助艺术和科学发展，还亲自撰写了专著《用鹰隼打猎的艺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该书一直是鸟类学的权威作品）。他宽容对待穆斯林，甚至曾令很多基督徒担心他将改信伊斯兰教。不过，他在打击异教徒的战争中却极其残暴，对犹太人也奉行歧视政策，强迫他们穿着特别服饰。虽然他是一位文化学识不同凡响之人，但就其性格而言，却充满猜疑心理，是一个生性狭隘的专制君主。也许正是如此之多的矛盾集于一身，也令弗里德里希二世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如此令人着迷吧！



弗里德里希二世1232年《用鹰隼打猎的艺术》一书的扉页，图中人物分别是这位皇帝和他的驯鹰师。



班贝格大教堂的雕塑《班贝格骑士》。这件13世纪早期的杰出雕塑作品，呈现的是一位衣着简单的骑手，端坐骏马之上，目眺远方。这类骑手雕塑反映了德意志宫廷的巡游各地，以及皇帝对其臣民的关怀。作品中的骑手并非代表某位具体皇帝，但也有论者认为，他可能是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一种理想化的刻画。

瑞克的奥托。大诗人沃尔特·冯·德·福格尔怀德本来曾为菲利普写下了大量诗篇，现在也笔锋一转，为不伦瑞克的奥托唱起颂歌来了。至于教皇，本来是垂青于奥托的，这时却半心半意起来。不过，奥托不仅得到了德意志贵族阶级的全面拥戴，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一向奉行政治现实主义的英诺森三世，虽然很不情愿，但形格势禁，仍然为奥托戴上了皇冠。成为皇帝的奥托遂率领军队南下攻打西西里，年轻的国王弗里德里希这时已做好了逃往非洲的准备。但是，由于教皇是小弗里德里希的保护 64 人，这时从道义上感到自己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于是，英诺森三世宣布革除奥托四世这位皇帝的教籍，转而支持他一向厌恶的霍亨斯陶芬家族来了。1211年9月，在法国人和教皇的鼓动下，少数几位德意志诸侯重新推选了弗里德里希为皇帝。

虽然只得到了教皇和法国方面的支持，时年18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仍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返回德意志的道路，以宣示自己的权威。一路上，他曾多次遇险，可谓九死一生。由于奥托四世与英国人结成了盟友，因此法国1214年7月27日在博文斯打败了英国军队，等于为弗里德里希在德意志对付奥托四世助了一臂之力。1218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亚琛加冕。至于奥托，虽然他直至1218年去世时仍坚持自己是德意志国王，但这种诉求已越来越失去了可信力。弗里德里希二世宣称自己将捍卫基督教，夺取“圣地”，并于1225年严肃地宣誓将在1227年夏开展新一轮十字军东征。对此，教皇格雷戈里九世清醒地看出，这位皇帝的实际目标是在意大利半岛建立统治地位，遂借口弗里德里希未能如期发动十字军东征，剥夺了这位危险的对手的教籍。在经过精心运筹之后，皇帝在布林迪西集结了十字军，向教皇发起了挑战，但此番军队再次遭到瘟疫侵袭，弗里德里希二世也病倒了。东征战争遂偃旗息鼓。

次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继续无视教皇的命令，重新集结十字军。在制服开罗的苏丹之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圣城，自行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与此同时，教皇的军队侵入西西里，并与岛上的反霍亨斯陶芬家族力量汇合一处。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迫率军队返回自己的王国，迅速打败了敌人，但征服意大利北部城市的企图未能奏效。1239年，教皇再次宣布剥夺他的教籍。此后，皇帝与教皇之间的长期的“口水战”愈演愈烈，其中教皇指控弗里德里希二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上最大的三个骗子，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耶稣基督，另一个是穆罕默德。

为了使自己的儿子亨利被推选为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迫于1220年给予兼任主教的诸侯在其领地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关税征收权、货币发行权。由于世俗诸侯纷纷抱怨说，摄政者即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儿子亨利（七世）给予城镇的特权太多了，他们在1231年和1232年的两道诏令中也得到了类似权利。皇帝希望在做出这些妥协后，能够为他与诸侯们的斗争划上句号，但这些做法一步步地使领地向公国方向发展，而亨利则决心

65

金玺诏书图

1356年的《金玺诏书》，是中世纪的德意志最类似于宪法的一件文献。当然，这并不是指近代意义上的宪法，而只是表示为国王推选制订明确程序的一系列机制。

在此之前，历代国王均由贵族推选，尔后得到国人拥戴。大多数国王都是得到一致推选，象征着他具有独一无二的政治素质。成为国王后，再由教皇为其加冕，以便从宗教意义上彰显其地位。

而根据《金玺诏书》，推选国王时，七大选侯中必须有四位在场，然后根据简单多数原则推举。如果其中某位选侯也是国王候选人，那么他不妨投自己一票。在某位皇帝离世而去后，必须在3个月之内由美因茨大主教召集所有选侯参加推选大会。七大选侯可自由进入法兰克福，并由该城市民为会议提供资助。每位选侯有权派出200名骑士随行，但其中携带兵器者不得超过50人。选侯们举行会议期间，所有非法兰克福市民不得进入该城，而法律与秩序的维护均交由法兰克福负责，这是一种特权，但未尝便不令人感到某种担忧。

当选侯们准备推选新国王时，首先在圣巴塞罗缪教堂举行弥撒。如果选侯们未能在30天内做出决定，那么他们将只能靠面包和水维持生命需要。在表决时，先由美因茨大主教投票，其后分别是特里尔和科隆大主教、波希米亚国王、帕拉丁选侯、萨克森公爵和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如果两位候选人票数相等，则由美因茨大主教做出最终裁决。

《金玺诏书》还对其他领地的权利做出了阐述。至于"栅栏之外的公民"，即生活在城镇之外者，他们则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只有生活在城镇中的公民可得到法律保护。这项原则的效力，将一直持续至19世纪。《金玺诏书》时代的德意志，并不能称作雏形期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各选侯都是在德意志这个松散的邦联中握有主权地位的君主。该诏书第31款称，这是一种"针对有着不同传统习惯和语言的不同民族的法律"，从而承认了这种多元性。



盖有查理四世黄金印玺的《金玺诏书》(1356年)。

增强王权，父子之间的矛盾遂趋于恶化。亨利与反对皇帝的伦巴第诸侯们结为同盟，并向法国示好。1235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阔别15年之久后，回到了德意志，随行的既有大批撒拉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又有豹子、猴子和骆驼等各种动物，充满了异国情调。亨利遭到逮捕，在度过7年囚禁生活后死去，死因也许是自杀。 65

在美因茨宣布媾和后，摆在弗里德里希二世面前的一大难题是怎样处理其儿子的主要盟友、奥地利公爵"好斗的弗里德里希"。这位公爵拒绝出席国王的宫廷会议，从而违反了朝制，被剥夺了帝国的采邑。弗里德里希二世下定决心把奥地利置于帝国控制之下，遂亲自前往维也纳，授予该市"帝国直辖城市"地位。正是在维也纳，他的儿子康拉德被推选为德意志国王，取代了被囚禁在狱的亨利七世。但弗里德里希的胜利并未维持多久：事实证明，他无法身处西西里，掌控遥远的奥地利。两年后，他被迫把奥地利交还给了"好斗的弗里德里希"，维也纳也失去了帝国直辖城市地位。1246年，"好斗的弗里德里希"在与匈牙利人的战事中阵亡，弗里

德里希二世夺取了他的领地。在皇帝于1250年去世后，奥地利又被波希米亚国王夺取。直到1273年，奥地利才由哈布斯堡王朝重新纳入版图。

1244年，教皇奥诺里斯三世逃到里昂后，召集会议宣布罢黜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皇位，但他无法找到一位令人信服的“敌对国王”。弗里德里希1250年去世后，其子康拉德四世继续与教皇英诺森四世相对抗。康 66 拉德1254年去世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自行于1258年加冕为西西里国王。1265年，教皇克莱门特为进一步打击霍亨斯陶芬家族，把西西里作为采邑授予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昂儒公爵查理。康拉德四世的儿子康拉德（亦称“康拉丁”或“康拉迪诺”）继续与查理作战，并在战事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到了1268年8月，他在塔利亚科佐之战中被打败，逃跑途中被俘，随后在那不勒斯的闹市区被当众处决。至此，霍亨斯陶芬王朝走到了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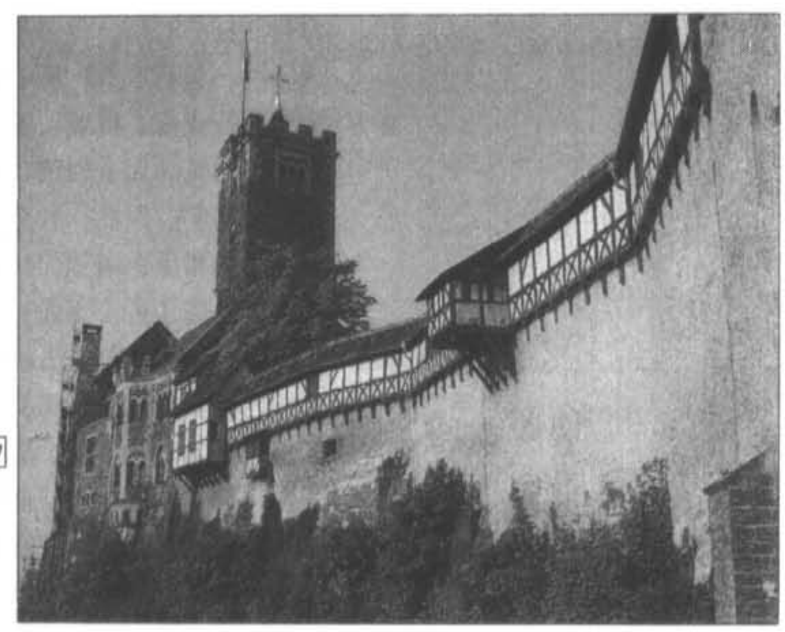
康拉德四世去世后，荷兰的威廉企图对德意志行使统治，并得到了莱茵同盟的支持。所谓莱茵同盟，是莱茵地区一些城市于1254年成立的，加盟城市数量很快发展到70多个，覆盖了从吕贝克到苏黎世的广大地区。当威廉1256年在与弗里斯兰人的战斗中阵亡后，该城市同盟宣称，在推选出一位合适的国王之前，它们自行其事。

1257年德意志王国选举国王的会议，只有少数几个诸侯参加，即后世所称的“七大选侯”。他们是：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三位大主教，波希米亚国王、莱茵边疆伯爵（后来改称帕拉丁选侯），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疆伯爵。美因茨大主教和莱茵边疆伯爵推选英国国王约翰的次子、霍亨斯陶芬家族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女婿、康沃尔公爵理查，而其他与会诸侯则中意于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他的母亲出身于霍亨斯陶芬家族）。阿方索虽然花了大笔金钱贿赂这些选侯，但由于卡斯蒂利亚贵族的阻挠，无法离开自己的王国，前往德意志接受王位。理查则不存在这种障碍，遂在亚琛加冕为国王。在此后近4年时间里，理查未曾离开德意志半步，一直呆在其权力基地莱茵地区。但当他的哥哥、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受到以西蒙·德·蒙特福德为首的男爵们强力挑战时，他不得不返回英国。理查于1272年去世。

国王、诸侯与危机岁月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年）曾经以诗人而非历史学家的口吻，把随后这段岁月称作“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恐怖时期”将一直持续至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尔夫被推选出来。鲁道尔夫虽然是西南德意志地区最有实力的诸侯，但当时他已有55岁了，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已是老迈之人。或许，选侯们把他看作一位过渡性人物，觉得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更大让步。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尔未曾出席推选会议，拒绝接受鲁

道尔夫的国王地位。根据封建法律，鲁道尔夫作为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铲除挑战对手，为此将不惜一战。为赢得盟友，他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巴伐利亚公爵，另一个女儿嫁给萨克森公爵，还有一个女儿则与匈牙利国王订了婚。得到这些强大盟友支持后，他充满信心地率军讨伐奥托卡尔，1278 年在维也纳附近的杜恩克夫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战场逃走的奥托卡尔被俘获和处决。尔后，鲁道尔夫安排女儿尤塔与奥托卡尔之子韦策尔二世结为夫妇，[67] 并把韦策尔二世的领地限定在波希米亚。至于波希米亚国王 1250 年夺取的奥地利领土，则交给了鲁道尔夫的儿子们管理。由此，哈布斯堡王朝正式建立起来。



瓦尔特堡系图林根伯爵领主的城堡。从 1190 年至 1217 年，在赫尔曼一世治理下，该领地是德意志效仿当时法国宫廷生活的一大音乐和文学中心。那一时代最杰出的两位德意志诗人，一位是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1170—1220年)，另一位是沃尔什·冯·德·福格尔韦德(1170—1230年)，便是在瓦尔特堡见的面。路德也曾在这里避难，并把《圣经》译成了德语。19 世纪以后，瓦尔特堡作为中世纪荣光和新教传统的一大象征，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个历史胜地。

勃艮第边疆伯爵奥托也拒绝效忠，宣称自己仅对皇帝而非国王臣服，而鲁尔道夫此时不是还未曾加冕为皇帝吗？鲁尔道夫不予争辩，而是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向贝桑松进发。面对实力悬殊的现实，奥托屈服了，不得不宣誓效忠。尔后，鲁尔道夫又把目光投向了图林根。这时的图林根，正陷入一片混乱：当地贵族彼此不和，暗杀和谋杀事件此起彼伏。鲁尔道夫出其不意地率军突袭该地区，捣毁了 50 多个城堡，恢复了法律与秩序，并在 1289 年的埃尔富特大会上予以庆祝。1291 年 7 月 15 日，他在埃尔富特去世，享年73 岁。

如果七大选侯 1273 年推选鲁尔道夫出任国王系因为他们看中了他的年纪老迈、实力不济，那么他们显然是错误估计了形势。1291 年，科隆大主教希望安排他的傀儡、拿骚公爵阿道夫成为新国王，而不是鲁尔道夫的儿子阿尔伯特。美因茨大主教同样渴望在一位地位脆弱的国王治下，使自己能够在领地内为所欲为。但选侯们的愿望再次落空了。阿道夫成为国王后，继续大力推行鲁尔道夫生前对图林根推行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因茨大主教与波希米亚国王以及鲁尔道夫之子、奥地利公爵阿尔伯特结成同盟，召集诸侯大会宣布废除国王。阿尔伯特遂被推选为新王，立即率军迎战阿道夫。1298 年 7 月 2 日，双方在帕拉丁的戈哈姆迎来决战，阿道夫战败身亡。

阿尔伯特与法国国王结成同盟，并为自己的长子迎娶了一位法国公 [68] 主。此举强化了他在德意志西部地区的地位，令莱茵地区的诸侯大为不满，再次密谋推翻国王。但阿尔伯特在军事上握有绝对优势，密谋集团遂很快瓦解。不过，来自教皇博尼费斯的压力则难以对付得多。阿尔伯特要求得到托斯卡纳，遭到教皇拒绝；持续经年的秘密谈判破裂后，教皇宣布阿尔伯特是一个叛教者、叛乱分子。1302 年，教皇又威胁开除法国国王腓

力普四世的教籍，理由是他对教会征收赋税。同日，他颁布诏书，援引了《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第10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诏书突出地强调了教皇的至高无上地位，但只有与阿尔伯特一世达成妥协，这一纸声明才能化为现实。因此，教皇认可了阿尔伯特的地位，并对法国国王指出，他是皇帝的属臣；阿尔伯特则表示接受选侯的权力，以及皇帝头衔的获得取决于教皇的认可。至此，教皇似乎在由来已久的教权与皇权之争中占据了上风，并可挟此迫使法国国王顺从了。

但可供博尼费斯庆贺胜利的时间太短暂了：1303年9月7日，法国国王的近臣威廉·诺加雷以及来自一个反对教皇的拥有强大势力家族的夏拉·科洛纳，捣毁了教皇的夏季居住地，教皇被囚禁了两天。其间，他遭到了残酷虐待，因此在获释后不久便死去了。博尼费斯的遭遇，对于德意志不啻于一场灾难。从此以后，教皇国沦入了法国人的控制之下：1309年，克莱门特五世把教廷迁到了法国东南部城市阿维尼翁。这种"巴比伦之囚"局面，将一直持续到1417年方告终结。

阿尔伯特1308年去世后，卢森堡公爵亨利被教会选侯们推选为国王，改称亨利七世。其中的一位选侯即特里尔大主教巴尔杜因，是亨利的弟弟。新国王以及他这位大主教弟弟，都是性格强悍之辈，很快便使卢森堡家族的实力与哈布斯堡家族可以相提并论了。在确定了自己在德意志的统治地位后，亨利把波希米亚交由能力出众的美因茨大主教彼得·阿斯佩尔特管辖，自己动身去了意大利。

由于持续经年的皇帝空缺，意大利北部城市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独立性。但饶是如此，该地区仍然明显分化为两大主要阵营。邀请亨利七世前往意大利的，便是其中的吉伯林派（倾向于拥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结成的派别）。另一个派别称作归尔甫派，则反对皇帝。值得一提的是，曾被归尔甫派判处死刑、被迫逃离佛罗伦萨的但丁，对亨利七世的到来给予了极其热烈的欢迎。直到两年之后的1312年，亨利七世才有机会在罗马加冕称帝。但由于归尔甫派的阻挠，他无法前往圣彼得大教堂，因此只能改在圣约翰·拉特兰天主教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而且典礼过后的宴会，还曾被归尔甫派的一场箭雨猝然打断。亨利既已戴上了皇冠，便决心要使自己的权威凌驾于一切君主之上，但这一切雄图大略，最终都化为了泡影：他于1313年8月去世，死后埋葬在比萨的一座规模宏伟的陵墓。

69

要为亨利七世找出一位继任者殊非易事。直到1314年9月19日，新国王才被推选出来，他便是奥地利公爵"公正的弗里德里希"。次日，上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也被推选为国王。由于双方均极不情愿沙场对垒，他们的军队一直未曾交锋。直到1322年，两军才在米勒多夫交战，路德维希取得了胜利。

此后，两位“国王”之间经历了长达3年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并立为君主的协议。他们很快便找到了共同的强大对手，那便是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约翰二十二世成为教皇时已经72岁了，推选者本来以为他命不久远，才作为一种妥协选择了他，但他居然活到了91岁，而且是一位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的教皇，这些恐怕会令推选者极其失望吧！约翰二十二世成为教皇后，决意增加教廷收人，下令神职人员在担任教职第一年的收入必须献予教皇，所有主教在得到教皇任命后的第一年也必须把收入的1/3献予教皇。此举既出，激起了教廷财产的激烈争论。教皇宣称，所有关于耶稣基督及其门徒没有任何财产的说法都是异端邪说。

路德维希与约翰二十二世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致使教皇剥夺了这位国王的教籍和一切政治权利，此后在称谓上只使用“巴伐利亚人”一词。但路德维希不予理会，仍然来到了罗马，由一位同样被剥夺教籍的主教为自己举行了加冕为帝的仪式，尔后把这位主教任命为“敌对教皇”，改称尼古拉五世。不过，随着路德维希离开罗马，这位尼古拉五世的权威便荡然无存。

约翰二十二世1334年去世后，其继任者贝内迪克特十二世是法国国王的一位密友。成为新教皇后，他决心把自己的权威加诸德意志教会，但立即招致了德意志诸侯们的强烈反对。当贝内迪克特十二世准备解除美因茨大主教的职务时，七大选侯1338年在科布伦茨附近的伦塞举行会议，宣布它们有权通过投票表决，自行推选获得多数票的人出任国王。七大选侯没有提及这位国王的皇帝头衔，不过路德维希业已明确指出，虽然为皇帝加冕的权力属于教皇，但这纯属一种确认仪式。

路德维希企图把勃兰登堡纳人王家领地范围之内，使诸侯们下定了推翻他的决心。与其并立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已于1330年去世。1346年，七大选侯选中了波希米亚那位双目失明国王的儿子查理。查理是一个野心勃勃、极其诡诈之人，早年在法国宫廷接受教育，并与后来成为教皇的克莱门特六世私交甚密。为使查理登上王位，克莱门特可谓大有功焉。但随着法国的骑士军队1346年在克雷西之战中被使用大弓的英国军队消灭殆尽，查理想真正行使国王权力的希望便基本破灭了。正是在这场战役中，波希米亚国王约翰阵亡，查理虽然在受伤后侥幸脱逃，但在战事中遭受毁灭性打击后，他的声誉已降至冰点。后来，他在波恩举行了加冕仪式；之所以无法像以前那样在亚琛举行，是因为与其他大多数帝国城市一样，亚琛如今也站在路德维希一边。人们普遍把查理视作教皇的傀儡。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很快便将时来运转：1347年10月11日，路德维希在外出猎熊时，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70

"黑死病"

这场瘟疫(1348 年,一种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其症状之一是患者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故被叫做"黑死病"。当时曾波及整个欧洲、北非,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也曾受影响——译注)的真正原因,历史学家们尚无定论。教皇在阿维尼翁的私人医生、当时被公认为医术最高明者的居伊·德·肖阿里亚克认为,这是几大行星交会的特殊天文现象造成的。有些人则断定,瘟疫是犹太人四处漂泊传来的。把瘟疫归咎于犹太人一说,甚至得到了德国一家声誉很高的出版公司的采信,而后来的纳粹分子更是醉心于此。也许,"黑死病"是十字军骑士带回欧洲的,不过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中东地区当时曾流行这种疾病。更有可能的一种说法是,灾难最初源于印度,是往返于黑海沿岸港口与印度之间的商船传至欧洲的。

不管瘟疫的源头是什么,当它恐怖地爆发开来的时候,医生们除了乞灵于天文学和迷信别无他策,游走四方的江湖术士则借机诈骗钱财,人们普遍认定瘟疫通过黑鼠和昆虫传播,一旦染上便必死无疑。死亡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死神成为那个时代至高无上的主宰。在美因茨,在科隆,每天都有近百人死去。在整个欧洲,多达 2500 万人被"黑死病"夺走了生命,这个数字超过当时全部人口的一半。编年史作者、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海因里希·冯·赫福德的记述告诉后人:1349 年,在德意志,在欧洲其他地区,犹太人"被用最可怕、最缺乏人道的方式,使用铁烙、火烧"杀害。这位修士并不相信凶手们有关犹太人朝井水投毒、制造这场灾难的说法,而是认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缘于对他们财富的嫉妒心理——只要除掉债权人,凶手们欠下的债务便万事大吉啦!

当医学奇迹终于未能出现的时候,当已经不再有犹太人供人们迁怒的时候,世人要么默默地接受了命运,要么加入到苦修者的行列。苦修者赤裸上身,一边接受鞭苔,一边和着祈祷和赞美诗忏悔自己的罪孽。不过,教会对这种当众忏悔的做法并不认同,因为它希望继续保持饶恕罪过的垄断地位。罪孽既然已招来天谴便不能继续掩藏,为了予以根除,必须施以极其严酷的惩罚。所以,与人私通的女人被施以活埋,叛国者被处以分尸,亵渎神灵者被割掉舌头,杀人犯则生生地被剥掉皮肤。



1349 年多尔尼克的一支苦修者队伍。

危机岁月

[71]



马丁斯·科德克斯(1305—40)的画作，描绘的是图林根伯爵领主在士兵、仆人和妇女们的帮助下，击退了围困瓦尔特堡的敌军。

单单从政治层面上看，14世纪上半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灾难发生，但这段时间里的自然灾害却非常可怖。1315年爆发的大面积饥荒，持续了三年之久。20年后，南德意志地区的谷物被不计其数的蝗虫吞入腹中。各地还相继发生了几次大地震。在所有灾难中，最可怕的一场是瘟疫的爆发：1351年，德意志各地流行开来的疾病，夺走了约1/3人口的生命。接踵而至的这些饥荒和瘟疫，使德意志人口总数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增长，至于恢复既往水平，更是要到16世纪才有可能。

世人把这些灾难看作来自上天的惩罚，为求取赎罪之途，纷纷陷入了宗教上的歇斯底里，德意志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奇异的宗教团体。犹太人则遭到了极其残暴的谋杀。有一种传闻广泛流传：犹太人在井里下毒，导致了“黑死病”的爆发。至于漫无遍野的蝗虫，则被视为来自上帝的惩处，缘由则是犹太人的亵渎之举。虽然教会并不赞成苦修做法，仍有大批苦修者列队行经城镇，当众忏悔自己的过犯。犹太人遭受谋杀的真实原因，往往是因为他们很有钱，1349年发生在纽伦堡的560个犹太人被大火烧死的大屠杀就是一例。

大量人口抛弃乡村，涌进了城镇，使很多村庄被废弃，大片农田被抛荒。人口的急剧减少，意味着农产品价格以及租金、赋税的下降，导致贵族及其他地主的收入急剧减少。为了缓解这一困境，许多贵族转而效命于势力更加强大的领主和诸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镇中的工资水平却大幅度上升，赚取工资者的“黄金时代”由此得以展开。城镇可以建造粮仓囤积廉价农产品，从而避免饥荒，而在农村，当收成减少时，人们则不得不忍饥挨饿。大多数人都把接踵而至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揭露了真相：这种迁怒只不过是债务人从肉体上消灭债权人的借口罢了。许多教士宣称瘟疫是上帝对犯下罪孽的基督徒施以惩罚，但也有人指出，自然界的灾难或许是出于自然界的原因。

查理四世要想有效施行统治，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困难。波希米亚的领主们担心强势国王的出现，因此激烈予以抵制。哪怕是竞争对手路德维希去世后，查理四世也难以成为一位无可争议的国王：反对派的选侯提出，应由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亦即克雷西之战中的胜利者，接替路德维希成 [72] 为德意志国王。面对不利局面，查理谨慎地采取了因应之策，一方面争取到一系列重要城市的支持，另一方面与爱德华进行了谈判。事实上，爱德华对德意志的王冠并没有多少兴趣。



1502年，斯特拉斯堡的一位大学教授在讲课。最早期的大学是一些私营的学术教育机构，得到皇帝、国王或教皇的保护，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自治权，实行学术自由，享有税收豁免权。在德意志，最初一批大学出现于布拉格(1348年)、维也纳(1365年)、海德堡(1386年)、科隆(1388年)和莱比锡(1409年)。

查理四世在德意志的地位既已得到巩固，令他可以在波希米亚度过了此后的几个年头。布拉格主教辖区1344年从美因茨大主教区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大主教区。1348年，布拉格大学成立，这是德意志帝国境内的第一所大学。从此，德意志的学者便无需前往法国和意大利了。查理四世建造了横跨伏尔多瓦河上的气势雄伟的"查理大桥"，重建了大教堂以及其他许多教堂，这一切都成为布拉格这座首都在整个帝国中显要地位的象征。他还把许多领地并入波希米亚，包括卢萨西亚和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奥尔穆茨主教区、特罗波奥，以及上帕拉丁的大部地区。由此，波希米亚的幅员一直延伸到抵近重要金融中心纽伦堡，埃尔兰根也成为波希米亚的一个城市。

从此，查理在德意志和波希米亚都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地位，要求其戴上皇帝桂冠的呼声也适时响起。1355年4月，他前往罗马加冕为帝，但仅在罗马逗留了一天便返往德意志，究其原因，在于他在政治上极其高明，避免卷入意大利政治或与教皇发生冲突。返回途中，他除了从帝国城市收取税金之外，几乎马不停蹄。罗马之行，终于使查理四世成为无可争辩的皇帝，而他的权势、他的财力也得到了大大增强。

1356年的纽伦堡诸侯大会，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之一是国王的推选问题。大会同意，有权推选国王的诸侯应包括：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三位大主教，以及波希米亚国王、帕拉丁选侯、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伯爵领主。没有人提及教皇对推选结果的认可权。这些议项在梅茨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获得通过，作为颁行"金玺诏书"。之所以称作"金玺诏书"，概因文本系用金印而非蜡印戳盖。

查理四世1378年去世时，为继任者打造了坚固的基础，但其儿子文塞斯拉斯继位后却把一切弄得一团糟。文塞斯拉斯虑事不周、生性急躁而残暴，很快便遭到了波希米亚贵族和教会的反抗。他下令捉拿布拉格代理大主教约翰·内波穆克，严刑拷打后扔进了伏尔多瓦河，布拉格市民遂发动了起义。在南德意志，也有许多城市爆发了反抗贵族的暴动。文塞斯拉斯无法从其弟弟西格蒙德那里得到任何支援：后者虽然登上了匈牙利王位，但其统治地位极其脆弱。1396年，西格蒙德率领军队进行十字军东征遭到[73]惨败，几乎损失了全部军队，他本人也差点丧命。1400年，莱茵地区选侯们罢黜了文塞斯拉斯；这位国王甚至未作任何抗争：他的力量之虚弱，由此得到了最后一次验证。

天主教会大分裂与公会议

帕拉丁选侯鲁伯特继任国王后，决心纠正文塞斯拉斯的错误，但事实

证明，他那豪情万丈的雄心壮志并不切合实际。鲁伯特想罢免维斯孔蒂的职务（维斯孔蒂是统治米兰的几个吉伯林派家族中势力最强的一员），结束罗马与阿维尼翁之间的天主教会分裂局面，并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但曾出资帮助其出任国王的南德意志商人们拒绝承担远征意大利的开支，而佛罗伦萨人虽然支持鲁伯特开展远征以满足自己把米兰踩在脚下的愿望，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鲁伯特对天主教会的分裂痛心疾首。他于1386年创建了海德堡大学，为罗马教皇提供精神支持，同时也为遭到阿维尼翁教廷排斥的学者们提供一个避难所。1409年，罗马和阿维尼翁两教廷的枢机主教们既未与两位教皇协商，也未曾知会皇帝，便在比萨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废黜驻罗马和驻阿维尼翁的教皇，选出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但亚历山大五世不久便去世了，枢机主教们遂又选出了约翰二十三世。无独有偶，当鲁伯特1410年去世后，选侯们也推选出了两位国王，一位是文塞斯拉斯的弟弟西格蒙德，另一位是他的侄子约布斯特。由于文塞斯拉斯这时还活着，德意志这时居然有了三位国王，就像天主教会有三位教皇一样。不过，约布斯特不久以后便去世了，而文塞斯拉斯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格蒙德的王位并未受到挑战。

虽然此前的经历丝毫谈不上辉煌，但登上王位后的西格蒙德却成为一位有为君主。精力充沛的他，既是一位充满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技巧纯熟的外交家。同时，这时的国内外形势也很有利。在被人们称作"傻子"的查理六世统治下的法国，已经无足轻重；自从在阿金库尔之战(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在法国北部的阿金库尔重创兵力数倍于己的法军——译注)惨败后，查理六世便完全陷入了精神错乱，并终于郁郁而终。作为匈牙利国王，西格蒙德被视作基督教文明抵御土耳其人的旗手。在天主教廷方面，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因为在性爱方面一错再错及贪污成性、不可救药，在康斯坦茨公会议上被罢免；阿维尼翁教皇本笃八世也遭到废黜。罗马的格里高利十二世则自行辞职。1417年，马丁五世成为新教皇，教会分裂局面暂时告一段落。

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的这种混乱局势，无可避免地招致了严厉的批判，而作为帝国繁荣的首都和重要文化中心的布拉格，则成为许多改革分子的乐土。1409年，当时最著名的宗教学家"布拉格的希耶罗尼姆斯"使用了"最神圣的波希米亚民族"一词。而国王文塞斯拉斯在《库腾堡诏令》中改变布拉格大学章程时，便运用了他提出的这种颇具近代色彩的民族概念：诏令规定，大学理事会中波希米亚人将享有三席，而其他各个民族只剩下一席，而在此之前，则是其他民族三席、波希米亚人一席。文塞斯拉斯的如意算盘是，既然德意志学者这时站在罗马教皇一边，那么通过改组理事会以示好于波希米亚人，可以争取这所大学支持比萨的教皇。然 74
而，诏令出台后，德意志学者纷纷迁往迈森。1409年，迈森伯爵领主在莱

比锡为这些学者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学者们出走后，布拉格从此再也没能恢复昔日元气，很快便被指斥为“异端邪说的大本营”了。

波希米亚著名宗教改革家让·胡斯1370年前后出生。他既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神父，又是布拉格大学的一名教授。1412年，教皇召令其前往罗马，遭到胡斯拒绝。胡斯宣称，教会的首脑人物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教皇。1412年，西格蒙德派人以“保证其安全”的诺言诱骗胡斯参加康斯坦茨公会议，但到会后不久即遭逮捕，在经过旷日持久的审判且不允许他作任何辩护的情况下，以异端罪名判处以火刑处死。波希米亚人在宗教、政治和经济诸领域的诉求，随着胡斯的殉难演化为一场伤亡巨大的起义。然而，胡斯派起义大军碾过中欧大地时，他们的残暴做法丝毫无助于把改革理念推广给那些不幸的牺牲者。

康斯坦茨公会议结束了教会的分裂，斥责了波希米亚异端学说，并表示要对天主教会进行若干改革。但是，这种改革热情很快便让位于教皇与公会议之间的激烈权力之争了。到了1437年，又出现了两个公会议，随后又再次出现了两位教皇并立局面。同年，西格蒙德去世。在执政的后20个年头，这位皇帝再已无力成就康斯坦茨公会议那样的成功了，遂将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匈牙利王国事务。至于波希米亚，已被胡斯派的暴力撕成碎片。西格蒙德在德意志的地位，也遭到了严重削弱。显而易见，帝国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教会。

德意志的诸侯们发现，虽然已经享有自主权，能够自行征收过境税、铸造货币，但这些仍然不足以满足自己的一时之需。因此，在需要别行筹取款项时，他们便需要召集境内的领主，以税收的形式提供财力支持。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德语中，“税收”（Steuer）含有“资助”、“支援”的意思。被诸侯邀请商谈此种要求的对象，既有贵族、教会、城镇的代表，有时也包括自由民。这种会议可以称作议会制度的雏形，因为领地代表们讨论的内容很快便不仅限于税收分担问题，反过来也开始向诸侯提出各种要求了。

与皇帝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行政管理相比，诸侯领地及较大一些城市的效率要高得多。它们把有关权利与特权用法律条文形式明确做出规定，官僚队伍的专业技能也日渐纯熟。而帝国这时仍没有哪座城市享有至高地位；历任国王都把首都设在自己的领地：路德维希在慕尼黑，查理四世在布拉格，弗里德里希在格拉茨；与后世相比，他们的宫廷规模很小。不过，在出现农业危机时，贵族们可以从宫廷得到急需的财政资助。

为了反击莱茵地区选侯们日长夜大的势力和影响，西格蒙德把勃兰登堡选侯区授予了一位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亦即皇帝的外交顾问、特使、纽伦堡公爵。勃兰登堡其实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那里的贵族离心倾向很强。这位公爵立即动身去了勃兰登堡，从此以后，他的家族将相继统治普鲁士和全德意志，直至1918年。西格蒙德还把萨克森授予了迈森伯爵领

75

主，使韦廷家族成为萨克森的主宰者。

1438年，选侯们推选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就像霍亨索伦家族、韦廷家族成为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主宰者一样，从此以后，德意志的皇帝直到1806年、奥地利皇帝直到1918年，均将出自哈布斯堡家族。虽然选侯们一致推选阿尔伯特，但由于他当时已经是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所以他并不怎么想兼任德意志国王。后来，他也未曾加冕为皇帝；在登上德意志王位后的第二年，他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期间，因患上痢疾而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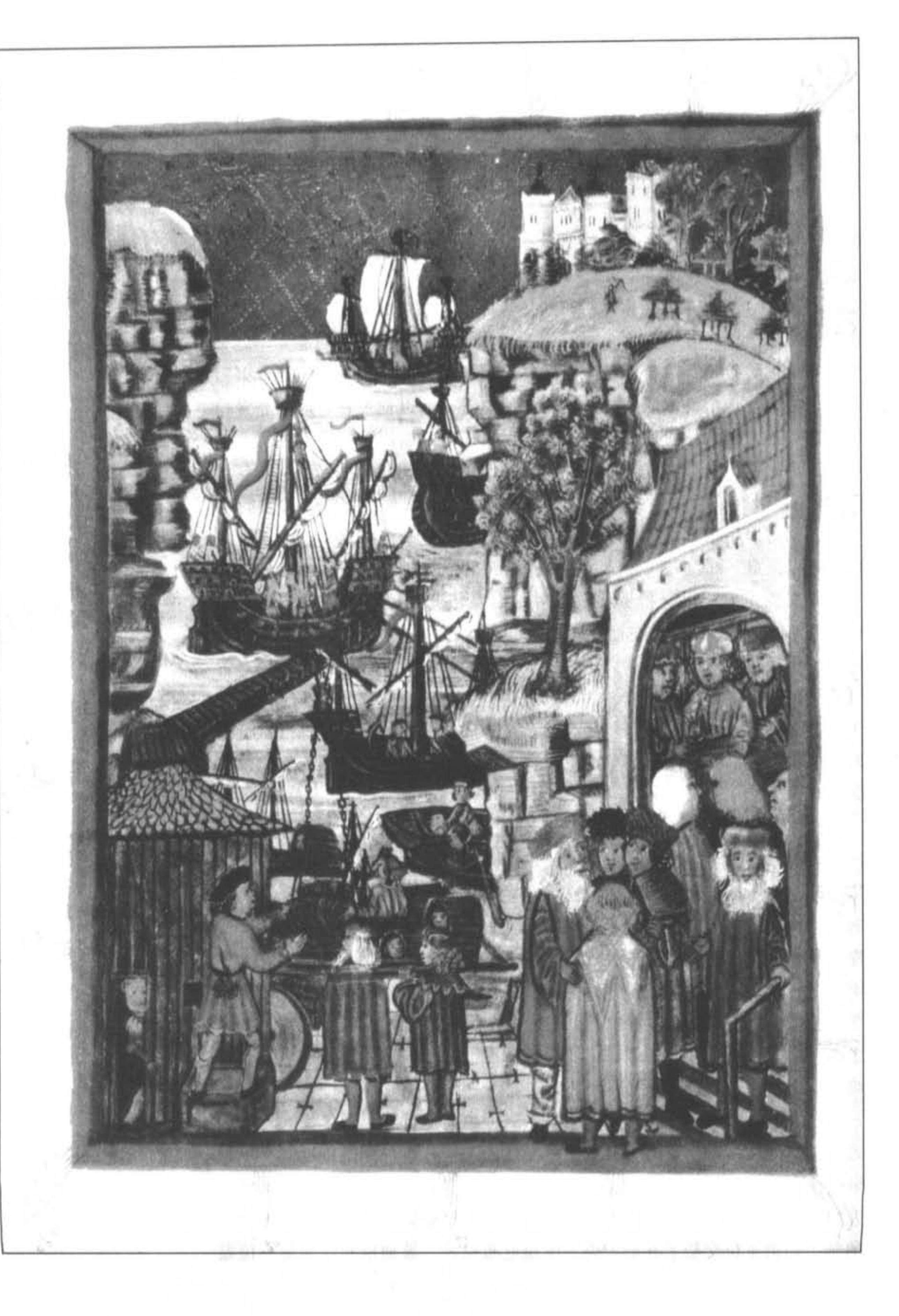
1439年，当时年龄最大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弗里德里希三世被一致推选为德意志国王，时年24岁。由于他已承袭了卡林西亚（克恩滕）、施蒂里亚和卡尼奥拉，而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领地，虽然交到了他的两个弟弟名下，但因为他们尚未成年，所以均由他监管，所以他上台后地位非常稳固。虽然他未遇到任何挑战，登上王位后也未曾显露出多少激动之情，但这次推选就其历史影响却极其深远，因为弗里德里希的统治将延续53年之久!甚至他最终去世，也可以称作“早逝”：他死于因腿部溃烂而进行的手术。当时医生信誓旦旦地说，病因在于他太爱吃新鲜水果了，动了手术他便可以痊愈。在位时间极长，堪称弗里德里希三世时期的一大特征。

弗里德里希三世支持罗马教皇对抗巴塞尔公会议。所谓巴塞尔公会议，系1431年至1437年在巴塞尔城召开，旨在商讨教会改革事宜，后来还推出了一位敌对教皇即菲力克斯五世。作为回报，罗马教廷允许他对帝国范围内的教堂施行控制权，并为他提供大笔金钱资助，保障了他在1452年加冕为皇帝。这时，巴塞尔公会议已被解散，那位敌对教皇也已自行辞职。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里希三世将成为最后一位在罗马举行加冕仪式的德意志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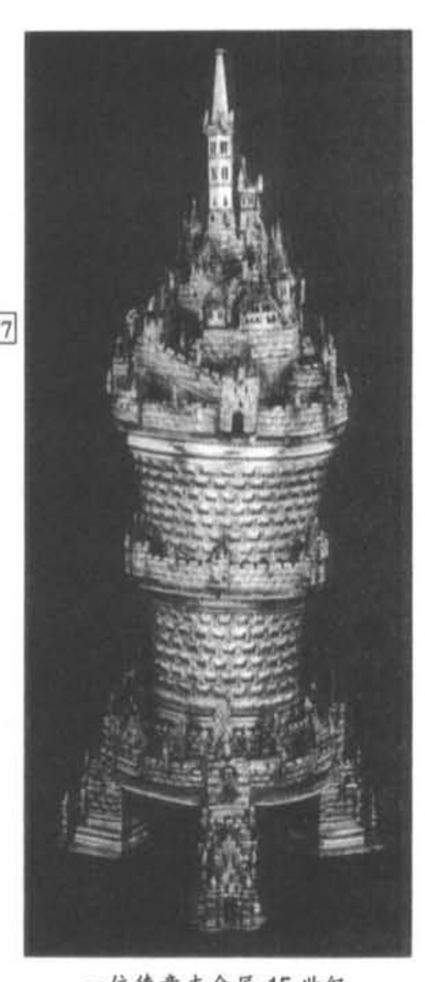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弗里德里希三世并不想挺身而出，保卫基督教世界免遭穆斯林入侵，而是诏令把条顿骑士团在帝国以东从异族手中所征服的一切土地都赐予它（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在巴勒斯坦的阿克地区成立的一个宗教－军事组织），由此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普鲁士和东波美拉尼亚。从1440年起，一批普鲁士领主提出了在国家事务中应享有一定发言权的要求，并得到了波兰国王的支持。1454年，这些领地夺取了条顿骑士团的大多数城堡，终于引发了一场战争。内战持续了13年之久，由于皇帝无法向条顿骑士团提供所需援助，1466年签署的《桑恩条约》规定，该骑士团必须放弃大部分领地。

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弗里德里希三世也连连折阵。1458年，匈牙利的领主们推选马特西亚斯·科尔维亚斯接任王位。这位国王将以其在中世纪极富个人色彩的方式，一直统治到1490年。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的后人拉吉斯拉夫·波斯图穆斯，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监护对象，但波希米亚的领主们把王位交给了乔治·冯·波迪厄布拉德。波迪厄布拉德是一位温

76



和的胡斯派成员，在位时间为1458年至1471年。他决心捍卫1433年签订的允许波希米亚人领取两种形式圣餐的《布拉格协定》（系德意志封建主和代表中产阶级的圣杯派在布拉格签署。根据这个协定，宗教会议承认一般教徒可以用圣杯领取圣餐，同时圣杯派已经得到的财产不必归还。所谓“两种形式的圣餐”，是指胡斯派中温和派的主张，即在圣餐礼中，教徒与主礼的教士同样领食面饼和葡萄酒。而在天主教礼仪中，主礼教士领食饼与酒，教徒则只能领饼，不得领酒——译注）。教皇庇护二世宣布废除 [77] 此项协定，并威胁说要以异端罪名审判波迪厄布拉德。这位波希米亚国王遂号召对土耳其人发动一次欧洲十字军战争，并呼吁对帝国进行改革。弗里德里希三世把波迪厄布拉德作为自己在东方的副手一样看待，在后者与教皇之争中予以支持，但他在东方的地位仍很不稳定，随着波迪厄布拉德于1471年去世，面临的挑战便更严峻了。1466年，当马特西亚斯·科尔维亚斯被开除教籍时，曾与波希米亚国王乔治·冯·波迪厄布拉德交战。1478年，又从后者的继承人手中夺取了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此前，这位匈牙利国王还在1462年打败了土耳其人，夺取了波斯尼亚，1467年又夺取了摩尔达维亚和瓦莱西亚。1482年，他对弗里德里希三世宣战，并于1485年夺取了维也纳，以极其奢华的方式住在了这里。皇帝则被迫离开了自己的世袭领地，在强大的竞争对手的阴影下，偏安于格拉茨。不过，他终于熬过了这段难捱的时光，得以把世袭的土地交给了自己的继任者。究其原因，在于马特西亚斯·科尔维亚斯没有合法的子嗣，因此在1463年签订了《普雷斯堡条约》。由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路德维希在1526年的莫哈奇之战中身亡，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这3个王国均根据《普雷斯堡条约》有关条款归并于哈布斯堡王朝，并将一直持续到1919年。



一位德意志金匠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制作的一件精品。大口杯用黄金和镀金金属铸造，形如城堡。

在帝国的西方，弗里德里希三世的主要对手包括勃艮第公爵“勇敢的查理”（他比皇帝更富有），以及英国和法国国王（在很多方面，这位国王的势力超过其他所有君主）。不过，查理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最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他御下的那支重装甲骑士军队，根本不是使用长矛的瑞士步兵的对手。先是1476年在格兰德森、穆顿，尔后是1477年在南希，勃艮第人连续遭受惨败，查理也在南希之战中丢了性命。这些会战表明，重装骑士如今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此外，“勇敢的查理”对德意志的进攻也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他进攻科隆大主教领地，包围了纽斯，但弗里德里希三世组织了自胡斯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帝国军队，迫使勃艮第人放弃了围困。强敌当前，这位皇帝号召保卫日耳曼民族利益，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德意志诸侯们纷纷汇集到他的麾下。“民族”这个概念，最初系大学里的学生的专用语，后来在教会的公会议上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而从抵御查理进攻起，它开始具有了近代含义。

第68页图：汉堡1497年《市政法规》中的一幅插图，描绘了汉堡港的商人和水手。汉堡是“汉萨城市同盟”的一个重要成员。该同盟包括北德意志的150个城镇，旨在促进贸易和相互保护。汉萨同盟致力于对东欧地区的殖民，控制了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贸易活动，并在1350至1450年间发动了数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78

中世纪的浴室

在中世纪初期，人们对个人卫生并不看重。对于只有一套衣裳的贫困农民来说，洗衣服的劳顿自然可以省去。那时的教士对洗澡普遍持强烈反对态度。很多人认为水对于身体具有不良作用，还有一些人则觉得，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裸体会引发淫荡念头。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三位一体论》等，曾任北非希波主教。因对基督教有重要建树，被教会封为伟大的圣师，故称为圣奥古斯丁——译注）虽然提出基督徒可以洗浴，但坚称洗澡频度不能超过每月一次。973年，哈卡姆二世（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译注）出使法兰克人的使臣报告说，一想到法兰克人的骑士，他就充满了厌恶感：这些人一年只洗一两次澡，而衣服是从来不洗的。对于穆斯林来说，在斋戒祈祷之前必须沐浴5次，因此，他们绝对不能想象法兰克人会有这样的肮脏生活习惯。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观察者留下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斯拉夫人至少还有原始的"蒸汽浴"：他们先在蒸汽中把自己蒸腾到近于昏死的状态，然后再用凉水把自己激醒。

在巴伐利亚，农民们开始蒸汽浴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事实上，德语中的"房间"（Stube）一词正是蒸汽"发散"（Stieben）的派生词。也许是受到自东方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一些富有的欧洲人开始在自己的城堡以及在城镇中的寓所里修建浴房，里面摆放的浴桶是用木头或金属制成的。家中如果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那么邀请他洗上个澡，便足以表达出热情好客之意。客人洗澡时，女主人会为这些客人中最尊贵的一位洗浴和按摩。有时，甚至男主人也会操持起这桩本应由仆人揽下的服务项目。

营业性蒸汽浴室随后出现。在装潢精美的浴室，女服务员（Badwibel）会用她们的纤纤玉指为骑士们按摩、擦洗和揩干。但这种享受的开支非常之高。坦霍伊泽曾经写道，一周洗上两个澡的生活习惯花了自己一大笔钱，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在洗浴之后，还要接受女服务员提供的进一步服务。到12世纪以后，公共浴室在许多城镇的出现，为浴客提供了一种更经济的洗浴场所。单单是美因茨一个地方，此类浴室就多达4家。这种公共浴室的社交意味很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洗浴，彼此开着充满色情含义的玩笑，享受着厅中游走的乐师演奏的美妙音乐，然后双双对对地到隔壁房间里铺设的床上进一步增进友谊。诚如此，古英语中"浴室"（stew）一词后来成了"妓院"，还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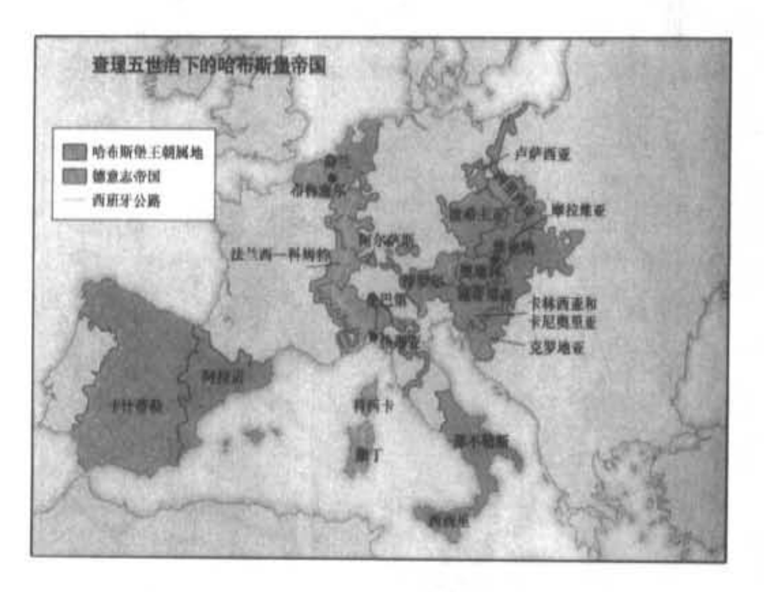
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开始把公共浴室称作淫荡之地，把服务员说成是娼妓，认为浴室老板赚取的是不义之财。医学界人士警告人们，前往浴室可能被传染上梅毒、"法国病"及其他令人难以启齿之疾。还有一些善妒之人，在浴室里把妻子捉奸在床后，激愤之下予以杀害；光顾浴室之士，常常在洗浴之际被人抢走钱财衣物。浴室的工作人员被视作"贱民"：奥格斯堡一家浴室的老板有个漂亮女儿名唤阿格尼丝·贝尔瑙尔，符腾堡公爵阿尔布莱希特二世秘密地娶了她之后，公爵的父亲大发雷霆，派人杀死了这个倒霉的美人儿。

浴客们光顾的时间，以星期六晚间以及节日的前一个晚上为最集中。当时的人们对占星术深信不疑，觉得在七、八月的三伏天，太阳位于狮子座，这时如果洗澡是不吉利的。家中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也可以到浴室加以庆祝：一对新人即将结婚了，便可以为他们安排一次"鸳鸯浴"；孩子降临到了世间，或者有位老人告别了人世，也可以举行一次浴室聚会。

中世纪的人们对头发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对自己的身体。因为头发留得很长，要想不生虱子，除了需要仔细梳理外，还得定期洗发。牙齿的清洁工作在晨间进行，用布蘸点盐水或粉末擦一擦。但这种方式收效甚微，很多人年纪轻轻地便掉了牙。大多数男士都仅仅在洗澡之后才会剃须，所以根本谈不上定期。教士则每周剃一次胡子，两星期剪一遍头发。至于洗澡，基本上是为了找个乐子而不是出于个人卫生动机。德意志有句谚语："要想开怀大笑，何不快快活活洗个澡！"（Wiltu eyn tag frohlich seyn?get,ach geh in pad hinein.）所以，一个人到底是进浴室之前还是从浴室出来之后更干净，还真让人难以断言呢！

第71页图：勃艮第的安东尼著作中的一页插图，反映了中世纪晚期一家浴室的景象。


lx
Blandum ecia luxuria
malum q accusare
aliquato facilius est
quā bitur operi nro inserit. Non
quidem ut ullū honorem recipiat
sed ne seipsum recognoscens ad
penitenciā impelli possit. Junitat
ille libido qui ex fonte viciorum
principis oritur neq; a reprehencione
aut ab emendatione separentur. quo
mentis errore convexe. Translateur
En ceste partie Valerius commence
son ixe livre qui est des dis et des
fais dignes de memoire de la cite
de romme et des estranchiers. ouql
apres ce que Valerius es viij livres
precedens a determine des vertus et
operations vertueuses. en ce ixe



马克西米连一世与哈布斯堡王朝复兴

1473年，“勇敢的查理”提出把自己的女儿玛丽嫁给弗里德里希三世之子马克西米连。在商讨此桩婚事的最后一刻，皇帝却打了退堂鼓。直到查理在格兰德森遭到瑞士人痛击之后，他才答应了这项提议。“勇敢的查理”在南希之战中阵亡后，法国军队侵入了勃艮第，弗里德里希三世立即采取了决定性的反击措施。他把勃艮第赐为马克西米连和玛丽的领地，并派使臣安排了他们的结婚仪式。4个月后，这对新人于1477年8月19日完婚。又过了10个月，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1482年，玛丽因骑马外出时发[80]生意外而去世。

1490年，马克西米连从他那位挥霍成性的堂兄西格蒙德那里得到了富裕的蒂罗尔公爵领地。同年，他打败了匈牙利人，并根据《普雷斯堡条约》获得了匈牙利国王的头衔，不过要化诸现实的条件是，并立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在去世时没有留下子嗣。这时的马克西米连还没有真正成为勃艮第的主人，为此不得不在随后的15年里与法国以及荷兰领主们进行战争。1488年，他沦为荷兰人的俘虏，但弗里德里希三世再次成功地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迫使法国人和荷兰人屈服了，于1493年签订了《森里斯和约》。至此，马克西米连在勃艮第的地位得到了阿图瓦人和弗兰德人的认可，统治遂得以最终确立。几个月后，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了。

马克西米连被人冠以“最后一位骑士”的雅号。他很喜欢马术表演和比赛，但他清楚地意识到，骑士在军事意义上已经了无意义，未来的战争将属于枪兵和炮兵。这位把荷兰夷为平地的残暴军事统帅，同时也是赞助艺术和文学的有功之人。这种性格上的两面性，曾令技巧最出色的宫廷画家们受益匪浅。1409年，马克西米连娶了米兰公爵的女儿比安科·玛丽·斯福尔察为妻，此后很快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及威尼斯、米兰和西班牙人均结成了盟友，把法国人逐出了意大利。作为对其在意大利打败法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认定，1495年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大会承诺将推行帝国改革，宣布帝国境内永不再战，一切历史积怨就此走向终结，今后但凡出现纷争，均应通过由皇帝和各领地代表组成的帝国法庭（Reichs - Kammergericht）解决。不过，帝国大会并未就法庭的裁决结果如何获得实施做出决定，也未就皇帝通过何种途径征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大多[81]数领地诸侯均表不满。

马克西米连在意大利的战事并未完全取得成功，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既

得战果。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未赢得帝国的充分支持。在瑞士军队打败士瓦本同盟及帝国的军队后，马克西米连不得不在1499年签订的《巴塞尔条约》中承认，他今后将不再对瑞士拥有任何权力。帝国大会固然很不情愿地答应将出资供他前往罗马接受加冕之需，但这笔款项始终未曾到位；哪怕马克西米连能够得到这笔费用，也无法到达罗马，因为意大利北部这时已被法国人控制。为了得到帝国大会曾承诺提供的这笔经费，皇帝不得不答应成立一个帝国政府（Reichsregiment），由教会和世俗诸侯和各城市的代表组成，负责确保帝国境内的和平、管理和控制帝国法庭和军队。在国王外出时，该政府有权做出决策，而在未取得政府同意时，国王则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从理论上看皇帝已全然失去了权威，但马克西米连实施了报复，导致这个政府无法有效贯彻其做出的任何决定。由于诸侯之间频生龃龉，帝国政府遭到了进一步削弱，并终于在1502年停止了运行。与之相较，旨在保障和平的帝国地区机构（Reichskriese）则更加有效，起到了帝国与各具体领地之间的纽带作用。当两位最具影响力的改革派人物（一个是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伯格，另一个是帕拉丁选侯菲力普）相继去世后，诸侯们反对皇帝的声势便更弱了。

由于从帝国征收的税收只能允许帝国保持一支小规模的军队，因而不足以打通前往罗马的道路，马克西米连1508年2月只能在特兰托举行了加冕仪式。此举打破了以往由教皇加冕的惯例。从此以后，继任者们都是同时加冕为国王和皇帝。马克西米连对意大利政治的干涉，最终以失败告终。1516年，他与法兰西斯（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年在位——译注）媾和，放弃了德意志帝国在意大利的属地。不过，哈布斯堡王朝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却将通过几桩幸运的联姻的收益得到足够的补偿：阿拉贡公爵费尔迪南德曾把女儿乔安娜嫁给了马克西米连的儿子菲力普；马克西米连的女儿玛格丽特则嫁给了费尔迪南德和卡斯蒂尔的伊萨贝拉的儿子、西班牙王位继承人胡安。由于西班牙国王的三个子嗣均已去世，所以到了1517年，菲力普和乔安娜的儿子查理，与那位精神不正常的母亲共同继承了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西属美洲。此前，查理已于1515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低地国家”（指西欧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译注）和勃艮第。1519年，当其祖父马克西米连去世后，查理被推选为皇帝。至此，其祖父那建立一个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的梦想，似乎已经化为了现实。

第四章　宗教改革运动

第75页图：哈布斯堡王朝1515年同时为两位王室子弟订婚时，伯纳德为皇帝马克西米连一家人画像。"别人需要打仗，但幸运的奥地利可以通过婚姻安排达到目的！"

 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欧洲许多地方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民族国家的专横、自负和自大。无论是英国都铎王朝的繁荣文化和咄咄逼人的海军、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勇于冒险的海外探险者和海外帝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还是瑞典国王的强大军队，都颇能体现这一点。不过在德意志，情况却大异其趣：延续多年的多民族的圣日耳曼罗马帝国仍在逐步消亡过程中，其各个组成部分则奋力争取独立的主权地位。这个帝国将重新组合，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以适应民族国家的新时代之要求吗？或者，它将分裂成为除了同样使用德语之外再无任何相似之处的若干个小国？德意志的命运和前途，直到18世纪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崛起为欧洲主要国家，才能随着它们之前的斗争，大略地看出一些端倪。

德意志经济奇迹



被称作"富可敌国"的雅各布·菲格尔（1459—1525年），是当时德意志最著名的金融家。图中这幅栩栩如生的肖像画，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518年为其创作的。

16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尽管在政治发展上远远落在了欧洲其他许多地区的后面，但在经济领域却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整个中世纪，由150个德意志城镇本着相互保护之宗旨结成的"汉萨城市同盟"，主宰了西起大西洋、东到波罗的海的贸易。到了16世纪，虽然该同盟的城镇开始走向衰落，其特权遭到了新兴民族国家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但在德意志的其他地区，经济却正以令人咋舌的速度稳步增长。在采矿业、金属业，德意志人处于欧洲最前列；在银行业，他们也开始取代了意大利大银行家们的地位。国际贸易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与东方的商业交往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利用分包制，工业生产一直可以下放到家庭作坊中的工人，产量增长也很可观。

德意志经济的龙头当属采矿业，尤其是哈尔茨山、厄尔士山脉（即克鲁什涅山脉——译注）、图林根森林及阿尔卑斯山区的铁矿业。这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时代：对资本的需求，刺激了银行业的发展；生产业不断产生新型的组织方式；工程人员面对各种复杂技术问题，总能独辟蹊径找出化解之道。大多数大型金属业工场，特别是在曼斯费尔德周边地区，均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投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富有的商人，也有普通的家庭主妇。直至西班牙16世纪中期开始从"新世界"进口白银之前，德意志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生产国。由于白银业已成为基本的支

83



萨克森公爵、马丁·路德的保护人“智者”弗里德里希三世(1463—1525年)。教皇利奥十世非常垂青此人，希望他能出任皇帝。鲁卡斯·卡拉纳赫1515年为他创作的这幅肖像画，刻画了他的性格力量和美德。

付手段，德意志遂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古尔登(德意志金币——译注)、弗罗林(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后来被欧洲若干国家仿造——译注）等金币，逐渐被白银铸造的泰勒所取代。“泰勒”这个名称，盖源于冯·施利克公爵率先铸造这种大型银币，是在厄尔士山区的乔希姆斯泰勒。

当时的大银行家（称作“金融家”）包括乌尔姆的埃辛格、沙德，奥格斯堡的菲格尔、霍赫施泰德和韦尔泽，其中菲格尔家族的财力之雄厚，远远超过竞争对手们。皇帝和诸侯们每次需要用钱时，总会前往被称作“富可敌国”的雅各布·菲格尔那里求借。菲格尔家族早在14世纪便涉足纺织业和商业，并开始把自己的资金借贷出去。随着业务上的发展，这个家族开始接受诸侯和贵族们的存款，并按照固定利率支付利息。由于马克西米连、查理五世这两位皇帝均借贷大笔资金，作为回报，便把哈布斯堡王朝领地的采矿权赐予了该家族，使其事实上垄断了匈牙利的银、铜、汞矿。历任皇帝为了得到推选，也需要从菲格尔家族借钱，而当他们荣登皇位后，雅各布·菲格尔在提醒他们时自然不会有丝毫犹豫。例如在1519年，选侯们必须在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孙子、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与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之间选出一位，查理共向他们支付了851，918个古尔登的贿金，其中543，585个古尔



84 奥格斯堡1531年的一幅木刻画，画中人物是一位农民来到犹太高利贷商人的帐房。对于德意志的犹太人来说，宗教改革运动并不足以为他们带来解脱。马丁·路德本来以为，他对基督教的解读可以被犹太人所接受，但促使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的声音，令他的这种希望破灭了。在1543年的《关于犹太人及其谎言》一文中，马丁·路德也祭起了中世纪的那种刺耳论调，把犹太人斥为宗教上的罪人和高利贷者，并宣称加尔文主义和天主教教义都是“犹太人的”异端邪说。

登是从菲格尔家族借来的。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一个家庭主妇一年只能挣到1.5个古尔登，学校教师是3.72个，诸侯领地的政务官(councillor，诸侯的参赞——译注)的年收入也只有80至200个古尔登。

哈布斯堡家族与菲格尔家族、韦尔泽家族等大银行家之间，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皇帝在财政上破了产，这些银行家的资本便如同打了水漂。为了规避这种风险，这些家族逐步转向生产经营活动，变成了维护自己的领地、保护自己的商业资本的领主。例如，菲格尔家族后来不再从事银行业，而是变成了巴本豪森领主，与德意志的其他贵族家族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85

虽然德意志经济在16世纪获得了可观的增长，但因为人口迅速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普通人却未能真正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实际工资反而剧烈减少了，并将在此后200年里继续以或大或小的幅度却又无可逆转地下降。真正分享了经济增长果实的，则是贵族和富裕平民。那个时代的一大突出特征是"祝祷、海喝和大吃"，人们的酒量之大、饭量之巨，实在是令今天的人们咋舌。萨克森公爵对酒食之徒的说法是：他们降临人间时是一个人，离开人世时则变成了一头猪。马丁·路德也曾指出，每个地方都有它们的罪孽，而"我们德意志人罪孽可以在葡萄酒囊(以整张羊皮制成)中找到，称作'豪饮'"。1993年，德国汉堡平均每人每年要喝33加仑的啤酒，而在整个16世纪，这个城市人民平均每年消费掉的啤酒则是近200加仑！

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处于绝对优势，不过在16世纪的德意志，资产阶级在很多领域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他们控制着经济，规定着文化标准，在政治上也握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虽然社会阶层的分野是依据人们的身份、地位或世袭爵位，与近代社会这种以经济尺度划分阶级不同，但一个人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倒也不是全无可能。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的父亲汉斯·路德原是一位农民，后来当了矿工。因为娶了一位富裕平民的女儿玛格丽莎·林德曼，他得以在曼斯费尔德开办了一家黄铜冶炼厂，生活逐步变得富足起来。在父亲的要求下，马丁·路德开始学习法律，以为作获得特权、财富和权力的进身之阶。1505年7月，就在他离家前往埃尔富特的大学，马丁突然放弃了法律学业。究其原因，在于他被一道闪电吓坏了，遂以圣安妮（据基督教《圣经》"外传"载，系圣母玛利亚的母亲，7月26日是她的纪念日——译注）的名义起誓将成为一名神甫。虽然此举令其父亲颇为恼火，但仍然立即加入了埃尔富特的奥古斯丁托钵修会。这一派向以教规严苛著名，马丁入会后很快便以祈祷的频繁、守夜的长时间和自我惩戒的烈度，与其他修道士相比显示出很大不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中世纪的上帝那严格而毫无怜悯的眼中，求得饶

86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原名亨纳·根泽弗赖斯奇·泽·莱登，1397年出生，其父亲是美因茨的自由民。1430年，由于当地自由民与行业协会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古滕贝格被迫离开美因茨，前往斯特拉斯堡，并在那里第一次进行了印刷术试验。他筹借到150个古尔登后，于1448年回到美因茨。1550年，他又从一位名叫约翰内斯·富斯特的人那里又筹集了1600个古尔登，准备建立一家活字版印刷工场，印刷拉丁文《圣经》。筹集的资金数目极其巨大，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万英镑。1455年，富斯特向他讨还借款，双方遂诉诸法庭裁决。尔后，古滕贝格破了产。

此后，他又开办了一家印刷工场，但规模要比此前小了很多。他在1457年印刷了《圣经·诗篇》，1460年印刷了约翰内斯·巴尔布斯编纂的拉丁文字典。1462年，拿骚选侯阿道夫二世攻占了美因茨，把自由民们赶出了这座城市。古滕贝格遂前往莱茵河下游的埃特维尔，设法在那里建立了又一家印刷工场。1465年，阿道夫二世表彰了古滕贝格的贡献，并为其提供了一笔数目不大的养老金。1468年2月3日，古滕贝格离开了人世。



古滕贝格并非其某些颂扬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印刷术的发明者”（古藤贝格的发明比起我国宋代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要晚得多，但他最先使用印刷机，成为近代机械化印刷技术的先驱——译注）。他真正了不起的发明，是使用了金属活字版印刷工艺。首先，用当时通用字体制成的296种字符被刻制成钢模，然后在质地较软的金属中冲压出底版。冲压字模利用古滕贝格所独创的一种灵便的手工机械，使用铅、锑、铋、锌合金制成，然后放入一种特制的盒子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符便放在最便于拿取的地方。印刷工人用排字棒捡取需要的字符，放进排字版，每个版便是印出来之后的一页。印刷油墨也是古滕贝格专门研制出来的，印刷机的使用原理类似于榨取葡萄汁。他发明的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铸字用的铅合金、印刷机以及印刷油墨在内的这一整套铅活字印刷技术，将一直沿用到18世纪。

印刷《圣经》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全书共1292页，每页42行（所以古滕贝格印刷本被称作《四十二行圣经》），总共印刷了180本。但这项工作动用6套印刷设备和12位印刷工人，整整忙了3年之久。古滕贝格的想法是，印制出来的书籍，看上去要像手写体书稿一样。这180本《圣经》，其中30本印在羊皮上，另150本印在意大利专门生产的纸张上。时至今日，存世的《四十二行圣经》只剩下了寥寥48本。

就其价格来说，印刷出来的书籍仍然很昂贵：每本《四十二行圣经》的售价，相当于一位熟练工人4年的收入。尽管如此，后来的年份里仍然有数量极其巨大的书籍印刷出来：遍及欧洲各地260个城镇的1100家印刷工场，负责制出来的古版本(指1500年以前印刷的书籍)达500万本，书籍种类达到27000种之多！

左图：J·克恩1840年创作的钢版画中的约翰内斯·古滕贝格（1397—1468年）。

下图：约翰内斯·古滕贝格排版印刷的《四十二行圣经》。图中显示的是《诗篇》第1至第4篇。

恕和解脱。1512年，他受聘为维滕贝格大学的神学（圣经研究）教授。正是由于他极其认真而富有批判精神地钻研《圣经》原文，而不是学习神学家们的注释，才会使他后来抛弃了罗马教廷现行的赎罪理论。

对于马丁·路德的批判主义思想，最富启迪意义的段落是《圣经·罗马人书》的第16、17两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由此，他开始认识到，人的救赎不是来自自己的善行和自我惩罚，而只能来自信仰上帝，并通过阅读《圣经》加强这种信仰，亦即：救赎只能来自《圣经》，来自尊严，来自信仰。不过，虽然马丁·路德这时已经抛弃了上帝毫无怜悯之心、严酷复仇的想法，但仍然相信一个人以及这个世界都带有原罪，尚未像伊拉斯谟（1469—1536年，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1521年定居瑞士巴塞尔，专事著述。著有《愚人颂》、《家常谈》等——译注）等宗教改革家们那样产生人文主义思想，把社会生活的秩序归因于人们的良好意愿和行为。

87

引起马丁·路德抨击教会并进而发动改革运动的事件，是所谓赎罪税的征收，使他进一步相信教会界已被罪过深深地掩埋。15世纪时，教会允许有罪的教徒购买"赎罪券"，宣称只要花了这笔钱，即使不真心忏悔，也可以保证免受惩罚。据说，赎罪券还能够缩短购买者在涤罪所的时间，或者是死者遭受炼狱之火烧灼的时间。从1513年起担任教皇的美第奇（利奥十世），是人道主义者伊拉斯谟斯在文化领域的友人，也是改革派寄予厚望的对象，但他沉醉于重建罗马的宏伟计划之中不能自拔。为了筹集重建费用，他得用信徒的盲从和轻信心理，在1517年以"大赦年"为名目，又开征了新的赎罪税。尔后，他派出数以百计的修士，像生意人那样奔赴基督教王国的四面八方，收取赎罪的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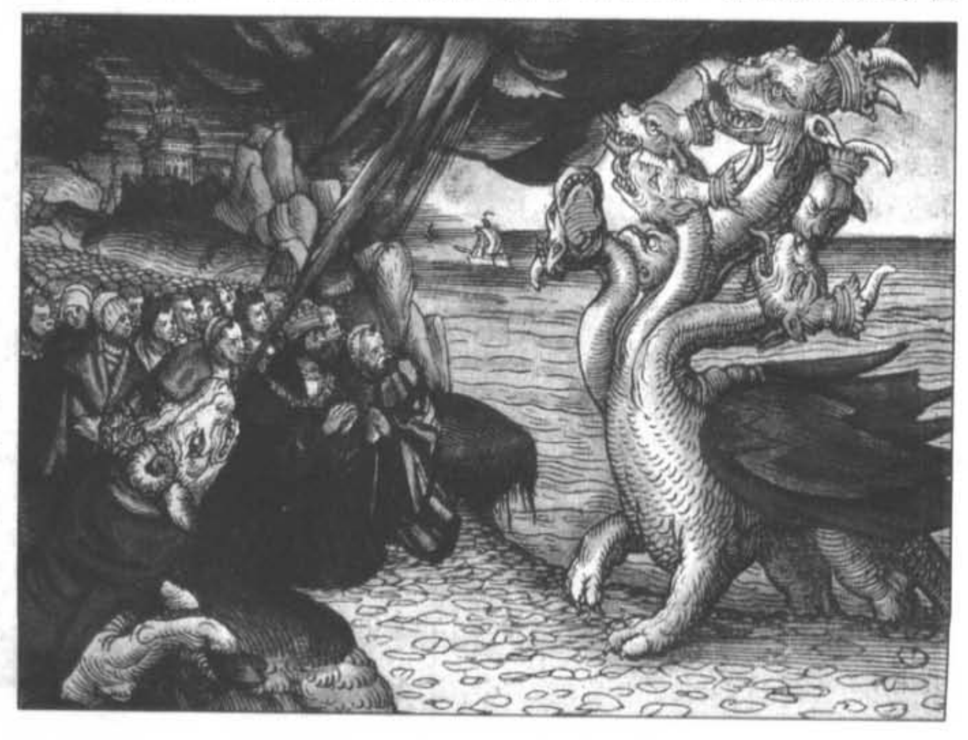
这是鲁卡斯·卡雷纳赫为马丁·路德创作的大量肖像画中的一幅。卡雷纳赫画技高超，表现力强，揭示了这位宗教改革家的复杂内心世界。



这批销售大军中最具口才的一位，当属约翰内斯·泰特泽尔。他巧舌如簧，对赎罪券的功效极尽夸张之能事。马丁·路德从忏悔者那里得知，泰特泽尔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花一定数量的钱，不仅过去的罪过，而且未来可能犯下的罪过都可获得赦免，不论这些罪过多么严重。听到这些荒唐之言，怒不可遏的马丁·路德写就了《九十五条论纲》（标题为《评赎罪券的效能》——译注），于1517年11月送给了美因茨大主教兼勃兰登堡主教。后世传说他把这篇论纲用钉子钉在符腾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几乎可以断言是以讹传讹，这样的故事最早也是出现在此后几十年。

美因茨大主教兼勃兰登堡主教阿尔布莱希特，是教会中一位权势极大的人物，也是三位大主教选侯之一，正是在德意志销售赎罪券的负责人。他同时还兼任马德格堡大主教之职，并且管辖着哈尔伯施塔特。集如此之多的要职于一身，本来是教规所禁止的。但只要阿尔布莱希特交上了24000杜卡特的金币，教皇便立即宽宏大量地对此种越规视而不见了。大主教的这笔钱，系来自向菲格尔家族的借贷，欠下如此之重的债务，如果仅凭常规途径是注定清偿不完的。所以，他接受了赎罪券在德意志的销售工作，商定：赎罪券的收入50%缴归教皇，50%则作为他偿还菲格尔家族的债 88 金。面对来自一介修士的批评，大主教自然不会闻过则改。而在马丁·路德这一边，由于迟迟听不到阿尔布莱希特的答复，他便抄录了几份论纲交给部分同事，以试探他们的反应。不料，部分同事未经作者的允许，便把《九十五条论纲》公布了出去，由此在德意志帝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仅仅过了六个星期，便有人把论纲从拉丁文译成了德语。同年12月，美因茨大主教声称马丁·路德犯下了叛教罪，宣布将其革出教门。1518年初，教皇便亲自下令成立法庭，对此种异端邪说进行审判，这一速度在当时而言显属非常之快。究其原因，在于马丁·路德对赎罪券及教廷救赎理论的抨击，构成了对教会根本制度的冲击，他那种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直接与上帝取得联系的理论，更是否认了世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分野，令享受种种特权的教士阶层失去了立身之本。教廷很难从法理上为销售赎罪券之举找到依据，但如果不对马丁·路德的责难作出回击，教皇顶上那耀眼的光环便会飘散而去。

在1518年10月召开的奥格斯堡帝国大会上，教会派出多明我教派的枢机主教卡热坦，对出身于奥古斯丁托钵修会的马丁·路德进行质问，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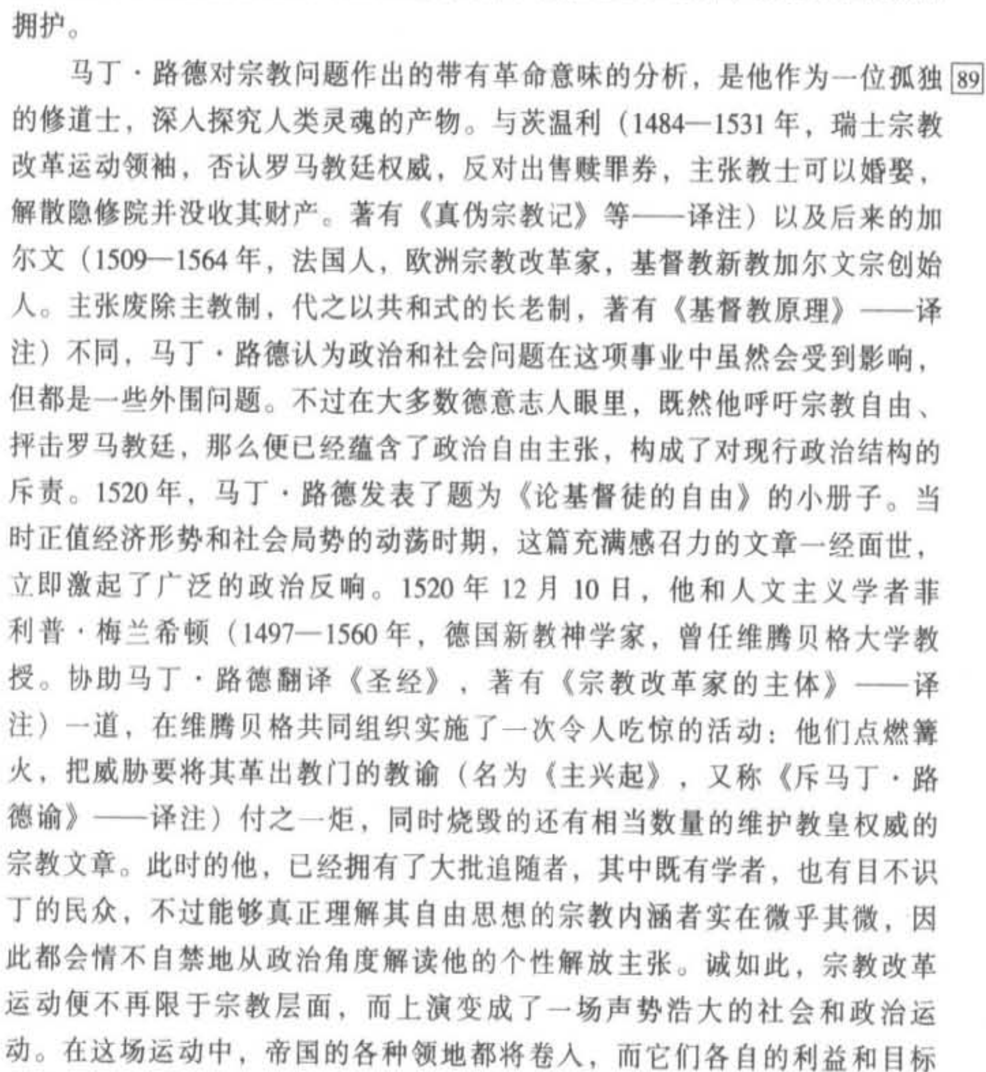
马丁·路德译为德文的《圣经》中，《启示录》一卷中所附的“七头毒蛇”插图。马丁·路德并不是把《圣经》译为德文的第一人，也不是创立“标准”近代德语者。他翻译《圣经》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使用了富有生命活力的通用德语，从而为德语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场辩论在随后的两年里没有了下文。至于原因，可能与皇位继承有关：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在 1518 年底患病后，教皇希望能阻止皇帝的孙子、西班牙国王查理继位，而是垂青于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希望后者能被推选为德意志国王；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这位选侯，对饱受折磨的马丁·路德提供了支持和保护。教皇希望在皇位继承问题尚未定局之前，淡化一下对马丁·路德的攻击。



刻有查理五世(1500—1558年)头像的银币。

而在马丁·路德这一边，抨击教廷的声音则越来越尖锐了。到了 1520 年，他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廷是万恶之源，教皇是反基督分子。可以说，这位 1517 年的宗教改革家，这时已变成了一位革命者。他写的篇篇檄文，获得了德意志各地成千上万的奥古斯丁派修道士、牧师、宗教学家的热烈拥护。



马丁·路德对宗教问题作出的带有革命意味的分析，是他作为一位孤独 89 的修道士，深入探究人类灵魂的产物。与茨温利（1484—1531 年，瑞士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否认罗马教廷权威，反对出售赎罪券，主张教士可以婚娶，解散隐修院并没收其财产。著有《真伪宗教记》等——译注）以及后来的加尔文（1509—1564 年，法国人，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创始人。主张废除主教制，代之以共和式的长老制，著有《基督教原理》——译注）不同，马丁·路德认为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这项事业中虽然会受到影响，但都是一些外围问题。不过在大多数德意志人眼里，既然他呼吁宗教自由、抨击罗马教廷，那么便已经蕴含了政治自由主张，构成了对现行政治结构的斥责。1520 年，马丁·路德发表了题为《论基督徒的自由》的小册子。当时正值经济形势和社会局势的动荡时期，这篇充满感召力的文章一经面世，立即激起了广泛的政治反响。1520 年 12 月 10 日，他和人文主义学者菲利普·梅兰希顿（1497—1560 年，德国新教神学家，曾任维腾贝格大学教授。协助马丁·路德翻译《圣经》，著有《宗教改革家的主体》——译注）一道，在维腾贝格共同组织实施了一次令人吃惊的活动：他们点燃篝火，把威胁要将其革出教门的教谕（名为《主兴起》，又称《斥马丁·路德谕》——译注）付之一炬，同时烧毁的还有相当数量的维护教皇权威的宗教文章。此时的他，已经拥有了大批追随者，其中既有学者，也有目不识丁的民众，不过能够真正理解其自由思想的宗教内涵者实在微乎其微，因此都会情不自禁地从政治角度解读他的个性解放主张。诚如此，宗教改革运动便不再限于宗教层面，而上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帝国的各种领地都将卷入，而它们各自的利益和目标也是五花八门。

新任皇帝查理五世于 1520 年 10 月 23 日在亚琛加冕。仪式进行得非常紊乱：就连加冕礼上皇帝的礼服都没有找齐。1521 年 1 月，查理前往沃尔姆斯，第一次出席帝国议会。会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动议：帝国将划分为若干个行政专区，作为各邦与帝国之间的连接纽带，负责征税、推行

军事政策、发展经济、维护法律与秩序；帝国法庭及其他机构的职能应予强化。在提出种种雄心勃勃的改革主张时，对教会滥用权力的抱怨声不绝于耳。不过这次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最令后世注目的，还是年方21岁的查理五世与来自符腾贝格的37岁宗教学教授马丁·路德的会面。皇帝要求后者放弃自己的“异端”思想，但遭到了拒绝。

马丁·路德不仅没有屈服，反而对教廷的权威发起了更加坚定、更加无畏的抨击。在他看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信徒与他的上帝之间的私人问题，世间没有任何组织能够阻挡这种联系，不论这一组织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势力庞大：“除非有人能用明确无误的文章或者令人信服的辩论把我驳倒，否则我将继续相信自己所说过的话。我既不信任教皇也不相信宗教会议，因为他们经常出错和自相矛盾，”他在结束发言时说道，“只要我还不曾被圣经文字或清晰理性驳倒了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望撤回任何话，因为违背良心行事是难以做到的，也是危险的。愿上帝保佑我。阿门。”他的这通发言，深深打动了听众们的心。不过，他的这篇发言在世间传播开来后的版本，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按照追随者们散发的发言稿，马丁·路德的结束语充满了更加豪迈的气概：“我不可能采取任何别的方式。这便是我的立场。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90 然而，在帝国大会期间的自我辩护，并未赢得多少支持。马丁·路德离开后，查理五世便颁布了帝国法外令，命令一切人等不得对其提供任何帮助。皇帝还宣誓说，将不遗余力，用“我的王国和权力，我的朋友，我的身体，我的血液，我的灵魂，”不铲除异端邪说绝不罢休。1521年1月3日，教皇签署破门律，将马丁·路德革出教门。不过，在萨克森选侯的保护下，他仍然安全无虞地生活在埃森纳赫的瓦特堡。

皇帝查理五世头顶皇冠、戴着指环、手执权杖，端坐于花园顶端，象征着其掌握的世俗和教会权力。在画像下方的人物，分别是职员、骑士和酣睡者。



改革运动趋向暴力化

一个修道士，一个奥古斯丁托钵修会的修道士，他的地位虽然卑微，他的声音却响彻了德意志各地，他的信徒将成为日后新教徒的中坚力量。

马丁·路德的很多追随者，都与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他们几乎无需思索，便能看出路德宗教学说所具有的价值，只是他们不想接受其对人类无可避免地会走向腐化、罪恶的悲观主义看法。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坚信人类的意志自由，在他1524年发表了《智慧入门》（该书是一本道德箴言集，共592条，内容包括论智慧、人的三个领域、事物的性质和价值、身体、精神、学习、德行、感情、宗教、耶稣基督、食物消耗、睡眠、慈善、如何与人共同生活、言语和交往、誓言以及如何待人等17个部分，在16世纪后半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曾一直是英国学校的教科书，成为英国教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译注）之后，很多原来的追随者抛弃了马丁·路德。

不论是马丁·路德还是伊拉斯谟，虽然他们的名字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变得越来越如雷贯耳，但如果没有大约70年前出现的古滕贝格印刷工厂，宗教改革运动便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反过来，这场运动也对印刷业的发展注入了极大活力。1518年，全德意志只印刷了200种书籍，而到了第二年，这一数字便达到了900种。马丁·路德的著作不仅在法兰克福书市上热卖，还大量销往欧洲各地。当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于1521年下令烧毁他所有著作时，市场上发行的他的书籍已经达到了50万册之多!不妨假设一下：如果马丁·路德是在此一个世纪之前发动改革运动，很快便会被世人遗忘。正是印刷业的普及化，令这些充满激情的理论很快散播到了千家万户，使教廷徒唤奈何。马丁·路德1522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工作，1534年又把《旧约全书》译成了德文。到他1546年去世时，他的译本已经销售了约100万册。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考虑到这些译本每部售价相当于一位女佣一年的工资，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作为新教徒一切宗教信仰的源头，《圣经》如今已经随时可以购得。正是这一事实，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宗教改革运动在世俗社会的第一批支持者，当属帝国骑士，即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头衔的低级贵族。他们痛感自己的特权不断遭到侵蚀，对许多周围的人因为效命于教廷而大发利市愤懑不平。1522年，帝国骑士弗兰茨·冯·济金根在兰道（Landau）召集来自莱茵河下游地区的600位骑士集会，宣誓结成“兄弟同盟”，以捍卫他们在新建立领地中的权利，捍卫他们新近形成的信仰。帝国骑士的代表们宣布，他们彼此之间如果出现分歧，将不得用暴力形式解决，甚至不得诉诸法律，而应通过它们自己的仲 91 裁法庭作出裁决。在这种新的道德观驱使下，他们明确声称要对酗酒与虚假誓言宣战。

从某种角度说，帝国骑士们走到了时代的前列：他们那种关于建立一个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全国性联邦的理想，假以时日，将对英国及其在美洲的殖民地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然而，他们存在的一个致命缺陷是：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他们都是一个没落中的阶级，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了。火药在军事上的运用，既已把他们从马鞍上掀了下来，这些当年的骄傲骑士，如今则要么去当雇佣兵首领，以性命为代价换取充满不定因素的一个爵位，要么便收敛起自己的自尊和自负心理，委身于世俗或教会的领主。决斗和群体流血冲突这些帝国骑士们传统上的寻求正义途径，到了15世纪后期已不被法律所见容，此后更在1521年《纽伦堡和约》上严格规定为非法。不过团伙冲突和仇杀现象并未就此绝迹。

大多数帝国骑士在其相互分散的城堡里所过的生活，都相当贫困，甚至他们的生命也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乌利希·冯·胡滕（人文主义者，骑士等级的理论家，与济金根一起领导了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译注）声称，自己面对的生命危险如此之严重，以致他在打猎或捕鱼时也要甲胄在身。在北德意志，尽管那里的地主贵族也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情绪，但经济条

92

托马斯·闵采尔

托马斯·闵采尔大约是在1489年12月21日出生于哈尔茨山区的斯托尔贝格，曾是马丁·路德最初一批热情追随者之一。托马斯·闵采尔获神学学士学位而成为牧师后，在图林根地区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他的宗教理论带有浑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强调每个基督徒都有义务为建立一个"在尘世上的天国"而奋斗。与之不同，马丁·路德提出了"两个王国"理论，对宗教与政治、天堂与尘世作出了清晰的划分。而被路德斥为"幻想主义者"的闵采尔则拒绝接受这种划分，宣称基督将直接为王治理，"千禧年"即将来临（千禧年，亦译"千年王国"，源于《新约全书·启示录》，认为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1000年。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而与基督一同为王；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传遍全世界。千年期满，魔鬼又被释出，再次进行迷惑人的活动。最后即是世界末日。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援引此说，认为应在现世建立没有压迫的正义社会——译注）。

闵采尔的足迹踏遍波希米亚、法兰克尼亚和南德意志各地，四处游历说教和布道。在图林根帝国城市缪尔豪森，他被激进追随者们推举为"永久议会"主席。他利用农民战争提供的机遇，举起了"基甸之剑"（基甸是《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的法官和英雄——译注），擎起一面缀以彩虹图案的宽达30码的白绸旗帜，集结了一支军队，向"肥猫"（grossen Hansen）、诸侯、富人、卑鄙小人、贪婪成性者宣战。他向追随者指出，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对基督者，由于他们的妄自尊大遮蔽了他们的眼睛，所以根本意识不到千禧年即将到来。

在法兰肯豪森之战中，诸侯同盟的军队对起义农民军实施了大屠杀。此战之后，闵采尔被俘入狱，经历了严酷折磨后，转而呼吁追随者抛弃暴力，"以乞求你们的领主的原谅，而我完全相信他们是会饶恕你们的"。在进一步遭受刑讯拷打后，他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忏悔。1525年5月27日，闵采尔被斩去了头颅。

由于闵采尔把千禧年宗教概念与农民的正当不满情绪混合在一起，反对派更有理由对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口诛笔伐了。当农民们转而向宗教领域寻求其政治要求的正当性时，马丁·路德在其题为《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的小册子里，也对他们的诉求进行了严厉批判。农民军之所以会在法兰肯豪森一败涂地，原因一是闵采尔未能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二是农民们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军事化神秘主义理想。就像其他所有此类试验一样，闵采尔关于惩罚一切罪人、建立一个"在尘世上的天国"的理想，是注定要走向悲惨的失败的，而他的特点则在于理想的世俗化和乌托邦式空想色彩。

农民战争失败后，两大阵营的对立更加不可调和。马丁·路德站在诸侯一方，对成千上万的农民遭到可怕杀戮加以称颂，虽然这些牺牲者大多是无辜百姓。他写道："亲爱的先生们，无论是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还是公开，都应该把他（农民）戳碎、扼死、刺杀。如果你被杀死，那么你的死至高无上，因为你是因为听凭上帝的号令而死去的……农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行为是恶劣的，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因此而死去，那么他们便是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肉体和灵魂，都永远捐献给了魔鬼。"后来，马丁·路德也曾对自己这种破口大骂的言词产生过一丝愧意，因此写道："我杀了闵采尔，就像我杀了伊拉斯谟一样。死神在我的头顶之上。但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闵采尔想杀害我的基督。"马丁·路德对托马斯·闵采尔和农民战争的激烈讨伐，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新教主义这种不为当局所禁止的宗教的兴起。



农民战争时期的一幅画，反映的是装备低劣的农民突然袭击了帝国军队的营帐。

件也好上许多。由于各地区经济和政治抱负上的差异性，骑士等级不可能结成一个全国性的联盟，1522—1523年的骑士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德意志的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究其实质而言，这次起义更接近于一场部族仇杀而非正规意义上的战争。骑士军队组织松散、装备低劣，根本没有多少打败诸侯军队的胜机。虽然在围困特里尔城之战中，济金根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特里尔选侯（大主教）理查·冯·格里芬克劳组织了诸侯同盟，联军转入反攻后，把济金根逐回了他的朗德斯土尔城堡。1523年5月7日，济金根重伤而死，他的城堡则被黑森伯爵兼帕拉丁选侯菲利普的炮兵轰成了碎片。

济金根之死标志着骑士暴动以失败告终。此后，诸侯们大举把骑士们的城堡夷为平地，把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不过，帝国骑士作为领地主的历史并未就此终结。只不过骑士们已无力在帝国层面上发挥作用，而是重新组合成了地方性的联合体，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从1540年以后，历任皇帝又把帝国骑士视为其抗衡诸侯势力的有益盟友，因而对他们提供保护。当帝国最终分崩离析而正式解体时，全境仍存在着1700个帝国骑士，而且这些骑士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农民战争

骑士暴动被镇压下去后又过了两年，农民阶级也揭竿而起了。近代初期由诸侯形成的邦君势力，一点点地侵蚀着农民的传统权益。通货膨胀也令农民深受伤害。这时的地租支付方式已从实物向现金转化，因此在农民们看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都被地主夺走了。诸侯在经济上的贪婪压榨、行政管理上的反复无常，也给农民们带来种种不幸。当然，在德意志的不同地区的农民，有的已沦为佃农，有的则还保持着相对独立地位，不过在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都不断趋于恶化，只有那些可以自行出售其农产品的人，才能从农产品价格上涨获得利益。各邦诸侯推行中央集权政策，剥夺了村社的自治权利。很多自由农这时都变成了佃农。 93

农民战争时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段艰难岁月。不过，后世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的缘由归于陷入赤贫境地的农民在绝望之下的爆发，当属对历史的误读。事实上，参与起义的是一些富裕的以及中等收入的农民，而不是一贫如洗的佃农。他们发起抗争的目的包括：保卫自己在村庄和教会中的自治权利，要求有权推选本教区的牧师，确保他们缴纳的“什一税”留归本教区使用，要求恢复以前享有的使用公地、打猎和捕鱼以及从公共森林中获取利益的权利，希望废除向司法领主交纳的繁重的遗产税。这些要求恢复公社制度的主张，都以基督教义的形式表达出来。究其实质，起义的农民并不是要废除领主制，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希望领主与农民之间恢复“兄弟式的爱”，并根据基督教原则恢复公社制度。这些崇高的理想，集中体现在士瓦本农军队伍领袖们1525年3月在梅明根通过

的宣言（指“十二条款”或“梅明根十二条款”。要求废除小什一税、继承税和农奴制，限制地租、劳役，归还被霸占的草地和森林，有权任免牧师等，并强调圣经是农民全部要求的基础，如有违反愿立即取消——译注）中。在这次集会上，三位叛军领袖还组成了“基督徒联合会”。拜马丁·路德宣传的福音书和宗教改革运动中提出的新教教义之赐，他们的这些要求可以通过教规获得合法性的支持。然而，诸侯们不用费太大周折，便把暴动镇压了下去。皇帝的常备雇佣军在冯·瓦尔德堡（或简称“特鲁赫泽斯”，是一种荣誉官职或皇家扈从首领职称，而非具体人名。1525 年镇压农民战争的特鲁赫泽斯应不止一位。是年起，特鲁赫泽斯成为帝国世袭官职——译注）统率下，在士瓦本打败了农军。在符腾堡，虽然乌尔利希大公（大主教兼公爵）因与哈布斯堡王朝发生过争执而站在了农民一方，但叛军在 1525 年 5 月败于波伯林根，尔后遭到了残酷的报复。

另一方面，虽然帝国军队在初期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暴动仍未平息下去。除了帝国骑士和自由民之外，农民军还争取到了其他一些盟友，包括符腾堡市长、被公认为德意志最杰出雕刻家的蒂尔曼·赖曼斯赫纳德。起义者本想在海尔布隆召开一次“农民大会”，商讨对帝国进行根本改革的问题，但士瓦本诸侯同盟的军队已经拍马杀到。新近在波伯林根的胜利，令帝国和诸侯势力志得意满，根本无意于考虑与叛军进行什么谈判。所以，对垒双方均更趋暴力化。农民军队固然犯下了种种暴行，而诸侯们的军队既已占据上风，实施的报复将十倍百倍的残酷。此后，帝国军队连续取得了几次会战的胜利。

在更趋激烈的农民起义的后期阶段，托马斯·闵采尔走到了中心位置。此人集神秘主义、理想主义于一身，以极富感召力的声音向追随者们晓谕：基督将直接为王治理，“千禧年”即将来临。为此，他号召进行一场不惜流血的征战。他充满激情的鼓动，得到了图林根的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城市贫民的热烈响应。很快，他便利用这些盲从的追随者，组织了一支军队——用不了多久，这支军队中的 5000 人便将在法兰肯豪森之战尸横遍野。帝国军队在这场屠杀中大开杀戒，闵采尔受伤后也被俘获。审讯经验丰富的刑讯官，企图让他号召追随者们放弃势力悬殊的抵[94]抗，乞求诸侯们的宽大处理。但闵采尔坚贞不屈（此节与前两页“托马斯·闵采尔”专页论述有悖——译注），1525 年 5 月 27 日与 53 位追随者一同遇害。

16 世纪的一幅木刻画，反映了在一个德意志村庄里，一边是虔诚的前往教堂做礼拜者，另一边则是沉醉于喝酒、大吃和男女追逐之中的喧闹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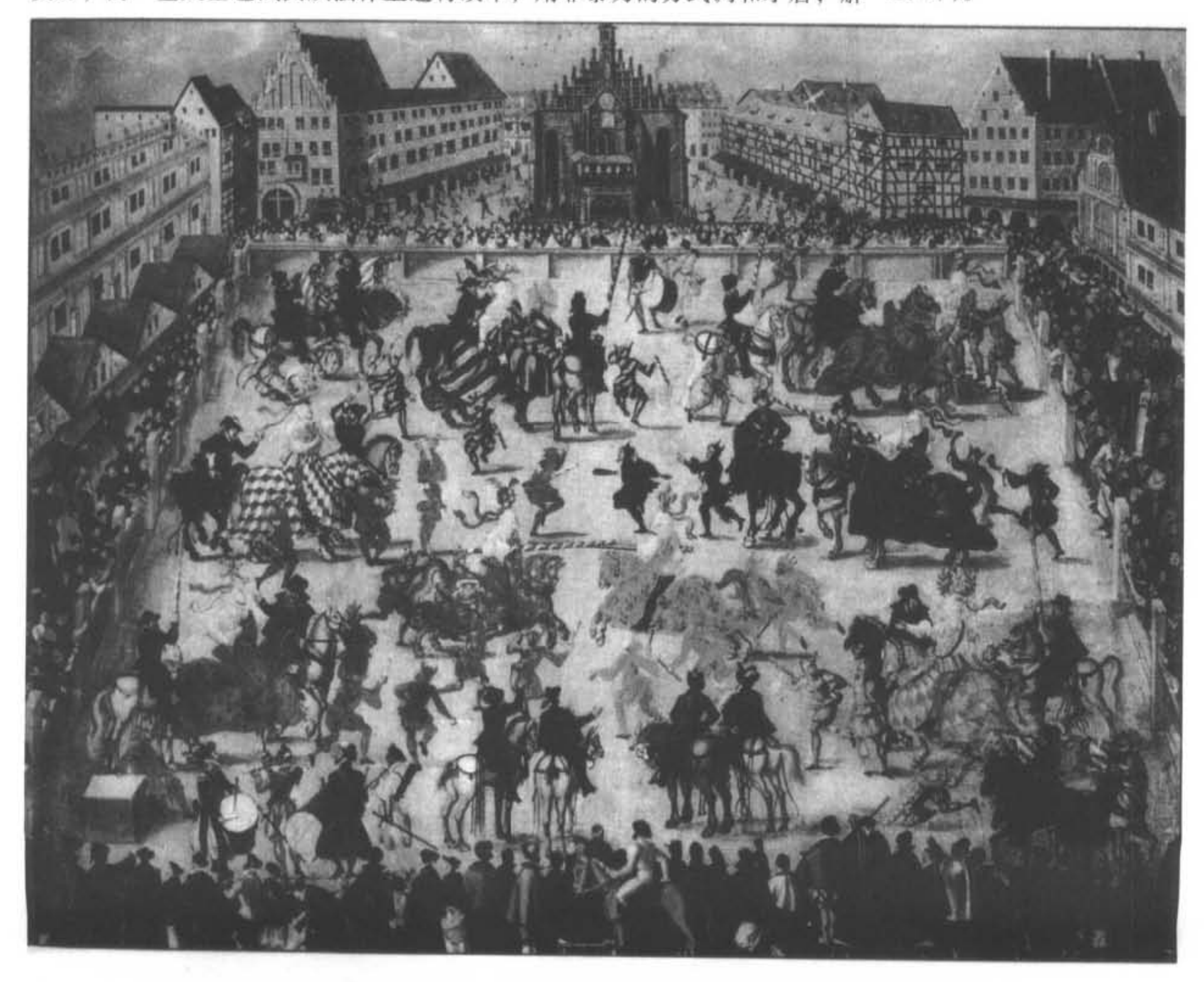


农民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视称作“错交的兄弟”的托马斯·闵采尔的活动，令马丁·路德深感震惊。他深信农民起义者已被魔鬼缠身，暴乱者的宗旨是有悖于他所探明的上帝启示的。所以，他坚决地站在诸侯一边，并把诸侯势力看成是自己宗教改革运动的最佳保护人，而这一点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认识。与当

时成千上万激进的、专制的、充满幻想主义色彩的人一样，马丁·路德也自认为自己已经独自发现了真理，而为了这份真理，他愿意宣判暴动农民的死刑。在题为《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的小册子里，他敦促诸侯们以上帝的名义杀死叛乱分子。起义失败后，约有75000名农民被诸侯们以此种名义予以杀害，但真正"罪有应得"的，又有几人欤？

参加暴动的农民，只是对昔日的农村公社抱着乌托邦式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纲领是什么。但他们那种基督徒的兄弟情谊的理想，是注定无法在现实中行得通的。只有在特里尔城，起义农民起草了明确的政治纲领，但立即引起了当局的高度警惕，而他们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领地成为另一个瑞士的，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对暴动进行了镇压。从政治动员角度看，农民阶级也远远未达到成为社会根本改革先导力量的要求。但归根结底，这场战争的长期结果是灾难性的。统治阶级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类似于允许农民在地方政府中获得一定发言权等字面上的象征性让步之外，绝对不可以在实质意义上对农民给予任何妥协。因此，在农民战争遭到镇压后，贵族阶级的地位得到了强化。但农民阶级并未放弃捍卫自己权利的决心，而一些人士也试图从法律上进行改革，用非暴力的方式调和矛盾，解

纽伦堡一年一度的"追刺学徒节"上，贵族子弟们尽兴地骑在马上追刺学徒。这幅画的作者是约斯特·安曼（1539—1591年）。



决农村的种种问题。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人们往往把农民视作受压迫的、地[95]位卑微的、逆来顺受的一个阶级，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相当活跃。

宗教改革运动在城镇地区得到了更加热烈的响应。当时，城镇人口的识字率约为30%，远远高于农村的5%，因此马丁·路德的著作可以拥有更广泛的潜在阅读对象。在城镇，那些受过教育的自由民堪称新思想、新观念的最佳受众，并能协助新教的牧师，在讲道坛、在客栈、在市场上，向那些目不识丁的民众讲解教义。当时，城镇的规模都很小，超过4万人口的仅有科隆和奥古斯堡这两座城市，所以每个城镇便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宣传和鼓动工作非常有效。罗马教会的牧师的主要效忠对象是教廷，享有种种特权、免税权和司法豁免权的教堂，是一种自治性质的机构，所以从来不曾与德意志这些规模不大的城镇社区融为一体。虽然城镇[96]也曾试图把教会及其慈善机构纳入到市政厅的控制之下，但往往徒劳无功。而新教教会一经建立，立即与城镇社区建立起一体化的联系。市政官的任命与罢免、财务的管理、社会服务的监督，都由一个世俗市民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市政官及其妻子儿女，还有其他一些自由民，过着舒服的资产阶级生活，而这种生活是禁欲的牧师们永远望尘莫及的。

帝国城市以及数百个规模较小的城镇，构成了共和制理想的中坚力量。根据这种理想，所有市民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城市保护他们免于非法监禁和过度征税。城市生活的不同领域，均由一系列专门委员会掌管，从而代表了市民的共同利益。政治精英阶层与其他市民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具有才华和取得成就，就能跻身于精英之列。为了保护城市的独立地位，以免遭受诸侯的吞并或控制，市政官享有独断行事之权。但这一切都是理论层面的设计，而在现实生活中，从15世纪起，市政官们越来越成为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专制寡头，宣称对市民进行种种盘剥是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这一点，在帝国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同时，诸侯们也处心积虑地想把这些城镇并入自己的领地。因此，正如农民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村地区频繁发生的骚乱一样，城镇居民在16世纪初期，为了摆脱市政当局的暴政，为了抵抗诸侯的并吞图谋，也多次举行暴动。而这些政治上的争端，往往夹杂有反对教会的声音。所以，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城镇居民政治、社会和经济斗争的教义依据，在城镇地区很快得到了积极而热切的回应。

在德意志所有城镇中，明斯特可谓最激进的一个。1525年，这里便发生了反对市政委员会的暴乱，但主教出面进行安抚，使市民的情绪得到了控制。1532年，该市改信路德教宗，并于次年得到主教的正式认可。1534年1月，来自哈尔莱姆的面包师约翰·马蒂来到了明斯特，宣称：奴役的时代业已结束，基督即将重临人间，上帝的子民将得到洗礼，不信上帝的人将被剑刃穿身。明斯特的很多市民都曾听到梅尔希奥·霍夫曼对圣经的解读（霍夫曼据此预言，“世界末日”前将在1534年发生），因此很容易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年）创作的水彩画《因斯布鲁克城堡的庭院》。丢勒出生在纽伦堡并住在那里，不过经常远行至意大利和荷兰并呆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是马克西米连一世和查理五世这两任皇帝的宫廷画家，见过伊拉斯谟、马丁·路德。丢勒是一位工艺大师、杰出画家，尤以木刻组画和铜板画见长，并首倡了蚀刻版画创作形式。他最著名的画作包括宗教题材作品，线条优美、栩栩如生的日常生活素描，以及类似此处插图的建筑物绘画，当然还有宫廷人物的肖像画。

接受马蒂的上述宣传。约有1500名市民，其中既有教士也有世俗成员，既有贵族也有手工业者、商人，接受了马蒂的施洗，然后一齐等候“世界末日”前的“基督复临”。而未受洗礼的市民则逃离明斯特，向主教及诸侯们请求恢复旧的秩序。约翰·马蒂宣布，上帝的复仇天使将把人类的90%以上人口予以消灭，只有作为“新耶路撒冷”的明斯特可以豁免。他预言，“世界末日”将在复活节之前来临。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了这些宣传，纷纷前往明斯特，以等待“世界末日”那一天。

2月24日，一个再洗礼派的市政委员会在明斯特被推选出来后，立即下令销毁一切亵渎神灵的物事，包括雕像、绘画、插图本书籍、乐器、赌博用具等。3月，主教率领军队包围了这座城市，但此举只会使“新耶路撒冷”的人们更加激进。城市连续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忏悔，演出充满古风 97



题为《孔奇蒂亚》的一幅雕版印刷品，描绘了德意志一户自由民家庭围坐餐桌旁的情景。墙上悬挂的两段圣经语录，一段引自《申命记》第6章，内容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雅赫维，你的上帝。"，另一段引自《马太福音》第20章，内容是"你也应当爱邻人如爱你自己"（亦译"爱人如己"）。这幅画作似乎蕴含有某种讽刺意味：当男孩在念饭前的谢恩祷告词时，只有父亲一个人在聆听，而女人们都已开始吃起来了。由于城内工资增长的速度比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更快，城镇居民可以过上较为富足的物质生活，而宗教仪式便不免要马虎一些了。

和野蛮意味的舞蹈，实行一夫多妻制（宗教依据源于《旧约全书》，现实动因来自长期的斗争中有很多男人死去——译注），并把所有的个人财产交纳出来，过上了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复活节过去了，基督并未重现人间。约翰?马蒂号召以上帝的名义付诸行动，并率领一批追随者走出明斯特城，迎战主教的军队。甫一交战，马蒂便被雇佣军砍翻在地。幸存者遂退回城内。曾在雷登为一位裁缝师当学徒工的约翰·博克尔森重新组织了一个长老委员会。随后不久，这个委员会为他举 98 行了加冕仪式，称为"正义的约翰王"。这位约翰王，俨然一位旧约式的君主，娶了6位王后，建立了像模像样的宫廷，成为明斯特的统治者。但主教已下定了结束这场闹剧的决心，经过长时间的围城后，明斯特于6月25日被攻破，所有为首的再洗礼派人物均被处决。这段短暂的极端新教主义经历之后，宗教改革运动之风便无法吹进明斯特了。此后，这座城市又回归了传统宗教，直到今天信奉的仍是正统的天主教。

宗教战争的源头

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诸侯们接受新教的自觉性，要比农民、骑士、城市居民更加强烈。宗教改革运动为这些诸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以夺取教会名下的土地或予以征税。另一方面，势力强大的教会诸侯，包括有权推举国王的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以及皇家修道院的院长、地位稍低的主教们，也下定决心要维护教会的特权，抵制改革者的图谋。骑士战争失败后，许多低级贵族都认识到，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教会其实是最佳的借助力量。由于这一原因，顺博恩家族、格赖芬克劳家族、达尔贝格家族均成为大主教和选侯。统治巴伐利亚的威滕巴赫家族则坚持信奉旧宗教，成为实际上是世袭的科隆大主教（科隆当时是德意志经济实力最强的大主教区、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的趋向都不是简单地出于经济利益这一个原因。事实上，很多天主教徒也很愿意接受伊拉斯谟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所以，并非只有那些新教徒才有改革热情。

不论出于哪一种原因，查理五世都应支持天主教会、抵制改革势力，但为了在欧洲这个大舞台上争夺霸权（指查理五世为了获得意大利的支配权而卷入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长达20年的系列战争——译注），他很少驾临德意志，而是把治理重任交给了弟弟斐迪南。德意志诸侯们乘皇帝虚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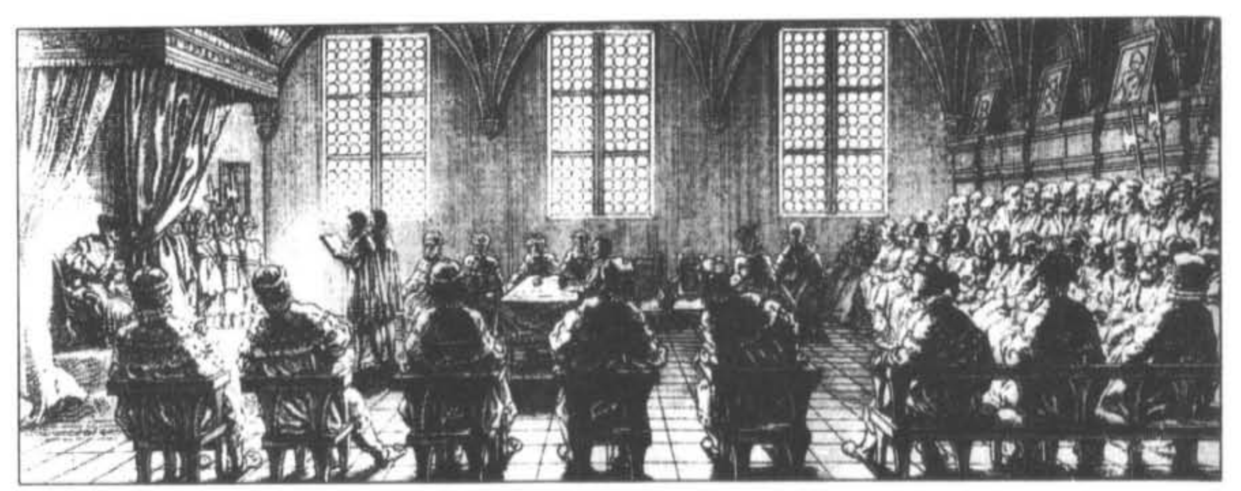
机，加速强化自己的权力，而查理与斐迪南为了对外进行战争(特别是与土 99 耳其人)，急切需要得到诸侯们的财力资助，因而根本无力阻止后者对帝国权力的蚕食。更重要的是，诸侯联军先后打败了暴动的骑士、镇压了起义的农民，又荡平了再洗礼派的闹剧，从而展示了他们的强大力量。1526年，帝国议会在施佩耶召开，否决了有关施行1521年沃尔姆斯敕令的动议，把有关宗教信仰的决定权交由各邦自行处理。1529年，查理五世因为在意大利打了几场胜仗，地位得到了强化，遂重申沃尔姆斯敕令。对此，5个诸侯和14个城市表示反对强化帝国权威，在施佩耶发表了一篇“抗议书”(Protest)。从此，路德“福音派教徒”开始被称作“抗议宗新教徒”(Protestant)。

为了制止权力流失局面的发生，查理五世决定亲自出席1530年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这也是继沃尔姆斯之后，他在近10年时间里第一次出席帝国议会。皇帝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莅临，使异端分子重新回到母教（指产生各教派的原始宗教或某人最初受熏陶的宗教，此处指天主教——译注）的怀抱，但已经为时太晚，无力回天了。路德的同路人和密友菲利普·梅兰希顿起草了《奥格斯堡信纲》。此份本意是为了与茨温利宗教观念之间架设一道桥梁的《信纲》，是系统表达路德宗教学说的一份重要文献。马丁·路德这时仍然被帝国当局禁止出行，所以不能冒险前往奥格斯堡，但他与梅兰希顿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信纲》表示了支持。

天主教徒为了回击这份《信纲》，发表了《驳论》，再次重申沃尔姆斯敕令，宣布一切反对该敕令者都是破坏和平的罪人。新教诸侯和城市自然对此高度警惕，遂于1531年2月27日在图林根的施马尔卡尔登集会，形成了一个反对皇帝的防御性同盟。至此，德意志分裂成为两大武装阵营。双方之所以避免了军事冲突，仅仅是因为查理五世此时再次陷入了与土耳其人的战争，率领军队奔赴了维也纳。1532年8月，他发表了《纽伦堡特许令》，答应暂时停止宗教纷争，以换取新教徒对其与土耳其人战事的支持。

在此后的10年里，查理五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外战争中，而德意志诸侯们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了各自的自主权。直到1542年，皇帝才摆脱了外部威胁，重新把注意力转向德意志内部事务。首先落入查理五世视野的尤利克-克利夫斯，是一个以杜塞尔多夫为中心的财力雄厚、势力强大的邦，1538年吞并了格尔登地区的多块领地。1541年，累根斯堡帝国议会宣布，这些与哈布斯堡家族在荷兰的属地相邻的领地，其所有权均归于皇帝。尔后，帝国出动了军队。为了换取法国国王和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支援，尤利克-克利夫斯公爵、人称“富可敌国”的威廉五世不得不签订了屈辱性的《文洛条约》，宣布割让相当规模的领地，放弃自己在宗教问题上的伊拉斯谟派宽容态度，并支持反宗教改革运动。这场为时甚短的较量之后，西北德意志地区出现了一片力量真空，尤利克-克利夫斯从此再无力像勃兰登堡-普鲁士、巴伐利亚或萨克森那样，成为强势的邦国了。

天主教会试图与德意志的新教徒达成某种妥协，但这种努力以失败告 100



《奥格斯堡信纲》是一份系统表达路德宗教学说的重要文献。图中所示是1530年6月25日，新教徒在奥格斯堡帝国大会上把一份《信纲》文本呈送皇帝查理五世。

终。教皇保罗三世及其全权代表、枢机主教康塔里尼已准备作出让步，但在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中颇有势力的德意志强硬派予以阻挠，使教皇的这一意图未能化为现实。当帝国议会1546年在累根斯堡召开会议时，皇帝已经做好了对付新教徒的军事准备，教皇也答应为其提供12500名士兵及大笔财政资助。查理五世还向巴伐利亚选侯家族的威廉、萨克森选侯家族的莫里斯承诺，将剥夺由这两个家族中态度顽固者把持的选侯席位，然后交给他们，从而换取了威廉和莫里斯的支持。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时，教皇从意大利派出的军队尚未加入皇帝的麾下，因此查理五世在开战初期的进展并不顺利。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内部很快便出现了激烈争吵，无法在战略层次上彼此协调。莫里斯抓住战机，驱兵侵入萨克森领地，他的堂兄约翰·弗里德里希则紧急返往萨克森组织防御。但为了撤往符腾堡，约翰·弗里德里希放弃了绝好的防御阵地，导致其军队在米尔伯格战役中被打败。整个战争便因这一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胜利而告结束：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被俘，黑森选侯菲立普被逮捕后沦为皇帝的人质，虽然查理五世宣称保障他的自由，但这两个选侯都被投进了荷兰的监狱。

至此，查理五世似乎已步入了权力的顶峰，但宗教问题构成的威胁依然存在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在顽固的天主教徒与强硬的新教徒之间探寻一条“中间道路”，以实现“普世基督教大联合”。1547至1548年召开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提出了“中间道路”方案，但对垒双方均未表示支持。相反，这一方案很快便成为众口一词的嘲弄对象。到1555年以后，这项试验便正式结束了。在这段时间里，查理五世还大力谋求创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各邦的诸侯除非征得他的同意，否则无权采取任何行动。按照他的设计，这样便可为帝国军队、政府和法庭提供充裕的资金保障了。但是，这一方案是诸侯势力绝对不会答应的。就连从皇帝那里得到了选侯地位的萨克森的莫里斯，也不愿意屈服于皇帝的意志。皇帝对待黑森选侯菲立普和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里德里希的做法，也令诸侯们深感震 101 惊，据此认为查理五世准备在德意志施行“野蛮的西班牙式奴隶状态”。

萨克森新选侯莫里斯虽然处境孤立、地位不稳，但运用高度纯熟且冷酷无情的外交手腕，足可以把皇帝彻底蒙在鼓里：莫里斯在一场极其逼真的假面舞会中，以皇帝的名义对信奉路德教派的马格德堡发动了围困战，不过此前已对该城的市长表明，此举是为了蒙蔽皇帝以争取时间，然后又与心怀怨恨的诸侯们结成了一个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同盟。这些反对皇帝的德意志诸侯 1552 年 1 月 15 日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签订了《钱布尔德条约》，法王承诺担当德意志自由的保护人，而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康布雷、梅茨、图尔和凡尔登等——这些城镇跨越“西班牙道路”两侧，法王据此可以阻断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属地与荷兰之间的补给路线。

《钱布尔德条约》墨迹未干，以权谋诡道为立身之本的萨克森选侯莫里斯又转而与受查理五世委托处理德意志事务的斐迪南一世展开了谈判。不料，以恃强凌弱的冒险家而著称的勃兰登堡·库姆巴赫伯爵阿尔布莱希特·阿尔希比亚德斯，为了扩展自己面积有限的领地，不惜破坏和平，对纽伦堡、班贝格和符腾堡发起了进攻，萨克森选侯莫里斯于1553 年 7 月 11 日阵亡。就这样，莫里斯这个近代史上的马基雅弗里式的诸侯，死在了阿尔希比亚德斯这个旧式的强盗头子式的唯利是图之徒的手中，令德意志诸侯们失去了最有力的领袖。

1555 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斐迪南一世推动下的产物。他认识到，其兄长查理五世那些天主教独尊、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的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帝国的继续运转已经无法与诸侯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和约规定“教随邦定”，即各邦当局可以规定邦内居民信仰何派宗教，而邦内信仰其他宗教者皆有权迁往其他宗教区域，当地官员也有强迫其他信教者改宗以信奉本邦宗教之权。这样，不仅各邦路德新教教会的形成得到了肯定，而且各邦的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都归统诸侯一身的事实也被肯定下来，帝国变成了各种领地的政治联盟，而不再是近似联邦制度的国家。征取税收和组建军队的职权不再归于皇帝，而是交给了在帝国议会享有代表权的领地和帝国行政专区，每个领地依据其面积和财力状况交纳一定的税收，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员。《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签订，使德意志帝国演变成为一个松散联邦制结构，这种局面将持续 250 年之久。在这一框架下，各成员邦得以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彼此之间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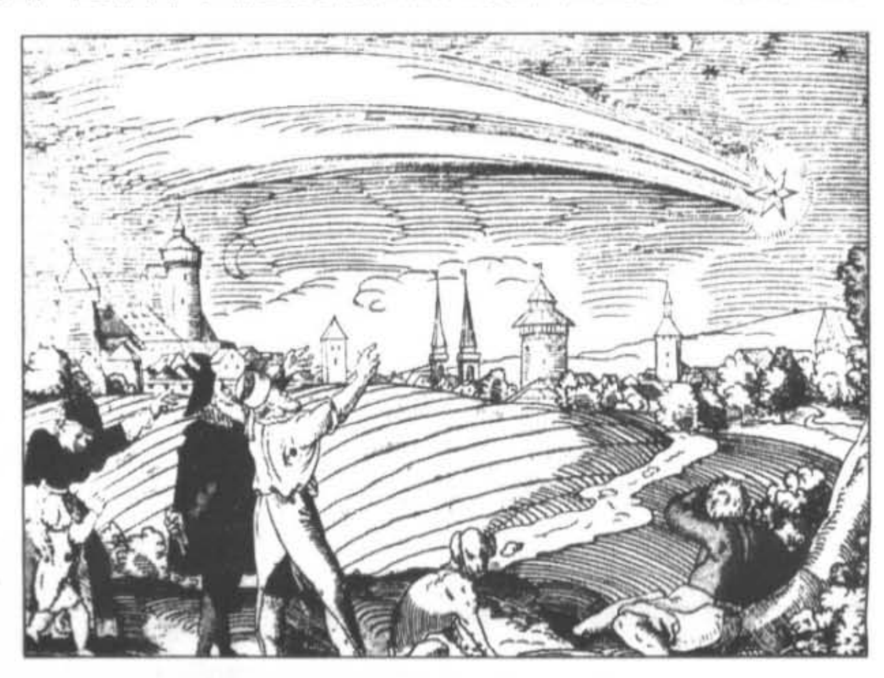
宗教问题在奥格斯堡以此种方式获得解决，意味着马丁·路德和查理五世的愿望都最终落空了。已于 1546 年去世的路德，其本意是对现行的大一统的教会进行改革，而不是要把它分裂成为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查理五世曾为保持教会的统一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这种统一是要把宗教改革势力排除在外的。从此，改称为天主教会的旧教会，再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了，而只能因地制宜地加以变通，并对各个民族的意愿作出妥协和让步。由此，中世纪欧洲在宗教上的同一性，让位于近代世界的差异性。查理五世曾寄望于普世的宗教为其建立普世的帝国提供依据，但这种构想已归于失败。

第五章 反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

[102] 1556年10月，遭受着痛风之苦、未老先衰的查理五世，突然大彻大悟，把西班牙王位让给了儿子菲力普二世，并把帝国交给了弟弟、罗马国王斐迪南。尔后，他归隐遁入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圣热罗尼莫德·尤斯特修道院，直至1558年去世。

宗教冲突

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署后的几年里，天主教和新教在德意志相对和谐地并存着，在很多地区使用同一所教堂，并在地方代议机构中开展合作。两种宗教的信徒之间通婚的情况也很普遍。但这种和谐共存的局面很快便被打破了：1545年至1563年的特兰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于1564年1月颁布了其决议《特兰托会议信纲》（Tridentinum），在天主教会与新教会之间筑起了一道森严的壁垒。《信纲》规定，《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亦称《圣经通俗译本》、《拉丁通俗译本》、《拉丁通行本》，其《旧约》部分是哲罗姆从383年起以《希伯来圣经》为依据翻译、校订的古拉丁文译本，《次经》增补部分译自七十子希腊文本，《新约》部分参照古拉丁文译本而改译。8世纪末为西部各教会所普遍应用，13世纪开始被称作《通俗本》。特兰托公会议后，成为本书的专称——译注）是唯



天文学家预言将有一系列易于观察到的慧星出现，其中包括1614年出现的“哈雷彗星”，认为这预示着人类将遭受灾难。天主教阵营与新教阵营的激烈对垒，酿成了社会的全面危机，似乎验证了这种看法。

一的“正典”，马丁·路德的“唯经”主张（sola scriptura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高举圣经，提出以圣经作为一切神学争论最后的权威与标准，即“唯独圣经”——译注）主张遭到谴责，他的德译本《圣经》被宣布为非法。《信纲》规定，圣事职能只能由教会和教士担当，俗人不得越行。与新教徒只接受三种圣事即洗礼、坚振、神品不同，特兰托公会议规定圣事有七件，即洗礼（圣洗）、坚振、告解、圣体（圣餐）、终傅、神品（亦称授职礼或祝圣神父——译注）和婚配。天主教主张，凡诚心领受圣礼者均可获得基督的“宠爱”和“保佑”，而新教徒则认为，个人的信仰才最具决定意义，非信教者接受圣礼反有不良后果。特兰托公会议肯定了炼狱和对圣徒、圣徒遗物和像等的求告、崇敬，进一步加深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鸿沟。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在罗马成立了“德意志与匈牙利公学”（公学是依纳爵. 罗耀拉奉教皇朱利奥三世的命令成立的，旨在培育来自当时由德意志人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有意晋升司铎的人，很快成为欧洲东部地区地方教会的重要依托——译注），严格按照特兰托公会议确定的正统思想，培训讲德语的牧师，以图把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人重新拉回到天主教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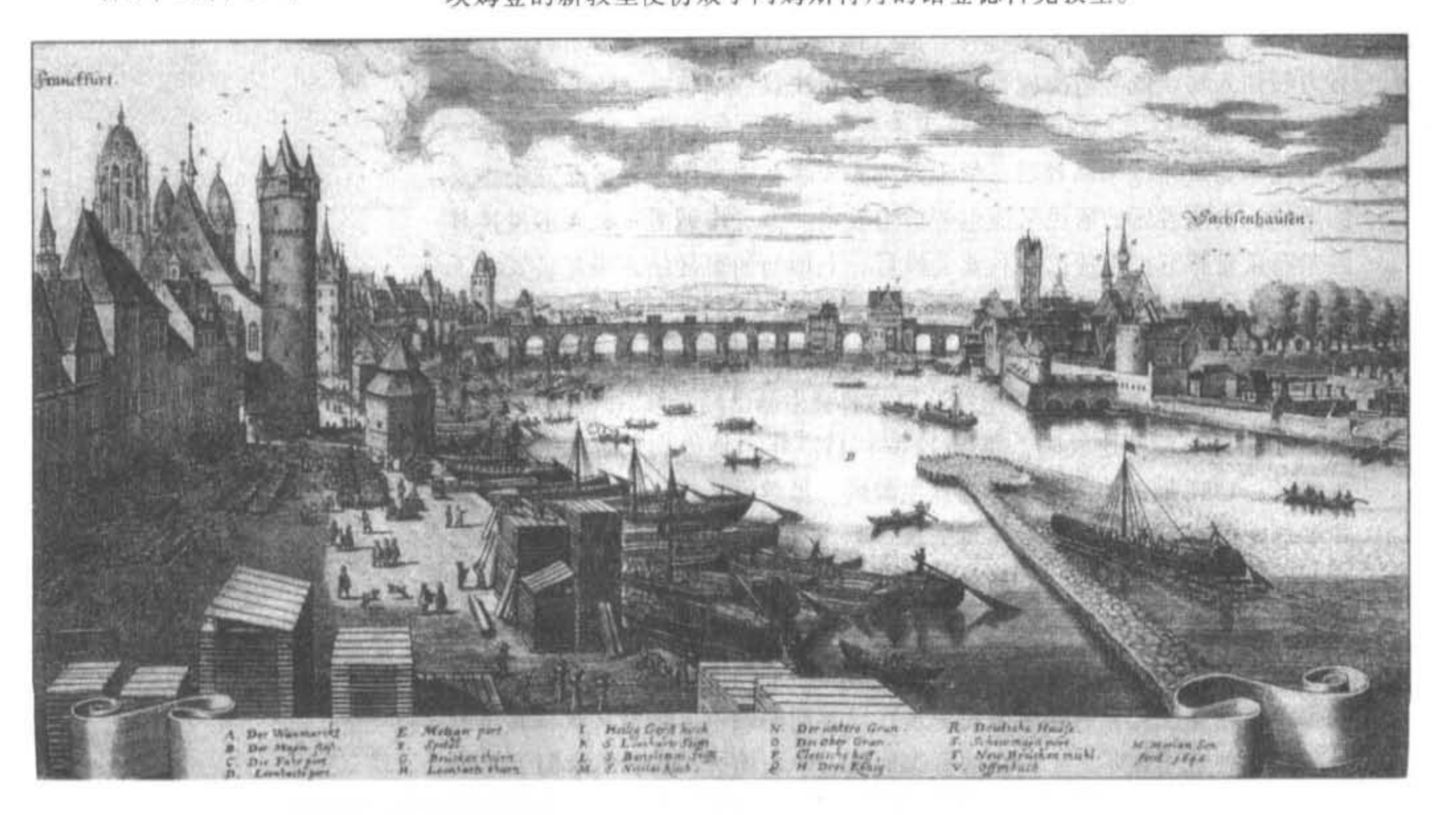
此时的德意志，分裂成为三大排他性的宗教集团，即天主教派、路德教派以及势力较小一些的茨温利和加尔文主义教派。在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西班牙，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帮助它们实现了民族统一，而在德意志，却只能使之进一步分化成为以宗教划分阵线的若干个邦国和城市，导致不同地区的思想文化呈现出极大差异性，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莱希特五世（1550—1579年）作为天主教派的强 103 有力领袖人物，既有坚决施行特兰托公会议决议的热情，又决心增进巴伐利亚自身的利益。1582年，科隆大主教兼选侯杰布哈德·特鲁希塞斯·冯·瓦尔德贝格改宗新教后，似乎天主教派将在选侯团失去科隆这个重要的席位，大主教区的居民可能也将被迫改宗。但“虔诚者”威廉五世接替阿尔布莱希特五世担任巴伐利亚公爵后，立即与西班牙结为盟友，发动了1583至1585年的科隆战争，把新教徒从科隆驱逐了出去。战后，威廉五世年仅29岁的弟弟恩斯特成为科隆大主教，虽然按照教规，担任此一职位者必须年满30周岁。不过，恩斯特这时的教会生涯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了：他1566年担任弗赖辛主教时，年仅12岁；1573年，他得到了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区；1581年，他又得到了列日主教区。虽然恩斯特经验不足，生活方式奢侈无度，但由他执掌科隆大主教一职，有利于统治巴伐利亚的威滕巴赫家庭的政治与领土利益。更重要的是，战后的德意志西部大部分地区仍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因此罗马教廷愿意接受这一结局。

不过，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在德意志西部地区仍然保持着一些重要的据点。帕拉丁大公约翰·卡西米尔在巴黎期间改信了加尔文教，此后海德堡大学便成了加尔文主义在德意志地区的中心场所，宗教学家们于1563

年出台了《海德堡问答集》，用129道问答题的形式阐述了加尔文教派的基本原理。至于其他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邦国，则大多位于帕拉丁或加尔文教派荷兰的邻近地区，但也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一个是黑森·卡塞尔，另一个是勃兰登堡。在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于1613年改宗加尔文教，但他无法让大多数臣民效仿自己。这些加尔文教派的邦对反宗教改革浪潮深为忧虑，担心会对德意志的新教徒进行一场类似于法国1572年那种“圣巴多（耶稣十二使徒之一——译注）罗马之夜”式的大屠杀，因此结成了相互援助的同盟，加入到反对帝国的势力一方。与之不同，路德教派则不大把反宗教改革运动当作什么严重威胁，而是相信只要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宗教和约便可以继续发挥效力。

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加深了德意志内部的政治分裂倾向，还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建筑风格上的区别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符腾堡公爵兼主教裘利斯·埃希特·梅斯布鲁恩、萨尔茨堡大主教沃尔夫·迪特里奇·冯·赖特瑙等势力不俗的天主教邦君和主教们，在反宗教改革时期都把自己的城邑变成了巴洛克风格的华美建筑物的汇聚之地。但其他天主教派领地则较为节制，例如慕尼黑的圣米歇尔基督教堂，便显得相当朴素。至于这一时期的新教徒派建筑，则秉承了茨温利和加尔文倡导的节俭美德，很多教堂其实只是简陋的会堂，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教堂的主要用途是布道而非圣事。只有德意志北部地区，由于深受物质繁荣的荷兰人的影响，建筑物在保持简洁风格的同时，加了某些装饰和色彩铺排。例如，埃姆登的新教堂便仿效了阿姆斯特丹的诺登德科克教堂。

马泰斯·梅里安（1593—1650年）的作品《法兰克福石桥》。法兰克福是一座自由市，它欢迎逃避宗教迫害的荷兰人迁居至此，而这些移民做出的贡献，令法兰克福成为当时贸易、银行业、制造业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路德教派并不像归正宗（指与路德派有别的加尔文宗——译注）那样，打破一切宗教旧习。该教派保留了老教堂中的装饰精美的祭坛和绘画作品，又增添了一些表达其宗教理念的新画。信奉路德宗的邦君，与天主教派的领主一样，急于重新构想自己的城邑，建立起高耸的新建筑物，以展示自己的权威与财富。例如16世纪中期由不伦瑞克公爵裘利斯重建一新后的沃尔芬比特尔，便堪称路德教派的维尔茨堡。17世纪初期建造的圣女玛丽教堂，居然集哥特式、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巴洛克式等种种建筑风格于一体，是路德教派的第一座杰出的宗教建筑物。由于该教派非常重视学者的地位与作用，不伦瑞克的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奥古斯特（弟弟）在1666年即其去世的那一年，建成完工了一座宏伟的图书馆，藏书图达10万册以上。 [104]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于1508年的画作《祈祷之手》。图中人物粗糙的双手，破裂的指甲，昭示着一个平凡的人散发出不平凡的爱。这幅作品动人心魄，流传甚广。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在绘画和雕塑方面却大幅度萎缩，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许多新教徒的精美艺术作品不被社会所接纳。此前的16世纪初期，倒构成了一段艺术领域的黄金时代。蒂尔曼·里门施奈德(约1460—1531年)、维特·施托斯（约1450—1533年)的杰出雕刻，融哥特式风格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于一炉，洋溢着震撼人心的力度与美。马提亚斯·格吕内瓦尔德（1455—1528年）所作《依萨汉姆祭坛画》（包括《耶稣的磔刑》、《圣母领报》、《耶稣复活》、《圣安尼的诱惑》等——译注），是世界祭坛画中最生动的作品之一。阿尔布莱希特·阿尔杜弗（1480—1538年）擅长宗教与神秘题材的绘画，画风细腻，栩栩如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欧洲第一位纯以自然景观为创作对象、画上不着一个人物的画家（指《多瑙河风景》——译注）。在所有伟大艺术家中，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年)的成就最突出，其创作内容包罗万有象，声誉响彻国内外。更年轻一代的汉斯·贺尔拜因（1497—1543年）1532年移居英国时，即以其生动的写实风格肖像画崭现头角。与阿尔杜弗同属“多瑙河画派”（16世纪初在多瑙河流域出现的一个新画派，另辟蹊径，以风景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有较强的抒情意味——译注）的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年），在定居维滕贝格担任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的宫廷画家期间，为马丁·路德这位宗教改革家创作了大量肖像画。他晚期作品的虚饰特点，显露出矫揉造作的一面。 [105]

德意志画坛到了16世纪中期出现的衰退，部分原因来自经济因素。诚然，德意志的诸侯，不论是天主教派还是新教派，固然能够拿出大笔金钱，延请盛名一时的来自意大利或法国的艺术大师们，例如巴伐利亚的鲁道夫二世就对朱斯佩·阿奇姆波尔多（约1527—1593年）这位米兰的样式主义画家青睐有加。鲁道夫在赫拉斯钦城堡的宫廷，不仅是风格主义艺术的重要据点，既接纳了第谷·布拉赫（1546—1601年，丹麦天主学家和占星学家——译注）和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年，德意志近代著名



文策尔·霍拉的雕刻作品《市场》，反映了17世纪中叶一个德意志城镇上妇女们的生活。

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译注），同时也汇集了形形色色的占星家、炼金术士和其他大言不惭、欺世盗名者。问题在于，不同类型的画家这时在荷兰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德意志，由于画家们无法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必要的经济资助，为生计所迫，他们只得像路边的小贩那样为客人画几幅肖像画。

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仍然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只是那些信奉新教的地区，为了使作品能够为更多读者所接受，才开始试图使用当地语言创作。至于天主教地区，不仅认为拉丁语是一种地位更高、更合乎教养的语言，而且把根植于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高地德语（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地使用的标准语，原为德意志中、南部方言——译注）与新教主义划上了等号，而这种偏见将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例如，大多数德语文学作品是新教徒创作的，其中许多作者都是新教牧师的后代，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又如，直到今天，天主教地区的居民所说的德语，往往仍是一种方言而不是标准德语。

音乐受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非常之巨。虽然加尔文认为音乐容易引发人们的淫欲，因而予以抨击，但路德却把音乐视作上帝赐予人类的最美妙的礼物，并使其充分服务于宗教领域。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海因里希·许茨（1585—1672年）就是一位新教徒。他只创作声乐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圣乐。他曾得到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二世的资助，并于1619年在德累斯顿担任了其宫廷乐队队长。直到1635年，这位选侯因三十年战争之开支，已无力资助音乐家们，许茨才离开了德累斯顿。

而在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音乐在天主教会却毫无地位可言。所以，天主教地区基本上是世俗音乐作品。尽管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愿意出资帮助音乐家，但直至18世纪，信奉天主教的南方才会诞生出真正的作曲家。

德意志邦国

《奥格斯堡和约》的签订，对德意志诸邦国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新教邦国，由宗教学家和法学家们组成的管理机构系由邦君任命，而独立于各个领地，因此萨克森选侯等邦君们很容易保持控制权。信 [106] 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也于 1570 年成立了一个功能相似的“教务理事会”，成员既有教会人士也包括世俗官员。教皇在 1583 年的宗教协定中认可了巴伐利亚公爵对教会的自主权，后来又先后在 1628 年的萨尔茨堡协定和 1631 年的奥格斯堡协定中两度予以重申。巴伐利亚公爵于 1623 年获得选侯地位后，虽然与教会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但公爵通过“教务理事会”可执掌广泛的权力。所以，该理事会的建立，是巴伐利亚成为一个近代化中央集权的邦国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从行政管理角度看，巴伐利亚堪称德意志诸邦国中最先进的一员。阿尔布莱希特五世已使贵族阶级听命于自己，并击退了新教威胁，而其继任者威廉五世个性谨严，但在政治上采取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手段，使科隆大主教区听命于巴伐利亚的旨意。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一世可谓威特尔斯巴赫统治家族最出类拔萃的一位，作为行政管理者、政治家和外交家，展现了出众的能力。不过，由于马克西米连生性阴郁、苦行谨修，人们往往低估了他的才华。

巴伐利亚划分为四个行政专区，官僚们在公爵与各领地之间施行治理。尽管各领地均由贵族人士统治，而这些贵族凭借其地位和财富，几乎完全独立于公爵，但专区的行政官员却越来越多地由中产阶级人士担任。行政专员们均拥有杰出的治理能力，在政治上又完全听命于公爵，权力遂日益增强，而领主们的势力则越来越小。虽然贵族、教士和自由民们对此不时发出抱怨，但形格势禁，他们已无力扭转颓势。

巴伐利亚的行政管理，居于中枢地位的一环是“邦务委员会”。1550 年，阿尔布莱希特五世使财政局从该委员会独立出来，交由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专门人士管理。财政工作系与金钱打交道，因此沾有某些“污秽”，自然是清高的贵族们不屑一为的。财政局与几个行政专区密切协作，编制预算，提出资金使用方案。邦内的财政收入获得了稳定的增长（究其原 [107] 因，部分源于邦对食盐和啤酒交易的垄断），而开支则得到了精心的控制。由此，巴伐利亚拥有了为推行领土扩张政策所必需的金钱后盾。

在科隆战争和三十年战争期间，巴伐利亚成立了一个“战争委员会”，由中产阶级出身的专家负责处理兵员征召、粮秣筹集、城堡建筑等具体事宜，而行军打仗之事仍然由贵族们承担。同样由专门人士组成的枢密院（公爵的私人顾问委员会）紧密配合公爵，对全邦境内的行政管理发挥监督作用。虽然领主们对枢密院的设立及其运作深感不满，认为它损害

了各个领地的自主权益，但公爵谨慎地却又是坚决地否决了这些抱怨。

法律的成文化，也强化了邦君对境内领主们的驾驭能力，虽然有些法律的编纂其实是由领主们自己提议的。仍以巴伐利亚为例，一批中产阶级中出身的律师用了15年时间制订了一部新法典，并于1616年颁行。传统的法律规定得到了延续，但那些模棱两可的、随着条件变化不再适用的规定则得到修订。新法典借鉴了罗马法的原则，而罗马法是以维护统治者的权力为首要宗旨的。法律条文明晰化后，在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后，再想向其管辖范围之外的其他法院（例如帝国法院）上诉，机率已减少了许多。总的来看，法律的成文化有利于早期的近代国家的形成。

在德意志诸邦，利用法律调整公共生活和私人关系的程度，要比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要高出许多。无论是经济活动、学术道德、宗教事务、医疗纠纷、公共服务，还是性取向、乞讨，都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法律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并非来自不同社会集团斗争之后的妥协，而是由邦君们颁布法令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做出规定。这一特点，将对日后德意志的政治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

为了维持人数越来越多的官僚机构、常备军和司法部门的正常运转，邦君们要想纯粹利用自己属地的收益予以满足，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因而越来越需要对税收要求做出预先估计并使征收工作例行化。根据1555年《奥古斯堡和约》之规定，为帝国征收税收这项工作应由诸侯们而非皇帝的使臣们负责。为了保障帝国军队之需，以消灭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土耳其人，征税数额大幅度增长，而诸侯们也借机谋取私利：他们征取的税收之多，远远超过其交给皇帝的数额。以维尔茨堡主教为例：他在1566年征收的“对土耳其人战争税”达294166古尔登，但只向皇帝交纳了其中的163268古尔登。

各邦议会宣称，无论是收入与财产税、公共医疗卫生税还是人头税，这些新税的征收权均归它所有。而且，邦议会在如何使用这些税收问题上也应拥有一定发言权。由于消费税（例如啤酒消费）不在此列，为规避邦议会的掣肘，这一税种很快成为最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由于各邦越来越要求获得更多的收入，诸侯们渴望获得完全的自主行事权，遂越来越多地[108]把邦议会搁置一旁。“三十年战争”期间的紧急状态，更使他们获得了天赐良机，彻底摆脱邦议会的节制滥征税收。以巴伐利亚为例，邦议会在1514至1579年间召开了33次会议，1579至1612年间召开了6次，而在1612至1669年竟然从未召开会议。

17世纪的德意志社会

贵族、教士和自由民，构成了帝国的三个阶层，而每个阶层又分为若干个等级。帝国以法令形式对每个等级的服饰做出了严格规定，从而使社

会分野清晰可辨。不过，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进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一定变化。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都倡导勤奋工作、积极接受教育、增进专业技能，因此所有基督徒都接受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贵族阶级也不例外：他们管理自己的领地、开办工厂、开采矿业资源，方式与经营企业并无二致。到了 17 世纪，贵族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反扑，宣称出身和社会地位要比经济上的成就更加重要。在享有自主权的邦，随着官僚队伍的迅速壮大，为平民子弟社会地位的晋升提供了大量机遇。不仅是自由民和手工业者的后代，甚至农家子弟，都可以在诸侯的行政机构中找到稳定的晋升之阶。如果天遂人愿，他们也可以获得封号，从而在社会地位上与牢骚满腹的贵族们平起平坐。至于世袭贵族，虽然对诸侯们的地位上升颇为不满，但由于惰性，并不想费时费力地在政治上谋求什么。

对于 16 世纪时社会地位分野上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贵族们做出的反应颇具保守意味。他们认识到，除非对近代社会的潮流作出妥协，否则便会被中产阶级取而代之。面对近代制造业的威胁，城镇行会要求自己的特权得到尊重。中产阶级出身的牧师、医生、律师和教授，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因此这些职业几乎都变成了世袭性质的。至此，先前的暴发户们摇身一变，如今已成了新时代的社会栋梁。

宗教改革与反改革，还对家庭及妇女的地位带来了影响。路德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特兰托公会议就婚姻问题提出的教义也规定，结为夫妇的男女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和爱。虽然德意志社会仍然等级森严，每个家庭依稀便是缩微版的国家，父亲和丈夫在家庭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主宰权，不过妻子们的地位已经开始改变：在仆人们眼中，她们与男主人拥有



1614 年法兰克福发生“屠犹事件”，把犹太人逐出了这座城市。马泰厄斯·梅里安 1642 年创作的这幅雕版画，描绘了犹太人遭到劫掠的情景。



瑞士16世纪出版的一部图书的插图，描绘了火烧“女巫”的情景。既然社会上的一切不幸都很容易归罪于魔法和巫术，那么在危机时期，捉巫运动此起彼伏也就不难理解了。

相同的地位；牧师夫人这种新职位的设立，使牧师的夫人们在教会中几乎获得了独立地位，承揽了相当数量的教区事务。

德意志社会进入16世纪时，洋溢着一片乐观主义情绪：欧洲的船只正对世界各地探险；宗教改革家们提出了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新宗教观，信徒们从此不再只能听命于腐化成性、卷入世俗事务不能自拔的教会；农民们因为农产品需求量越来越大而获利甚丰，而城镇地区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展一片繁荣。但到了16世纪中期，潮流开始转向了：从“新世界”源源不断运回的白银，令通货膨胀率如着了魔般扶摇直上；宗教领域的不同派别彼此争斗和流血冲突，暴力事件频仍；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无法提供所需的农产品，致使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失业加剧，甚至出现了饥 109 荒；在城镇地区，虽然财富仍在积聚，繁荣现象并未停止，但投资的回报率已经出现了下滑。在奥格斯堡，3/4的居民在税收簿上被归类为“无力纳税者”。由于天公不作美，各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农作物近乎绝收的灾难，导致饥荒四处蔓延；在纽伦堡，1561至1585年间爆发了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染病者多达4.5万人，其中2万人失去了生命。

经济上的困境、专制主义政权对自身利益的侵害，导致农民在1575至1630年间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暴动，这在南德意志地区和哈布斯堡王朝领地尤为普遍。在帝国各地的城镇地区，由于自身权利和特权不断遭到侵蚀，城市居民也爆发了一系列暴动。在很多场合，城市暴动均采取了屠杀犹太人的形式，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当数1612至1616年间在法兰克福发生的“费特米尔奇暴乱”。文岑茨·费特米尔奇是一位姜饼烘烤师，他把这座城市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归咎于市政委员会，并极尽鼓动之能事，率领大批居民举行了抗议活动。法兰克福的手工业者和店主们对荷兰难民和犹太人的涌入深感不满，将此视作16世纪中期以来经济萧条的祸因，遂在1614年8月21日的屠犹活动中把自己的种种愤怒和忧虑心理尽情释放出来。犹太人被赶出了这座城市，他们的住所被劫掠一空。由此，德意志境内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不复存在，原先居住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被迫迁居邻近的城镇和乡村。到了1616年，该市当局镇压了这场涉及面相当之广的群众暴动，处死了费特米尔奇。次年，帝国颁布了保障法兰克福犹太人人身安全的法令后，很多犹太人又回到了这座城市。各邦也承担起了保护境内犹太人的责任，并分配其担负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职能，从而使很多犹太人得以事业发达、资金雄厚。

类似于上述暴力化的反犹主义大爆发的“捉巫运动”，究其实质，是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种种不确定因素和社会问题时，人们做出的社会的、心

理的复杂反应的一部分。而这场“捉巫运动”的新型的暴力化手法，在审讯官、多明我派修士雅各布·施布兰格尔及其追随者海因里希·因斯蒂托里斯合著的《巫术之密》一书中，得到了系统化的阐述。此书于1486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巫术之密》，Malleus maleficarum，系由教皇英诺森八世批准出版，系历史上基督教会第一次承认神怪力量的存在——译注），至1669年，共再版28次之多!这部发行量惊人的书籍的基本论断是，由于一切不幸和罪恶都是魔鬼造成的，那么为了挫败魔鬼，就必须追杀他的爪牙即女巫。所谓女巫，按照该书的定义，是指那些把自己交给魔鬼并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女巫们为了参加“女巫安息日”即对魔鬼进行顶礼膜拜的仪式，拥有飞行的本领。此外，她们还具有其他种种邪恶的本领，例如把疾病传染给敌人、使天上降下冰雹并使牛奶变酸等。

“女巫”们被抓获后，由法院进行审判，而最终的判罚结果往往事先已经注定。无论是痛哭流涕、“幡然醒悟”，还是忍受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都不足以挽救她们的性命，而只有她们在死刑执行过程中真的死去，才能证明她们的无辜!有些法庭在处理女巫时仅以流放论处，有些心怀怜悯的法官会下令直接处以死刑，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巫们都是在火堆里 110 活活烧死。为了逼使她们交待自己的同伙，以便把所有寻衅对象一并投入火堆，法庭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不少案例中，当地有权有势者均巧妙安排，以便借机除掉自己在政治或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威斯特伐利亚的“汉萨同盟”城市莱姆戈市长赫尔曼·科斯曼恩便是一位“捉巫市长”。在他17世纪六七十年代执政期间，科斯曼恩及其同伙作为指控人、法官兼行刑人，把数不胜数的竞争对手送上了火堆。但到了最后，一位名叫玛丽亚·伦姆潘达尔的理发师之妻，拒绝指控任何“女巫”，多番刑讯折磨后侥幸逃生，被逐出莱姆戈后，她向帝国法院上诉并获胜，促使捉巫者被解除了职务。

在危机岁月，例如16世纪80年代至该世纪末期间，以及三十年战争期间，审判女巫的案件数量均大幅度上升。至最后一位德意志“女巫”于1775年被处死时，已有约10万名无辜者被构织以这一罪名失去了生命。捉巫运动的终结，是新兴的理性主义精神的胜利，应当归功于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勇敢地指责这种疯狂行径的宗教学家、哲学家的不懈努力。

三十年战争的起源

对缉拿女巫的歇斯底里、对天文现象的可怕预言，似乎预示着社会全面危机即将到来。从政治上看，天主教派、路德教派与加尔文教派三大阵营的对立正在加剧。1607年，帝国城市多瑙沃斯爆发暴乱，占人口多数的新教徒对天主教派在圣马克日举行的庆祝仪式进行了袭击。对此次仪式承担保护责任的皇帝鲁道夫二世，把此一事件视作对自己尊严的挑衅，遂命

[111] 令巴伐利亚公爵用强制手段实施帝国禁令，剥夺新教徒的法律权利。这位公爵为天主教派立下此一大功后，多瑙沃斯城市被划归他的管辖之下。但此举显然违背了法律，因为这座城市居住的是士瓦本人而非巴伐利亚人，因此禁令本应交由属于路德教派的符腾堡公爵执行。

1608 年 1 月，帝国议会在累根斯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解决皇帝因对土耳其人进行战争而欠下的债务。但是，多瑙沃斯所发生的事件，足以令最温和的路德教徒也加入到以帕拉丁选侯为首的激进阵营，要求在帝国各主要机构中增加加尔文派和路德派的席位。萨克森公爵试图打个圆场，但在帕拉丁选侯的代表步出帝国议会会场后，绝大多数温和派代表都尾随其后退出了会议。无论是帝国法院还是帝国议会，均无法使矛盾双方实现和解，赖以维系帝国内部和平的传统机制已无法有效运转下去了。1608 年 5 月 14 日，以帕拉丁选侯为首的新教激进派在诺德林根附近的奥豪森修道院集会，结成了军事同盟。1609 年 6 月 10 日，“天主教同盟”亦在慕尼黑组成。至此，帝国已分裂成为两大相互敌视的军事集团。

相形之下，天主教同盟的实力更加强大。尽管同盟内部也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它不像新教同盟那样存在教义上的不同。从财力上看，占据上风的也是天主教同盟：它不仅得到巴伐利亚的全力支持，还可以从教皇那里获得经济资助。巴伐利亚公爵麾下还有一位非常富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那便是约翰·采克拉斯·蒂利——据传，他从耶稣会士那里学会了祈祷，从西班牙人那样学会了军事指挥。在波希米亚，人们普遍认为皇帝鲁道夫二世精神紊乱、缺乏能力。利用鲁道夫二世统治地位动摇以及这位皇帝正与其弟弟马特蒂阿兹陷于纷争等机会，新教徒及各个领地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大自由。马特蒂阿兹1612 年被推选为皇帝后，决心制止这种权力流失



1618 年 5 月 23 日在布拉格的赫拉德斯钦城堡发生了“掷出窗外事件”。新教徒们抗议帝国的反宗教改革措施，把两名帝国官员从窗户扔了出去。虽然从 45 英尺之高的地方摔了下去，但这两个人并未丢失性命。天主教徒们将之归因于圣母玛利亚的庇护，但真实原因却只是一种巧合：他们落下去的地方，是一处松软的粪堆。

趋势。此前，新教徒在两处天主教会名下的土地上修建了教堂，一座是在布劳瑙的一座本笃会修道院的地产内，另一座是在属于布拉格大主教领地的布洛斯特格拉堡。新教徒本来以为，皇帝1609年颁发的允许新教徒修建教堂的诏令，不会有什么预设前提，但马特蒂阿兹如今宣布，此项诏令仅仅适用于帝国属地，而不适用于天主教会的领地。布劳瑙的新教领导人遂被投入监狱，布洛斯特格拉堡的新教教堂则被夷平。应维也纳大主教克莱斯尔的要求，布拉格市长禁止新教徒举行集会。为抗议此种做法，以加尔文派的海因里希·马特蒂阿兹·图尔恩大公、路德派的约希米·安德里斯·冯·施利克为首的约12位著名人士，1618年5月23日冲进了赫拉德斯钦城堡，抓住了在他们看来应承担罪责的两位反动官员，一位是威廉·冯·斯拉瓦塔，另一位是雅拉斯劳·马丁尼兹，并把他们掷出了窗外。这两个倒霉蛋，从45英尺的城堡摔了下来，居然都保住了性命！（在这次"掷出窗外事件"中，这两个官员正好落在河沟的垃圾堆上，一伤其足，一被摔昏——译注）

皇帝马特蒂阿兹1619年3月去世后，波希米亚等级议会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富挑衅性的决策，推选信奉加尔文主义、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帕拉丁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担任新国王。弗里德里希五世曾在1613年娶了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斯图尔特为妻。在这位野心勃勃的妻子及一群贪心不足的顾问们的怂恿下，时年63岁的弗里德里希一时冲动，接受了波希米亚王国的王冠，但形势的发展很快便证明了此举系操之过急。事实上，他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援，甚至其岳父詹姆斯一世也不愿意助其一臂之力。与之相反，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却将其精锐的军队提供给新任皇帝斐迪南二世驱使。1620年11月8日，约翰·采克拉斯·蒂利统率的巴伐利亚军队，对于帝国在布拉格郊外的白山彻底消灭帕拉丁与波希米亚联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算起来，这场战役距离弗里德里希加冕为国王还不到一年时间。 [112]

在帝国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被天主教徒轻蔑地称作"残冬之王"的弗里德里希失去了选侯地位。作为对其为帝国效力的奖赏，皇帝把选侯权授予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1618年，唐·巴尔塔扎·朱尼加成为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三世的首相。前任首相莱尔马公爵曾与英国、荷兰就荷兰作为"泛西班牙"一部分事宜达成了谅解，但朱尼加认为这样做徒然使荷兰的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因此废除了这项政策。如今，西班牙不仅向皇帝斐迪南提供财政援助，还派军队侵入了帕拉丁，而不幸的弗里德里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这时，人们认为西班牙似乎将要吞并这片土地，从而使富有战略价值的"西班牙道路"，即自北向南、用于向驻荷兰的西班牙军队提供补给的公路，得到更充分的屏护。不过，布鲁塞尔和马德里的政治家们认为应谨慎从事：在帕拉丁开展的军事行动，已经使在荷兰的西班牙军队实力遭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或法国被迫干涉，西班牙 [113]

将如何应对?出于这种担心，西班牙人仅仅占领了莱茵河左岸，而蒂利则率军围困海德堡，并于1622年9月予以攻陷。这样，天主教派牢牢控制了德意志加尔文主义者势力范围的中央地带，集新教学者编纂图书之大成的帕拉丁藏书库，被运送到了罗马。“残冬之王”及其王后在欧洲各地漫无目标地流亡，心也冷，泪也干，受尽了天主教派的嘲笑。

白山一役之后，胜负之势已定，冒险家、野心家们遂蜂涌而至，加入到帝国一方。原因自然不难看出，那便是皇帝掌握有金钱、土地和其他可供赏赐的战利品，令雇佣军人趋之若鹜。其中，阿尔布莱希特·冯·华伦斯坦（1583—1634年，天主教徒，波希米亚贵族，但自视为德意志人——译注）可以称作最著名的雇佣军首领。由于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华伦斯坦的财力更加雄厚，自信心也更加饱满。在白山之战中，他曾率领一支龙骑兵参战，并借战乱之机购买了相当数量的被罚没的贵族庄园，所支付的金钱仅相当于这些地产真实价值的几分之一。除拥有弗里斯兰公爵头衔外，华伦斯坦名下还有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他统率下的这支军队的一切武器装备，均由这些工厂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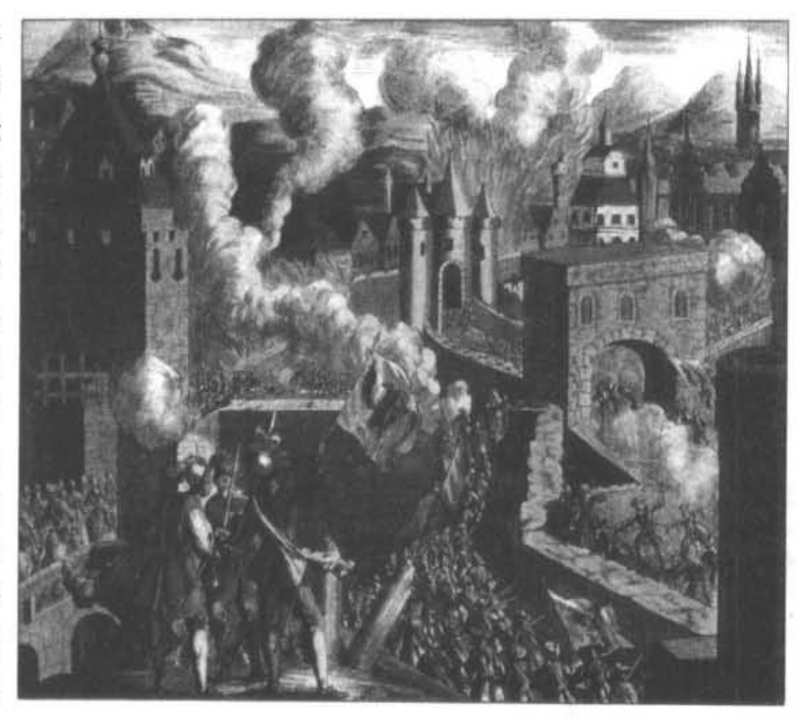
1625年12月，英国、丹麦、尼德兰联合省以及帕拉丁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在海牙结成同盟。丹麦人立即对德意志发动了入侵。华伦斯坦遂向皇帝提供了一支4万人的雇佣军，且这支军队的一切用度均由他自己承担，而作为回报，皇帝授权由华伦斯坦担任帝国军队的统帅。这种安排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皇帝由此获得了一支由天才将领指挥的第一流军队，而华伦斯坦则可以完全听凭自己的意愿赚取战争回报。后来，他果然赚了个钵满盆满（华伦斯坦纵容部队从民众那里掠夺财物作为军饷，每攻克一个地方，即大肆抢掠粮食和财富——译注）。

1626年4月25日，华伦斯坦在德绍的易北河大桥上首战告捷，由此展开了他所向披靡的凌厉攻势，把新教徒武装赶到了匈牙利。8月27日，他与蒂利统率的巴伐利亚军队协同作战，打败了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及其在德意志北部地区的盟友，包括卢特及萨尔茨吉特附近的巴伦支堡。帝国军队遂占领了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除遭受围困的斯特拉尔松港之外，新教徒势力被彻底逐出了波罗的海沿岸。1629年5月22日，丹麦国王签订了《吕贝克和约》，同意再不干涉德意志事务，以此为条件恢复了失去的领土。

哈布斯堡王朝此前一直以宽宏大量的方式对待丹麦人，原因在于担心如果过于施压，可能会导致瑞典卷入战争。但随着战事的胜利，皇帝的雄心壮志被调动起来，走向了危险的地步。他任命华伦斯坦为“大洋与波罗的海统帅”，并计划开挖一条运河，把北海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汉萨同盟城市的新教徒和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自由民对此项动议深感震惊，遂遍寻盟友以对付皇帝。没用多久，他们便会找到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友。

114 **1629年3月，斐迪南二世颁布《恢复教产诏令》，宣布凡被新教徒世**

俗化的教会财产，均返还天主教会。事实证明，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错误。同年7月，斐迪南二世又宣布剥夺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梅克伦堡·古斯塔夫公爵的土地，然后赏赐给华伦斯坦。这两位公爵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盟友，他们的家族已统治这些土地达800年之久。帝国骑士们对于皇帝把华伦斯坦这样一个雇佣军首领、军火商提拔为骑士庄园领的新主人，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其合法地位之举，错愕之余不禁义愤填膺。尤有甚者，如果皇帝赏赐的是一位忠实的臣子的话，骑士们未尝不能接受，但他之所以要把这些公爵领地授予华伦斯坦，只是只为舍此他便无法清偿对后者欠下的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费用！



蒂利率领的雇佣军在经过长时间的围城战后，于1631年5月20日攻陷马格德堡，入城后极尽杀戮、抢掠、强奸之能事，最后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蒂利(1539——1632)，出生于尼德兰的布拉邦特，在耶稣教会获得教育后，在帕尔马军队中学习了战争艺术。三十年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帝国统帅，先后打败了帕拉丁选侯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在布来登费尔德赢得胜利后不久，蒂利在战斗中阵亡。

《恢复教产诏令》的出台，以及对华伦斯坦的提升，都是对领地主们权利与特权地位的损害，激起了天主教派和新教派两大阵营的强烈反抗。美因茨大主教兼选侯直言不讳地指出，华伦斯坦一事令他“震惊和不快”。新近获得选侯权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表示，他在累根斯堡选侯大会上，将拒绝推选皇帝的儿子为“罗马人的皇帝”。1631年，马克西米连与法国签订了防御同盟条约即《枫丹白露条约》。事实再次证明，诸侯们自身的利益才是重中之重，而所谓的教派铁板一块只是一种假象。压力之下，皇帝被迫做出回应，宣布撤销《恢复教产诏令》、取消儿子斐迪南的继任人提名，并免去华伦斯坦的帝国统帅职务。随后，华伦斯坦回到波希米亚，密谋对皇帝和诸侯们展开复仇之举。

瑞典人的干涉

1630年7月6日，亦即累根斯堡选侯大会召开后的第三天，新教事业 115 最强有力的卫护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1594——1632年）入侵了乌什德姆岛。1631年9月17日，新教联盟军队在莱比锡附近的布来登费尔德几乎全歼蒂利率领的帝国军队。蒂利御下的36000名官兵，共有12000人阵亡、8000人被俘，并损失了全部炮兵，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仅损失了3000人。实战表明，与声名显赫的蒂利相比，这位国王的军事才能更加不凡。而连续多年饱受打压之苦的新教徒，终于迎来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次大捷鼓舞了他们的斗志，而帝国军队极其残暴的行径更激发了他们的复仇意志。例如，在经过长期的围困之后，蒂利率领的雇

佣军曾于1631年5月攻陷新教徒的据点马格德堡。这是德意志人口最众、财富最多的城市之一，帝国军队入城后，极尽杀戮、抢掠、强奸之能事，而作为统帅的蒂利则得意忘形地将这场狂欢称作“马格德堡婚宴”。最后，这座城市被付之一炬。

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与蒂利绝望之际，仍试图阻止瑞典军队进入巴伐利亚，于1632年4月在莱希河上建立了防御工事。但古斯塔夫的军队夺取了河上的一个岛屿，架起大炮，对准巴伐利亚军队实施炮击，蒂利受了致命伤，马克西米连也被迫撤往因戈尔施塔德。5月17日，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以胜利者的姿态，志得意满地进入了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陪同在他身边的是“冬日之王”。这时的弗里德里希觉得，他重返波希米亚并重获选侯资格，已经指日可待了。



深具三十年战争时代特色的两名士兵。

经历了布来登费尔德的溃败之后，斐迪南二世又想起了华伦斯坦，恳求他重新出山。后者提出，他必须拥有绝对的指挥权，皇帝不得对其进行战争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干涉。皇帝让步了，遂使华伦斯坦成为唯一掌握绝对自由指挥大权的军队统帅，直至拿破仑。

华伦斯坦正准备为军队修建冬季营房时，得知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想在天寒地冻之前与帝国军队对垒，因此将侵入萨克森。他决定应战，遂于1632年11月16日在吕岑城与瑞典国王迎头相撞。这是介于莱比锡与纽伦堡之间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一场激战之后，新教徒获得险胜，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在战斗中死去，帝国军队剥去他的所有衣服，让他那布满弹创的尸体一丝不挂地暴露在战场上。

而吕岑之战，也是华伦斯坦的最后一次战役。他背着皇帝，不断与斐迪南二世的政敌们私自和谈，其中既有“冬日之王”、萨克森公爵、法国国王，甚至包括瑞典人。野心勃勃的他，这时已毫无遮拦，而皇帝自然不能听凭属臣功高盖主，遂下令不论死活，都要抓捕华伦斯坦其人。后者试图逃脱追杀，但终于在1634年2月25日被一位名叫德弗罗的爱尔兰上尉杀死于波希米亚的伊格尔城堡。

116 新教诸侯们再也不能容忍雇佣军对他们的合法性构成的威胁了。因此，帝国军队如今由皇帝的儿子、波希米亚兼匈牙利国王斐迪南统率。

瑞典的内政外交，操纵于一位相当能干的政治家手中，他便是阿克塞尔·乌克森斯蒂恩。1633年4月23日，在他的协调下，瑞典与德意志新教徒组成了“希尔德布隆同盟”。乌克森斯蒂恩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一系列德意志邦国变成瑞典的卫星国，使它们成为瑞典推行对外政策的有力襄助。不过，新教徒的邦国并不想成为瑞典人的附庸。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战死后，他那支军队已经从热情四溢的十字军战士蜕变为残暴而势利的亡命之徒。因此，德意志的新教邦国决心自主地寻找一条出路。1634年11月，斐迪南率领帝国军队，在诺德林根彻底打败了瑞典人。此后，新教邦君们终于下定了决心，愿意与皇帝展开谈判，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1636年5月30日，《布拉格和约》签字生效，并得到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的接受。拒绝接受者包括：仍未从《恢复教产诏令》的后果中摆脱出来的符腾堡；觉得继续进行战争比媾和更好一些的黑森－卡塞尔；沦为荷兰人或瑞典人势力范围内的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国。《布拉格和约》保障邦君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他们的领地，只有那位倒霉的“冬日之王”是个例外。《恢复教产诏令》被正式废除。这样帝国内诸邦重新承诺共同维护和平与法律。不过，和约未能承认加尔文教的独立教宗地位。但不管怎样，和约毕竟是帝国权威与邦国权利之间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妥协，表现出邦君们已经决心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和约最终未能实现，这并不是德意志内部的过错；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1634至1642年一直担任法国首相的黎塞留枢机主教的作梗。

三十年战争的法国阶段

就在《布拉格和约》签订的前几天，法国向西班牙宣战，并得到了瑞典、荷兰、萨伏伊、帕尔马及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邦国的支持。而德意志的大多数邦国仍与皇帝结盟，力图挫败入侵的外国军队。所以，等到和约签订之时，战争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甚至更加残酷的阶段：外国军队横行德意志大地，沿途大肆劫掠、强奸和屠杀。

1636年10月，瑞典人在威特斯托克之战中打败帝国军队，后来在1642年11月又在布雷腾费尔德取得胜利。帝国军队在扬·冯·韦特率领下，曾经于1638年2月在莱茵费尔登打败了法国人，但因为这位将军允许士兵大肆杀戮，所以仅仅过了三天，便于结结实实地吃了败仗。1643年11月，韦特时来运转，在士特林根血洗法军。1645年3月，瑞内人在布拉格以南的扬考打败了帝国军队后，向维也纳挺进。特拉西瓦尼亚的乔治·I·拉科西齐与瑞典人结成了同盟。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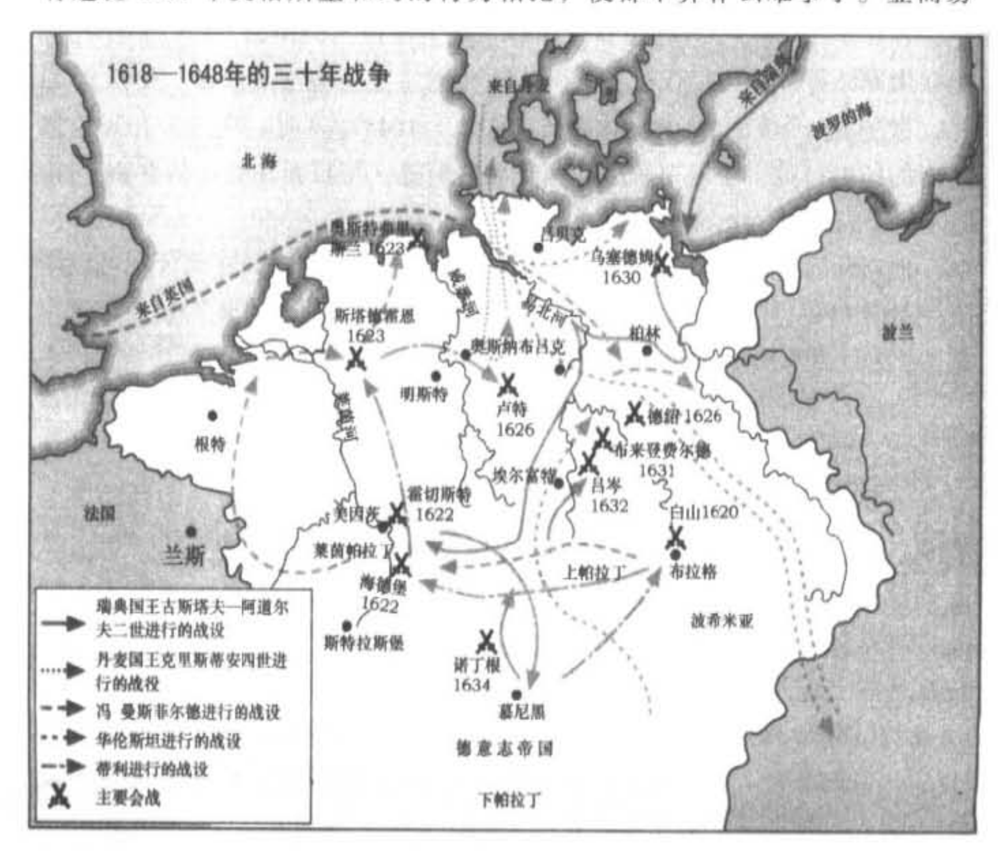
但新任皇帝斐迪南三世突然向拉科西齐表示，可允许其在匈牙利可以享有宗教自由权，并慷慨地赐予其大量地产，终使后者与瑞典人分道扬镳。瑞典人精力已耗尽，更兼补给困难，终于后撤了。

帝国似乎已经再次转危为安，但其地位已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萨克森公爵约翰·乔治1645年9月在科茨岑布罗达与瑞典人媾和，勃兰登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也逐步拉开了与皇帝的距离。同时，法国的两位著名将领，一位叫孔德，另一位叫图里内，正在利用三十年战争提供的舞台，开创他们夸世战功的序篇。1645年8月3日，图里内在内德林根附近的阿勒希姆打败了帝国军队，虽然他也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当瑞典军队出现在德意志南部地区时，巴伐利亚公爵迫于压力，于1647年3月签订了媾和条约。但他很快又投入到作战行动之中，结果被图里内及瑞典将领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联手打败。这时的巴伐利亚，已全然处于不设

防境地，无法抵御法国与瑞典联军的残暴劫掠。

各个主要参战方，无论是皇帝、法国首相黎塞留还是奥克林斯蒂尔纳（1583—1654 年，瑞典首相。由于古斯塔夫二世一直忙于对外战事，所以他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瑞典王国真正的管理者——译注），或者是“西班牙的黎塞留”奥利瓦雷斯，都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但他们都希望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充分的满足，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平。直到 1645 年 8 月 19 日，皇帝才终于得以邀请有关各方举行了一次和平会议。瑞典人和丹麦人把战线停止于奥斯纳布吕克，而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派出代表前往明斯特，商讨如何停止已长达 18 年的战争。法国也派出代表来到明斯特。由于各方代表包括 37 位外国人和 111 位德意志诸侯使者，所以谈判非常复杂，可谓旷[118]日持久。直到皇帝派出的极富外交才能的使臣马克西米连·冯·特兰特曼斯托夫以出让阿尔萨斯为代价，与法国人达成协议，才终于排除主要障碍，为《布拉格和约》的签署铺平了道路。这一妥协意味着，法国人从此将控制“西班牙道路”的一个关键枢纽。1648 年 1 月 20 日，西班牙人匆匆与荷兰人完成了媾和协定的签署。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的荷兰已经从帝国获得了完全独立。

根据和约，瑞典获得了包括奥得河出海口以及不来梅、费尔登在内的波美拉尼西亚西部，勃兰登堡获得了哈尔伯斯塔特、卡明、明登、马格德堡、马克和克利夫斯。为了奖赏有关各方的盟友，还必须就其他领土交割达成协议。不过，这一切与如何处理“特赦”亦即从哪一天起开始赦免所有违犯 1666 年奥格斯堡和约的行为相比，便都不算什么难事了。显而易



《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

汉斯·雅各布·冯·格里美尔斯豪生（1622?—1676年）的代表作《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简称《痴儿西木传》——译注）共分五卷，第一卷于1668年出版后即引起巨大反响。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格里美尔斯豪生又创作了第六卷，在第二版中加在书中。这部小说最初在纽伦堡出版时，其文字具有很强的口语色彩。为了增强可读性，该书在法兰克福出版时换用了标准德语。格里美尔斯豪生对新版本视同己出，以之为基础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

《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以三十年战争为故事背景，覆盖的时间是1632至1645年。故事的主人公的自述展开：西木卜里其西木斯是斯珀赛特一户农民的儿子，被抢掠的军队掳走后，与一位隐士在一起度过了两年时光。隐士去世后，他得到哈瑙的一位军事指挥官的照料，但在这位指挥官去世后，又被大肆劫掠的克罗地亚人俘虏。他找准机会逃走后，在龙骑兵队伍中服役，后来成为帝国军队的一名军官，但又成为俘虏、被迫结婚、逃往巴黎。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在巴黎，靠一位妇人过活，后来靠行医赚取生活之资，后来又作为一位步兵士兵参加了战争，参加了争夺圣地的战事并升为上尉，发了一笔财，不过很快又失去了。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一位农民，因为没有贵族头衔，觉得自己是社会的弃儿，他开始周游世界。在回到家乡之后，他在一处岛屿上过起隐居生活，直至去世。

小说描写了主人公的一系列冒险经历，体现了他的能力和勇气。故事的描写生动而幽默，并充分运用了讽刺手法。故事的主题是，一个人如果在"癫狂"的世界上是无法认识自我的，而必须在宁静和孤独中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抛弃了西班牙和德意志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善恶相争，开始触及故事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后来的德意志作家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创作了《阿伽堂》，歌德创作了《威廉·迈斯特》，内容都是个人怎样和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与它们不同的是，作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作家，格里美尔斯豪生在《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中揭示的含义是，一旦上帝不再理会人类和这个走向堕落的世界，人们是无法与上帝和谐相处的。

《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并非一部关于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小说。书中虽然描写了相当多的战争场面，其中有些是现实事件，有些则源于虚构，其用途只是为了在书籍的上半部分提供一个故事背景。同样，书中之所以要描写战争的种种残酷性，也只是为了反映出人类本性中邪恶的一面。格里美尔斯豪生对追述历史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民族问题。他有着极其强烈的反对法国文化的倾向，厌恶华美而庸俗的法国服装，决心在作品中不使用任何一个窜入德意志语言中的法语词汇。对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他给出的答案是：复兴包括全人类的基督教王国，其中也包括作为附庸国家的土耳其。在他看来，正是德意志诸侯们的卑鄙野心，构成了现实苦难的主要原因。因此，德意志必须建立在各个城市的永结同盟基础上，并由这些城市派出代表组成一个全德议会。

格里美尔斯豪生的宗教观极富大同主义色彩。虽然他从路德教派改信加尔文主义，但完全摆脱了当时偏执于宗教之争的社会主流思想的束缚。不过，作为那一时代的人，他相信女巫、避邪物、魔法和魔鬼的存在。

作为作家，格里美尔斯豪生对德意志语言具有极其出色的驾驭能力，是同时代所有其他作家望尘莫及的。这既包括犯罪团伙的俚语，也包括宫廷生活中的官话，还包括路德翻译圣经时使用的标准德语。



《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第一版插图。

见，新教徒希望越早越好，而天主教徒则希望越晚越好。最后，各方终于达成共识，同意以1624年为界线。令天主教派深感不满的是，因为把时间设定在这一年份，他们这一方失去了北德意志地区的主教区。1648年10月24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生效，德意志各地一片欢呼。

战争影响

三十年战争虽然给人们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和苦难，但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加速了近代化进程，促进了专制主义邦国的形成。法学家们宣称，诸侯们在面临现实威胁的情况下，有权征取税收以保护邦内臣民的人120身与财产安全，而无需得到境内领主们的正式批准。事实上，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在整个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召集过领主们举行会议，而是径自宣布“战争的绝对要求，使法律的声音沉默”。因为人们均对战争忧心忡忡，诸侯们遂自动获得了保卫邦国免遭敌人侵略、维护境内和平的权力和责任。而为了担负这一责任、行使这项权力，各邦最好保持一支常备军，而不是一帮纪律松弛、朝秦暮楚的雇佣军、冒险家。

一支军队的纪律越严明，其军官团的权威便越大。而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便如同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而作为齿轮的军官即便再愚蠢透顶、再缺乏指挥才能，也能顺利地为诸侯们担负一定的职能。在德意志，由于绝大多数军官都由贵族充任，贵族阶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由此导致贵族与专制主义邦国之间融合到了一起，不仅在军队效力，也愿意在官僚队伍和外交领域为宫廷服务了。从此，德意志正在走进一个邦国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许多贵族，都是因为在政府和军队中成绩突出而获得封号的，而来自古代贵族家族者则寥寥无几。

战争业已清楚地表明，政治与宗教不能混为一谈。由于这块土地曾经把政治野心与宗教狂热主义掺合到了一起，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世俗政治人物和教会都认识到二者必须脱钩了：政治将世俗化，而宗教则复归教会主宰。不过，政治与宗教分离后，仍常常发生历史上的那种彼此争斗。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段岁月里，欧洲国家为增进各自利益，往往缔结一套复杂的联盟体系。由于各个联盟之间在外交上、政治上相互制约，因此，尽管各国军队规模更庞大、作战威力更强大，但再也未曾像三十年战争那样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和平会议上，各当事方会共同努力，建立一种理性的新秩序，从而使彼此分歧得到克服，争取实现长期的和平。虽然宗教问题仍被作为宣传上的武器使用，但它已退出了中央舞台。

建立一套普世秩序的梦想，已随着查理五世的逊位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数以百计的小邦国角逐有利地位。这种群雄相竞的局面，对大邦非常有利：它们相互勾结，共同牺牲小邦的利益。这时的德意志，已全面融

入欧洲的国际政治生活中：依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法国和瑞典成为德意志大地新秩序的保护人；从1714年起，英国国王兼任了汉诺威选侯以及荷尔斯泰因、奥尔登堡两地的公爵；德意志诸邦国可以自主地彼此之间或与外部强国结成同盟。从此，德意志成为欧洲列强竞相争夺的战场，而诸邦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也纷纷争取列强的支持。

在这种局面下，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只剩下了实力强大的国家。在此之前的14、15世纪，勃艮第等小邦国曾经因为行政管理高效、军队素质优良，16世纪后期、17世纪初期的荷兰也曾经因为它的财富和海上力量，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过主要角色，但时过境迁，如今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一 [121] 个国家的面积、人口和财富。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欧洲真正拥有发言权的只是法国、英国和瑞典。至于西班牙、波兰，它们作为强国的历史已经终结了，而荷兰也在迅速衰退之中。还有德意志，它全然是一片政治真空。

真正的强国，必须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而1648年的德意志诸邦国，在这一领域的条件恰恰非常不如人意。由于连年的战争，农业遭到严重忽视，许多耕地被抛荒，德意志的谷物价格下降了近一倍。士兵们屠杀家畜

1648年5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明斯特市政厅签署。杰拉德·特尔鲍赫（Gerard Terborch，1617—1681）的这幅代表作品，描绘的是与会代表庄严宣誓遵守和约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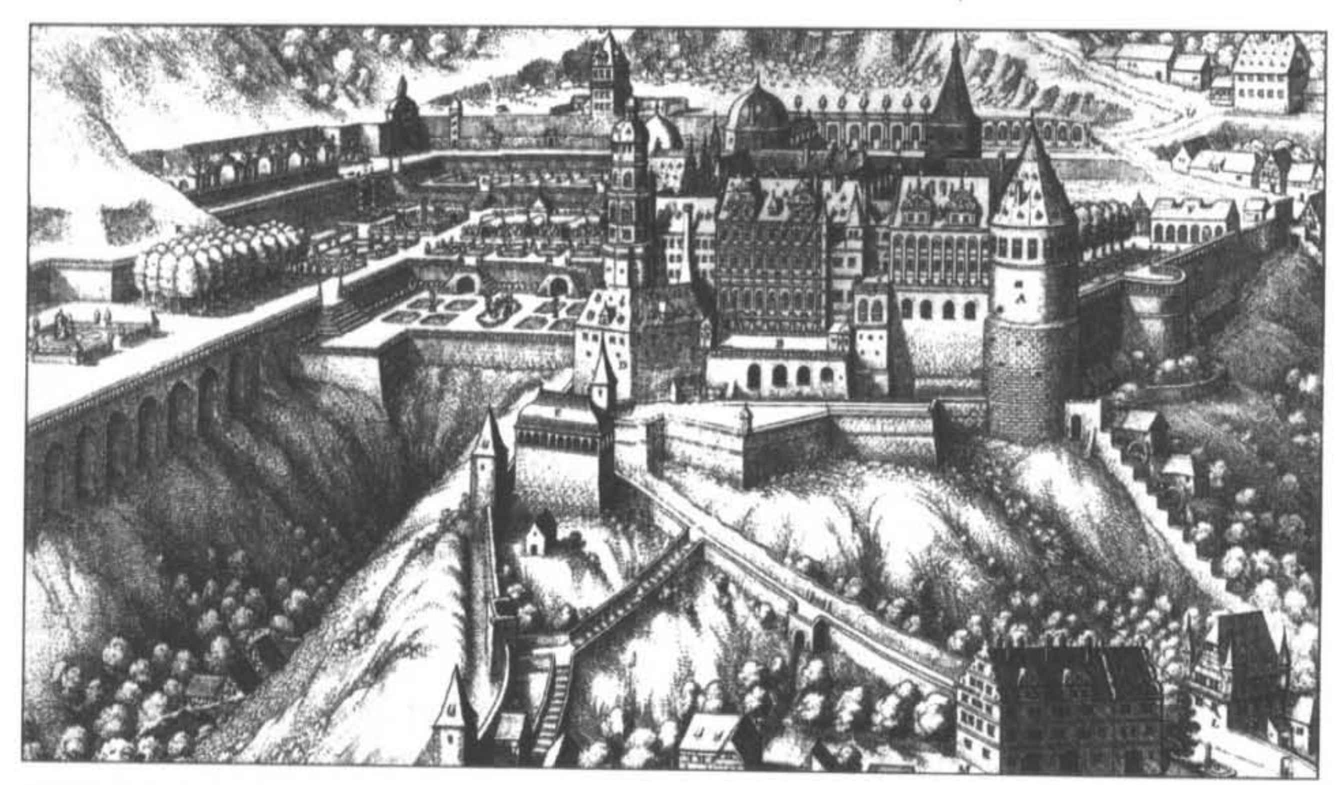


作为食物，甚至连种畜也不放过。那些一心巴望着战争不要结束的雇佣兵，仍然不愿意回到土地耕种上来，因此必须把他们赶走。在很多地区，疾病和营养不良导致人口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不过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威斯特伐利亚、下萨克森和下莱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北海沿岸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属地等，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则非常有限。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开始稳定回升，虽然这种回升的速度颇为缓慢，经济也开始逐步得到恢复。

德意志的较小邦国，绝大多数都难以建立一套能够适应近代化国家需 [122] 要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无力推行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它们的国土太小，经济实力太弱，根本无法与欧洲强国展开竞争。尤有甚者，它们那本来便很有限的收入，还往往因为刻意效仿法国路易十四专制主义的宫廷生活，而消耗在无休无止的浪费中，而这种以奢华生活为荣耀的攀比之风，惟一的受益群体便是宫殿建造等奢侈业。只有那些较大的邦，例如勃兰登堡—普鲁士等，能够采取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根据勃兰登堡选侯的诏令，连接奥得河与施普雷河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运河"于 1662 至 1668 年间开挖建成。这位选侯还对丝绸纺织业、地毯与窗帷业、制皂业、烟草业、制糖业等私营工业提供政府支持，而这些工业中相当一部分掌握在 1683 年迁居普鲁士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手中。但纵便是弗里德里希·威廉这位勃兰登堡的"大选侯"，纵便他采取了种种措施，也因实力所限，难以取得很大成效。由于勃兰登堡—普鲁士甚为贫困，它难以筹措到为进行大规模结构改革所必需的资本。另一方面，对于来自荷兰的顾问们提出的建议，即废除农奴制度、实行彻底的迁徙自由，选侯也不可能接受。当时的德意志内部的贸易，遭受着数不胜数的关税壁垒的阻碍。为解决这一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曾建议召开一次易北河流域所有城镇参加的会议，以扩大海外贸易，但这项动议提出后如同泥牛入海。此种各自为阵的割据局面，对普鲁士等大邦构成了巨大障碍，而对较小的邦更具有灾难性的影响。专制主义的邦国，其赖以为继的基础上诸侯与贵族阶级之间的妥协。因此，邦国所推行的社会政策必然具有保守性和复古性，对经济发展起的是刹车作用。

在萨克森，也有相似的旨在加速经济发展的温和措施被推出。1697 年，萨克森公爵"强者"奥古斯特成为波兰国王后，市场得到扩大，令巴伐利亚的制造业获得发展良机，在 18 世纪 40 年代以前取得过相当高的增长率。不过，粮食生产部门的情况相当糟糕，迟迟难以从三十年战争的衰退中恢复过来。大片土地因人口凋零而抛荒，土地往往被划分为小片农田，要么便是被并到了贵族的庄园。由于劳动力不足，导致工资上涨，地主遂加倍剥削依附于他们的农民以转嫁损失。在萨克森，尽管从法律规定上没有农奴，但由于以工资为生的农民被迫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合法权利被剥夺殆尽，所以究其实质，他们的真实地位并不多农奴好上多少。

在 17 世纪初期，巴伐利亚堪称德意志最近代化、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邦，



马泰斯·梅里安 1620 年创作的《希德尔贝格城堡》。这座城堡建于 1225 年，是帕拉丁选侯的住处，后来在 1689 至 1693 年间被毁坏。

但战争使它遭受重创：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约有 900 个城镇和村庄被毁。与萨克森相似，巴伐利亚的贵族阶级也利用有利之机增加自己名下的土地。经济恢复速度相当之缓慢，直到 1760 年，巴伐利亚的耕地面积仍未达到 1616 年时的水平。虽然它也想在重商主义框架下鼓励贸易和工业发展，但由于它推行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需要花费巨额开支保持一支常备军，所以这种努力往往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与上述诸邦相比，除波希米亚以外的哈布斯堡王朝属地遭受的战争损 [123] 失则要轻得多。不过由于历任皇帝的精力每每被王朝内部争斗、宪政危机、对外战争所牵扯住，所以很难腾出手来发展经济。事实上，奥地利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国人的进取精神。来自荷兰、意大利、英国等地的这些外国人，把奥地利视作充满希望的沃土，试图在这里发财致富。与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巴伐利亚一样，奥地利也需要保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常备军，因此也难以挪出钱来用于长期项目的投资。

在这样一段战事频仍、外交活跃的岁月里，社会政策显然无法得到足够重视。德意志帝国的四周，无论是土耳其还是瑞典、法国，都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强国，必须使它们相互牵制，才能保住一方平安。而在帝国内部，各邦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权力争夺。自 1653 至 1654 年累根斯堡帝国议会起，勃兰登堡—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更是就帝国的主宰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直到目睹了法国革命战争的灾难性影响之后，德意志的诸侯和政治家们才终于承认，惟有健康的经济、更加开放的社会，才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建功立业的根本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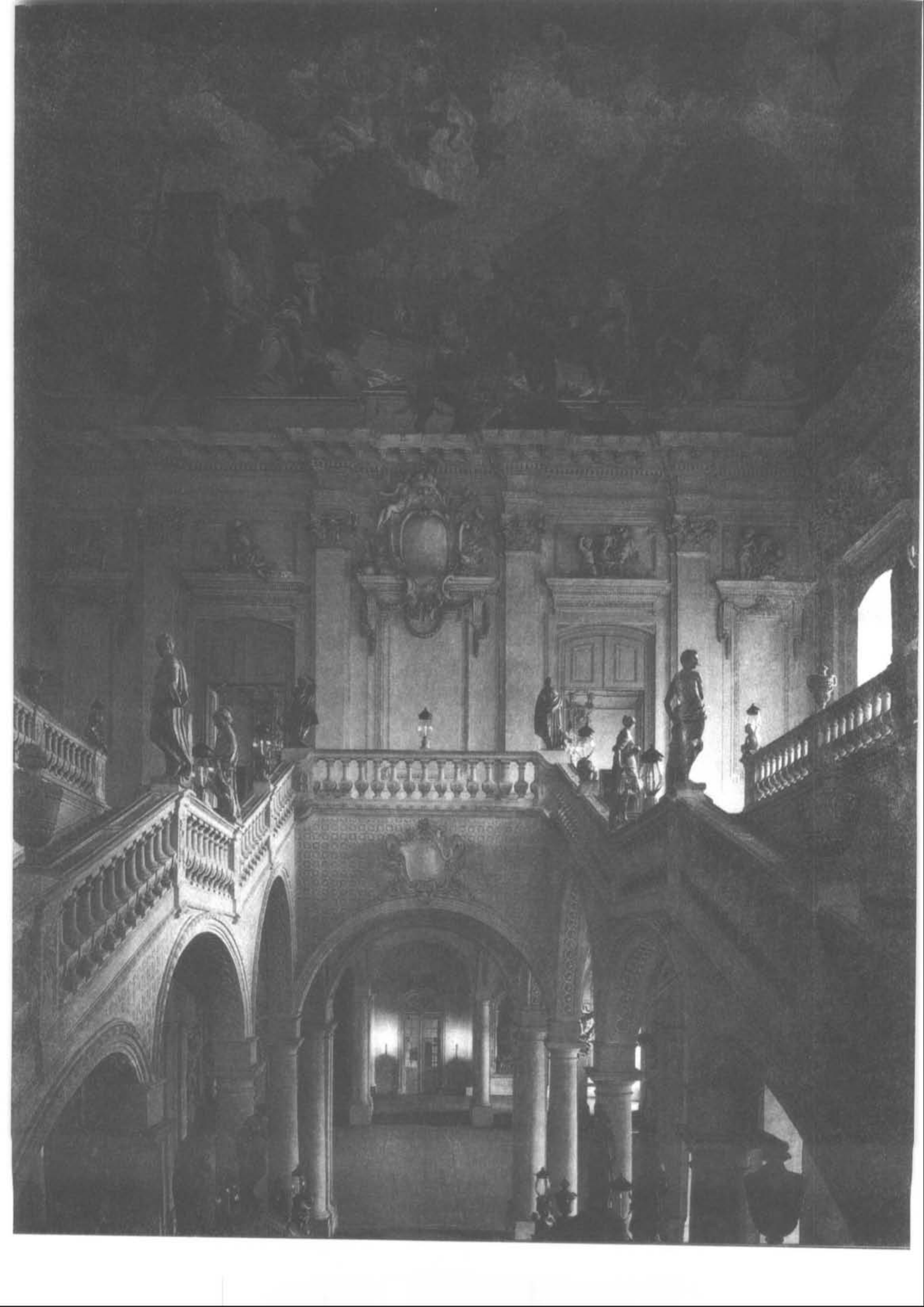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十八世纪

[124] 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四分五裂，数以百计的小邦国（据统计，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分裂为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可以说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也有不完全相同的统计数字——译注）中的地方诸侯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经济，防止境外力量渗透进来，由此对总体的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构成了严重的桎梏。不过，这种残破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其积极意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接受了宗教改革运动的事实，给予全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和加尔文主义者以平等的权利。"统治者决定臣民宗教信仰"（cujus regio, ejus religio）这一原则得到修正后，如果某个邦君改变了信仰，便不再意味着其臣民也必须如法炮制了。在帝国议会就宗教事务举行的会议上，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的提议都有可能被推翻；在这种情况下，则需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单独召开会议后，才能达成某种妥协方案。在帝国的其他主要机构中，新、旧教徒的人数也完全相等。虽然在宗教领域历经种种苦难之后，彼此还不可能彻底捐弃前嫌、彼此宽容，但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相比，德意志人无疑享有广泛得多的宗教自由。

立宪改革

过去几十年中很少召开会议的帝国议会，这时获得了一丝生命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凡条约中未予决定的宪法问题，均由帝国议会处理。该议会1653年6月30日在累根斯堡召开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立宪会议的意味，但却无法做出任何决议，而是陷入了不同邦国之间以及各邦国与皇帝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1654年初，德意志皇帝斐迪南二世关闭了帝国议会。从此以后，直到1663年才由他的儿子、继任帝位的利奥波德一世召开，原因是为了筹措急需的经费用于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帝国议会在累根斯堡重新召开后宣布不再解散，变成所谓"永恒帝国议会"，直到帝国在1806年解体。各个小邦均派代表参加这个议会，虽然无力阻止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强大邦国投入战争，但它毕竟提供为较小的邦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论坛，有助于它们化解歧见，并解决了数不胜数的冲突。可以说，累根斯堡是一个达成交易、缔结联盟、试探对方反应的场所。

[125] 第117页图：符腾堡兼任主教的邦君宫殿内金碧辉煌的楼梯，是由那一时代德意志最著名的建筑师巴尔塔扎·纽曼（1687—1753年）设计的，四周的壁画则是由吉奥瓦尼·巴蒂斯塔·蒂耶波洛（1696—1770年）于1750至1753年间绘制的。纽曼曾作为军队工程师为符腾堡兼任主教的邦君服务，但在一次造访巴黎后，转向了建筑领域，后来被任命为符腾堡的一位教授（建筑师）。



"永恒帝国议会"的大多数立法工作，都是为了解决涉及整个帝国的事项，如防务、造币、经济政策等。1731年，它通过了一项颇富进步色彩的法令，对禁止行业协会滥用权力起到了很大作用。1772年，它解除了对妇女参加某些行业工作的排斥性做法，并取消了对熟练师傅只能雇佣多少工人和学徒的数量限制。

帝国高等法院系帝国议会1645年建立的，一开始设在施佩耶尔，但为126了避开正在法耳茨地区大肆侵扰的法国人，后于1693年迁至韦茨拉尔。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规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该法院应有相同的代表人数。由于各邦不愿意为它提供足够经费，所以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往往久拖不决。1654年，有关成立上诉法院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不过为了把它建起来，整整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筹措到经费。当它真的建立起来后，效率也无法让人恭维。但不管怎样，上诉法院自1654至1806年间，处理了约8万个案件。从这个数字上看，如果人们提起诉讼的理由是正当的话，上诉中所花的时间和金钱还算值得。

设在维也纳的帝国法院也可部分代替帝国高等法院的职能。它是由皇帝而不是帝国议会设立的。尽管法院中也有6名新教徒任职，但由于所有法官均由皇帝任命，所以新教的邦国抗议说，该法院偏向天主教徒。但不管这些邦国如何抱怨，人们对它的好感要超过高等法院，甚至新教徒们也是如此。与高等法院相比，它的效率更高，作出判决所需时间要短上很多。它一般不受理不同邦国居民之间的争议，当邦与其侵扰的臣民之间发生争议时，它在判决中一般会偏向前者。

虽然上述这些法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它们毕竟为帝国提供了双重司法体制，其中一种在帝国议会之下，另一种在帝国之下，以保证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解决某些严重冲突，而不至于酿成暴力事件。这些法院以及各邦的较低级法院的正常运转，也是德意志从未爆发法国式的革命的一大原因。在德意志，既没有巴士底监狱被捣毁，也没有哪个君主被斩首。究其原因，是大多数人仍然相信，诉诸法律一途足以保障自己的公民权，而那些当权者为避免发生明显违反法律的情况发生，也必须做出必要的调整。换言之，如果人们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抱有足够的信心，便不需要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

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认可了介于较小诸邦与帝国之间的行政专区的地位，但在外国势力介入或德意志大邦推行各自利益时，这一级行政区划便会趋于萎缩。不过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等受到较小的邦欢迎的专区，它们仍能够行之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像法国的联合省、瑞士的州那样成为一级联邦机构，并被广泛视作联邦制度的一种范例。

设在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批准建立一支帝国的常备军(miles perpetuus)，并规定，各邦应分别为组建这支军队提供一支部队。虽然皇帝握有这支军队的统率权，但各邦国的主权地位则得到了强化：根据帝国的法律，

邦君们保有向其臣民征税以支付各自军队开支的权利，而且凡涉及军队开支和征税问题的诉讼不得提交各帝国法院。为了按照自己的意愿使利奥波德一世被选为帝国皇帝，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答应的条件是，帝国的法院从此以后不再涉及有关税收事宜的案件。为帝国军队召集部队的责任，由帝国行政专区负责。在那些无某个大邦居于主宰地位的专区，这项职能可以像联邦制度下那样得到有效履行。但在勃 127 兰登堡·普鲁士等由某个邦主导的专区，则变成了由较小的邦为其强大的邻邦的军队提供金钱和人力。由此，各邦之间出现了“有武装”与“没有武装”的分野；那些“有武装”的大邦的强势地位自然得到了大幅度增强，而利珀、帕德博恩等小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也多方筹集资金建立军队，从而加入到“有武装”的邦之行列。

帝国与各邦国的权力分野，有助于减轻专制主义倾向。由于人们的宗教信仰、财产权利受到帝国法院的保护，各邦君及其政府便不能漠视这些权利。反之，帝国政治制度如需进行大的变动，也必须征得各邦的同意。普鲁士的“士兵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688—1740）曾以其特有的德语、法语混杂的方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强化主权，使之稳如磐石。”（Ich stabilire die Souverainete wie einen Rocher von Bronce）但纵然他治下的普鲁士简直就是一个完全拥有主权的国家，但毕竟要受到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因素的制约，不会愚蠢地真去挑战皇帝的地位。

在许多天主教邦国，宗教迫害现象相当严重。在维尔茨堡，自 1731 至 1732 年间，便有 21000 名新教徒被驱逐出境。这些人逃到普鲁士后，在东普鲁士定居下来，投入到北方战争后的重建工作中。这项工作极其艰苦——在10年时间里，这 2 万多名移民中就有 25%的人死去。在德意志诸邦中，由于普鲁士人口中各种教派都有，所以它算是对宗教问题最宽容的一个，虽然它也未曾放松对教会的支配和影响。而大多数帝国城市，虽然它们后来曾被称作资产阶级宽容和理性精神最后的保留地，却独独在教派问题上缺乏宽容，这既包括居民绝大多数系新教徒的“汉萨同盟”城市，也包括奥格斯堡、拉文斯堡等新、旧教徒共同居住的南部城市；在这些城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规定的新旧教派相同代表权，不仅没有带来宽容和相互尊重，反而使两条阵线更加泾渭分明，双方暴力事件也频频发生。

勃兰登堡—普鲁士

在德意志诸邦中，普鲁士所具有的一些独特之处，令其存在着有别于其他诸邦的某种特性。1613 年，路德派的选侯约翰·齐吉斯孟特皈依加尔文教，在其臣民中极其不得人心。因此，他被迫承认了路德派教会的权利，而普鲁士也因为这个原因，不再需要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了。在军官团、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贵族，依旧是路德派教徒，而法院以及城市中

等阶级的很多人则是加尔文主义者。一方面是居少数地位的加尔文派教徒，另一方面是受到庄园领坚定支持的、居多数地位的路德派教徒，双方要避免冲突，只有宽容这一条路好走。大选侯（指 1640 年即选侯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其加大选侯头衔的时间，一说是 17 世纪 40 年代末或 50 年代初，一说是 1675 年——译注）虽然是加尔文教徒，但也充分认识到了宗教宽容的重要性。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坚持思想自由原则，而是出于现实 [128] 政治生活的要求。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 年，亦称“腓特烈大帝”）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则比其他任何一个德意志邦君更直截了当：他宣称：“假如土耳其人或异教徒来到这里，想在这片土地上居住，那么我们也会为他们修建清真寺或教堂。毕竟，每个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不过，这种认识与持开放思想的自由派所主张的宽容并不一致。正是因为在普鲁士，宗教自由是自上而下的赐予，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获得的，所以它后来不曾像英格兰或荷兰那样，为个人自由而进行长期的奋争。

在普鲁士的所有新教徒中，也许最具影响力的是虔敬派（路德宗的一派，主要领袖有斯彭纳尔和弗兰克——译注）。虔敬主义起始于三十年战争时期，它反对其他教派的盲从和相互倾轧，强调“内心的虔敬”、生活简朴，主张个人与上帝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该教派的主张，与普鲁士所倡导的纪律、节俭、责任观念、谦虚、勤勉、社会义务等美德，可谓严丝合缝，从而为普鲁士建立一个专制国家提供了宗教保证。

法国于 1685 年彻底取消了《南特敕令》（该敕令是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法令，给予胡格诺派教徒政治上一定的权利。其被路易十四撤销后，彻底取消了对新教徒的宗教宽容，导致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迁徙到荷兰、英国，甚至南非——译注）。作为回应，大选侯颁布了《波茨 [129] 坦敕令》，欢迎遭受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移居普鲁士。此后，约有 1.5 万人响应这项邀请，对普鲁士的经济和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举列来说，根据选侯妃索菲娅·夏洛特（Sophie Charlotte，1668—1705 年，“士兵王”之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母亲，出生于汉诺威王室，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妹妹，长期受法国文化熏陶——译注）和大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提议建立起来的柏林科学研究院，其创始人中的 1/3 来自法国。又如，1689 年在柏林建立的名为“皇家学院”的法语学校，是普鲁士首屈一指的学校，精英阶级的后代们都在这里以法国传统的方式求学。

不过，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艺术和科学不感兴趣。直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继位后，由于他轻视德意志文化，对法国文化却敬仰有加，才使柏林科学研究院获得活力，并任命了法国数学家莫佩尔蒂担任院长，德·阿莱姆伯特、孔多塞、狄德罗也加入了科学研究院。1743 年以及 1750—1753 年间，伏尔泰两次应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邀请去柏林生活。这些移居普鲁士的胡格诺派教徒，对编写洋洋大观的法国百科全书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

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这些人士的政治观点持严重保留态度，但对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仍勉励有加。

易北河以东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容克（贵族地主），由于拥有大片由农奴们耕种的土地，在16世纪曾因农产品价格攀升而获利甚多。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们握有治安权、司法权以及对教士的任命权。由于大选侯成功地迫使勃兰登堡邦议会接受了自己的“军事税”方案（指1653年大选侯与容克之间达成的“勃兰登堡邦议会协定”。容克贵族同意，为维持和装备常备军，选侯可以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增加税收即军事税，包括金钱和实物；同意建立一支常备军，承认选侯为其最高统帅。此项协定得到西部领地贵族的认同，但在东部领地，大选侯同贵族们的斗争特别激烈——译注），因此已无需与容克们就增加税收问题作进一步的商谈。但大选侯旨在迫使东普鲁士庄园领主们接受类似协定的企图失败了。1661至1663年的“长期邦议会”和1669至1672年的第二届邦议会，均拒绝批准增加税收提议。1662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率领军队开进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城市贵族同盟的领袖耶罗尼莫斯·罗特被投入监狱，并在从未举行审判的情况下一直在狱中关押至死。1672年，贵族反对派领袖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冯·卡尔克斯泰茵上校前往华沙，争取波兰贵族阶层的支持时，遭到绑架后被拷打和处死。1674年，大选侯开始强制在柯尼斯堡强制征税，而1704年后，已无需征求庄园领主的意见即可在东普鲁士征税。贵族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

1701年，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获得了皇帝利奥波德的准许后，得到了“普鲁士的国王”头衔（弗里德里希一世）。但普鲁士公国（即稍后的东普鲁士）位于帝国疆界之外，因此弗里德里希只能是普鲁士的国王，在帝国里仍然只是一个选侯(“普鲁士的国王”，König in Preuβen，此头衔只适用于普鲁士地区。到18世纪弗里德里希大王时期，才改称“普鲁士国王”，König von Preuβen，成为包括勃兰登堡在内的所有领地的国王——译注）。如果说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期，普鲁士有可能会仿效法国的专制政体，并把那种贵族化的华丽宫廷生活照搬过来，但到了他那生性吝啬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登上王位后，却更喜欢军营式的简朴而不是凡尔赛宫的华美气派。这位“士兵王”通过向贵族们征收土地税来供养军队，采取的方式是收取金钱而非要求庄园领主服兵役。由此，国王与贵族阶层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双方才认识到了彼此的共同利益：贵族们需要国王来保障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对付越来越活跃的资产阶级的挑战，而弗里德里希二世也需要贵族阶层充实军官团。1752年，他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强调指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维护 [131] 贵族的利益。为此，他规定任何资产阶级人士不得购买贵族的庄园。与其父亲的政策不同，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再收购贵族的土地，也很少把爵位授给资产阶级。他允许贵族们在自己的庄园里自行其事，如果遇到困难，还

130

桑苏西宫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是一个出色的军队统帅、一位才思敏捷的作家、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男士。他希望自己在每个方面都能做到尽善尽美，既是一名战士，又是一位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像伏尔泰或莱布尼茨那样的学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评价大选侯（1620—1688年）时，认为他虽然给国家带来了所有必需的工艺，但因时间限制，无法给国家带来美妙的艺术。如果说，挥霍成性的弗里德里希一世（1657—1713年）把普鲁士变成了雅典，弗里德里希·威廉（1688—1740年）把普鲁士变成了斯巴达，那么，弗里德里希二世想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所以，他在波茨坦把桑苏西宫（普鲁士王宫，一译"无忧宫"——译注）变成了雅典，而在军营则完全是斯巴达式的风格。

在担任王储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便经常在自己位于莱茵斯贝格的乡郊庄园招待友人和熟人。在担任国王后，他保持了这一传统，1745—1756年间把招待地点换成了洛可可式风格的桑苏西宫中的小餐厅。餐厅里，弗里德里希二世选用的一幅油画，曾令伏尔泰感到非常吃惊：萨梯（希腊神话人物，森林之神，具人形而有羊的尾、耳、角等，性嗜嬉戏，好色——译注）和仙女（nymph，希腊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译注）们被夫妇、爱神丘比特、娈童癖者簇拥着，整幅画弥漫着浓浓的淫荡气息，会令造访的观众觉得"希腊的七贤士进了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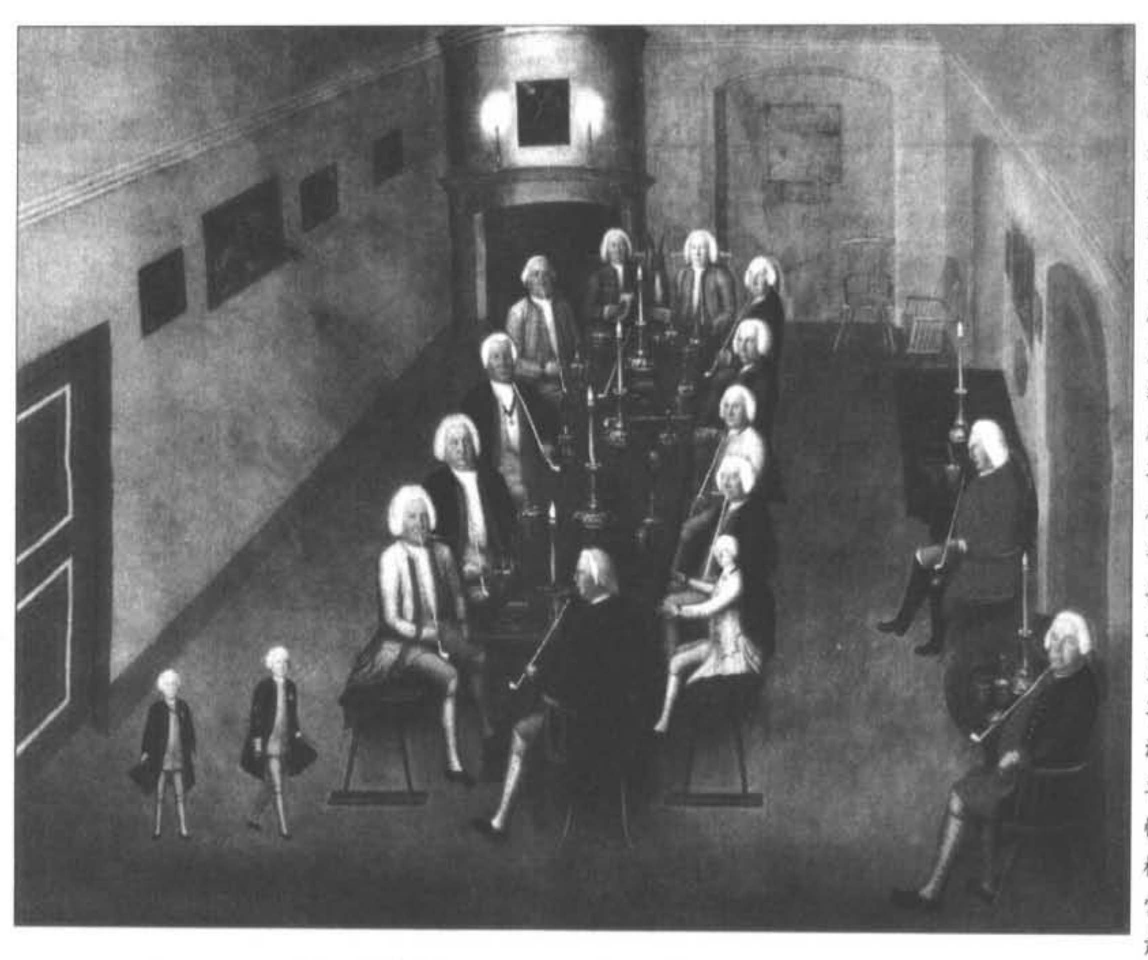
在桑苏西宫，国王与宾客们轻松自在地就各种话题展开谈论。睿智而酷爱讽刺的伏尔泰，对这位年轻的国王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其对一切哲学体系均持怀疑态度。桑苏西宫的谈话生动有趣，国王和宾客们全部使用法语交谈，除了上帝之外，一切人和事都难逃他们的讽喻。阿道夫·冯·门采尔于 1850 年创作的《桑苏西宫的桌边谈话》这幅生动作品，为我们展现了这样的场景：伏尔泰正在对半信半疑的弗里德里希讲述着什么，而柏林科学研究院院长莫佩尔蒂则以挑战的目光看着伏尔泰。在这样一幅虚构的作品里，国王根本算不上中心人物，但它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事实上，弗里德里希根本不允许人们对他本人提出批评。莱辛曾尖刻地指出，在普鲁士，人们享有的惟一自由只限于他们有权就宗教问题说一些漫无边际的废话。

桑苏西宫的座上客中，其他著名人物还有：极受欢迎的《给太太们看的牛顿》一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拉·梅特里（《机器人》作者，后因一次食用了过多磨菇而丧命）、让·巴蒂斯特·德·阿尔让斯（此君对宗教的罪恶进行了猛烈谴责）。

到 1763 年以后，弗里德里希心情越来越苦闷，因不喜与人交往而陷入了孤独状态，出席国务会议时显得无精打采。许多知识分子都宁愿对这位哲学家国王敬而远之，而不愿接受他的邀请造访柏林。弗里德里希已无法再现昔日华宴的盛景，但回忆起桑苏西宫，仍能激起他的一丝快乐心情吧。



阿道夫·冯·门采尔于 1850 年创作的《桑苏西宫的桌边谈话》。图左第三人为伏尔泰，左五为弗里德里希大王。



乔治·利西维斯基于1738—1739年绘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烟草会议”。这位被同时代人称作“下士国王”的普鲁士国王，厌恶法国式的巴洛克风格宫廷的繁文缛节，只有在这种出席者均为男性的“烟草会议”上才最为自在。在与文职官员、军官和邀请与会的其他人士商讨当天工作的枢密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他身着军服，抽烟斗、喝啤酒，吃的东西非常简单。利西维斯基的这幅画作，以简洁的风格，刻画了“士兵王”宫廷生活的简朴、严肃和军事化特点。

要慷慨地提供大笔贷款，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普鲁士贵族阶级守纪、服从、富有效率，这些都是军事美德的集大成 131 者，但这些贵族对自己的地位都很傲慢。尽管他们自己经营庄园的方式接近于商业企业，向外国出口农产品、酿造啤酒和勾兑烈性酒，但对中产阶级的贸易和商业社会却不屑一顾。容克所拥有的庄园，俨然是一个自治的政治、经济体，容克成为全权的家长制统治者，而主人与农民之间的社会身份鸿沟是永远无法跨越的。这套制度虽然颇富效率，但它有意识地阻绝了政治和社会近代化的道路，并拒绝接受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价值观念。因此，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均无缘以任何方式参与国家事务。

在18世纪，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都因为采购奢侈品，掏空了经济。与之不同，普鲁士突出强调农业、外贸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虽然在许多邦国，建造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式宫殿，会令工匠、技师、珠宝商和银行家们都从中获利，会令首府显得一片繁荣，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固的经济支撑，是注定不能成为强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甫一登上王位，便下令逮捕了柏林首屈一指的珠宝商兼银行家弗劳·利别尔曼，并强令王室以一种近于病态的简朴方式节约每一份开支。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生前从利别尔曼那里借了大笔债务尚未归还。

普鲁士军队根据1733年的“征兵区规则”召募新兵。据此，普鲁士全境被划分为一系列征兵区，分别负责向对应的团提供补充兵员：一个步兵团的编制为5000人，一个骑兵团则为1800人。征兵区内的每一个年轻男子都登记在该团花名册中，在宣誓效忠于国王后审查能否入伍。由于城市资产阶级和有财产者一般被免于服兵役，所以大多数士兵都出身农民。至于军官，绝大多数是容克。从征兵制实行后，普鲁士禁止贵族在外国军队服役，贵族子弟们年满12岁后必须到柏林的预备军官学校念书。事实上，很多贵族子弟是在警察的陪同下前往柏林的。

由此，庄园中的地主与农奴的关系，又被复制到了军队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政治遗嘱》中要求后继者“在军队里任用贵族和廷臣，让他们的后代进入军校，以便让所有贵族从孩提时代就知道，只有上帝和普鲁士国王才是他们的主人”。这套军事体制运转到1740年时，已使弗里德里希二世拥有一支8万多人的军队。与之相比，与普鲁士竞争的奥地利[132]拥有11万军队，但其居民人数两倍于普鲁士。同时，它还把农民与贵族的社会地位牢牢固定下来：前者被置于双重奴役制度之下，而贵族们则作为享有特权的精英，享受国王的恩惠。

虽然这一时期的普鲁士，已经成为一个官僚体系高效、诚实、经济健康发展、法令畅通的近代国家，并拥有一支颇富战斗力的军队，但它的社会却陷入僵化状态，几乎绝对不可能为自由民主力量的发展提供动力。所以，它是一个专制的、官僚化的、家长制的国家。农民阶级遭到压制，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贫困和被剥削，而是由于历史积习造成的奴性，使他们不可能表达自己的要求、痛苦或获得解放的诉求。

而在城市，情况则大不一样。资产阶级基本上被免于服兵役，因此可以腾出手来赚钱，或者跻身于上下各级的公务人员队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像英国、法国那样通过捐钱获得贵族头衔。弗里德里希二世禁止富有的资产阶级购买贵族庄园，尽管这条禁令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名无实。由于军官团和政府职务只限贵族阶层充任，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差别更大了。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固然可以变得更富有，但也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社会地位卑下、缺乏政治权力。

18世纪的德意志社会

18世纪，德意志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上升。妇女们的结婚年龄提前了，因此法律和宗教传统所允许的合法生育期也延长了。大多数家庭都是间隔两年半的时间生育一个孩子，但每个家庭能长大成人的子女平均只有两个。约有1/3的新生儿无法成活，而在许多地区，70%的孩子在年满14岁之前便死去了。这段时间固然没有爆发严重瘟疫，但与其说这是因为公共卫生体系获得了改善，不如说纯属运气不错。城市街头肮脏不堪，尤其

133

宫 殿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全德意志有权向帝国议会派驻代表的邦有250个。这些邦的邦君都建有宫殿，只是奢华程度有高有低而已。此外，一些有一定财力的帝国骑士庄园主，也如法炮制建造宫殿。与之相似，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的住所也是富丽堂皇。这些人之所以获得职位，并非出于具有多少美德或宗教热情，而是来自王室的封赐。他们在住所中并不排斥女性的陪伴，而是将异性视作自己类似于宫廷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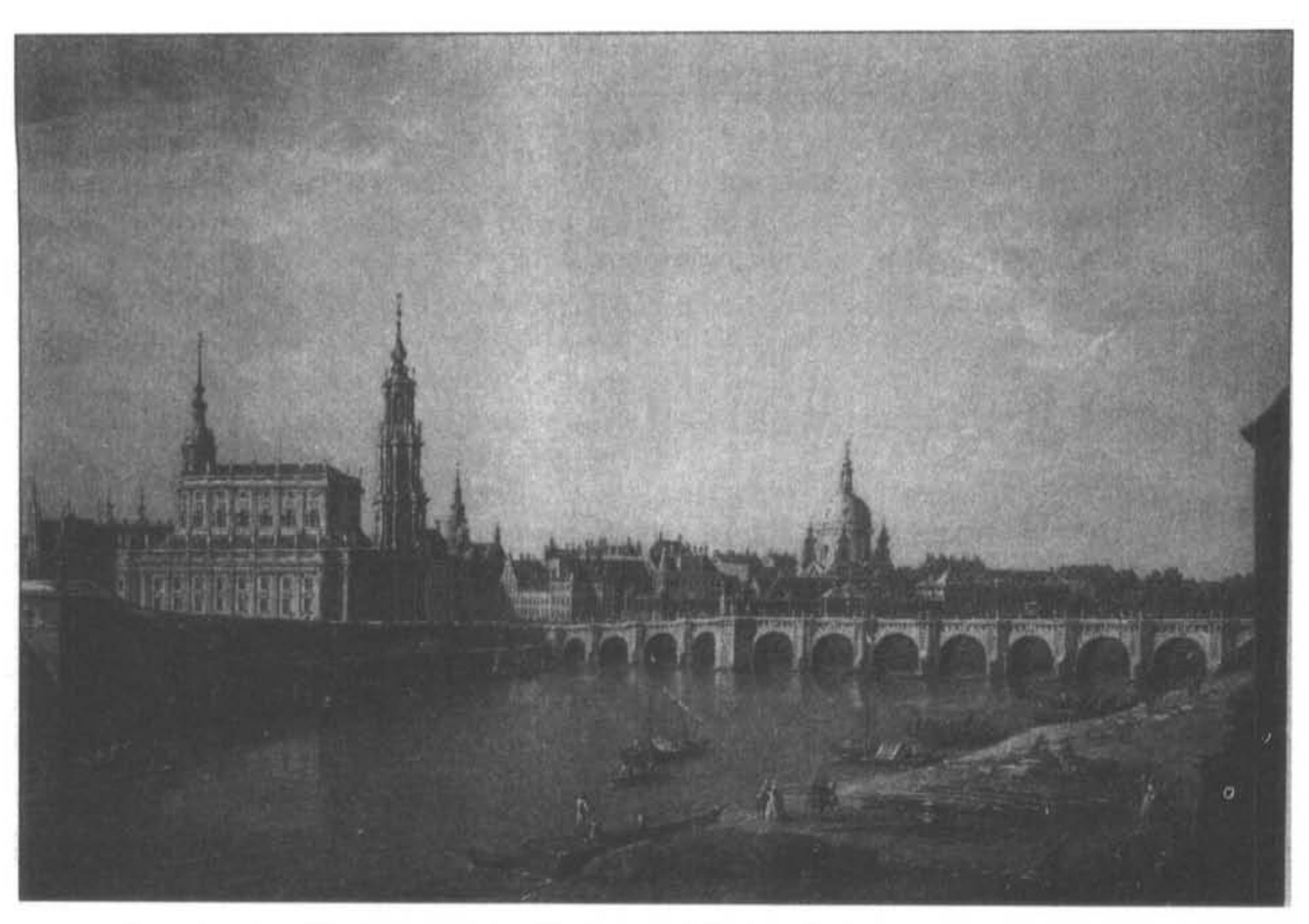
各邦的宫廷结构大同小异。除了传统上的枢密顾问之外，新教的邦设有宫廷告白官，天主教的邦设有宫廷牧师。至于医生、艺术家、建筑师、园艺师、乐师、戏剧导演、驯马师、历史学家、警卫、游戏安排者、仆人、侍从官等在宫廷谋生的人，虽然一个个顶着听起来很响亮的官职和头衔，但其实都只是宫廷中的家仆，而且他们获得的报酬并不高。邦君们的配偶以及他们的子女，也有自己规模稍小的住所，并配有侍女、家庭教师、督导员。

宫廷中的一切，都要围绕邦君这个中心而展开。当邦君外出旅行时，宫廷中的大多数人都要陪同。场面宏大的宫廷仪式，有助于巩固邦君的地位，并使廷臣们各守其职，从而起到体现和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些仪式体现社会价值观和时尚气息，并对行为准则作出规定。宫廷举行的极尽奢华的仪式，需要动用当地的技师和艺人，由此可以带动奢侈品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通常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因此会受到经营它们的邦君的鼓励。以腓特烈大帝为例，虽然其在晚年的"一毛不拔"之名声闻名遐迩，但仍然会抱怨他的父亲的一个做法不当，即强迫迈森瓷器业的创始人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迁往德累斯顿。

到了18世纪末，围绕宫廷生活的那些造价不菲的典礼、劳师动众的军事游行，以及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轻佻的言行举止，将成为当时的批评家和评论员大加讥讽的话题。不过，虽然很多邦的宫廷生活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但也有一些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例如曼海姆和魏玛。各邦的宫廷为建筑师、艺术家和风景－园艺师们提供了资助，由此诞生了诸多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的杰作。宫廷被视作令人兴奋而充满活力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可以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甚至像莱布尼茨那样富有批判精神的人，也认为宫廷生活在一个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宫廷，任职于其中的那些艺术家等将变得身无分文。



J·弗朗茨·卢梭1780年绘制的《马克西米连大公抵达驻地宫殿》。



安东尼奥·德·迪皮·若利（1700—1777年）绘制的德累斯顿远眺图。

令过路的人无法接受的，柏林的王宫外面，也经常看到一堆堆的人粪。很多人患上天花，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死因。另外一个常见的死因是呼吸类疾病，特别是结核病和斑疹伤寒症。至于新生儿的高死亡率原因有二，一个是常发的传染病，另一个大多数系在家中生育。

尽管不合法生育遭到社会排斥，在许多地区未婚母亲会遭到当众鞭打，但这种生育现象仍然非常普遍。直到18世纪末，在新教徒的柏林仍约有10%的生育不合法，而在天主教徒的慕尼黑，这一比例则高达约20%。在农村地区，不合法生育现象可得到更多的同情，但其占总生育数的比例仅为1/16。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随着法律对结婚的限制趋于减轻，非合法生育的数量将大幅度减少。

在18世纪，贵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大多数贵族把自己 134 的头衔归功于所在邦的邦君而不是德意志皇帝，但也有一些地区的贵族直接认同于皇帝，这在西南德地区尤其如此。由于在帝国议会中，每个邦国和公国都各有一票，所以后一种情况的贵族在议会也有自己的代表。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特权，贵族们总是与身份相同者通婚，因而比起英国的贵族，其挑选的范围要狭窄得多。因为他们无法与富有的平民通婚，所以一般要比英国的贵族更穷一些。

教士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在由邦君和公爵兼任天主教主教的

邦，教士们都是贵族，而且很多人是帝国骑士。虽然特兰托公会议上已做出了进行改革的决定，但大多数教士仍兼管若干个教堂。这些人中间几乎没有几个受过任何宗教理论培训，甚至不少人连洗礼都没有接受过。有些忙于俗世事务的邦君，会把教会的事务交由一位副主教办理。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农民家庭的子弟，如果受到正规的宗教学培训，可以担任小教区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甚至在某些大教堂供职。例如在科隆大教堂，1/3 的教士席位留给获得过宗教学博士学位的平民。至于级别较低的教士，大多数都来自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家庭。

新教地区的教士，基本上来自资产阶级。由于他们都是来自子女众多家庭的已婚男子，故而可以为教众树立牢固家庭生活的榜样。这对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教的教士承认邦君为“大主教”（summus episcopus），在讲道坛上宣读邦君的敕令，在布道时要求信众服从当局，对各邦国可发挥重要作用。与之不同，天主教的教士则富有怀疑精神。可以想见，二者在政治上所起的影响必然大相径庭。 135

18 世纪的德意志，贫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据估计，约有 20% 至 25%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教徒们听到消息说，天主教的邦中 25% 的人口生活在赤贫状态，会情不自禁地摇头叹息。但被他们遗忘的一个事实是，在七年战争结束时，柏林有 30% 的人要靠领取救济过活。人数众多的乞讨大军，并不全部来自社会的最低阶层；那些背运的贵族、失业的官员、破产的资产阶级人士，也会与来自社会低层的成千上万流浪汉一样，走向德意志的大街小巷乞讨过活。



贝尔纳多·贝洛托 1765 年绘制的十字架教堂（Kreuzkirche）废墟。该教堂在 1760 年被普鲁士军队炮火严重毁坏，主楼于 1765 年倒塌。贝洛托（1721—1780 年）的叔叔卡纳列托（1697—1768 年，意大利画家——译注）是当时最著名的地市地貌画家。

18世纪的德意志，城市生活日益陷入了停滞状态。如果要获得根本的改变，除了接受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强烈刺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在政治上，权力被贵族家族所把持；在经济上，行业协会享有的种种特权，令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甚至在德意志所有城市中最富自由色彩的汉堡，在这个骄傲的中产阶级拒绝允许贵族拥有财产的城市，其居民也被划分为9个阶级，每个阶级享有的法定权利都不相同，而规定不同社会阶层应穿着不同服饰的所谓节俭法规，仍赫然出现在成文法令中，只是人们越来越漠视它的存在罢了:在宫廷生活的引导下，洛可可风格的时尚、对法国生活方式的迷醉，已开始超越法令中对衣着的身份认定。

136 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来说，18世纪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作黄金时期，如果他们不曾因为贪婪和纸醉金迷而浪费机遇的话。究其原因，在于这既是一个近代化庄园管理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放荡成性、投机成风的时代。除了东部和东北地区之外，现金借贷关系在许多领域取代了劳务与实物支付关系。由于三十年战争对农业的严重破坏，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容克们把农民驱逐出份地的现象愈演愈烈，而庄园主拥有的免税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令大量自耕农变成了庄园里的农奴。这些世代在容克庄园耕作的农奴，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话说，与奴隶没有什么两样。与西部领地的农民相比，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奴不仅政治地位低下得多，而且经济条件也很差。虽然西部领地的农民也普遍陷入贫困和被剥夺境地，但他们与法国或德意志东部的农民相比仍然自由得多，并且拥有较多的财产。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对德意志未产生大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东部的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地区，农村形势发展之糟糕，致使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暴动。虽然一些富有改革精神的行政官员，例如西里西亚的恩斯特·威廉·冯·施拉布伦多夫等，也曾付出大量努力，但究其结果，却是农民出于过高期望而发起暴动，或者是因当地贵族的抵制无功而返。弗里德里希二世有关“保护农民”和发展农业的努力，也因当地贵族的抵制以及农民自身的狐疑而未能奏效。倒是在王家国有地上，这位国王取得了很大成功：劳役从每周5天减为3天，5万户农民成为拥有自己的耕地而不单单是拥有使用权的自耕农。

王家国有地的相当一部分被租让出去，其中大多数被资产阶级的农业企业家租走。虽然国王要求官员确保这些租让土地在获得高额回报过程中，不得损害农民的利益，但租赁者大多是既有高度经营能力又对利润疯狂追求的商人。他们还通过购买贵族庄园地，赚取了可观的财富，虽然这种做法是官方明令禁止的。王家国有地的租让者一般都拥有充足的资本和技术，与贵族庄园的那些死板规定和法律限制不同，他们往往会对农场进行近代化改造。因此，在这个传统的贵族社会里，也存在着近代化的因素。

很多容克庄园则负债累累。虽然在18世纪的后30年时间里，庄园的

价值大幅度攀升，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也比工业品价格高出许多，但容克们的债务负担却加重得还要快。至于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财产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值。为帮助贵族地主对庄园进行近代化改造，弗里德里希二世向他们提供了贷款，但这些钱往往被贵族们用于进一步的投机，开办大型的典押行。因此，旧的体制已无法通过改革予以转变，而只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但一直要到普鲁士 1806 年惨败于法国人之手，才令普鲁士贵族阶级认识到，打破旧的结构已势在必行。

137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若干年中，德意志许多邦的封建义务负担都有所减轻。在巴登，马格格夫·夏尔·弗里德里希先后于 1773 年和 1786 年两次减少劳役时间，并于 1783 年废除了农奴制。但即便是在巴登，农民仍然要承受劳役重担，并接受对其迁徙自由权的限制。1785 年，农民们获准用钱赎买自己摆脱这些封建义务，但真正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微乎其微。巴伐利亚 1779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王家国有地上的农民可以通过支付补偿金的方式成为自耕农，但能交得起钱的人寥寥无几。

在工商业领域，情况也好不上多少。学徒在干满 2 至 6 年后，可以成为熟练工。而要独立从业，必须完成自己的“代表作”（为取得师傅资格而交行会鉴定的手艺品——译注），并交纳一笔不菲的金钱才能提交鉴定。在很多情况下，学徒必须拥有一定价值的自有财产，才能被行会所接纳。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很少，因此对于熟练工来说，几乎只有一种办法能使自己成为师傅，那就是等师傅去世后娶师傅的遗孀为妻。诚如此，在很多地方，超过 1/3 的男子娶了比自己年龄大上许多的女人为妻，也就不足为奇了。学徒和熟练工的待遇往往很差，为了抗议非人道待遇，罢工和暴动屡屡发生。1793 年，为了镇压布雷斯劳的裁缝罢工，当局调集了军队，致使 27 人丧生。虽然德意志帝国的法令对学徒关系作了规定，但行会往往置之不理。

在 18 世纪后期的德意志，主要存在三种生产方式，第一种是手工作坊，第二种是工人在家中进行的简单加工，第三种是工场。其中，纺织业和制衣业主要在手工作坊开展。所谓工场，是不受行会监管的、有一定规模但仍未进入工业时代的企业。它们或者由某个资本家拥有和管理，或者由国家掌管，工人挣一份工资为生，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与工场不同，工厂则使用机器设备。在德意志，第一家工厂是 1784 年才在杜塞尔多夫附近出现的，系一家使用英国机器的压棉厂。直到 1800 年，德意志各地超过 1000 家的工厂所雇用的工人，仅占工人总数的 7%。如果考虑到许多邦在重商主义驱使下，鼓励制造业的发展，这个数字就显得更低了。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当属莱茵兰：克雷费尔德、杜伊斯堡等城镇都已发展成为重要制造业中心，佐林根的钢铁业也开始在整个欧洲具有影响。在这里，富有冒险精神的制造商们可以免受政府管理和专制主义制度的干扰，因而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发展工业。

反过来，虽然德意志各地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但在当时的欧洲，能够像它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重要中心城市的，只有意大利可与之相比。这些中心城市中，既有慕尼黑、德累斯顿等邦首府，也有波恩等大主教兼科隆选侯的宫廷所在地、美茵茨等拥有大教堂的城镇、纽伦堡等帝国早期城市、汉堡等富有资产阶级聚居中心，还有哥廷根等大学城。与意大利相 138 似，这种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也应归因于政治生活的松散化和专门化。帝国并未设立像伦敦或巴黎那样的首都，皇帝系在法兰克福加冕，但一般住在维也纳。自1663年帝国议会在累根斯堡举行会议以后，帝国宫廷设在维茨拉尔，而首相住在美茵茨。虽然当时很多人对不设首都城市怨声载道，但正因为此，德意志才拥有了数量众多、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心城市，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文化成就，充满自信的中产阶级也在这一环境下逐渐发展起来。

音乐与文学

当玛丽亚·特蕾西娅登上哈布斯堡王朝帝位时，维也纳作为伟大的音乐中心的地位已经开始下滑。这位女皇毫无耐心举办规模宏大的宫廷盛会，而巨大的战争开支也要求她节约行事。因此，她拒绝为年轻的莫扎特提供一个职位，还警告自己的儿子费迪南大公不得任用他：“我实在难以想象，你为什么一定要雇用一个作曲家或者其他什么毫无用处的人……这种人东游西逛像个乞丐，摆出的架子倒像这个家族的一部分。”1743至1778年间，在卡尔·西奥多尔担任帕拉丁选侯期间，曼海姆是德意志的主要音乐中心。卡尔·西奥多尔保持有一支大型管弦乐队、一家戏剧公司、一个多达100多位舞蹈演员上台表演的芭蕾舞团，并雇用了两位音乐主管，其中一位负责法语剧目，另一位负责意大利语剧目。英国音乐学者查尔斯·伯尔尼（此人对德国音乐的评价不高）曾经这样评价这支曼海姆乐队：它汇集了一批天才的独奏家和作曲家，但这支乐队像是一支纯粹由将军们组成的军队，更适于制订战役计划而不是进行一场战斗。这支乐队的领导者、曼海姆学派的创始人，是精通小提琴琴艺的安东·斯塔米茨（1717—1757年，捷克作曲家、小提琴家、指挥家，1745年起领导曼海姆 140 宫廷乐队——译注）。乐队的其他主要成员包括：斯塔米茨的两个儿子安东和卡尔，弗兰茨·夏维尔·里希特，伊格纳兹·霍尔茨鲍尔，安东·菲尔兹，卡洛·托埃斯奇，克里斯蒂安·卡纳比希。曼海姆学派对音乐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于建立了近代管弦乐队模式，乐队由第一小提琴手操控，通常是用他的乐弓，而不是由大键琴手引导。该学派的音乐家们还发展了奏鸣曲形式，并首开古典交响乐之先河。曼海姆风格的音乐讲究中庸之道，成员来自欧洲各地，每个人都对创造出新型的音乐语言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1685 年 3 月 21 日出生于图林根的埃森纳赫，其父亲是当地的一位乐师。17 岁时，他在魏玛公爵的乐队得到了一个"侍从一乐师"的低级职位，尔后不久到一所不大有名的教堂担任独奏，但并不重视自己的任务，还与合奏者和乐师们争吵。1707 年，他转至图林根的缪尔豪森教堂，但又与仅仅要求最浅显音乐形式的虔敬派大臣进行争论。第二年，他被魏玛公爵延请为管风琴师，公爵高度欣赏他的才能，巴赫也在这里迎来了自己音乐生涯的黄金时光。此间，他创作了自己的一批最优美的作品，包括前奏曲与赋格曲、托卡塔（键盘乐曲，指利用乐器惯用的风格上的要素而创造的一种即兴演奏——译注）与赋格曲、幻想曲与赋格曲，以及富有创新和自省精神的前奏曲等。

由于未被任命为首席乐师，巴赫产生了离开魏玛的想法，遂接受了寇顿大公利奥波德的邀请。魏玛公爵以其违反契约的罪名把他投入狱中，关押了 4 个星期后才解雇了他。到了寇顿后，他的生活很愉快，并迎来了艺术创作的丰收季节，直到这一切被妻子的突然去世打破。妻子死后，为他留下了 4 个儿女。第二年，他与时年 20 岁的安纳马格达莱纳结了婚，后来与她生育了 13 个孩子，但只有 6 个有机会长大成人。

之所以被冠以"勃兰登堡"的名称，是因为勃兰登堡边疆伯爵非常仰慕他的才华，巴赫遂将此乐谱献给了他。巴赫的大多数拨弦古钢琴曲和室内乐，都是在寇顿期间创作的，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部。与在魏玛期间一样，他的作品博采众长，既有意大利学派尤其是维瓦尔第风格的激情，又有法兰西学派发明的强烈节奏美，以及德意志本土复调作品的那种复杂性的多重思维。

1722 年，巴赫来到莱比锡，担任圣托马斯教堂合唱指导。这是一个地位很高但工作相当繁重的职务。在来到圣托马斯教堂的第一年里，他就为教堂的新年弥撒创作了约由 6 节康塔塔（大合唱）组成的一部完整乐曲。据传他曾创作过 5 部这类乐曲，但大多数曲目都失传了。巴赫还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到多个地方旅行，花费大量时间与友人们弹奏、组织音乐会，甚至还有精力与自己的雇主争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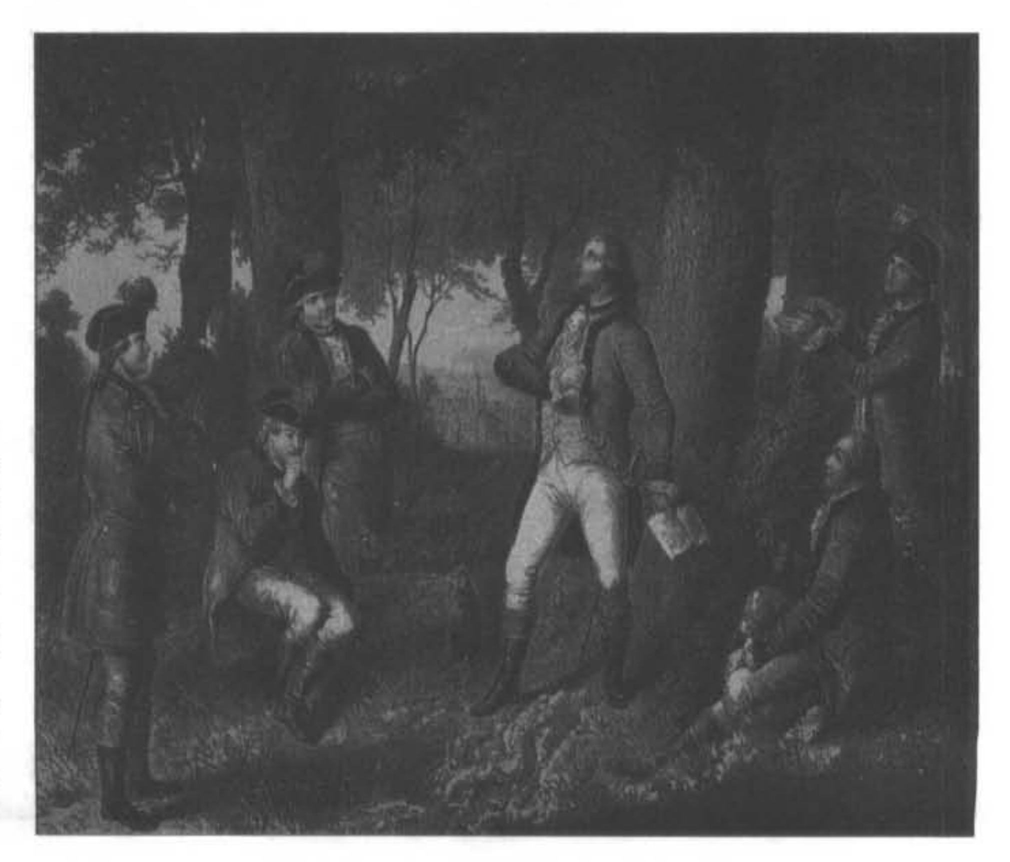
在莱比锡期间，巴赫最杰出的代表作是 1727 年创作的《马太福音书耶稣受难乐》。《受难乐》中，他自由地采用了世俗的民歌旋律、舞蹈性曲调、标题音乐的技法、音画式的描绘，以及庞大的表演方式，体现了鲜明的个人特点。1741 年创作的《哥德堡钢琴变奏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音乐"遗嘱"：它以相同的低音模式为纽带，把各种不同音乐风格的 30 部变奏曲汇集在一起。同年，他为腓特烈大帝创作的《音乐的奉献》，也是一部集多种格于一体的杰作。18 世纪 40 年代，他完成了《赋格的艺术》，使他被后人誉为赋格体音乐的集大成者。他创作的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天主教弥撒曲，但从来不曾准备公开演奏它。虽然同时代的许多人认为巴赫的风格陈旧，但在他创作的一系列无与伦比的杰作中，却汇集了不同艺术风格，洋洋大观，令后人叹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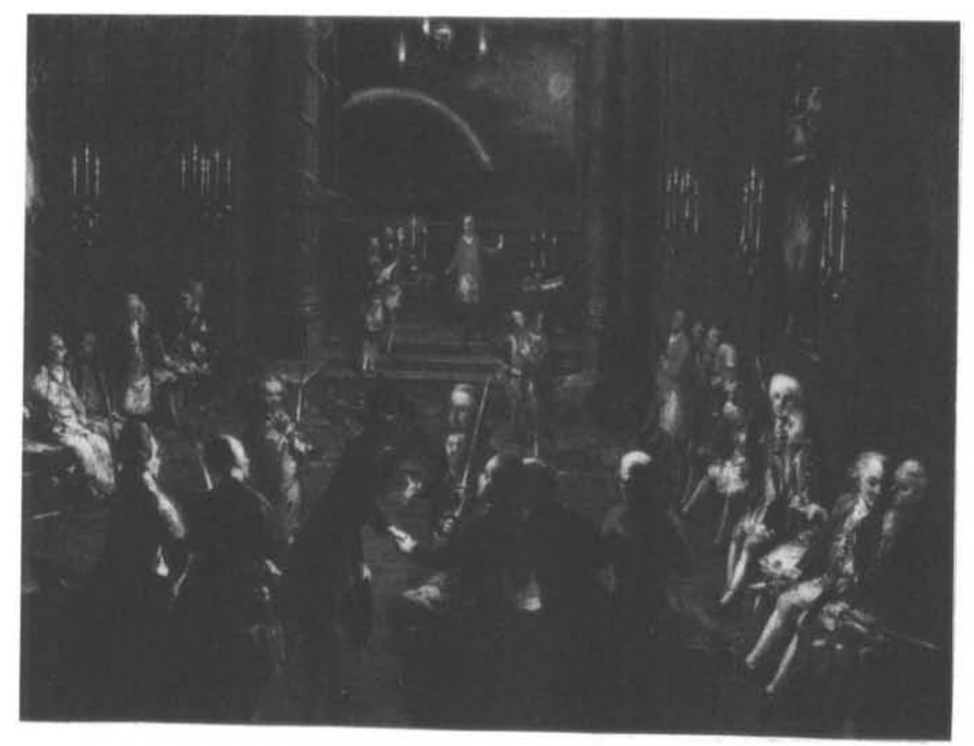
巴赫的绝大多数管弦乐作品，都是为寇顿的乐师们创作的，其中包括《勃兰登堡协奏曲》。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一位熟练的横笛吹奏家，作曲本领也很强。在他的带动下，柏林成为另一个重要的音乐中心。约翰·约阿希姆·克万茨为这位国王创作了300首长笛协奏曲供其吹奏，巴赫之子卡尔·菲利普·埃曼努埃尔也是一位住在柏林的作曲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趣味形成的所谓“柏林学派”，风格保守，讲求曲调优美和近于意大利式的简洁明晰。柏林剧场于1742年建成后，弗里德里希二世资助了大量金钱用于意大利风格剧目的上演。但随着其对外进行战争带来的庞大开支，他不得不节省资金，该剧场也于1756年关门大吉。由于他的趣向较为保守，以及资金投入的紧张，很多作曲家离开了柏林，转向环境更为宽松、待遇也更加优越的地方，例如卡尔·菲利普·埃曼努埃尔·巴赫，在柏林期间担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键琴手，待遇比意大利语歌唱演员还要低，于1767年前往汉堡，接替了特勒曼的职位。

141 音乐生活并不局限于宫廷与教堂。继汉堡1722年开办公共音乐会，法兰克福于1723年尾随其后，莱比锡也于1743年开办了公共音乐会。作曲家们得到了宫廷、富人以及音乐会主办者的资助。从18世纪80年代以后，维也纳成为全世界无可争议的音乐之都，海顿和莫扎特在那里创作了一系列无人能及的杰作。古典风格的维也纳学派，自觉地走国际化之路。因此，海顿自称“全世界都能理解我的语言”，并无夸大的成份，而莫扎特也曾写下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德意志人开始真正地像德意志人那样去思考、去行动、去说话，甚至像德意志人一样歌唱，那将是德意志永远的



身穿军装的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年）在符腾堡军事学校，先后学习法律和医学。席勒22岁时创作的反抗封建暴政、充满狂飙突进精神的剧本《强盗》获得成功，其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令纳粹党人下令禁演该剧。席勒把剧场看作法律的殿堂，在这里“这个世界上的强权人物可以听到他们从来—或者极少—听到的真理”。



某位姓名不详的画家1790年的画作：《莫扎特造访威尼斯自由泥瓦匠旅馆》。与为担任匈牙利埃斯台哈奇公爵宫廷乐长、知道自己缺乏自由的海顿不同，莫扎特在辞去萨尔茨堡大主教的乐师一职后，必须作为一位自由作曲家维持生计。不过，他仍然依赖于自己那些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资助者。贝多芬则是第一个无需就景创作的作曲家，而且那些为其提供赞助的人也把他视作独立的艺术家。

蒙羞!"虽然他的这番言论，遭到了仇外主义者的激烈攻击。维也纳古典作曲家们的创作真正是面向整个世界，不仅跨越了国家疆界，也超越了阶级的鸿沟，这是他们的一个永不磨灭的功绩。

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文学进入了一个很不平凡的繁荣期。作家们推崇的既有英国的莎士比亚和劳伦斯·施泰因，也有法国启蒙主义的资产阶级批判风格作品。无论是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又名《军人福》，1767年）和《爱米丽亚·迦洛蒂》(1772年)，还是席勒的《阴谋与爱情》(1784年)，都包含有社会批判和政治指教的成份，但真正令这些作品影响深远的，还是因为它们触及了文学和哲学意义上的不朽主题。莱辛在1779年创作的《智者纳旦》(1779年)中，充满激情地呼吁宗教宽容和平等，堪称德意志启蒙主义人性观念的经典表达。

作曲家弗朗兹·约瑟夫·海顿。这幅肖像画是托马斯·哈代1792年创作的，当时海顿住在伦敦。



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中的“感情表达”观点，在这一时期德意志文坛的一场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以年轻的歌德、席勒以及赫尔德、雅各布·迈克尔·赖因霍尔德·伦茨等作为代表人物的“狂飚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原义为“风暴与冲击”，我国学者译为“狂飚突进”——译注）。这是一批20多岁的年轻作家们掀起的抗议运动，是对上一代那些自我节制的“启蒙”学者的反叛。这批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有的突然自杀身亡，有的因贫困患上伤寒症而痛失生命。他们把自己看作充满天才智慧的局外人，拒绝接受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的布道式说教，拒绝认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行为规范，而是强调情感、情绪和大自然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产阶级嬉皮士的先驱。1773年，年轻的歌德创作了诗剧《普罗米修斯》，并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剧中这个主人公身上。1774年，

142

浮 士 德

《浮士德》一书中关于一个男子与魔鬼订立契约的古代传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到了16世纪早期，主人公被取名为浮士德博士，因为醉心于对知识的追求，他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曾借用这则故事，抨击炼金士、医生、当时最著名的医学探索者之一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约公元1493—1541年——译注）的众神论邪说。对于启蒙学者来说，浮士德是一个集想入非非与自吹自擂于一身的荒谬好笑的人物形象。但到了18世纪下半叶的"狂飚突进"运动作家那里，却变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他对惯例习俗和社会限制的蔑视，令其被视作另一版本的普罗米修斯。因此，浮士德这个屡屡在世人辩论中被讥笑的艺术形象，经过歌德的创作，成为举世闻名的一个文学人物。

歌德在其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对浮士德这个形象钟爱有加。1772至1775年间，他写下了故事梗概《原浮士德》。1790年，他对梗概材料作了再加工后，出版了《浮士德：片断》。全本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分创作于1797至1806年，第二部分直到1831年才完成，而全书杀青后不久他度过的生日，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一个寻求克服自我与世界、理想与现实、艺术与生、善与恶等重重矛盾的人。因为他从未停止探索之路，他最终得到了拯救，而魔鬼靡菲斯特输掉了他与上帝的赌局。在对浮士德灵魂的争夺中，靡非斯特无力与上帝抗衡；在爱的力量面前，在创造才能面前，在自由的道德抉择面前，靡非斯特都毫无还手之力。不过，作为故事主人公的浮士德，并不尽善尽美。他的种种计划，不论多么宏大、值得赞美，终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诗剧第一部分出版后，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好评，虽然教会中的一些人士认为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应予谴责的对象，而斯塔尔夫人（Germaine de Stael，1766—1817年，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先驱——译注）出于其法国式的阶级联合体必须得到维持的信念，也对此书的立意提出了置疑。至于诗剧的第二部分，则招致了几乎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谴责：理性主义者认为歌德滑入了神秘主义的梦呓境地，天主教徒指责他亵渎神灵，新教徒声称歌德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罗马教廷更谴责这部作品以假科学之名的自大狂。没有哪个人愿意花一些时间，仔细研究作品的文学价值。海涅等年轻的德意志人虽然曾赞扬该诗剧第一部分"有进步意义"，但对以浮士德为上帝所救场景作结的第二部分，却直斥其十分"反动"，尽管剧中情节与基督教的救赎概念毫无瓜葛。海涅还认为《浮士德》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此试图为这个故事注入某些社会改革因素。

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成立后，急切地投入到寻找一位真正"日耳曼"英雄工作中。民族主义者这时把浮士德看成了"日耳曼精神"的化身，歌德剧作中的这个人物遂被摆放到了本来毫无可能的祭坛。后来，当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试图把浮士德改造成为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神话人物时，歌德的这部杰作遭到了更大程度上的意识形态扭曲。而这种扭曲的终极状态，则是浮士德博士，这位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居然被改造成了纳粹冲锋队员们的榜样。与一切伟大作品一样，《浮士德》一剧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读者预留了广阔的理解空间，因而很容易被误解、曲解。正如歌德自己在评论这部著作时所说的那样，《浮士德》犹如一个谜，将令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沉醉——这番评论虽然充满自负意味，但却完全符合事实。

卡尔·福格尔·冯·福格尔斯泰因：《浮士德插图》（局部）

他又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创造了"狂飚突进"的原型人物。作品发表后，当即风靡了整个德意志，思想敏感的青年人纷纷摹仿起青衣黄裤的翩翩少年维特的打扮、举止，在遭遇恋爱上的不幸后，也举起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莱辛及启蒙学者们对此深感不安，认为维特这种自我沉溺、充满忧郁感伤意味的主人公，将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但莱辛等人 143 在作出这些批评时，往往忽视了作品对社会进行的深刻分析、对贵族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鲜明批判，以及它对个人权利充满热情的主张。而《少年维特之烦恼》恰恰是因为这些因素，才能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J·I·拉布的木版图，图中人物是老年时的哲学家伊曼努埃尔·康德（1724—1804）。康德既不赞同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又反对笛卡儿的先验论，由此在哲学上带来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主张，理性只能存在于认识主体的思想中，而非被认识的客体。没有单个的人，就没有思维，而没有思维，就没有客体、没有世界。由此，奠定了德国唯心论的根本立场。

歌德和席勒等伟大作家们很快就跨越了"狂飚突进"运动。席勒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认为，艺术是一个超越现实生活的自由王国，只有在这个王国才能建构起道德。他公开抨击专制主义的卑下，大声疾呼实现言论自由。但席勒太过专注于历史，因此时常会脱离现实生活。随着时代的演进，诸如自然与理性、知识与信仰、个人与社会等矛盾，已不再是必须二中选一的要求，而必须予以超越。对此，无论是康德的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1787 年），还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 年），都回应了这种时代的召唤。歌德的这部作品是最杰出的一部"教育小说"（源于德国文学中一种传统的小说类型，以描述主人公成长过程为主题——译注），探讨了个人的教育与发展问题。此后，歌德在《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1787 年）中，描绘了一幅理想化的蓝图，即通过个人牺牲实现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和谐。尽管与席勒相比，歌德的立场较为保守，但他在创作中也经常涉及个人反抗社会压制的题材。在《浮士德》中，歌德探讨了诸如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理解与谬误、真实与传说、罪与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在德国文学宝库中，《浮士德》构成了最伟大的一章。

活跃与 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 30 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如诺瓦利斯、勃伦塔诺、艾兴多夫、蒂克等，虽然也受到了"狂飚突进"运动的影响，但并不属于该运动中的年轻叛逆主义作家。浪漫主义作家们强调大自然的力量与美，高度认同德意志中世纪的浪漫历史，坚决地摆脱民族主义情绪的困扰。E·T·A·霍夫曼和让·保罗与浪漫主义派别颇为相近，但他们深受劳伦斯·施泰因的独特幽默感和创新手法的影响。更为年轻一代的两位杰出作家，一位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另一位是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他们均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和复杂性，很难简单地把他们划入到哪个类别。

腓特烈大帝的战争

1740 年 10 月 20 日，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查理六世去世，因无男嗣，其

长女玛丽亚－特蕾西娅依据遗嘱即1713年《国本诏书》，内部未遇到任何阻碍即得以承袭父位。据此，在与各领地协商后颁布的、规定皇位可传给女性继承人的《国本诏书》，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现在的问题在于，欧洲各主要国家是否会遵守其诺言，支持这一皇位继承。5月31日登上普鲁士王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2月16日借口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缺乏足够依据，派兵侵占了奥地利富有的西里西亚。

1741年4月10日，普鲁士军队在莫尔维茨会战中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弗里德里希二世也由此赢得了其作为年轻统帅的勇敢大胆名声。但事实上，当奥地利骑兵迫使普军退却时，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离开战场时曾经以为自己[144]已经失去了一切，只是由于库特·克里斯托弗·冯·什未林元帅率领普鲁士步兵发动了一次果敢的反攻，才决定了此次会战的结果。此后，弗里德里希二世遍寻声援，通过1741年6月4日签订的《布雷斯劳条约》，与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萨克森、波兰、瑞典、那不勒斯、科隆和帕拉丁结成了同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由此展开。

统治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将这场战争视为给予哈布斯堡王朝这一竞争对手致命一击的天赐良机，遂与法国组成联军，攻入奥地利境内，对维也纳构成威胁。尔后，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掉头北上，侵入波希米亚，并与奥古斯特三世统率的萨克森和波兰军队会合，占领了布拉格。巴伐利亚选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1742年1月，选侯们又一致推举他为罗马国王，亦即未来的皇帝。2月，他加冕为皇帝，改称查理七世，这也是德意志帝国自1438年以来第一位哈布斯堡家族之外的皇帝。但这位查理七世好景不长：奥地利军队很快挺进至慕尼黑，占领了这座巴伐利亚首府。

由于巴伐利亚完全依赖法国和普鲁士军队的支持，奥地利遂决心击破反哈布斯堡同盟。1742年6月，玛丽亚－特蕾西娅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签订了《布雷斯劳和约》，同意把普鲁士占领的整个西里西亚割让出去，萨克森和波兰的维丁家族也与奥地利媾和，并在此后多年里一直忠实履行盟友作用。不过，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和平未能持续多久：奥地利方面得到了英国和匈牙利的支持，结成了“国本军队”，从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手中收复了布拉格，并准备对后者发起决定性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时与巴伐利亚和法国人缔结了同盟，尔后于1744年夏派兵进入波希米亚，占领布拉格后，向布德维斯和塔博尔方向推进。奥军发动反攻，迫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后撤。这时的普鲁士，突然发现自己地位孤立，充满危险：奥地利、英国、荷兰、萨克森于1745年1月在华沙结成了“四国同盟”，而巴伐利亚随后在4月份退出了反哈布斯堡阵线。查理七世虽然多方努力，夺回了巴伐利亚领土，但返回慕尼黑后不久他便去世了。但事实业已证明，巴伐利亚的势力太弱，不可能为德意志帝国提供抛弃哈布斯堡王朝主宰的另一选择方案。从此以后，德意志再也不可能有在巴伐利亚领导下达成统

一的可能了。

1745年10月4日，玛丽亚-特蕾西娅的丈夫（弗朗茨·施特凡·洛林公爵——译注）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奥军面对普鲁士人连遭败仗的消息传来，冲淡了欢庆仪式的气氛。6月4日在西里西亚的霍恩弗里德贝格、9月30日在波希米亚的索尔、11月23日在亨多夫，普军连续赢得了会战的胜利。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抵德累斯顿。1745年圣诞节，普鲁士同奥地利、萨克森签订《德累斯顿和约》，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通过这次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得到了更多的领土和巨额赔款，并令英国和荷兰对其吞并西里西亚提供担保，可谓收获甚丰。

弗里德里希二世班师凯旋而回，从此被称作腓特烈大帝。巴伐利亚既已退出争霸行列，那么，德意志的命运毫无疑问将取决于由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二元制”发展结果。1740年时，普鲁士的领土相当于奥地利的1/6，人口相当于后者的1/3，如今却能够单枪匹马地从强大的竞争对手那里夺 145 来一个繁荣的省，标志着它已作为欧洲的一个强国而崛起。

1756年1月16日，普鲁士和英国签订了《威斯敏斯特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负责在德意志境内维护现状，从而巩固了腓特烈大帝对西里西亚的占领。玛丽亚-特蕾西娅决心把西里西亚从“桑苏西宫的恶人”手中夺回来。奥地利首相1750年5月与法国签订条约，构建了另一个攻守同盟。对此，弗里德里希在判断上发生了重大偏差：他认为，鉴于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由来已久的相互仇视，巴黎与柏林之间仍能维持亲密和关系，尽管法国这时正在北美洲的与英国进行战争，而英国正是普鲁士新结交的盟友。

周围都是强大的敌人，而自己却没有一个有效的盟国。面对这种局面，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先发制人，发动一场他所宣称的“预防性战争”。1756年9月，普军侵入萨克森，没费多大麻烦就获得了几次胜利，但很快便要面对一个实力远胜于己的联盟了——这个联盟既包括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还包括绝大多数的德意志邦国。瑞典军队占领了波希米亚，俄国人占领了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已经失守，奥地利军队甚至一度占领了柏林。这时，普军取得的两场大捷挽救了普鲁士：1757年11月5日，它在罗斯巴赫打败了法国和帝国联军，虽然联军的兵力两倍于普军；12月，它又在洛伊滕打败了奥地利统驭的帝国军队，而且普军的兵力仍然是后者的一半。

但罗斯巴赫和洛伊滕的两场胜利，只是为普鲁士争取了一个喘息之机。此后，普军很快又在一系列会战中被击败，并终于在1759年的昆尔斯多夫会战中遭遇惨败，但奥军和俄军取胜后并未扩张战果。对敌人如此浪费机会，腓特烈大帝称之为“勃兰登堡王宫的庇护”。事实上，奥军和俄军这时也是元气大伤。1762年12月，英国与法国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抛弃了奥地利。

146

1757年11月5日，腓特烈大帝在罗斯巴赫会战中，打败了苏比斯率领的法军以及奥地利帝国军队，赢得了他在七年战争中最漂亮的一仗。图为当时准备这场会战时拟订的计划图。

在俄国，伊丽莎白女沙皇于1762年1月5日去世，由彼得三世（女皇的外甥，系德意志荷尔斯泰因人——译注）继位。后者长期以来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极为崇拜，执政以后立即结束了对普战事，并与普鲁士组成联盟。7月，彼得三世便被其妻子废位后死去，可能是死于妻子的谋杀。新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摒弃了俄普同盟，但并未重启战火。这时，瑞典也退出了战争。借此良机，弗里德里希集中了一支21万人的大军，对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发起了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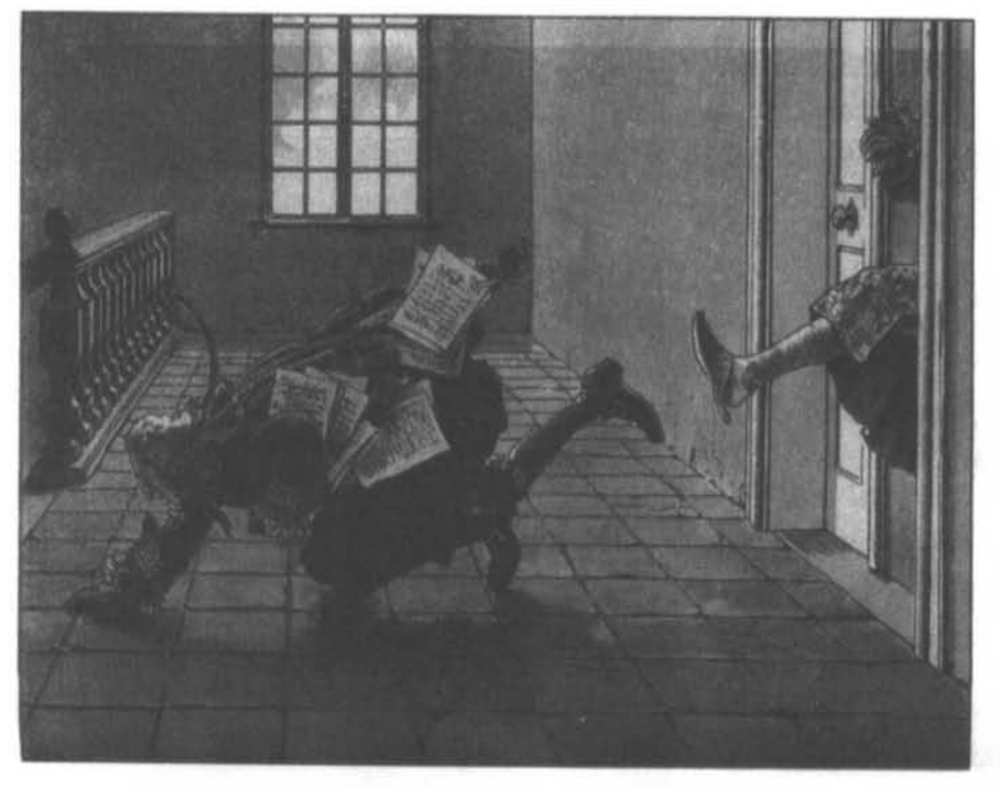
战事持续多年之后，剩下的各交战方都已疲于战争，因此媾和谈判很快取得了进展。1763年2月10日、15日，普法、普奥分别在巴黎和胡贝尔图斯堡（莱比锡附近——译注）签订了和约。经过这场“七年战争”，普鲁士纵使不能称作胜利者，至少其领土的占有没有发生变化。相反，面对实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弗里德里希二世坚持保住了对西里西亚的占有。但军队在这场战争的伤亡，与三十年战争相当：共有50万各交战方官兵阵亡，其中普军为18万。战火导致经济濒于崩溃、货币失去价值、通货膨胀现象四处蔓延。和约签订后，弗里德里希立即着手稳定货币、改造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并取得了成功。

1763年以后，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都需要得到某个盟国的支持，而对普鲁士而言，这个盟国只剩下俄国还有可能：英国已不再过问欧洲大陆事务，转而集中精力于它在全球新建立起来的殖民帝国；法国已与奥地利结盟，玛丽亚－特蕾西娅的女儿玛丽·安东妮特1770年嫁给波旁王朝的多芬，而多芬在1774年继承王位，改称路易十六。从1763至1764年

间，腓特烈大帝一直支持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前的情夫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角逐波兰王位。经过精心筹划的这一举措，旨在激起维也纳和巴黎的反对，并由此使普鲁士与俄国签订了防御条约。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弗里德里希都希望波尼亚托夫斯基成为她们手中的棋子，但后者却下定决心改造波兰。这一努力在俄国的压力之下失败了，但俄国对波兰的干涉激起了奥地利的严重关切。这样，玛丽亚－特蕾西娅年轻的继任者、热烈地崇拜腓特烈大帝的奥地利新君主约瑟夫二世主动地着手改善与普鲁士的关系。

到了1772年，俄、奥、普三方同意牺牲波兰，使它们的分歧得以化解。它们共同对波兰进行了瓜分，其中奥地利得到的份额最大（根据三方1772年8月5日签订的第一次瓜分波兰条约，俄国获得的面积为9.2万平方公里，人口130万；奥地利获得的面积为8.3万平方公里，人口265万；普鲁士获得的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人口58万。俄国虽然份额最大，但人口较稀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虽然比俄国本土先进——译注）。至于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则只剩下了一个残缺不全的王国。1777年，普、俄续签了双边同盟条约。

1777年元旦，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连·约瑟夫三世去世，死后无男嗣。有权承袭巴伐利亚的帕拉丁公爵卡尔·西奥多尔担心普鲁士会制造麻烦，遂建议由奥地利接管巴伐利亚，条件是把奥属尼德兰转交给他。对此提议，维也纳当然热烈欢迎，而腓特烈大帝则挑动德意志诸邦反对奥地利。与此同时，他又炮制了一份详尽的领土交换提议，交给约瑟夫二世，



普鲁士使臣拜伦·冯·普洛绍1757年10月14日在累根斯堡一脚把帝国法院的说客阿普里尔博士踢到楼道里。冯·普洛绍是普鲁士派驻帝国议会的代表，他以累根斯堡为基地，组建了一个高度有效的间谍网。当阿普尔博士带来一张便条，威胁将把奥地利驱逐出帝国时，冯·普洛绍一脚把他踢了出去。此事很快作为普鲁士的一则轶闻渲染和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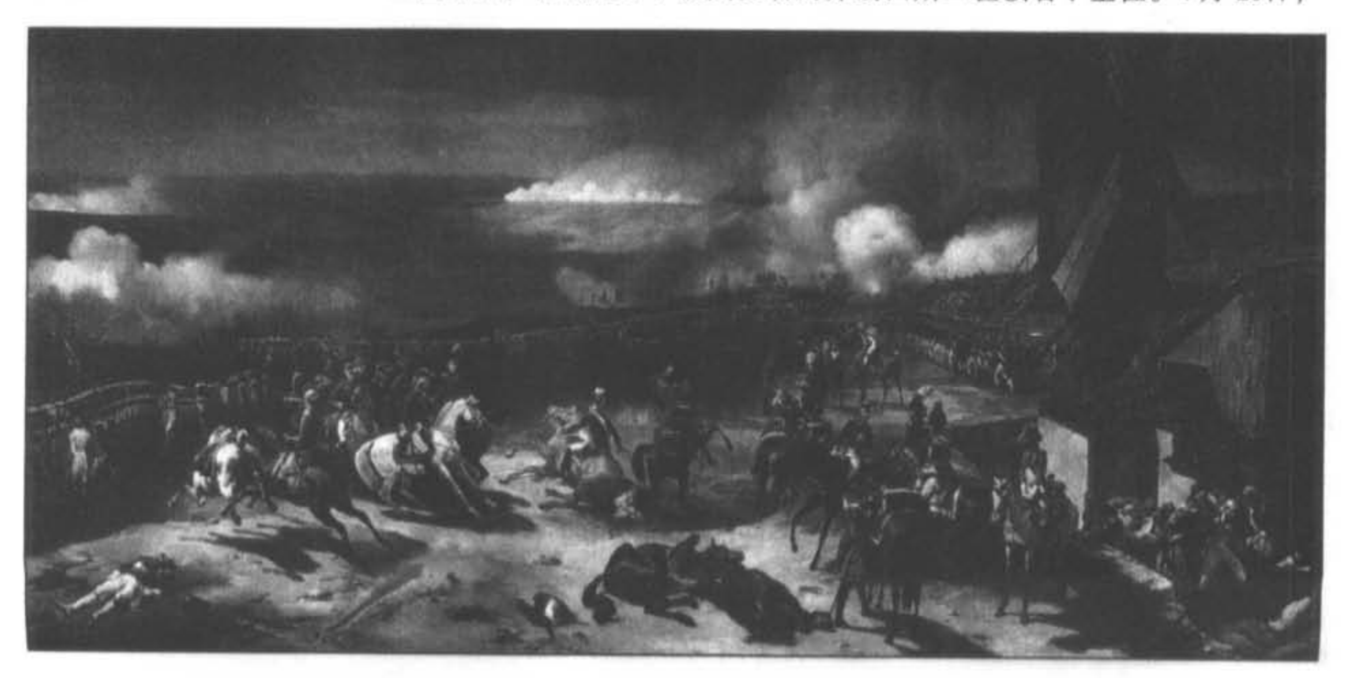
只是担心德意志诸邦反对，不敢把此提议公诸于世。1777 年 7 月，他以带 147 头维护诸邦权利、反对皇帝暴政的名义，起兵侵入波希米亚。此举令他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遂爆发。

不过，围绕巴伐利亚归属的这场战争，普奥双方都没有强烈的交战欲望，因此这场所谓的战争被人戏称作“土豆战争”。在俄国和法国的调停下，普奥双方于 1779 年 5 月签订了《帖欣和约》，规定恢复原状，保证卡尔·西奥多尔继任巴伐利亚选侯。这场战争的最重要后果是，俄国从此成为德意志帝国秩序的保护人。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普鲁士最初想借此之机削弱奥地利，因此支持奥属尼德兰的雅各宾党人。但随着 1790 年约瑟夫二世去世、利奥波德二世继位，情况发生了变化。利奥波德二世决心结束与土耳其的战争，并准备放弃一切领土要求。1790 年 7 月 27 日《赖兴巴赫条约》签署后，普鲁士着手调停奥地利与土耳其的战事，不再支持列日(位今比利时境内——译注)的雅 148 各宾党人。

1791 年 8 月 27 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庇尔尼茨声明》，不仅表达了对路易十六君主权力的共同关切，还表示如果欧洲各强国一致同意，它们将为实现这一目标对法国实施干涉。由于欧洲列强根本不可能一致同意对法国进行干涉，这一声明当然只是纯粹做做样子，但对于法国的主战派来说，却大可据此做文章，进行宣传和鼓动。奥普同盟条约并不可能解决它们之间的根本分歧；1792 年 1 月 1 日，随着奉行和平路线的利奥波德二世去世，他的儿子、极其反动的弗朗西斯二世接替了皇位。4 月 20日，



法国革命军 1792 年 9 月 20 日在瓦尔米高地大败奥普联军。

法国对奥、普宣战。

指挥奥普联军作战的不伦瑞克·伦内伯格公爵查理·威廉·斐迪南，是一位蹩脚的军事统帅。他发布宣言，称如果革命党人胆敢动一动法国国王的头发，他就要夷平巴黎。尔后，他率军越过边境，侵入香槟地区。1792年9月20日，联军在瓦尔米高地与迪穆列率领的法国革命军遭遇。受到后勤补给困难和传染疾病困扰的联军，在经受法军几个小时的炮击后，被迫撤退。30年后，歌德回顾这段往事时称，他当时曾在这片战场上对士兵们说过这样的话："在今天、在这里，世界历史将掀开新的篇章，而你们可以说，自己都是亲身经历者。"

在瓦尔米大破联军后，法军在屈斯蒂纳率领下长驱直入，相继占领施佩耶尔、沃尔姆斯、美因茨，进入奥属尼德兰。尽管如此，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所真正关心的，仍然是东欧事务而不是来自革命的法国的威胁。1793年1月23日，普鲁士接受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提议，第二次瓜分波兰，其中普鲁士得到的份额是但泽、索恩、波森。俄普双方事前均未与奥地利人商讨此事，令维也纳怒火中烧，决心对普鲁士作出报复。

尽管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存在着种种根本分歧，但帝国仍于1793年3月22日对法国宣战。在得到英国的资金支持后，普鲁士增派了军队，但普、奥双方从来不曾就战略问题进行协调；相反，它们此刻更关心的事情仍然是波兰的未来，而不是雅各宾派专政下的法国威胁。帝国军队在初期取得了几次胜利，收复了被法军占领的一些领土，但随后又被赶了回来。1795年4月，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巴塞尔条约》，退出了对法战争，法国则承认北德意志为中立区。条约规定法国可自由处置莱茵河以西地区（大部分系主教领地和大修道院领地），而作为回报，普鲁士在莱茵河以东获得补偿。不过，这项条约中的规定，后来从未被签约双方遵守过。普鲁士明目张胆地破坏帝国宪法、赤裸裸地背叛其在《庇尔尼茨声明》中信誓旦旦的诺言，招致了广泛的抨击。

对法作战的遂只剩下了奥地利。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在意大利北部连续打败奥军、对奥地利本土构成了进击之势。迫于此不利局面，奥地利人不得不在1797年10月17日签订了屈辱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不仅丧失了莱茵河左岸的所有领土，而且失去了阿迪杰河以南的意大利（作为补偿，它得到了威尼斯）。与普鲁士一样，作为回报，奥地利可在莱茵河以东获得补偿；还是与普鲁士一样，皇帝明目张胆地破坏帝国宪法、出卖了它的基本支持者——教会和小邦国。至此，帝国的最终瓦解，已经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1797年12月9日，法国和德意志帝国开始在拉施塔特举行媾和谈 [149] 判，以便使整个帝国成为媾和的一方，并把诸多帝国骑士领地等包括进去。由于普鲁士、奥地利在对法媾和中的补偿协定这时仍秘而未宣，所以磋商充满了诡异气氛，而大修道院领地们这时还希望能维持住帝国的统一

性。谈判中，法国方面要求得到莱茵河西岸的一切领土，以及河上的所有桥梁，并要求帝国在东岸的所有要塞必须毁弃。对于法国人的漫天要价，英国、奥地利和俄国结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1799年3月1日，法国对奥宣战，法军立即跨过了莱茵河。4月28日，法国派遣参加拉施塔特会议的两名代表被匈牙利轻骑兵谋杀，谈判遂突然中止。

法军先后在马伦戈、霍恩林登的会战中大败奥军。1801年2月9日，奥地利被迫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法国把莱茵河左岸的所有领土收入囊中，奥地利则失去了其在意大利所剩下的大片领土，不过仍保留有威尼斯、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拿破仑这时开始以最大的热忱，投入对德意志面貌的重塑。德意志帝国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法国的对德政策目标是：削弱奥地利，把帝国分解成为若干个较大的邦。为此，法国分别与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单独签订了条约。1803年2月25日，累根斯堡全帝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总决议规定取消所有教会诸侯邦国，仅继续担任帝国首相的美因茨大主教兼邦君的领地除外。超过百个的小邦不再存在，45个帝国直辖市失去直属帝国的地位，仅不来梅、汉堡、吕贝克、法兰克福、纽伦堡、奥格斯堡等6个帝国城市仍保持独立地位。在内部版图重组过程中，改变邦国归属的德意志人多达3,161,000人。巴登、黑森－卡塞尔、符腾堡、萨尔茨堡得到了选侯地位，但它们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利。主教领地和大修道院领地在被置于世俗邦国之下后，已不可能为教会带来丰厚的物资回报，因此不再是贵族们的保留地。政治生活的世俗化，对农民的影响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许多农民变成了独立的自耕农，但另一方面，其他很多人的经济情况恶化，陷入贫困境地，直至再次成了为地主耕种的佃农。

《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出台后不久，法国和英国再次爆发了战争。法国遂违反与德意志帝国的媾和条约，出兵进攻汉诺威。1805年4月11日，俄国与英国结盟并对法宣战；8月9日，奥地利也加入了反法同盟。但普鲁士继续保持中立，甚至在拿破仑公然破坏了北德意志中立地位后亦是如此。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则站在法国一边，反对帝国皇帝，这种无视帝国宪法存在的行为明确无误地证明了，帝国已是名存实亡。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大败俄奥联军，这也是他生平最辉煌的会战之一。奥地利不得不接受了屈辱的《普雷斯堡和约》。至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不仅得以升格为王国，还和巴登一样从奥地利那里割让了大片的领土。随后，这几个南德意志邦国利用自己的主权地位，吞并帝国骑士领和自由城市。

1806年7月12日，拿破仑策动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等16个邦国，脱离帝国，正式建立了“莱茵联邦”，将其置于自己这位法国皇帝保护之下。同时，他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个新的王国，首府设在卡塞尔，



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塔特两场会战中击败普军后，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于1806年10月27日抵达柏林，并通过勃兰登堡门。

国王是他的弟弟耶罗姆；建立了贝尔格公国，由其妻兄穆拉特掌管。莱茵联邦的成立，本意是想使其成为独立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外的“第三德意志”，但由于其自身存在的认同问题和忠诚度问题，这种作用始终无法实现。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越来越把法国视为占领者，而联邦对其承担的向拿破仑大军提供兵员的重负，深感不满。

普鲁士继续保持中立。1806年7月，它与俄签订协定，规定俄国维护普鲁士领土完整，普鲁士则保证不向拿破仑进攻俄国提供一兵一卒。但当英、法两国就汉诺威的未来问题开始谈判时，普鲁士却下令动员军队，勒令拿破仑从南德意志撤出所有部队，恢复穆拉特所管辖的领土，并允许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对这样一个最后通牒，拿破仑甚至不愿意费神地予以回应。于是，普鲁士于10月9日向法国宣战。5天之 [151] 后，普军一天之内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塔特两场会战中连遭重创。普王及其政府逃往梅梅尔，拿破仑10月27日在柏林举行了胜利入城仪式，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德·舒伦堡向法军移交了军械库后，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保持镇静，这是一个公民的主要义务。”

第七章 改革、复兴与复辟

152 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法军彻底击溃，柏林亦被占领，但它与法国的战争状态仍在持续。普、俄两国在《巴滕斯泰因条约》中达成共识，将把对拿破仑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然而到了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在弗里德兰会战中击败俄军，俄国人不得不诉诸和平。局势之发展，已令普鲁士方面近于绝望。

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在1807年7月9日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按照拿破仑的盘算，普鲁士几乎要在蒂尔西特宣告不复存在。但虽然经过沙皇的大力游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勉强保住了王位，和约对普鲁士仍极其苛刻：它失去了一半以上国土，仅剩下勃兰登堡、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领土变得支离破碎，人口也从先前的1000万骤减到450万。后续签署的补充协定规定，普鲁士必须支付法国1.545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在赔款未付清前领土由15万法军驻扎，且它必须为其提供占领开支。虽然法国人的赔款要求后来减少到1.2亿万法郎，但仍远远超出了普鲁士的支付能力，因此法方最终把要求修改为每个月支付4000万马克。普鲁士军队被裁减到4万，而且一旦法国与奥地利之间重开战事，其中的1.6万人要听凭法国人的差遣。

德意志诸邦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设想，只要推行《拿破仑法典》（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后，先后颁布了三部重要法典，即1804年《民法》、1807年《商法》和1810年《刑法》，其中《民法》1807年改称《拿破仑法典》——译注），只要制订出近代宪法，他就能赢得德意志人的民心，但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想法大错而特错了。以他的幼弟耶罗姆为国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便是一个典型的由腐败的军事寡头执政者统治的例子：在法国人的无情掠夺下，王国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或许耶罗姆最初也曾有过某些改革念头，但随着他把大量财产赏赐给自己的追随者，这一切便都化为乌有了。因此，本来想要成为一个让其他州效仿的范例的威斯特伐利亚，很快便呈现出普遍的社会动乱迹象。不过，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德意志西部、南部诸邦，也不像许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灾祸连连。事实上，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都推行了改革。这三个邦在1806年战争后

新增了大片领土，因而必须实现一定程度的融合。而在奥地利，自1805至1809年期间也尝试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不过斯塔迪翁大公旨在加强帝国中央集权、建立近代政府制度的改革，却遭到了王室和骑士庄园主阶层的激烈阻挠。在普鲁士，改革是一件生死攸关的选择：如果不对现状进行根本改革，它将永远不可能恢复大国地位，而注定只能成为一个第三流的附庸国。

在德意志大地上的许多邦，法国革命都为业已开始的改革运动增添了新的动力，虽然它们的改革目标往往显得混乱甚至自相矛盾。在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和巴伐利亚，代议制机构在名义上均得以建立起来，但在巴伐利亚从未召开过会议，而在威斯特伐利亚统共也只召集过两次。而且在这两个地区，选民人数都很少，基本上限于那些富人。选举制度非常复杂，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制，所谓"全民代表机构"要么从未付诸实践，要么便是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甚至字面上的权力都不具备。在威斯特伐利亚，这个"全民代表机构"充其量只是与国王伉俪共进了两次晚餐；就像是要刻意模仿一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的情景，这些代表一句谏言都没有，而只是滑稽地注视着国王耶罗姆和他的王后进餐时一鼓一鼓的腹部。 [153]

来自法国的压力、帝国的终结（1806年7月，莱茵联邦成立，意味着存在了近850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已名存实亡；8月，"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二世宣布解散神圣罗马帝国——译注），以及重新组合德意志政治地图的"帝国荣誉的最终决定"，为改革者提供了一次黄金机遇。当拿破仑命令在巴伐利亚推行《拿破仑法典》时，门塔格拉斯借助于法国人的威胁，劝服骑士庄园主们接受了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在德意志诸邦中，巴伐利亚1811年出台的《刑法》最富进步意义，采纳了近代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任何人不经审判则不得定罪。巴伐利亚的司法改革还包括新建一个由5个部门组成的司法部，从而把司法与行政区分开来。庄园主们在税收领域的特权被剥夺，政府机构引入了考绩制，不再实行卖官鬻爵。1809年，新教徒获得了与天主教徒的同等权利。1813年，犹太人也得到了从事宗教活动的完全自由，虽然他们在法律上仍受到其他一些限制。巴伐利亚1808年出台的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享有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并把国民称作"公民"，这显然是一个富有自由色彩的词汇。虽然巴伐利亚仍然是一个专制主义王国，但大众舆论已不会被完全忽视。一言以蔽之，随着庄园主的诸多特权被废除，已为后来进行自由改革开辟了通路。

1805年，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克·奥古斯塔斯二世废除了主旨在于维护庄园主利益的旧宪法，并在拿破仑的支持下，创建了一个统一的王国。王国把新近获得的领土一并包含进去，他本人也于1806年加冕为国王弗里德里克·奥古斯塔斯一世。此前，新教教士们曾在庄园领拥有生杀予夺之

154

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

弗里德里希1774年出生于格赖夫斯瓦尔德，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他对复制大自然不感兴趣；事实上，他的很多最精美的风景画纯是出于冥想。他往往是利用自己对自然景物勾画出的素描，进行高度个人化的演绎。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带有冷寂虚幻的情味和神秘的宗教气息。在他的眼中，包括人的精神在内的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上帝意志的达，是"世界精神"（Weltgeist）。艺术、哲学、文学和科学，无一不是这更高一级的统一体的一部分。因此，在他几乎所有画作中，呈现的都是某个人物的背影前面呈现出的奇特自然景观。在这里，人类就像周遭的树林、岩石一样，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弗里德里希的许多画作中，人物都被放置在前侧的阴影部分，似乎在凝神注视着遥远的天际。到1810年以后，他的创作理念发展为，在大自然的神奇魔力面前，人类实在是微不足道地渺小，理应以谦卑的姿态面对。

普鲁士在1806年的溃败令弗里德里希震惊之余，感到极度悲凉。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宁静，他一次又一次从格赖夫斯瓦尔德的家乡前往新勃兰登堡和吕根岛，但他的作品的色调仍然越来越灰暗、阴郁，景物也从先前阳光照耀下的草场，变成了灰暗的松树林和似乎意味着什么的日落景观。

弗里德里希的画室是斯巴达式的清修风格：不加装饰的单色墙壁，光秃秃的地板，甚至是对着易北河的窗户也紧紧地关闭着；这是一个远离了尘世的绝对个人化的空间。虽然到1806年以后，他声誉远播，已经衣食无忧，但他仍然把一切精力都献给艺术，过着清苦而单调的生活。



弗里德里希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已打定主意过单身生活，但在1818年却娶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自从与凯瑟琳·博默结婚以后，这个早年浪迹野外写生的画家，身边多了一位衣着入时的伴侣，他自己也戴上了象征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三角帽。此后，他的作品色彩上柔和了一些，但仍然充满了惆怅和冥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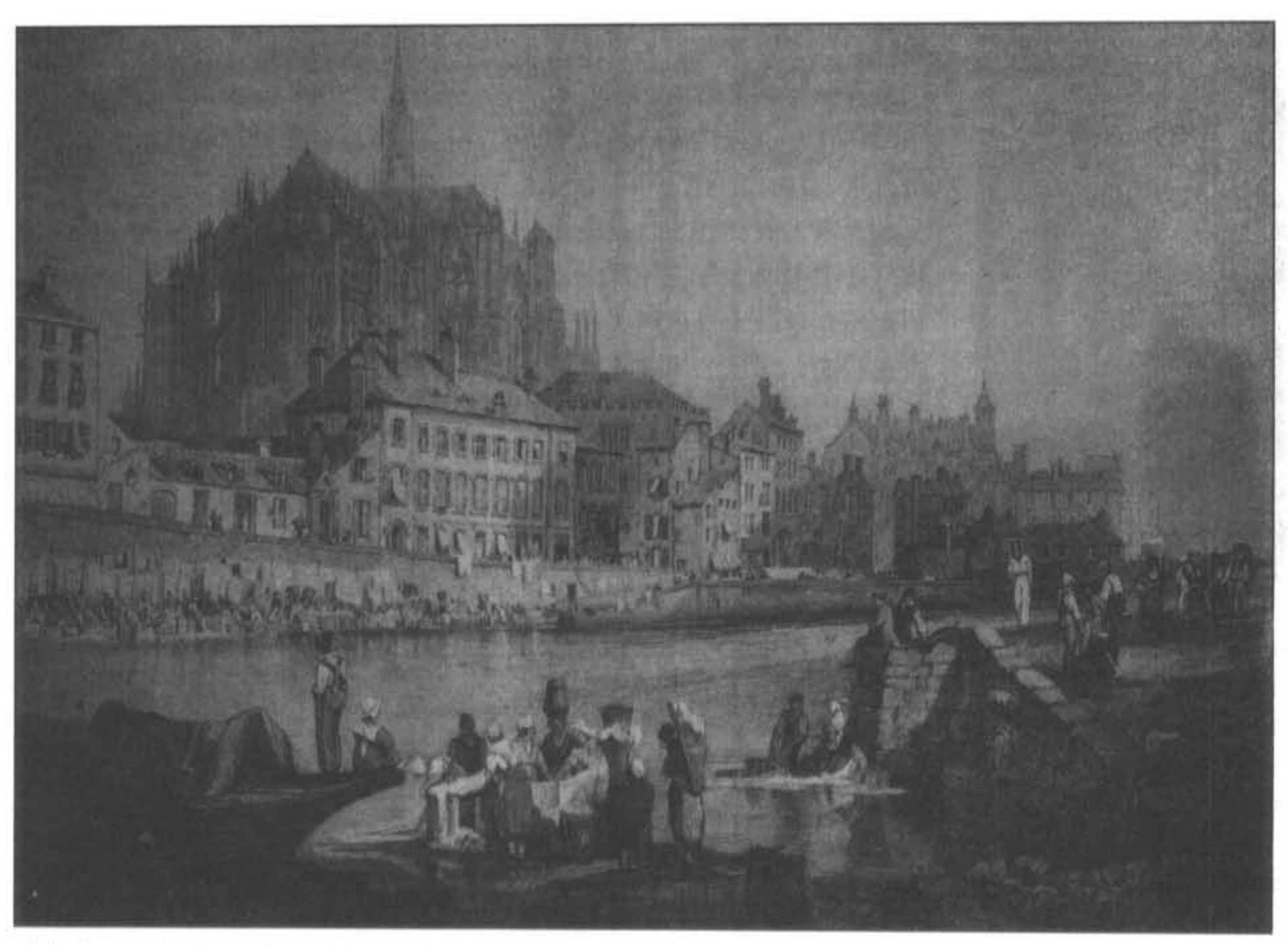
在经历了一段创作高峰之后，他从1824年起陷入了低谷，在两年时间里仅仅创作了一些水墨画。1835年，他患上了心脏病，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拿起油画笔。1837年，他的健康状况愈加恶化，此后仅仅勾勒了一些猫头鹰和墓石。后来，他患了精神紊乱症，于1840年5月7日在德累斯顿去世。

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1818年以后创作的《吕根的石灰岩》

大权，随着弗里德里克一世给予所有基督徒同等宗教权利，这些人的特权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作为一位专制君主，弗里德里克一世的改革为建立一个近代的立宪制国家铺平了道路。

在巴登，查尔斯·弗里德里克侯爵从1746年一直统治至1811年。他是一位开明的改革家，无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后来的拿破仑都非常尊敬他。但尽管该邦采取了许多富有进步色彩的体制改革，但由于在革命战争时期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巴登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决债务问题，弗里德里克侯爵授权埃梅里希·约瑟夫·冯·达尔伯格男爵进行财政改革，推出了收入税制度。达尔伯格以商业运作方式发行政府公债，并对银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在德意志诸邦中，巴登、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是最早的三个根据严格规定的法律原则组织国债的。

在普鲁士，1806年战争之前就曾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改革运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从法国移植的很不公平的间接税（Regie）制度，于1786年得



塞缪尔·普鲁特(1783—1852)创作的科隆大教堂远景。这座德国最宏伟的哥特式教堂，在几百年时间里一直未能完工，直到1842年9月，才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之举行了盛大的续建仪式，以最终完成修建工作。

到废除。两年后，思想自由原则被写入了法律。新的民法于1794年最终颁行。1799年，王室土地上的50万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废除。对于法官和公务人员，任职资格也比以往更加严格了。

卡尔·冯·施泰因男爵1807年1月接替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伯爵，出任普鲁士首席大臣。施泰因的政治理念，既有保守成份，也有自由色彩。作为帝国的骑士，他是一位自负的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贵族，把庄园主的权利视作防范专制权力侵犯个人权利的屏障。他对城镇和村庄 155 的改革，也具有进步意义。19世纪自由欧洲的一大特征即市参议会、村公所的建立，其源头就是这项改革。不过另一方面，他的许多改革内容只是恢复了人们先前便曾拥有、但被专制政权所剥夺了的权利。施泰因的前任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伯爵（此处的“前任”，指哈登贝格曾于1807年任政府首席大臣。后由于拿破仑的干预被免职。施泰因1808年11月24日去职后，哈登贝格于1810年6月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当年10月27日正式担任政府首届首相。因此，普鲁士这段时期的改革亦被称为“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译注），也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但与施泰因不同，他并不是普鲁士人（哈登贝格出身于汉诺威埃森罗德一个贵族家庭——译注）。这两位政治家都出于维护王权的根本目的，希望把普鲁士蕴藏的潜力充分调动起来。为此，需要改革中央一级和地方各级的行政


雅各布·施莱辛格创作的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年)的肖像画(局部)。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都认为，思维与存在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但黑格尔却提出，真理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历史就是精神获得知识并努力掌握真理的一个辩证的过程。他指出："实体就是主体。"

管理，改善财政基础，提高农业和工业水平，改革教育与法律，并建设一支有能力在未来某个时候解放全德意志的军队。

1807 年，施泰因开始以令人目眩的节奏，展开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改革。1807 年 10 月 9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布了全称为《关于放宽土地占有条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敕令》，简称《十月敕令》，规定自 1810 年 11 月 11 日起，废除一切庄园的农奴制。不仅世袭人身依附关系得到了废除，敕令还规定骑士庄园从此可以自由买卖，国家公职的任职资格也不再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但为了补偿地主阶级从农民那里失去的封建义务，普鲁士在 1811 年和 1816 年又颁布了《调整敕令》和《王家公告》，由此造成了一个重要后果：较贫穷的农民因而无法获得土地，而那些条件稍好一些的农民，则需要支付 156 很高的代价才能赎买封建义务、获得人身自由。据测算，地主们获得的补偿金达 120 亿马克，并从农民交出的地产中获得 250 万公顷。因此，得到了自由的农民，要么成为没有土地的雇工，要么陷入严重债务。这样，施泰因效仿英国模式、建立一个强大的自耕农阶级的愿望，在容克地主们的反对下落了空。

从长远观点看，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中产阶级。农民拥有的小块土地在经济上是没有出路的：由于地力贫乏、生产率相对低下，只有大规模生产方式才能存活下来。纵便农民的土地受到保护，但在农业危机面前，绝大多数人也注定无法维持下去。造成农业危机的原因很多，既有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及农产品的进口，也有人口的快速增长。容克地主们则短缺资金，因此把土地出售给富有的资产阶级。在整个 19 世纪，德国东部的骑士庄园土地有 2/3 出售给了被人蔑视的"商人"。

施泰因对城市行政管理政府的改革，于 1808 年 11 月 19 日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市民凡能够满足一定的财产条件，均享有政治权利，只有军人、犹太人、门诺派教徒(1536 年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等，主张生活俭朴)和未成年人除外。市参议会通过两级选举制度选出(市民以秘密、平等的选举权选出城市代表，城市代表大会选出市参议会主持城市的自治——译注)。但施泰因无法把城市的这种自治方式扩展到农村地区；农村的自治，将在 1825 年和 1828 年的两项敕令中做出规定。

施泰因还对作了枢密制政府改革，建立了由 5 个部组成的国务会议(Staatstrat) 作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这也是近代政府各部的前身。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军政部各设一名部长，他们不受国王私人的枢密顾问的干扰，并有权直接向国王报告工作。由此，普鲁士实现了中央集权，政府管理也摆脱了国王及其亲信顾问的横加干涉。这些改革措施于 1808 年 11 月 24 日生效，而这一天恰恰是法国人得知施泰因密谋组织

全国起义而勒令普王将其免职的日子。

接替施泰因的是哈登贝格。他建立了政府各部对立法的负责制度；国王法令在生效前，必须得到相关的部的副署。1810年和1811年，他在贸易管理与商业税方面推动了一系列法令的出台，废除了行会对具体行业的垄断地位，建立了贸易自由（Gewerbefreiheit）原则。从此，贸易活动不再由行会管理，而是由国家管理，受限制程度大为减轻。这些措施的出台，旨在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增加国家的收入。与此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税收制度的不平等现象也得到了修正。不过，他有关废除贵族在某些类别税收领域特权的努力，遭到了激烈反对，最终未能奏效。后来，类似提议在1818年再次提出，但仍未成功。直到1861年，废除贵族税收特权的改革，也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在此期间，威斯特伐利亚及西德部分地区也实行了相似的商业改革，但萨克森直到1861年以后才进行此类改革，符腾堡和巴登则是在1862 [157] 年，巴伐利亚更是晚至1868年。不过，尽管这几个州在经济上较为落后，但政治上的自由度均远远超过普鲁士。究于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影响，是催生了数量巨大的无地农业工人和失业工匠，由此导致了工人的平均工资下降，四处乞讨的流浪汉比比皆是。经济自由的动力，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工业化时代的普遍繁荣。

普鲁士改革中成就最大的一项，当属军事改革。军事改革的目标乃是建立一支以法国国民军为样板的、愿意为捍卫自己的财产和自由而战的普鲁士国民军。据此，这支军队的成员应当拥有需要捍卫的财产和自由，士兵们不应成为残暴军纪和野蛮训练的受害者，军官团也不应继续沦为贵族阶级的禁地，而应打破身份联合制、惟才是举。1810年，沙恩霍尔斯特（普军总参谋长兼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译注）创建了战争学院（一译柏林军官学校——译注），由校长、经典军事著作《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组织对普军参谋军官施训。改革者们得用军队被迫裁减员额的机会，把一大批年迈无能的军官清理了出去。继续留在现役的将级军官只剩下了两位，一个是布吕歇尔，另一个是格奈森瑙。军事改革派在政治观点上非常自由化，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除非士兵们都是自由人，否则无法灌输民族自豪感和战斗精神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1815年以后复辟时代降临时，很多军官都自愿退役了。

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生中从未上过学的一个人，他就是威廉·冯·洪堡。洪堡于1809年被任命为教育改革的主持者。作为一位人道主义者，他认为每个个人都应依据自己的能力开发自己的才智，而国家应该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在他看来，使人民接受教育乃是国家的责任，这并不是因为舍此国家便无法强大，而是因为这是一项道德义务。尽管在他的这种新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各种矛盾，但他取得的教育改革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他的多方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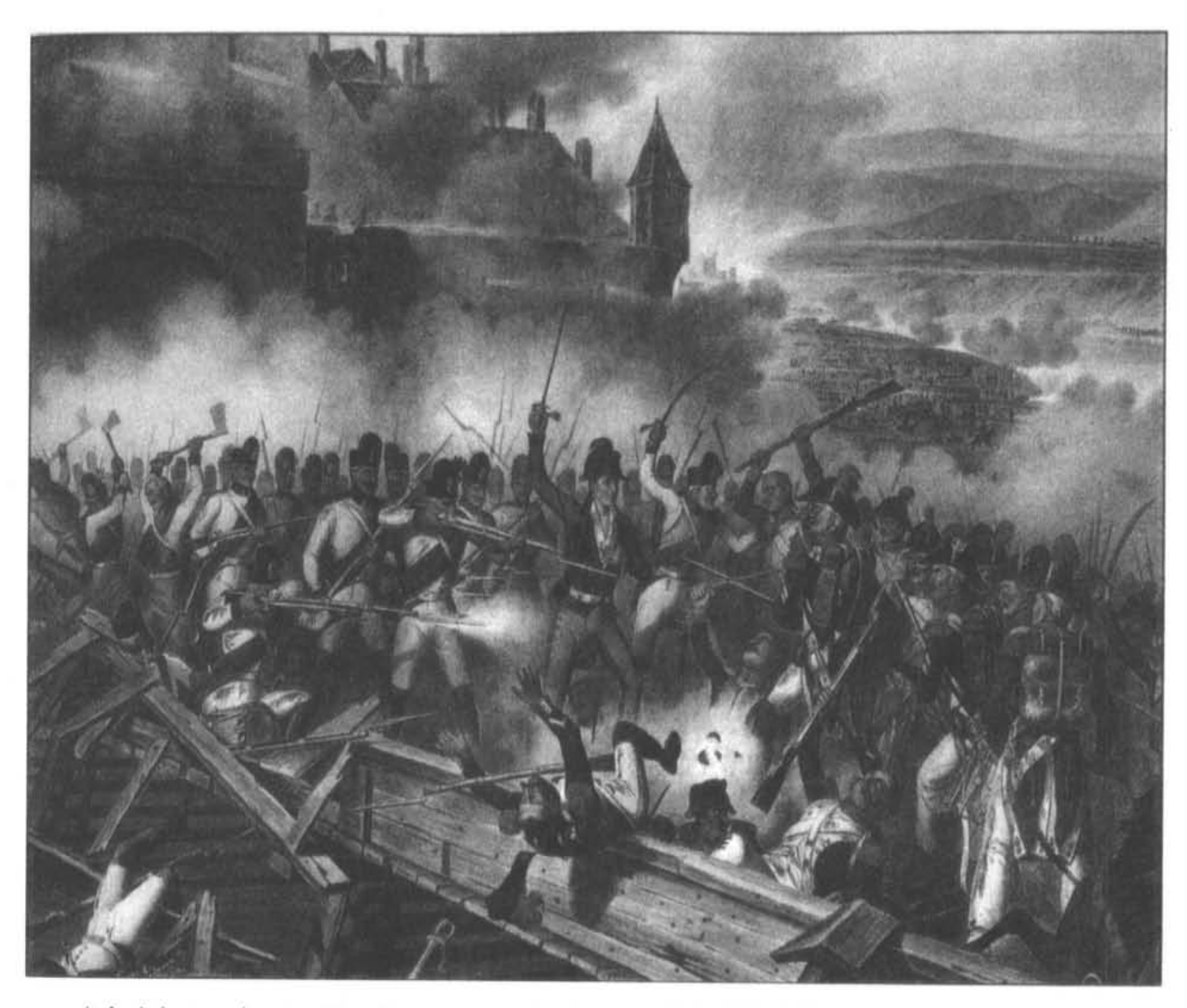
力，柏林大学得以于1810年创立。在这种新式大学里，人文精神得到了突出的强调。洪堡的愿望是培养出秉承内在道德制约的自由人，而不是一批只懂得某一学科专门知识或技能的学生。对于他来说，对真知的追求正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正如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真正赋予大学生命的气息……是绝对的学术自由这一普世法则。"

洪堡还分小学（初级学校）和完全中学（语法学校）两个层次对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完全中学与大学相似，强调人文知识的学习，尤其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由此，原有的400所以死记硬背为圭臬、以体罚和殴打为管理手段的拉丁文学校，均被强调自我约束的精英化教育的完全中学取代。为了强化教师素质，规定中学教师必须拥有大学文凭。1812年，又建158立了中学毕业考试制度，未获得中学毕业证书者不得进入大学深造。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对普鲁士形成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往往持自由派思想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改革仍远远谈不上民主，贫穷阶层仍然难以分享这一更为开放的体制所带来的好处，但毕竟打破了以身份论人的旧的社会藩蓠，为属于资产阶级的19世纪德国社会准备了人才。不过，教育改革的阳光要照耀到小学，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腓特烈大帝时期创办的这些小学，倒霉的学生们照旧要接受普军退役军士们的棍棒教育。令人庆幸的是，新的师范学院已经建立起来，下一代的教师可望接受到新式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

普鲁士改革运动所存在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系源于时势的必然。正如普王在批准建立柏林大学的诏令中所说的那样，普鲁士必须运用知识的力量，来弥补它在军事力量方面的损失。因此，当普鲁士恢复了其军事力量之后，改革的内在动力便不复存在了。改革期间，自然不可能把旧的秩序连根拔除。虽然改革派已经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强音，但随着旧式精英们成功地提升了普鲁士的国力和地位，德意志将走向不幸的明天。

民族解放战争

到1812年，法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禁止欧洲大陆各国与英国有任何通商往来，拿破仑推出了大陆封锁政策，但这项政策对法国的伤害一点也不亚于它给英国造成的损失：法国的大多数港口从此死气沉沉，拿破仑最坚定支持者中的富有资产阶级，也因此怨声载道。俄国决定摆脱大陆封锁体系对自己的伤害，继续与英国做起了生意，英国商品遂经由俄国流向西欧各地。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纠集了一支近70万人的军队，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分别派3万和2万军队参加，开始了其注定要失败的远征莫斯科作战。大军为筹集粮草，对德意志大地大肆劫掠，造成了普遍的饥荒。



法军、奥军 1809 年在维也纳附近的埃德斯堡大桥上的战斗。

当拿破仑 1812 年 10 月撤出莫斯科后节节败退，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之后，他那些内心里颇不情愿的盟友们抛弃了他的事业。12 月 30 日，侵俄大军中的普军指挥官约克·冯·瓦滕堡将军在未经普王同意的情况下，与俄国将军迪比奇签署了《陶罗根协定》，规定普鲁士军队对俄国保持中立。哈登贝格在获得普王批准后，宣布抛弃《陶罗根协定》，并与法国人进行了谈判，但与此同时继续与俄国、奥地利保持沟通。

1813 年 2 月 27 日，普鲁士与俄国签订了《卡利什协定》。此前，在德国问题上从 1812 年 6 月起便听取了施泰因的意见的俄国人，承诺普鲁士可以恢复其在 1806 年时的疆界，虽然不能收回华沙大公国，但可在北德地区获得补偿。协定规定俄奥结盟，由俄国出兵 15 万，普鲁士出兵 8 万，共同为“解放欧洲”而战。3 月 16 日，普鲁士正式向法国宣战。次日，普王 [159]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布《告我人民》号召书，呼吁全体国民不分阶级，做出牺牲，因为“如果我们想继续作为一个普鲁士人，一个日耳曼人”，这种牺牲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对民族主义的诉求，原因在于民族主



恩格尔贝格·塞贝茨（1813—1905年）为慕尼黑的麦克西米泰姆会议室创作的壁画，再现了欧洲几位重要政治家参加维也纳会议时的场景。位于中央位置的5个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塔列朗、蒙特杰拉斯、哈登贝格、梅特涅和冯·根茨。

义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了极其巨大的能量。虽然普王在这封号召书中，仍然是以君主的身份对臣民呼吁。

普鲁士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后，动员了一支28万人的军队，但在格罗斯格尔申和吕岑近郊的会战中，联军仍为拿破仑所打败。交战双方遂于1813年夏展开媾和谈判，期间英国、瑞典和奥地利也参加了反法同盟。由于法军在远征俄国之战中已元气大伤，由于法国经济危机重重，由于对手空前团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法国不得不两线作战，拿破仑在一系列会战中接连失利。1813年10月16日，当时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莱比锡之战开始了。会战持续了四天之久，拿破仑陷于惨败，但反法同盟军队也付出了巨大伤亡。由于拿破仑拒绝开展媾和谈判，俄、普、英、奥四方1814年3月9日签订了《肖蒙条约》，规定四国结盟，有效期为20年。随后，联军占领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放逐到厄尔巴岛，虽然仍作为一位君主，被获准保留皇帝头衔，但已无法掩盖其现在沦为战俘的事实。160

1815年3月1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出人意料地在法国南部登陆。他曾经希望自己的归来，将得到广泛的支持，并期望反法联盟会分崩离析。但这两项赌博都失败了。他匆匆拼凑了一支军队，虽然赢得了几场战斗，却无力打赢一场会战。1815年6月18日，双方进行滑铁卢会战，英军统帅威灵顿彻底打败法军，而由布吕歇尔和格奈森瑙率领的普军在这次会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拿破仑逃回巴黎，6月22日再次退位。“百日王朝”结束了。

德意志联邦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和平会议。在打败拿破仑的战争中曾扮演最重要角色的英国，决心提升普鲁士的实力，使其边境线一直延伸到莱茵河，以在西方建立一道坚强的屏障，防止法国可能重新向欧洲北部扩张。不过另一方面，英国也不希望看到普鲁士太过强大，以致于在德意志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由于俄国支持普鲁士兼并萨克森领土，作为后者接受俄国占领华沙大公国的补偿，普鲁士很有可能在全德境内称霸。"萨克森问题"令奥地利深感担忧，为挫败普、俄的这项计划，奥、英、法三方结成了秘密同盟。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正是利用"萨克森问题"提供的天赐之机，使法国参与了维也纳会议。最后，普鲁士只得到了萨克森邦2/5的土地。

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无意于恢复战前的那些德意志小邦国，而是希望建立一个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联邦，以便使普鲁士、奥地利以及较小诸邦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哈登贝格基本同意梅特涅的主张，但坚持认为普鲁士在这个联邦中应拥有更大发言权，特别是在处理德意志北部、西部的事务时。

德意志联邦遂宣告成立。它代替了旧的德意志帝国，由34个邦和不来梅、法兰克福、汉堡和吕贝克等4个自由市组成。联邦的宗旨在于"保持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德意志各邦的独立性和不可侵犯"。联邦在法兰克福设有议会(Bundestag)，主席由奥地利担任，由各主权邦的代表组成。无论是在"小议会"还是联邦议会全体会议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提案在投票表决时均有可能遭到否决，即使它们得到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等4个王国支持也不例外。因此，虽然联邦时常给人以奥、普共治的印象，但实际上不尽如此。各邦应遵守联邦法律赋予其的义务，并不得参加任何对联邦或其他成员邦构成威胁之同盟，因此它们的主权受到了一定限制。联邦条例第13款规定，"在所有各邦中将制订一部邦议会宪法"，但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均对此置之不理，直到1848年革命期间才着手制订。但不管怎样，联邦条例第13款鼓舞了德意志大地上的自由派，在维也纳会议召开后的几年时间里，南部各邦都实行了较大幅度的宪政改革。 161

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由主权邦结成的松散联盟，而且正如威灵顿公爵对施泰因所说的那样，这一松散联盟的维系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二是大众舆论的认同。否则，德意志将只能作为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一种共同的文化而存在。许多人曾经希望，支撑德意志诸邦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并肩作战的因素在于日耳曼精神，因此在战后理应在政治上作出相应的安排，现在不得不失望了。

166

瓦特堡大会

在所有号召立宪改革、民族统一和自由的组织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1815年在耶拿成立的“德意志大学生运动”（Burschenschaften）。这些由自由公民组成的联合会，构成了政党的源头。但当局认为，政治应当是政府而不是这些联合会的职能，因而对此类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忧心忡忡。大学生运动对南德地区新教徒为主大学的学生，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些学选用了曾在拿破仑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吕佐夫侦察分队的队旗颜色，以红黑两色中间缀以金色橡树枝，作为自己的会旗。此后不久，红黑黄三色即被所有自由民族主义者所效仿，并在1848年被采用为国旗的颜色。令组织者颇感失望的是，1815年时德意志共有8000名大学生，但参加大学生运动者仅有约1000至1500人。

为纪念宗教改革300周年和莱比锡“民族大会战”4周年，来自多所大学的大学生运动会员们于1817年10月举行了瓦特堡大会。政治立场开明的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准许大会在他的领地召开，具体地点是一座正对着马丁·路德（政治避难时）曾住过的城堡对面的小山。参加大会者包括来自至少3所大学的500名学生，其中发起单位耶拿大学派出了168名代表。

大会的第一个夜晚，与会的少数激进学生点燃篝火，把多本“非德意志的”和反动的书籍投入了熊熊火焰。被烧毁的书籍中，既有象征令人痛心的外来占领岁月的《拿破仑法典》，也有普鲁士的警察法令。被视作压迫、旧政权、军国主义之象征，普鲁士骑兵的一件紧身衣、一副假发辫、一位下士使用过的军棍，也被扔进了火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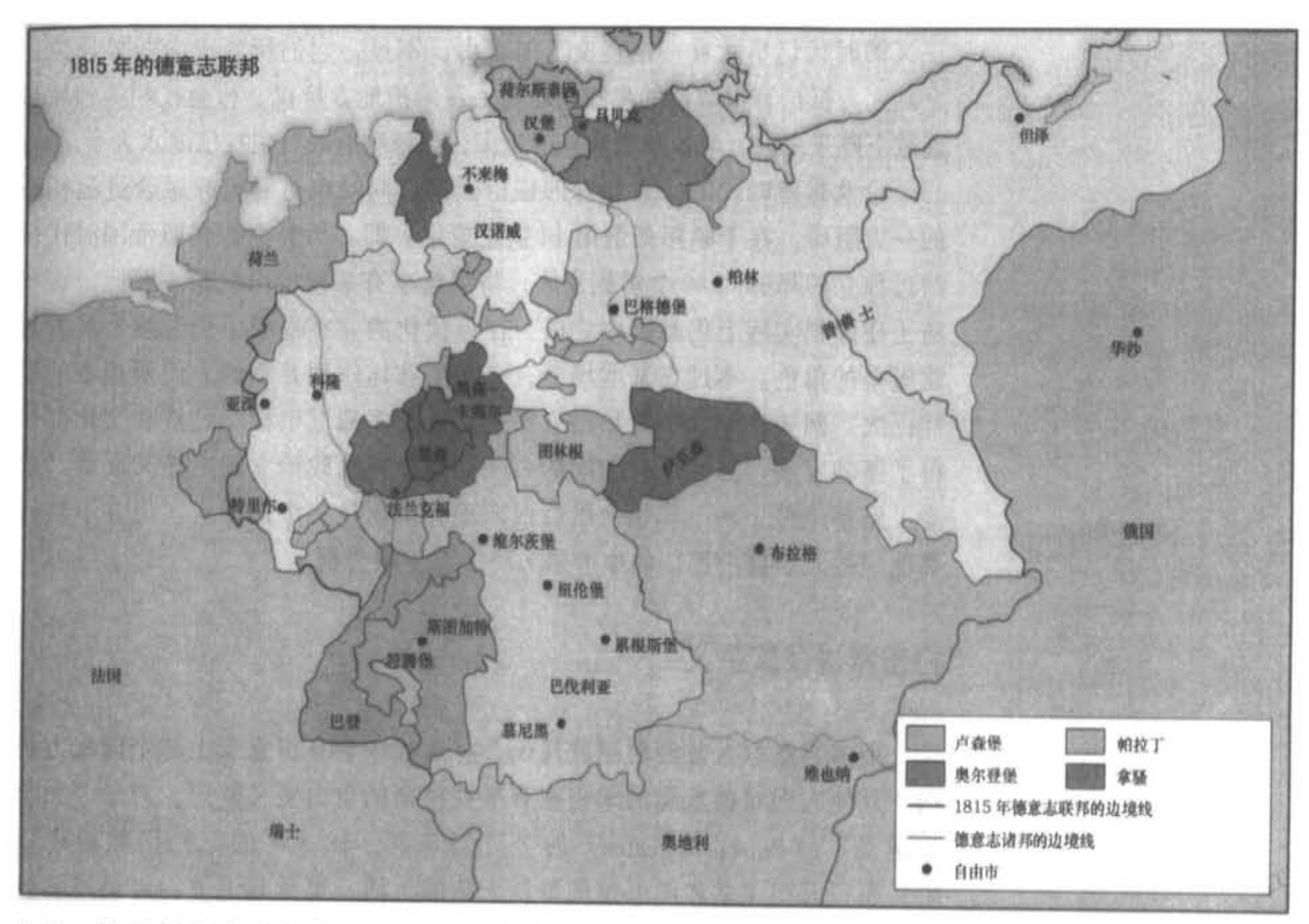
对自由改革和民族统一的呼吁，是当局最害怕听到的声音。瓦特堡大会后，当局出动警察，逮捕了许多与会者。由于全德大多数邦均实施了镇压行动，大学生运动转入秘密活动，主张也愈益激进。1819年，该运动被明令取缔。直到它在政治上转向保守，才在1848年得到恢复。



1817年10月18日，瓦特堡大会上的一支游行队伍在行进。

奥地利不仅在德意志联邦中占据主导地位，还控制着意大利。它与俄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对法国的动向给予密切的监视，但它的实力已不足以支撑与大国的角逐。据统计，奥地利在1840年的人口构成中，共有640万日耳曼人、1482万斯拉夫人、430.5万匈牙利人、454.8万意大利人、156.7万罗马尼亚人，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民族成份。由于外债规模庞大、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生产技术落后，这个国家在1811年时即已走向经济破产，财政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扭转。俄国驻维也纳公使在1820年的报告中写道，奥地利的财政情况已破败不堪，只是由于越来越多地向外国借贷大量资金，这个国家才得以勉强维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将成为奥地利的一场灾难。

普鲁士国力强盛的一大因素，在于其经过改革后效率得到提高的政府管理。维也纳会议结束后，哈登贝格继续进行改革，直到其于1822年



去世。他强化了政府各部和国务会议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堵绝了恢复革命前那种君主专制主义政体的道路。不过，在自由派官僚政府中居于多数地位的仍是贵族人士，而且在 1825 年以后，随着政府为了节省开支而大幅度减少公务人员的数量，自由色彩就更加淡化了。哈登贝格的改革，无法像许多自由派人士所期望的那样深化下去，而且他还信任梅特涅，对学生及潜在的革命者执行了反动政策。在普鲁士军队中，贵族阶层也占据了大多数地位，由此对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制约。19 世纪的德国统一，将有赖于“铁与血” 。而俾斯麦以其冷酷的现实主义所指出的这项最重大的政治决策，将进一步强化军队的地位。因此，德国发展起来的工业社会，其服务的对象将是专制的、贵族的、官僚化的国家，而不会像自由派改革者们所为之奋斗的那样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

这段时间，德意志的一些邦实行了自由立宪改革，其内容包括在建立一定程度的代议制政府，制订书面宪法，并保障言论自由权。其中，萨克森－魏玛大公国于 1816 年制订了自由宪法，巴登、巴伐利亚于 1818 年效仿，而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则分别于 1819 年和 1920 年制订宪法。由此，上述各邦在一定意义上建立了代议制政府，使它们跻身于欧洲最具进步色彩的国度之列。[162]

至于地方政府，虽然持续遭受着贪污腐化之风的折磨，但在这个专制

主义的时代仍享受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不过，它们所处于的弱势地位，令其无力抵挡官僚政治的集权化趋势。在维护地方特权、行会权利等领域接连败下阵来之后，兼及贫困人口的增多，当地政府的自主权已缩水大半。

论及封建时代的一大特殊的残留因素，同时也是对民族融合进程构成的一大阻碍，在于联邦条例第 14 款之规定，即：历史上曾在旧帝国时代统治过独立的邦的约 80 个贵族家族，将继续享有某些特殊权利。因此，这些骑士庄园领实际上仍是国中之国，在近代化的立宪框架中仍继续扮演着封建堡垒的角色。不过在某些场合，它们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巨大。例如在菲尔斯滕贝格家族统治下的多瑙厄申根，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蓬勃发展。虽然他们中间的一些高傲贵族在政治立场上极其反动（威廉·路德维希·冯·赛恩－维特根斯坦公爵就是一个例子），但并不妨碍其他一些人是自由派，例如卡尔·冯·莱宁根公爵。

打击激进民族主义

很多德意志人曾经希望联邦议会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权力机构，其他人则对德意志的未来抱有某些模糊的自由主义梦想。对于“大学生运动”（Burschenschaften）的会员们来说，1813 年的记忆仍然栩栩如生，而每天在课堂和图书馆的单调乏味的生活，更激起了他们对民族解放战争胜利时那份欢欣鼓舞的怀念。许多激进派学生遂呼吁把革命理想化作行动，这在基森和耶拿两地表现得最为炽热。而他们的领袖、在基森从事教职的卡尔·福伦，是一位头脑简单而又耽于幻想的恐怖主义者。1819 年 3 月 29 日，福伦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卡尔·路德维希·桑德，在曼海姆刺杀了作家、俄国间谍奥古斯特·冯·科采比。这桩谋杀案，本来是坚定走和平路线的德意志民族运动在特殊条件下偶发的、近似于精神错乱的一个孤立事件，但一向对革命极其恐惧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却将其视作 [163] 某个广泛政治阴谋的一部分。在这种判断的驱使下，他采取了铁腕的反击措施。1820 年 5 月 20 日，桑德被当众处以死刑，以此作为对任何企图效仿其行为的凶徒的警告。然而，桑德在绞刑架上的英勇无畏的神情，却巩固了他作为自由斗士的形象，后世的人们在 1869 年为他建立了纪念碑。行刑者处死他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但木材在制造了绞刑架之同时，也建成了一座圣殿，供奉着桑德这位年轻的民族主义烈士，接受来自虔诚的爱国者们的敬意。

当科采比被谋杀时，奥皇和梅特涅都在罗马，此后数月一直未回到奥地利。1819 年 8 月 1 日，梅特涅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波希米亚的温泉疗养地特普利策会面，说服普王要严密监视德意志境内一切大学动向、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中止宪政改革。此后不久，来自德意志各大邦的部长们在卡尔斯巴德（今捷克的卡罗维发利——译注）召开会议，拟订出各项



在普鲁士推动下，由18个邦组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于1834年1月1日宣告成立。这是庆祝关税统一体宣告成立的一幅漫画，题为《砍森林》。

镇压措施。就是这些公然违犯宪政原则的所谓“卡尔斯巴德决议”，在梅特涅的大力推动下，却在联邦议会上获得通过，并于1819年9月20日公布执行。梅特涅这时抱定的宗旨是，要么大获全胜，要么全部输光——换言之，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革命就是复辟。他还认定，除非采取反动路线，奥地利将不得不退出德意志联邦。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梅特涅使奥地利巩固了其在联邦中的主导地位，但也由此为奥地利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维也纳的执政阶层看来，奥地利帝国内部的事务才是第一性的，联邦至多是第二位的事务，而梅特涅所主张的在全德境内镇压革 164 命则纯属无事生非。

根据“卡尔斯巴德决议”，联邦向每所大学都派出了一位联邦全权代表进行监视。此后，所有被怀疑有颠覆思想倾向的教师均予以革职，大学生运动遭到取缔，学术自由原则被废除，大学被置于联邦的控制之下。虽然政治气氛在不同的邦有所不足，在某种大学被革职的教授未尝不能在另一所大学重执教鞭，但德意志境内的大学从总体上看都陷入了压抑、绝望、呆板的氛围。

同样是根据“卡尔斯巴德决议”，凡少于320页的印刷物在出版前均需予以检查。篇幅更长的著作，如果包含“教唆理论和恶毒的疯狂思想”，在出版之后也会遭到查禁。为了查找和跟踪革命者，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在美因茨成立。尽管这个委员会并未发现几个此类的危险分子，因而给人以徒有其名的感觉，但这个机构的设立本身，便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恐慌和猜疑的气氛，在这段时期对德意志的思想生活产生了进一步的

摧残作用。

1815年出台的联邦条例曾经许诺，组成联邦的每一个邦都将制订一部宪法。条例的制订者们对这一条款的理解是各邦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但由于在表述上太过模棱两可，因此各邦的解读也大相径庭。有些邦宣称，只要恢复旧式的各省等级议会（Diets），就可满足这一条款的要求了。作为对付革命威胁的最后一件立法，联邦议会通过了《维也纳最后法案》，其中规定各邦的宪法都必须遵守君主制原则。这其实是一种妥协，其倒退的程度并没有像梅特涅及其他反动人士所希望的那样远，南德诸邦业已制订的自由主义宪法因而可以不作修改。另一方面，此一法案的出台，宣告任何关于联邦宪法可望遵循自由路线制订出来的愿望都已落空，而且立宪之路也不可能在各邦独立地持续下去。由此，德意志联邦成为纯粹以镇压革命为己任的一套制度；新式的宪政机制被用来摧毁新兴思想，立宪制度被旧式政权用来消灭立宪主义。

德意志关税同盟

虽然资产阶级的立宪要求遭到了失败，但在经济领域，他们却赢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功。资产阶级希望建立一个全德共同市场，并通过较高的关税予以保护，以便让本土工业在保护性关税壁垒后面获得成长，直到它发展到足以应付英国商品竞争的程度。设立较高关税的动议，对于一向反对自由贸易观念的奥地利，也具有一定吸引力，不过率先采取行动以建立共同关税的是普鲁士。1818年，其境内各省之间的税收壁垒一律予以撤销，由此使普鲁士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市场。同时，它对过境的货物，165 由颇富效率的海关机构征收很高的过境税。这种自由经济思想的目标，不仅是要在普鲁士采取上述关税政策，而且还要在整个德意志增进普鲁士的利益。正如普鲁士财政部长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冯·莫茨所写到的那样，这一政策“与德国统一无关，与（德意志）联邦无关，必要时甚至可以与联邦对着干”。

德意志的大多数邦都把普鲁士的上述税收政策视为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由于新增关税提高了进口谷物的价格，全德各地普遍遭遇了饥荒，更加剧了人们的这种指责。1819年，一群工业家和商人成立了“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Deutsche Handels - und Gewerbeverein），其宗旨是推动建立一个全德关税同盟，在经济陷入严重混乱的现实情况下，刺激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普鲁士通过把邻近的几个邦拉入自己的关税体系，不断扩大自己的关税区。1828年2月，它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缔造了一项关税同盟条约，从而在美因河对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1832至1833年，它又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关税同盟展开了缔约谈判。梅特涅警惕地关注着普鲁士建立关税同

盟之举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试图说服巴伐利亚拒绝加入，但因奥地利谈判小组拒绝就过境税、多瑙河过河关税、奥地利保护性关税等事宜作出任何让步，他的这一企图未能奏效。由此，“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得以于1834年1月1日宣告成立。此后，包括萨克森、图林根诸邦、法兰克福在内的很多邦均立即加入，巴登也不顾法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加入了这一同盟。至此，覆盖2500万德意志人口的一个共同市场，开始在普鲁士政府高效而灵活的操控下运转起来。

在这段时期，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经济才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增长。一直到1846至1847年间，关税同盟内的劳动人口中，仍然只有不到3%的人属于产业工人。对于工业扩张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力来自铁路的修筑，其中第一项重大成果是1827至1832年修建的林茨到布德维斯铁路，不过它是用马拉动的。在英国，斯托克顿至达林顿的铁路从1825年通车，就用上了斯蒂文森制造的机车，而在德国，第一条用蒸汽机驱动的铁路即纽伦堡至富尔特，直到1837年才建成通车。此后，私营公司为修建铁路的高额利润所吸引，以疯狂的热情投入了缺乏协调的铁路建筑工程。政府多方努力，力图使这种混乱的局面恢复应有的秩序，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现在，派驻法兰克福议会的奥地利代表，如果想早一点回到维也纳的话，应该选择的路线是：乘坐莱茵河上的汽船前往杜塞尔多夫，从那里坐火车到柏林，再从柏林前往维也纳。 167

铁路建设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仅相当于先前的20%，客运、货运能力得到飞速增长。对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纳闷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乘坐火车以便少花半个小时到达波茨坦？抱怨如果这样的话，就连那些地位最卑微的臣民也可以和自己这位国王一样快速地旅行了。普王的这种评论虽然显得愚腐可笑，却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铁路为交通业带来的某种民主化，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大规模民航业，同样促进了交通业的民主化一样。更重要的是，铁路建设构成了促进钢铁业、机器制造业长足发展的巨大动力。在实践中，

1837年11月17日，奥斐费迪南修筑的布尔诺至拉格恩的北方铁路建成通车。在德国，铁路建造始于1835年纽伦堡至富尔特的一段铁路建成。此后，德意志很快形成了欧洲大陆最密集的铁路运输网。铁路业对机械工业、钢铁业、煤炭业和冶炼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大推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德意志工业革命。



德意志人逐渐掌握了制造高性能铁轨和稳定机车的技术，各地的冶金厂、工场都可以开足马力加快生产了。

德意志社会

与等级森严的18世纪相比，比德迈时期（意味因袭平庸。比德迈系德国假托的诗人名，其诗实系多人所作，诗味平庸。比德迈时期，指代19世纪早期及中期的德国——译注）至少从表面上看被赋予了更多的平等色彩，人们的服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克俭传统早已化为历史旧事，现在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男士都穿着黑色或者深灰色、暗淡色的西装。不过，在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简明化的背后，旧有的社会差别并未得到消除。1840年时，工业家中出身于工人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背景的约占60%。虽然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贵族们变成富有的实业家者不在少数，但仍有很多贵族对“经商”充满蔑视和不屑，尤其是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贵族被工业财富所诱惑，不惜降低“身份”与工业家联姻，还有不少富有的商人被封为贵族。工业资本主义虽然具有降低社会等级的意义，但这段反动时期采取的复辟政策则起着相反的作用。不仅如此，资本主义本身也必然会导致新形式的不平等。

[168] 比德迈时期的清平乐图，突出地表现在家庭被赋予的重要地位。人们把家庭视作一个私密空间，回到了家，便可以把世上的劳作和奋斗尽抛脑后。家庭被看作一个远离了外部世界各种压力的安全庇护所，它承载着个人的理想和梦想，生命的所有真正意义寄托于斯。这时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选择伴侣时必须男女双方相互爱慕和尊重，一对夫妻的最大希望在于传承家族血脉的儿女们。由于18世纪理性启蒙运动的影响，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已遭到削弱，而对家庭的重视恰恰能够起到弥补作用。

但就在这种似乎得到改善、更趋平等的表象背后，这个时期的德意志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差别，这突出地表现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上。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收入差别也非常之大。例如在克姆尼茨的一家印花布染制工场，最高周薪与最低周薪居然相差13倍之多。诚如此，计算什么平均工资、衡量什么平均生活标准，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到19世纪40年代则更加尖锐。究其原因，在一定意义上是工匠们已无法与大工业生产相竞争，而纺织业尤其如此。因此，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接受社会救济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20-30%。比德迈时期小康家庭中的那种温情脉脉的田园诗风格，怎能抗衡多数人过着凄苦生活构成的反讽？

自18世纪末以来，德国的犹太人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人们不应忘记的事实上，他们在改革时期所争取到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基本上只能算作对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迫害、剥削、排

拉埃尔·冯·瓦恩哈根

拉埃尔·莱温1771年出生于柏林，父亲是一位富有但未受到教育的犹太商人。她是一个极其聪颖、性格外向、充满求知欲的年轻姑娘，从家庭教师那里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法语和数学教育，阅读了伏尔泰、卢梭、费希特、康德以及她最热爱的歌德的著作。

她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羞愧，认为自己出身于犹太人家庭是一种命运的不幸安排。拉埃尔·莱温曾两次与贵族家庭的订婚，但婚约均被撕毁。此后，她鉴于自己长得既不漂亮、又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决定将终身不嫁。她改信了基督教，并把自己的教名（名字，不包括姓——译注）改为弗里德里克。最后，当她43岁那一年，与一位29岁的外交官兼作家结了婚。新郎卡尔·奥古斯特·瓦恩哈根·冯·恩赛，是一个思想观点非常自由化的人。

婚姻生活极其甜美。她在结婚一年后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感到非常快乐的是，我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已经结了婚!事情不论大小，我都可以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去感受。我可以把一切都坦率地告诉瓦恩哈根，一点也不需要隐藏，而我所说的一切都会令他非常快乐和高兴。反过来，我单独一个人时，也会让他感到快乐。"婚后的她，拒绝接受妻子必须听从丈夫、处于附属地位的传统观念，认为妻子应当是丈夫自由而平等的伴侣。她主张，婚姻必须建立在彼此爱慕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而不应当只是一件商业安排或求取社会地位的工具。她突出强调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这种发展只能通过与其他人尤其是她们所钟爱的人的相互关系，才能得到实现。

拉埃尔·莱温在婚前便开始在自己所居住的简陋阁楼里举办沙龙活动。她一般不正式发出邀请，而是采取"来者自便"做法，接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到来，以漫谈的方式，共同探讨文学、艺术和哲学。活动期间，除了由她那年纪老迈的房东为来宾倒上一杯茶之外，连一道点心也不予招待。这种简朴做法，与巴黎的那种执行奢华的贵族沙龙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尽管招待极其简朴，却不妨碍许多身份和地位不凡者光临，例如拉齐威尔亲王、多纳公爵等霍亨索伦家族王子和贵族、弗里德里希·根茨等政治家，以及公务人员、军官、教授和柏林戏剧、话剧界的明星们。她还接待了众多那一时代的著名作家，例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克莱门斯·冯·布伦塔诺、蒂克、拉·莫特·福凯、让·保罗、海涅和路德维希·伯尔纳等。其他一些著名人士还有：洪堡兄弟、施莱尔马赫、雕塑家约翰·哥特弗里德·沙赫道等。

其实，拉埃尔·莱温只是那一时期主办类似活动的众多犹太妇女中的一位。其他著名沙龙主办者还有：亨里特·赫茨、多罗西娅·门德尔松莎拉·莱维、阿马利厄·贝尔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串名单中只有最后两位保留了犹太教信仰。她们所主办的沙龙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并不是因为德意志土地上的犹太人得到了解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她们都是局外人，这些犹太妇女才得以搭建起中性立场的舞台，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以平等的身份聚会。

E·M·西蒙的木刻画:《拉埃尔·冯·瓦恩哈根举办的茶会》





比德迈时期的家庭，被看作是远离了外部世界各种紧张压力的舒适庇护所。这幅由某位姓名不详的画家在于1828年创作的画作，画上人物是威廉·弗里德里希·埃里克一家人，洋溢着比德迈时期家庭的甜美温情。

挤、特殊限制的纠正。在一个真正的世俗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是绝对不会遭受任何歧视的。所以，犹太人获得的解放，如果放在德意志社会抛弃了以庄园为基础的半封建制度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恰恰是整个社会获得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犹太人的解放从来不曾彻底实现，由此可以看出这场改革并不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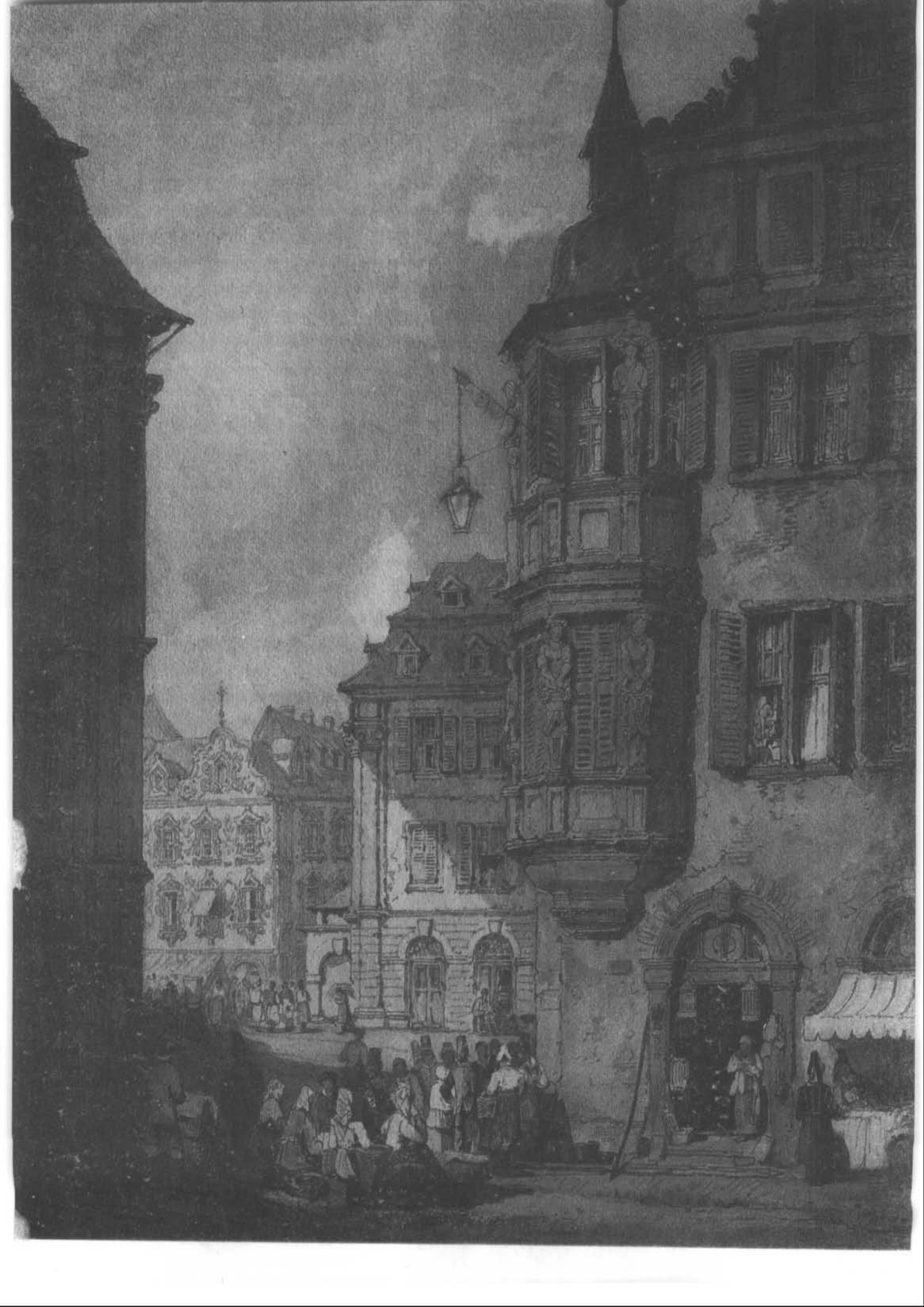
在1816年的德意志帝国境内，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仅占总人口的1.1%，而到了1871年，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比例也只上升了零点一个百分点。但在其间的半个世纪里，犹太群体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时期，犹太人除了少数极富有家庭之外，绝大多数属于赤贫人口，而如今从总体上看，都变成了纯粹的资产阶级。虽然国家当局及犹太群体都曾作出努力，鼓励犹太人经营农业或成为工匠，但未能取得多大成效。由于在几百年里一直被禁止参与农业和手工业，犹太人宁愿维持自己的商人、银行家等传统职业，利用工业的快速增长赚取利润。他们在银行业取得的成就尤其可观：到1882年，在银行及股票证券部门的从业人口，1/5是犹太人。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到19世纪末，犹太人在零售业从业人口中的比例已下降到2%以下。

在德意志，军官团一向是人们提高社会地位的首选目标。由于犹太人被剥夺了此种权利，他们对接受大学教育显示出更大的热情。到19世纪80年代，普鲁士的大学生中约有10%是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假以时日，这些人将作为医生、律师、艺术家等，成为著名人物，成就辉煌事业。但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位犹太人教授直到1859年才在哥廷根大学出现，而第一位犹太人律师则是在1860年才在汉堡出现。

然而，对犹太人由来已久的蔑视并未就此终结，甚至在很多场合还由于上述情况更趋加剧：除了传统上的不信任和猜疑情绪之外，如今又因犹太人取得的成功而增加了妒忌心理。但这一切并未阻碍犹太人对德意志社会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犹太群体也在犹太文化框架内有力地推动了改革运动。德语在19世纪已经成为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用于交往或交易的混合语（lingua franca）。不过，这些变化同样会遇到一些问题：正统的犹太教徒担心这种社会融合将导致犹太宗教的枯竭，危及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但归根结底，日耳曼人与犹太人在19世纪的彼此接近，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当时谁能预见到，犹太人将在未来的纳粹德国遭受毁灭性的灾难！

[171] 第163页图：塞缪尔·普劳特（1783—1852年）绘制的纽伦堡市景。纽伦堡这座繁荣的城市，中世纪时就是德国重要的商业中心，又是一批最著名的艺术家、工程师生活的地方，其中包括声名远播的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译注）。1835年，纽伦堡至富尔特之间的铁路建成，这是全德境内的第一条铁路，可以作为纽伦堡巨大财力和工程人员高超技艺的一个注脚。

[170]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学者取得的最重大成就系出自哲学和人文科



学，而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到了该世纪下半叶，二者的关系突然出现了彻底的颠倒：德意志这片“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涌现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观点。谢林及其“自然哲学”学派以经验主义为名，对牛顿大加讨伐，主张自然界只有运用直觉和冥想才能予以理解。物理学家们，例如维也纳的孚希特斯莱本和慕尼黑的林斯艾斯，对 172 “唯物主义”医学大加谴责，呼吁人们在生病时，综合利用祈祷、双手下垂、冥想的治疗方案，仅少量辅之以更加近代化的药物。可以想见，坚持经验主义科学探索的人士，在探求大自然的奇迹时，要想挣脱这些江湖术士般的医疗观、诗人似的冥想论，需要付出多么艰巨的努力。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年)。1822年，海涅的《诗》(Gedichte)出版后，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接着，他出版了早期的两部重要作品《诗歌集》(Das Buch der Lieder)和《旅行札记》(散文集，第一章《哈尔茨山游记》发表于1826年——译注)，获得评论界高度赞扬，销量也非常可观。1830年，他前往巴黎，并一直在那里度过了后半生。在1834年出版的《德意志宗教与哲学史》中，他向法国读者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思想中蕴含的革命元素。海涅被一些人看作热忱的爱国者，同时被另一些人看成冷酷的卖国贼；被一些人看作原则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同时被另一些人看成唯利是图的马屁精。但不论世人是褒是贬，他的勇气支撑着他孤军奋战，而在大多数问题上，历史证明了他是正确的。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德国科学家当数贾斯特斯·李比希。当他21岁在巴黎师从盖-吕萨克（1778—1850年，法国化学家、物理学家，1808年提出气体反应何种比定律即盖-吕萨克定律——译注）时，被亚历山大·冯·洪堡发现。后者立即在基森大学为他谋得教职。李比希在基森建立了全德所有大学的第一个近代实验室。作为这一时代德国最具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之一，李比希提出了植物的矿质营养学说，成为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发现了三氯甲烷和三氯乙醛，并探究了发酵和腐败的化学原理。他发明了一系列科学装置，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比希冷凝器”。在实用技术领域，他为世人创造出了“李比希肉汁”。李比希是一位化学家，但他的多部著作表明，他在系统论、方法论领域也是一位旗手。

这一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体现于文学理论领域，而富有创新性的写作已被充满哲理性的分析所取代。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所著《新旧文学史》，尝试把文学作品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研究，并试图把中世纪的基督教理想主义融入近代世界的要求之中。黑格尔的追随者、自由党人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盖尔温努斯在《德意志诗歌史》一书中提出，文学的使命在于为建立德意志国家做出贡献。

日耳曼抒情诗歌的伟大传统，在约瑟夫·冯·艾兴多夫、爱德华·莫里克、阿内特·冯·德罗斯特-赫尔斯多夫等人的手中，得到了传承和延续。而以海因里希·海涅和路德维希·伯尔纳为杰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作家，由于参与政治生活，他们的作品在1835年被德意志联邦议会禁止在境内出版，此后很多人被迫流亡海外。这一压制行动的直接诱因，是卡尔·古茨科在小说《怀疑论者沃利》中对教会大加抨击，并号召解放妇女、爱情自由。

变局初显

1830年7月，巴黎爆发革命，查理十世被迫流亡海外，王位落入“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普之手。保加利亚人掀起了反抗荷兰人的起义，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并出台了一部进步宪法。在意大利、在波兰，也爆发

了类似的起义。在德国北部，很多邦都对宪法进行了修订，加入了类似于南部诸邦宪法中的进步条款——只有普鲁士非常突出地是个例外。

在不伦瑞克，公爵的马车受到石块袭击，宫殿也遭到群众包围。由于失去了众多资产阶级、贵族人士和军官团的支持，公爵接受其受人拥戴的弟弟的建议，宣布逊位。人群放火烧毁了宫殿，当局却丝毫未予制止。在英国国王的支持下，威廉公爵继位，并于1831年9月制订了一部新的宪法。

在萨克森，对年纪老迈的安东国王及其首相汉斯·格奥尔格·冯·卡 [173] 洛维茨反动政权的不满愈益普遍化。在王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暴动和示威之后，这位国王再三考虑之后，任命了自己的侄子为共同摄政。富有自由色彩的新政府遂告成立，准备实行一定范围内的改革，并于1831年9月仿效南德诸邦模式制订了一部新宪法。第二年，王国废除了封建义务。

在汉诺威，1830年的暴动也催生了有限范围的宪政改革。但到了1837年，随着身兼英国国王和汉诺威国王的威廉四世去世，这些改革措施也被废弃。新任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上台后，转而推行极其反动的统治政策。在黑森王国，暴动民众威胁选侯威廉二世说，如果他拒绝召开立宪会议，就会爆发内战。威廉二世不为所动，导致全邦各地暴力活动此起彼伏。威廉二世遂求助于联邦议会进行干预，以恢复法律与秩序，同时召集立宪会议在卡塞尔开会，于1831年1月推出了一部新宪法。由于威廉二世拒绝与新建立的邦议会合作，不得不宣布退位，由其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

在1830年汉诺威、黑森等地发生的骚乱中，无论是奥地利、普鲁士还是联邦都听任事态发展，未曾加以干预。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当时的精力放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意大利和波兰，而只要这两个大邦不表态，联邦是绝对无力采取行动的。北德地区的形势，对南德诸邦的自由派不啻是注入了一剂兴奋剂。他们建立了一系列全德范围的联合会，出版了几种新的报纸和杂志，并不遗余力地动员大众舆论。

南德诸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巴伐利亚的帕拉丁。1832年，"声援出版自由爱国联合会"（Vaterlandsverein zur Unterstutzung der freien Press）在此地成立后，呼吁实行出版自由，将其视为德国统一和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的必要前提。该联合会1832年5月27日在汉巴哈组织大规模集会，庆祝"德意志的再生"。与会者达2万至3万人，他们身披象征德意志自由主义的黑、红、黄三色旗，佩戴波兰的白鹰徽章，聆听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演讲。汉巴哈大会这个突出的事件，以大规模集会的方式昭示全德各地的人民都希望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但这场群众运动最终失败了，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民族主义者内部陷入了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极端分裂；其二，当局对运动实施了极端严厉的镇压。在梅特涅

的鼓动下，巴伐利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队进入帕拉丁，逮捕激进分子，拔除各地种植的“自由之树”。民族主义领袖们要么被逮捕入狱，要么被迫流亡海外。

汉巴哈大会举行一个月之后，联邦议会通过了“六项措施”，对各邦议会的权力加以大幅度限制，并成立一个“控制委员会”以确保立宪主义者遵守此项新法。但大多数邦均表示激烈反对此项把联邦法律置于邦法律之上的做法，也不同意成立“控制委员会”这个新的联邦警察机构。一批激进的海德堡大学生冲击法兰克福警察哨所和守卫，进而企图推翻德意志联邦议会，但民众对这一事件无动于衷，并未像大学生们所希望的那样引爆全境的起义。联邦议会遂成立了“政治调查中央委员会”，并派出一个营的士兵镇压叛乱。冲突中，6名士兵死亡，大学生中也有一人丧命。

174

那些实行了立宪民主制的邦，面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政策显得毫无还手之力，而梅特涅则在1834年1月至5日的维也纳部务会议上强行推出了更严厉的压制性法律。1836年，普鲁士共逮捕了204个学生，其中39人被判处死刑，4人被处以车裂刑。后来，这39个死刑犯被改判监禁，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年继位后，全部被赦免出狱。

普鲁士虽然彻底压服了自由派，但来自天主教徒的麻烦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西部诸省。根据(天主教)特兰托主教会议的决议，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通婚后生下的孩子，必须当作天主教徒抚养成人。1803年，普鲁士政府则下令不同宗教通婚后，生育的孩子宗教信仰从父，至少在易北河以东诸省必须如此。1825年，这一命令被推广到普鲁士全境。尽管梵蒂冈教廷急于就此问题达成某种调和，但决议与普鲁士法令之间的互不妥协仍导致了一系列冲突。1837年11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服从普王的各项旨令而被逮捕，波森、埃尔梅兰、库尔姆、布雷斯劳等东部其他诸省，大主教们也因蔑视普鲁士有关不同宗教信仰家庭问题上的法律而被处以监禁。直到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成为新任普鲁士国王后，对天主教会做出重大让步，才使此一冲突告一段落。虽然普鲁士政权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但无论是奥地利人还是南德地区立宪诸邦均未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对于奥地利人来说，普鲁士的激进派实在太激进了，而对于南德诸邦的自由派来说，天主教徒则太保守了。

1837年，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去世，由维多利亚女王接任王位。而在汉诺威王国，王位一向由男性继任，因此汉诺威王国由时年36岁的卡梅兰公爵接任国王。新国王上台后，在取得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后，立即废除了1833年制订的宪法。哥廷根大学的七位著名教授遭到逮捕，其中包括历史学家达尔曼和以《格林童话》闻名于世的格林兄弟之一雅各布·格林，这便是“哥廷根七君子”入狱事件。此事在联邦议会上被提出辩论，但只有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巴登公爵投票支持汉诺威1833年宪法。由于

《蓬头彼得》

海因里希·霍夫曼1809年出生于法兰克福。他创作的《蓬头彼得》，用洋溢着文学与美感的押韵诗句，讲述了多则少儿故事，并配以栩栩如生的插图。霍夫曼早年在海德堡和哈雷学习医学，然后回到法兰克福，从事过多种工作，并曾在一家免费诊所兼职。1844至1851年间，他教授解剖学。1851年，他在法兰克福一家治疗精神疾病和癫痫症的机构任职。1859至1864年间，他在市郊建立了一家近代化的精神病医院，以非常富有进步意义的方式加以管理。假如霍夫曼不曾创作出《蓬头彼得》这部世界上最著名的少儿文学作品之一的话，那么，他也会作为一位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先驱者而载于史册。

1844年，霍夫曼想找一本绘画书籍，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自己当时3岁的儿子。他遍寻未果，遂决定自己写一本这样的书。他知道，对于年幼的儿童们来说，图画比文字更容易打动他们，而当时那些充斥着道德说教的所谓少儿读物无不乏味、刺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能见到的少儿读物"每一部都太过神圣、理性，却又装作天真幼稚，一点不也合乎孩子们的胃口，一点也不真实可信"。于是，他绘制的图片反其道而行之，极尽夸张、滑稽之能事，一点也不刻意追求什么现实主义，而是着力迎合孩子们那充满好奇和幻想的童趣。因为书籍使用厚纸印刷，装订得较为松弛，所以很容易翻动，小读者即使还不懂得爱惜也不大被撕破。这本书问世后初版的1500本在几周之内便销售一空。从那时以后，它的销量已经突破了2500万本！

这部书的主人公彼得，原型取材于当时一种治疗秃顶的专利药方所作的广告：如果一个孩子弄到一瓶这样的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书中威风凛凛地站在基座上的这个小男孩（见插图），是一个极其自信的"无政府主义者"，坚决不允许大人为他修剪指甲和理发。在书籍的原始版本中，作者并没有为这个小男孩起名字，但后来他的"知名度"已非常之高，终于在1846年的第三版的封面上，得到了"蓬头彼得"的大号。

书中那个因为玩火烧了自己的"小保利娜"的故事，系根据一则真实的故事改写。"明亮之星们"的故事最早出现于1829年，曾引发了一系列事故。至于书中的其他故事，目的在于教导3岁到6岁之间的儿童不要虐待动物、不要嘲笑其他种族的人、不要吮大拇指、不要拿自己的食物玩耍，还有不要在椅子上左摇右晃。

霍夫曼在自己的医疗工作中，观察过许多食欲减退症、多动症、失忆症患者，以此为题材于1859年出版了一部医学专著。他还为自己治疗的年纪病人绘制图画，发现这种做法有助于减轻病情。正是这个作为业余画家兼打油诗的霍夫曼，正是这个作为快乐、慈和、诙谐地逗儿子开心的霍夫曼，正是这个以进步的治疗观对待病人的霍夫曼，多重身份集于一身才使得他的《蓬头彼得》成为一部天才之作。

《蓬头彼得》1845年英译本的两项插图





对其一个成员邦的非法行径加以纵容，德意志联邦已失去任何公信力。后来，“哥廷根七君子”周游全德各地，谴责汉诺威政权，并充满轻蔑地批[176]评联邦陷入的失败。达尔曼在文章中写到，联邦议会的决议案足以说明，通过和平方式在德意志实现宪政的道路已走到了绝境。

尖锐而富有战斗精神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在许多诗歌中加以表达后，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其中一首题为《德意志兰之歌》(Deutschlandlied)，作者是霍夫曼·冯·法勒斯列本，后来成为国歌(《德兰之歌》共有三段，1922—1945年被定为德国国歌。195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取其第三节为国歌。两德统一后仍采第三段为国歌——译注）。这种新型民族主义针对外部对象，猛烈抨击对法国的“罗马主义”和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虽然民族主义者内部存在着政治分歧，但对共同敌人的仇恨足以掩盖这一切。这一时期，世界大同的自由主义已被充满丑陋的法西斯腔调的民族沙文主义所取代。

1840年成为一个转折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这一年成为新任普鲁士国王。此君非常聪明却又优柔寡断，既充满了对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日耳曼理想的浪漫主义情怀，又认定在这个奇特的野蛮精神复活时代，理应有民族主义的一席之地。他有一种令人称奇的本领，即：他可以声色俱厉地发表一通看法，但细细琢磨之后，却会发现他的话要么模棱两可，要么全是废话。但不管他身上存在多少弱点，比起奥地利的斐迪南一世相比，已可称得上一位绝对的贤明之君了：斐迪南是一个近于白痴的癫痫症患者，而他的宰辅路德维希公爵则是个唯唯诺诺、毫无作用的家伙。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执政后，出台了一系列富于进步色彩的政策，结束了与天主教会的争斗，并赦免了大量的政治犯。这令改革派受到了极大鼓舞。但当改革派顺势提出立宪改革要求后，这位国王却不予采纳，而是说出一大通充满哲理意味的话加以推托，甚至把那些过于激进地鼓吹宪政自由者送入监狱。1842年，他允许来自各省的代表在柏林集会，对政府提出建议。然而，这一做法并不足以令改革派满意，而对于保守派来说则已经走的太远，更不用说俄国和奥地利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梅特涅不约而同地向他提出警告，不得再对自由派做出任何让步。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希望实现王权与罗马教廷的和解，其思维方式更接近于德意志民族而非单纯的普鲁士立场，1842年9月举行的纪念续建科隆大教堂的盛大典礼，就颇能说明这一点。这座哥特式教堂，自1559年以后其修建工作便半途而废了。在续建仪式上，两位主要讲话人分别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及在梅特涅陪同下专程赶到科隆的奥地利约翰大公。普王在讲话中称，最终完成科隆大教堂的修建工程，将成为德国统一的象征。约翰大公也说：“只要普鲁士、奥地利、德意志其他地区，以及所有讲德语的地方，都联合起来，我们将像山上的巨石一样坚不可

摧。”而在报上的报道中，大公的话被换成了“不再有普鲁士和奥地利，而是只有一个德意志，一个像我们的大山一样坚不可摧的德意志。”后来，约翰大公被任命为法兰克福议会的“联邦摄政王”，恰恰要感谢报界对其发言的错误报道呢！

1847年，为了克服国家的财政困难，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柏林召集“联合省议会”。各省议会派出与会的共有612名代表，大多数是贵族地主，其中许多人是赞成立宪改革的自由派。普王提交联合省议会讨论的一 [177] 个主要议题是发行3000万泰勒的债券，以修建从柏林到柯尼斯堡的东方铁路。联合省议会要求必须先行讨论立宪，否则将拒绝提供担保。在这种情况下，普王解散联合省议会，并下令铁路建设工程下马。

巴伐利亚政治危机的引燃，则是由于一个浪漫的情事。时年60岁的路德维希一世，一向酷爱猎艳，这时又被一个名叫利默里克、艺名唤作洛拉·蒙特兹的爱尔兰年轻舞蹈演员弄得神魂颠倒。虔诚的天主教徒们对老迈国王的丑态怒不可遏，而在他提出要授予自己的“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还必须妇、密友，在宫廷中颇有影响，曾促成法奥结盟。此处喻指情妇——译注）兰茨菲尔德女公爵头衔时，推行反动政策的政府宣布辞职。新一届政府的自由派立场虽然要浓厚得多，但对国王的丑闻却更加强烈地予以反对。当这位年轻的女公爵招募了一位自由派学生作为保镖后，反对的声浪已趋于沸腾。这时，路德维希一世才幡然醒悟，与洛拉分了手。后来，洛拉离开了慕尼黑，顺利地当上了别的男人的情妇。再往后，她在45岁那一年，带着追悔之情，在长岛的阿斯托里亚去世。

在汉诺威，恩斯特·奥古斯特继续对议会两院的立宪改革要求置之不理。在黑森，新任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与地方势力展开对抗。在萨克森、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各邦议会中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呼声都越来越高。甚至在联邦议会，主流思想也显而易见地趋于更自由化，令人吃惊地就公布其议事程序、解除新闻检查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争论。普鲁士赞成出版自由，在联邦议会中取得了对奥地利的多数地位，通过了更为宽松的新闻检查法令。此后，联邦议会收到了数不胜数的建议，要求按照更加自由化的路线改革联邦，其中包括来自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科堡公爵艾伯特的一份备忘录。

普鲁士外交大臣约瑟夫·马里亚·冯·拉多维茨建议，联邦应制订一项共同的法令，并增进德意志诸邦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改革各邦的军队。他还提出，如果奥地利不同意这些建议，那么普鲁士将单独行事，或者向联邦议会发出呼吁，要么与有关的邦进行个别谈判。拉多维茨表示，只有普鲁士始终与整个德意志同荣辱、共命运，而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帝国奥地利，其对德意志事务的关心至多能算作半心半意。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未尝不赞同拉多维茨的看法，但却无法认同一



建于1260至1270年间的柏林旧市政厅，后于1866年破败拆毁。这是威廉·布吕克1840年创作的油画。

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没有了的里雅斯特，没有了蒂罗尔这个神奇的大公国，这样的德意志，”他充满感情地宣称，“简直比一个人没有了面孔还要难看。”甚至梅特涅也已做好了讨论拉多维茨建议的准备，下令召集一个会议，于3月25日在德累斯顿讨论联邦改革问题。不过到了那个时间，革命已席卷了德意志，梅特涅本人也丢了官。

这些年里，社会生活条件每况愈下，令人痛心疾首。大量失业、贫困、饥饿，种种现象像瘟疫一样席卷了德意志许多地区。从1845年以后的[178]连年欠收，导致柏林、维也纳、斯图加特和乌尔姆爆发了抢粮风潮。在上西里西亚，有据可查的因营养不良患上的斑疹伤寒症就有8万件。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很高，众多企业破产。不过到1848年革命爆发时，德意志经济已开始趋于好转，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也大幅度增长了。经济困难加上政治上的不稳定，导致局势颇具爆炸性，但随着经济回复增长，人们的革命激情也要淡化许多。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

19世纪40年代中期，德意志各地遭遇了一连串的灾难。1843至1847年，因马铃薯疫病和谷物欠产而导致的大面积饥荒，在1847年达到最高峰，仅在西里西亚一地，就有8万人因营养不良患上斑疹伤寒症，其中约1.6万人丧命。在不包括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地带的德意志各地，单在1847年就爆发了100余起暴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这一年4月在柏林发生的"马铃薯革命"。

自由派医学教授鲁道夫·冯·菲尔绍就西里西亚情况撰写的一篇详细报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左翼力量有效地利用了饥荒和贫困问题，对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提出置疑，在动荡的政治形势下，把局面推向了革命。

饥饿令工人阶级陷入严重骚乱。从1844到1847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45%，而遭受的苦难最惨重的当数西里西亚的亚麻布纺织工人。在普鲁士，直到1847年，传统手工棉布织布机仍有116832台，而机械动力的仅有2628台。羊毛、亚麻布纺织业，二者比例也大体相当。因此，德意志纺织制造业无法与英国人竞争，即便德意志关税同盟提高了保护关税也无济于事。究其原因，在于规模小、产量低就意味着成本高、出口量下降。

随着德意志的羊毛和棉花产量在不断上升、本土制造商逐渐具有了与英国、法国、比利时进口产品相抗衡的本领，亚麻布纺织业陷入了停滞和倒退。这项产业仍然是按半封建性质的方式组织的，使用的设备已极度老化和过时。到了1844年，由于贫困、饥荒，兼因政治局势的不稳，终于在绝望的工人阶级中间引发了一场革命。纺织工人们冲击工厂，捣毁了机器，烧毁了记载他们债务的账簿，然后涌向工人老板的庄园前示威。当局调来军队予以镇压。三天后，一切都恢复了寂静。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悲惨生活，令同时代的人们怒不可遏，也激起了海涅、杰哈特·豪普曼、康特·珂勒惠支等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但从本质上看，纺织工人们是工业革命的无辜牺牲品。他们的不幸，源于德意志纺织工业的落后；只有用机械纺织机取代手工纺织，才能克服这种落后，而这必然夺走他们的饭碗。虽然这些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坚持了下来，在1848年至1850年其实际工资得到了罕见的大幅度增长，但大多数人虽然未被疾病和饥荒夺走生命，也不得不加入人数越来越多的赤贫大军。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悲惨命运，令卡尔·马克思更加坚信自己的论断：群众的绝对贫困化，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卡尔·威廉·许布纳（1814—1879年）创作的油画《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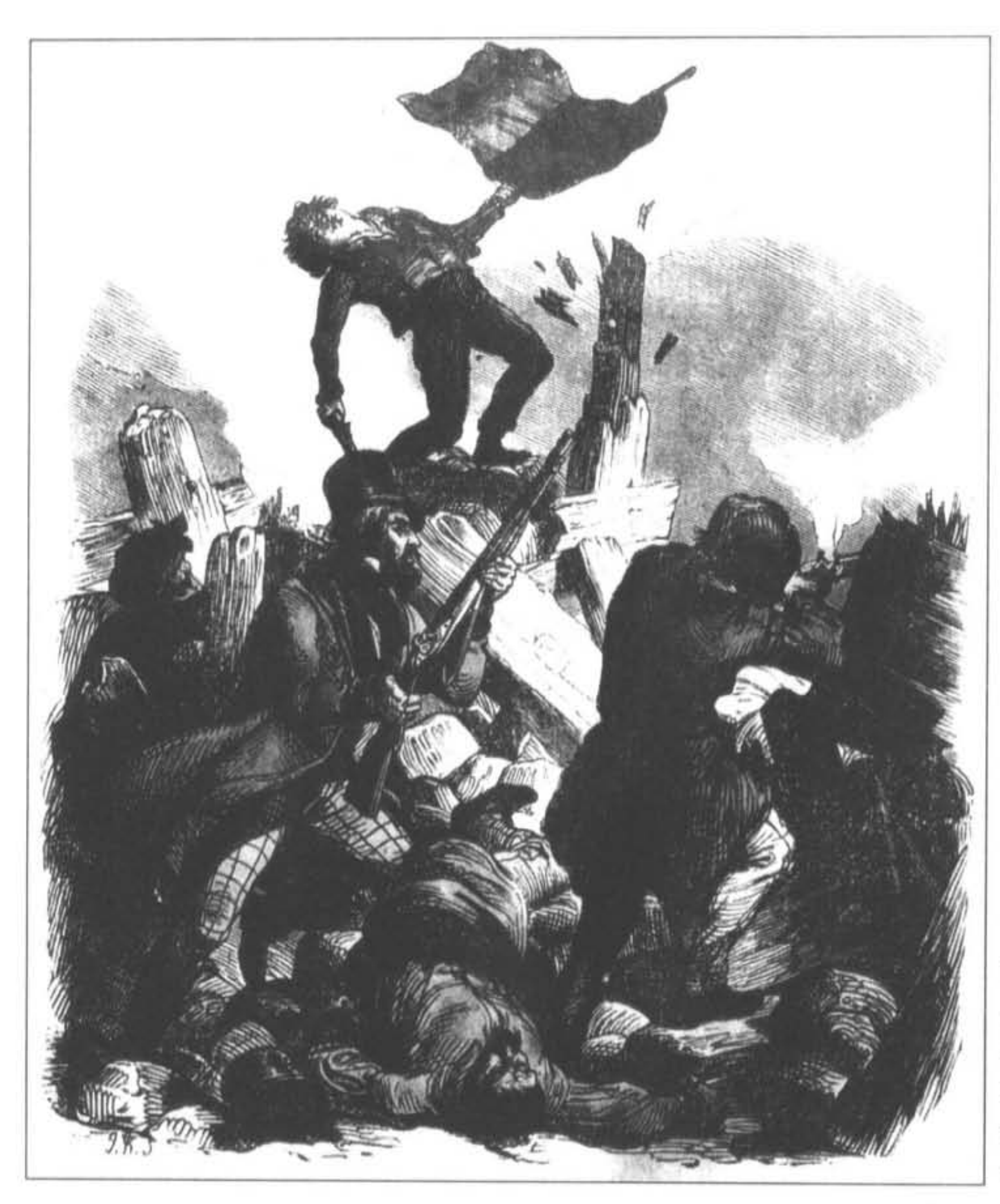
第八章 德国的统一

[180] 1848年2月24日，巴黎街头筑起了街垒。不久，大势已去的国王路易·菲立普逃往国外，法国又变成了共和国。这一年的1月，意大利已经爆发过革命。而到了3月3日，匈牙利的激进自由民族主义者科苏特呼吁哈布斯堡王室进行宪政改革。鉴于德国业已在聚集改革动力，上述事件必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2月12日，自由派出版商弗里德里希·巴瑟曼便曾在巴登议会发表了一通充满激情的演讲，号召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在巴登、符腾堡和黑森，人们迫切要求实现新闻自由、实施宪政改革、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以及成立一个全德议会。

1848：革命年

1848年的德国革命运动，原因复杂，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各邦首府，民众要求现政府自动下台；工匠和手工业者沉溺于捣毁机器运动，把新兴工厂和机器视为仇敌；农民要求废除封建义务，频频劫掠和烧毁地主贵族的庄园。民众还袭击军火库，把自己武装起来。激进分子梦想建立乌托邦式的美好未来，更冷静些的法学家则努力绘制宪政改革的蓝图。3月5日，主要来自德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的51名改革人士，在海德堡集会，其中既有赫克尔、施特鲁韦等共和派，也有以黑森州一些著名自由主义者海因里希·冯·加格恩为代表的拥护君主制度者。加格恩等人希望由普鲁士国王担任皇帝，恢复德意志帝国。在这次会上，自由派的声音压过了激进派，遂决定在法兰克福召开一次"预备会议"。为此，任命了一个七人委员会，负责遴选574名代表。

议会3月1日曾发表过一个声明，呼吁国民克制。3月9日，议会接受自由派的黑、红、黄三色旗为联邦国家的旗帜。次日，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中包括17位温和自由派人士，提议进行宪政改革。3月底，议员们开始商讨这一改革事宜。与此同时，担心激进派可能占据优势的海因里希·冯·加格恩，与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拿骚和两个黑森进行谈判，希望藉由现有议会一途，通过现存各个政府实现联邦制改革，而不要出现一个可能会表现得非常激进的国会。但这些努力均归于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巴伐利亚的抵制。



画上描绘的场景是1848年3月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的街垒战斗。柏林巷战中至少有230人丧生。后来，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下令军队从城中撤走。

在很多邦，反动制度都被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温和自由派人士。各邦希望通过如此安排，使激进分子无从发挥威力。例如，加格恩被任命为黑森-达姆施塔特邦首席部长。巴登、符腾堡、汉诺威、萨克森，以及几乎全部较小的邦，都成立了新的温和派政府。在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一世迫于情势，于3月20日逊位，其子马克西米连任命了一个改革派政府，不过 181 政府首脑由保守的封建主义者布雷·施泰因伯格伯爵担任。至于其他各邦，这场变革则充满了暴力。3月13日，维也纳上演的巷战，导致60人丧生，奥地利首相梅特涅逃离了这个国家。不过，以科洛夫拉特伯爵为首的新政府仍由代表旧制度的人物组成。5月15日，维也纳又爆发了新的示威，国王不得不逃走，激进派遂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显而易见，各派政治势力已不可能和平共处。

普鲁士各地的示威活动此起彼伏。国王之弟威廉亲王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但大批军队出现在柏林，却只能使局势朝更加动荡的方向发展。当梅特涅政府在奥地利垮台的消息传来后，腓特烈·威廉四世决定采取一个和解姿态，于3月18日宣布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立即召开联合会议、制订宪法。在柏林的王宫外，聚集了大量民众，一些人是前往那里感谢国王，另一些人希望推动国王在改革的路子上迈出更大的步子，还有一些人则是要求军队撤出柏林。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下令部队驱散示威群众。于是，双方发生了交火事件，示威者筑起了路障，至少有230人在冲突中丧生。军队无法清除路障，国王被迫下令撤退城内驻军。腓特烈·威廉四世还参加了那些在冲突中丧生者的葬礼，尔后又出席了一个把武器装备移交给革命公民卫队的仪式。3月21日，国王骑马巡视柏林，衣服上缀有象征革命的黑、红、黄三色，并对群众宣称："我身上有着并不属于我的这几种颜色，但我要的并不是王冠，我也不想进行统治。我想要的是德意志的自由、德意志的统一，我要的是秩序。这一点，我可以向上帝起誓！"同一天，他还签署了一项宣言，其中一句话非常著名但其含义却众说纷纭："从今天起，普鲁士并入德意志。"没有人能真正弄清这句话表达了哪些内容，但看上去，似乎人民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普鲁士成立了一个由鲁道夫·坎普豪森和大卫·汉斯曼为首的新政府。这两个人都是来自莱茵区的著名温和派自由主义者，前者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后者则是纺织厂厂主。联合会议再次召开，经表决决定进行一次国民议会的民主选举。5月1日，普鲁士各地进行了选举，以产生出席国民议会以及"法兰克福议会"（全德国民议会）的代表。

坎普豪森和汉斯曼政府决心维护国王的权威、保障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免遭激进政治诉求的威胁。假如不是由于围绕着威廉亲王、奥托·冯·俾斯麦及国王的助手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动集团的话，金融和工业资本家与旧秩序之间未尝便不可能达成妥协。由于这个时候该集团的势力相对而言还不是特别强大，威廉亲王逃到了伦敦，俾斯麦尚无法公开表达其极端保守思想，而格拉赫也还不能对国王形成巨[182]大影响。然而，新出版的报纸《新普鲁士报》，却在传播极端保守主义的福音。由于该报头版有一个铁十字，它很快被人们俗称为"十字报"。至于驻扎在波茨坦的军队，则是急切地盼望着机会的来临，以重新夺占柏林。

由各邦议会代表团组成的预备会议中，激进派居于少数。当弗里德里希·赫克尔提出的共和国主张遭到拒绝后，他带领约40位代表宣布退出。赫克尔前往南方支持者相当之多的巴登，号召为建立共和国举行武装起义。虽然他率领一帮纪律松弛的暴民前进到了弗赖堡，但根本不是来自巴登和黑森的军队的对手，这场结局早已注定的冒险，到了4月底便彻底结束了。

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日期和方式，交由各邦自行决定。因此，各邦选民的规模和选举制度必定呈现出巨大差异，而且对预备会议制订的基本原则也必然会作出很不一致的解读。5月18日，350名代表被选出，已达到法定人数，全德国民议会遂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正式开幕。海因里希·冯·加格恩被选为议长，根据他的提议，议会决定由约翰大公担任帝国摄[183]政王，后者又任命维多利亚女王同父异母的兄弟莱宁格尔亲王担任联邦首相，奥地利的安东·冯·施梅林担任内政部长，普鲁士将军冯·波伊克尔担任陆军大臣。联邦大会遂被搁置一旁，德国有了一个新的政府。

但很快人们便开始怀疑，这个新政府究竟有多少权威可言了。冯·波伊克尔将军下令德意志各邦境内的军队进行检阅活动，为奥地利大公约翰欢呼三次。这一点并不能满足法兰克福的激进派人士的期望，因为他们希望军队对帝国政府宣誓效忠，但对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来说，却又走的太远了：它们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这项要求。汉诺威宣称，由于天气不好，阅兵仪式无法举行。巴伐利亚倒是为大公高声欢呼了，但同时呼喊的对象还有它的邦君和德意志民族。当然，其他诸邦的规模不大的军队，一般都忠实地服从了冯·波伊克尔的旨令。

法兰克福新政府在争取各个大国的外交承认方面，同样难以取得成功。不论是沙皇专制的俄国还是共和制的法兰西，都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英国人似乎更富同情心，但其首相帕默斯顿爵士对于是否要承认一个能存在多久尚在未定之天的政府，难免大费踌躇。虽然确实有一些欧洲国家承认了这个德国的新政府，如瑞典、荷兰、比利时、瑞士等，美国也出于鼓励这一对联邦政治体制新试验的目的，给予了外交承认，但凡此种种，在各个大国拒绝承认面前便显得苍白了，也无助于改变新政府不能切实履行治理职能的先天缺陷。可以说，联邦政府既没有行政权、没有财力、没有军事支持、没有宪法，而且其议会一旦面临重大问题，也会毫无例外地分化为若干个集团。

1848年春夏两季的德意志政坛，虽然表面上显得纷纷攘攘，煞是热闹，实际上却漫无目标，乏善可陈。单单是在普鲁士，便有50个保守派团体、300个自由立宪派组织和250个民主集团。其中，组织最为严密的是天主教组织，虔诚的“宗教自由联合会”呼吁把教会的权利明确写进宪法。保罗教堂的法兰克福议会所获得的捐款，90%以上来自天主教徒。到了10月，第一届全德天主教大会在美因茨召开，这是1848年这个“革命年”中举行的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超越议会的集会。

普鲁士的地主们组成了所谓“容克议会”，选举了一个50人委员[184]会，以期对普鲁士国民议会施加影响。在法兰克福，工匠和手工业者们成立了反动的“工商业者全体大会”，谴责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政策，要求恢复职业行会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免遭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侵害。至于自由派和激进人士，这时仍然陷于严重分化，虽然他们也做了一些努力，以

格林兄弟1850年的一幅银板照相。站立者是雅各布（1785—1863年），坐着的是威廉（1786—1859年）。这对兄弟因收集了大量德国民间传说而闻名遐迩。雅各布曾经是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的一位代表。



便在民族的基础上达成某种联合。而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派和反对资本家的天主教徒之间无可消除的分歧，也使对工业社会持批评态度的势力难以发挥较大影响。

也许德国人生来就是这样吧：他们认为，原则问题的处理，较之以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更加紧迫。经过连篇累牍的辩论之后，法兰克福议会终于就一部分根本权利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其中并不包括社会权利以及资本家坚决主张的财产权。至于民族主义问题，引发的争论更加激烈。波兰民族主义者拒绝承认日耳曼代表有权为波森（今波兹南——译注）人代言。7月24日至27日，议会就波兰问题展开辩论。议会中的波兰人、神学家扬·雅尼谢夫斯基充满激情地呼吁全体议员，使波兰人和日耳曼人享有同等地位。虽然议会表示接受该项提议，但这篇发言并不能改变辩论的结果：波森被宣布为德意志联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来自南蒂罗尔的六位意大利代表，提议特伦蒂诺和罗韦雷托不再是联邦的组成部分。在此后的辩论中，右翼和中间派分子都发表了许多愤怒的，甚至不无残酷和种族意味的讲话。例如，雅各布·格林宣称，提出此项动议者便是“德意志”的敌人。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劳默尔则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提出自古以来便有战胜的民族与被征服的民族之别，权利归由前者。他的结束语让其他代表感到酣畅淋漓：“德国宁愿消亡，也不会投降，不会交出祖国的任何一片土地。”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捷克人在弗朗兹·帕拉基领导下，成功地抵制了法兰克福议会选举工作，并在布拉格召开了斯拉夫人大会。聚集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与会者们对此痛心疾首，其中一位代表把波希米亚称作“插进德意志这棵橡树中，企图将之劈开的一根楔子”。主张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均是联邦组成部分的动议，在表决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许多左翼人士认为，日耳曼人将为这些落后地区带去进步和文明，因而也投了赞成票。

根据1460年签订的《里本协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永远联合为一体，但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这时想把它并入丹麦。为了维[185]护联邦的主张，普鲁士、汉诺威和其他邦国的军队，在普鲁士将军弗兰格尔率领下，前去镇压丹麦人。虽然面对着英、法、俄国的压力，但冲突双方最终在瑞典人的调停下，于1848年8月26日在马尔默达成了停火协定。协定规定，德国军队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撤出，而民族主义者在基尔成立的临时政府也宣告解散。政府遂提请国民议会批准该协定，然而左派代表认为这是对日耳曼民族利益的背叛，因此坚决予以反对。经过表决，议会以238票反对、221票赞成，否决了马尔默停火协定，迫使莱宁格尔政府因此辞职。不过，此后部分中间派代表改变了主意，对新政府无法取得过半数支持率的前景感到担忧，因而在后来的表决中改投了赞成票，使停火协定得以以一票优势获得了批准。



1848 年，没有政治党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露面。志趣相投的改革家都在当地的小饭店和啤酒馆里碰头，此后这些议会小派别都被以此来命名。如俾斯麦所言，遍及全德的政治宴会都在这样的场所举行，他们提出了许多议案和表决，但只有极少数被接受。

批准停火协定的第二次表决于 1848 年 9 月 16 日进行后，法兰克福第二天便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矛头直指保罗教堂里的“叛徒们”。新任首相施梅林调集了驻扎在美因茨附近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很快，示威者在法兰克福筑起了街垒，并试图冲击保罗教堂。在随后的巷战中，80 人丧生。事态的发展，似乎完全验证了许多人的看法：左派都是赤色共和派、嗜血的革命者和自行其是的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政坛重心这时开始向右倾斜。法兰克福议会既已托庇于奥普军队的保护，一旦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再愿意如此，它便会完全失去效力。果然，上述两邦的封建反动势力促成了这一结果。

在普鲁士，一方面是稍显激进的国民议会，另一方面是国王及其反动顾问们。随着形势的演变，部分议员试图与王权达成妥协，左翼力量遂陷于分裂。11 月，腓特烈·威廉四世改组政府，任命勃兰登堡伯爵弗雷德里克组成新政府。12 月 5 日，他解散了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

法兰克福议会坚决主张，如果把奥地利包括在联邦之中，则必须将王国中的日耳曼人居住地区与其他地区明确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哈布斯堡王国必须一分为二。然而，这一提议是年仅 18 岁的新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不可能接受的。法兰克福议会提出，帝国皇位应交由普鲁士国王执掌。1849 年 4 月 2 日，议会代表团前往柏林，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拒绝。这位国王坚定地信奉君权神授说，声称自己不能接受“一顶由议会多数赋予的皇冠”，甚至将之喻为“（标志）奴隶（身份）的铁项圈”。尤有甚者，他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德国统一的希望，还彻底摧毁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合法性：5 月 14 日，普鲁士政府敦促约翰大公解散法兰克福政府，并命令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所有普鲁士代表辞职。 186

事实上，普鲁士这样做只是追随了奥地利的步伐：在更早些时候的 4 月 5 日，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便已命令所有奥地利议员辞去职务。奥普



一则讽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漫画，称他要求调动炮兵对付1848年革命。但这一指责并不符合史实；事实上，他为革命公民卫队提供了武器。

两邦的这些做法，令此前关于制订德国宪法的辩论彻底失去了意义（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制订出宪法，规定建立统一的德意志联邦），也令极左派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在德累斯顿，他们筑起了街垒；在普鲁士多个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暴力冲突，部分后备军（地方军）也加入了叛军。在伊瑟隆发生的后备军与正规军间的冲突中，丧生者达100人。在符腾堡，邦君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感到接受联邦宪法已是无法避免。还有，帕拉丁领地的游击队拿起了武器，巴登的军队发动了兵变。不过，这场“五月运动”主要局限于帕拉丁领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生活地区，而未波及到莱茵兰、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工业化地区。

187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缓慢地却又是无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了。1849年5月4日，依旧认为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意见的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呼吁举行新的选举，但约翰大公拒绝采取此种失去现实意义的步骤。数日后，加格恩也服从了普鲁士国王的命令，与中间派的另外60位议员一起辞去了职务。这群人离开法兰克福时，宣称宪法已经制订完毕，要想使它发生效力，其实只需要一位国家元首予以推行了。左派势力也同样对现实缺乏足够认识。他们相信选举将可在7月15日举行，忠实的民主派的坚强核心将会完成创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这项光荣任务，如果有必要，便用武力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大多数中间派和右翼人士都离开了保罗教堂，留在国民议会的便大多是左派了。约翰大公任命了一个由赛恩－魏特根斯坦亲王为首的联邦新政府，但随后便在信任投票中败下阵来：反对票191张，赞成票12张，弃权票44张。然而，这个政府依旧留在台上，倒是很多投了反对票的议员

不得不屈辱地离开了法兰克福。留下来的强硬左派无法与“五月运动”建立联盟以形成一支革命力量，大多数人在投票中均主张把国民议会迁至斯图加特，以避开驻扎在法兰克福和美因茨的普、奥军队。他们或许还与符腾堡的革命者建立了联系。一部分议员依旧留在法兰克福，但大多数人都 188 去了符腾堡的斯图加特。议会在斯图加特仅存在了19天，便被当地政府军解散了。令他们倍感遗憾的是，当地的民众对他们的护宪事业根本没有什么激情。

普鲁士军队在各省恢复了秩序，镇压了萨克森的叛乱，又开进帕拉丁领地，打垮了那里的由波兰将军斯奈德率领的纪律松弛的叛军。威廉亲王，亦即后来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个皇帝，从伦敦回到了德国，并因其对革命者的穷追猛打，博得了“炮弹亲王”的雅号。在巴登，叛军的首领安东·冯·米尔罗斯拉夫斯基，也是一位波兰人，他的军事组织才能比斯奈德稍胜一筹，但毕竟双方实力悬殊，不久也被迫放弃了抵抗。此后，普鲁士当局进行了一系列军法审判，处决了数不胜数的叛军。共有8万人离开了巴登，其中绝大多数去了美国。从1849至1854年间，约有110万德国人移民国外。

普鲁士军队镇压了革命。腓特烈·威廉四世比较认同普鲁士外交大臣

左下图：费尔迪南德·瓦尔德穆勒（1793—1865年）以伊斯歇尔附近的风景为题材创作的绘画。

右下图：莫里茨·冯·施温德（1804—1871年）于1855年创作的《造访画家之家》。





约瑟夫·马里亚·冯·拉托维茨将军的“小德意志方案”，即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同时又与奥地利保持紧密联系，但这却是他的那帮反动顾问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势必把令人不快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势力牵涉进来。同样，奥地利人也不会接受这一方案。在拉托维茨的安排下，普鲁士与萨克森、汉诺威结成“三王同盟”，在埃尔富特组建了议会，并着手通过这个议会与参加同盟的各邦政府共同制订一部宪法。1849年7月，包括加格恩、巴瑟曼和雅各布·格林在内的约150位自由派人士在哥达城聚会，最终认为普鲁士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妥协方案。也就是说，“哥达城议员”们背弃了3月28日版联邦宪法的自由民主原则，转而想用一个以反革命的普鲁士为首的反动联邦取而代之。这些人为自己支持普鲁士的立场进行辩解的理由是，普鲁士1848年12月的宪法创设了下议院（普鲁士关于改组德意志联邦的方案，主张把德意志的行政、外交和管理军事的权力授予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各邦君主的联盟，其他事务由各大邦君主联席会议管理。在君主联盟之下设立两院制的全德议会，下议院由选举产生，国家院由各邦政府和议会的代表组成——译注）。然而，这个议院中的1/3代表，系由交纳税收最多的4.7%的人口选出的，另外1/3代表由纳税额较多的另外12.6%的人口选出。也就是说，纳税较少的82.7%的人口，其选举的代表只有1/3。这套旨在保证保守势力在议会中居于多数地位的选举制度，将一直沿用到1918年。

左派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震惊和不安，遂抵制了埃尔富特议会的选举。至于保守派，对这次选举也根本谈不上热心。参加埃尔富特联盟的共计26个邦，只有12个接受了新宪法。鉴于奥地利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巴伐利亚也倾向于奥地利的立场，它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指出，埃尔富特议会违反了联邦的法律。随后，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组成“四王同盟”，共同支持由奥地利提出的“大德意志联邦方案”，其关键内容有二点，一是把哈布斯堡王朝中的非日耳曼人居住地区一并纳入，二是只设立名不副实的议会。这样，自由派不得不面临着两难境地：要么接受一个对自己稍作让步的“小德意志方案”，听任反动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普鲁士发号施令，要么对民族自决原则视而不见，接受一个包括非日耳曼人居住的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统治地区的“大德意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也毫无自由主义可言。

189

后世的人们往往认为，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原因在于德国自由派和民主力量是一帮没有“脊梁”的庸人。但事实上，革命的失败并非德国民族特性的某个具体方面造成的，而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守力量这时实力还占据着绝对优势，革命队伍在政治、经济、社会目标方面彼此矛盾，缺乏任何明晰的行动方案，每每就事论事地被事态发展拖住步伐，而不能为民族问题寻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德国资产阶级这时已在旧式精英体制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利益，并与之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已无法担当一种全新秩序的旗手。至于无产阶级，虽然卡尔·马克思称之为“革命阶级”，但它的成长经历毕竟太有限了，还不可能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小资产阶级倒是提出了最先进的一些政治理念，但它在经济上主要是力图维持现状，徒劳地对抗工业资本主义的大踏步前进。资产阶级在面对社会下层的激进主义时，选择了向保守势力寻求保护。至于小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同保守派一样，对资产阶级经济能量充满恐惧，因而双方颇有共同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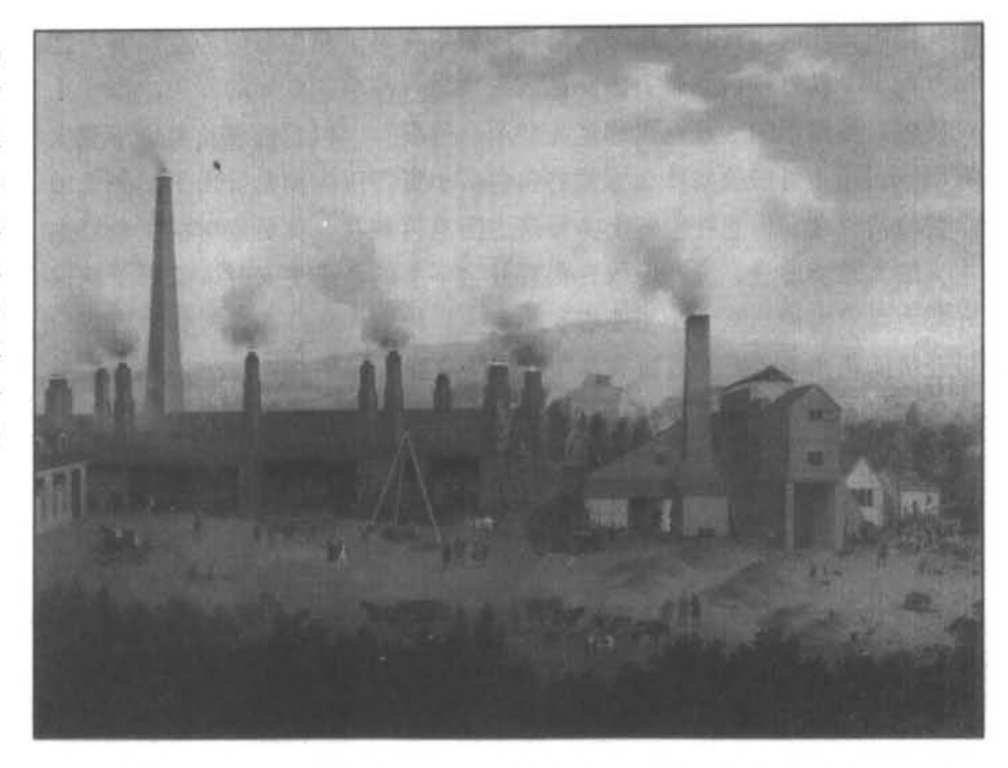
所以，1848年为德国留下的遗产是悲剧性的。“教授议会”那些纸上谈兵的议案及其对政府的信任投票，被视为议会民主空洞无用的例证。激进派被描绘成暴力成性、胸中无物的幻想家，无法给国人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于是，旧秩序倒充满了种种美德，成了现实主义的代名词，而与之相对的自由派的理想主义显得苍白无力。

革命之后

埃尔富特议会与奥地利主导下的联邦议会渐成水火之势，并终于因为黑森公国发生的暴动而走向了冲突。1850年，黑森的选侯宣布在境内实行军事管制，但军队、法院和文职当局都拒绝听从。联邦议院投票表决对此进行军事干涉，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遂派军队进入黑森支持选侯，而后者也宣布黑森退出埃尔富特同盟。普鲁士认为，部署在柏林与莱因兰诸邦之间的奥利地和巴伐利亚军队对其安全构成了威胁，也是对其威望的极大羞辱，因而决定同样派兵进入黑森。由于奥地利这时得到了沙皇俄国的全力支持，普鲁士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下风，不得不屈辱地同意谈判。11月28日，普鲁士人在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接受了奥地利方面提出的条件，双方停止冲突。此后，埃尔富特议会被解散，普鲁士重新加入了联邦议会。

虽然世人均把普鲁士的含辱忍让称作“奥尔米茨之辱”，但奥地利从这一让步中到底获得了多少收益呢？事实上，德意志大地谁主沉浮这个根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奥地利既已失去了一举击垮普鲁士的机会，这个 190 机会便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次了。巴伐利亚外交大臣冯·德·普方德腾的话非常富有预见性：“围绕德意志大地的主宰权的争斗已经分出胜负，奥地利是输家。”虽然在1851年1月至5月的德累斯顿部长会议上，普鲁士一直被奥地利压了一头，但仍然成功地挫败了后者把整个哈布斯堡帝国均纳入德意志联邦的企图，从而强化了联邦有关决议的约束力。

1848年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德国工业化进程将不会带来社会结构上的任何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事实上，贵族阶层在此之后，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如，他们在各自庄园中继续保持治安权力，直至1872年和1892年才两次做出调整；在军队，贵族担任高级军官的比例更高；在



铁路建设为投资者提供了一条安全的、回报率相当可观的渠道。对铁路股票的投资，有效地刺激了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铁路建设还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为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边际需求。对于资本能力很低、边际利润不高的德国公司而言，这种需求关乎它们的生存。

文职政府中，也因为被视为政治上可靠人选，而得到极多升迁机会。至于资产阶级，则放弃了政治上的雄心，集中精力于赚取金钱和谋求专业发展。当然，从1846至1873年间，德国经济度过了一段强劲增长时期，为中产阶级赢得大笔财富提供了大好机遇。

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普鲁士才得以夺回1850年的部分失地。奥地利之所以反对俄国，自然有着充足的理由。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希望能够维持现状，推动土耳其来抑制俄国的勃勃野心，甚至还可能在巴尔干半岛获得某些领土。刚开始，奥地利期望能够在保持武装中立的情况下实现上述构想，但到了1854年12月2日，它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同盟协约，占领了俄国放弃掉的多瑙河流域几个公国，随后又向俄国边境派遣了数量可观的军队。

191 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公使俾斯麦，强烈反对和抵制奥地利主宰德意志联邦的企图。当奥地利提议联邦军队的一半应动员起来，支持其反俄政策时，俾斯麦针锋相对地提出，普鲁士应与联邦中希望保持中立的各邦携起手来，组成一条反奥阵线。在联邦议会，他争取到了反对奥地利军队动员提案的多数。对于奥地利的态度，俄国愤恨不已，而奥地利与英法组建同盟的时机又太晚了，因而无法从俄国的战败中获得什么好处。借助于克里米亚战争，普鲁士一方面赢得了俄国的感激，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开罪于英法，更重要的是，它在联邦中挫败了奥地利的图谋。

但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德意志联邦的主导权又迅速转到了中部邦国手中。在奥地利的支持下（正因为如此，普鲁士的接受显得颇不情愿），联邦开始实行商业法，规定了德意志北部地区银币泰勒与南部地区

古尔登之间的固定汇率。萨克森首相博伊斯特还提议进行改革，例如建立联邦法院等，在俾斯麦与奥地利派驻法兰克福议会特使雷克伯格之间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辩。奥地利之所以赞同诸如此类的提议，是希望藉中部邦国的支持，共同对付普鲁士。而普鲁士之所以持反对态度，也正是为了挫败奥地利的种种设想。

1857年，此前即经常被外界称作举止怪异的腓特烈·威廉四世，精神 192 更加紊乱，已无法处理政务，因此其职责交由弟弟威廉亲王代掌。次年，威廉亲王被正式册封为摄政王。令人们大出意外的是，“炮弹亲王”解散了以奥托·冯·曼图菲尔为首的反动政府，代之以自由派与保守派共治的新政府，首相卡尔·安顿·冯·霍亨索伦，是普鲁士王室天主教派系的首领。

威廉亲王希望通过向自由派作一些徒有虚名的示惠，便能在不激起强烈反对的条件下，继续维持原有的许多政策。然而，存在已有80年的反动政府被解职，已足以激起自由派的更大渴望，而邦议会的选举结果，也是自由派获得压倒多数地位。威廉亲王的新政府迫切地希望取得奥地利的好感，而在法兰克福，俾斯麦则在希望利用意大利危机这一机遇——奥地利1858年被法国与皮埃蒙特－撒丁同盟打败，为意大利实现统一扫清了障碍——好好羞辱一番奥地利这个竞争对手。他建议，一定要抓住奥地

威廉·布吕克（1800—1870年）的作品，画中内容中从皇宫纵观柏林主要干道——菩提树下大街。菩提树下大街另一端延伸至勃兰登堡门，两侧矗有霍亨索伦王朝历任国王的塑像。大街在二次大战中遭受严重毁坏，当柏林被一分为二时，无法恢复昔日的宏伟景象。



利与法国之间战争提供的机会，把普鲁士军队调至南方，“背包背到哪里，前方哨所便设在哪里”。公共舆论强烈反对俾斯麦的提议，认为意大利民族主义的胜利、奥地利人从意大利北部的撤出，便是日耳曼事业的受挫。

奥地利希望能够在与皮埃蒙特、法国的争夺中，得到联邦的军事支援。普鲁士外交大臣施莱尼茨的主张是，等待奥地利走向虚弱，为了换取军事支援，不得不在联邦中作出让步。奥地利派出的使者承诺，为获得这种支援，将把阿尔萨斯和洛林让予普鲁士。普鲁士又提出对联邦军队行使最高指挥权，并在联邦议会中与奥地利平起平坐。但是，随着奥军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遭遇惨败，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马上便下令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展开媾和谈判，因此有关军事支援的种种方案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很多德意志人都把奥地利的失败归咎于普鲁士。在他们看来，普鲁士背弃了民族大业。奥地利的失败，便是德意志的失败，日耳曼种族遭受了一次可耻的屈辱。到了1859年，民族情绪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保守化，甚至在民主圈子中也是如此。自由派和民主派分子从1848年的失败经历中认识到，要想取得任何成果，都只能与政府合作，而绝对不能与之作对。自由主义变得空前温和小心谨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会激起奥托·冯·曼图菲尔的反动政策卷土重来。所以，自由派根本不敢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甚至不再认真考虑是否还存在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可能性。他们不再存有上台执政的奢望，只要能在预算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和一定程度的合法保障，就心满意足了。自由派的劳工领导人赫尔曼·舒尔茨-德利斯基拒绝参加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所持理由便是担心由此会造成新[193]政府的不快。纵便是费迪南德·拉萨尔及其于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认为德意志社会也许能够在现行政治制度之内，通过王室实现变革。对上述种种严重缺乏勇气和信念的言行，只有少数激进分子敢于嘲弄和批评。

俾斯麦与普鲁士宪政危机

一向身着戎装的威廉亲王，这时决心改造军队。他的陆军大臣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向下议院提出一项全面计划，要求结束后备军的独立地位，把军人服役期延长到两至三年，骑兵则延长到三至四年。同时，每年征召入伍的人数也将大幅度增长。这项动议旨在创建39个新的步兵团、10个新的骑兵团，因此需要增加25%的防务开支。

但对于那些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军国主义因素增强而又与后备军存在着浓厚感情联系的自由派来说，威廉亲王的这些动议都是不能接受的。这支军队尊奉1813年的爱国传统，但在1848年革命时期暴露了其在政治上根

本不可靠。威廉一世1861年成为普鲁士国王后，对自由派的反对意见怒气冲冲，解散了保守派与自由派的联合政权，代之以一个反动政府。而这一举措在州议会中使自由派获得了更大支持，增加军费的动议在下议院再次遭到拒绝。罗恩及其盟友在绝望之下，不得不诉诸于最后一着：他们建议任命普鲁士驻巴黎大使俾斯麦出任政府首脑，以化解宪政危机。

虽然围绕军事改革的宪政之争，使普鲁士政府在内政问题上几乎陷于瘫痪，但在整个德国，此一时期仍然取得了相当巨大的经济增长。1860年的英法《科布登协定》创建了西欧自由贸易区，而拿破仑三世希望德意志联邦间的关税同盟也能加入其间。信奉自由贸易的普鲁士，将之视作排除奉行保护主义的奥地利的一个天赐良机。另外，资产阶级自由派于1859年创建的“德意志民族协会”，规模和影响力也迅速上升。该协会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规模较小的德国。1862年3月29日，普鲁士与法国签署了贸易协定。虽然当时正值宪政危机高潮时刻，普鲁士下议院仍批准了该协定，赞成票为264张，反对票只有天主教集团的12张。似乎这一协定还不足以充分羞辱奥地利，普鲁士又正式承认了维克多·埃马努埃尔为意大利国王，从而接受了这个缺乏合法性、不符合国际法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政权。

1862年9月22日，威廉一世在柏林郊外的巴贝尔斯贝格宫召见俾斯麦。虽然他对任命后者担任首相顾虑重重，但俾斯麦保证将像封建家臣侍奉主人一样为他效命，从而不仅赢得了普王的信任，而且可以自由地采取他认为最适当的措施。9月30日，俾斯麦在下议院预算委员会讲话时，提 [194] 议双方妥协和解，并把自己从法国南部采撷的一枚橄榄枝送给该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他仍然坚称普鲁士必须保持强大，如果她准备奉行有力的德意志政策。他把讲话的矛头指向阻碍德意志统一的势力，令占议会多数的自由派听上去大畅其怀。他也提出了保守圈子中盛行的一种说法，即“宪法中存在一个漏洞”。根据这种似乎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解，由于宪法并未规定在政府与议会之间发生僵局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能，可以采取一切它认为适当的措施。俾斯麦讲话中的这样一段话非常著名：“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通过一场严重斗争，一场铁与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讲话中的“铁与血”等字眼，在全德各地从保守派到激进民主派的各个政治派别，激起了强烈的抨击，人们由此把俾斯麦视作近于怪异的一个普鲁士反动军国主义者。

1863年，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再次爆发起义。俾斯麦向沙皇承诺，他将全面履行俄普于2月8日签订的《阿尔文斯勒本协定》。这既引起了同情波兰民族主义的法国政府的相当不快，也令德国自由派大为光火。虽然后者把生活在德意志或边境附近的波兰人视作“劣等民族”，不会对他们的自主愿望抱丝毫同情态度，但却对那些为摆脱沙皇专制主义的波兰人怀有 [196]



威廉·布鲁克以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为主题绘制的作品，上面可以看到新岗楼和军械库（均为柏林代表性建筑，其中军械库现为德国历史博物馆——译注）。图左为亨利亲王的王宫，右为大剧院入口处。柏林当时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作为普鲁士的首府，不久将成为统一的德国的首都。它既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各种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工业蓬勃发展。柏林既充满了近代城市所共有的各种社会失调现象和问题，又具有它特有的富有感染力的城市精神。

相当好感。因此，在自由派眼中，俾斯麦更加是一个完全不可救药的反动人物了。

同样是在1863年，费迪南德·拉萨尔被新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推举为主席，从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始祖。该党主张实行普选制和扶持劳工政策。1866年8月，比拉萨尔更接近于卡尔·马克思正统理论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成立了萨克森人民党，把社会主义者和更加激进的自由派联合在一起。该党于1869年在埃森纳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易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提出了较为宽泛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党纲。与拉萨尔分子相似，该党也宣称“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通过工人阶级自己来赢得”。1875年，拉萨尔分子和埃森纳赫派在哥达召开会议，两党合并成立德国社会工人党，即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新党同时吸纳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其政敌眼中是难免激进得可怕，甚至要贴上革命的标签。

普奥争霸

面对俾斯麦越来越锋芒毕露的德意志政策，奥地利为予对抗，提议进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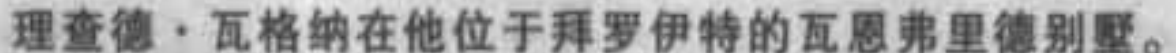
瓦　格　纳

瓦格纳 1813 年出生于莱比锡，早年音乐素养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巴赫曾执教过的圣托马斯中学。在创作了两部不成功的歌剧后，他被聘为里加歌剧院指挥。1839 年，他前往巴黎，完成了歌剧《黎恩济》，并于 1842 年成功上演。3 个月后，又上演了他的另一部更加复杂和杰出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内容是他所喜爱的主题之一——用爱赎罪。《漂泊的荷兰人》取得很大成功，使他成为德累斯顿的萨克森王室的王家剧院的指挥。后来，他分别在 1845 年和 1847 年创作了《汤豪塞》和《罗亨格林》。在 1849 年起义中，他曾短暂露面于街垒，因而遭到通缉，不得不离开德国，音乐生涯遭到了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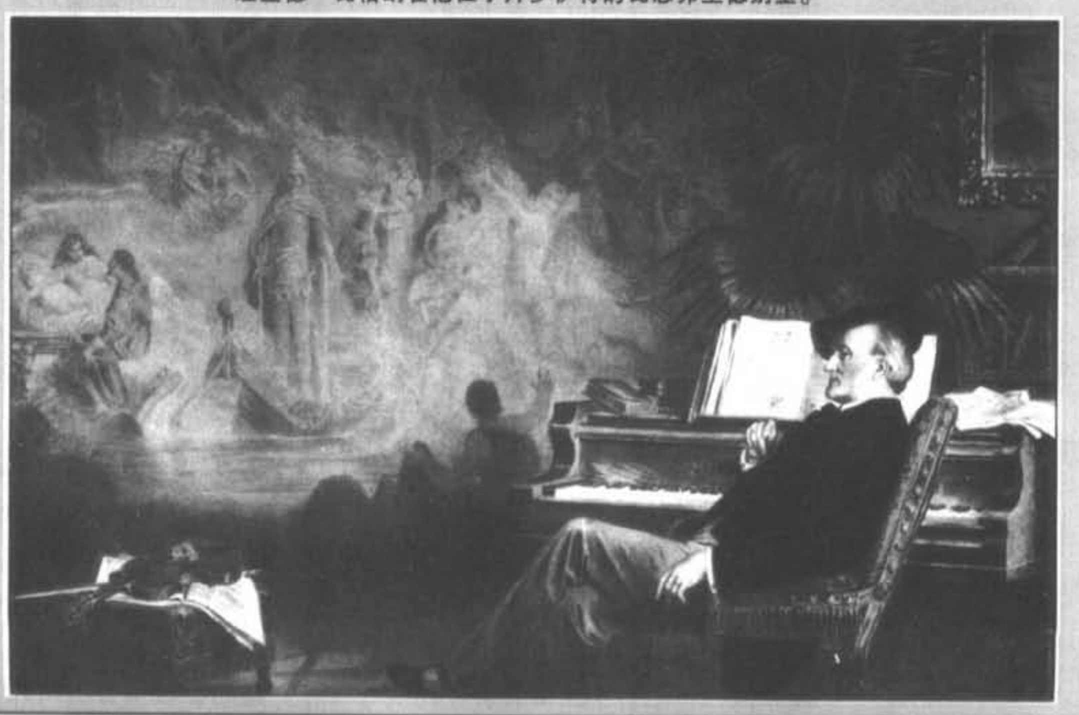
1850 年代，瓦格纳基本是在瑞士度过的。他开始创作史诗作品《尼伯龙根指环》。同期，他创作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他所有歌剧作品中色欲成份最浓的，表达了他对自己慷慨的庇护人之妻玛蒂德·威森东克的感激之情。由于出版商不愿意接受鸿篇巨制的《尼伯龙根指环》，他开始创作《纽伦堡的名歌手》，用来赚取一些金钱。正是在瑞士，瓦格纳摒弃了年轻时代的德意志理想主义，代之以令人不快的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虽然他不无矛盾的作品仍充满激情和人道情怀。

1864 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邀请瓦格纳前往慕尼黑。他没费多少时间便引诱了李斯特的女儿、王家剧院指挥的妻子科西马·冯·比洛，并于 1870 年与之结婚。此后，瓦格纳继续为王室效力，路德维希二世还特别在拜罗伊特为之建造了一座剧院。瓦格纳的最后一部剧作《帕西发尔》于 1882 年上演。一年后，瓦格纳在威尼斯逝世。

在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瓦格纳一改传统音乐创作中对旋律的无比重视，而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代表某个人物或某种情感的主题上。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长篇作品，而且题材众多。其中，他那本名为《犹太人与音乐》的充满反犹太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对于科西马来说不啻为句句是真理的圣书，而对于后世的纳粹党人来说，其意义也一如《圣经》之于基督徒。但不管怎样，瓦格纳毕竟是一位具有出众天才的作曲家。诚如柴可夫斯基在评论《尼伯龙根指环》时所说的那样：“不论人们如何看待瓦格纳的这部鸿篇巨制，谁也不能否认他为自己所确定的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目标，而且他确实实现了这一目标。须知，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拥有英雄般的内在力量的，这正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能企及的最伟大的艺术动力。”



理查德·瓦格纳在他位于拜罗伊特的瓦恩弗里德别墅。



行深入的邦联制改革，但具体内容一直秘而不宣，准备在奥皇主持召开全德诸侯大会时再作为重磅炸弹抛出。当时，威廉一世正在加斯泰因接受水疗，弗兰茨·约瑟夫赶到那里，亲自邀请他出席将于两周后举行的法兰克福诸侯大会。随威廉一世前往加斯泰因的俾斯麦力劝他拒绝这一邀请，但普王仍踌躇不决。直到奥地利方面的一位随行官员在他与约瑟夫会面后不久再次造访，事实上是要求他立即表态时，威廉一世才深感自己遭到了侮辱，遂接受了俾斯麦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抗奥地利采取的动作，俾斯麦呼吁在全德意志进行直接选举，选出一个“民族代表会”。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位2月份态度尚极其反动的人物，到了8月却俨然披上了1848年那些自由派的斗篷。

虽然普鲁士方面拒绝出席，法兰克福诸侯大会的筹备工作仍在进行。联邦议会自1851年以来，首次重新插上了黑红黄三色旗。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愈益高涨，当约瑟夫来到时，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呼。8月18日，大会如期开幕，场面煞是宏大。约瑟夫结束了他的长篇开幕词，但台下诸侯们却在很长时间里鸦雀无声，直到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提议，应向疗养结束后在巴登-巴登逗留的威廉一世再次发出邀请。德意志诸亲王中最精明、最谨慎的一位，即萨克森的约翰亲王，遂去了巴登-巴登，作为“代表30个邦君的一位亲王信使”，请求威廉一世前往法兰克福。威廉一世又有些动摇了，但俾斯麦再次说服他不要理会。他与亲王各执一端，[197]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双方都筋疲力尽，亲王因高度紧张陷入了虚脱，首相则在自己的卧室擦拭眼镜，藉以放松情绪。

普鲁士的拒绝出席，等于宣判了这次大会的无疾而终。任何一位诸侯都无法设想一个没有普鲁士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也清楚地知道，由它占主导地位建立一个大德意志的梦想已经破灭，因为德意志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奥、普合作。

俾斯麦一直想方设法使普鲁士免于落入下风，现在轮到他寻机挫败奥地利了，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恰恰为他提供了天赐良机。1863年12月，丹麦新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推出新宪法，宣称石勒苏益格是丹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地区的主要人口都是德意志人，因此德意志联邦表示抗议，认为丹麦违犯了国际法。1864年2月，普、奥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打击丹麦军队。德意志人不论政见，绝大多数都对两邦此举额首称庆。丹麦军队很快被打败，日德兰半岛和艾尔森相继沦陷。这一年的夏季，有关方面在伦敦举行会议，联邦和奥地利方面均支持奥古斯滕贝格公爵，赞同由他管辖这几个小公国的主张，但俾斯麦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把它们并入普鲁士，并成功地阻止了它们获得独立的计划。会议遂无疾而终，1864年10月，在维也纳签署和约，丹麦国王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而奥地利由于政治、军事和地理原因，将不得不扮演普鲁士的次等伙伴。最后，根据普奥两邦1865年8

月14日签订的关于共管易北河诸公国的《加斯泰因协定》，荷尔斯泰因由奥地利管理，石勒苏益格由普鲁士管理，而劳恩堡公国则由奥地利以250万泰勒卖给了普鲁士。

到了1865年夏，俾斯麦已决心对奥开战，当然这需要与意大利结盟。这时，他的政治地位非常脆弱：当初把他推上首相之位的宪政危机，仍然没有解决，反对普鲁士的情绪在德意志各地日益普遍，奥古斯滕贝格公爵依旧受到很多人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不惜放手一搏，寄希望于用战争解决这些难题。威廉一世则希望避免与奥地利迎头相撞，而与意大利结盟的设想更是令他吃惊。在他看来，意大利现行政府缺乏合法性，而且是一个革命的国度。因此，他命令俾斯麦设法与奥地利达成妥协。至于这位首相，对策则非常简单：他干脆不理会普王的命令，专注于赢得其他国家对他反奥大业的政治支持。

1866年4月8日，普鲁士与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了结盟协定，意大利同 198 意，如果普鲁士在未来三个月里与奥地利爆发战争，它将立即对奥发动进攻。这一秘密条款的签订，等于是俾斯麦已经透露出对奥战争将在7月发动。4月9日，也就是他与意大利签订秘密协定的第二天，普鲁士再次提出用一个普选产生的德意志代表会议来代替德意志联邦议会的主张。俾斯麦的这项提议的直接诉求对象，是德意志较小诸侯和自由派，但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自由派人士警告说，像俾斯麦这样一位反动首相，要创建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岂非笑谈？俾斯麦却毫不沮丧："如果无法用公共舆论实现它，那么就用火药和炮弹吧！"

鉴于德意志大地火药味日益浓厚，而且意大利人正在准备战争的消息也同时传来，奥地利相继动员了其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军队。意大利劝说普鲁士也动员军队，到了5月更是敦促普鲁士这样做。奥地利这时请求联邦议会处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要求专门就荷尔斯泰因问题召开一次会议。普鲁士反驳说，奥地利业已违反了《加斯泰因协定》，并把军队派进了荷尔斯泰因。奥地利呼吁动员联邦军队以对付普鲁士，并在议会中以微弱优势通过了这项动议。

乍看上去，普鲁士面对的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萨克森、汉诺威、库尔黑森、黑森-达姆施塔特，以及德意志中部、南部地区大多数邦所组成的强大联盟，但奥地利未能对联盟进行有效协调。普军迅速开进相邻的汉诺威和库尔黑森诸邦，很快占领了法兰克福。普军参谋总长冯·毛奇寻求机会，在波希米亚与敌进行决战，遂把三大军团调集至波希米亚北部分兵合击。奥地利军队在贝内德克统率下，未能在德累斯顿阻挡住普军的进击，这时受困于柯尼希格雷茨城（位于今捷克境内的赫拉德茨-克拉洛韦——译注）附近。贝内德克请求奥皇与普鲁士媾和，但遭到 199 了约瑟夫的拒绝。7月3日，普军第3军团冒雨赶到了战场，会同其他两个军团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毙、伤、俘奥军4.4万人，己方仅损失9200

人。普军乘胜追击,向维也纳挺进。

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北部的情况要好一些，分别在库斯托扎和利萨打败了意大利陆、海军。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法国的态度了：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战役失败后，约瑟夫请求法国作为中间人进行调停。在此后几周极其复杂的谈判中，俾斯麦的智慧较老谋深算的拿破仑三世高出一筹。最终，各方达成了妥协，而这种妥协是俾斯麦能够接受的：德意志大地被分为三个部分，其中北德意志联邦将以普鲁士为首，包括新近被吞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汉诺威、库尔黑森、拿骚、法兰克福。至于拟议的南德意志联邦，则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但普鲁士拒绝接受此一方案，而宁愿与各邦单独谈判，并强化关税同盟与之的联系。而奥地利则被排除在德意志其他地区事务之外。在媾和会议上，萨克森也被列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虽然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得到“全面保证”。

普法战争

从1866年8月始，俾斯麦便通过谈判，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分别签订了军事协定，次年初又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签署了类似条约。他之所以要施加压力，迫使其他邦签署这些协定，原因就在于1866年7月，法国拿破仑三世突然提出了恢复1814年边界的要求，这涉及到卢森堡、比利时境内法语区、莱因兰-帕拉丁领地以及包括美因茨在内的莱因-黑森。这位皇帝之所以狮子大张口，所持理由是他对北德意志联邦的慷慨大度做法，理应得到报答。虽然这场危机很快便偃旗息鼓了，但俾斯麦和毛奇已经开始考虑争取德意志南部诸邦的支持，以对法国进行一场战争。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甚至希望奥地利也能施以援手。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亦即它在德意志大地的影响，随着“关税议会”的成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在关税议会中，每个成员邦均享有代表权，选举采取普选制，每位公民一票，这样普鲁士由于人口较多，得以在议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该议会的主要负责范围包括关税、运输和贸易规定。

在南部地区，对普鲁士的敌对情绪仍然很强烈。人们既害怕普鲁士将一家独大，又担心天主教徒会与新教徒的普鲁士发生冲突。有关加强保护手段以抗衡普鲁士占据压倒优势的工业能力的呼声，也时有所闻。1867年底、1868年初，关税议会举行新一届选举，南部奉行各邦独立自主原则者获得巨大胜利。在符腾堡，这样一句竞选口号鲜明地体现了人们的普遍情绪：普鲁士所给予人们的，只是要你“交好税，关好门，去当兵!”在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更多的人警告说存在着“新教的军事力量”危险。不过，[200]虽然遭到了诸如此类的挫折，普鲁士在关税议会仍能够通过大多数法案，而南部诸邦的工业家和农场主，尽管对普鲁士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却也从

其日益繁荣的发展中分享了不菲的利益，谁都知道与普鲁士保持经济联系有利可图。俾斯麦的“经济总参谋长”德尔布吕克 1868 年经过谈判，与奥地利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在关税议会中未费多大周折即获得通过。这项协定的签署，一举剥夺了南德意志诸邦对奥地利这个仍很强大的邻居的支持。

而要把南德意志诸邦纳入到普鲁士的轨道，则需要更高的外交技巧。在普鲁士的政策框架中，与这些邦结成同盟构成了关键的一环，但这一点很不得人心。例如在巴登，只是通过紧急状态法令才勉强维系了这种同盟关系。无论在哪个邦，只要需要增强军备而增税，便会激起诸多的反对，并由此导致反普鲁士、主张大德意志方案的政党形成。

而与此同时，普鲁士与法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拿破仑三世看来，鉴于他在 1866 年保持中立，理应在领土上获得“报偿”，但却未能如愿，于是双方都积极准备战争。在普鲁士一方，由于“铁血财政”法案的出台，自由派已无法就军事开支问题提出置疑。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把普法之间的疯狂军备竞赛称作“对我们这个时代和文明的冒犯”。大多数观察家都相信，这场战争已不可避免，甚至还有很多人期待着战争的爆发，例如法国认为，这样将有机会转移国内政治危机，调动全国力量对付共同的外敌。而对于俾斯麦而言，对法国的战争将使其根据普鲁士的意愿，完成“小德意志方案”的统一大业。

1870 年春，西班牙议会通过决议，决定由普鲁士的一个天主教地区霍亨索伦 - 锡格马林根家族的一位成员接任王位。因此法国认为，在普鲁士采取敌视态度的情况下，自己正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5 月，敌视普鲁士的法国右翼力量在公民投票中获得巨大胜利，随之易人的外交大臣格拉蒙决意反对普鲁士提出的“小德意志方案”。6 月 21 日，霍亨佐伦 - 锡格马林根家族的亲王接受了王位提名，这个消息于 7 月 3 日正式公布。格拉蒙在代表会议上对普鲁士公开发出威胁：如果它不立即停止复活查理五世的帝国的企图，法国便将对其宣战。7 月 12 日，亲王宣布放弃提名。然而，法国人这里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本来，亲王既已放弃提名，法国便已取得巨大胜利，而它却想进一步羞辱普鲁士，从而甘冒在缺乏任何盟友或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危险。法国要求普王作出书面保证，保证今后永远不许任何一位德意志亲王取得西班牙王位。拿破仑三世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宣称，只要霍亨佐伦家族人士角逐王位，就意味着法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认定无论英国还是俄国，都不会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遂准备对法开战。格拉蒙则指示驻普大使贝内德蒂去巴特埃姆斯面见威廉一世，要他承诺今后永远不会支持或更换王位继承。7 月 13 日，就 [201] 在贝内德蒂前往巴特埃姆斯的同时，拿破仑三世及其大臣们商定，如果普王不作出此一保证，法国即对普鲁士开战。贝内德蒂在拜会普王时态度极其傲慢，令威廉一世无法接受，因此有礼貌地却又坚决地拒绝了这位大使





普法战争中被关押在科隆附近瓦内海德战俘营的法军战俘。在这场双方都伤亡惨重的战争中，法军主力1870年9月2日在色当被包围后投降，共有10.4万人被俘，其中包括病情很重的拿破仑三世。

羞辱自己的企图。当天，普王指示把发生的这些事情用电报告诉柏林。后世传说，俾斯麦修改了电文内容，借机挑起一场危机，但事实上，电文在交由报纸发表时，与原件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其实，在这份电报发表之前，法国方面便已作出了战争决定：7月14日，法军进行动员。19日，法国拒绝了英国的调停要求，对普鲁士正式宣战。在南德意志，各邦纷纷表示支持普鲁士，信守与普鲁士的防御协定，以共同保卫德意志，抵抗法国的侵略。

在经过一系列双方均损失惨重的会战后，法国军队在梅斯被围困，尔后于9月2日在色当会战中彻底失败。普军共俘获法军10万之众，其中包括拿破仑三世本人。尽管胜负已分，但战事并未就此完结。波希米亚激进主义者、天才的演说家甘必大，号召国民进行一场保卫法国的战争。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却不得不面对此起彼伏的游击战。1871年2月26日，梯也尔代表“国民政府”与普鲁士缔和，但巴黎仍被围困着。3月18日，激进的巴黎市民宣布成立“巴黎公社”，围困者换成了第三共和国的军队。在德意志人的监视下，国民政府军队大开杀戒，把公社镇压了下去。战争终于结束了，但共和国仍然不得不忍受德国的军事占领，直到1873年付清最后一笔赔款后德军才最后撤离。

1870年10月，俾斯麦开始与四个南德意志邦进行谈判，以建立新的德意志帝国，到11月25日，这四个邦均已同意这一主张，并接受普鲁士国王为帝国皇帝。各邦议会分别批准了条约，从而使这个“自上而下”建立的新帝国具有了某种“自下而上”的合法性。1871年1月1日，新帝国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宣布成立了。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的帝国皇帝就位仪式，则非常盛大隆重，由巴登大公弗里德里希一世宣布威廉一世

威廉一世加冕为皇帝

1870年，奥托·俾斯麦劝服南德诸邦接受了北德意志邦联宪法，并于当年11月签订了有关条约。南德诸邦被准许保留部分权利，由此避免了对宪法的争论，从而保证了邦联宪法作为德意志帝国宪法于1871年1月1日生效。至于1871年4月16日的新宪法，只是正式确认了这些邦保留的权力，并规定了上议院即联邦议会的议席分配。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镜厅被拥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因为普鲁士的第一任国王腓特烈一世当年也是在这一天加冕的。凡尔赛宫这座"太阳王"的宫殿，这时是德军总司令部。在加冕典礼上，各邦君主们一个个身着戎装。安东·冯·维尔纳创作的油画（见下图），就如实再现了加冕典礼上浓郁的军事氛围。德意志帝国的基石，是用铁与血铸造的，是对法战争获胜的结果。因此，这一进程既不可能和平实现，也不会带有多少民主色彩。这一点也在典礼上反映出来。皇帝被诸侯们簇拥着，一如中世纪的国王。

威廉一世对于成为"德意志皇帝"（German Emperor），持很大保留意见——他希望接受的皇帝称号是"德国皇帝"（Emperor of Germany。与前者相比，此称号更为威严，但"包含有对非普鲁士地区行使君主权利"的意味，因而会招致南德各邦的疑虑——译注），因此，当俾斯麦争论说各邦君主不会同意这一称谓时，他曾怒气冲冲。就在加冕典礼的前夜，威廉说道："明天将是我一生中最不快乐的一天。普鲁士的君主之位就要被我们埋葬了，而你，俾斯麦亲王，对此是要负责任的！"

事实上，各邦君主们对帝国的成立也远远谈不上醉心。他们尤其担心的是，自由派会在新帝国中大行其道。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俾斯麦不得不用"圭尔夫基金"向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行贿（这笔基金是1866年从汉诺威索取的）。路德维希之弟奥托亲王出席加冕典礼后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当时有多忧伤，多痛苦……一切都那么冷冰冰的却又煞有介事，一切都那么庄严隆重却又如此矫情，一切都那么虚假、空洞！"

曾经有一位法国记者指出，法俄"联盟的恶梦"，一直折磨着俾斯麦。就在国际舞台各种事件纷纷扰扰上演之际，俾斯麦在巴特基辛根完成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承认了自己对法俄结盟前景的无比担忧。在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购买了苏伊士运河股权后，俾斯麦希望英国能深深卷入埃及事务，那样就会在黑海问题上与俄国迎头相撞。诚如此，英俄两个大国彼此牵制，便不可能联手对付德国了。至于俄国与奥地利在巴尔干的争夺，意味着俄国需要德国的支持，而英国与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又会把英国的注意力吸引到海外。因此，俾斯麦最理想的构思是，"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而且只要它们彼此之间处于对立关系，就无法结成联盟来对付我们"。



安东·冯·维尔纳创作的油画，内容为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被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加冕皇帝。

根据新的宪法，南德意志诸邦事实上被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虽然它们在上议院即联邦议会中的席位得到了增加，但普鲁士拥有的席位之多，足以使任何修改宪法的动议无法得到通过。新联邦国家由25个邦组成，其中王国4个、大公国6个、公国5个、侯国7个、自由市3个。各邦仍保202留部分权力。例如，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均拥有自己的军队，由它们共同组成的德意志军队，皇帝只有在战时才能对其行使最高指挥权。各王国可以自行征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还拥有自己的邮政系统。从法理上看，皇帝的最高权力除了表现在他是联邦议会的世袭制主席外，还可以召集或解散联邦议会和下议院（帝国议会），并有权任命宰相和各部的负责人（称作国务秘书）。

第一届帝国议会的选举，在国民中激起的反响之小，颇让人感到意外。有选举权者并不踊跃，真正参加投票的仅占51%。在总共382个议席中，民族自由党获得125席，成为大赢家，连同旧自由党的30席、进步党的46席，即可形成多数。俾斯麦在自由保守党中的支持者仅仅获得37席，而对这位宰相持更多批评立场的保守党人获得57个议会。天主教中央党获得63席。帝国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柏林皇宫举行时，威廉一世宣布议会开始运转。这位新加冕皇帝所坐的是专门从戈斯拉尔运来的当年亨利三世用过的御座。与皇帝身边簇拥的亲王和将军们都穿着华丽的制服，与之相比，衣着普通的议员们倒成了可有可无的听众。



1871年3月1日，普鲁士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举行阅兵式，庆祝在1870—71年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



安东·冯·维尔纳1900年创作的油画，描绘的是普鲁士军队1870年设在凡尔赛的统帅部情景。自左至右依次是：布卢门塔尔、王储弗里德里希、韦尔迪、威廉一世、毛奇、罗恩和俾斯麦。

由于毛奇指挥的普军取得的辉煌战功，大多数德国人都对新帝国的诞 203 生感到欢欣鼓舞。商人们增加了财富，军人们沐浴在连战连捷的胜利阳光中，知识分子们也充满了民族主义激情。但也有不少人对时局的发展不无担忧：普鲁士的保守派担心，在一个实行普选制进行治理、由贪婪粗鄙的资本家所主宰的国度里，他们所热爱的祖国普鲁士将只是其中的一个邦；南德意志地区的一些天主教徒对北部的新教徒大权在握也心怀不满。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专制政权，帝国议会虽然由普选制产生，却没有多少真正权力。君主的权力仍完整无缺，贵族阶层的特权地位未受到任何冲击，军队的权势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俾斯麦在推动完成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过程中，以高明的手腕操纵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保护了传统上的精英阶层，使民主势力遭受了失败。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均获得长足进步，却又存在着致命缺陷：一方面它已成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君主制、专制主义的社会框架。随着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发展，帝国用不了多久，便将走向军事上的失败、社会上的骚乱和政治上的破产。

第九章 德意志帝国

[204] 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关系问题，是新建立起来的帝国所面临的首要重大问题。在竞选期间，中央党曾建议向罗马派出德国军队，以保护教皇——法国军队已于1870年9月离开了那里。普鲁士政府把教皇视作近代世界的一支保守力量而予支持，表示如果他被迫流亡，将为其提供一处安全的庇护所，但在这个近代化的世俗国度里，天主教会仍每每成为一种难以应付的因素。

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其主宰的德意志帝国，都深受新教的影响。虽然大多数天主教徒都默认了按照小德意志方案建立的帝国，但令俾斯麦深为不安的是，这些人仍强烈支持帝国诸邦保留一定权力。尤有甚者，波兰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天主教徒，更是对帝国怀有浓浓的敌意。令帝国与天主教徒关系更加复杂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德意志天主教会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拒绝接受梵蒂冈会议1869至1879年做出的包括教皇"永无谬误"信条在内的决议的"旧天主教徒"，另一派则仍信奉梵蒂冈教廷的教义（所谓梵蒂冈会议决议，是指天主教会在梵蒂冈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性最高教务会议，由教皇庇护九世召开，700多名主教参加。庇护九世提出了教皇在信仰和伦理问题上"永无谬误"为信条，经一个多月争吵，因普法战争即将爆发，反对派大多离去，剩下的450名主教表决通过了"永无谬误"信条。不久意大利军队攻入罗马，经投票表决教皇国合并于意大利王国，教皇退居梵蒂冈，拒绝和意大利政府订立和约，从此誓不出梵蒂冈一步，自称"梵蒂冈囚徒"——译注）。

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文化斗争"系在各个邦而非帝国的层面上展开。帝国议会于1871年通过的《布道坛条款》规定，布道中如果涉及政治煽动，即为非法。这项规定的法律效力直至1953年才废止。在普鲁士，1873年5月颁布了一系列反天主教法令，称为"五月法令"，把教会教育完全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督之下。普鲁士还作出规定，婚姻登记必须经过政府部门批准，命令一切教团解散，只有宗教医疗救护罢休除外，国家对教士的授职保有否决权，国家不再向教会提供资金，等等，并得到了其他诸邦的纷纷效仿。梵蒂冈命令德国主教不要理会这些禁令，而由此引起的后果则是，一批大主教和辖区主教遭逮捕后驱逐出境。

俾斯麦在对付天主教的斗争中，既然要继续获得自由派的支持，就不得不对他们做出各种妥协，而这种局面是他很难长期忍受的。事实上，与

他的愿望恰恰相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只是强化了中央党的地位，而且此举遭到了大多数保守派的反对。保守人士不满政府限制地主对当地学校的掌控，并把当局对天主教会的抨击视作不敬上帝的自由主义的又一例证。到1875年时，俾斯麦已经开始意识到，发动反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是一次严重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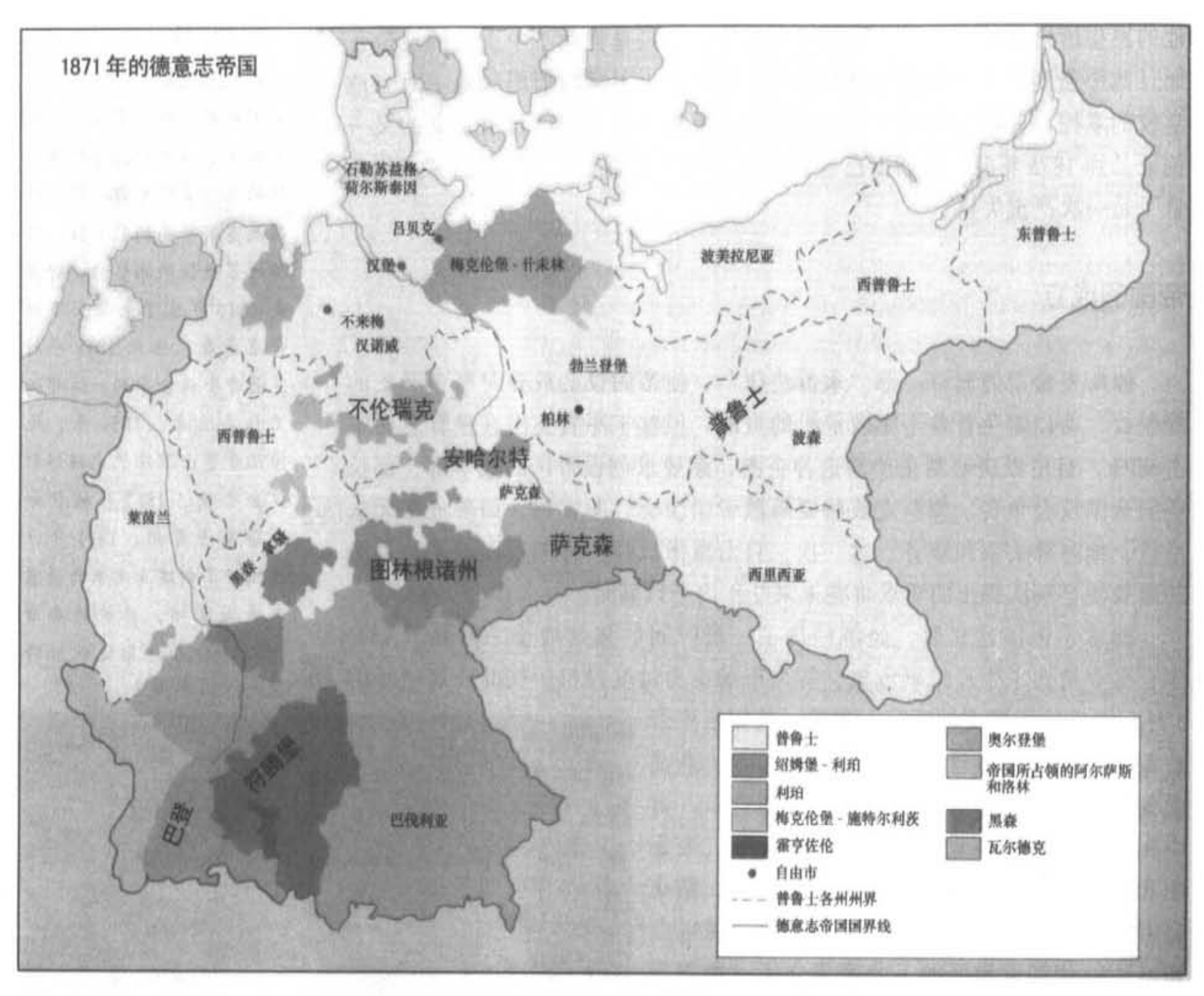
帝国的成立

俾斯麦希望能制订一部“永恒法律”，使帝国议会放弃对军事开支的控制权，藉以避免普鲁士宪政危机的重演。但鉴于军费支出在预算总额中占90%，自由派决心制止他的这种企图，遂要求创设帝国的战争部，部长应向帝国议会负责。俾斯麦威胁要解散帝国议会，并宣称，如果危机无法 205 平息，他将辞去宰相职务。这一次，自由派像以往一样知难而退了，妥协的后果便是军队提出的要求将在未来7年内予以满足。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强劲增长，但到了1873年，工业遭遇了生产过剩危机，货币市场也为过度投机所扰乱。这一年的5月，维也纳股票交易所陷入崩溃，德国投资者愈益紧张，银行界也面临很大压力。本土产品受到了外国进口的廉价农产品的激烈竞争，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北美。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和工业家们开始倡导实行保护性关税，结束自由派的自由贸易政策。1873年11月，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工业家成立了“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并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游说集团。该联合会要求加大铁路修筑力度，不再削减关税，降低焦炭价格，并得到了名为“保护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经济利益协会“的支持。后者俗称“长名字协会”，倒也恰如其分。在这场保护本土经济利益的运动中，居于幕后的主要人物名为亨利·阿克塞尔·比尔克。这位“长名字协会”的秘书长，于1876年成为强烈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德国工业家总协会”主任。不徒如此，比尔克还使工业界的“烟囱业大王”与农业界的“卷心菜容克”们联起手来，这也许与他在东部地区拥有一座庄园有关。在德国，认识到公众舆论可加以操纵、议会成员可受到派别利益影响的，比尔克当数第一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他称作



弗兰茨·冯·伦巴赫（1836—1904年）创作的身着军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画像。如同他为俾斯麦创作的其他多幅画像一样，作品既富有很高的艺术性，又体现了很强的洞察力。俾斯麦1815年生于勃兰登堡的舍恩豪森。他在1848年时是普鲁士议会中的一位超级王权主义者。1851年，他出任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公使，1862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1871年，他担任了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宰相，并被封为亲王。1890年俾斯麦被迫辞职，1898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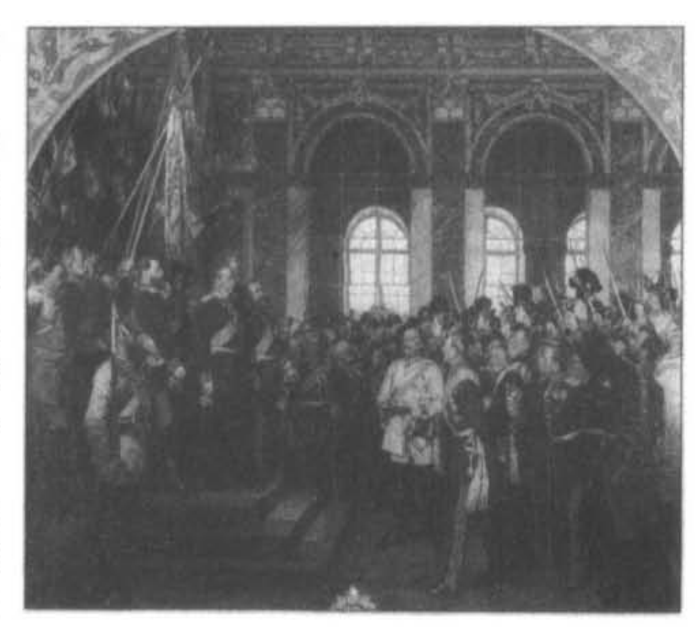
利益集团反民主的多元主义的始祖，而这正是帝国时期的德意志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海军和陆军协会”、“殖民地协会”还是“泛日耳曼人联合会”，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都在议会框架内争相施加影响，令政治能量趋于分散，无法用于从纵横两方面扩展议会民主和公民权利。

1875年，俾斯麦在外交政策领域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当法国国民议会投票支持扩充军队后，柏林发行的半官方报纸《邮报》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刊出文章《战争在望?》，普鲁士总参谋部也持类似看法。俾斯麦打定主206意，要借机从外交上羞辱法国人一番，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重大误算。法国外交部长德卡兹公爵巧妙地周旋于各国之间争取支持。奥地利这时虽然仍无意与柏林为敌，却也与法国一道鼓动英国出面调停争端。这样，伦敦、圣彼得堡、罗马、巴黎的各国政府均要求德国退让，俾斯麦的外交政策陷入了孤立，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德国当然知道，它无力主宰欧洲，因此应当满足于目前已取得的一切，对其他大国的利益予以尊重。正如俾斯麦在点评这场“战争在望”危机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强大的德国，渴望置身于和平，平静地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点，又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军

队，原因就在于“一个随时准备拔出鞘中之剑的人，是不会遭到他人攻击的”。

1875年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起义，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即黑山——译注）和保加利亚也纷纷响应。土耳其人极其残忍地镇压了这些起义，但到了1877年，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迫使罗马尼亚站在自己一边，把土耳其人从欧洲大陆赶了出去。1878年3月，在圣斯特凡诺签订了和约，保加利亚的疆土得到扩展，一直延伸到爱琴海。

1870年，奥托·俾斯麦劝服南德诸邦接受了北德意志邦联宪法，并于当年11月签订了有关条约。南德诸邦被准许保留部分权利，由此避免了对宪法的争论，从而保证了邦联宪法作为德意志帝国宪法于1871年1月1日生效。至于1871年4月16日的新宪法，只是正式确认了这些邦保留的权力，并规定了上议院即联邦议会的议席分配。



207 威廉一世加冕为皇帝

安顿·冯·维尔纳创作的油画，内容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被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镜厅被拥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因为普鲁士的第一任国王腓特烈一世当年也是在这一天加冕的。凡尔赛宫这座“太阳王”的宫殿，时为德军总司令部。在加冕典礼上，一个个身着戎装的各邦君主们拥戴着成为皇帝的威廉一世，一如中世纪的那些德意志国王。安顿·冯·维尔纳创作的油画（见右图），就如实再现了加冕典礼上浓郁的军事氛围。德意志帝国的基石，是用铁与血铸造的，是对法战争获胜的副产品。因此，这一进程既不可能和平实现，也不会带有多少民主色彩。

威廉一世对于成为“德意志皇帝”（German Emperor），持很大保留意见——他希望接受的皇帝称号是“德国皇帝”（Emperor of Germany。与前者相比，此称号更为威严，但“包含有对非普鲁士地区行使君主权利”的意味，因而会招致南德各邦的疑虑——译注），因此，当俾斯麦争论说各邦君主不会同意这一称谓时，他曾怒气冲冲。就在加冕典礼的前夜，威廉说道：“明天将是我一生中最不快乐的一天。普鲁士的君主之位就要被我们埋葬了，而你，俾斯麦侯爵，对此是要负责任的！”

事实上，各邦君主们对帝国的成立也远远谈不上醉心。他们尤其担心的是，自由派会在新帝国中大行其道。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俾其麦不得不用“威尔夫基金”向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行贿（这笔基金是1866年从汉诺威索取的）。路德维希之弟奥托亲王出席普王加冕典礼后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当时有多忧伤，多痛苦……一切都那么冷冰冰的却又煞有介事，一切都是那么庄严隆重却又如此矫情，一切都那么没有虚假、空洞！”



一幅关于“三帝同盟”的漫画，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奥匈帝国弗兰茨·约瑟夫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描绘成为俾斯麦操纵着的傀儡。但在现实生活中，俾斯麦安抚俄国人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208] 曾经有一位法国记者指出，法俄“联盟的恶梦”，一直折磨着俾斯麦。就在国际舞台各种事件纷纷扰扰上演之际，俾斯麦在巴特基辛根完成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承认了自己对法俄结盟前景的无比担忧。在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购买了苏伊士运河股权后，俾斯麦希望英国能深深卷入埃及事务，那样就会在黑海问题上与俄国迎头相撞。诚如此，英俄两个大国彼此牵制，便不可能联手对付德国了。至于俄国与奥地利在巴尔干的争夺，意味着俄国需要德国的支持，而英国与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又会把英国的注意力吸引到海外。因此，俾斯麦最理想的构思是，“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而且只要它们彼此之间处于对立关系，就无法结成联盟来对付我们。”

俄国战胜奥斯曼帝国，同时引起了英国和奥地利的高度警惕，它们不约而同地明确表示正在考虑战争问题。俄国人当然知道，一旦爆发这样一场冲突，自己将毫无胜机，因此不得不与伦敦展开谈判，让出了在圣斯特凡诺取得的很多果实。为对俄国的这些让步加以确认，有关“东方问题”的柏林会议于 1878 年 6 月 13 日正式开幕，主持会议的是俾斯麦。在这次多国参加的会议上，俄国征服的许多土地交还给了土耳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管理权被奥匈获得，感激万分的土耳其苏丹作为礼物，把塞浦路斯交给了英国。

对柏林会议的结果，泛斯拉夫人深感痛恨。一向严厉异常的俄国新闻检查制度，这时也网开一面，听任报界对德意志帝国宰相进行了连篇累牍的人身攻击。如今，“联盟的恶梦”再次沉甸甸地压在俾斯麦心头，而且这将可能是他所能想像到的最可怕局面：德国要面对的，将是俄国、奥地利和法国共同组成的同盟。在近于恐慌的心绪下，他向奥地利提议建立关税同盟，在遭到对方拒绝后，又建议德奥订立防御条约。威廉一世对这种抛弃亲俄这一普鲁士传统外交政策的做法深感震惊，警告说这样将导致沙皇俄国与共和制的法国结成同盟。德皇强调奥地利实力太弱，甚至连它国内的事情都办不好，而且英国对德国的态度尚在未定之天。

[209] 但俾斯麦争辩说，与奥地利签订的将是一个纯粹防御性质的联盟条约，对俄国而言不仅不是威胁，反而具有某种吸引力，因此未采纳德皇提出的异议。在他看来，泛斯拉夫主义的威胁将会得到妥善控制，通向俄国的妥协之路很快便会通畅起来，奥地利一旦与德国签订防御条约便不会考虑与法国结盟，至于英国，则会愉快地接受德奥两国于 1879 年 10 月 7 日签订的《同盟条约》。但是，俾斯麦的上述判断存在着两大硬伤：其一，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利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二，英国人对德奥同盟绝对没有任何好感。由于和奥地利签订了这项条约，德俄两国很快便陷入了激烈的关税争端，双方的总参谋部不约而同地紧张筹划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根据德奥同盟条约，两国在面对俄国进攻时将彼此给予对方全力支

援。如果法国进攻德国，奥地利将保持中立，除非俄国也参与进攻。俾斯麦很快便意识到，这种防御同盟只需德国或奥地利任何一方制造一下战争借口，很容易变成进攻联盟。他在多份备忘录中均指出了这种危险，但他也清楚，一旦奥地利失败，哪怕战争是它首先发动的，德国也必须加入到它的防御中。为了保持欧洲的力量平衡，必须维持奥地利的大国地位。



根据康拉德·西蒙罗思（1854—1915年）的画作印制的印刷品，内容是威廉一世接见俾斯麦。俾斯麦虽然是一位虔诚的君主主义者，但他与威廉一世的关系却每每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实现自己的设想，俾斯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采用恫吓手法。事实上，威廉一世对自己这位宰相所推行政策的诸多保留意见，往往被实践证明是不无见地的。

如果俾斯麦这时便开始考虑其他方案，例如他后来所称之的“五只飞球的游戏”，应该是不会签订德奥同盟条约的。1881年3月，沙皇遇刺身亡后，俄国大张旗鼓地搜捕恐怖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得到了很多资产阶级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同情），遂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是亲德派，这时展开了恢复“三帝同盟”的谈判，很快便于1881年7月18日在柏林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当缔约国之一和第四国（土耳其除外）发生战争时，另外两个缔约国应保持善意中立，即使战争的发动者是某个缔约国也不例外。俾斯麦借此条约，令俄国保证了在德法爆发战争时的中立态度，但不久以后，随着保加利亚危机的上演，条约不再具有约束力。

始于1885年的保加利亚危机，使德国面临两面作战的危险。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的战争，很可能把其各自的盟国即俄国和奥地利卷进去。俄军开始向边境地区调动，并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挑衅性的步骤。与此同时，法国国防部长布朗热开始鼓动对德报复，而法国国民议会也同意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德国人知道，俄、法两国的总参谋部正在进行会谈，法国武器正源源不断销往俄国。作为中欧大国，德国存在着致命的地理隐患。

针对法国人的威胁，俾斯麦也针锋相对地扩充军队，以有效发挥威慑作用。俄国问题则较此更为棘手：1885年，德国提高了关税率，导致从俄国进口的小麦和燕麦减少了50%。1887年初，俄国政府下令禁止外国人在西部各省拥有土地，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损失了地产。为予回击，德国通过了“伦巴第禁令”，取消俄国债券的发行权。反过来，俄国人把他们的金钱从柏林转到巴黎，并为法国政府提供一笔1亿法郎的贷款，供其加强军备建设。1887年12月，德国再次调高了燕麦和小麦的进口税率。

在危机此起彼伏之际，俾斯麦成功地于1887年6月18日与俄国单独缔结了所谓“再保险条约”。俄国承诺，一旦德法开战，它将保持中立。虽然三帝同盟条约这时还未废除，“再保险条约”却未提及奥地利与俄国 210 之间不可避免要爆发的战争问题。俾斯麦还表示，支持俄国人对博斯普鲁

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觊觎之心，因为他深信，只要俄国企图打通南下之路，必将遭到英国人的阻击，而这对德国是有利的。虽然俾斯麦把“再保险条约”视作自己外交天才的成功范例，但这项条约充满了不可调和的自身矛盾，充其量只是一种应付近期危机的临时性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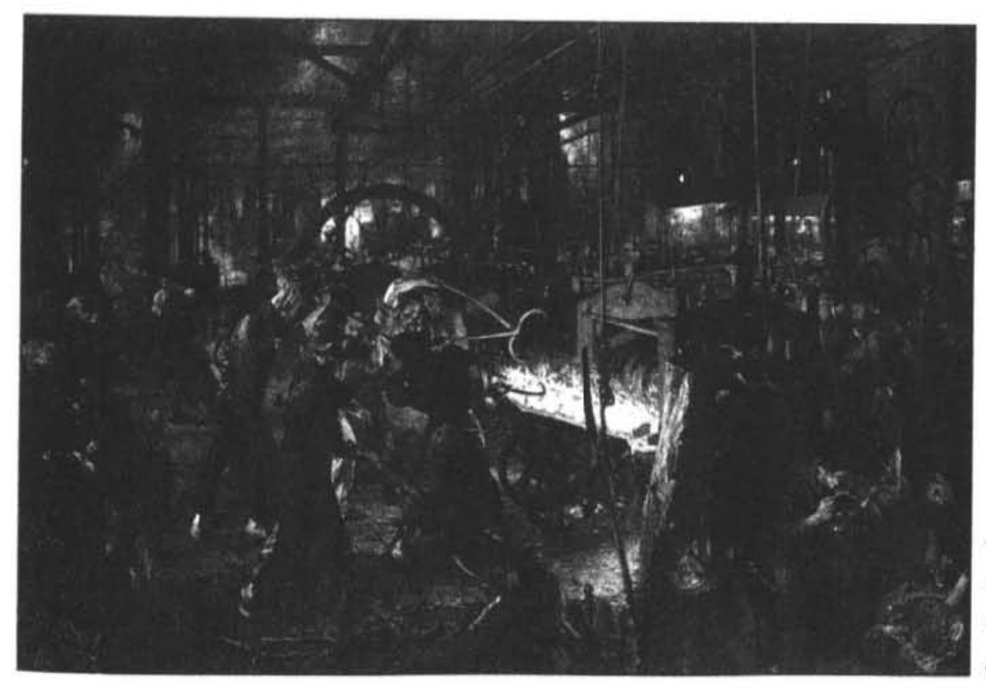
俾斯麦认定，要长久保持欧洲局势的稳定，必须把英国人拉进德奥同盟中来。1889年，他向索尔兹伯里爵士提议签订军事同盟协定，但英国人未予理会。英国虽然不反对解决其与德国之间的殖民地问题，但对这样一个处于俄法两大传统敌手包围之中的中欧国家，对这样一个前途和命运充满不可预测性的德国，它没有丝毫兴趣和德国拴在一起。俾斯麦本来希望，俄国和英国的争夺将使英国被迫重新考虑德国提议，加入到德奥同盟中来，但在现实中却完全落空了。可以说，俾斯麦关于欧洲安全的政策是基于理想化的假设上的，他在“抛接游戏”中无法使五只球都保持在空中。最终，德国失去了自己的行动自由权。

俾斯麦的对内政策

俾斯麦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系在1878至1879年以德奥同盟为分水岭而奠定基调，而其对内政策也成型于同一时段，往往被称作帝国的“第二次创立”。1874年，一位头脑简单的制桶工在巴特基辛根胡乱朝俾斯麦开了一枪。被逮捕后，这个结束学徒期不久的年轻人供认，自己是天主教中央党的同情者。俾斯麦利用这一事件，向帝国议会提出了一项严厉控制联合会和俱乐部的法案。在未获议会通过后，他又另外提出了一项措辞较宽泛的刑法典修正案，亦即其批评者所称的“橡皮条款”，旨在对出版与结社作了一定限制，但在以思路清楚、原则坚定的爱德华·拉斯克为首的一批政敌面前，仍然败下阵来。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只得求诸大众舆论，而由于近些年来的经济不景气，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一种传闻：自由派和社会党人正处心积虑地颠覆国家，并得到了不负责任的帝国议会多数派的支持。正是利用这种政治策略，他把自己在帝国议会遭遇的挫败转化成为政治上的一次得分。

在1877年的选举中，拉斯克及其左翼自由派失去了在帝国议会中的关键职位，政治风向急剧右倾化。部分保守派人士开始呼吁对外国谷物采取保护性关税限制，右翼自由派则号召对工业品采取保护性关税。对于俾斯麦来说，进一步提高关税率，甚至高出帝国议会中可能形成的中右多数派的要求，还有另一层好处：关税是可资充实帝国国库的一种间接税收，大幅度提高关税率，可使联邦政府财力获得可观增长。[211]

1878年5月11日，一个神经错乱的木匠企图射杀驶过菩提树下大街的德皇。俾斯麦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便宣称，这个企图弑君者与社会民主党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系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拉萨尔派以及形形色色



阿道夫·冯·门策尔（1815—1905年）以工业题材创作的《轧钢厂》。他是一位艺术品鉴赏家、艺术家，作品中记录的时尚生活和历史场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组成的政党，其成立大会系于1875年在哥达举行。俾斯麦借此事件，要求通过反社会主义政党法案，并把所有反对这一提议的人均说成是弑君者的同情分子。对此，代表右翼自由派的民族自由党成员本宁格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所提出的法案是“对帝国议会的宣战书”。与上一次一样，反社会主义政党法案再次被议会多数派拒绝通过。

然而，这时又有一个疯子横空出世，从而挽救了俾斯麦。1878年6月2日，有个失业学者诺比林博士用自己的散弹猎枪朝德皇开火，打伤了一位年仅18岁的军官。俾斯麦把这次新的行刺事件视作一次绝好时机，可借此解散帝国议会，实施反社会主义政党的法律，摧毁自由派，使自己的关税制度改革方案得以出台。在帝国议会，巴登州表示反对解散帝国议会，但俾斯麦坚持自己必须得到一致支持，并威胁说舍此将辞去宰相一职，或者通过政变推翻宪法。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屈服了，解散后于1878年7月30日重新选举。这一次，帝国议会中保守派占了106席，自由派125席，由此中央党取得了多数地位。至于社会民主党，获得9个席位，比原来减少了3席。

如今，一切都取决于中央党的态度了。一方面，它痛恨社会民主党的 212 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文化斗争”的痛苦经历还历历在目，因此它也不可能对俾斯麦极力推行的《非常法》多么热心。因此，最后通过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非常法》），形式多于实质。虽然根据该法令，与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团体、集会遭到了取缔，社会主义者不得担任收税员，但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仍能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该党党员仍能发表演说抨击《非常法》，党的会议改在瑞士举行，但报纸仍然在德国各地印刷和发行。

与《非常法》的出台相比，俾斯麦争取多数议员支持以实施保护性关税的努力也轻松不了多少。支持调高关税的利益集团势力强大，这个名为“自由经济联合会”的组织，在帝国议会中有204名议员是其会员，但另一方面，反对此举的各种组织也具有很大能力。大多数普鲁士地主觉得，一旦调高关税，他们的出口市场将趋萎缩，而人们过份夸大了来自俄国和北美廉价谷物的威胁。地主们担心，提高关税将仅仅有利于工业家，而在他们眼中，工业家只是一帮靠倒买倒卖赚取利润的粗鄙的暴发户。至于温和保守派，则希望大幅度减低直接税收，以抵消间接税的增长。一向关心各邦权力的中央党，担心中央政府收入增加后，将使各邦失去财政权力。而左翼自由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知道，间接税的增长将使穷人的利益进一步受损，虽然这些人现在已经因经济衰退衣食堪忧了。

为争取中央党的支持，俾斯麦向该党保证，“文化斗争”将趋平息甚至完全中止，并将接受被称作“弗兰肯施泰因条款”的维护各邦权益的税收分配方式，即：帝国每获得一笔超过1.3亿马克的关税收入，均分给各个邦，后者按照一定比例再交出一部分。

当时，德国的关税水平很低，还根本谈不上保护性质：工业品的进口税率是10%至15%，农产品则还要低一些。直到1885、1887年，在俾斯麦多方努力之下，税率才调高到保护性关税。不过，1879年的那次提高关税意义也很重大，因为正是以此事件为契机，农业与工业、谷物与钢铁开始结盟，并将成为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德意志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随着关税的再次提高，仍然忠诚于其信条的自由派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与俾斯麦的决裂之路。倡导自由贸易政策的大臣们全部辞去了职务，包括“文化斗争”的旗手、教育大臣法尔克。在这种局面下，在议会中占据多个席位的中央党似乎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但帝国议会的短暂的黄金时代已经远逝。从此，政治生活中的弄潮儿变成了利益集团、游说分子，主导趋势变成了不问原则的相互妥协。

如果说在俾斯麦的国内政策中，反社会主义政党法是大棒，那么社会保障政策便是胡萝卜。与英国相比，德国在管理劳工生活条件的立法方面已经远远落后，而社会保障体系与法国相比更是不可以道里计。俾斯麦希望，推出养老金制度后，工人阶级为了得到这笔钱，便会变得忠顺和不问政治。在他看来，要对付社会民主主义，最佳的药方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一目的，帝国议会首先于1883年通过了健康保险法，规定保留工资收入的病假可从原来的三天延长到不超过13个星期。在经历三年的争论之后，意外事故保险制度也于1884年出台，保险金相当于平均工资的2/3，自病假截止之日起算。这种保险实行不追究过失责任的方式，由雇主合作协会管理实施。1889年，《伤残和老龄抚恤金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不过这种抚恤金数额有限，到1914年时每年仅为152马克。与之相比，1913年的德国工人平均工资为1083马克。

213

上述福利制度均谈不上普遍或慷慨，因此工人和雇主双方都不甚满意。俾斯麦试图通过这些立法剥夺社会民主主义的成长空间，但鉴于这种思潮的主旨在于社会控制权而非减轻劳动条件的艰苦性，所以无法奏效。不过，与法国或英国相比，俾斯麦的有关社会立法已领先了一大步，并为日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殖民地政策

俾斯麦在 1881 年宣称："只要我当一天宰相，德国就不会有殖民政策。"虽然在此前一年，当一家德国公司在南太平洋的业务陷入严重困境时，他还曾试图施以援手。到 1884 至 1885 年时，德国已经在西南非洲、东非、多哥和喀麦隆、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马歇尔群岛等地建立了殖民地。俾斯麦的对外殖民政策有多重的复杂动机，其中有面对经济萧条寻找出路的原因。殖民地的建立需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且容易滋生与其他帝国的矛盾，但在俾斯麦看来，它们可以为德国商品提供市场并保证原材料的供应，为德国进军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市场赢得口岸。

俾斯麦当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海外殖民有可能使德国摆脱在欧洲中部容易两面受敌的地理特点，也有可能把民众对国内政治的关注转向海外发财之路。或许，德国可以利用帝国之道，像 1871 年那样再次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在 1884 年的选举中，俾斯麦便利用殖民问题抨击自己的政



一位德国殖民地长官 1905 年的照片。他身穿热带制服，左手持手杖，右手拿着雪茄，身后坐着的是他的仆人。德国在 19 世纪后期的殖民活动，耗费了帝国的大量资源，而俾斯麦更希望把精力集中用于欧洲事务。

治对手视野狭窄、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藉以引起反对英国的选民的好感，抗衡自由派的亲英国立场。

但俾斯麦的上述如意算盘，几乎无一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如果不建设一支庞大的舰队，海外殖民地是无法得到保卫的，由此导致德国在中欧地区的地理劣势进一步恶化。再者，扩充海军势必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从经济上看，殖民地的所得与付出是不相称的：德国出口总值中只有0.1%通向其殖民地，总进口中也只有0.1%来自殖民地。直到1905年，德国对国外的投资也有2%投向殖民地，所谓殖民地中的德国人也只有寥寥 214 6000人，其中大多数是文职雇员和军人。虽然也有一些武器贩子、酿酒商和廉价布匹的生产者赚了点钱，但帝国用于殖民地的开支要大得多。俾斯麦在快要辞去宰相职务前，已对殖民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1890年，德国把桑给巴尔岛（位于坦桑尼亚北部——译注）出让给英国，以换取赫尔戈兰湾，此举似乎表明，俾斯麦希望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事务。

威廉二世

1888年春，威廉一世逝世，享年91岁。继位者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但这位弗里德里希三世仅仅统治了99天。新皇帝是自由派，崇尚英国立宪政体，娶的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随着他因咽喉癌去世，俾斯麦再也不需要担心德国会成为英国的仆从国了，但与此同时，德国实现自由化并与英国交好从而确保安全的希望也化为了泡影。尼采曾指出，弗里德里希三世的逝世是德意志遭遇的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幸。

所谓“德意志遭遇的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幸”，弗里德里希三世之子威廉二世也算一个。按照其英国舅舅爱德华七世的话说，威廉二世是“历史最神奇的失败作品”。他天资聪颖却又庸俗浅薄。他神经质似地夸夸其谈，自说自话般地胡思乱想。他酷爱装腔作势，嗜杀野生动物。他 215 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但只有在他那同性恋者和易装癖的密友圈子中的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对英国的痛恨，是自卑感在作祟，也是因为他痛恨自己来自英伦的母亲——他的父亲刚刚过世，他便把母亲软禁了起来。这个自相矛盾、言辞粗鲁、性格暴躁的人身上，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德国的种种矛盾。

继任帝王时，威廉二世年方29岁。他毫不讳言，自己不想隐身于比自己大上44岁的宰相的阴影之下。他对亲信说：“我给那老头6个月的喘息时间，然后我就亲自执政。”

皇帝与宰相的主要冲突，来自社会政策。威廉二世希望自己能把工人阶级从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吸引过来，运用自己对福利事业的关心获得他们的忠诚，从而博得“社会皇帝”的美名。皇帝的社会思想其实来自宫廷牧师施托克尔，而且在接受后者逻辑混乱的想法时未作周密考虑。在施托

威廉二世1900年身着军服的一张照片。可以说，他的个性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德国最令人生厌的一面。威廉二世深信自己肩负着世界性的历史使命，自始至终没有认识到自己能力上存在的不足。他不懂得世事需要有进有退，而是在自卑心理作祟下一味逞强。他将把自己的祖国带向灾难。



克尔看来，通过社会改革、新教主义，辅之以反犹太主义的药方，便可以把工人阶级吸引到周边。因此，当俾斯麦要求恢复并强化《反社会民主党法案》时，威廉二世不仅予以拒绝，还提出应对1889年的煤矿工人罢工采取安抚政策。他认为，德国人与英国人不一样，“忽视了自己的工人，把工人像柠檬一样榨干后，便像废物一样置之不理了”。他还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工作条件问题。俾斯麦则强调，这是企图廉价地取悦于最底层的阶级，而要想让每个人都快乐，那将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为了防止皇帝与其他大臣串通一气对付自己，俾斯麦提醒皇帝，1852年的一道诏令要求除国防大臣之外，所有大臣与国王商讨大事之前都必须首先请示宰相。对此，威廉二世公开宣称：“谁挡我的路，我就灭谁!”

在1890年2月20日举行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俾斯麦所联合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议员遭到失败。对此，这位宰相提议废除宪法，在不设帝国议会的情况下施行统治，必要时甚至不惜通过政变方式。但他却未得到自己所推动的全民公决的支持，也被如今已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普鲁士国王所否决。无论是政治家、将军、文官还是商人们，没有谁赞同他拟议采取的如此激烈的步骤。在这种局面下，俾斯麦1890年3月18日提出了辞呈。年轻的皇帝愉快地接受了。

领航员下了船，大多数人都感到如释重负。当皇帝大声宣布“航向不变，全速航行!”时，人们纷纷鼓掌欢呼。然而，当他们发现航向已经发生改变，对政府越来越感到不满时，又会重新想念起俾斯麦，把他当成神话般的人物。人们普遍认定，如果德意志号航船仍旧由这位“铁血宰相”领航的话，一切都会更好。随着俾斯麦回忆录的出版，人们更加觉得今不如昔了。在这部文学上看不失为杰作的回忆录中，这位老人对继任者进行了刻薄的、大量的批评。在新教徒的德国，人们争相拜读回忆录，对这位把德国引向民族光荣之路的作者掀起图腾般的崇拜。不久以后，民族光荣之路便将在灾难中走向终结。

新的宰相是莱奥·冯·卡普里维中将。此人是一个杰出的军人，曾担 216 任海军大臣，但没有多少政治经验。他性格温和，不喜欢帝国主义，认为德国如果建设一支庞大的舰队将是自寻死路。他接替俾斯麦的职务后，试图缓和社会冲突和紧张关系，准备加强社会立法，平抑粮食价格，增大工业出口，并制止每年多达10万人的移民现象——这些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是有知识、有思想的专门人才，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和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卡普里维试图与俄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用德国的工业品交换俄国的粮食，由此招致了保守的农场主们的不满，不屑地将之称作“连一块地、一棵草都没有的宰相”。帝国主义者则反对与英国签订的用桑给巴尔岛换取赫尔戈兰湾的条约，遂成立了最为好斗的利益集团“泛德意志人同盟”。卡普里维还希望在国内在一定程度上就一系列问题取得某种共识，其中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例如增加工业品出口、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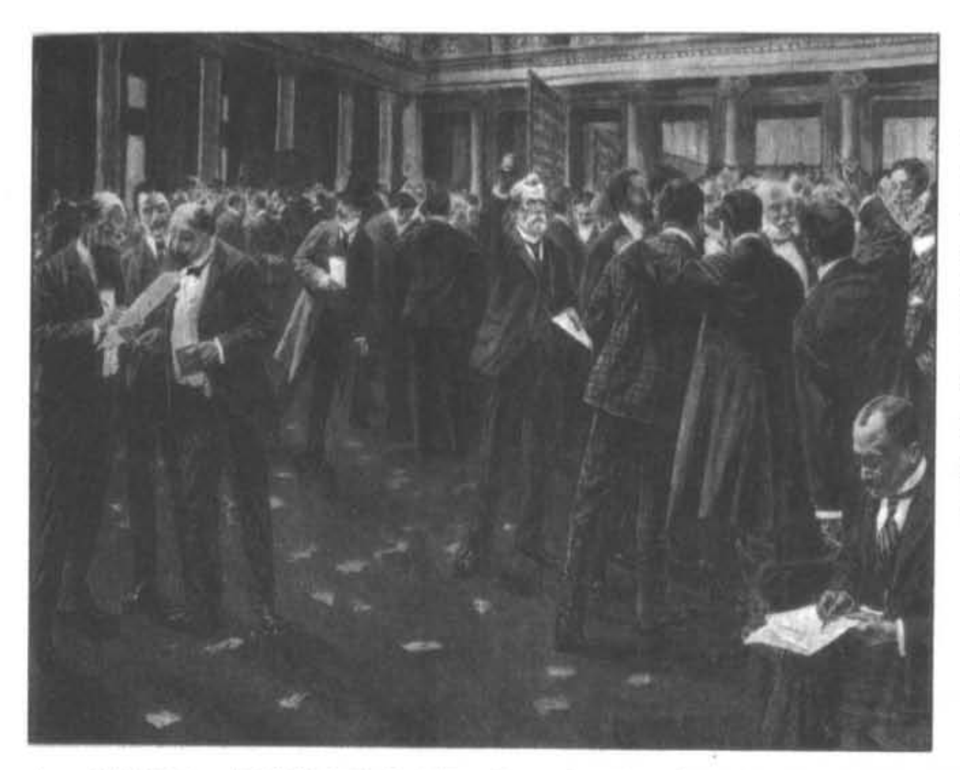
英国达成一项协定等。但由于皇帝左右摇摆，由于右翼利益集团的强势影响，也由于社会民主党不可能融入帝国的政治生活之中，他的上述努力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1895年，威廉二世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一帮不配称作日耳曼人的家伙”。

卡普里维缺乏必要的行动自由权，无力使德国摆脱“联盟的恶梦”。1892年，俄、法两国开始进行军事会谈，次年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此后，俄国人宣布，任何一国如果不给予它最惠国待遇，将面临关税增加20%～30%的报复措施。对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派，德国帝国议会的反应是，把俄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增加50%。反过来，俄国人也如法炮制，并在各个港口把德国船舶的停泊费用增至天文数字，等于把它们逐出了本国水域。在这种情况下，俄德两国间的贸易基本上宣告中断。与此同时，俄国舰队则于1893年访问法国土伦港，不久之后又批准了两国军事协定。

由于德国是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关系的中断对其经济造成了极大压力。两国1893年开始进行停止关税战的谈判，次年达成协议，彼此均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贸易战的结束并不足以使法俄军事协定失去效力。而且，来自保守派和“农场主联合会”的攻讦使卡普里维承受着更大压力。这些人指责宰相，正在葬送在他们看来是德国立国之本、普鲁士价值源泉的农业。在宫廷，人们也在策划推翻卡普里维政府。看来，这位俾斯麦的继任者被迫下台，已是指日可待。

1892年，普鲁士教育大臣泽德利茨－特吕施勒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准备让教会对学校拥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卡普里维希望通过做出这一让步，在普鲁士联邦议会中争取到中央党的支持。对于一向强调学校应重视传统价值观，以对付社会主义等有害的近代思想观念的威廉二世，这也是[217]一种取悦。普鲁士的自由派指责这项法案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威胁，迫使普鲁士政府撤销了提案，教育大臣也因此辞职。同时，卡里普维也辞去了普鲁士首相一职，由超级保守人士博托·冯·奥伊伦堡接任。普鲁士首相与帝国宰相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此前仅仅在俾斯麦执政时期短暂发生过一次。此次两项职务的分离，将在历史上造成致命后果。

两年之后，普鲁士政府又遭遇了另一次重大挫折。博托·冯·奥伊伦堡鉴于无法在帝国议会获得多数支持，遂采取了贸然行动，向普鲁士联邦议会提出了一项“反革命法案”。皇帝策动了政变，奥伊伦堡和卡普里维均提出辞职。本来，卡普里维希望为左派打开一扇进入政治生活的窗户，以实现社会融合，而奥伊伦堡及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克尔的主张则是压制左翼势力。米克尔在“集中政治”的旗号下，罗织了右翼势力联盟。当“反革命法案”提交讨论时，刚好是联邦议会1894年12月搬到新址后的第一次辩论。这场政治危机的发生，客观上只会进一步加剧两派势力的分庭抗礼。其中的一条阵线主张国家专制，其支持者是保守派和右翼自由派。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者和左翼自由派都是目无上帝的革命者，是国家的敌



弗里德里希·黑泽西（1859—1864年）设计的柏林股票交易所大厦。德国之所以存在资本短缺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柏林股票交易所效率低下，而其效率低下，则归咎于1896年《股票交易法》规定的手续过于繁复、印花税太高。人们在指责皇帝是一个“愚人”时，常常会拿这项法案作为例证。投资者发现，他们的资本拿到德国境外，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

人，遂掀起了一场歇斯底里的“捉巫”运动。另一条阵线则是那些仍然秉承民主原则的人士，他们希望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运转正常的议会民主制国度。

“反革命法案”的出笼，清楚地表明威廉二世已经放弃了成为“社会皇帝”的念头。这时的他，已全盘接受了反动的钢铁大王卡尔·费迪南德·冯·斯塔姆－哈尔伯格的思想，奉行起“工业家长制”来，亦即工业家等于“工厂的主人”，工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都听由他的支配，就像传统上容克地主在自己的庄园一样。据此，罢工等于叛国，任何东西只要与社会主义有一星半点的相似之处，就必须予以取缔。新任宰相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谢林斯菲斯特亲王在帝国议会第一次发表讲话时坦承，他上台后没有任何既定的施政纲领。事实上，这位以“永无谬误”为信条的旧天主教徒，纯粹是斯塔姆“国王”的一位使臣。

1895年，普鲁士教育部听说一位任教于柏林大学的年轻物理学家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并从自己相当可观的财产中捐献了一部分以资助一份社会主义月刊，便责令大学开除这位名叫马丁·阿伦斯的教师。大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代表校方抗议称，当局的此种要求是对学术自由的粗暴干涉，是毫无法律依据的。为“师出有名”，政府遂炮制了“阿伦斯法”，使自己解除阿伦斯博士之类人士的职务时有了法律依据。教育部与柏林大学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两年时间，阿伦斯等人最终被赶出了学校，反社会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取得了一次胜利。

此后，当局又试图通过“莱克斯法案”以强化新闻检查制度，但由于 218 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在帝国议会未获通过。杰出的军事历史

学家汉斯·德尔布鲁克对此评论说，德国的自由离不开社会主义者。确实，正是这个仍然在谈论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敢于直面顽固的天主教徒和伪善的保守派，成为自由精神的最坚定的捍卫者。

米克尔纠集的“集中政治”运动，只是农场主和工业家们的一种各怀心事的暂时同盟，其粘合剂在于这些人都害怕社会主义，都希望让自由派和中央党各安其位，无法发挥更大影响。虽然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没有政治目的，只是效忠于威廉二世的“个人卫队”，但究其实质这不过是一场化装舞会罢了。当保守派拒绝有关开凿运河以便把莱茵河、威悉河和易北河连接起来的提议时，这一阵营内部的裂痕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农场主们认为，这一运河一旦化为现实，外国谷物便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从而使工业界获益甚多，劳工便会弃绝农业，进入工业中心工作。虽然皇帝本人也热烈地希望开凿这条运河，但保守派和“农场主协会”在1899年和1901年两次挫败了这项动议。直到1904年，在国家保证该运河将缩短距离，不连通易北河，并对拖船费用加以控制之后，才与农场主们达成了妥协。至于中央党，在当局撤销对传教士的禁令后，也不再反对修建运河，而且作为回报，该党还答应放弃“弗兰肯施泰因条款”，以帮助帝国脱离财政窘境。

农场主和工业家们对威廉二世时期甚嚣尘上的“世界政治”政策，立场也完全相左。虚荣、圆滑而又野心勃勃的外交家伯恩哈德·冯·比洛于1897年被任命为外交部国务秘书后，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说：“德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陆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的天空。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希望把任何人推进阴影里，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在阳光下的地盘。”比洛所谓的“阳光下的地盘”，首先在中国得到了实现：德国夺取了一座产量不低的煤矿，并在中国开办了一家质量很棒的啤酒厂，而此举并未招来列强的多少注意力。比洛的第二个动作是提出修筑“巴格达铁路”，据称将从柏林一直通往巴格达。如果这条铁路真能建成，将使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占据非常有利的战略地位，并昭示着德国人将来会放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可以把铁路继续往南延伸至巴士拉，连接那里的油田和波斯湾。但主要是由于预算上的困难，这项工程进展缓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其竣工仍然遥遥无期。

俾斯麦深知，德国要想保证安全，关键在于与英国维持良好关系。但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威廉二世，出于自己对英国人的近于病态的痛恨，根本不可能认真考虑怎样利用英国的“光荣孤立”政策实现这种局面。1896年1月，威廉二世致电克鲁格总统（南非荷裔布尔人，1883至1902年任德兰士瓦邦总统，在1899至1902年英布战争中任总司令抗英，战败媾和——译注），对其率布尔人抵御来自英控开普殖民地的詹姆森部队的入侵表示支持。这一愚蠢的外交步骤激起了英国方面的极大不满，并对德国人1895

年开凿基尔运河背后的动机产生了进一步的疑惧。基尔运河的竣工，使德国军舰可以从波罗的海进入北海。

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文化

虽然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帝国，政治生活充满了粗鄙、矫情和野心，但在思想文化方面，在人们对技术进步欢欣雀跃、充满信心之中，在资产阶级对国内外形势可能发生剧变那挥之不去的担心之中，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对世人长期以来作为真理而接受的一系列信念给予了革命性的颠覆。在视觉艺术领域，阿道夫·门采尔以腓特烈大帝和威廉一世的宫廷为体裁，创作的古典派绘画作品赢得公众普遍好评，而抽象派艺术家却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提出了挑战。

在建筑领域，以彼得·贝伦斯、阿尔弗雷德·梅塞尔、路德维希·霍夫曼等人的功能理性主义思想占据上风，创立了“现代建筑”学派的原则和规范。他们挫败了艺术学派的攻击——事实很快证明，后者只不过是一种装饰风格而已。纵使是“现代建筑”学派不久便自动归隐，仍然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支持。而以埃里希·门德尔松在柏林建造的“爱因斯坦塔”为代表的印象派建筑，则因为过于精英化、旧式和压抑而无法获得欢迎。此后的建筑风格，强调运用新技术和实用，排斥虚假的装饰，表现出对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乐观情绪。

在伟大的古典作曲家中，勃拉姆斯可谓最后一位大师。勃拉姆斯1833年生于汉堡，1862年迁居维也纳，1897年在那里逝世。当他仅仅20岁时，舒曼便赞誉他是一位天才，但直到其创作的《德意志追思曲》在1869年首演后，他才受到普遍的关注。在音乐领域，勃拉姆斯持保守倾向，强 220 烈批评李斯特、瓦格纳等人的“新音乐”。他一生著述甚丰，举其要者有四部交响乐、四部协奏曲，以及室内乐、歌曲等，都是古典音乐殿堂中的杰作。至于瓦格纳音乐学派，在勋伯格于1909年出版了《三部钢琴曲》后，也遭到了猛烈抨击，而“新维也纳学派”则已着手“无调性”的试验，并将为音乐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文学领域尚存现实主义，但其色调已发生变化。特奥多·冯塔纳虽然在其大师级作品《埃菲·布利斯特》等中抨击普鲁士社会，却又深深依附于它，相信它有能力对自身进行改造。而托马斯·曼并没有如此的乐观，他用犀利的笔触绘制了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作，主题便是不可救药的腐败社会。格尔哈特·霍普特曼的社会批判戏剧，深深震撼了德国中产阶级，他也因此众望所归地获得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进而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桂冠诗人。

弗里德里希·尼采横空出世，用他那洋溢着力与美的寓言体文字，把


德国公海舰队的创建人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1849—1930年)。

同时代人那种谨小慎微和焦虑不安心理一扫而空。尼采对“数千年的谎言”提出挑战。千百年来作为哲学根基的一切，都成为他的抨击对象，理性、宗教、民主甚至人类社会的美德，在他的笔下都成为虚妄。随着他愈益变得狂放不羁，尼采大声疾呼要出现新的英雄，即抛弃了传统上一切与生俱来的垃圾的“金发野兽”，预言这代新人将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尼采的学说充满了惊世骇俗的非理性主义和精英主义，而他的思想的继承者们将对这个世界带来更彻底的损毁。

与尼采不同，被称作现代社会学鼻祖的马克斯·韦伯，却是一位严格的理性主义者。同时，他认为社会科学从来不曾起到支持价值判断的作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导一个人他应该做什么，而只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让他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韦伯认为，科学基于“责任伦理”，通向妥协和理解，而政治则基于“信念伦理”，通向分裂与对峙。作为一位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韦伯在其科学著作中提出的基本价值观是他对德意志民族国家需求的理解，以及他对资产阶级社会伦理道德的坚定信心。

海军军备计划与预防性战争

1898年，比洛担任外交国务秘书后不久，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被任命为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是德皇的亲密私交，和威廉二世一样迷信建设一支强大的公海舰队，认为惟其如此才能消灭英国皇家海军，使德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同样，他和皇帝一样傲慢自大、缺乏自省精神。不过，他的组织 221 天才、技术专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信念，以及他那令听众如醉如痴的鼓动本领，使他成为推进海军军备计划的最佳人选。他的鼓吹激起国人对海军的热情，便能驱使整整一代男孩子穿上水手服，从而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他宣称，社会秩序自此将长治久安，国人从此将对“有文化和没文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绝缘。据此观之，公海舰队的建设既是针对英国，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帝国议会。

蒂尔皮茨1898年提交的第一个海军扩建法案，要求建造两个中队的战列舰。为了激起民众的造舰狂热，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奔走全国各地，宣扬蒂尔皮茨炮制的新的福音；记者们连篇累牍地书写文章；演说家们走街串巷，边放映幻灯片边大声疾呼；海军军官们更是结合自身体会，严肃告诫国人加强海岸线防御的必要性。功夫不负有心人，德国人对舰队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了。造船厂老板和工业家们从中看到了大发利市的机会，帝国主义者梦想攫取更多的殖民地，爱国者渴望壮大国力，抗衡英国人犯下的诸如把高尚的布尔人赶到集中营的种种暴行，而社会民主党人则欢迎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工人工资的措施。



冯·蒂尔皮茨为实施自己的造舰计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激起了国人的巨大热情。这张海报反映的是，1910年在柏林选侯大街旁的一个展览上，人们藏匿于模型舰船中，在一个大池塘里"披波斩浪"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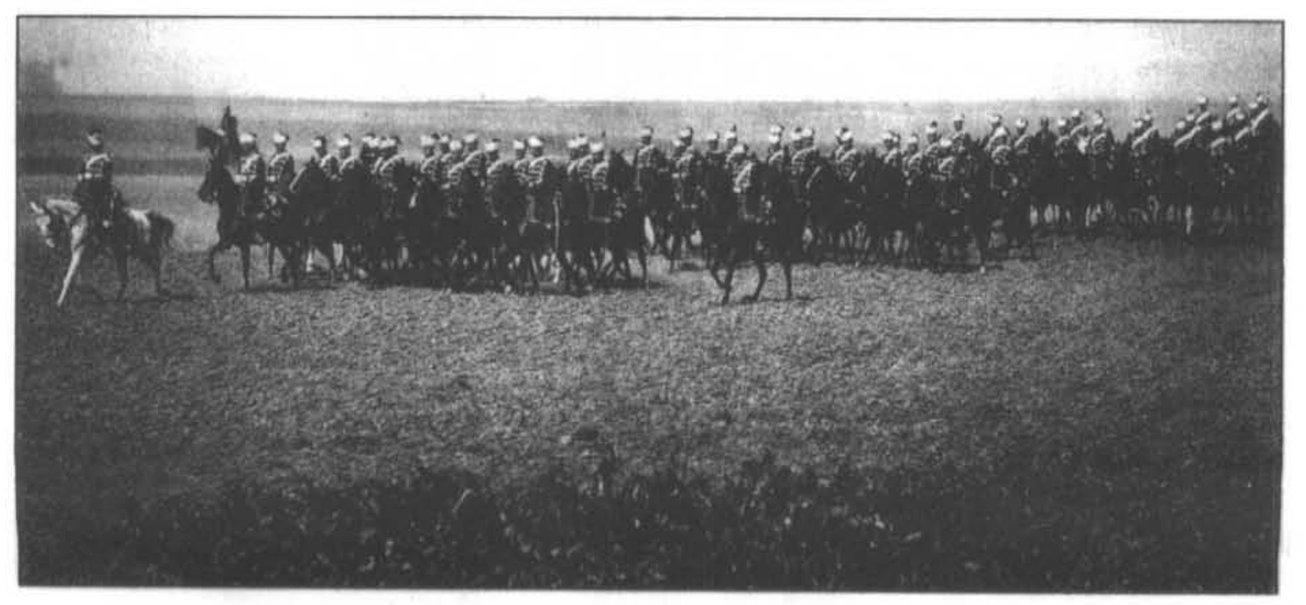
然而，蒂尔皮茨的计划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赌博：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强国，要么战败灭亡。德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一场在赫尔格兰湾到泰晤士河口之间某个海域进行的庞大海战。舰队制胜战略，将令政治家们丧失任何回旋余地。此时的德皇，已把获得国民爱戴的希望寄托在海军建设和令人神驰目眩的帝国扩张上，而不再是虽富实际意义却吃力乏味的社会改良，而自1900年起担任宰相职务的比洛恰恰是一位最为理想的执行官。比洛出身于破落的下等贵族家庭，与当时以及当今的诸多德国政治家一样，把政治看成是通向财富和地位的捷径。他野心勃勃，作为廷臣没有主见，只知一味奉承皇帝，是"最满脸堆笑的大臣"。当他从高位上跌落时，曾自我解析了一番："你面前曾有两条道路好走：可以到开罗或索非亚当总领事，可以到雅典或者海牙担任使者，也可以当副国务秘书，如果走运，最后能混几年大使，最后以冯·比洛先生的头衔退休，手头没留下多少积蓄，在波恩或维也纳度过残生。你也可以成为大臣、亲王、将军，在马耳他得到一幢别墅，成为历史名人，但走这条道路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争吵，结下敌人，进行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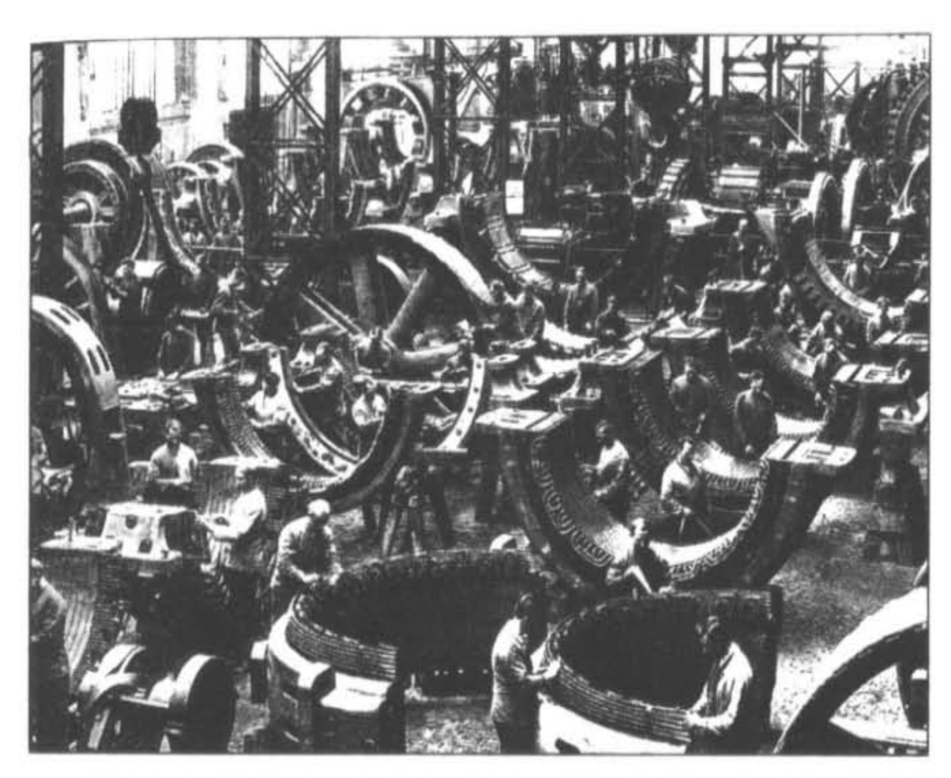
比洛在帝国议会的支持者来自米克尔的右翼集团，但他至多能加以操纵，却无法主导这个集团。到了1901年，比洛出于取悦农场主的目的，在撤销开挖第二条运河法案的同时，从内阁中赶走了数位不再得到他们信任的大臣，而在农场主们眼中与工业界关系太过密切的米克尔也赫然在列。第二年，比洛提高了关税税率，但与农场主们的期望相比升幅太低，而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又太高了。在1903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谴责农场主阶级强行提高食品价格、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从而赢得了可观的议席。其实，新关税只是每200千克谷物为1马克，而农场主们要求的则是15马克！因此，农场主联合会对政府深为不满，大加痛斥，甚至很多保守人士准备加入社会民主党，共同反对比洛政府！

1900年的海军扩建法案提出再建造两个中队的战列舰，令英国人感到了危机。虽然按照蒂尔皮茨的“风险理论”，德国人的目标只是建造一支规模可观的舰队，令他国海军不敢冒与之交战的风险，但并不足以抚慰英国的担忧。英国的海军至上主义者决心应战，英德海军军备竞赛遂愈演愈烈。1905年，这场竞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英国建成了“无畏”号战列舰，这艘庞大的战舰，令蒂尔皮茨已建成的所有战列舰尽皆过时。现在，德国面临着困难的局面：基尔运河河道狭窄，无法通行“无畏”级的庞然大物，威廉港的船坞也太小了，至于财力，德意志帝国更是无法与英国人相提并论。

同样是在1905年，德国总参谋部的预防性战争鼓吹者宣称，机会现在已经来临：俄国新近在俄日战争中大败亏输，国内又爆发了革命；英法两国也很虚弱，前者尚未从布尔战争的创痛中恢复元气，后者则被殖民地问题弄得头昏脑胀，因此双方的“协约”关系徒有其名。不过，德国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们要谨慎一些，并不想真的发动战争，而只想利用有利时机在外交上取得胜利，以离间英法之间的协约关系。威廉二世的顾问们则怂恿他前往摩洛哥，以显示德国在这个国家的利益——摩洛哥虽然名义上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显而易见已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外交大臣，亦即英法协约的设计师、法国在摩洛哥帝国主义政策的幕后推动者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向德国人提出，愿意在贸易领域做出让步，但这并不足以填满德国[223]人的胃口。为了让危机愈烧愈旺，德国人要求就摩洛哥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为了让怒气冲冲的德国人消气，法国总统鲁维埃解除了德尔卡塞的外长一职，并表示愿意进一步降低德国商品的关税。但是，德国人仍不满足，而是坚持必须召开摩洛哥问题会议。终于，德国人如愿以偿了：会议得以在阿尔赫西拉斯举行，但在这次旷日持久的会议却几乎止于空谈，更致命的是德国人在会上遭到了孤立。此后，法国在摩洛哥的宗主地位得到了加强，其与英国的协约关系也得到了强化。

德皇1884年参加军事演习。普鲁士陆军每年都举行一次全军性演习，以检验作战能力，提高总参谋部军官的领导水平。就军事素质而言，普军堪称世界之最，但囿于过份重视政治上的可靠性和过份限制军人的社会成份，这支军队的规模太小，无法完成它所规定的雄心勃勃的任务。





1904年的柏林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电子工业于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兴起，不久之后通用电气、西门子等公司便成长为世界电子业巨头。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子、化工等产业中取得的成功，对其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次灾难性的外交失利后，威廉二世采取了另一个步骤，即赴比耶尔克会见沙皇，力图把沙俄争取过来，共同反对英国。两国皇帝在见面时场面确实相当热烈，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国一旦遭到欧洲另一国家的进攻，另一国即应提供支援。他们甚至还设想最终能够说服法国也加入进来。但这一缺乏现实基础的约定，很快便被俄国方面撤销了。作为此项生硬倡议的设计者，比洛提出辞呈，不过未被德皇接受。另一方面，尽管德国从英德“无畏”级战列舰竞赛中遇挫，到摩洛哥问题上徒劳出击，再到比耶尔克成果的无疾而终，短短时间里接连遭到挫折，但精英阶层并不会接受谈判和裁军之路，因为在他们看到，这种倒退有失德国的尊严。置此困境之下，他们只能幻想包围德国的联盟将分崩离析，同时不得不准备“预防性战争”。

1906年，中央党与社会民主党联手，在帝国议会挫败了一项动议追加2900万马克的法案，用于德国镇压赫雷罗人的血腥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殖民地，缘由是赫雷罗部族发动了暴动。法案被否决，对于比洛及其世界政治当然是一次重挫，但到了1907年1月，“比洛集团”在所谓“赫雷罗选举”中却获得了胜利。在这次选举中，俾斯麦当年所构建的保守派与右翼自由派的联合体复活了，而社会民主党则丧失了一半的议席。

尽管比洛在帝国议会获得了稳定的多数来支持自己的“世界政治”，但问题在于国库里的金钱已所剩无几。由于海军军备建设，由于1893、1899、1905年三次扩充陆军，由于在中国和非洲的殖民战争，帝国每年的预算赤字达到了2亿马克。政府试图用增加土地税的方式加以弥补，令保

第217页图：挪威艺术家、讽刺性《纯真》杂志重要供稿人奥拉夫·古尔布兰森（1873—1958）于1914年10月在发表的一幅漫画，传神地表达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四面受敌的焦灼感。

守派大为不满，而提高间接税又激怒了左派。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究其原因，主要是军备计划）导致每年的财政赤字上升到5亿马克。到了1908年，帝国所欠债务达到40亿马克之巨。帝国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都不赞同进一步增加土地税和间接税，保守派人士公开宣称，他们将退出“比洛集团”。

1908年10月28日，英国伦敦的《每日电讯》发表了威廉二世对一位英国上校所作的评论。在这位名叫斯图尔特·沃特利的上校面前，德皇发表的言论倒符合他的个性，却将为德国带来无穷后患：他说，英国人对德国充满猜疑，“犹如三月里的野兔”；在布尔战争期间，德国并未参加对付英国的大陆同盟，这位皇帝本人还对维多利亚女王提出了怎样打败布尔人的建议，并被罗伯茨爵士所采纳；德国的舰队纯粹用于保护商船队。这 224 番傲慢无礼而又鲁莽异常的言论，在发表前居然通过了比洛和外交部的两重审查！谈话见报后，令英国人和德国方面都气愤异常，并由此导致了比洛和皇帝的决裂。比洛此前已因财政法案失去了保守派和中央党的支持，现在又不再拥有皇帝的信任，感到面前只有辞职这一条路好走了。1909年6月26日，皇帝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辞呈。

接替比洛出任宰相一职的是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此人是一个缺乏政治色彩的官僚，因为不具备贯彻自己主张的能力和勇于决断的精神，他无力推动财政改革进程。虽然他颇为其自诩的“对角线政治”所得意，但这种旨在寻求一致意见的努力，反映的恰恰是难有多少转寰余地的现实。在外交政策领域，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主要目标是，当欧洲大陆战事爆发后，能够确保英国保持中立。正是因为相信欧洲战事已不可避免，所以当他在奥得河畔的霍亨芬诺庄园种植了一排酸橙树时，他称之为浪费精力，原因就在于用不了几年，这片庄园便会落入俄国人之手。他的这种悲观主义，倒是与此前比洛的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225 1911年，法国向摩洛哥派兵，支持苏丹镇压那里的叛军。德国外交部门要求法国就这一破坏阿尔赫西拉斯协定的行为作出补偿，并不得损害有意获得摩洛哥南部矿藏的大型矿业公司马内斯马恩公司的利益。德国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派出“豹”号炮舰前往阿加迪尔海面。英国政府对这一笨拙的炫耀武力做法深感震惊，警告德国不得强行要求在摩洛哥部分地区获得势力范围，但后者拒绝撤出自己的要求。危机爆发后，柏林证券交易所一夕数惊，震荡连连。最终，有关各方找到了妥协之道：德国将获得刚果河流域的一块土地，放弃多哥的部分领土，而摩洛哥仍旧是法国的势力范围。由于摩洛哥这块无足轻重的沙漠地带，欧洲在1911年便走到了战争边缘。对于德国最后偃旗息鼓的退让，国内民族主义者大为恼火，斥责皇帝胆小怕事，而贝特曼-霍尔维格就更无法得到他们的尊敬了。

由于国人对外交局势深为担忧，也由于1911年以后的经济衰退的影

München, 6. Oktober 1914

19. Jahrgang Nr. 27

SIMPLICISSIM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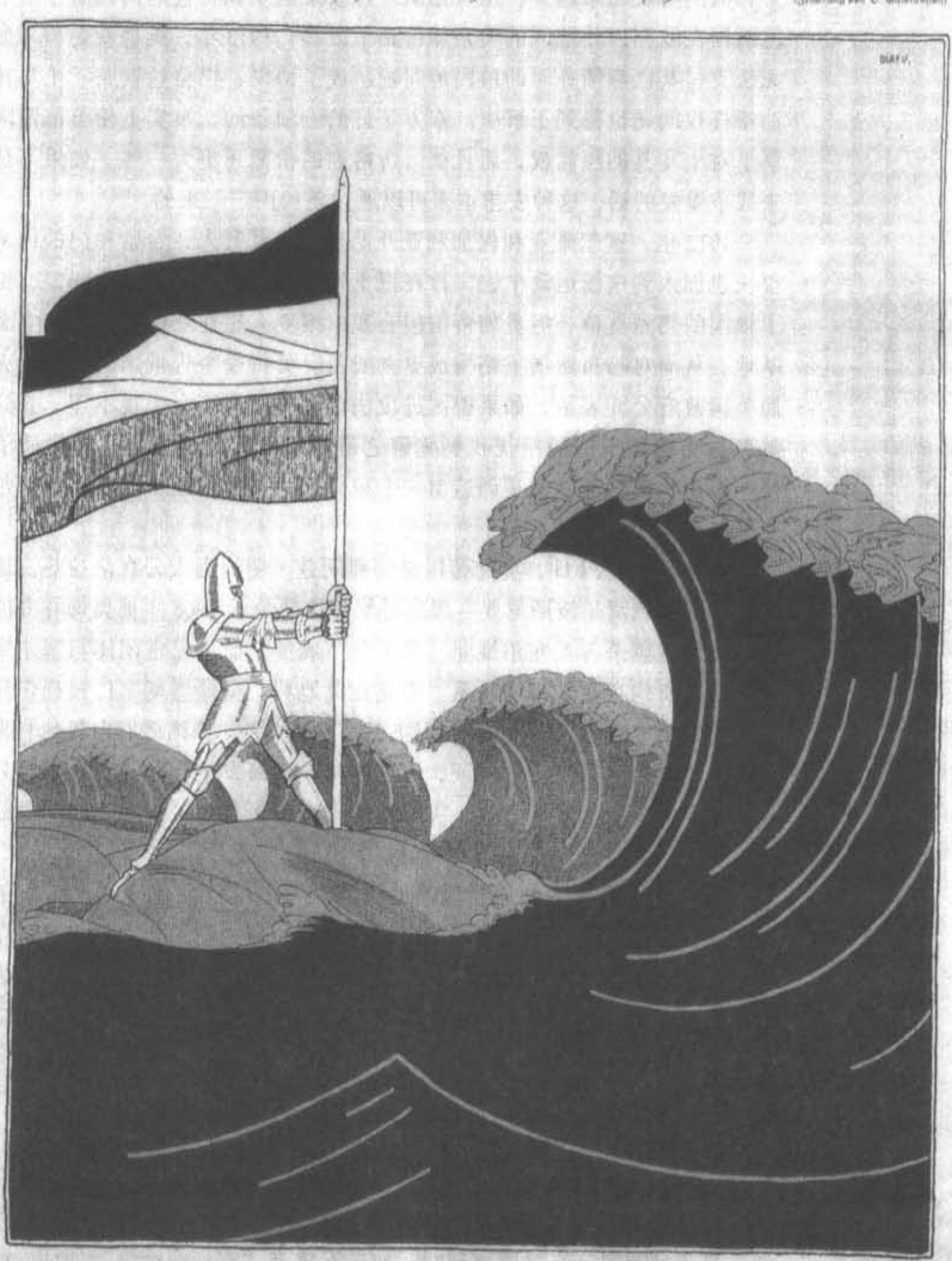
Liebhaberausgabe

Begründet von Albert Langen und Th. Th. Heine

Abonnement halbjährlich 15 Mark

Deutsche Wacht in Kiautschau

(Zeichnung von O. Gulbransson)



响，社会民主党和进步党人在1912年1月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在帝国议会中，社会主义者获得的议席增加了一倍，成为势力最大的党团。

1912年2月，英国国防大臣霍尔丹爵士访问柏林，建议：如果德国愿意取消海军军备计划，英国将在德国遭到外部攻击时保持中立。然而，这一建议是德国方面无法接受的：尽管德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建造更多的军舰，却又把英国人的提议视作对其民族尊严的侮辱。另一方面，虽然英国对德国的猜疑越来越重，尽管德国对外政策的基调日益通向预防性战争，但两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关系却得到了改善：1913年，英德就葡萄牙如果无法支付其巨额债务时的殖民地问题达成了协议；巴格达铁路、土耳其石油特许权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双方签订的一项条约，事实上使英德两国共享了对土耳其的控制权，而且德国所得到的份额还更大一些。如果不是后来战争爆发的话，这种安排本来可以通过条约固定下来的。

1912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开始反抗土耳其人，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很快也加入到这场运动中去。旨在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的这一同盟，得到了俄国的热烈支持，但奥匈帝国担心塞尔维亚人想在亚德里亚海建立海军基地，从而对哈布斯堡王朝构成更大威胁。贝特曼警告俄国人不要玩火，而英国政府公开表示，如果德国进攻法国，英国将不会坐视不理。直到有关各方为奥匈帝国的担忧找到化解之道后，欧洲才从战争边缘撤回了脚步。至于化解之道，便是创造出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藉以阻挡塞尔维亚通向大海的步伐。

227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萨拉热窝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两个于1908年被奥匈吞并的省份的首府。刺杀者系塞尔维亚“黑手党”成员，而该秘密团体与塞尔维亚和俄国政府均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在奥地利，皇储遇刺事件被视作向塞尔维亚发动进攻的天赐良机。6月5日、6日两天，德国政府向奥地利来使出具了“空白支票”：它保证，无论巴尔干半岛发生什么情况，都将为后者提供全力支持。显然，这一灾难性的安全保证背离了俾斯麦当年制订的政策。

贝特曼原本希望奥地利能够迅疾地对塞尔维亚完成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不给俄国人留下实施干预的时间。但奥地利人的动作太缓慢了：条件苛刻得令塞尔维亚绝对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直到7月23日才发送出去。而在德国方面，参谋总长小毛奇当时还在卡尔斯巴德进行水疗，7月25日方返回柏林，而这时俄国人为声援塞尔维亚，已经在实际上展开了部分动员。小毛奇深信战争已不可避免，而德国一方胜算颇大。同样于7月25日返回柏林的战争大臣法金汉，极力鼓吹发动战争。小毛奇一直到7月31日早晨7时才得知俄国人已进行动员，但这时他已做出了动员军队的决定，从而将把欧洲拖进战争。德皇和贝特曼还希望接受英国人提出的谈判要求，但此时德军已经挺进比利时，如果不放弃“施利芬计划”的话，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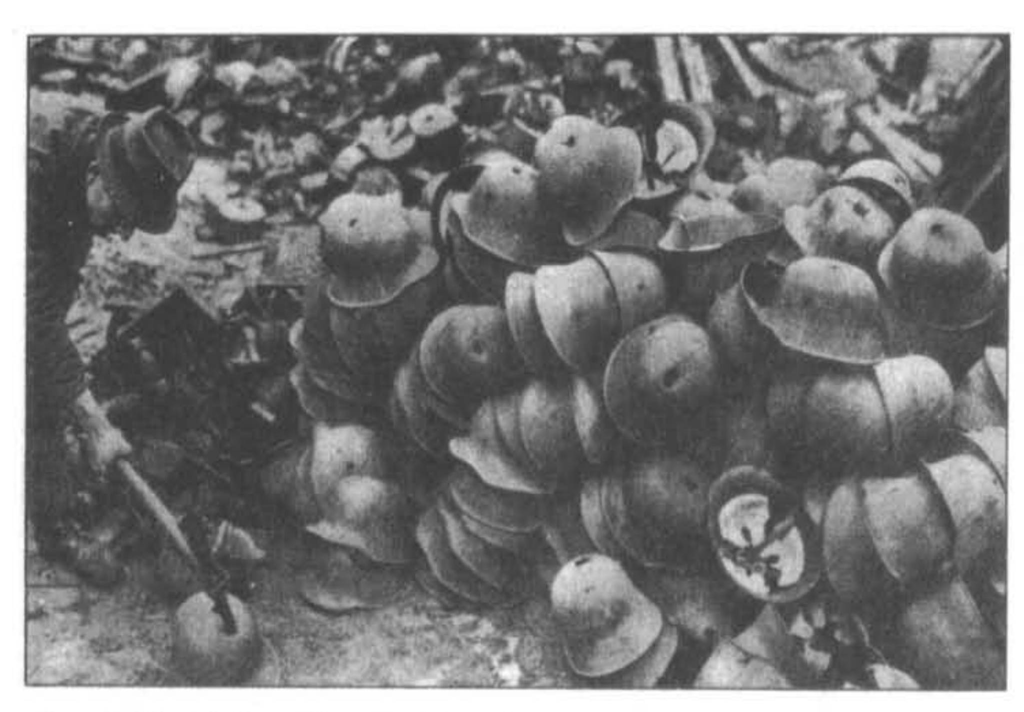
无法停顿脚步——按照这项作战计划的修订版，德军将经比利时境内，快速向南逼近巴黎，尔后在法军从前线撤回保卫首都之际，予以围歼。德国人的速决战略、贝塔曼的“黑暗中的跳跃”，终于引发了一场遍及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战争。这场毫无理性的战争，对交战双方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大屠杀，它将动摇欧洲文明的道德和文化基础，使欧洲陷入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直到今天，欧洲仍然无法完全走出这场危机。

第十章　魏玛共和国

[228] 到1914年8月，德军已占领比利时，并进抵巴黎以东地区。但不久之后便被迫撤了回来，以解救其遭到法军在马恩河地区大规模反击的北线部队。随后，德军和英法联军为相互迂回对方翼侧而实施连续机动，直到海岸为止，史称“奔向大海”作战。在灼人的炎热天气下，两军分别挖掘了北起英吉利海峡、南至瑞士边界线的堑壕，由此揭开了长达四年的“静坐战”的序幕。接替小毛奇出任德军参谋总长的法金汉企图在协约国军队位于伊珀尔的防线打开一道缺口，以夺取战略主动权，但最终劳而无功，徒然送掉了8万德军官兵的性命。德军年轻的志愿人员唱着国歌，对朗奇马克村发动进攻，几乎就是主动地成为大屠杀的对象。虽然这次攻击为民族主义右翼人士提供了一个神话般的经典范例，但最高统帅部从中汲取的教训则是，面对敌军机关枪阵地，步兵进攻已经成为一种纯粹浪费兵力因而应予禁止的作战样式。一时之间，西线战场唯一可行的战略，只剩下了消耗战一途，以寄希望于协约国在代价巨大的进攻中耗去其资源。

在东普鲁士战场，实力相对较弱的德军面对俄军的快速动员和迅速推进措手不及。解除退役状态、回到现役以指挥东普鲁士部队的兴登堡，及其参谋长鲁登道夫，受命稳定战局。在他们的指挥下，德军在坦嫩贝格，以经典性的合围战法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俄军伤亡5万人，被俘9.2万人，而德军仅损失1万人。随后，在马苏里亚进行的冬季会战中，俄军又有7万人伤亡，4.5万人被俘。不过，德军虽然在坦嫩贝格取得了重大胜利，兴登堡也被人们誉为“常胜将军”和“战时英雄”，但这次战役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东线的战事又持续了三年多时间，直到沙皇俄国崩溃才告结束。

在1914年8月那段空前团结的日子里，德军怀着愉快的心情投入战争，对本国战争目标的正义性和迅速赢得胜利的能力深信不疑。反对这场战争的，只有数量很少的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坚持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从战争爆发伊始即行生效的一份法律，授予最高统帅部及各作战区总指挥官独裁大权，各个政党和文职行政当局则被抛到了一边。德国的将军们相信，只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实现他们那力不从心的宏伟战争目标——在西部改变边界线，在东部获得生存空间，在波罗的海地区并吞大片领土——就能够让民主改革要求偃旗息鼓。但随着军事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目标也越来越广泛了。到了1917年，德国议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左联



根据1918年的《停战协定》被销毁的德国军用钢盔。

盟，呼吁停止战争、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鉴于法金汉采取的先发制人战略在凡尔登战役中以失败而告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于1916年8月接掌了最高统帅部（兴登堡任参谋总长，鲁登道夫任副参谋总长——译注）。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通过“兴登堡计划”和“爱国服务法”，把全国置于更加严格的军事控制之下。皇帝事实上已 229 从“最高军事统帅”的位置上退居幕后，听任总参谋部自行做出一切重大决策。至于文职官员，从宰相往下，一律要向这些身穿戎装的“半人半神”们行礼致敬。这时的德国，俨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有些人公开表示，它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制。用鲁登道夫的话说，宪法的残存部分所起作用只是“避雷针”，即可以把军事统治者的过错推卸到文职官员头上。

到了1917年，德国人不惜冒着把美国人卷入战争的危险，投入了一场更加绝望之下的赌局：实行“无限制潜艇战”。虽然德国潜艇数量十分有限，但按照最高统帅部的估计，此举将切断英国跨大西洋的补给来源，只需几个月，便可迫使英国求和。后来的形势证明，1917年对于这场战争是决定性的一年，表现为美国参战和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德国最高统帅部不仅没有利用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作为可行的媾和谈判条件，反而继续坚持要在东方开拓一个庞大帝国，全面控制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因此导致了数量巨大的德军部队被继续拴在东线。而如果这些部队得以调到西线作战，效果本来会好上许多的。

1918年3月，德国人开始实施其代号为“米哈伊行动”的最后一次攻势。德军经过精心准备，对英、法军队在亚珉和兰斯之间的结合部，展开了高效率的进攻，在战役一开始确实取得了明显战果。但是，德军缺乏为利用这一纵深突破成果所必需的预备队和补给手段。7月中旬，协约国发



Urkunden, Depeschen und Berichte der Frankfurter Zeitung.

莉娜·冯·绍罗什为《法兰克福日报》出版的《大战：文献、评述与报道》一书创作的封面。身穿灰色野战服、头戴钢盔的德军士兵，正在沿堑壕调动。这是战争后期德国宣传界写实主义的、非英雄主义的艺术作品中的一幅代表作。

动了反攻，德军防线坚持到8月8日。这一天对于德军来说是黑暗的一天；当协约国军队利用大群坦克为先导，突破了德军在索姆河的防线时，德军官兵只能惊慌逃窜。在统帅部，鲁登道夫的精神差点陷于崩溃：显而易见，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了。9月29日，他和兴登堡一道建议政治家们寻求媾和。

230

战争失败了，政界和军方精英们为把战败原因归咎于议会中的无产阶级多数派（即社会民主党——译注），以诋毁议会民主制，使自己能够重掌权力，采取了一系列老谋深算的步骤。10月29日，基尔港水兵拒绝登上军舰执行一次自杀性的攻击任务，随即发动兵变。11月7日，巴伐利亚维特尔巴赫王朝被推翻。次日，革命风潮波及到科隆和不伦瑞克。在全德各地，与俄国人的苏维埃惊人相似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纷纷建立。协约国提出的媾和前提条件就是，德皇必须退位，而鉴于德军已无法继续作战，必须立即达成停战协议。兴登堡并不拥有足够的勇气来告诉皇帝这个苦涩的现实，遂指派接替鲁登道夫副参谋总长职务的格勒纳将军来执行这个难堪的使命。11月8日，格勒纳告诉皇帝：“军队已不再拥戴陛下了。”11月10日晨，威廉二世逃至荷兰流亡。德国不再有一个皇帝，普鲁士也失去了它的国王。然而，普鲁士军官团中对皇帝退位感到遗憾的却没有几个人，因为正是他推行的狂妄自大、侵略成性和目中无人的政策，把德国引向了如今的灾难。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

形象良好但性格软弱的过渡性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把德国这个烂摊子交给了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亲王的这一行为，其实是违宪之举，而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艾伯特最初拒绝接受这一缺乏合法性的权力交接，则带有革命意义。社会民主党重要人物沙伊德曼则要现实得多，对艾伯特起到了推动作用：“噢，来吧——只管答应下来！”这样，第一届临时革命政府遂宣告成立。组成人民委员会的包括三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士和三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11月11日，德国由文职的中央党国会代表埃茨贝格尔出面，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厢里，签订了停战协定。凡此种种，瓦尔特·拉特瑙做了这样的评论：“一支战败的军队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我们德国人便称之为革命。”他的话不久将为历史所证实。

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传出后，绝大多数的德国民众犹如挨了一记重锤。除了阿尔萨斯的寥寥几平方公里之外，这时的前线距离德国国境线还有一段距离，而且最高统帅部此前从未就局势恶化泄露过任何东西。此种状态将为魏玛共和国带来一大致命弱点：这个政权是战争失败的产儿，但国内却很少有人能够接受这一失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3月份发动的攻势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他们现在却拒绝对此承担责任，更加剧了事态的

恶化。在他们的坚持下，停战谈判只能交由文职官员办理了。最高统帅部决心把罪名加诸民主政党头上，就像鲁登道夫1918年10月1日对同僚军官发表谈话时着重强调的那样：“我曾请求陛下把这些绅士弄到政府里。能这样地交接，我们实在要感谢他们才对。现在，必须由他们进入各个部门，去签订媾和条约，必须由他们来品尝一番我们奉上的这碗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德国虽然失去了大片大片的国土，但还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也许应该看成是一个奇迹。法国人决心摧毁俾斯麦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希望使莱茵河左岸成为法国新的东部边界线。德国 231 之所以得以延续下来，主要应归功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他们希望把它作为对付俄国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而予以保留。不过，德国走上俄国之路的危险，从来不曾真正出现过；表面上似乎是一场革命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旧国家政权的崩溃罢了。战后的德国民众，绝大多数都是希望通过民主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者，他们对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的残暴独裁深感厌恶。

德国的激进左倾分子缺乏成为真正革命者的那种冷酷无情。他们的计划是，在柏林的工厂和兵营进行选举，产生出的代表在布施马戏院召开大会，以选举出“大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然后再推翻艾伯特为首的临时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但这一计划遭到了柏林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奥托·维尔斯的破坏：为了保持力量平衡，威尔斯匆匆组成建立了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士兵委员会。

1918年11月10日晚，格勒纳将军打电话给艾伯特，向后者保证：只要他加入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去，军队将给予他全力的支持。艾伯特不假思索便接受了这一要价。他痛恨布尔什维主义。这时，德军仍在东线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和波兰人交战，艾伯特希望确保德国军队有秩序地复员。他保证，军官团的权威将不会遭到士兵委员会的挑战，也不会成为



在社会国际1907年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罗莎·卢森堡发表公开讲演。卢森堡女士是左翼派别的领导人之一。该组织在1918年12月31日改建为德国共产党，并参加了1919年1月5日的革命暴动。暴动很快便被镇压下去，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这两位激进左派的著名领袖，1月15日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部队杀害。

政治控制的对象。

在人民委员会内，社会民主党（SPD）和独立社会民主党（DDP）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的决裂点，终于由于对“人民水兵师”的处理问题而爆发了。所谓人民水兵师，是负责守卫总理府的一群明显带有左翼思想的水兵。藉此之便，这些贪婪的唯利是图之徒大肆劫掠艺术珍品，并232把奥托·维尔斯（这时任柏林警卫司令部司令官——译注）扣作人质。12月24日，忠于艾伯特政权的正规部队炮击总理府，尔后通过谈判达成了解决方案：水兵们予以解散，部队则撤出柏林。艾伯特政府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抗议，退出了政府，随即由3名社会民主党人接替，这令政府完全失去了保障。如果不是左派人士埃内斯特·道米格犹豫不决的话，本来是可以推翻这个政府的；道米格认为，如果激进分子在圣诞前夜推翻现政权的话，德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以卡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团体—— “斯巴达克同盟”，在错过这一黄金时机后，于除夕改组为德国共产党（KPD）。1919年1月5日，政府下令解除柏林警察总监埃米尔·艾希霍恩的职务。此人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曾发表过大量支持激进革命的言论。他的被解职，引发了一场自发性的武装暴动，而德国共产党领导层、激进工会组织、柏林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均不无思想动摇地支持暴动。

虽然艾伯特政府于1月5日逃出了柏林，但这次暴动注定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1月11日，新近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古斯塔夫·诺斯科，带领他组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部队进入柏林。经过两天的激烈巷战，暴动被镇压下去了。1月15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位激进左派的著名领袖，被诺斯科的部队杀害。反革命行动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其遗留下来的影响却极具危险。诺斯科动用的“自由团”，是由一群唯利是图的极端保守分子组成的，这些人以杀害共产党人为乐事，但同时也企图推翻艾伯特政府。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支持者，耳闻目睹了诺斯科残酷对付暴动者的行为后，认为利用“自由团”无疑是把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因而拉开了与社会民主党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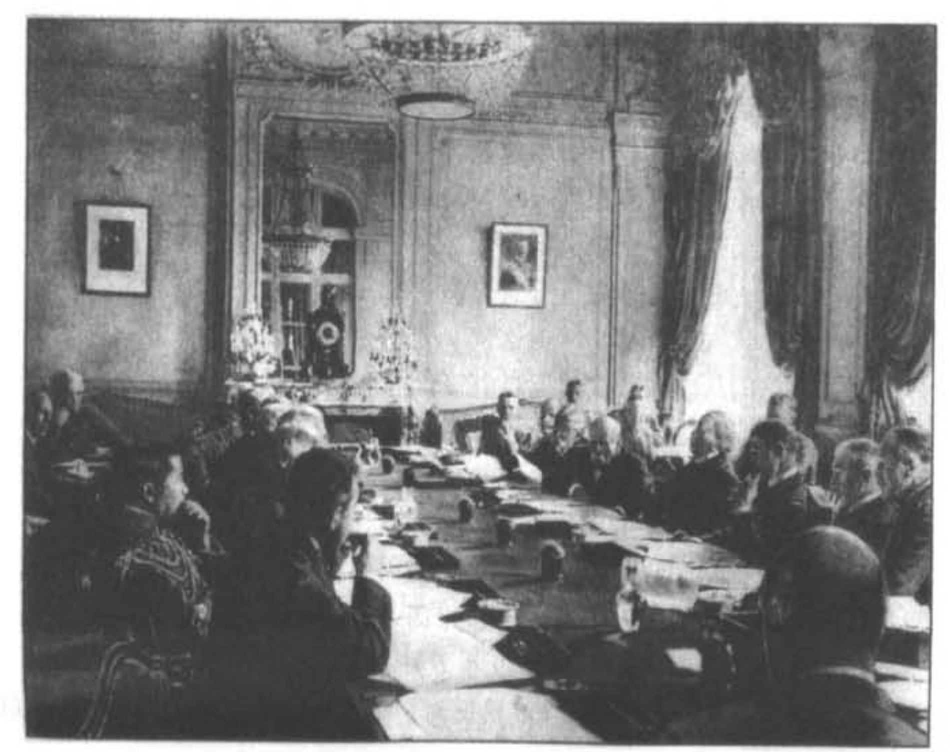
国民议会选举于1919年1月19日举行。选举采取普选制度，凡年满20周岁的男女公民均有权投票，各政党按所获选票比例获得相应议席数。虽然德国共产党抵制了这次选举，但参选政党仍达19个之多。社会民主党获得了37%的选票，但未能获得其原本期望的绝对多数。独立社会民主党仅获得7.6%，从此便无法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了，它的党员后来逐渐返回了社会民主党，要么便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如果把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DDP）加在一起，则一共获得76%的选票，这显示出绝大多数德国人希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共和制的政府。社会民主党曾提出对重工业、采矿业、银行业实行国有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很快便被迫放弃了。整个国家正在挨饿，营养不良已夺走了25万人的性命，到

1918年底时，人均每日摄取热量仅为1000卡路里。工业生产由于原材料供应严重不足，又回到了战前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极少数毫不理会现实条件的空想家才会主张大规模国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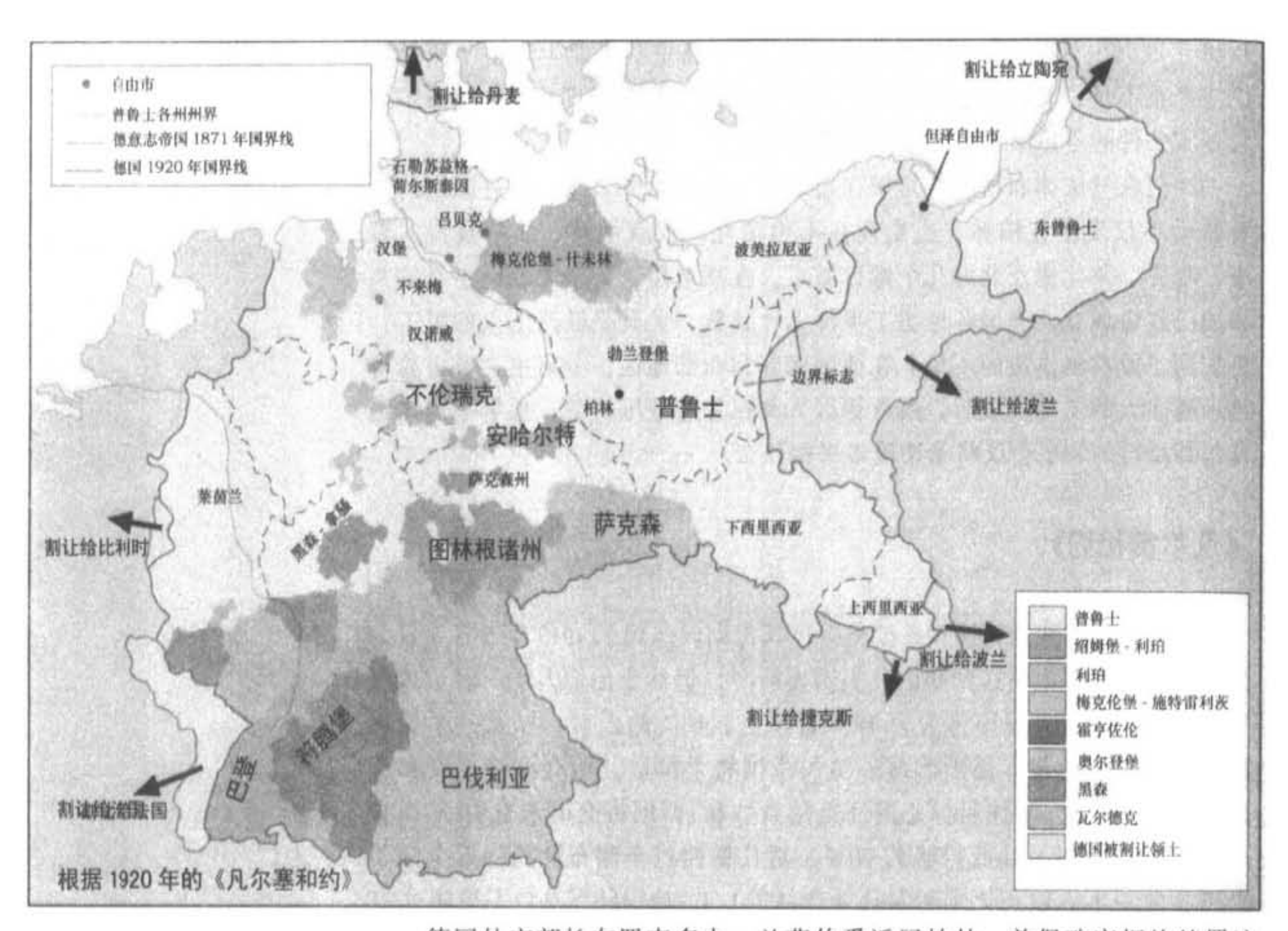
如何恢复法律和秩序，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当务之急。激进派别的武装暴动不仅发生在柏林，也出现在不伦瑞克、埃森纳赫、埃尔富特、哥塔、哈雷、莱比锡及北海几个港口城市。在慕尼黑，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全国各地罢工事件无计其数，尤其是铁路工人的罢工，233 更加剧了原材料供应的不足。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分离主义者正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最后，所有德国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想早一点知道凡尔赛举行的和平会议将给德国带来些什么。

《凡尔赛和约》

德国人当然知道，媾和条款将会极其苛刻。但到了1919年5月7日，当和约的最终文本被送到德国代表团面前时，仍然令他们大吃一惊。按照条约文本的规定，德国将失去14%的领土、10%的人口，以及一半铁矿和1/4的煤炭储量。德国的海外殖民帝国将予解散，所有海外投资和特许权利均予废止。更怵目惊心的还是赔款数额：德国将交出未来10年煤炭产量的60%，以及其商船队的90%、近代铁路机车和车辆的将近全部、奶制品的一半，以及化学和制药业产品的1/4。德国陆军总数不准超过10万人，海军不准超过1.5万人，其武装力量不得拥有坦克、飞机、潜艇或毒气。



法国总理克莱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坐在右排、蓄着海象胡子的是克莱蒙梭，他旁边眼睛斜看天花板的是劳合·乔治，乔治首相左边、托着下巴作沉思状的是威尔逊。三位政治家的严重分歧，击碎了人们对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梦想。



根据 1920 年的《凡尔塞和约》

德国外交部长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返回柏林，敦促政府拒绝签署这一条约。艾伯特总统赞同这一提议，并得到了三名德国民主党部长和三名社会民主党部长的支持——后三位部长分别是沙伊德曼、兰茨贝格和鲍威尔。以马蒂亚斯·埃尔施伯格为首的德国中央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诺斯科、施米特和达维德则主张，政府除了接受和约之外别无选择。最高统帅部制订了依托易北河进行防御及对波兰发动进攻的计划。根据“春季阳光[234]行动”计划，德军完全可以在一周时间里把华沙攻占下来。这时，德国东部诸州正在策划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方面保持德国公民资格，另一方面寻求实现被占领土的收复。普鲁士激进分子的这种奇特的幻想，竟能得到柏林政府的认同和好感。一时之间，人们热烈地谈论起普鲁士将怎样发挥作用，把德国从拿破仑式的扼制中解救出来。

针对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鲁登道夫的继任者格勒纳将军发出了决定性的声音。他对鲁普士民族主义不抱任何好感，坚决主张德国必须保持统一，才存在日后赢得它所失去的东西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势力这时开始赞成接受和约条款了，沙伊德曼因多次反对无效，遂辞去了总理职务。翌日，古斯塔夫·鲍威尔奉命组阁，在德国民主党有所保留的支持下，组成了新的少数派政府。1919 年 6 月 22 日，国民会议就和约文本进行辩论后表决，237 票赞成，138 票反对，另有 5票弃权。各个政党的议员

中，都有人投票赞成接受该和约。6月28日，德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所有政治倾向的人，都充满了苦涩和怨恨情绪。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德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并需付出巨额赔款，也有协约国充满道德家口吻的宣传造成的影响。德国人普遍觉得，协约国的种种布道是最厚颜无耻的伪善行为。条约规定德皇必须退位，并宣称将组织特别 [235] 军事法庭，以战争罪犯名义予以审判，尤其令德国人感到充满侮辱意味。《和约》第223段有关“违犯战争法规与惯例”的规定，也令德国人深为不满，而且条约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还极尽曲解之能事，以使表达方式更加难以容忍。所有德国人都仇恨这项条约，下定决心予以修正。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条约的规定还不够严厉，因而无法阻止修正主义者大行其道。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得出，在接受这项条约后德国将怎样生存下去，绝大多数人都对未来感到绝望。

在民族主义者、贵族和保守派圈子中，这种绝望情绪不久便转化为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政府的愤恨。最初，许多反动团体还把民主政权视作抵御布尔什维主义的最佳保障，准备予以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一政权的谴责越来越趋向暴力化。1919年11月18日，冯·兴登堡元帅来到国民议会为调查德国战败原因而成立的委员会，神情庄重地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过，“德国军队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句话绝对没有说错。此后，动摇分子也加入到了反民主阵营中来。由于兴登堡享有的崇高声望，人们从他的这番表白中分明感受到，德国的民主力量是卖国贼和罪犯。共和派缺乏像先前的俾斯麦或后世的阿登纳那样出类拔萃的领导人，无法使新的政治体制获得人民的认同。这些人充其量只是缺乏生气的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而共和国的支持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基于理性的共和派”（Venunftrepublikaner），就像古斯塔夫·施特莱泽曼那样，他们并不喜欢“革命”，但除了议会制以外又看不出有别的什么可行的政治体制。综上所述，共和国被许多人所痛恨，而它的支持者至多只是“宽容”它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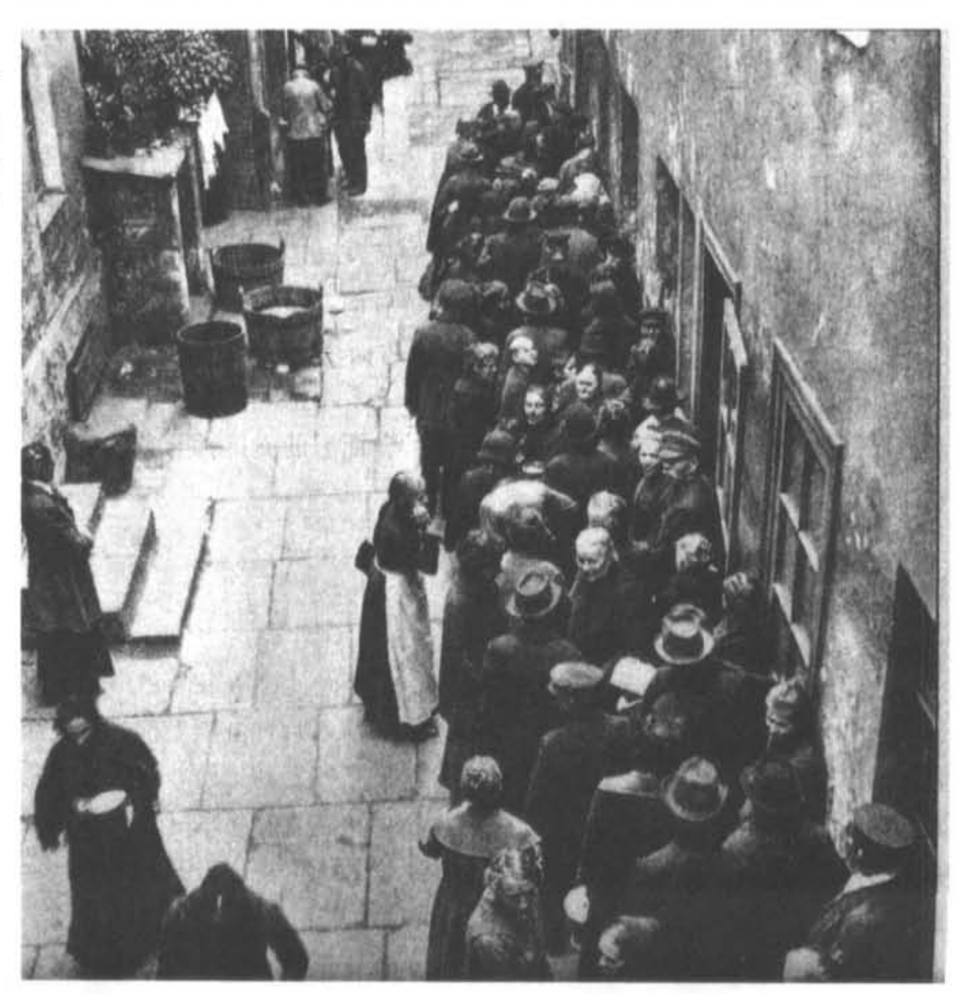
1920至1923年的危机岁月

1920年3月12日，国防部长诺斯科接到密报：德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部队指挥官冯·吕特维茨中将，以及赫尔曼·埃尔哈特海军上校的被宣布解散的、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第2水兵旅，将于当夜发动暴动。军队拒绝采取行动保卫政府。据称，事实上的参谋总长冯·塞克特将军（此人实际职务是作战局局长——译注）说过这样一句话：“国防军不打国防军！”政府 [236] 遂逃至德累斯顿，尔后又惊慌失措地逃往斯图加特。

吕特维茨占领了柏林，鲁登道夫出席了在首都举行的胜利游行。暴动

的政治领导人沃尔夫冈·卡普，事先并未从吕特维茨或埃尔哈特那里得知暴动计划，惊讶之际已被簇拥着赶到了总理府，但那里的工作人员拒绝听从他的号令。联邦政府及普鲁士邦各部门照常履行其职能，就像卡普根本不存在一样。国家银行也拒绝向卡普政府提供金融支持。有人提议派部队夺取银行，但当场便被否决了:毕竟，军官们还不是银行抢劫犯。纵便是在国防部效力的军官，也拒绝接受卡普或吕特维茨的命令。至于塞克特，这时则称病不出。各州境内的高级军官和绝大多数的反共和人士，很快便认识到，暴动是一次失败，卡普没有掌握到丝毫权力。3月14日，协约国宣布，如果卡普不偃旗息鼓，它们将对德国实施封锁。

围绕卡普与吕特维茨的这次暴动何以会失败，有一种说法影响甚广，传播至今，即：全面罢工挫败了暴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拯救了共和国。但事实上，对于这样一次仓促上阵的冒险行径，保守官僚们拒绝与之合作，这才是挽救了共和国的真正原因。3月13日，政府新闻官发布了总罢工呼吁书，假借了总统及社会民主党籍部长们的名义，但这些人并未批准采取该步骤。罢工行动确实在3月15日星期一开始了，但其造成严重影响的地方仅限于柏林市工人阶级为主要居民的城区。罢工很快便走向升级，组织者提出了革命的口号。这时，罢工与其说令沃尔夫冈·卡普忧心忡忡，



20世纪20年代初期，柏林一家施粥店门外排起的长长的队伍。战后的供应短缺和经济混乱，导致了大面积的营养不良和饥荒。

不如说更令古斯塔夫·鲍威尔为首的政府心惊肉跳。当罢工最后终于停止时，所有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卡普的冒险失败了，他于3月17日坐飞机去了瑞典，吕特维茨则逃向匈牙利。

激进左派现在发出了推翻政府的威胁。在鲁尔区，一支被称为“红色鲁尔军”的工人武装建立起来，成员约有5万人。此前一直不愿意与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工会主义者发生联系的共产党人，这时才给了这支武装迟到的支持。由于国防军已无力驾驭这种局 237 面，政府遂求助于此前曾支持卡普的“自由团”暴徒。双方的激战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共有3000人丧生。国防军领导层此前曾拒绝支持卡普，但现在应社会民主党人士的呼吁，投入了镇压罢工者的行动。但诺斯科试图使社会民主党和国防军建立同盟的努力仍宣告失败，他随即宣布辞职。

1920年6月的选举，对社会民主党及民主党人来说，是一次惨重的失败。魏玛联盟在国民议会中的议席，从占总数的66%锐减到43%。包括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激进左派，获得了20%。由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和德国人民党（DVP）构成的极右势力，获得28%。此后，年已老迈的中间派、中央党人士康斯坦丁·费伦巴赫组成了一个中右联合政府。从此，无条件拥护民主制的政党联盟再也未能夺取多数地位。不过在普鲁士，情况要远远较全德选举情况鼓舞人心。在那里，新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已经成立，其领导人奥托·布劳恩和卡尔·泽韦林都是精明强干的现实主义者，在卡普暴动期间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勇气。他们上台执政后，立即着手从政府和警察队伍中清洗了有不忠于宪法嫌疑的人员。一向特立独行的普鲁士，此番又成了共和理想的坚强堡垒。

1921年1月29日，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它们的赔款要求。德国官员曾经估计，德国将需要偿还30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但协约国在法国及比利时那些贪婪而渴望报复的选民的驱策下，提出的赔款数字高达2260亿金马克，另加德国出口额的12%。每年缴付的数额规定为，前两年每年20亿金马克，此后逐渐递增，最后31年每年缴付60亿金马克。

费伦巴赫政府拒绝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法国遂出兵占领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鲁尔奥特等城。费伦巴赫仍拒绝在赔款要求上签字，因而选择了辞职。美国人和英国人要求法国降低要价，最终与之达成协议，规定德国需缴纳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每年交纳6%的利息并逐年减少本金，合计每年需缴付20亿金马克。同时，德国出口总值的26%将被划入设立的一个赔款账户。如果德国人未能在一周时间内同意上述要求，协约国将占领鲁尔区，掌管该区一切产品。新任中间派总理约瑟夫·维尔特不得不予以接受。

政府认为，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如果增加税收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因而选择了向银行大举借债。这种做法导致政府债务额大增，对业已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更是火上浇油。由于协约国拒绝接受德国用已经贬值

的马克或类似货币缴付赔款，坚称德国必须使用黄金或硬通货，很快便用光了国家银行的储备。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和法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德国要想扩大其出口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银行不得不大量印刷钞票以购买外汇，导致通货膨胀失控。

1922年4月，德国和苏联均应邀参加在热那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以讨238论赔款和欧洲面临的其他经济问题。这两个均为外界轻侮对象的国家，同样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深恶痛绝，以此为纽带，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两国贸易联系相当密切，范围不断扩展。两年之前，德国在俄罗斯境内开办了坦克和飞行学校，两国军官共同在那里研究机动战法。1922年4月，两国在热那亚附近的拉帕洛温泉区缔结条约，彼此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不过，与苏联的上述联系还未构成协约国目中的重大外交事件，也不能算作《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欧洲秩序被打开了多大的缺口。事实上，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未能说服法国，使之松动削弱德国的立场，造成的后果要远比德苏接近更为严重。

1922年11月，维尔特政府倒台。这时的社会民主党，急于挽回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心，再也不敢与代表重工业利益的德国人民党结盟组成政府了。对未事先知会该党便与苏联签订《拉帕洛条约》，社会民主党也颇有微词。左派势力严厉抨击维尔特的经济政策，认为只是笨拙地按照国家银行开出的药方抓药。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的决裂，组建一个以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为首的广泛执政联盟的努力宣告失败。此后，威廉·古诺出面组建新一届少数派政府。古诺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但一点政治经验都没有。1923年1月9日，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不顾英国代表团的规劝，派遣5个师的法国部队和一支专家队伍进入鲁尔，打出的旗号是调查德国为何未能按期缴付赔款。

大多数德国人均把法国的此种行为视作侵略而同仇敌忾。政府呼吁国人罢工或曰“消极抵抗”。针对德国这一做法，法国在鲁尔区实施了军事管制。虽然工业界的罢工非常有效，能够导致洛林钢铁业因严重缺乏煤炭供应不得不停产，能够使法国经济走向严重危机，但德国政府仅靠报纸上的宣传文章，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消因鲁尔区被占领而付出的代价。到这一年的4月，通货膨胀如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在鲁尔区，一个名叫莱奥·施拉格特的法西斯主义恐怖分子，一时间却成了英雄。他掀起的游击战行动，得到了极端右翼分子和共产党人不约而同的颂扬。由于普鲁士政府对暴力活动采取坚决反对立场，迫使古诺与极端主义分子划清界线时，这位总理走向了垮台。8月13日，德国人民党创始人、主席古斯塔夫·施特莱泽曼出面组阁。在他组建的广泛联合的新一届政府中，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可谓首屈一指。

施特莱泽曼认识到，德国无力继续“为鲁尔区而斗争”，因此于9月26日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此一做法遭到右翼分子的刻骨仇恨，鲁登道

夫将他称作和平主义者、共济会会员和“比犹太人还犹太人”。左派也指责他背叛了祖国利益，加入了声讨施特莱泽曼的行列。后者为进行反击，威胁要取消他们得来不易的8小时工作制。社会民主党人遂撤回了对政府的支持，迫使施特莱泽曼内阁于10月3日向总统辞职。虽然3天之后，他又回到了总理府，在新一届政府中减少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数量，但这注定将是一届短命的内阁。

在得知共和国政府已停止了夺回鲁尔区的斗争后，巴伐利亚邦政府在 239 未与柏林当局进行协调的情况下，于9月26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宣布全德国进入紧急状态。两周之后，萨克森和图林根两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均任用了部分共产党籍的部长，坚称这样做是为了防范法西斯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危险，换言之，便是防范巴伐利亚的极端主义。巴伐利亚立即断绝了与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关系。在君主制度结束后，德意志帝国内部各邦之间互派使者的传统做法却延续了下来，巴伐利亚因而能够采取这个步骤，倒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由于国防部长格斯勒命令巴伐利亚当地驻军司令官冯·洛索夫将军查封纳粹党人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招致巴伐利亚政府对艾伯特总统及格斯勒的抨击，巴伐利亚危机愈发加深了。洛索夫拒绝接受这项命令，格斯勒便撤销了他的职务。然而，巴伐利亚邦长官冯·卡尔接着便任命洛索夫为巴伐利亚邦的国防军司令。到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这种严重背叛行为加以制止了，但因当时适值卡普暴动，国防军并未调动。

萨克森和图林根两邦的长官都在上任后不久，针对巴伐利亚邦的法西斯分子和国防军的军事独裁发表了煽动性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那里的共产党活动为国防军采取措施提供了一种借口。施特莱泽曼命令萨克森及图林根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赶出去，在遭到拒绝后，他强行解散了两邦的政府。巴伐利亚不是指责柏林当局对共产主义软弱吗?施特莱泽曼用这样的方式做出了回答。同时，这也等于堵住了冯·卡尔或阿道夫·希特勒等其他极端分子效仿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进军柏林掌握全国政权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人退出了联合政府，使施特莱泽曼在国会失去了多数地位。与此同时，冯·卡尔也不再能够指责德国被马克思主义者控制了。1923年11月8日，他在慕尼黑一家名叫比尔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出席一次集会，讨论当前局势。他的讲话突然被粗暴地打断了：阿道夫·希特勒宣布，“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他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成员包括冯·洛索夫、巴伐利亚警察局长塞瑟尔，以及鲁登道夫将军等。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出生，其父是奥地利海关职员，他在家中排行第四。他中学未毕业便离开了学校，来到维也纳，作为临时画工和非熟练工人，过着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参了军，



希特勒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发动了一场流产政变。卐字旗飘在市政厅大门上方，冲锋队员们乘坐汽车驶过门前。当警察部队朝冲锋队员开火射击后，这场短暂政变顿时宣告了终结。

在德国一个步兵团当上了下士，获得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1919年，他加入德国工人党（DAP）。这个团体由一群极其仇恨犹太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希望能在工人阶级中获得影响力。希特勒作为一名演说家的才能，使之能够为德国工人党的集会吸引大批听众。为了巩固这个党的组织，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920年，该党易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一年之后，希特勒成为该党主席。翻开这个党的纲领，240 充斥着反犹太主义、欺世盗名的经济理论、假社会主义主张。对希特勒的暴乱，施特莱泽曼采取了断然措施，授予冯·西克特全部权力，后者遂下令国防军镇压这一暴乱。洛索夫看出希特勒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胡吹一气，因此执行了西克特的命令。希特勒11月9日率领自己的追随者们，冒冒失失地从啤酒馆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军，遭到了警察队伍的阻拦，随后，他被逮捕了，并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正是利用这不长的一段入狱时间，他写下了《我的奋斗》。

这时，施特莱泽曼已控制了鲁尔区和巴伐利亚的局势，并使德国马克币值实现了稳定。然而，他对萨克森和图林根采取的措施，却令左翼力量十分不满。1923年10月23日，他被迫采取了罕见步骤：要求国会对自己进行一次信任投票。投票结果出来了：231票反对，151票支持，7票弃权。对此，艾伯特总统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说，在今后10年里，这个党将为自己投票反对施特莱泽曼的愚蠢行为吃尽苦头。后来的历史将证明，艾伯特不幸而言中了。

1924至1930年的践约岁月

施特莱泽曼被赶出了总理府，不过直到他于1929年去世前，仍一直在历届政府中作为外交部长占据一席之地。他知道，除非德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愿意履行《凡尔赛和约》中担负的义务，否则是无法予以修正的。他也知道，阿尔萨斯和洛林是注定无法收回了，但他希望能通过谈判从比利时收回欧本和马尔梅迪，并使萨尔区早日进行最终归属的公决。在东方，他决心使德国重新得到但泽及通向东普鲁士的走廊，以及尽可能多的 [241] 其他领土。尽管如此，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却无法理解他的务实做法对于德国未来复兴的意义，因此对施特莱泽曼大肆谴责。

1924年1月，以美国银行家查尔斯·G·道威斯为主席的一个英美两国委员会抵达柏林，调查和研究德国赔偿问题。由此出台的《道威斯计划》提议，德国应得到一笔价值8亿金马克的贷款以刺激经济，每年战争赔偿额应在从1924年的前5年里降到每年10亿马克，直至1928年，每年应付之数逐步增加，从1928年起每年支付25亿马克。为使德国履行赔偿问题得到保证，协约国将对德国国有铁路和国家银行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德国部分工业收入将作为抵押。虽然该计划仍使德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最终赔款总额仍悬而未决，但至少协约国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赔偿应依照德国的偿付能力来确定。1925年2月，施特莱泽曼采取了他的践约外交的第二个步骤，提议与法国和比利时签订安全条约。在随后的4个月时间里，对德国意图充满疑心的法国，一直未对这一提议做出答复，不过法德两国最终还是在洛迦诺举行会议，讨论施特莱泽曼的这一提议了。

双方的谈判是在轻松气氛下进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采取了灵活态度。经过磋商，德国、法国、比利时达成了不使用武力改变彼此边界的共识，德国也明确表示接受莱茵兰区的非军事化。英国和意大利对这项“莱茵兰协定”提供担保。德国保证，其与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任何边界问题，均将通过国际仲裁予以处理。法国还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分别签订条约，规定：如果它们遭到德国进攻，法国保证予以支援。

直到《洛迦诺公约》签订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才真正结束，由此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新纪元。由于这一成就的取得，施特莱泽曼、白里安和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当年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然而，还有一个大国置身于这一大合唱之外，那便是苏联。苏联认定，《洛迦诺公约》的矛头是指向它的：事实上，法国确实试图获得在其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从德国境内出兵东征的权利。这样，施特莱泽曼一方面与西方大国建立了新型诚挚关系，另一方面又同苏联签订了互惠条约，从而为德



德国民主党的一张宣传海报，上面的文字是："把票投给能让国家走向自由的人。"图上，一个德国爱国者肩扛着"德国"，踏着"卡普暴动"、"伦敦最后通牒"、"拉特瑙被谋杀"、"货币崩溃和鲁尔区被占领"、"赔偿计划"等台阶逐级攀援，而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纳粹分子则向他投掷石块。德国民主党据此把自己说成像德国历史上的先民一样，在努力战胜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之际，遭受着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极端分子的双重攻击。

国通过和平方式在东方修改边界创造了良好条件。1926年9月，在白里安发表一通令人惊奇的演说后，在一片缓和气氛中，德国正式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虽然《道威斯计划》已经出台，但德国要想按时偿付每年的赔偿金额，仍然是不可能的。由于发行的公债主要用在几个大城市特别是科隆市头上，这种局面更趋不稳定。为使德国能够应付公债压力，美国人提供了金额巨大的短期贷款。当时，又有谁会预见到全球经济不出几年便将陷入大萧条呢?为再次讨论德国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会议于1929年1至6月 242 召开，担任主席一职的是美国人欧文·D·扬格。会上，法国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均坚持，它们从美国的借款，应从德国的赔偿款项中冲抵。在一番激烈的拉锯之后，与会各方形成了"扬格计划"。该计划规定，在未来的59年里，德国每年还款额将从7.5亿金马克逐步递增至20亿金马克，此后随着债务的分期清偿再逐步减少。《道威斯计划》对德国经济主权的大多数限制条款均被撤销，法国和比利时两国还答应早日撤出莱茵兰区。显而易见，"扬格计划"是施特莱泽曼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1929年10月3日，他终于因为争取国人赞同他重振德国雄风的精巧入微的操作方式而操破了心，死于一次心脏病发作。

施特莱泽曼掌舵的这些年里，德国国内相对稳定，但还远远谈不上繁荣。中等阶级在1923年的经济恐慌中失去了自己的积蓄，公务人员的收入减少了，而且1/4的政府雇员因为1923至1924年的"节省开支计划"而失去了工作。到了1929年以后，这些心怀不满情绪的中等阶级，将成为纳粹主义争取支持的理想温床。相形之下，出口工业表现较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德国人的工资水平还很低。到了1926至1927年、1927至1928年之间的两个冬季，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然而，尽管德国遭遇了这些困难，20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仍然称得上是"黄金时代"。其原因大致表现在，欧洲处于和平状态，易滋生反叛情绪的年轻人这时不得不躬下身子以维持生计，旅行费用降低了，人们还普遍认为世界正走向一个新的、更加和平的时代。

所谓"黄金时代"，在文化领域倒显得名副其实。20年代的德国，是包豪斯建筑学派的时代，是达达主义这一虚无主义文艺流派的时代，是十二音音乐的时代，也是托马斯·曼、贝尔托特·布莱希特、赫尔曼·黑塞、埃里希·凯斯特纳、恩斯特·荣格、埃里希·玛里娜·拉马克等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世界各国戏剧界中，德国的成就大于任何其他国家。剧院和歌舞表演酒店上演的节目广泛涉及政治题材，极富探索性和实验性。不过，虽然"魏玛文化"一词频频被人使用，而且它在遭到党卫队的长统靴践踏后随着富有艺术才华的流亡者一道飘洋过海，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但这个词汇也许是一种历史的错位。事实上，魏玛共和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重要艺术形式，都深深根植于德意志帝国时期。

243

包豪斯艺术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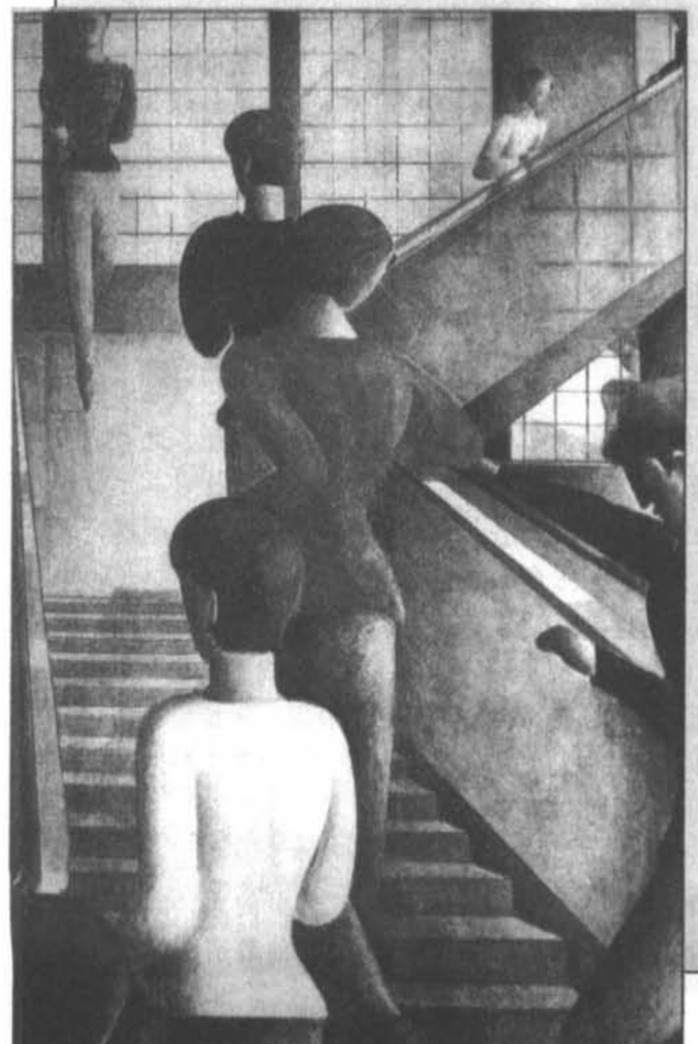
包豪斯艺术学校由图林根的社会党政府投资建造，1919年建成招生，董事会主席的是建筑学家瓦尔特·格罗皮厄斯。学校强调和重视手工艺，格罗皮厄斯甚至将之称作艺术家与工匠之间的“鲜明阶级分野”。虽然当地反动人士批评学校是信奉共产主义的犹太人的大本营，不过在学校早期，担任教职的主要是宣扬素食主义、东方宗教、公社式生活方式、和平主义、玄学等五花八门观点的落拓不羁之士。这些人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约翰内斯·伊滕的奥地利人，不过格罗皮厄斯并不欣赏他的神秘主义和对艺术与工艺的固步自封，于1923年撤销了他的校长职务，由拉斯洛·莫霍

伊-纳吉接任。格罗皮厄斯热心于艺术和技术运动，在发展包豪斯建筑流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豪斯建筑流派最初有哪些特征，如今人们已知焉不详。格罗皮厄斯爱到了勒科布歇尔和范杜斯堡，以及《新大众》等杂志的审美情趣的深刻影响。1923年，包豪斯艺术学校举行作品展，提出的口号是“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米尔斯·范德罗赫展出了一幢玻璃建筑的摩天大楼的模型，默塞尔·布罗伊尔则展出了至今仍被奉为近代设计艺术经典作品的几把椅子。

新上台的右翼政府于1925年关闭了包豪斯艺术学校，格罗皮厄斯旋即在德绍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德绍市长认为，接纳格罗皮厄斯将使该市在文化地图上占据一席之地。在那里，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理念占据了上风，而康定斯基、克利等不那么醉心于利用机械工艺的人则选择了离开。莫霍伊-纳吉宣布，既然摄影术的发明便意味着绘画的终结，包豪斯艺术学校已经只是一所技术学校了，因此他除了辞职已别无选择。格罗皮厄斯也于1928年辞去了职务，后来作为建筑学家和阿德勒汽车的设计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接替执掌学校的迈尔宣称，“建筑只是结构，”把戏剧从课程表中删除了。从此，学校的重心落在了设计而不是艺术上。

1932年，德绍市政委员会关闭了包豪斯艺术学校。在决定学校生死命运的表决中，社会民主党成员投了弃权票。米尔斯·范德罗赫把学校迁至柏林一家废弃工厂继续办下去，但纳粹分子于1933年4月再次关闭了学校。





左图：奥斯卡·施莱默（1888—1942年）于1932年绘制的《包豪斯的楼梯》。

右图：1925年建立的国立包豪斯中学。设计师是瓦尔特·格罗皮厄斯（1883—1969年）。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生活是属于精英阶层的，却又宣称已经波及到芸芸众生；它带有浓郁的资产阶级艺术特征，却又受到了波希米亚式的落拓不羁作风影响，对资产阶级的颓废与狭隘予以鄙视。知识分子们宣称，资产阶级价值观已被掩埋在佛兰德的泥泞之中，但究竟能有什么东西来代替它的位置，却又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在这样一种道德真空中，如果出现一个阿道夫·希特勒或约瑟夫·斯大林那样的人，虽然带有残酷的宿命论色彩，但至少在安全领域似乎倒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情绪、感受、内心活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言传的个人的意识的“主观性”，才是真理的可靠的见证，对青年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国家社会主义也藉此在文化角度具有了某种亲和力。另一方面，托马斯·曼、恩斯特·特勒尔奇，以及极富影响力的马克斯·韦伯等人，则高举理性思考传统的大旗，反击愈演愈烈的同时来自左、右两个阵营的非理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潮流。这些人可以被归类为“基于理性的共和派”：他们之所以支持共和制，是因为舍此看不出还有别的可行方案来解决德国面临的诸问题，亦即“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认识当然显得消极，因而招来库特·图霍尔斯基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等当时颇富盛名的讽刺家们的挖苦，也就不足为怪了。

244 艾伯特总统所支持的共和国，是讽刺作家们所不喜欢的，因而遭到了他们辛辣的口诛笔伐。在坚持任用中间派政府的过程中，艾伯特展现了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并对自己所在的党拒绝做出必要的妥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国人对他的名誉和爱国主义的攻击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终于耗尽了他的精力。像施特莱泽曼一样，艾伯特总统于 1925 年 2 月逝世时，也是适值壮年。在此之前，他在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打了 173 场名誉权官司。当时，甚至他自己所在的党，也在考虑是否要把这位总统开除出去。

在总统选举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能在第一轮获得当选所需的绝对多数。左翼遂答应支持中央党候选人、前任总理威廉·马克斯。此君是一个缺乏色彩但颇具行政管理才能的官僚。右翼则鼓动兴登堡陆军元帅参选。兴登堡的声誉这时仍如日中天，国人从他身上，往往会联想到那充满光辉和英雄主义的历史。这位元帅本无意于投身政治，因而用了很长时间左右权衡才最终答应投入角逐。选举结果出来了，他以微弱多数获胜，究其原因，居然是中间派的巴伐利亚人民党支持了他而非威廉·马克斯。共产党人上演的一出闹剧，更是击破了共和派获胜的最后一丝希望：该党推出了恩斯特·台尔曼参选，并获得了 6.3% 的选票——如果这些选票投给马克斯的话，本来可以使他获胜的。

兴登堡虽然已经老迈，不过仍尽全力为共和国服务，从未有过突破宪法限制的做法。他的身边，是一些立场和志趣颇堪怀疑的人，有贵族地主、民族主义军官，也有反对共和制的激进分子，而他最亲密的三位顾

问，一个是自己的儿子奥斯卡，此人爱好权术，也有一定的才能；一个是奥托·梅斯纳，此人是一个投机分子，担任职务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第三个是库特·冯·施莱彻尔上校，是深得国防部信任的一个天生的权术家。到了1930年以后，随着兴登堡总统年事渐高，治国能力逐年下降，这几个人的影响和权力将大幅度提高。



德国民主党1928年5月制作的一张竞选海报。上面的口号是："女人们想一想！房租提价，失业增多，住房不足，海关税，通货膨胀，税率上升！再也不要右翼政府，把票投给德国民主党候选人！"该党把普通民众的生活困难，归咎于连续几届右翼政府的政策。

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令民族主义者遭遇了一次严重挫折，社会民主党则获得了近1/3的议席。纳粹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数从14席减至12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选举是魏玛联盟最后一次机会了。新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缪勒，是德国政治生活中那种典型的不事张扬却又效率很高的官僚。由于他曾充任过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的签字人，一直遭到右翼分子的挖苦，甚至被讥称为"凡尔赛缪勒"。

不过，缪勒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政党。1927年，按照《凡尔赛和约》所允许的那样，德国一艘新的战列巡洋舰已开工建造。共产党人在选举期间，针对这一决定大加抨击，社会民主党人也主张，应该把钱用于为饥饿的孩子提供住房和食物，而不是毫无用处的海军舰船上。缪勒深知，如果要把联合政府维持下去，政府必须建造这艘巡洋舰，但社会民主党则一致反对这项计划。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竟投票反对由本党总理领导的政府，实在是一桩令观察家们迷惑不解的事。虽然政府在右翼的支持下，赢得了这场争论，也维持了联合政府的继续存在，但议会民主制却遭到了一次重创。中间派的德国人民党提出了得到更多部长席位的新要求，但遭到了拒绝，遂退出了联合政府。施特莱斯曼这时病情已相当严重，又因为"扬格计划"的有关谈判忙得不可开交，却也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说服德国人民党重新考虑退出联合政府的决定。

通过社会民主党籍的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进行的高明的调解，鲁尔区的罢工活动已经结束，但雇主和劳动者双方不满情绪并未得到平息。失业率不断上升，外国投资额则不断萎缩。德国马克遭到严重打压，只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出面帮助和干预，才免于崩溃。1929年5月1日，共产党人在柏林发动暴动，导致11人丧生。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的激进农民，发起"农村运动"，在德国北部地区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激进分子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谴责共和国制度，政治暴力日趋激烈。

在局势日益走向混乱之际，右翼势力发动了一场反对"扬格计划"的运动，但在公民投票中，只有14%的人对这一行动表示支持。然而，这对于纳粹分子来说，已足以称得上一次胜利了，因为从现在开始，他们已经能够被人们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等量齐观，视作值得尊重的右翼人士而非极端主义者了。在报业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这时的态度则越来越激进，对议会制民主的抨击越来越直白，导致一系列立场较为缓和的保守派党员辞去了党内职务。另一方面，尽管该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它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这时还没有人能

说得清楚。

对德国政治而言，另一个更加严重的事态发展是中央党的右倾化。新任党首路德维希·卡斯主教，对社会民主党厌恶有加，试图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求得某种一致。而离开了中央党的支持，魏玛联盟的终结也就指日可待了。同时，接替施特莱泽曼担任德国人民党领袖的恩斯特·舒尔兹，也是一位顽固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决心结束本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反过来，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也在抱怨本党由于参加魏玛联盟，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是一种可耻的妥协。这些人要求党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保持党的纯洁性。

综上所述，魏玛联盟便演变成各种各样相互攻击和争吵的意识形态的悲惨联合，已然回天无术。联盟中的诸党派，无一对议会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保持充分认识，也没有什么人意识到极端主义构成了多么可怕的威胁。不过归根结底，造成这一联盟崩溃的，还是社会民主党犯下的过错。从1929年1月起的一年时间里，德国财政赤字达到15亿马克之巨，失业人数不胜数从180万上升到280万。有鉴于此，德国人民党提议降低失业补贴。然而，社会民主党反而要求把雇主的保险费从3.5%提高到4%，而且最终确实做出了分阶段提高保险费征收率的决策，而左翼和工会组织在接受这种妥协时心里还颇为不满！1930年3月，病情严重的缪勒被迫辞去了总理职务，不久便去世了。

魏玛共和国的崩溃

[246] 议会民主制陷入了如此严重的窘境后，如果还有人要责怪兴登堡不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多数联盟政府的话，也许并没有足够的理由。他听取了冯·施莱彻尔的建议，召见了中央党议会领袖海因里希·勃鲁宁，让他组建新一届政府。众所周知，施莱彻尔将军希望的是一个独立的、反议会制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府。

迎接勃鲁宁政府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联合抛出的不信任案。只是由于得到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支持，新总理这才涉险过关。勃鲁宁警告说，如果国会多数派企图剥夺他的合法权力，他将被迫采取“非常手段”。显然，这是指根据宪法第48条之规定，由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行使特别权力。面对不断下降的物价，他提议增加税收、降低收益，但因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以及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内部的胡根贝格集团的联合阻挠而未果。兴登堡遂使用紧急状态权力，使这些措施得以推行，社会民主党则针对宪法第48条的运用有效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解散了国会。到这个时候，终于不再有一个能对运用48条规定之权力进行投票否决的国会了。

1930年9月，国会选举工作在暴力和混乱局面下上演了。社会民主党

三分钱歌剧

1928年，恩斯特－约瑟夫·奥夫里希特在柏林的希福鲍尔达姆街的剧场接掌了总监一职后，四方寻找一部用来拉开新的演出季节帷幕的剧作。马克思主义者、剧作家、诗人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建议他使用约翰·盖伊的《乞丐剧》，奥夫里希特深以为然。为配合把该剧搬上舞台，布莱希特着手创作了一些唱词，并由库特·魏尔为之配曲。担任场景设计的是卡斯帕·内尔，导演则由恩斯特·恩格尔担当。该剧的上演，产生出了在两次大战期间风靡全德国的 Die Dreigroschenoper，即"三分钱歌剧"。

《乞丐剧》的成功，不仅应该归功于魏尔的天才配曲（包括"刀子马赫"等杰出作品），归功于布莱希特创作出来的充满智慧的、脍炙人口的唱词，也与当时的观众容易被音乐家所要传达的信息所感染有关。无论是左翼、中间派还是右翼人士，对于剧中把政客与歹徒等量齐观的比喻，都不难予以接受。这时的布莱希特，虽然还不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但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摧毁魏玛共和国的事业中去。不幸的是，人们从剧作中只顾欣赏了机智的幽默和充满反讽意味的双关语了，对政治倾向却未予以充分重视。而布莱希特后来的大多数作品中，也再也不见了这些优点。

虽然布莱希特借用了约翰·盖伊的剧作，而且使用了弗朗西斯·维龙、鲁德亚德·吉普林等人的艺术手法，但搬上舞台的这部戏剧，基本上仍然可以算作他的原创作品。该剧讲述的是一位名叫马赫希斯的匪徒（"刀子马赫"），爱上了波莉·皮查姆，并与她结了婚。新娘的父亲是伦敦乞丐们的组织者，为这些人提供衣服。他的口头禅是，"我的任务就是要唤起人们的怜悯心理"。皮查姆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个好姑娘，像马赫希斯这样一个恶棍根本配不上她，竟然敢打女儿的主意，理应上绞刑架才对。于是，皮查姆太太与妓院老板杰尼达成了一笔交易，由后者向警察局告发了自己那位不成气的女婿。马赫希斯虽然成功地逃了出去，但实在抵挡不住妓院的诱惑，又一次光临那里，再次被杰尼举报。这一次，因为他没有钱贿赂看守，终于踏上了不归路。然而，就在临刑前最后一刻，因为这一天恰好是国王的加冕日，王室对全国犯人进行大赦，马赫希斯不仅活了下来，还被赐予了爵位，得到了一座城堡和一笔相当可观的年俸。

布莱希特希望通过这部《乞丐剧》，向观众提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邪恶和伪善，但使用的艺术手法充满了轻松的喜剧风格，因而令"三分钱歌剧"并未实现它的本意。资产阶级人士舒适地坐在观众席中，照样会对剧情兴致盎然。"先要上些点心，然后再谈道德，"马赫希斯的唱词，激起观众的掌声，并不因为阶级差别而存在多少不同。布莱希特对自己的作品未取得预期效果深感失望，于是把故事推倒重来，重新进行了创作，但到这部剧作被搬上银幕时，使用的却不是他的新作。魏尔于1933年移居美国，此后创作了大量杰出的音乐，并创作了通俗音乐剧中的一部辉煌作品——《九月之歌》。而布莱希特的合作伙伴改由汉斯·艾斯勒充任。此君与天才的作曲家魏尔的最大区别恰恰在于，他缺乏灵气和幽默感，只是一位正统的共产主义者。



1956年在英国皇家剧院上演的一出"三分钱歌剧"的剧照。

对紧急状态权力的滥用表达了不满，而参加政府的各个政党则把现实中的种种苦难归咎于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的大肆挥霍。大多数竞选者都是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官僚，但对举足无措的选民来说，却只有激进分子能够调动起他们的情绪。共产党人对《凡尔赛和约》和“扬格计划”的帝国主义性质，对税收系统的不公正，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进行了猛烈抨击。纳粹党人针对各个政党的声名狼藉，宣称自己将抛弃自私自利和相互倾轧做法，承诺为选民创造一个没有阶级差别、实现民族团结的新局面。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为国家提供领导力量，而阿道夫·希特勒恰恰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在他的主持下，国家社会主义党发起了声势壮观的竞选攻势。

选举结果出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大赢家，甚至连希特勒都感到难以置信。该党获得了所有选票的18.3%，其在国会中的议席从12席一举飙升到107席。中央党基本维持了自己的支持率，而支持勃鲁宁的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则损失惨重。这样，反民主的纳粹党人、共产党人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加在一起，在总共577个议席中占据了255席。因此，勃鲁宁如果有任何修改宪法，以恢复君主制或通过紧急状态法案的企图，都不可能获得所需要的2/3多数，从而注定会归于失败。不过，反民主政党所获议席尚未过半，因而魏玛共和国的丧钟还未敲响。

纳粹党人的巨大成功，在德国国内外都引起了严重不安。人们担心，德国正在走向一场内战。奥托·布劳恩在对美联社记者谈话时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由有远见的团体构成的大联盟”，便代表了很多人的共同看法。布劳恩经过努力，说服了自己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必须支持勃鲁宁、接受宪法48条的运用，否则只能是面对以下两种后果之一，要么是总统宣布进行新的选举，而纳粹党人十有八九会取得进一步的斩获，要么是组建新一届政府，把极右政党吸收进去。

[248] 勃鲁宁相信可以通过怀柔政策感化纳粹分子，觉得只要给他们几个普鲁士邦甚至德国的部长闲职，便可以使他们成为值得尊敬的、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放弃刺耳的宣传和无休无止的打打杀杀。然而，当他以总理的身份于1930年10月与希特勒见面后，商谈却毫无成效。会谈期间，希特勒用一连串纳粹党的主张对勃鲁宁教训了一通，给后者留下的印象是，今后再想进行什么谈判已经不再存在可能性了。等到新一届国会开始运作后，他的这种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纳粹党徒涌进了柏林，打碎犹太人商店的玻璃窗，而纳粹党籍的议员则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要求对银行业实行国有化，要求剥夺金融资本家和犹太人的财产。在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下，纳粹党人和其他右翼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对勃鲁宁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但这些动议均归于失败，勃鲁宁要求被授予紧急权力的提案被送到了大会。

勃鲁宁希望通过货币贬值的猛药来大力刺激出口，从而积累一笔用于战争赔款之需的外汇储备，并增加工业就业人口。他还希望能够打动协约

国，使它们相信在当前困难局面下，它们对德国的赔款要求是不合理的，应该予以撤销。诚如此，德国将可以解除赔款重负，激进右翼分子在群众中的吸引力便会大打折扣。不过，这个问题存在着两大障碍：其一，要想让协约国相信德国的诚意，勃鲁宁必须下大力气履行“扬格计划”中的义务，而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使他沦为右翼分子抨击的理想靶子；其二，经济危机的烈度，是任何人此前都无法预料到的。到1930年底，德国失业人口已突破500万大关，失业率在世界各国中居于榜首，而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公共部门的薪水已调低了23%，失业补贴和福利已基本被取消，税收则大幅度增加。勃鲁宁希望通过采取这些严厉措施，使协约国相信，德国已到了极限，绝对没有能力再履行战争赔款责任了。



保罗·路德维希·冯·兴登堡（1847—1934年）。1914年率领德军包围俄军，取得坦嫩贝格会战的胜利而一举闻名。1916至1918年，担任德军参谋总长。1925年，成为右翼势力的总统候选人。1925—1934年间，他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统，期间于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勃鲁宁提议与奥地利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但被法国人指斥为违反条约之举，由此遭受了一次严重挫折。法国人从奥地利撤出了资金，致使该国一家主要银行于1931年5月被迫破产。又过了一个月，美国总统胡佛提议允许德国延期支付赔款，但对于挽救德国经济而言，这一提议来的太晚了。7月，在位居规模最大银行之列的一家银行破产后，所有银行均关门大吉，被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此后，为讨论德国赔款问题，各国于1932年1月在洛桑召开会议。但在会议召开之前，勃鲁宁却愚不可及地泄露了他准备结束一切赔偿的意图。法国大使安德烈·弗郎西斯－庞塞对此怒不可遏，遂打定主意不允许德国人脱离这间牢笼。不过，就像在日内瓦进行的裁军谈判成效不错一样，这时的勃鲁宁，仍然很有希望通过谈判使赔款问题划上句号。

在德国国内，殃及社会各阶层的苦难和无助感，由于勃鲁宁政府施行 249 的严厉政策更趋恶化。可以说，德国这时已濒临内战的边缘。本来，共和国的自由已经所剩不多了，而激进右翼更决心给予它致命的最后一击。1931年10月，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分子在巴德哈尔兹堡举行大规模的显示实力的游行，穿着制服的纳粹人士与右翼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俾斯麦青年团和各种各样的老将军们，肩并肩地行进在大街上，而希特勒身边则簇拥着一些著名的军人、工业家、商人，其中包括西克特、吕特维茨和胡根贝格。不过，他也明确表示，他不会听凭任何人的左右。社会民主党人针对这种局面，创建了“钢铁阵线”，试图藉此表明共和国雄风犹在，不过这个准军事化组织并没有真正实力。就在巴德哈尔兹堡大游行之后，兴登堡第一次与希特勒见了面，不过后者并未给他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其肖像多次出现在邮票上的兴登堡总统似乎很富智慧地宣称，他可以任命希特勒担任邮政部长，以便让他安分守己。

兴登堡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选票均来自中间派和左派，可以说已为右翼力量所摒弃。希特勒进入了第二轮，并在此轮获得了36.8%的选票。兴登堡对勃鲁宁为之竞选付出的努力毫不领情，而他的幕僚们也建议他放弃这位过于依赖社会民主党人的总理。这时，作为魏玛联





左图：乔治·格罗兹（1893—1959年）创作的画作《放荡》，描绘了柏林一家夜总会的情景。格罗兹以简明的绘画手法，表达了对魏玛共和国道德沦丧的不齿。

右图：奥托·迪克斯（1891—1969年）于1920年创作的《战争时期伤残人玩纸牌》。这幅作品可以称作魏玛共和国时期追求政治上正确画风的一个典型。

盟最后一片领地的、由奥托·布劳恩领导的普鲁士政府，下定决心把纳粹党人压制下去，遂请求勃鲁宁禁止纳粹党的准军事化组织。但只是在布劳恩威胁要在普鲁士境内禁止这些组织的旗帜后，勃鲁宁及其内政部长格罗纳将军才于1932年4月颇不情愿地答应了。这样，勃鲁宁似乎已经成为奥托·布劳恩的掌上之物。

为了帮助那些面临财政难题的东部地主，国家实行了一项旨在降低这些地主贷款利率的“东部援助”计划。当勃鲁宁决定终止这项计划的执行时，兴登堡及其顾问施莱彻尔、梅斯纳觉得可以把这位总理赶走了。当然，那一旨在帮助容克地主的计划是从政治利益角度推出的，在经济上费用甚巨，这时已不再具有合理性。按照勃鲁宁政府的思路，只有那些日后可以获得利润的农庄才应予以资助，而资不抵债、脱困无望者应被分割成若干块小片土地，提供给那里的农民。但对于兴登堡庇护下的容克地主来说，这样做无异于“共产制的布尔什维主义”，是对普鲁士生活方式的直接攻击。因此，他们极力要求总统解除勃鲁宁的职务。另一方面，勃鲁宁则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普鲁士的选举中，奥托·布劳恩的社会民主党人遭到失败，因而在德国的这个最大的邦，魏玛联盟各政党的议席仅仅只比国家社会主义者多了一个。奥托·布劳恩宣布辞职，但仍然维持着一个看守政府。这时，兴登堡解除了勃鲁宁的职务，于1932年6月1日任命弗朗士·冯·巴本接任总理。

巴本此先是中央党的一位不知名的普通议员，这时组成了一个右翼联合政府，并把纳粹党人也吸纳进来。在普鲁士邦议会任职期间，他一向对社会民主党持反对态度。虽然他才智平平，但一向不缺乏热情，而他曾与奥斯卡·冯·兴登堡在一个团服役的经历，更是令他受用良多，很快便被兴登堡总统视为自己人了。巴本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出身于贵族地主。他宣布，将依照如今人们已知焉不详的奥斯马·斯帕恩和埃德加·J·荣格的理念，建设一个“新国家”。在那里，“真实财产”将取代阶级，“机

250

制内的领导”将取代民主。社会福利将大幅度予以压缩，基督教精神将使德国拥有与“文化上的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抗击外来敌人的力量，而“民族的”力量将发展壮大。对于拥护魏玛共和制的各政党来说，巴本被任命为总理的方式及其含糊不清的政治纲领，都是不能予以容忍的。中央党这时甚至把他看作比希特勒还要坏的人，但在拟议将其开除出党之前，巴本已知趣地声明退出了该党。在纷纷扰扰、近于内战的混乱局面下，新的选举又上演了。

巴本在创建其“新国家”方面，犯下的第一个致使错误是颠覆了普鲁士政府。当时，有谣言说奥托·布劳恩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与共产党人结盟，共同对付国家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巴本以汉堡发生的暴力事件为借口，向普鲁士派出了一位中央全权代表，取代了那里的合法政府，并于7月20日宣布柏林和勃兰登堡进入紧急状态。

普鲁士邦的终结，是巴本采取的非法措施，不啻于通过政变手法摧毁了德意志民主的最后一个堡垒。然而，拥护共和制的诸政党却袖手旁观，一言未发。劳工组织担心不会有几个人予以响应，所以也不敢号召大罢工。等到选举真正开始时，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普鲁士邦政府被非法篡夺之事，而纳粹党人在选举中又一次成了大赢家：他们获得了230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得票居于次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获得133个议席，德国共产党引人注目地获得了89席，中央党及其巴伐利亚分支共获得97席。反民主派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而对巴本和施莱彻尔来说则成为一大 251 灾难。纳粹党人如今已羽翼丰满，再也不会听从居于巴本政府后台的贵族地主、工业家和银行家的旨意了。巴本主动提出可以给希特勒两个部长席位，但后者对兴登堡说，除了总理职位之外，他什么都不会接受。巴本无法与新一届国会共事，遂请求兴登堡签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但步子稍稍晚了一点：国会被解散前，已经通过了对巴本的不信任案，而且赞成票与反对票之比竟然是512对42，在德国历史上创下了历届总理获不信任票最多的记录。

政治暴力和罢工越来越多，波及全国各地。在选举后的两周时间里，共有50人丧生。在柏林，运输工人于1932年11月发动罢工，纳粹党人、共产党人和大学生们居然能紧密合作。在混乱状态下进行的新的选



马克斯·贝克曼（1884—1950年）于1936年创作的《女子酒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画作，大多数都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倾向于通过直描手法，揭露反动、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道德沦丧。贝克曼能够深刻洞察时代弊端，并坚持用讽刺手法加以揭露，使其作品可以超越那个时代的具体生活，流传至今。

举，使国家社会主义党减少了200万张选票，从而遭受了一次挫折，而共产党则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选票。到这个时候,似乎巴本又有机会继续推行他的“新国家”计划了，然而兴登堡忠于他对宪法立下的誓言，拒绝考虑废除议会制政体。总统要求巴本与各个政党进行协商，但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均表示了拒绝。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及巴伐利亚人民党虽然支持这位总理，但它们在国会中的议席加在一起也只有13.4%。巴本遂被迫辞职，不过仍作为看守政府的首脑留在台上，幻想兴登堡也许会回心转意。

兴登堡与诸政党进行谈判，试图能够组建一个多数政府。他对希特勒说，如果他能在国会中形成多数，可以任命他为总理。然而，希特勒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右翼势力及其支持者还想让巴本担任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希望能够效仿此前的勃鲁宁和巴本，通过总统宣布紧急状态进行治理，但兴登堡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一党独裁，因此表示了拒绝。由于谁也无法在国会中建立有效多数，巴本踌躇满志地觉得，兴登堡还会重新任命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施莱彻尔收到了国防军的一份调查材料，内称：德[252]国正在滑向一场内战，军队和警察将难以控制。兴登堡对此非常震惊，找来巴本，告诉他：非常抱歉，他已决定任命施莱彻尔接任总理一职。12月初，地方选举工作得以进行，纳粹党人遭受惨败。在图林根，他们的选票比夏天少了40%。从经济上看，情况已有所好转，很多评论人士均认为，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在到达了其巅峰之后，现在开始要走下坡路了。

新任总理曾有过作为反动将军和无原则性的机会主义者的历史，但究其本质，施莱彻尔更符合一位幻想家甚至空想家的特征。他相信，找到一条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可行的，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普鲁士的保守主义者可以与负责任的工人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贪婪成性的资本家和极端冒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种甚显混乱的政治思想，与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负责组织工作的格利戈尔·施特拉瑟倒颇为投缘。后者这时仍是一位忠实的反资本主义者，认为希特勒如今与工业家和银行家过从甚密，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背叛。施莱彻尔希望通过任命施特拉瑟为副总理，使纳粹党产生分裂。12月8日至9日夜间，施特拉瑟为是否要对希特勒发起挑战而左右为难，而希特勒面对自己丧失对党的驾驭权的可能性，一度想要自杀。但到了最后，施特拉瑟放弃了，乘火车离开了柏林。希特勒立即从党内清除了施特拉瑟的权力根基。至此，纳粹党又恢复了统一。

而施莱彻尔仍然希望能把纳粹党内施特拉瑟派拉到自己一边，并与相对温和的劳工组织开展合作。为此，他提出了一项有关社会福利、社会立法和赤字财政的宏伟计划，旨在刺激经济活动。许多工会组织人士均对这项计划表示欢迎，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这时已经士气低迷，对时局也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他们惟一会做的，只是又一次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并劝解工会组织不要听从施莱彻尔的提议。奥托·布劳恩则意识到，真正的危险在于国家社会主义，可惜能看清这一点的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他向施莱彻尔提出，如果后者能够恢复普鲁士的原来面目、解散国会并把选举推迟到春天之后进行、把精力主要放在打击纳粹分子，他愿意支持现任总理。然而，施莱彻尔估计兴登堡不会同意解散国会，而且布劳恩在其自己的党内缺乏支持，更重要的是，他这时仍然幻想赢得施特拉瑟的合作，因而拒绝了布劳恩的提议。

就在施特拉瑟重新振作起来，而且兴登堡也已准备任命为他副总理的时候，希特勒对这位背叛自己的战友发动了猛烈而残酷的反击。孤立无援的施特拉瑟，从此退出了政治生活，当上了药剂师。看到施莱彻尔也无法组建一个多数政府，巴本觉得报仇的机会又来了。工业家和银行家这时仍然支持巴本，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欢迎巴本的通货膨胀政策，另一方面是对施莱彻尔高度警惕，认为他是一位穿着军装的社会主义者。巴本主张，[253] 如果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政府或许可以在国会形成有效多数，而更为温和的保守力量也可以对希特勒予以控制和操纵。1933 年 1 月 4 日，巴本与希特勒讨论了上述计划，后者答应可以让巴本出任副总理，并使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新政府中占据若干个部长席位。

至此，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道路上，只剩下一个障碍了，那便是兴登堡不喜欢这个“波希米亚下士”。之所以总统会改变既定方针，是因为贵族地主们也呼吁让希特勒取代施莱彻尔了，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后者抱怨其滥用“东部援助”计划极为不满。此外，驻东普鲁士军队首脑冯·布洛姆贝格将军及其参谋长冯·赖谢瑙上校也向兴登堡举荐希特勒为总理，宣称军队将会欢迎这一举措。总统错误地以为，布洛姆贝格是在代表整个陆军说这番话，殊不知布洛姆贝格和冯·赖谢瑙只不过是仅有的两位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高级军官。当希特勒答应让巴本出任副总理兼普鲁士邦总理，由布洛姆贝格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兴登堡终于打消了最后一丝疑虑。在他看来，无论是他钟爱的普鲁士还是军队，都不会落入粗鄙而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手中。有关施莱彻尔及军方将领正在阴谋发动政变的传闻，更是令总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1933 年 1 月 30 日，他召见希特勒，授权他组建政府。

右翼势力对这项任命欢欣鼓舞。由于整个内阁中的纳粹党人只有希特勒本人和弗立克，而且作为内政部长的弗立克，还对普鲁士邦没有管辖权，巴本非常得意地对一位友人说，他们只不过是“雇用了”希特勒先生，用不了两个月，就可以把这个人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于左翼力量，则普遍怀有惆怅和绝望心理。一位旁观者倒非常清晰地看出了希特勒成为总理将带来的后果，虽然时人很难想到他便是鲁登道夫将军。在写给先前的上司冯·兴登堡的信中，鲁登道夫指出：“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您已经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祖国交给了历朝历代最大的煽动政治家之一的手中。我敢预言，这个恶棍将把我们的国家抛进深渊，使我们的民族遭受难以想像的痛楚。您将因为自己的这一行为而遭到未来子孙们的诅咒。”

第十一章　纳粹德国

[254] 一开始，希特勒很想以传统类型的政治家面目示人，与总理府和外交部门的原有官员密切配合。右派丝毫不怀疑希特勒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左派则坚持认为他只不过是工业家和地主的一个傀儡。人们普遍相信，此人被任命为总理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因此，上述两种看法都迅速传播开来。事实上，希特勒出任总理，标志着一个阶段的开端，即法西斯独裁政权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速建立起来。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虽然缺乏政府管理经验，一向是把议会机构当作宣传的平台而已，但他们拥有无政府主义的巨大能量和对权力贪得无厌的追求，除非运转有序的官僚体系和军事机器能予以遏制和控制，他的上台将把德国导向自我毁灭。然而，随着议会民主制在1930年的失败，希特勒面前已是坦途一片。

纳粹政权的建立

1933年2月1日，兴登堡总统接受了希特勒解散国会的要求。据此，希特勒得以在7个月的时间里根据总统法令实施统治，并利用政府拥有的一切力量开展竞选攻势。依据兴登堡2月4日签署后成为法律的《保护德意志族民法令》（此处的“族民”，德文原文是Volk，有“人民”、“民众”、“民族”的含义，在纳粹理论体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涵义，即指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马尔克公社时期的部族民集团——译注），政府拥有了几乎无限的权力，能够声称反对党正在“传播明显的谎言”或“危及国家根本利益”，使任何一个反对党派鸦雀无声。兴登堡还接受了巴本提出的解散普鲁士邦议会及一切地方政府的要求，这实质上构成了第二场政变。2月22日，戈林在普鲁士把纳粹党的准军事化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希特勒的私人卫队——作为辅助警察力量征用，以打击左派威胁。这一举措，也得到了巴本的批准。从这时起，戈林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普鲁士的官员和警察队伍进行清洗，用极端保守分子和纳粹党徒取代忠诚的共和派。

军队这时对纳粹党上台还持很大保留，但希特勒只需略施小计，便把他们争取到了自己一边。2月3日，他出席了一次为高级军官而备的晚宴，并向他们保证：军队将一如既往地独立于政治之外，他准备重振军备，实行全面兵役制，他的主要目标是铲除马克思主义。席间，许多军官都听到

了希特勒为了夺取“生存空间”，将对东方实施“激烈的德意志化”。

戈林和沙赫特发现，要说服以德意志工业联合会会长克虏伯为首的25位工业巨头，使他们为纳粹党竞选慷慨解囊，同样不费吹灰之力。工业巨头们欢呼议会民主制度的终结，认为要赢得与马克思主义工会的斗争，实现国家统一和强盛，舍此别无他途。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捐献出300万马克，代价应该算很低的了。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左翼和民主派的报刊 255



一位无名画家为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创作的画像。图中，希特勒着纳粹党制服。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希特勒，对艺术的理解却极其粗俗。画像中的他，摆出了一副伟人的标准造型。尽管在公开出现时他一向身着制服，但在所有私人场合，希特勒总是穿普通服装，特别是在他所钟爱的巴伐利亚度假胜地时。

被勒令暂停出版，直到上诉至最高法院后才得到解禁。冲锋队和党卫队小分队频频冲击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集会。为搜集犯罪证据，警察还搜查了共产党的一些办事处。共产党人被指控正密谋发动叛乱，但这缺乏明显的证据。到了2月27日晚9时，纳粹分子等候的机会终于降临了：国会大厦被人纵火，整个大楼很快便被火舌吞没了。9时27分，警察逮捕了一个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贝的荷兰泥瓦匠：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围绕纵火原因的辩论极为激烈。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能见诸天日了。到底是纳粹分子为获得所需要的借口而炮制了这一事件，还是马里努斯·范·德·卢贝一人所为?显而易见，指责共产党人策划了纵火案没有任何证据。火灾发生的当晚，戈林即下令逮捕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也不例外。党的办事机构和共产党旗下报刊均被查封，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在余下的两周竞选时间里也被关闭。在起火后的次日，兴登堡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总统法令，这项法令允许任意逮捕公民，暂时停止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条款。法令还授权帝国政府在必要时接受各邦的全部权力。这是建立纳粹独裁政权过程中迈出的关键的一个步骤。事实上，这项法令便是独裁统治的基本法，即使在其酿成恶果后仍长期发生效力，它昭示国人，是否符合宪法已没有任何意义。虽然设在莱比锡的最高法院裁决不存在共产党叛乱阴谋（1933年9月，最高法院在莱比锡开庭——译注），从而使总统法令失去了法律依据，但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选举在1933年3月5日举行，其结果对纳粹党人来说，也许会令他们失望。虽然动用了恐怖手段，虽然禁止左派政党进行竞选宣传，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纳粹党仅获得了43.9%的选票。不过，由于获得12.2%选票的共产党代表已全部被捕，纳粹党人已无需在国会寻找同盟者。因此，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很快被驱逐出了内阁。

权力的集中即国家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从选举的当天便开始了。据称，设在汉堡的参议院已无法保障法律与秩序，遂被迫停止运作，把宪法赋予它的权力移交给纳粹党人。此后，德国各个邦一个接一个地被置于柏林的直接控制之下，只有巴伐利亚对这些违宪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但是，海因里希·黑尔德博士虽然在一开始抵制了冲锋队的威胁，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纳粹党人冯·埃普将军担任该邦负责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国家专员。3月16日，黑尔德辞去了邦总理一职。

冯·埃普出掌巴伐利亚邦后，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也从此开始了他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执法”生涯。他先是担任了慕尼黑的警察局长，尔后又掌握了巴伐利亚的政治警察。这时，他那更有才干同时也更邪恶的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完全盖过了他的锋芒，所以希姆莱还只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人物。在希特勒刚刚上台的几个月里，恩斯特·罗姆及其冲锋队的暴徒殴打政治家，把反对派投入匆匆建起的监狱，肆意施以肉体折

磨，对全国人民进行恫吓，无所不用其极，所起到的作用要比希姆莱及其党卫队风光得多。冲锋队还成群结队地毁坏犹太人开的商店，偷走他们的机械设备，关押甚至杀害犹太人。在全国许多地方，冲锋队的头目都担任了警察局长，转而在合法的外衣下继续其清洗活动。

党卫队不甘示弱，也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了攻击，这自然会引起希特勒在工业和银行业的新盟友们的高度关注。一支党卫队人员冲进了法 257 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喝令董事会全体董事辞职。党卫队还频频攻击社会主义者开办的合作商店，并要求在银行和工业企业的董事会里占据一席之地。巴本对这些无法无天的行径大加抱怨，但希特勒不予理会。不过，希特勒也从中看出，纳粹党的"革命"需要制度化，以便把冲锋队的自发性的暴力纳入到有组织、有纪律的轨道上来。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监督下，第一所集中营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开办，便是这一思路付诸实施的第一步。

为了安抚那些被冲锋队的暴力和纳粹极端主义宣传所震惊的人们，希特勒精心安排3月21日举行一场民族复兴的盛大节日，即国会在波茨坦重新召开。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既是因为这一天是进入春季的第一天，同时也刚好是俾斯麦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国会的开幕式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举行，腓特烈大帝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兴登堡总统身穿陆军元帅军服，希特勒则是一身笔挺的正式礼服。这场精心安排的表演，收到了良好的反响。希特勒在兴登堡面前毕恭毕敬的样子，似乎足以使人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激情将受到普鲁士传统价值观的节制，冲锋队无法无天的行径也将受到久负盛名的普鲁士官僚体系的有效约束。

然而，国会之所以开幕，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把议会政治制度的最后几丝痕迹彻底消除。本来，内政部长弗立克起草的《授权法》（《授权法》的正式名称是《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内容是把立法权、批准与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均从国会移交至内阁——译注）需要2/3多数才能得到通过，但因为各个政党均认为此法案只是为了对付共产党，所以投票之后，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提案轻松获得了通过。这给人们的印象是，希特勒施行独裁统治的愿望，也是诸党派的广泛共识。那些敢于指出授权法案公然违反宪法的人，不久之后便被投入了监狱或遭到了流放。

《授权法》既已出台，政党的存在便成为多余了。虽然共产党从未被正式禁止其活动，但它其实已经被摧毁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虽然早就与社会民主党拉开了距离，试图与纳粹党人达成妥协，仍然于1933年5月2日被取缔。5月10日，戈林下令没收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资源；6月22日，该党被宣布为非法。尔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钢盔队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抨击，许多成员因为受到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指控而被逮捕。这一年的6月，兴登堡总统在伦敦举行的经济会议上，要求重新得到德国的殖民地和向东方扩张，在国际上酿成了莫大丑闻。时过境迁，希特勒要想摆脱他，已经容易得多了。至于民族人民党和钢盔队剩下的成员，都被吸收



冲锋队员在1933年4月1日的反犹攻势中在一家犹太人开设的商店外站岗。张贴的标语上写的是："日耳曼人保护自己！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

进了纳粹党和冲锋队。

3月28日，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在富尔达召开会议，宣称将忠于新政权。急于与德国新政权达成协定的梵蒂冈教廷，表示不赞成天主教干预政治。（代表罗马天主教的政治运动的）中央党遂遭到教廷遗弃，从此不再拥有多少能量，在表决中对授权法案投了赞成票。7月5日，该党别无他途，只得自行解散。3天之后，德国政府与罗马教廷签署了一项协定，天主教会从此保持沉默，不会成为潜在的反对势力的中心了。7月14日，政府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合法的政党。

258

新政权上台后的几周里，德国各地以冲锋队为主力军，掀起了一场极其严酷的反犹运动，不过，纳粹党组织的在全国范围内成系统地抵制犹太人店铺，发生在4月1日以后。人们对此的反应不一：有的人忧心忡忡，有的人对自己过去多年来一直予以庇护的犹太店主们充满同情，也有很多人对"日耳曼人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的警告置之不理。大体上看，普通民众对这场运动没有多大兴趣。1933年4月7日，《职业文官重建法》生效。这一法律规定，犹太人及反对派政党成员不得从事公共服务工作。在此后一年时间里，4000名律师、3000名医生、2000名公务员和数量相当之多的大学教授、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员，失去了赖以谋生的饭碗，而究

其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只有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军队服役的人，才得以通过兴登堡总统的私人干预而幸免。虽然德国的大多数犹太人组织均未能认清事态的严重程度，因此仍建议犹太人留在国内，但在“第三帝国”的第一个年头，移民国外的犹太人仍达到了约37000人。

5月10日，德国柏林和其他几个城市开展了 259 “针对非日耳曼思想倾向的行动”，大学城点起了篝火，海因里希·海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埃里克·玛利亚·雷马克、埃里克·凯斯特纳等著名作家和科学家的著作被付之一炬。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全面控制了电台，而在此之前，电台一直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所有。全国性和各邦的报纸均被置于严格的监控之下，大量报刊被关门大吉。

“一体化”进程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医生、律师、农场主们组织的行业协会，全部被置于纳粹党的控制之下，从此德国只剩下了国家社会主义养蜂协会、国家社会主义摩托车俱乐部了。纵使是乡下的撞柱戏（类似保龄球的一种体育游戏。用重10磅的木质或橡胶质地球撞击21英尺外布成菱形的9根椭圆形木柱，以最少次数击倒所有木柱者为胜——译注）球队，也要受到党的监督。至此，德国一向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俱乐部生活萎缩了，人们不管呆在家里还是到邻近的小酒馆去，都得小心地提防警察局告密者的身影。



1934年5月1日，希特勒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向群众大会发表讲话。据会议的组织者称，集会人数达200万。虽然希特勒口音很重、对德语的驾驭水平不高，但却是一位非常高明的演说家。每一次讲话，他都不厌其烦地精心准备，充分考虑到每一处的语速、神情、声调。即使是反对者也承认，希特勒拥有一种罕见的煽动群众的本领。

社会生活以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高速度变化着，局势的动荡开始令希特勒感到担忧了。7月6日，他告诫纳粹党的高级干部，革命已经结束了，下一步任务是巩固权力和地位。“党，”他说，“如今就是国家。”不久之前，群众运动和冲锋队激进分子为希特勒上台执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时至境迁，现在却对他的政府构成了威胁。恩斯特·罗姆担心，革命正在失去激情，“昏昏欲睡了”。1933年夏，他大声疾呼：“现在的确是应该结束民族革命，转而进行一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了。”他在另一次演讲时呼吁，对于军队、官僚机构和工业界的反动派，“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干掉”。罗姆认定，国防军必须得到清洗，虽然希特勒特意把国防军从“一体化”进程中豁免了。“国防军这块灰色礁石，将在冲锋队的褐色浪潮下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他的这些主张是希特勒无法容忍的：他需要国防军的专门人才掌管重整军备工作，需要国防军的军事素养和经验。冲锋队的街头斗士

们也许确实充满了政治热情，但要打一场现代化战争，这些人都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罗姆的野心已经引起了国防军的强烈警觉，他们建议把冲锋队变成一支陆军控制之下的边防军。希特勒知道，这一方案是罗姆不可能接受的。既然无法打破自己与国防军之间达成的协议，那么，除了干掉这位冲锋队首领，他已别无出路。

陆军绝对愿意与纳粹党人达成某些交易。1934年2月，卐字纳粹党徽成为正式军徽，本来便有着反犹传统的军官团，采取行动把犹太人全部赶出了军官队伍。同月，希特勒对罗姆和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说，冲锋队必须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政治鼓动和准军事训练上，国防军将保持其独立地位，革命已经结束。罗姆对希特勒的安排非常愤怒，在对自己冲锋队的下属们讲话时，把希特勒称作"一个任人唯亲的下士"，发誓将不理会纳粹党与国防军达成的协议。冲锋队上上下下对党的畏缩不前和"反动派"的不满日益高涨，罗姆提出批评的调门也越来越尖锐。

罗姆虽然是整个国家仅次于希特勒的最有权势的人，但他的各种政敌也并非等闲之辈。戈林、戈培尔和赫斯对他的地位妒忌有加，必欲去之而后快。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面对党卫队只能屈居冲锋队之下出任第二小提琴手，也很不甘心。国防军针对冲锋队的挑战，决心挫败罗姆的野心。这时，保守团体的批评对象已不仅限于冲锋队，也延伸到了希特勒政权本身。6月17日，巴本到马尔堡大学发表演讲，对现政权提出了强烈批评，指出它怀着"异乎寻常的专制企图"，"德意志革命"成了"自私自利、不择手段、谎话连篇、作风粗野和自高自大"的挡箭牌。巴本呼吁恢复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主张司法独立原则是不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而牺牲掉。

戈培尔立即采取行动，对巴本的这篇演讲稿进行封锁，使之未在报纸或电台发表。演讲稿的起草者埃德加·荣格（此人是巴本的私人顾问、慕尼黑的一位杰出律师和作家，信奉新教。巴本演讲稿中的部分观点是其秘书赫伯特·冯·包斯和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袖埃里希·克劳斯纳提供的——译注）于6月26日被逮捕。巴本提出了辞呈，但希特勒未予接受。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冲锋队正企图发动政变，但在6月30日那一天，确实有多名对现政权持批评态度的著名人士遭到谋杀，旧帐在一日之内算清了。希特勒亲自逮捕了罗姆。当时，罗姆正在巴特维塞一家旅馆里住着，他的一位副手（指西里西亚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译注）正搂着一个小伙子躺在床上。虽然罗姆是一个众所皆知的有相公癖者，希特勒先前并未感觉到这有什么不妥，但现在有机会摆出一副道德卫士的姿态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约有100人遭到谋杀，包括施莱彻尔将军和他的妻子、前巴伐利亚邦总理冯·卡尔。完全无辜的音乐批评家维利·施密特博士也惨遭杀害，原因竟然是他与当地一个冲锋队长路德维希·施密特同姓，因而被误认成后者了。希特勒下令处决自己的朋友罗姆时，心中一定不无矛盾，但仍然在第二天下令达豪集中营的主管枪毙了他。虽然在这起

事件中，国家机器堕落到了一个犯罪团伙的水准，但这些谋杀者却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国防军看到自己的一个可恶的对手就此一蹶不振，自然是心花怒放，而普通德国民众以为激进分子和空想家们遭到了纪律处置，也觉得大快人心。人们普遍对希特勒果断采取行动充满钦佩之情，关于元首的神话又多了一个例证。至于党卫队势力的上升，则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希特勒已允许他们独立于冲锋队之外，不久之后，党卫队的所作所为将使人们发现，作为国防军的对手，它构成的威胁将远远大于此前的冲锋队。

纳粹独裁政权的巩固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被极其隆重地安葬在他生前最辉煌战 261 功的发生地——坦嫩贝格（指东普鲁士战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俄军西北方面军对德国东普鲁士的进攻战役，德方称此役为坦嫩贝格战役。坦嫩贝格系科穆辛森林以西的村名——译注）。希特勒采取一个公然违反宪法的举动，兴登堡一死，便把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合二为一了。布洛姆贝格对此的反应是，召集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像惯常那样对宪法，而是对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此举引起了不少军官良心上的不安，一些人开始考虑积极地进行反抗。

表面上看，希特勒既已完全实现了独裁大权，纳粹政权自然是高度集中、极富效率了。但尽管他是绝对意义上的独裁者，却也不可能控制政府的各个环节。他所信奉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驱使他设立了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政府机构和特别委员会。强势领导人，如经济部长沙赫特、内政部长弗立克、稍晚一些成为军工部长的斯佩尔，甚至包括试图维持一定程度秩序的希姆莱，都有权力缩水的感受，而不论什么时候，野心勃勃的激进分子都不会缺少钻营和升迁的空间。1934年6月，纳粹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在给弗立克的信中写道：“从法律上看，你作为内政部长，邦长(Reichsstatthalter)都是你的属下。阿道夫·希特勒是普鲁士邦长，他把权力指定给邦总理戈林。你同时也是普鲁士邦的内政部长。作为德国内政部长，阿道夫·希特勒和普鲁士邦总理在法律上都是你的属下。因为你还是担任普鲁士邦内政部长的同一人选，你是普鲁士总理的属下，又是作为德国内政部长的你本人的属下。我不是法学学者，但我也能断言，这样一种情况是先前从来不曾有过的。”这种现象表明，国家社会主义从来不会失去其走向官僚化的蓬勃动力，但当纳粹运动的某些方面世俗化为司空见惯的谋求官位和腐化堕落的同时，其他方面则会更趋激进和暴力化。这两股张力最终在“最后解决办法”中汇合在一起，谨小慎微的官僚作风与嗜杀成性的极端主义相结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剧。

希特勒一向看不起只会伏案工作的专门人员，乐此不疲地重复他那“一个聪明的想法，胜过一生一世兢兢业业的文牍工作”的论断。从这种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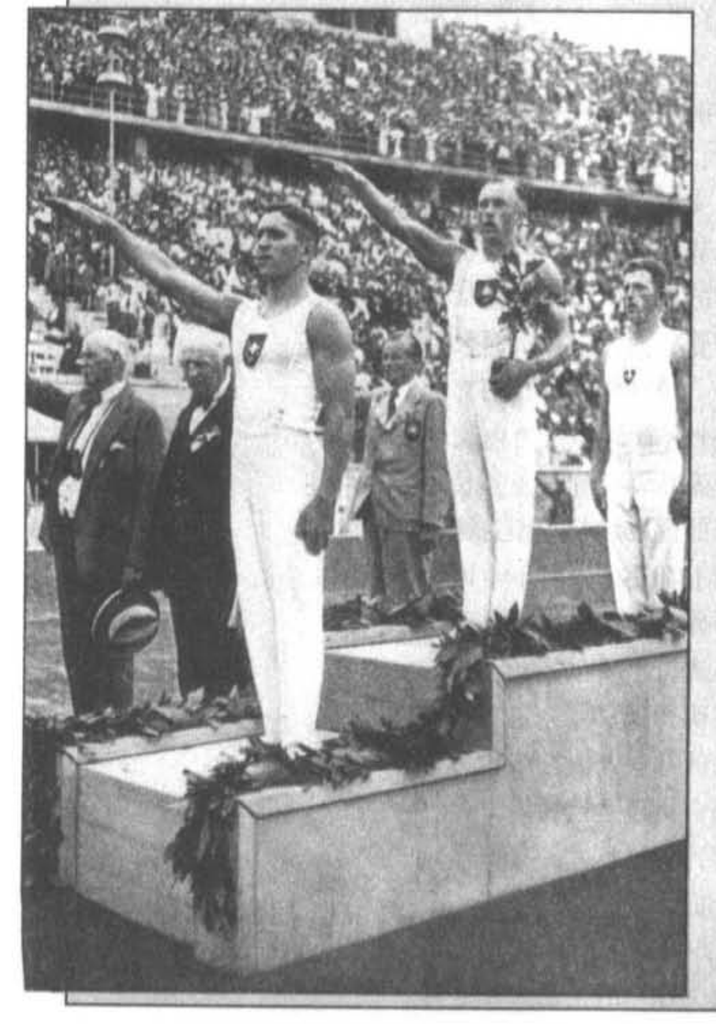
1936 年奥运会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是纳粹党人宣传攻势的一大胜利。为主办成功这届奥运会，纳粹政权 1933 年上台后倾尽全力，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向世人证明，新德国是世界上最明亮的光源。暴力、歧视和种族仇恨都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柏林是一座欢乐、和谐、热爱生活的大都会。德国被妆扮成为一个健康向上、勤俭奋斗、富庶安康、兴高采烈，并有着一套胜人一筹的福利制度的国度。奥运会的组织工作极其严谨，当局在场馆建设和来宾接待方面不惜工本，慷慨大方。国家社会主义退居了二线，政治口号一时失去了踪影，原先那无所不在的卐字党徽，现在也只有在个别场合才能看到了。至于犹太人，终于可以从迫害者那里获得一个喘息之机了。

盛况空前的开幕式，也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尽管希特勒派军队占领莱茵兰仅仅发生在几个月之前，但法国代表团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主席台前面时，仍向希特勒表达了敬意。国王、总统、政治家和王子们纷纷来到柏林，与其说是前来欣赏这次体育盛会，不如说是为了看一看阿道夫·希特勒，看一看德意志这个伟大民族的拯救者。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为来自外国的贵宾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款待：戈培尔在万湖的普弗恩岛举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会，招待 1000 名宾客；戈林在他担任部长的航空部所在地的花园，用 18 世纪的风格建造了整整一座缩微版的庄园，让一匹小马驮着他那肥胖的身躯，连着数个小时在那里闲逛。晚间，戈林在特意用乳白色丝绸装饰起来的柏林歌剧院举办盛大宴会；里宾特洛甫为了庆祝自己被任命为德国驻伦敦大使，在自己位于达勒姆区的别墅举办大型宴会，用成瓶成瓶的香槟朝 700 位来宾的喉咙里猛灌。

这些宴会，使纳粹精英阶层赢得了社交界的广泛赞誉。纳粹官员们与来自各国的贵族、银行家、工业巨头、电影明星、运动员和大富豪们把酒言欢，济济一堂。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里·弗朗西斯·庞塞用日记，为我们绘声绘色地记述了柏林这些年里的生活。他评价道，人们怎么可能相信，面前的这些如此温文尔雅、热情好客的主人，竟会是谋杀犯、严刑拷打者和战争贩子?出现在奥运会舞台上的希特勒，给世人的是一个和平的、理解国际事务的形象。但就在同时，他又下令武装部队和工业界，务必在 4 年时间里做好战争准备。

这次奥运会是纳粹德国的一大胜利。德国代表团共获得金牌 33 枚、银牌 26 枚、铜牌 30 枚，居各国之首，美国队排名次席。赛场上最出人意料的比赛结果是英国冰球队战胜了加拿大，最令人震撼的胜利是这届运动会的英雄人物杰西·欧文斯创下的：他一人独得三枚金牌，打破了男子 100 米世界纪录，打破了男子 200 米和跳远奥运会纪录，并且还是接力比赛冠军队的成员之一。欧文斯是一位杰出的运动员，也是一位性格和善的人，但因为他是非洲裔美国人，所以为纳粹种族主义者所不欢迎。希特勒拒绝暂时忘却一下自己的信条，没有与这位赛场上的最耀眼明星却又是他眼中的劣等人握手。



第 16 届奥运会 1936 年 8 月 1 日至 16 日在柏林举行。图为男子体操比赛获奖者。冠军是来自德国的施瓦茨曼，亚军是瑞士选手马克，季军是德国选手弗赖。

“领导原则”出发，他任命了一些全权代表办公室等特设机构，冀图减少官样文章，把重要事情办成。例如，弗立契·托特博士被指派建造高速公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被置于希特勒的直接掌管之下，以越过数不胜数的现有机构的竞争。这种政府管理上的“闪电战”，在纳粹政权上台的最初几年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1942年时，权倾一时的鲍曼已经在抱怨，太多的精力浪费在部门之间的竞争和争权夺利上去了。

作为“元首”，希特勒面对政治对手的竞争和下级官员的争斗，处于绝对超然的地位，而他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方面，以及战争初期的战场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功，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这种地位。与此相较，纳粹党受到的支持程度却每况愈下。党的地方官员们由于其出身低下，被轻蔑地称作“镀了一层金的农民”。这些人沾沾自喜、蠢笨如猪、贪污腐化，根本无法赢得尊重。到了战争爆发后，他们由于其地位而得以免服兵役，又被视作胆小鬼。不过，民众对党的下级官员的轻慢，希特勒似乎充耳不闻。因此，“如果元首知道就好了”，一时之间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更可怕的是，纳粹 263 党的名声越坏，希特勒作为国家希望与梦想的负载者的作用便越强。

纳粹党与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明确的分野。许多显要人物都同时担任党内职务和政府官职，例如戈培尔、希姆莱、赫斯、卢斯特、达里都是如此。纳粹党籍的邦长，本来是党的官员，但往往同时出任各邦邦长或总理等政府职务。党卫队被视为最忠实履行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支队伍，党和国家的两种特性水乳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最终将导致它一举超越二者的控制。希姆莱和他那野心勃勃、嗜杀成性的副手海德里希，在巴伐利亚使政治警察不受任何法律或行政权力的制约，并与穿着统一制服的党卫队和集中营相辅相成，成为施行恐怖统治的绝好工具。在普鲁士，戈林已把原来的政治警察改造成为“国家秘密警察”，简称GESTAPO（Geheime Staatspolizei，音译为“盖世太保”），不过与巴伐利亚的同行相比，这时还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1936年6月17日，一支全国范围的统一的警察队伍在德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来，希姆莱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这样，此前一直属于各邦自行管理的警察，被集中交给党卫队这一党的政治机构的首领集中领导。从理论上说，希姆莱只是内政部之下管理全国警察事务的一名官员，但内政部长弗立克非常清楚，作为党卫队的首脑，希姆莱只对元首一人负责。希姆莱宣称，警察对执行法律不感兴趣，它的任务是“反映国家社会主义的元首国家的现实”，“把领袖的期望付诸实现”。

最初，警察队伍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负责日常警察事务的“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另一块是由刑事警察(Kripo)和盖世太保组成的“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1939年，秘密警察与纳粹党的间谍机构“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合并，组成“德国中央保安局”(RSHA)，海德里希任局长。1937年，希姆莱宣布，党卫队分为五大主要部分：一是



穿着统一制服的准军事化组织，是魏玛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殊景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建有类似组织。1934年以前，纳粹党的军事化羽翼一直是冲锋队。党卫队最初几年仅仅扮演了为希特勒提供私人卫队的次要角色，但后来取代了冲锋队的地位。

普通党卫队，即参加军事训练的兼职人员；二是后备军，即从事边境防卫的预备役部队和辅助警察部队，1938年将构成党卫队的骨干力量；三是管理集中营的“骷髅队”，用希姆莱的话说，其任务就是“铲除犯罪分子和劣等民族垃圾”；四是保安处，它是纳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情报机关”；五是种族与占领区总管理处，负责确保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和赢得“生存空间”。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警察都是党卫队员。事实上，很多人根本达不到加入党卫队所需要的那种强烈得近于变态的种族意识和体格标准。党卫队下定决心要消灭犹太人及布尔什维克“劣等人”等“邪恶”的存在，塑造全新的种族秩序，按照德意志远古史的传统和传说，建立一个严格的类似于返祖现象的那种排除外来血统“污染”的社会。在纳粹政权刚刚上台的几个星期里，冲锋队曾针对犹太人实施了令人惊惧不安的暴力行动。1933年4月，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公共服务工作。此后，反犹主义似乎冷却了一些。尽管采取更加积极行动的呼声不时响起，但除了1935年 264 5月禁止犹太人在军队服役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但到了1935年9月，形势急转直下：希特勒当时去了纽伦堡出席党的集会，下令制订一部“关于犹太人的法律”。当夜，对希特勒头脑里在想些什么一无所知的内政部工作班子，精疲力竭地完成了起草。凌晨2时30分，希特勒批准了这一文件，史称“纽伦堡法律”。纽伦堡法律禁止犹太人和“德意志公民或拥有相同血统的人”通婚，禁止犹太人雇用雅利安女仆，禁止犹太人展

267

颓废艺术

德国美术协会系由约瑟夫·戈培尔任主席的德国文化协会的分支机构之一，于1933年11月成立。希特勒很欣赏建筑师保罗·路德维希·特罗斯特，在艺术问题上经常向他咨询。他对所谓"颓废艺术"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如果艺术家在卡尔·爱因斯坦所著《20世纪的艺术》中获得好评，那么，他的作品就一定属于颓废之列。只有那些获得德国文化协会会员资格的人，才能进行艺术创作，而任何艺术作品一旦被定性为"颓废"，当局即有权予以没收。所有博物馆均撤出了馆藏的现代派作品，只有柏林一地例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以前，人们还能够看到它们。

美术协会主席齐格勒教授，所绘的怪异的裸体肖像画令希特勒觉得很有趣，因而得到了这个位置。他受命组织一次将于1937年在慕尼黑举行的"1910年以来德国颓废艺术作品展"。为此，主办者从认为其作品表现了"疯狂、粗俗、蹩脚、颓废"的艺术家中，挑出了112位。作品展共分九大部分，分别是：绘画技术蹩脚；"亲犹太人"宗教艺术；社会批评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包括德国画家乔治·格罗兹和奥托·迪克斯的作品）；"淫秽"；颂扬黑鬼（印象派作品）；"艺术与精神错乱"；"犹太垃圾"；最后一项是，"颓废之极致"（维利·鲍迈斯特和库特·施维特斯的作品）。

展览中的一些精品，后来被纳粹官员们据为己有，特别是喜欢印象派和马蒂斯（1869—1954年，法国画家、雕塑家，野兽派领袖，代表作有《戴帽子的女人》等——译注）的戈林。超过1000幅的画作被付之一炬，另有125件重要作品于1939年在卢塞恩拍卖，世界各国的博物馆藉此机会收藏了一些凡·高、莫迪利亚尼、高更、夏加尔、毕加索和布拉克的杰作。1945年后，德国从这些外国博物馆回收的作品寥寥无几。



1938年在柏林举办的"颓废艺术"展。参观者在马克斯·贝克曼的《海滩》前，背过了身子。

示德国国旗。犹太人不得享有完整的公民权。法律并未明确界定哪些人属于犹太人范畴，因此给了那些更加歹毒的反犹主义者充分的解释空间，不过这项法律的受害者们也得到保证说，这将是最后一项反犹立法。尽管纳粹分子一向把犹太人看成一个种族，但所下的犹太人的定义是至少有3位祖辈系犹太教教徒的人。至于"半犹太人"，如果他信奉犹太教，也会被视作犹太人。所以，一个人算不算是犹太人，更多地取决于宗教因素而非种族因素，虽然从实践上看，一些狂热种族主义者也曾以其不是"种族上的"犹太人，饶过了一些虔诚的犹太教徒。

纳粹党人特别重视青年人，提出了"谁控制了青年，谁便控制了未来"的论断。小伙子从10岁到14岁，要加入"少年队"，年满14周岁后正式参加有统一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从一开始，少年队和青年团就 265 把重点放在军事纪律、集体观念、职业培训和政治灌输上。男孩子一加入少年队，便能把下述情况倒背如流："我们的领袖希特勒1889年4月



1936年宣传Volkswagen("大众汽车")的一幅广告画，上面的口号是："要想开上自己的汽车，每星期得存上5个马克！"斐迪南·保时捷博士监督下设计的这种"人民大众的汽车"，是希特勒非常垂青的项目，一个名为"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负责娱乐活动的组织为之投入了大笔经费。按照宣传中提出的目标，普通德国人应该都能不太费力地把这种汽车买回家。但事实上，在第三帝国时期这种汽车仅用于军队，一辆也没有为任何平民生产出来。

20日出生在勃劳瑙。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关官员，母亲是家庭妇女……"但是，尽管当局下了大力气吸引年轻人，但直到1936年，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也只有60%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至于女孩子，也有相应的组织，即"少女队"和"德国女青年团"，以培养她们将来为人妻子、母亲和家庭妇女的本领。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青年团的团员，都经常因为参加团里的活动和培训而缺课。虽然教师们不无抱怨，但当局却充耳不闻，因为"性格"、"意志力"和"种族精神"，当然要远远比"僵化的知识"和"机械的世界观"更重要的。

成立初期，这些青少年团体也像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青年运动一样，充满了反资产阶级传统的狂热主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知识无用论，但用不了多少时间，便退化成了旨在培养战士、家庭主妇和党的官员的规模庞大、充满官僚习气的训练营。很多年轻人与唯我独尊的国家社会主义拉开了距离，很多教师在讲授历史和文学课时，也对这一新型的意识形态只字不提。纳粹党及党卫队操纵下的学校，本来充满信心地要塑造出一批种族纯正、身体强健、立志为国家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新型贵族"，但这一愿望无可奈何地落了空。很快，德国投入了战争，这些青年团中的学生成为第一批被动员起来担负辅助工作的人，一开始是配合军队和疏散人员，后来是帮助难民。

纳粹德国的经济政策

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之所以获得国民的欢迎，原因在于其在经济上取得的可观成就和在外交上赢得的一个个胜利。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在电台发表讲话，承诺将在4年时间内消灭失业现象。这在当时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牛皮大话，但他后来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到1936年，不仅失业问题得到了克服，而且在很多领域，还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而当时，美国的失业率仍高达20%。

纳粹政权上台后，继续实行巴本和施莱彻尔政府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但推行的决心之坚决、幅度之大，又远远超过前任。在上台的前两年里，共投入了50亿马克以改进基础设施、对私人住房提供补贴，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军工订货。当时最引人注目，同时也遭受了最广泛批评的建设项目是高速公路网络。虽然当局经常声称此举是出于战略原因，但其实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和服务于宣传需要：将军们更喜欢通过铁路调动自己的部队，而且他们对这些公路在什么地方修建并没有发言权。

就业女性结婚后，如果放弃工作，可以得到1000马克的"婚姻贷款"。为了享受这一好处，到1935年初时，已有37.8万名妇女放弃了工作，这既是腾出了同等数量的就业机会，又是向消费者商品市场释放了数以百万计的马克。

如此程度的财政赤字，很快便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备战工作成 266 为政府预算中的最大宗项目之后。1933 年，军费在公共开支中所占比例为 4%，而到 1936 年时已锐增至 39%，到 1938 年更猛增到 50%。军费如此迅速的上升，是政府收入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的：1938 年，财政收入仅为 177 亿马克，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 300 亿马克。克虏伯、西门子等德国实力最强的四大工业康采恩，1933 年动用仅 100 万马克的本金，创立了彼此商业往来的票据“金属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期票”（简写为 Mefo，音译“米福票”），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为弥补财政赤字，遂把“米福票”引入了交换领域，用它来支付得到军工订货的企业，德国各银行都接受，最后由国家银行予以贴现。很快，米福票便成了德国事实上的第二货币。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危险越来越明显，国家银行不得不在 1938 年春停止了米福票的发行。

这样，重整军备的费用便只能通过课税扣除，以及强迫银行和保险公司向政府出借大笔款项的办法支付了。纳粹政权希望，待取得征服战争胜利后，可以偿还这些借款。规模巨大的军备订货，损害了德国的外贸。沙赫特早在 1934 年便提出了自己的“新计划”，使国家事实上垄断了外贸工作。他同东南欧、中南美国家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用工业品换取原材料和农业品的物物交易。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德国外贸业获得了出超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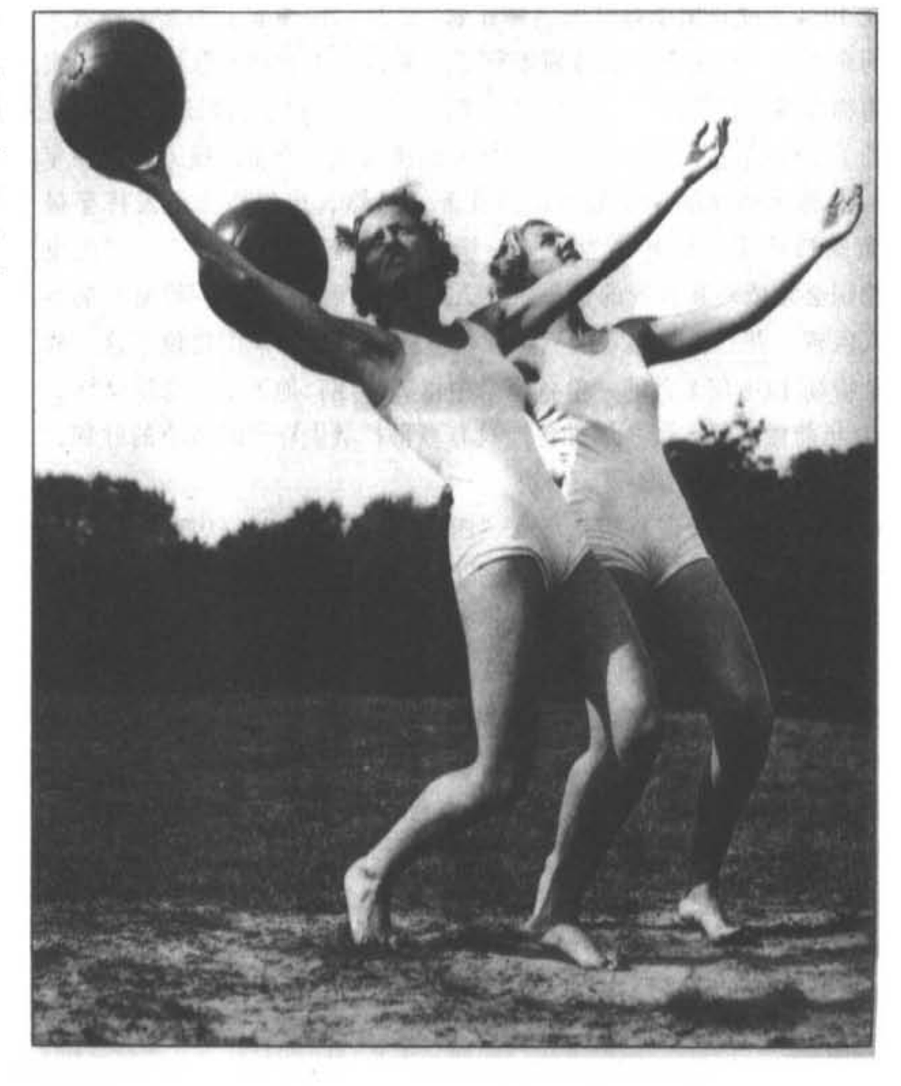
但到了 1936 年春天，重整军备计划对经济构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一年的 4 月，戈林承担起加速备战步伐的任务。显然，出口能力已发挥至极致，外贸缺口将无法弥补，为了打一场短促而有限的战争——“闪电战”，德国必须依赖其自身的资源，在人造橡胶、人造燃料等原材料的生产中投入巨资，并且备战的着眼点必须是横向扩军而非深度建设。这一战略，在希特勒 1936 年 8 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体现：他下令，德国经济必须在 1940 年前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只有赢得扩展生存空间战争的胜利，纳粹经济中的种种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旨在扩充军备、实现自给自足的“四年计划”（1936—1939 年），对经济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因为从此以后，德国必须把着眼点放在利用国内资源上来，而不是鼓励进出口，但诸如冶炼贫铁矿石等做法，势必抬高成本。德国农业无法满足国民的需要，因此有限而急需的外汇，不得不拿出相当一部分来进口粮食。虽然纳粹政权在 1933 至 1939 年间为取得农民的支持下尽功夫，实行了全面的新农业计划，辅之以大谈其“血统和土地”的动听宣传，仍有 140 万农民离开乡村，到城镇寻找收益更大的工作。尽管国家为人工合成橡胶项目投入了巨大资金，但它只能满足 5% 的需求。虽然“四年计划”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但希特勒毫不理会沙赫特和许多工业家的建议，继续全力推行这一计划；沙赫特和工业家们虽然也赞成大规模重整军备，但不主张以如此之快的步伐。

社会生活

纳粹政权运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保持了社会的平静。到 1934 年夏天，工会组织已被取缔，国家社会主义工场组织（NSBOs）和德国劳工阵线（DAF）中的社会激进分子，也已不得轻举妄动。拥有 2000 万会员、4.4 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和 130 万志愿工作人员的德国劳工阵线，实际上是一个对工人发号施令、进行行为控制和思想灌输的机构，不过，它也试图通过雄心勃勃的娱乐计划，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提供廉价的观赏戏剧、电影、音乐会的票，建筑体育设施，开办夜校，并安排劳工阵线及其他纳粹党员享受度假生活，收费便宜之至。它组织的诸如到加勒比海度假，或者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旅行等最受欢迎的活动，在提供大笔补贴的条件下，成了“中等阶级”享受的幸福时光。假日 268 从 1933 年的平均 3 天，增加到 1939 年的 6 至 12 天不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也逐渐对旅游培植了兴趣，这也为战后旅游成为德国人民生活的一大

训练中的两名女运动员身上，体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纳粹党人强调军事纪律、集体观念、职业培训和运动。适用于女孩子的纳粹青年组织，着重培养她们将来为人妻子、母亲和家庭妇女的本领。



突出的组成部分，埋下了伏笔。

应当说，德国劳工阵线是成功的，但在涉及意识形态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虽然该组织的会员普遍享受了假期，但夜校的参与率就不高了。还有戏剧、电影、文学，只有那些真正具有艺术性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喜爱。没有几个人愿意观看描写希特勒青年团或党卫军的电影，而那些并不直白地宣扬意识形态诉求的历史故事，例如描写腓特烈大帝或俾斯麦的影片，则受到广泛的欢迎。外国出版的畅销书往往能取得很大成功，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美国女作家——译注）的《随风而去》（又译《飘》或《乱世佳人》）和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小说家——译注）的《向家乡看吧，安琪尔》都是这样，但那些政治上符合纳粹党口味的东西，则很难卖出去多少本。戈培尔非常希望能拍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版本的《战舰波将金号》或《淘金记》，但徒然付出了大量劳动和金钱，却永远无法拍出同类水准的影片出来。戏剧表演是个例外，269 尤其是在战争岁月。由于集中上演古典剧，诸如柏林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格斯等公司，都保持了最高的艺术水平，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被控制，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

和平时期的柏林，对于那些有钱光顾鸡尾酒酒吧和饭店，或者欣赏特迪·斯托弗的摇摆舞音乐者来说，很像仍然停留在“黄金20年代”。什么“种族共同体”，什么阶级分野，在这里听起来都像以往一样刺耳。富人们身穿燕尾服或裘皮大衣，兴致勃勃地参加杰出的演唱小组“喜剧和声”的演出。狂热的纳粹党员们这时即使有些不大自在，也还会与专心致志欣赏艺术的人和平共处；一些有远见的人已经意识到，这种太平盛世不会持续太久了；或许，一部电影的名称已经预示了一切，那便是《在火山上跳舞》。1934年，“喜剧和声”小组的三位犹太人被迫退出，取而代之的是“雅利安



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幅电影剧照。虽然纳粹党人不遗余力地利用娱乐形式灌输其意识形态，但实践证明，真正受到欢迎的是那些能够让观众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虚构类作品。



希特勒出席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集会。这种集会每年9月举行一次，阿尔伯特·斯皮尔称之为“大舞台”。集会活动持续8天，场面宏大，安排严密，旨在表达和张扬对元首的崇拜。希特勒共在集会上发表过15至20次讲话，每当他在集会上出现，照例会成为夺目的焦点，成为25万名与会者崇敬的对象。

人”。至于摇摆舞音乐，也被打上了“黑人·犹太人”的烙印。针对美国“黑鬼文化”的斗争日益加剧，不过，纳粹当局也不是笨伯，它知道，鉴于爵士乐的受欢迎程度，真要针对它发动一场全面的扫荡将是愚蠢的。

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改善相当有限。到1937年，平均实际工资恢复到了1929年的最高水平，但这是以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生产效率为代价的。工人收入的增加，在军火工业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其他领域，工资则不升反降。到1939年时，人们的不满情绪已愈益普遍化，怠工和旷工现象越来越多。当局把这种现象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鼓动，但不管怎样，每周工作65个小时当然是一种罕见的做法，工人们实在是太疲劳了。

国家社会主义对女性的态度，更是对“种族共同体”的一大嘲弄。理 270 论上看，女子的地位和作用将是成为妻子和母亲，因此，纳粹德国的女人是不需要工作的。但由于劳动力不足，德国却又在1938年颁布法令，要求25岁以下的单身女性必须服一年的劳役。这道法律后来成为一纸空文，在符合条件的95万名女子中，只有5万人实际上从事了劳动工作。战争刚刚爆发时，工作女性的数量实际上有所下降，她们的工作岗位转由外国劳工填补。到了1941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女性数量确实有所增加，但她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对于这种不公现象，戈林做了这样的解释：女人其实就像马，有些人非常适合干活，有些则像良种母马一样，应该专事繁殖后代；良种母马是不能套上犁的，那样它很快就会累倒。所以在这个所谓“种族共同体”里，元首所欣赏的那些有财富、有教养、有容貌的女人，享有种种特权。正因为如此，效力于国家社会主义妇女协会（NSF）的那些御用文人，遭到人们的深深厌恶。

外交政策

社会不满情绪之所以能够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希特勒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胜利。纳粹政权上台后，形势对其下定决心推行复旧政策十分有利。1930年有关各国签署了延期赔付的“扬格计划”议定书后，战争赔款已告结束。至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解除武装 271 的规定，更是早就被各方抛诸脑后了。日本侵占满洲并于1933年退出国联后，集体安全机制已沦为一纸空文。英国和法国的意志极其薄弱，美国则孤立主义盛行。

在纳粹政权上台后的头两年里，虽然德国外交政策几乎未做任何改变，但盟国对希特勒仍不无疑虑。1935年1月，他取得了外交上的第一项胜利：尽管反法西斯人士倾尽全力，但萨尔区居民在公决中，仍以91%的压倒多数，决定与德国统一。三个月之后，希特勒颁布法令，实施普遍兵役制，以建立一支由55万人组成的陆军，并宣布重建德国空军。又过了一个月，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施特莱沙阵线”，重申了其维护欧洲现状的决心。

然而，“施特莱沙阵线”注定只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协议。英国人紧接着便试图与德国谈判签署一项海军协定。德国方面予以回应，派出的特使是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这个重面子而不懂策略的家伙。希特勒希望通过签署英德海军协定达成两个目标：其一，英国人接受德国新海军舰只吨位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这就等于明示天下，《凡尔赛和约》已化为历史陈迹；其二，以此为开端，争取与英国达成一项全面的协定，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苏联。6月18日，英德两国签署了海军协定。希特勒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墨索里尼认定，在“施特莱沙阵线”建立以后，英法两国需要他来制约德国，因而于1935年10月5日，对埃塞俄比亚宣战。面对意大利军队在一支武器装备水平极其落后的军队面前的残暴行径，英法两国公众被激怒了，但两国政府的抗议却是半心半意。一开始，希特勒是支持埃塞俄比亚人的，还送去了价值300万马克的武器，但在国联威胁对意大利实施制裁时，他转而支持后者了。从英法对意大利人侵行动的软弱反应中，希特勒看清了很多东西。借此机会，他开始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交上了朋友。在此之前，因纳粹分子暗杀阿尔斐斯总理而引发的1934年奥地利危机，曾令意德关系陷入严重紧张状态：墨索里尼担心德国会夺占奥地利这一两国之间重要的缓冲地区。

“施特莱沙阵线”既已名存实亡，希特勒遂于1936年3月7日下令德军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借口是新近法国与苏联签订的协定违反了《洛迦诺公约》。同日，他解散了国会，要求在3月29日进行新的选举和对

他进军莱茵兰的大胆举动进行公民投票。在莱茵兰的巨大成功，把希特勒的威望提升到了顶峰：公民投票中，98.8%的人赞成希特勒的奇袭行动。法英两国除了旁观，什么也没有做；国联对德国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但它采取的那点制裁措施，希特勒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墨索里尼已经向他保证，意大利不反对德国这一步骤，而且不再希望奥地利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压制纳粹分子。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国和意大利不约而同地支持佛朗哥将军，这使得两国关系更加亲密了。希特勒在内战爆发伊始便做出了干预的决定，既 272 是为了确保德国能够继续从西班牙获得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但更关键的动因是，他担心西班牙会落人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从而增强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反对德国的实力，并使西班牙与苏联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1月1日，墨索里尼第一次在讲话中提出了从罗马到柏林的"轴心"一说。不过，希特勒对是否与意大利建立同盟关系还有些矛盾。与同英国结盟相比，同意大利结盟的价值要小得多：英国这时已令他很放心了，如果与之结盟，下一步展开东方的征服战争，便有了最有力的安全系数。

1936年10月，希特勒任命冯·里宾特洛甫为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履任抵达维多利亚火车站时发表谈话称，他希望与英国开展结盟谈判。如能成功，希特勒便可以腾出手来，在东方对付布尔什维主义了。但英国人对此并不热心；他们太清楚不过了，一旦德国打赢了对苏联的战争，必将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力量，这对斯坦莱·鲍德温领导的保守政府，绝对不是什么令人赏心悦目的前景。对自己此次使命的失败，里宾特洛甫将之归因于英王爱德华八世的逊位：众所周知，爱德华八世同情纳粹党人，因而他的逊位被看作"反德国的、反动的、犹太人的集团"的一大胜利。英国人发现这位大使既无能又懒惰，遂用谐音戏称之为"冯·布里肯罗普"(Brickendrop 意为"失言"，"惹乱子")。他不仅未能缔结一项盟约，甚至无法安排一次鲍德温与希特勒之间的会晤。尔后，里宾特洛甫飞回柏林，开始与日本人谈判，很快达成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于1937年11月6日签署。希特勒遂放弃了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希望，而里宾特洛甫更是建议，如果英国企图破坏德国的向东扩张，就应对英国发动进攻。

到了这个时候，外交界、军界和工商业界的精英中较有远见的人都已清楚地看出，德国外交政策正踏上一条新的、危机四伏的道路。11月5日，希特勒对自己的外交部长及各军种总司令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长篇谈话，谈话内容后来由霍斯巴赫上校记录了下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冯·布洛姆贝格，陆军总司令、陆军上将冯·弗立契男爵，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雷德尔博士，空军总司令戈林，以及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男爵。霍斯巴赫是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希特勒的讲话由他记录下来，详细写入一份极为秘密的备忘录中——译注）。会上，希特勒先是就种族问题和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刻毒地咒骂一通，然后

273

碎玻璃之夜

1938年11月，一个名叫赫策尔·格林斯潘的年轻犹太人，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团的一位名叫爱德华·冯·拉特的随员。当时，犹太人已被从大多数职业中排除了出去，他们必须随身带着身份卡，在名字中加上"以色列"或"撒拉"，不过反犹运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政府各部对反犹行为的合法性表示了疑虑，要求予以澄清，而激进分子则要求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11月9日，希特勒得知刺杀事件时，正在慕尼黑参加"啤酒馆暴动"15周年纪念活动。他与戈培尔讨论了这一事件，后者随即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讲话，声称德意志人民将寻求对谋杀事件进行报复。纳粹党和冲锋队遂奉命"自发地"表达人民对犹太人犯罪行为的义愤，而党卫队则被命令暂时按兵不动。冲锋队员们身穿制服，怀着愉快的心情开始了行动。11月9日至10日夜间，至少有91名德国犹太人被谋杀，绝大多数的犹太教会堂遭到焚烧，犹太人的财产被抢掠一空。盖世太保首脑海因里希·穆勒下令逮捕了2万至3万名犹太富人，把他们送到集中营，等候从德国驱逐出境。德国境内大小城镇一片狼藉。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根本不得人心，没有谁不知道这件事是来自上面的指令。大多数德国人都觉得这样做实在走得太远了，这倒未必是因为对犹太人抱有多少同情心理，而是担心冲锋队员们如此漠视人们的财产权，也许用不了多久便会轮到他们遭殃。

11月12日，由赫尔曼·戈林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决定，剩下的25万名德国犹太人必须交纳10亿马克的罚款，而且他们遭受的损失不得向保险公司理赔。委员会还决定，犹太人的企业和产业将"雅利安化"，犹太人将被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和游泳场所。从此，德国犹太人失去了一切合法权利和生活保障，踏上了遭受种族灭绝的不归路。党卫队机关刊物《褐色军团》宣称，犹太人很快就将被屠杀光。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德国议会宣布，一旦战争在欧洲爆发，德国的犹太人将予消灭。

"碎玻璃之夜"后，环卫工人们清扫街道。



宣称，德国至迟必须在1943至1945年投入战争以解决极为迫切的生存空间问题，第一个目标将是进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里，希特勒首次提及了可能与英国进行一场战争的可能性，虽然他判断，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动一动手指头来挽救捷克斯洛伐克。

两周后，张伯伦新内阁的掌玺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来到贝尔格霍芬拜见希特勒时，提出了解决德国对奥地利、但泽、捷克斯洛伐克等问题上所提要求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但希特勒予以拒绝，因为这样将不利于他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不过，修改《凡尔赛和约》的道路至此已经畅通无阻了，英法两国的绥靖派已经做好了接受德国所提要求的准备，觉得禁止德国重整军备的条款可以改变，社会的和谐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局面正是德国那些传统保守派所乐于见到的，所以，当布洛姆贝格等人11月5日听到希特勒的长远打算时会深感震惊。

希特勒决定对政府和军队领导层进行大改组。当布洛姆贝格的新婚妻子曾有过犯罪记录，而且还拍过淫秽照片的秘密被曝光后，希特勒借此把



1938至1939年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的文字是游行用的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希特勒身兼总统和总理之职，掌握了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他还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整个德国都在他的掌握之下，忠顺地执行他下达的命令，以实现他的白日梦想。

他打发走了。瓦尔纳·冯·弗立契虽然是一个反动的反犹主义者，但他不是纳粹党员，且一向轻视和看不惯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捏造证据，指控弗立契与一个男妓有染，迫使他辞去了陆军总司令职务。希特勒迅即自任总司令，废除了国防部，代之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惯于阿谀奉承的凯特尔将军担任最高统帅部长官，同样缺乏个性的约德尔将军担任其副手。弗立契的继任者是软弱恭顺、以溜须拍马为能事的冯·勃劳希契将军，当时，此君正准备离婚，去娶别人奉上的一个美人。老派外交官诺伊拉特的外长职务，由里宾特洛甫接掌。经济部长沙赫特对迅猛扩军持批评274态度也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纳粹党死硬分子瓦尔特·丰克。派驻东京、罗马、维也纳等的重要大使也都换了人。

通向战争之路

1938年2月12日，奥地利总理舒施尼格来到贝尔格霍芬，与希特勒进行会谈，迎接他的先是一大通粗暴的指责和赤裸裸的威胁，尔后便是一连串的要求：他必须任命纳粹分子赛斯—英克瓦特为内政部长，必须对因违法而被监禁的纳粹分子实行特赦，必须使奥地利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与德国开展亲密合作，必须使两国总参谋部之间进行磋商。舒施尼格感到，除了接受这些要求之外，自己别无选择，幻想自己至少能够保持奥地利的领土完整。

直接听命于希特勒和弗立契的赛斯—英克瓦特，发动纳粹分子展开了一系列暴力活动，使奥地利很快陷入无政府状态。3月9日，舒施尼格宣布将于3月13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由奥地利人民决定是否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的、基督教的和统一的奥地利”（原书在“自由的”和“独立的”之间嵌入了“德意志的”一词，经查对有误，故隐去——译注）。希特勒从戈林那里听说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迅即采取了因应措施。他派遣黑森亲王去见墨索里尼，向后者保证，德国将接受以布伦纳罗作为其与意大利的边界线，永远不会对南蒂罗尔提出领土要求。3月10日，他签署了代号为“奥托行动方案”的第一号指令，即入侵奥地利的作战计划。戈林声称，舒施尼格既已失去德国政府的信任，因此必须辞职。舒施尼格遂向罗马、伦敦、巴黎探问态度，但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支持，不得不于3月11日夜提出辞呈。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虽然勉强接受了他的辞呈，却拒绝让赛斯—英克瓦特接任。很快，奥地利纳粹分子夺占了政府所有重要部门。晚8时45分，希特勒发出了入侵的命令。就是在这个夜晚，黑森亲王从罗马打电话到总理府，告诉希特勒，墨索里尼已表示支持。希特勒回答说：“请告诉墨索里尼，为了这件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后来，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3月12日，德国军队越过奥地利边境，受到了兴高采烈的奥地利人的夹道欢迎。受此鼓舞，希特勒决定吞并奥地利。第二天（原文如此。经查，应为3月14日——译注），他向维也纳的群众发表讲话，当宣布奥地利现已成为德国的一个省份时，听众们陷入了欣喜若狂的状态中。这时的希特勒，实现了俾斯麦关于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国家的梦想，正处在民意拥戴的顶峰。4月，德国就合并奥地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99%的选民投票赞成。至于德国警察和党卫队对奥地利犹太人及反对派的可怕暴行，这时又能几个有识之士感到担忧呢？

德国通过吞并奥地利，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时的它，得到了超过1919年所失去的领土，以及极具价值的铁矿，还有军火工业所迫切需要的50万没有就业机会的工人。这时的奥地利，中央银行的黄金及外汇储备达14亿马克，而同期的德国只有7600万马克。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对德国的一大战略威胁，但现在已成为德国进攻的理想目标了。

吞并奥地利两星期后，希特勒接见了苏台德区德意志人领袖康拉德·汉莱因，指示他提出一系列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一个月后，他又命令凯特尔将军制订一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代号为“绿色方案”。英国人宣称，它可以接受以对德国有利的方式调整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从而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它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捷克人。法国当时正处在又一场政治危机之中，如果得不到英国的支持，也不会采取措施。至于墨索里尼，更是没有任何反对意见。5月20日，捷克政府做出了争取主动的决定，立即实行部分动员。英、法、苏终于暂时摆脱了它们的后知后觉，纷纷表示完全支持捷克人采取的这一步骤。看上去，战争已迫在眉睫了。

275

1938年5月28日，希特勒对军队和外交方面的高级领导人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宣称“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是“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为避免英、法干预，他将发动一场为期4天的决定性的“闪电战”。在此之后，他准备掉头对付法国人，以便为东方的扩张主义战争解除后顾之忧。这时的希特勒，还不清楚这一切会不会导致与英国的战争，但他已经认定，要实现自己在东方的目标，必须首先确保西方安全无虞。

6月，德军向德捷边境地区调集部队，而英法两国则不断催促捷克人进行谈判。9月13日，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来到贝尔格霍芬晋见希特勒，后者提出苏台德区必须立即合并到德国。张伯伦回答说，做出这一决定需要与内阁磋商并获批准，希特勒承诺在两人再次会商之前，他将不使用武力。随后，英、法政府督促捷克人，把苏台德区所有日耳曼人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地方都割让给德国。张伯伦来到巴德戈德斯贝格，向希特勒提出了这一建议，但希特勒冷漠地回答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张伯伦返回伦敦。9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爆发战争，它将有义务支援法国。希

特勒抱怨说，他被人“像个黑鬼一样”对待。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上，他对群众宣布，是战是和，捷克人必须做出抉择。

9月27日，希特勒命令德军做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次日，在墨索里尼的劝说下，他才很不情愿地答应在慕尼黑接待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协议于9月27日凌晨达成：德国将得到苏台德区，并将与意大利一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区的领土完整。

从某种意义上说，慕尼黑所发生的这一切，当然是希特勒获得的一次胜利。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国度，它除了减少了360万国民外，还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换个角度看，希特勒被剥夺了在布拉格举行入城仪式的机会，他的时间表被打乱了，英国和法国得到276了一个整军备战的喘息之机。德国民众把张伯伦作为一位和平使者予以欢迎，希特勒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德国人民对战争前景并不那么斗志高昂，不无幽怨地嘟哝道：“靠这些人，我怎么打一场战争!”

10月21日，希特勒下令制订“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和吞并梅梅尔区的计划。梅梅尔区是波罗的海沿岸一个港口，是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割让给立陶宛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要求获得独立，并得到了柏林的支持。捷克总统哈查解散了以提索神甫为首的斯洛伐克自治政府，并派部队进入斯洛伐克。经劝说，提索前往柏林去见希特勒，后者警告他，如果他不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德国便将支持哈查对斯洛伐克的管制主张。1939年3月14日，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了一份独立宣言。

当天夜晚，哈查总统及其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来到了柏林，迎接他们的，可想而知是希特勒的又一次愤怒的咆哮。在长篇大论地指责了一番捷克人的不端行为后，希特勒让哈查做出选择：要么是把自己的国家交给德国，要么是接受入侵和对布拉格的轰炸。哈查的心脏病犯了，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给他打了一针，使他恢复了知觉，以便让他在官方公报上签字，“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国家的命运交到德国元首的手中，”以“保全中欧这一部分的安宁、秩序与和平”。15日上午9时，德国军队进入捷克首都。希特勒当天晚上赶到了布拉格，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从而把捷克全境变成了德国的一个卫星国。在那里，他遇到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一年前在维也纳。捷克人民相对无言，脸色苍白，泪流满面。没有什么人按照纳粹行礼方式扬起手臂欢迎希特勒的驾临。

1939年3月21日，希特勒敦促立陶宛把梅梅尔区交还德国，次日登上了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于23日抵达梅梅尔。这时，立陶宛政府已经屈服了。虽然乘坐军舰害得希特勒晕船，但他又赢得了一次不流血的胜利。现在他的目光聚焦到了波兰。

希特勒曾经希望，波兰能够成为他在东方的征服战争中的二流伙伴，参加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并为德国在西线的作战提供后方掩护。虽然他想得到但泽，想在波兰走廊建造穿越两国领土的铁路和高速公

路，但也准备保证在今后25年里的波兰现行国境线不变。与此同时，他在3月25日命令德军做好发动进攻准备，代号为“白色方案”，进攻发起日期最早可在1939年9月1日。

波兰根本不想当从属于德国的第二小提琴手，而且也害怕苏联人的反应。3月26日，波兰外交部长贝克拒绝了里宾特洛甫就但泽问题提出的新要求。五天后，英国政府宣布把安全担保扩展到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作为对德国夺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反应。现在，德国和波兰走上了迎头相撞之路。4月28日，希特勒废除了两国1934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担心英法可能会与苏联达成协议，遂暂时把意识形态上的顾忌搁置一旁，同意了里宾特洛甫提出的与魔鬼打交道的建议。斯大林也急于 277 与希特勒达成一项交易，希望从中获得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的一部分领土，遂邀请里宾特洛甫访问苏联。里宾特洛甫8月23日抵达莫斯科，经过三个小时的谈判，两国就势力范围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时，希特勒已下定决心投入战争，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他改变主意了，而英国政府也毫无回旋余地地宣称，它将支持波兰人。8月31日下午，希特勒下达了次日凌晨4时45分对波兰发起进攻的命令。为制造战争借口，党卫队人员身穿波兰制服攻击了两国边境线附近的一家德国电台，但如此自欺欺人的把戏，又能骗得过谁呢？

希特勒的战争

德国人民对战争毫无热情。这一次，举国上下未像1914年8月那样陷入癫狂的兴奋状态。直到9月3日，英国和法国才向德国宣战，但这仍然令希特勒和德国民众感到意外和不舒服。希特勒本来希望能分别在东方和西方进行战争，使英国人保持中立，但这一愿望落空了。他发誓，在最终取得胜利前，他将永远不会卸下自己“神圣而宝贵的”制服，除非死亡。

德国不宣而战地入侵波兰后，战事很快便结束了。9月17日，苏联红军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及稍后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几个波罗的海小国。9月19日，希特勒在但泽发表演讲，声称：波兰已被摧毁，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站起来了。在遭受德国和苏联瓜分后，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从此沦为殖民地，成了人类最残暴压榨和迫害的对象。无论是苏联还是德国，都有系统地对波兰的统治阶级进行了清洗。数以千计的波兰军官，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秘密警察）的谋杀，尸体掩埋在卡廷森林附近的万人坑里。德国人的做法似乎还要彻底：海德里希准备了五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命令它们杀死波兰知识分子。就这样，成千上万的波兰专业人员被屠杀。到了9月27日，海德里希志得意满地宣布，至多只剩下3%的波兰领导层人士还活在人世了。与此同时，党卫队把波兰犹太人赶进了华沙、克拉科夫、伦堡、卢布林、罗德姆等地的犹太人隔离区。一些德军

官兵目睹了党卫军灭绝人性的残暴行径后深感震惊，开始对其上司甚至对希特勒表示抗议，布拉斯科维茨将军就是其中的一员。元首对这种“拯救大军的做派”不屑一顾，把布拉斯科维茨调到了西线。

1939年10月任命自己为“加强日耳曼种族国家委员会主席” 的希姆莱，提出了德国对波兰占领政策的基本思想：应当让波兰人认识到，“他们要服从德国人，要诚实、勤奋、态度良好，这是上帝的诫命”。血统良好因而可以成为德国人的孩子，将受到适当的教育。斯拉夫劣等民族将提供一支“俯首贴耳的劳动力大军”。截止1941年夏，已有100万波兰人失去财产，被迫迁移。这片土地转而由德国人殖民，而这些殖民者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

278 希特勒又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但德国的处境根本谈不上安全了。意大利已宣布保持中立，日本也是如此。德国的军火工业这时还未能转入战争轨道，其原材料供应仍严重依赖海外进口。更严重的是，德国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没有后者的帮助，它就无法发起对法国作战行动。在这种棘手局面下，希特勒决心尽快展开西线战事，必须迅速击败法国。至于英国，将被从欧洲大陆排除出去，最终也许会不得不接受他屡次提议的世界瓜分方案。到了那时，他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实现其在东方开拓一个帝国的雄伟大业了。

西线进攻行动先后29次被推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军方对此顾虑重重，所以声称天气条件太差，必须延迟战事。1940年4月9日，德国首先对丹麦和挪威发动了进攻，以确保来自瑞典的铁矿石供应，并加强其与英国对垒的地位。西线的战争始于5月，荷兰抵抗了五天之后投降。德军的主要攻势方向是经过阿登森林直扑英吉利海峡，一举包围了法国北部的英国和比利时军队及相当数量的法军。这时，希特勒命令德军坦克部队停止前进，英军和部分法军这才得以从敦刻尔克撤退至英国本土。德军之所以停止进逼，是由于其左翼处于危险的暴露状态，其后勤补给线已拉得过长，部队极度疲劳，坦克也急需维护保养。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21日，希特勒坐在福熙元帅1918年在贡比涅森林签署德国投降协定的同一节车厢里，签署了法国投降协定。

凡尔登防御战的功臣、如今早已年迈的贝当元帅，在南部地区组建了一个新的法国政权，行政意义上的首都设在维希。德国拿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虽然这两个省并未正式合并至德国。于6月10日违背希特勒愿望而向法国宣战的意大利，也得到了法国的一小块边境地带。法国北部则被置于军事占领状态。

希特勒这时仍然希望能与英国达成一项协议，但于1940年5月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用钢铁般的意志鼓舞国人继续战斗。7月16日，希特勒下令做好入侵英国的准备，代号为“海狮行动”。又过了三天，他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讲，呼吁英国政府“诉诸理性”，结束敌对状态。大

第271页图：1940年5月加莱一处十字街口在遭到德国空军轰炸后的景象。这一轰炸，是希特勒多次推迟后发动的西线攻势的一部分。



不列颠上空的空战，终于在8月13日爆发，但到9月16日时，却因损失惨重和天气不良，德国空军不得不将“海狮行动”行动延期实施。希特勒此番一反常态地对了解入侵英国计划的细节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原因在于他认识到掌握制空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有鉴于此，他从7月初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入侵苏联上来。

7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暗示，他不会愚蠢地坐视不管，听任英国被打败。希特勒这时坚决主张，必须在1941年春征服苏联。由于德国已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者，英国将被迫放弃战斗，美国也缺乏重整军备所需要280的时间，而到时候又会面对实力大大增强了的日本这个劲敌。出于这种考虑，希特勒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9月27日与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不过，这一盟约所收成效甚微。日本依旧保持中立地位，无意与德国人进行战略层次的协调。希特勒可以期望的最理想局面便是，日本这个种族上相当可疑的国度，能够把美国人的手脚牢牢拴在太平洋。他也曾试图把法国维希政权和西班牙拉到三国同盟中来，但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贝当要求与德国在一项正式的媾和条约向法国提供保障，而佛朗哥则十分滑头地装聋作哑。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来到柏林，带来了苏联在这场战争中要实现的目标：控制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并暗示将在今后把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西部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并入苏维埃帝国。希特勒的一位助手评价道：“M（莫洛托夫）把猫从袋子里面放出来啦。他（指希特勒）现在算真正解脱了，甚至连一时权宜之计也用不着了。”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期间，适逢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进行空袭，场面曾一度混乱。这件事过后，希特勒进一步认定，必须向东进军了，越快越好。12月18日，他签署了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的第21号指令，内容便是在1941年进攻苏联，即使到那时英国仍未被打败也要



德军士兵从战壕里把一种新研制的反坦克炮推出来。这种火炮便于隐蔽，用于保护前线部队免遭敌坦克攻击。

实施。希特勒要求对苏战争速战速决，以便使德国在 1942 年能以更坚强有力的地位与美国人作战。因此，对苏战事必须在 1941 年 8 月结束，以便使德军随后夺取英国在中东和直布罗陀控守的战略要地，经阿富汗向印度洋挺进。在这场“两种世界观的决战”中，希特勒交给了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一项“特殊任务”，明确地把党卫队从陆军中分离出来。陆军被告知，军人职业风尚将不再存在，官兵们将投入反对亚洲和俄罗斯人的威胁，捍卫西方文明的战斗，打一场铲除犹太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战争。

希特勒 5 月 13 日签署的关于巴巴罗萨作战区军事法的法令规定，凡针 281 对苏联公民犯罪的军事人员，将不会因此被送交军事法庭。他 6 月 6 日签发的那道臭名昭著的《政治委员命令》规定，一切被俘虏的红军政治委员必须立即枪毙。在出台了这些措施之后，陆军已经心甘情愿地投入到纳粹犯罪行为之中。党卫队特别行动队（SS Einsatztruppen）受领的一项特殊使命是，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对苏联犹太人的谋杀，以铲除“布尔什维主义的生理学根源”。德国陆军将为这些谋杀犯提供食品、运输工具和住所，因此也沦为谋杀罪的共犯。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开始了对苏联的进攻。

德军攻势有条不紊地展开。7 月 15 日，希姆莱提出了《东方总体计划》，规定将把 3100 万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德国将在东方进行殖民，劣等种族的“废物”将被“处理掉”。德意志东方帝国的建设任务，即由希姆莱全权负责。7 月 21 日，希特勒对克罗地亚国防部长科瓦特尼克说，他准备消灭欧洲的犹太人，首先是苏联，然后是欧洲其他国家。希特勒警告，如果有哪一个欧洲国家收容犹太人，那么这种做法不啻于充当了“致命病菌的孵化器”。7 月 31 日，海德里希从戈林那里接到命令，将为“在欧洲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戈林告诉他，这道命令是根据希特勒的旨意下发的。

到 7 月底，德军攻势逐步放慢了节奏。这一年的 12 月，苏联人在莫斯科前线成功发起了一次反攻。希特勒解除了大多数指挥官的职务，以便亲自指挥对苏战事。到这个时候，纵使是在纳粹政权领导层内部，也有一些人相信这场战争注定是打不赢的了。甚至是希特勒本人，也看出了这类迹象，声称：“如果德意志人民不够强大，如果他们未能为自己的继续存在下去做好献出鲜血的准备，那么，他们就应该消失，被另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消灭。”他表示，诚如此，他将不会为自己的德意志同胞浪费一滴眼泪。

希特勒计划到 1942 年在东南方向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但当年夏合围消灭红军的计划失败了。他立即下令 B 集团军群夺取斯大林格勒，向里海方向进攻，A 集团军群则向巴库推进。在北部战场，列宁格勒应予攻占并摧毁。10 月 23 日，蒙哥马利在阿拉曼发动攻势，从此，轴心国军队在北非战场走向了失败道路。11 月 19 日，苏联人的反攻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发起，保罗斯将军的第 6 集团军很快被包围起来。希特勒下令德军不惜一



上图：来自欧洲德占区各地的犹太人被送到纳粹灭绝营。90%的波兰犹太人（300万人）、56%的比荷卢三国犹太人（31万人）和1%的丹麦犹太人（70人）惨遭杀害。

下图：1945年5月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发现的这些订婚戒指，是从死难者手上取下来的。

切代价夺取斯大林格勒。1943年2月2日，保罗斯所属的剩余力量向苏军投降，共有9万人成为战俘；后来，这些战俘几乎无人幸存下来（被俘德军共有9.1万人，许多战俘由于次年春天伤寒流行而病死。根据联邦德国政府1958年发表的数字，后来有5000人有幸回到德国——译注）。虽然从战略层次看，希特勒下令在斯大林格勒继续战斗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样可以使德军主力从高加索地区解脱出来，于2月20日发动反攻，但这座城市终于成了德军的惨败之地。从此以后，希特勒再也无法被人们视作战无不胜的领袖了。在德国国内，希特勒的神话也开始减色，灾难就要降临了。

282 在此前的和平时期，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就充满了不同领域的激烈竞争和不同机构的彼此倾轧，程序政治原则从未得到良好的遵守。到了战时，这种现象愈益突出，混乱局面更加恶化。自从1937年以后，内阁便未再召开会议。戈林曾试图组建一个以他为首的部长会议，但希特勒视之为对自己绝对权力的威胁，因此撤销了这一提议。1939年11月以后，内阁便不复存在了。希特勒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那遥远而偏僻的统帅部度过的。在德占区的文职当局可以自行其事，往往无需理会柏林的政府各部的意见，而在德国国内，地方长官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各自统治着自己的采邑，由来已久的行政管理程序已与他们无涉。

负责在东方执行希特勒种族政策的希姆莱，权力越来越大。1943年，他又增加了内政部长这一重要头衔。1944年，他又被任命为陆军后备部队

总司令。与此同时，戈林的星光则无可挽回地黯淡下来了：德国空军未能打赢“不列颠之战”，他掌管的工业管理部门效率低下，他本人那种身穿缀满珠宝的制服到处乱逛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诟病。这时的戈林，主要精力改放在从欧洲各地的艺术馆里掠夺艺术品，以及打猎上。希特勒所垂青的那位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在军工制造领域展示了出众的组织能力，而戈林则被撇在了一旁。戈培尔仍忙于宣传鼓动工作，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发生后，他于 1943 年 2 月 18 日在柏林体育馆发表了一篇 283 著名的演讲，向听众提出了一个富有煽动性的问题：“你们希望进行总体战吗?”（所谓“总体战”，源于鲁登道夫 1935 年所著《总体战》，认为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争，为此必须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建设一支平时就做好战争准备的军队等——译注）在一段时间里，当希特勒面对失败不知如何应对时，成功地推动了他的双手的人，便是戈培尔。赫斯 1941 年驾机飞到了苏格兰后，希特勒的秘书鲍曼有效地控制了纳粹党，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事实上代替了德国政府的作用。他控制着哪些信息可以让希特勒了解，并以希特勒的名义下达命令。这个人既有狂热之徒的意识形态幻想，又有官僚的细致严谨，所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分子。



到 1943 年后，战争已不再被宣传为种族意义上的十字军东征，而是欧洲文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较量了，亦即宣传画上的文字：“你们的幸福寄托于欧洲的胜利。”

“最后解决”

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是 1941 年秋天在奥斯威辛、海乌姆诺、特雷布林卡、贝乌热茨、马伊达内克、索比堡等地的集中营里开始的。此前，虽然已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党卫队特别行动部队谋杀，但如今上演的如此规模的大屠杀，是行刑队或小型移动式毒气室无论如何也难以办到的。一方面要消灭犹太人，另一方面军工生产又急需他们来填补劳动力的不足，这无疑是个矛盾。所有集中营中规模最大的奥斯威辛，就明显体现出了这对矛盾：囚犯们一来到这里，先由党卫队医务官简单检查一下，把那些看上去适合劳动的人送到工厂，不太强壮者则送到毒气室。

在波兰，从其被德国军事占领的那一天起，便有数不胜数的犹太人遭到杀害。毫无疑问，关于消灭欧洲的一切犹太人的那道命令，始作俑者是希特勒，发布时间大致在 1941 年夏。这一决定的做出，既不是主宰犹太人命运的官员因为不知道怎样处置其掌管之下的犹太人，而在绝望和惊慌失措情况下出此下策，也不是希特勒试图抓紧时间完成其“历史伟绩”，而是他对苏联进攻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当时条件下，打赢对苏联的战争似乎还是十拿九稳的事。

1941 年 5 月 20 日，德国中央保安局发布命令称，鉴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毋庸置疑会出台”，禁止法国的比利时犹太人迁居他处。7 月 31 日，戈林指示海德里希，“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9 月，犹太人被强制每人戴上

一颗黄色的“大卫之星”（犹太人的标记，由两个等边三角形反向叠成的六角星——译注）。1941年秋，毒气室率先在海乌姆诺和贝乌热茨的集中营投入使用。此前，在被称作T4（柏林“动物园路4号”是希特勒的总理府地址）的“安乐死计划”中，毒气室已被用来处理精神疾病和家族遗传类疾病患者。在奥斯威辛，毒气室第一次使用时间是1942年1月。

1941年11月29日，海德里希发出会议邀请函，议题就是“最后解决犹太人”，地点在柏林的大万湖的原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办公地点（原文如此。国际刑警委员会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前身，1923年成立，总部设在维也纳。此处应指该委员会的德国分支机构——译注）。会期此后因故推迟，实际召开时间是1942年1月20日。这次会议时间很短，所使用的语言模糊不清，但主要目的是要向政府各部门表明，海德里希现在大权在握。

284 “最后解决犹太人”方案最终导致了约600万犹太人惨遭谋杀。要想理解这一政策的原因，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法理解也许倒是一件好事,因为理解往往要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宽容。这一从人类历史上恐怖得无以复加的惨剧中，人们能够看出意识形态上的狂热与盲从、冷漠他人生命的官僚化的严谨操作程序、原始而病态的行为方式，以及一个工业发达社会的技术能力。把这一最反人类的罪行化作国家社会主义永恒的耻辱柱，应当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希特勒政权赢得了它最夺目的光环。

国内战线

在德国国内，纳粹政权处心积虑地避免德国民众



在战争后期，德国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研制成功一种秘密武器以扭转不利战局了。V1和V2型火箭绝大多数都用来袭击英国伦敦周边地区。V1火箭速度较慢，破坏程度相对不大，但V2是一种超音速武器，往往在事先无法预警情况下突然命中目标，因而威力很强。

上图：英国人称作“嗡嗡弹“的V1火箭。

右图：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在布罗姆斯科钦缴获的V2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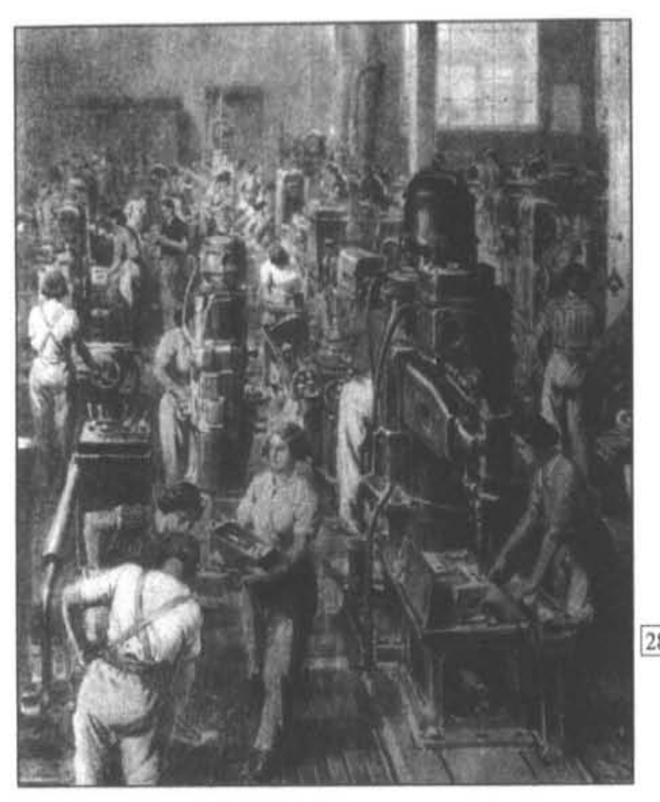
为了战争胜利付出任何牺牲。直到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那篇演讲之前，从未有人提到鲜血、汗水或眼泪等字眼。希特勒认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原因在于国内战绩的崩溃，因而下定决心不让国内的民心士气降低到如此之低的地步。出于这一目的，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都通过严格的战前计划工作、从苏联进口及剥削德军占领区等方式，予以保证。

到了1942年春天，食品定量不得不予以调低，此举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情绪。夏季在苏联发起的攻势，以及当年获得的良好农业收成，为克服粮食困难提供了可能。同年10月，肉类定量从300克增加到了350克。

纳粹政权面对劳动力不足，并不动员妇女参加工作，而宁愿使用外国劳工和战俘，先后把700万人运送到德国。这样，德国军火工业1/4、农 285 业生产近一半的劳动力是外国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斯拉夫劣等民族”，这对纳粹有关“鲜血与土地”的宣传构成了强烈的反讽。但也正是通过这种手法，德国得以避免了实行“总体战”政策。然而，这一局面随着戈培尔1943年2月18日发表讲话以推动希特勒采取措施而结束了。戈培尔讲话的到场听众都是事先精心挑选的，戈培尔的演讲从宣传手法上看也算得上是一篇杰作，但同时也意味着他已承认了德国的失败。早在一年之前，军工部长弗里茨·托特及其继任者斯佩尔便得出了结论：在经济上，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了。托特死于一场空难后，斯佩尔继续不遗余力地使军工生产高效运作。他在越来越大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却遭到了推崇小型、效率低下生产商甚于大型企业的纳粹死硬分子的反对，而这些人能够得到鲍曼、地方长官及党卫队经济学家奥托·奥伦多夫的支持。

当希特勒的威望在1940、1941年如日中天的时候，国内反抗力量似乎还是无稽之谈。到了1942年，战争局面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抵抗运动仍严重分化。其他反对派出于猜疑心理，对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加以孤立。从1939年8月到1941年6月，由于德国和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这些共产党人处于尴尬境地，从莫斯科那里不可能得到任何帮助。虽然他们能够利用“红色小乐队”等间谍网络，为苏联人提供价值巨大的情报，但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往往付诸东流，而且在战争结束后，不仅未能因为立下的功勋获得什么好处，反而有很多人被投入了“古拉格”（典出自索尔仁尼琴小说《古拉格群岛》，指苏联的劳改营网——译注）。纳粹政权的极端保守主义反对派，包括前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尔德勒、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等，都是反民主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相信，德国将能够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和抵御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而存续下去。还有“克赖斯索团体”，主要由年轻的、虔诚的基督徒组成，倾向于宗教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另外，一批年轻军官，包括冯·施陶芬贝格、冯·特雷斯可夫和阿尔布莱希特等人，大多数都是贵族出身，最初也曾对纳粹主义抱有好感，但在1938年11月的大屠杀和东方的残暴罪行发生后，逐渐与纳粹当局拉开了距离。

凡此种种，没有哪个密谋者希望恢复魏玛共和国，原因在于他们认



1943年的德国女子工厂的工人们。由于德国广泛利用外国劳工，所以需要在军火工厂工作的德国妇女人数并不多。到1944年秋，在德国的外国劳工人数约为800万人。近1/4的工厂工人是外国人，其中200万是战俘，250万人来自苏联，170万人来自波兰，130万人来自法国，60万人来自意大利。此外，还有65万名集中营囚犯在军火工厂干活，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约有一半的波兰和苏联劳工是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为20岁。

为，国家社会主义是民主制的产物，正是民主制度使得无知的群众拥有了过于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当中民主思想较为浓厚的人梦想建立一个超越党派因素的广泛运动，即一个荡涤国家社会主义一切污泥浊水的“新开端”。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没有谁怀疑必须把希特勒干掉，而且这只能通过军事政变形式才能办到。

在一次又一次试图终结希特勒性命的计划无疾而终之后，冯·施陶芬贝格1944年7月20日在元首位于东普鲁士的会议室放置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了，炸死了四个人，但希特勒虽然受了轻伤，却无碍性命。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他，激起了他的复仇心理。刺杀未遂事件的消息传出后，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深为震惊。他们把希特勒看作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看作处于如此危急的[286]战争关头的最后一丝希望。因此，已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大受损害的希特勒神话，这时反而又复活了，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利用。希特勒谴责“一切自称贵族的‘冯们’”（德国姓氏中带有“冯”的，一般均为贵族），下令进行血腥的报复。戈培尔被任命为德国总体战全权专员，不遗余力地增加武器生产量。所有活着的年龄在15至60岁之间的男子，都被征召加入了“人民冲锋队”（Volksturm），成为一支由装备低劣的孩童和身体虚弱的老者构成的衣衫不整的军队。希姆莱藉此机会，对军官团大加羞辱，掀起了新一浪潮的恐怖。在所谓“人民法庭”上，罗兰·弗勒斯勒总要当众羞辱一通受害者之后，才带着快意的神情把死亡判决书拿出来。谢天谢地，他后来被英国皇家空军的一颗炸弹死了。

战败

现在，这场战争已没有取胜的可能性了。在东线战场，中央集团军群1944年6月遭遇了惨败。此时，整个战线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了。与此同时，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正在向德国本土推进。盟军的空中攻势密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欧洲堡垒”已失去屋顶，德国的一座座美丽的城市变成了瓦砾场。在空袭中丧生人数达到了50万人，还有400万座住房被摧毁。斯佩尔知道，战争就要结束了。

这时的希特勒，退回到了他的幻想王国。他幻想盟国即将分崩离析，英国人会和他一道来对付苏联人。他宣称，他那新的“神奇武器”即V1和V2火箭，将为他带来胜利。在一场近于绝望的赌局中，他下令德军从阿登地区向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发动反攻。阿登战役的发动，不仅严重削弱了东线实力，而且在四天的凶猛反扑后，由于遭受惨重损失不得不停顿

下来。苏联人1945年1月12日发动攻势，红军野蛮的复仇之举，掀起了谋杀、强奸和劫掠的浪潮。随着其进攻势头迅速跨过奥得河，数以百万计惊恐万分的难民向西方逃去。对于苏军所“解放”的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不幸者来说，从红军那里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1月16日，希特勒回到了他在柏林总理府的地堡。这座位于地下20余英尺的与世隔绝的地堡，在令人恍恍惚惚的烛光下，俨然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对于德国各大城市无可挽回地变成一片片废墟，纳粹重要人物却大唱赞歌：戈培尔把持下的媒体宣称，“资产阶级在19世纪的所谓成就，终于被埋葬了”，这将为建立一个革命性的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铺平道路；希特勒告诉斯佩尔，盟军的所作所为，对于他们共同制订的重建这些城市的计划，是大有裨益的。3月19日，希特勒签发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及所有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落入盟军之手。斯佩尔倾尽全力，阻止地方长官们把这道命令付诸实施。 287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和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鲍曼、斯佩尔、里宾特洛甫、莱伊及部分高级指挥官一起，度过了他的56岁生日。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也赶到了柏林。两天之后，希特勒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俄国人已经来到了柏林郊外。他尖叫着，责骂与会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们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然后便抽泣起来，嘟哝着一切都完了，他只能开枪自杀了。4月29日，他与爱娃·布劳恩举行了结婚仪式，然后写下了政治遗嘱，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作战部长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任命戈培尔为总理。第二天，希特勒和他那刚刚结婚一天的新娘双双自杀，尸体迅即被焚烧掉。戈培尔及其妻子也自杀身亡，临死前还杀死了他们的六个孩子。鲍曼在逃出总理府途中被击毙，但尸体是在几年以后才被认定的。邓尼茨尽可能苦捱战局，以便使300万德国人从苏联人的手中逃出来。5月9日，德国人的作战行动停止了。5月23日，邓尼茨被逮捕。6月5日，盟国正式接管其征服了的德国。



亚琛遭到盟军轰炸机空袭后，幸存者们从废墟堆里逃出。虽然盟军的轰炸行动对自身军工生产造成的压力超过其对德国，但对德国民众的士气起到了严重打击效果。1943年汉堡遭受空袭时，约有5万人丧生。人们普遍担心，其他城市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第十二章　1945年后的德国

[288] 战后德国被划分为若干个占领区的方案，早在1944年9月便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决定下来了。到了1945年9月，又在德国西部以及大柏林增加了一个法占区。在1945年7、8月间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一致决定，纳粹战犯必须交由法庭审判，纳粹党员将不得继续担任官职，战后德国应允许民主政党和工会存在和活动，尊重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地方政府将由德国人在盟国监督下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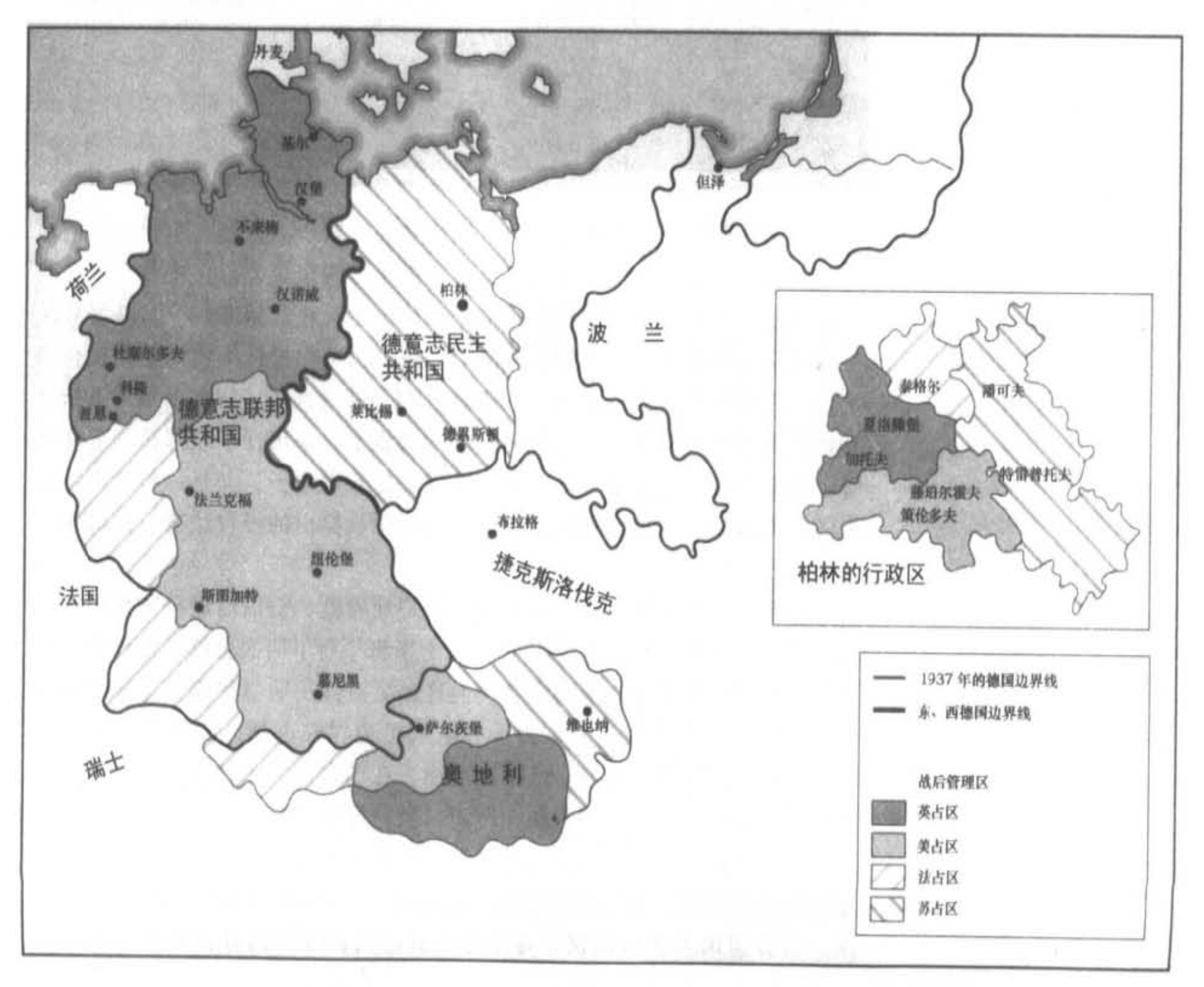
在苏联占领当局的严密监督下，德国共产党从1945年6月11日便恢复了活动，着手寻找联合执政的伙伴。1946年4月，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被迫与德国共产党合并，组成德国统一社会党。而在西方占领区，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盟国，都无意于如法炮制，搞那种枪口下的婚礼，所以共产党依然独自行事。在西方占领区举行的第一次联邦选举中，共产党人仅获得5.7%的选票。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去了一只胳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经当过国会议员，后来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可怕的10年岁月。他是一位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分子，虽然算得上是彻底的民主人士，但在管理自己的政党时，采取的却是一套铁腕政策。舒马赫作为热烈的民族主义的鼓吹者，决心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确保德国的统一，恢复其在世界民族之林应有的地位。但鉴于盟国对德国的深深戒心，鉴于冷战已走上历史舞台，这种想法显然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空想。同样，他倡导广泛实行国有化，并实行政府控制经济的政策，也很难为他赢得多少支持。在西方占领区举行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29.2%的选票，而基督教民主联盟由于成功地合并了一系列中间派别和右翼政党，创造了一个稳固的资产阶级集团，获得了31%的支持率，从而战胜了社会民主党。

德国的分裂

在最初几年里，基督教民主联盟强调基督教社会思想。该党高举自由财产的大旗，但同时认为，拥有财产的人必须同时对弱势群体担负起责任。基民盟一开始也曾主张对关键行业实行国有化，但迅即放弃了这种左翼思想，转而全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基民盟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是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创立前后一个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并以其名字命名了一个时代。阿登纳出生于1876年，当选总理时已经73岁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曾担任科隆市长，曾与纳粹分子发生过激烈冲突。作为莱茵兰人和 [289] 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普鲁士一丁儿点好感也没有。在他看来，正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政策，使德国陷入了灭顶之灾。阿登纳的一项非凡成就是实现了西德与法国的和解，建立了他希望能够成为新欧洲之基石的法德同盟。在目睹了德国遭遇的种种事件后，他再也不曾对自己的国家建立起什么信心。在他看来，德国犹如一门放在甲板上的大炮，而他要做的就是用西方联盟这根缰绳系住联邦共和国。虽然他激烈地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但阿登纳并非教条主义的自由派，而是不折不扣地履行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思想。从个人作风上看，阿登纳颇为固执己见，身上带有威廉一世、俾斯麦、兴登堡等先人的影子，不过他的业绩与这些前驱相比，要大于任何一位：正是阿登纳，创建了一个光荣的、稳固的、冷静的民主政体，使国人摆脱了历史上曾屡次使德国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种种狂热、迷信和傲慢自大倾向。





战后德国所独有的“瓦砾妇女”，用自己的双手清理德国遭受重创的城市废墟。图为妇女们排成人链，在德累斯顿清理废墟。盟国1945年的轰炸行动，摧毁了这座城市70%的建筑物。根据该市警察局长的报告，约有2.5万人死于轰炸，3.5万人失踪。

与基民盟和社民党相比，自由民主党规模较小。这是一个自由派的政党，既反对社会主义又反对宗教思想。由于另两个主要政党中都有强大的自由派别的存在，更由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色彩越来越少，基督教民290主联盟也逐渐淡化了基督教义的影响，自由民主党发挥影响的空间便相当小了。在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11.9%的选票。特奥多尔·豪斯从1948年起担任该党领导人，在阿登纳的劝说下，他出任了联邦德国首任总统。豪斯出生于士瓦本，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自由派，虽然他当年曾经投票支持希特勒提出的授权法案，因而酿下了大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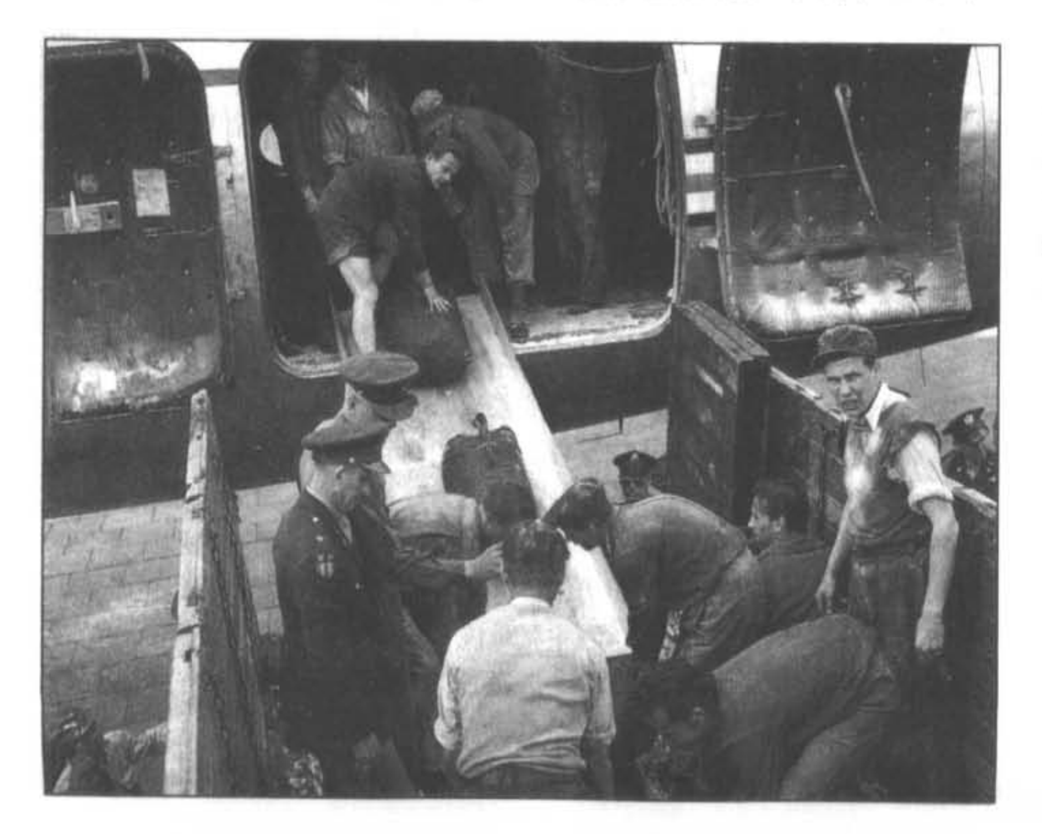
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很快便能清楚地看到，德国已经很难保持统一了。西方占领区各州的总理1946年在不来梅举行了两次会议，1947年6月又在慕尼黑召开了一次全德大会，但这次会议除了明显暴露出东部和西部的差异性，什么成果也未取得。苏联人迅速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了根本改革，使得德国的统一事实上已不再可能。在苏占区，土地改革已经展开，工业企业和银行实行了国有化，所谓“资产阶级对教育领域的垄断”也被打破，从而使得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被排斥在这一行业之外。苏联人还违反波茨坦协定，从自己的占领区把财富、物资和专业技术人才掠夺到本国，西方盟国为表示抗议，遂停止从自己的占领区向苏占区发送工业设

备。苏联关于建立一个“联合盟国委员会”以管理整个德国的动议也胎死腹中，其在鲁尔工业区分一杯羹的企图落空了。

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时称，应当由德国人民自由地、不受外部大国势力干涉地处理自己的事 291 务。他建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该把各大国占领区合并组成一个经济区，并建立新的德国政府。美国人当然知道，苏联人不会接受这类主张，所以贝尔纳斯的潜台词是德国东西分治。英国人已经愿意接受一个西德国家，但法国人这时仍激烈反对。为了在经济上支持该方案，美国于1947年推出了“马歇尔计划”，以推动德国的重建，并将之融入西欧。这项计划打消了法国人的疑虑。占领军的开支得到了削减，美国1948至1952年间向西欧提供的170亿美元的援助，为美国商品提供了可观的市场。

“马歇尔计划”既已出台，德国的分裂便成为不可避免了。资本主义的西部地区从此迎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苏占区在社会主义官僚制度和斯大林主义正统学说的束缚下，则陷入了停滞状态。1948年6月24日，苏联人关闭了所有通往（西）柏林的陆上通道，在此后的11个月里，这座城市依靠盟国的空中运输维持生存。柏林空运雄辩地显示了西方的团结，证明了美国的价值，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对欧洲担负的责任，强化了西方抵制共产主义的决心。对柏林的封锁也使法国人最终认识到，必须接受把西方三个占领区合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西德国家的方案。

1947年1月1日，美占区和英占区在经济上联合组成“双占区”。6月，由来自各州议会的代表组成了“经济管理委员会”。到了1949年



1948年7月8日，煤炭由飞机运抵柏林。当天共出动25架飞机，使用5000只军用工具包，共计装运了200吨煤，在柏林的藤珀尔霍夫机场卸在卡车里。

4月，法占区也加入进来，从而变成了“三占区”。同年5月，来自各州 292 议会的65名代表组成了“议会委员会”，着手起草新国家的宪法。西德国家的建立，由此又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该委员会起草的《基本法》获得了各州议会以及西方盟国的批准，于5月23日正式生效。《基本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在其基础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

《基本法》淡化了魏玛宪法的平民政治色彩，大幅度增强了下议院（联邦议院）的权限。联邦议院选举采取直接选举和按比例分配相结合的方式。由于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所以那些从较大政党中分裂出来的派别，要想赢得席位，希望便相当渺茫了，虽然此类派别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非常尴尬了。

阿登纳时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联邦议院的选举于8月14日举行。结果出来后，不免令《基本法》的设计者们失望了：三个主要政党，即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及它在巴伐利亚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虽多方努力，总共也只获得了70%的选票，而其他8个较小政党也获了联邦议院席位。阿登纳建立了一个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自由民主党（FDP）和德意志人党（DP）组成的多数联合政府，但到了9月15日那一天，还要靠自己投自己的票，才得以当选为总理。由于阿登纳在自己的政府里占有明显的主宰地位，一个新的词汇很快便应运而生了，即“总理制民主”，但因为不断遭到舒马赫的攻击，阿登纳决心还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虽然宣告成立了，但并不能算是完全的主权国。一直到1955年以前，联邦议院通过的所有决议案，如果得不到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的副署，将无法成为法律。这种现实迫使阿登纳密切关注对外政策问题，并与西方大国进行紧密的协调。幸运的是，政治局势的需要恰恰与他的愿望不谋而合。

1949年11月22日，阿登纳与西方盟国签订了《彼得斯贝格的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不久将停止那些战时制造武器装备的工厂的拆迁赔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管理鲁尔区的盟国管制机构。其后，联邦议院围绕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舒马赫指责阿登纳是“盟国的‘总理’”，导致阿登纳的议员资格被停止20天。社会民主党宣称，联邦共和国应不再向同盟国做任何让步，而应全力维护其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利。然而，鉴于双方实力对比的极大悬殊，这种主张只能是一种完全缺乏现实可行性的臆断罢了。阿登纳秉承其务实的、渐进的思路，把反对派称作“永远说‘不’”的政党。

1950年，阿登纳接受了法国外长舒曼的计划，即建立一个由法国、比

293

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

小说《浮士德博士》，内容是作曲家阿德里安·勒沃库恩的传记（书中假借其友人塞里纳斯·蔡特布洛姆之口讲述，作品的全称是《浮士德博士：由一位友人讲述的德国作曲家的一生》）。勒沃库恩为了摆脱自己所遭遇的创作危机，与魔鬼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一情节隐喻德国在20世纪经历的政治、艺术和社会危机。小说藉此对德国这样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何以陷入纳粹时期的粗陋野蛮，进行了反思。

勒沃库恩于1885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即展现出过人的天份，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兴趣，但后来被音乐的魅力所吸引，认为音乐中既有数学般的严谨，又充满了神秘的、不可知的精神感召力，遂放弃了神学研究，转而为成为作曲家而奋斗。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的创作能力，而且深信艺术已陷入严重危机，艺术表现形式已经只剩下了拙劣的模仿和四平八稳的中庸之道。

勒沃库恩与魔鬼的协议并不像传统故事中那样是用鲜血订立的，而是通过与一个妓女性交，并因此染上了梅毒。四年以后，魔鬼亲身来到了勒沃库恩的面前并向他保证：他将得到出类拔萃的创造力，作为交换，魔鬼将得到他的灵魂，勒沃库恩必须放弃爱。此后的19年，勒沃库恩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创作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其中的巅峰之作是《浮士德博士痛苦的呐喊》。在完成自己的名篇之后，勒沃库恩把友人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坦白了一切。不久，他因中风而瘫痪，并患上了精神病，1940年去世。



小说对勒沃库恩这个人物的刻划，源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生平事迹，很多情节都可以从尼采那里找到出处。作品中，故事的讲述者蔡特布洛姆在1943至1945年间写下了自己的传记，由此，托马斯·曼可以借他之口，对战争进程和纳粹党的覆灭进行评论。蔡特布洛姆是一位与勒沃库恩完全不同的人，他头脑冷静，书卷气十足，富有人文关怀精神，与主人公勒沃库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蔡特布洛姆代表了那些拒绝与黑暗势力作任何交易的正统德国资产阶级人士。

《浮士德博士》构思虽然巧妙，但它未能对“德国病”和纳粹梦魇进行应有的分析。也许，托马斯·曼（德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01年发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浮士德博士》是他在二战后完成的作品——译注）太过于专注作品的精美构思了，反而听任纳粹主义的现实从眼皮底下一晃而过。

托马斯·曼（1875—1955年）的肖像，作于1948年。

荷卢三国经济联盟、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组成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阿登纳总理认识到，通过欧洲的一体化，联邦共和国将得到天赐良机以期被接纳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伙伴，而且这一主张对那些反感民族主义的年轻一代，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然而，舒马赫及其社会民主党，仍把“舒曼计划”视作法国资本家企图操纵德国工业的一项阴谋，而予以排斥。

围绕德国重新武装问题，国内与国际上都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阿登纳认为，共产主义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联邦德国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从《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签署之日起，他便一直盼望能够成为北约成员国。在他看来，加入北约将使联邦德国在通向完全拥有主权国家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个步骤。当然，要使这个国家重新武装起来，还需要 294

克服许多问题：希特勒刚刚灭亡5年，便重新建立一支国防军，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西德如果建立一支军队，即使被纳入到北约控制之下，法国也会持强烈保留态度。

社会民主党反对重新武装主张，认为这样做势必使德国的统一在事实上失去可能。在该党看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防务，应该交由北约负责。这种观点，对于持“不是我”主张、无意于在军中服役的年轻一代，颇具吸引力，但与对待与盟国的关系一样，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又是未能正视冷战现实，因此其关于建立集体安全的主张，只能是幼稚的、不切实际的空想。1952年3月10日，斯大林宣称，德国可以实现统一，而且只要它保持中立地位，甚至可以拥有一支国防军，这似乎给了社民党以及其他反对重建军备的人某种鼓励。但对斯大林的提议，阿登纳不假思索地表示了拒绝。他决心继续推行与西方紧密合作的政策，深信所谓的德国保持中立，只会使它严重依附于苏联，甚至变成共产主义国家。虽然阿登纳的这种做法当时遭受了强烈抨击，但今天再来回顾一下这段岁月可以发现，他对苏联意图的判断非常准确，而且斯大林的提议确实不意味着德国统一便拥有了可靠的基础。此外，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都不大会接受一个处于苏联阴影之下的所谓独立的、中立的德国。在1953年秋的大选中，基民盟/基社盟获得了45.2%的选票，社民党仅获得28.8%。这一情况表明，大多数西德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府实现的经济成就，而不是被政客们和新闻界连篇累牍大加炒作的民族问题。

康拉德·阿登纳领导的基民盟1957年9月制作的一则竞选海报。上面的文字对社民党的有关主张，即德国应脱离北约，只有实力地位才能带来多边裁军等，进行了抨击。



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它也加剧了财富的悬殊。但到1950年初，生产出现了下降，失业人数达到了近200万。1948年6月20日，西占区开始使用一种新的货币，即德国马克，而旧货币即帝国马克21日起正式作废。每个德国人都领到了40新马克。这项改革显然有利于那些拥有不动产、货物和机械设备者，不可能创建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一方面是数量巨大的失业大军，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市场经济之机赢得了大笔财富的新生富裕阶层。资产阶级保守分子对这个时代粗鄙的拜金主义思潮痛心疾首，而社会民主党则把这些现象看成是“社会市场经济”既不公正也缺乏效率的铁证，要求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尔哈德仍然坚定地信奉自己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理论。稍后，借助于朝鲜战争对经济生活的有力刺激，联邦德国经济很快便取得了近8%的增长率，而且在

整个50年代一直维持了这种高速度。尽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全社会几乎每个成员都享受到了“经济奇迹”带来的好处，而且国家提供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对收入较低者提供保护。面对艾尔哈德的政策取 [295] 得的不容置疑的成功，社会民主党开始与教条的社会主义经济主张拉开距离，但充其量也只能宣称，艾尔哈德关于“一切人的繁荣”的诺言完全是个骗局，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事实上，从1950年到1962年间，工人收入平均增加了两倍半，所以那些本来可能投票支持社民党的工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赞同基民盟的竞选口号“不做试验”的。

阿登纳政府的成功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社会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艾尔哈德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只能通过鼓励那些可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鼓励投资），间接地干预经济生活。由于联邦德国刚刚成立后，资本市场相当有限，国家对那些难以带来丰厚利润的领域提供了投资资本。1950年，投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2.8%，到1965年上升到了28.8%。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市场必须保持竞争，不得由垄断势力所主宰。在经历了长期的辩论之后，《反对限制竞争法》(即《市场经济基本法》)于1957年获得通过，但所起作用甚微，联邦德国依旧是卡特尔（独立公司或个人为了对某种或某类商品的产销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或垄断影响而组织的联盟——译注）和信托公司的乐园。

政府采取财政措施，并通过货币贬值不断推动工业品的出口，使之成为“经济奇迹”的强力发动机。联邦德国没用多少时间，便开始在国际货币领域扮演起重要角色，并于1949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开发组织。次年，它又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52年加入了国际货币易基金组织。从1952年起，它在贸易领域获得顺差，到1960年时，它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大国。

“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成份，在《基本法》中得到了确立，虽然第20条的规定其实非常含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实行民主和社会福利的联邦制国家。”建国不久，联邦德国便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一切公民都应得到安全网络的保障，其生活不得低于公认的最低生活水平。国家对其公民承担的这种保障责任，在宪法法院早期的一次判决中得到了阐发。同时，人们也普遍认同，富裕阶层应当对弱势群体承担一定的义务。1952年《分担责任法》的出台，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该法案规定征收特别税，以对数百万难民以及遭受希特勒战争和苏联迫害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后来，为了支付重新统一所需的天文数字般的费用，德国于1989年以后也采用了这种做法。1957 [296] 年，养老金平均增加了65%，此后则根据经济增长情况按比例予以提高。由此，养老金领取者也能够分享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了。

盟国在西占区曾成立了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德国州际银行”（1948年3月1日，英美双占区在法兰克福成立德国州际银行；同年6月16日，法占区各州中央银行加入——译注），直到1957年，才被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即联邦



战后联邦德国的工会是按照行业划分进行组织的，所以每个企业只能有一个工会代表工人利益。法律规定，所有雇工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煤炭业和钢铁业企业，管理委员会中都必须有若干位工人代表，企业理事会中也必须安排一名工人。经济的不断扩张、工会领导人的负责，共同创造出稳定的劳资关系，管理者和劳工均从中获益匪浅。

银行所取代。联邦银行基本上完全独立于政府，它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不考虑短期的政治收益。正由于这一原因，政府与联邦银行之间的关系，常常会变得很紧张。联邦银行成功地防止了通货膨胀，保持了马克的坚挺，使德国马克从1958年起可与美元自由兑换，成为世界上主要货币之一。

1949年，德国的16家工会联合组成了"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一项纲领鼓吹对关键行业进行国有化，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制度，倡导企业民主。在阿登纳执政时期，鉴于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这项纲领就像社民党的主张一样不合时宜。因此，工会联合会于1963年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较为温和的另一项文献。此后，工会接受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把主要精力放在面包与黄油问题上，从而变成了多元社会的参与者。代表劳工利益的组织，面对的是代表雇主利益的组织，即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BDA)以及势力更大的德国工业联合会(BDI)。虽然它们偶尔会故态复盟，把"赤色分子"的帽子扣在工会组织头上，但大体而言，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中庸的态度，把对方作为谈判的伙伴。

297 除了企业的劳资双方共同决策、救济难民、住房与福利等重大社会问题外，在阿登纳执政时期的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社会民主党宣称，德国加入欧洲防务联盟违反了《基本法》。(1952年5月27日，联邦德国和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签署了将建立"欧洲防务联盟"的条约，但因法国国民议会1954年8月30日予以否决，该条约遂

无法落实——译注）除非改变宪法，政府必须在联邦议会和联邦参议院均获得2/3多数，如果得不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这一点是无法办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设法使总统撤销了有关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解释的要求，使《欧洲防务联盟条约》于1953年3月通过简单多数获得通过。在同年9月进行的选举中，阿登纳得到了他所需要的2/3多数，对宪法进行了修订。

1953年的大选表明，联邦德国已经成为组织严密的民主国家。这一年的2月，联邦政府宣布接受"第三帝国"时期欠下的外债后，战争赔偿工作宣告终结。这一举措为新生联邦德国赢得了良好的信誉。与此相似，向纳粹统治下的受害者做出赔偿这项慷慨大度法律的出台，既是为实现德意志人与犹太人的和解这一艰巨的任务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向世人宣示，德意志人民勇敢地为当年犯下可怕罪行承担起了责任。新纳粹分子的社会主义帝国党（SRP）1952年被禁止。1956年，德国共产党（KPD）也因为违反宪法而被法律禁止活动，虽然该党从1953年起，已经影响很小，在联邦议院无法得到席位。

数量相当之多的前纳粹政权官员，在联邦德国时期继续担任一定的职务，在文官队伍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这种情况自然会损害联邦德国在外国的形象，而东德宣传部门也以之为口实，对西德的声誉进行攻击。不过，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这些前纳粹官员的留任，对西德建立和发展健康的、民主的社会，构成了多少阻碍。究其原因，一是官僚们就像当年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自然不会与新生政权作对，二是随着国家机构的日益膨胀，这些历史上存在污点的官员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官僚队伍在不断壮大之后，已经无法像传统上的德国官员那样，以精英之士自居了，而是汇集了方方面面的务实而各有专长的人员，共同管理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因此，严格的意识形态分野，对官员的选用越来越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些继续任职的前纳粹分子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当数汉斯·格洛布克博士（格洛布克是阿登纳的重要助手——译注）。此人曾为"纽伦堡法律"这份纳粹种族主义政策重要文件（纳粹政权1935年颁布，宣布剥夺犹太人公民权——译注）撰写官方评论，现在则是阿登纳总理办公室的主任。可以说，格洛布克是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文官，而他身上那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当然是很不幸、很令人难堪了。然而，他又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管理者，能够高度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说，阿登纳离不开他的帮助。事实上，人们找不出他在什么地方曾不当利用自己权力的证据，而且公认他在担任高级职务人士中属于出类拔萃的一员。围绕格洛布克的争议，引发了道德、勤勉和如何 [298] 处理与公众关系等问题，但不管怎样，任用此人并不意味着年轻的联邦共和国准备走上邪恶的第三帝国老路。

与之相较，法官们不愿意谴责那些在第三帝国时期做出令人愤慨判决的同僚，问题要严重得多。他们之所以对此类不当判决不予改正，理由大致是判决在当时并不违法，而且也符合现行的司法程序。因此，那些犯有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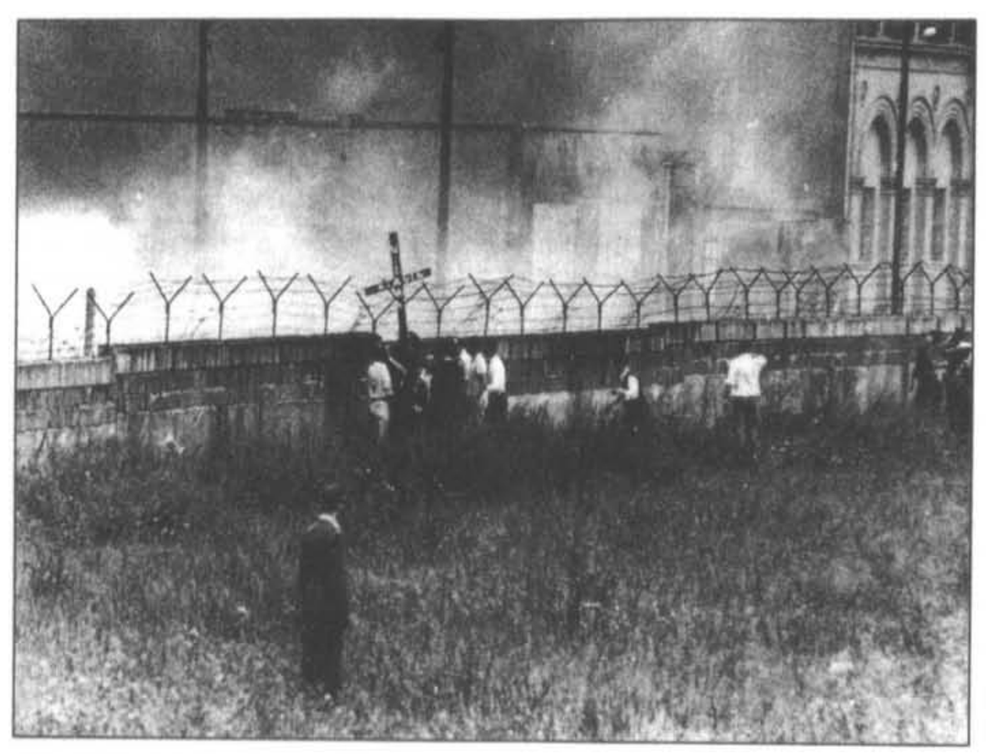
的法官，一般仍能获得一份养老金，虽然沦为其不当判决的受害者失去了这份福利。也许，这便是德国司法制度传统最不合乎情理的一面吧。同样，共产党人在纳粹统治时期遭受迫害，本来应当得到一笔补偿金，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实现。虽然司法系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比以往敏感了不少，虽然年轻一代的法官并没有不可告人的经历，但很多令人发指的历史案件，仍然被过于宽容地网开一面了。

关于德国的重新武装，法国人最终改变了反对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高明外交艺术。1954年10月，"煤钢联营"六国及美、英、加拿大签署《巴黎协定》，主要内容有：联邦德国被接纳为北约成员国；废除对联邦德国的占领；联邦德国成为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协定于1955年5月5日正式生效。为了打消法国人的疑虑，阿登纳被迫接受了法国的提议，即：萨尔区是否交由欧洲联盟管辖，由萨尔区当地居民自决。由于阿登纳未反对该项协议，再次遭到了缺乏民族精神的指责。反对派称，他正在像过去出卖了东德人一样，现在又要出卖萨尔区了。不过，萨尔区居民在随后举行的公投中，以压倒优势反对归由欧洲联盟管辖，法国人不得不同意把该区交还德国。

无论是阿登纳还是他那位精力充沛的国防部长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都决心用最先进的武器来装备新建立的德国军队——联邦国防军，其中包括原子武器的投射系统。当然，两个人都无意于使联邦德国拥有原子武器本身，相信应继续由美国掌握之。但在反对派以及许多对核武器扩散问题高度关注的德国民众看来，阿登纳和施特劳斯的这种做法，是向危险的道路上滑出了第一步。不幸的是，阿登纳对于他基本上一无所知的战术核武器问题，发表了大量的不无歧义的谈话，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政府希望拥有一支核武装的联邦国防军。1958年，德国版的核裁军运动组织即"为反对核死亡而斗争"(CND)宣告成立，掀起了战后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社会民主党、工会、宗教界很多人士和和平主义者、激进知识分子、共产主义者，均与这一组织建立了联系，使之迅速变化成为理想主义者及其同路人的一个外围组织，但随着来自苏联的核威胁越来越不容忽视，头脑更加冷静的一些人离开了它。

299 导致"为反对核死亡而斗争"运动在德意志大地所获支持减少的一大因素，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58年11月27日挑起的柏林危机。赫鲁晓夫要求西方同盟国从柏林撤走军队，使柏林非军事化并获得"自由市"地位。他还警告说，如果西方拒绝这些要求，那么通往柏林的一切交通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控制，苏联将单独与民主德国缔结一项和约。

这场柏林危机持续了近三年之久，最终导致了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的筑起，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修建这道墙，是为了阻止人民前往更具吸引力的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联邦德国的一大胜利，但同时也使世人看到，德国的统一已经遥遥无期，*必须丢掉任何幻想*



柏林墙于 1961 年建成后不久，西柏林青年手举上书“我们谴责”字样的十字架，沿着这道墙游走。东德警察向示威者发射水炮，而西德警察把催泪弹扔过墙去，以示报复。

了。虽然西方大国仍守护着西柏林，虽然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了“我也是一个柏林人”的讲话，但美国人清楚地表明，德国统一并非其当务之急，美国更加关心的是维持欧洲现状。

阿登纳相信，美国试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努力，已使得德国统一的希望完全破灭，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集中考虑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并得到了戴高乐的积极反应，因为这有助于加强他在美国人面前的地位。1963 年 1 月 22 日，两国在兰斯大教堂签署了《法德条约》。该条约也许是阿登纳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构成了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戴高乐所取得的收获，可能比阿登纳要小一些。在联邦议院，围绕批准该条约的辩论，使得文件中反对美国的调门有所降低，并重申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其作为北约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所承担的义务。

一方面是阿登纳内外政策所取得的无庸置疑的成功，另一方面是自身 301 在 1957 年联邦议院选举中遭遇的惨重的失败，迫使社会民主党对自己的立场作出反思。1959 年，该党在戈德斯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的党纲，摒弃马克思主义残余，吸引了阿登纳的融入西方政策，并把自己称作拥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的政党。1961 年，维利·勃兰特作为西柏林市长，以其在柏林危机中的无畏表现，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颂扬，接过了党的领导权。从勃兰特身上，体现了这个革新后的党的务实、亲西方、开放的党风。在 1961 年的大选中，阿登纳领导的竞选工作异常糟糕：他放低宣传调门的水准，竟把批评矛头指向勃兰特的背景，说他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移民的，说他出身于目不识丁的家庭。正是在这次选举中，基民盟/基社盟失去了绝对多数地位，而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从 31.8% 上升到了 36.3%。

300

明镜事件

1962年10月8日出版的一期《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有关北约举行的代号为"法莱克斯62"机动演习的文章,指出了西德防务问题中存在的一系列缺陷。次日,联邦检查官即启动初步调查程序,调查该文是否泄露了国家机密,并责令国防部长报告是否存在机密泄露问题。国防部长10月19日回答称,《明镜周刊》掌握了机密信息,发表的文章对国家构成了损害。10月23日,联邦法院的预审法官签署了对该刊所有人鲁道夫·奥格施泰因及编辑部多位工作人员的逮捕令。

10月26日至27日夜间,周刊在汉堡和波恩的编辑办公室遭到搜查,其在汉堡的主要办公室被查封,直至11月26日。奥格施泰因及多名编辑均被逮捕。杂志的军事记者、副总编缉康拉德·阿勒斯当时正在西班牙度假,也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不得不飞回德国。对阿勒斯的违法逮捕,是根据国防部长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下令。

在签署逮捕令数日之后于26日至27日夜间对上述著名记者的逮捕,酿成了一桩公开的丑闻。为证实该周刊此前对国防部长在另一桩事件中涉嫌滥用职权的报道,联邦议院于10月25日进行辩论。人们普遍猜测,《明镜周刊》事件源于施特劳斯对这家杂志的报复之举。

阿登纳11月7日缺乏深思熟虑的一次讲话,更令事件火上浇油:他指控《明镜周刊》为谋取经济利益而不惜叛国。议员们这时得知,司法部长在事件发生前未能按照法定程序所规定的那样了解即将进行的逮捕情况,而内政部长也承认,他实施了"某种法律之外的行为",但之所以这样做是情势所迫。

当人们清楚地了解到,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自己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并未对联邦议院说出实情时,按照议会惯例,他理应提出辞职,但施特劳斯拒绝这样做。埃里希·门德宣布,自由民主党已无法继续留在政府中与施特劳斯共事,5名该党籍部长辞去职务。基民盟/基社盟的部长们也宣布辞职。在这种情况下,阿登纳得以与自由民主党共同组成了一个不包含施特劳斯在内的新一届联合政府。

《明镜周刊》事件的后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它是一起动用非常可疑的手段,迫使持批评态度报刊缄默的尝试,而这种行径在德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不幸的传统。另一方面,在事件发生后,法治原则得到了坚持,民主议会政治制度得到了尊重,愤慨的民众对逮捕记者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民主赢得了胜利,言论自由得到了增强。



工作人员把装满了被没收报刊的洗衣篮搬回《明镜周刊》编辑部。

由于联合政府中的合作伙伴自由民主党在竞选期间打出了这样的口号:“与基民盟/基社盟在一起,但不要阿登纳!”阿登纳在筹组新一届政府时遇到了很大困难。显而易见,这位总理已经在走下坡路,不可能度过这场政治考验了。特别是《明镜周刊》事件的爆发,导致内阁全体成员辞职之后,阿登纳的政治生命已指日可数。1962年12月11日,他组建了自己的新一届政府,不过他现在已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一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上来:阻止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成为自己的继任者。当然,他认为艾尔哈德缺乏对外事务艺术,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不管怎样,党还是在1963年4月把艾尔哈德选拔为他的继承人,使“老人”不得不再次遭受屈辱。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辞去总理职务。

阿登纳时期的文化艺术

阿登纳执政时期,联邦德国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不过其主题大多是批判主义的。托马斯·曼在其194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中宣布,资产阶级时代已经完结,传统艺术、哲学、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已随之化为历史陈迹,德国文化已经被它自身所包含的邪恶的臣服主义内核毁灭。哲学家西奥多·W·阿多诺(1903—1969年,德国哲学家、音乐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新音乐的哲学》、《否定的辩证法》、《社会批判论集》,以及与霍克海默尔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等——译注)1949年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返回德国。这时的他,对作为“天生革命军”的无产阶级丧失了信心,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价值观感到绝望。他宣称,自从奥斯威辛(大屠杀)之后,再也不可能有什么诗歌了。

1947年,一群作家聚集在一起,探讨战后德国文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不久以后,他们便以其“四七社”这一文学团体而名闻遐迩了。这些作家认为,多年来对文字的滥用、语言中旨在掩盖可怕现实的种种修辞手法的“发明”,已令浓墨重彩的文学手法归于破产,因此,他们今后应明晰地、直白地写作。日常会话体的语言文字,才能揭露伪装下面的真相,而文学化的语言往往会掩盖真实情况,读者除非透过字里行间认真研究一番,否则便会沦为其欺骗的对象。

但对于其他作家来说,放弃文学创作中的修饰和隐喻风格,毫无人们所 302 熟悉的那种防护地直描抒写现实,既未必可行,更缺乏必要性。这一时期联邦德国最著名的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1886—1956年,著有诗集《陈尸所及其他》、《肉》、《蒸馏》、《尾声》,小说集《大脑》、《征服》等——译注)在其影响面相当之广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两难困境。以埃里希·凯斯特纳(德国作家,1952—1962年任联邦德国笔会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E.K.博士的家庭诗歌药箱》、《查阅自己写的书》,长篇小说《法比安——一个道德家的故事》,儿童读物《艾米尔捕盗记》等——译注)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则怀着感伤的思绪,回

顾那已被摧毁殆尽、如今已难以再现的充满荣耀、智慧和欢乐的黄金时代。冈特·埃希(联邦德国诗人,二战期间应征入伍,曾被美军俘虏。晚年迁居奥地利。著有诗集《偏僻的田庄》、《地铁》、《雨的音讯》等——译注)运用“四七社”倡导的简化论,力避人为雕饰和无病呻吟,创出了洋溢着力与简约美的诗歌。

在阿登纳执政时期,德国人民的创造天赋集中用于经济重建这项宏大工程之中,魔术一般被唤醒的财富,与昔日的艺术传统一起被加以美化。托马斯·曼的文化残片,很快便被作为德国文明这一伟大文明的古代遗迹顶礼膜拜。按照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契的话说,文化变成了“托辞”,即避免与第三帝国那种审美上的粗鄙发生冲突的手段。

知识分子们操起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他们的大祭司是西奥多·W·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尔,他们的大本营是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是当今西方世界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其名称来源是由于该学派学者大多曾经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这个研究所创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希特勒上台后迁到日内瓦,后迁巴黎,战后霍克海默尔回到西德,重新建立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译注)。这些知识分子主张,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很多论著都充满模棱两可之处,需要做出重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在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结构中占据良好的地位,借以对这个社会施加影响,这样一种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到了60年代后期,以学生运动为先导,联邦德国社会对传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犯了时代的错误,它是对现状不加辨别的肯定,是对粗鄙灵魂进行的低劣按摩。无论是戏剧、舞台剧、芭蕾舞还是交响乐,都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耗费极大的开支,都是社会投入巨资补贴以服务于那些中产阶级观众的垂死文化。这些论断似乎充满了激情,但是否真的能够找到替代的一种文化政策,人们就无法得知了。显而易见,过去的文化形式并不单单是资产阶级掠夺社会财富的过时的产物,而那些先锋派文化艺术中相当大的成份倒是自我陶醉、孤芳自赏,甚至是夸夸其谈、以次充好。

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1960年在科隆的西德无线电台录音棚。施托克豪森1928年出生在科隆附近的马德拉斯,他在1956年创作的《青年之歌》这首电子合成音乐,是为数不多经受时间考验流传至今的电子乐作品之一。1960年的他,正参与创作名为“七日之光、音乐与戏剧”的宏大工程。该工程把音乐与戏剧结合在一起,运用的音乐具有罕见的力度、美感和智慧。



阿登纳执政时期,知识分子们——其中几乎全部都是左翼人士——均对阿登纳持强烈批评态度。在他们看来,他的专制作风,他的教权主义,他那狭隘的莱茵兰式爱国主义,都足以使人想到另一个人,那便是佛朗哥。在这些人士看来,联邦德国是庸俗资产阶级的、落后的、不堪忍受的国度。确实,阿登纳对艺术和艺术家毫无兴趣,把政府中指手划脚的批评者视作领取东德津贴的共产主义同路人,毫不留情地予以解职。因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均被排除在

政党政治舞台之外。不过，他们在谴责“经济奇迹”的庸俗拜金主义色彩时，倒也可以为自己的不同流合污而自得。在这些高雅的批评家们眼中，阿登纳最大的失策便是，他并没有创造一个崭新的德国，而是简单地从魏玛共和国 303 倒下去的地方抬起步伐。自从沃尔特·迪克斯1950年在《法兰克福手册》月刊上发表一篇影响颇广的文章后，“恢复”便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

但实际上，要“恢复”传统的并不是政治家，恰恰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抨击，只不过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吹毛求疵、冷嘲热讽的左翼批判家们的苍白再现而已，而当年那些批判家心怀不善的攻击，对民主进程的崩溃也起了很大一份作用。如今，这些知识分子签署了数不胜数的宣言，反对核战争，反对查禁淫秽材料，反对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但脱离了政治生活。他们自视清高，胸中充满了怨气。

与魏玛共和国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今时代已不存在任何一位著名的右翼知识分子。纳粹时期酿成的灾难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所以除了少数异想天开者和冷眼旁观者，谁也无法从第三帝国的所谓成就中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当年曾与纳粹政权过从甚密者，比如恩斯特·容格尔，从前便表达了自己有所保留的态度，后来接受了议会制，成为思想独立的右翼人士，虽然他们往往会言不由衷。虽然也不时有些堂吉诃德式的人徒劳地企图从纳粹政权那里找出积极的一面，但大体而言，右翼思想重新在知识界占据一席之地，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

阿登纳执政时期的主要著作，例如君特·格拉斯取得极大成功的《铁皮鼓》、沃尔夫冈·克彭和马丁·瓦尔泽的小说、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的诗歌，都是用文学形式包裹的政治读物，往往过于强调政治上的颠扑不破，作为文学美的可怜的替代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当年获得很高声誉的作品，给读者的感觉是越来越充满说教味和偏见，更可怕的是，冗长乏味，令人不忍卒读。

至于戏剧表演业，纳粹时期即曾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柏林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格斯领导下，继续兴旺发展，主要上演德国经典剧目和外国著名作品。1951年，拜罗伊特的瓦格纳(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德国作曲家、文学家，曾任德累斯顿宫廷乐长。1872年在巴伐利亚州拜罗伊特自建剧院，演出自编剧本，其中不少剧目宣扬了宗教神秘和“超人”思想。瓦格纳去世后，住在拜罗伊特的他的后人，仍每隔几年举行一次音乐节。战后，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于1951年举行，下文提及的维兰德和沃尔夫冈·瓦格纳，都是他的孙子——译注)音乐节恢复举行，盛况空前。演出的大师作品剔除了纳粹时期改动的痕迹，在维兰德和和沃尔夫冈·瓦格纳的指导下，把听众带进了纯正的荣格（1875—1961年，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译注）风格的神秘的本来面目的世界。就连那些很敏感的左翼分子，也放下了意识形态偏见，静静地享受它们。年轻一代的杰出作曲家们，例如汉斯·维尔纳·亨策和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都是在阿登纳执政时期崭露头角



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们加入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联合会1966年7月组织的游行中去，反对美国卷入越南冲突。标语上的文字是“与全国解放战线团结在一起”和“波恩支持美国在越南的种族屠杀”。游行队伍遭到了同情美国对越政策的学生的攻击。在60年代后期的学生抗议运动中，自由大学构成了一个最活跃的中心。

的。美国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在联邦德国非常受欢迎，诸如美国武装部队无线电台、美国之音等电台，都拥有大量的听众。通俗文化以其清新活力和张扬的个性魅力，对年轻的民主制度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它们能推动听众与仇外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拉开距离，也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民众认同阿登纳的融入西方政策。

到了60年代，文化变成了社会上极大丰富的物质的副产品。战争的废墟已经清理干净，经济奇迹带来的繁荣惠及到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让一卢克·戈达德笔下的这些“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子孙们”，通过遁入“地下”来逃避现实生活的纷纷扰扰。而在这个由性、毒品、摇滚乐，以及东方的玄学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掺杂在一起的“地下世界”，年轻一代人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革命之中。另一方面，这个“地下世界”似乎又是悬浮在现实世界之304上，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当他自以为精明而壮起胆子走进这个世界后，很快便被作为利用“备选”文化谋取大量利润的狡诈的资本家，捆绑得结结实实送给普通民众。随着抗议运动试图摆脱所谓资本主义“摩洛神”（典出《圣经·旧约》，系古代腓尼基等地所崇奉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译注）的魔爪时，强度越发暴烈。静坐、辩论会、示威和暴动，不一而足，成为当时司空见惯的现象。年轻一代的装束和行事风格，也越来越具有叛逆意味。他们运用源于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词汇，与粪便学的大量用语杂合在一起，组成新型词汇库，对西奥多·W·阿多诺所称作的当权者使用的“正规用语”发动猛烈进攻。

不久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便意识到了，抗议运动正在走向失控。阿多诺在其任教的大学里上课时，竟遭到攻击。比他年轻一些的魔法师容根·哈巴马斯，以激烈的言辞警告其无拘无束的学徒不要陷入“左翼法西斯主义”。无论是谁，面对知识界的斯文不再，都不会想到要为自己过去多年的所作所为承担一份责任。反过来看，这其实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学生们“向大学进军”的举动，除了使他们在大学的管理中取得了一份发言权外，并没有得到别的东西。年轻人可能只考虑到心脏位于自己的左侧，但不久以后便会认识到，他们的钱包都放在身体的右侧，需要在学术界、报刊业、商业圈认真效力，融入到所工作的行业中去。随着他们在银行中的存款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他们会享受起在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译注）乡村或西班牙庄园中的那种平静生活方式，并在自己工作之余，对自己曾经加以破坏的经

[305]

巴德尔·迈因霍夫帮

迈因霍夫　巴德尔　恩斯林　迈因斯　拉斯珀


Meinhof, Ulrike. 7. 10. 34 Oldenburg


Baader, Andreas Bernd, 6. 5. 43 München


Ensslin, Gudrun, 15. 8. 40 Bartholomae


Meins, Holger Klaus, 26. 10. 41 Hamburg


Raspe, Jan Carl, 24. 7. 44 Seefeld

在 1968 年这个"学生暴动年"的 4 月 2 日，法兰克福两家百货商店发生了爆炸案。警察逮捕了 4 名嫌疑人，其中包括大学生古德伦·恩斯林和她的男友安德列斯·巴德尔。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在左派杂志《混凝土》上撰文，为两人辩护，称扔出炸弹是向"消费恐怖主义"发起的英勇的进攻。恩斯林和巴德尔被处以 3 年监禁，但在为她们的上诉举行听证会时便消失了。巴德尔后来于 1970 年 4 月被捕，但在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组织的一次武装行动中逃出了监狱。在这次行动中，有一位劫狱者丧生。

恩斯林、巴德尔、马勒和迈因霍夫建立了城市游击战组织"红色军团"。他们相信，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佳方式，是暗杀警察和武装部队成员，绑架社会名人以换取赎金和释放入狱的同志。至于弥补经费的不足，则可以抢劫银行。

红色军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大学生，而且这些大学生大多来自家境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前一阶段的学生抗议运动对整个社会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似乎使他们明白了什么。他们以为，只要激怒当局，他们便可以揭露国家政权的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把人民群众争取到他们一边。但究其结果，却与他们的想象完全相反：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外，人们并不同情他们。

安德列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乌尔里克·迈因霍夫、霍尔格·迈因斯、让·卡尔·拉斯珀最终于 1972 年 6 月被捕，被控以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的罪名，但恐怖活动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狱中的领导者们向其他成员发布命令，并与其他监狱的同路人协调行动。此后，一系列谋杀和绑架事件相继发生，最终发展到劫持一架法国航空公司客机。由于以色列人的营救，被劫客机重获自由。上述非常严重的暴力事件，使政府更加坚定了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决心。

1976 年 5 月，幻想破灭的乌尔里克·迈因霍夫自杀身亡，但谋杀事件仍然在持续。1977 年 10 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德国精锐的反恐怖部队第 9 特别行动小组在摩加迪沙进行了解救行动。人质重获自由后不久，巴德尔、恩斯林和拉斯珀便相继自杀了。零星的恐怖主义活动，假借红色军团的名义，后来还有所发生，但这一组织是否还继续存在，则没有确切证据。柏林墙倒塌后，恐怖分子失去了东德人的支持，活动日渐式微。他们犯下的致命错误便是，认为当局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左翼恐怖主义上，因而对极端右翼团体的邪恶活动视而不见。

[306] 谁也不能否认，联邦德国在阿登纳主政时期，与纳粹统治历史完成了决裂，就像当时的一部著名作品的标题那样：《波恩不是魏玛》。但不幸的是，虽然人们对这一切变化谈论了许许多多，不少领域仍然存在不少连续性，司法系统对纳粹分子的过于宽容，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共产党人及同样遭受纳粹迫害的受害者的不当对待，便是一个例子。此外，公务员获得的各种特权，以及公务员、白领雇员及普通工人享受的社会福利的巨大差别，都可以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但这些现象虽然遭受了强烈批评，却依然故我。


Stachowiak, Ilse, 17. 5. 54 Frankfurt/M


Jünschke, Klaus, 6. 9. 47 Mannheim


Augustin, Ronald 20. 11. 49 Amsterdam


Braun, Bernhard 25. 2. 46 Berlin


Reinders, Ralf 27. 8. 48 Berlin

济制度表达关切之意。

到了70年代初，文化领域突然剧烈转向了。(联邦)德国陷入了严重的不景气，而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希望进行任何改革。人民呼吁政府节省开支，限制职能范围。人们开始把福利国家制度看成是新形式的封建主义，是国家对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的粗暴侵犯。对自力自主和自省意识的强调，取代了积极干预的政治活动。在人们心目中的未来，再也不是乌托邦式的良好景象了，而是行将到来的灾难。预言家们大声疾呼，世界如果不在核战争中灭亡，也会在生态灾难或一切自然资源被消耗光后消失。第三世界将更加贫困，失业人数将进一步上升，滥用毒品和犯罪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普遍。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将寻找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

阿登纳之后的西德

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接任了总理职务。他希望在自己主政后，能够避免阿登纳时代的那种政治纷争和意识形态隔阂，创建一个"成熟社会"。他所使用的这个词义模糊的术语，含义是要在务实的原则指导下，和谐地享受稳定增长的经济成果，既实现社会的繁荣，又能避免残酷的社会分野。在对外政策领域，艾尔哈德的外交部长杰尔哈德·施罗德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

西德经济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波峰波谷，但与大多数其他工业国相比，其持续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一方面，农业不断萎缩，另一方面，工业产值在1960至1975年间增长了一倍，从而为"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出口：从1960年到1980年，联邦德国的出口额从479亿马克上升到3500亿马克。



保加利亚签署了贸易条约，从而为打开东欧国家之门，迈出了最初几步。由此，联邦德国在对外关系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灵活性，这也是期望缓解欧洲紧张局势、默认德国分裂现实的美国所愿意看到的。1966年3月，艾尔哈德发 307 出"和平照会"，建议苏联及东欧国家（但不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达成不使用武力、控制和不扩散原子武器的协议。这一倡议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了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它是联邦德国为在两极世界中获得一定机动空间所做出的一份尝试。

然而，对外政策领域的争论，正在危及建立所谓"成熟社会"所依赖的社会共识。影响很大的德国戴高乐主义者团体，主张建立一支"第三力量"，以便使联邦德国从美苏两极格局中解脱出来。而在左翼，反美主义者认为大西洋同盟对欧洲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主张解除这种联盟关系，美国发动的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更令这种思潮不断蔓延。艾尔哈德和施罗德辩解说，大西洋同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应该在坚持这一同盟的前提下，提升德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1965年的大选之后，依旧是艾尔哈德担任总理。联合政府中的伙伴自由民主党丢失了一些席位，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则有所上升。因此，艾尔哈德为了维持联合政府的执政地位，不得不对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做出一定让步。政党谈判的结果，暴露出这位总理是一位弱势领导人。次年，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举行选举，艾尔哈德将之视作检验自己受欢迎程度的标尺。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遭到挫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在杜塞尔多夫组成了新一届联合政府。国家经济这时也开始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增长率出现了下降，加之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化和失调，导致失业人数增加。由于对预算计划持不同意见，自由民主党在1966年10月被迫退出联合政府，艾尔哈德遂成为少数政府。总理面对无法克服的局面，不得不宣布辞职，接任者是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

在经历长时间的谈判后，以基辛格为总理、与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德国战后政治舞台的著名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左翼积极推动成立大联合政府的主要人士的赫伯特·魏纳，强烈要求社会民主党必须向其选民显示其有效施政的能力。新一届政府于1966年12月1日成立后，决心克服已波及全国各地的经济困难，并对东欧国家推行一条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

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和财政部长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着手压缩财政赤字，同时通过经济计划工作刺激经济增长。他们采取的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联合政府内部围绕未来道路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对外政策方面，基辛格政府试图同时与美国和法国改善关系，抵制了戴高乐把德国拉出大西洋同盟、成为法国主导下的欧洲一个二流伙伴的企图。如果说这几年里外交方面遇到的麻烦还算有限的话，内政领域则是问题成堆。年轻一代人激烈批评美国卷入越南冲突，反对德国支持这场他们眼中的帝国主

义战争，觉得自己与生活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渐行渐远，格格不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既不公正也缺乏效率、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他们发现，基辛格政府推行的是一套自鸣得意的政策。当这位总理曾经是纳粹党306党员的历史被曝光后，年轻一代被彻底激怒了。由于迄今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对党，他们便成立了一个“超议会反对派”，就像他们在法国、意大利、美国的同龄人一样，发动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抗议、暴乱。极端右翼政党“新民主党”(NDP)的壮大，似乎印证了他们最可怕的担心。当时，很多人都在谈论纳粹主义复活，虽然现在来看，不免有过份夸张的现象。

1969年的大选结果，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明显上升，基民盟/基社盟稍有减少，而对自由民主党来说则是一次惨败。新民主党得到4.3%的选票，因未跨过5%的门槛，无法在联邦议院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基民盟/基社盟还想参加一个以维利·勃兰特为首的大联合政府，但社民党选择了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权。

维利·勃兰特政府下定决心，在国内迎合年轻一代提出的许多不无道理的批评，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他还希望在处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中采取更加大胆的政策，但鉴于他领导的联合政府在联邦议院仅享有12个席位的优势，而且自民党伙伴对此持强烈保留态度，所以他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面临很大阻力。

令他们觉得乏味异常难以忍受的大联合政府终于走到了尽头，但这还不足以使年轻一代感到满意。他们信奉了社会主义坐享其成的一面，提出了摆脱规章制度和资产阶级繁文缛节约束，做“真正的人”的理论。在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中，他们从年轻时代的马克思、毛泽东和威廉皇帝的著作中摘抄一些语句，作为自己的口号。然而，这种从享乐主义角度对“自我实现”的强调，只不过是为不负责任的自私主义寻找借口，对权威的攻击，也只是为自己的浅薄和放纵找到托辞。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抨击，调门越来越高，直到这种口诛笔伐的恐怖主义被真枪实弹的恐怖主义所取代。

勃兰特政府愿意承认，年轻人的这些批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无稽之谈，遂宣称准备“为民主冒点风险”。此后，社会福利得到了增进，离婚法实现了革命性的修订，男女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的平等地位写进了法律条文，堕胎也合法化了。教育在经过改革之后，有真才实学者接受教育的空间增大，传统上以社会和经济地位为标准的情况得到了改变。但凡此种种，都不足以使那些激进青年满意。另一方面，在右翼的一些心怀叵测的批评家们眼中，这些措施则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弃，是平等主义思潮在作怪。

不过，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至少在对外政策目标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1970年初，政府接受了苏联在1969年9月提出的就相互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提议。以总理办公室国务秘书埃贡·巴尔为首的联邦德国代表团遂前往莫斯科，经过艰苦的谈判，达成了被称作“巴尔文件”的十点共识，内309容包括相互放弃使用武力，联邦德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存边界。在进

一步的商谈中，苏联接受了这一认识，即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联邦德国放弃其实现两个德国的统一的诉求，并对联邦德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作了让步。1970年8月12日，两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西方三个大国（美英法）均予接受。

与莫斯科的谈判取得成功，为联邦德国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条约打开了门户。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与波兰签署条约，规定联邦德国接受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为波兰西部边界线，波兰对德国人的迁移所作的极其严格的限制予以取消。此外，波兰还接受德国统一条款被包含在《莫斯科条约》之中。1973年12月11日，联邦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类似条约，一致同意《慕尼黑协定》（1938年9月29日由纳粹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译注）无效，双方建立外交关系。

在联邦德国与苏联及波兰进行谈判的同时，美英法苏四大国于1970年3月就柏林地位问题也展开磋商，到次年9月，达成了《四国协定》。协定中保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柏林西区之间的联系。虽然苏联不承认西柏林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但接受西柏林市民处于波恩的外交保护之下，以及西柏林在经济上完全融入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在1972年12月21日签订的《基础条约》中得到了认定。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之间的正常睦邻关系”，并保证双方“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两个德意志国家还互派了常驻代表，与派驻他国外交代表的惟一区别在于头衔不是大使。这一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两个德国的统一问题即使还存在可能，也将是遥远未来的事，因此必须接受德国分裂的现实。通过上述一系列条约的签署，中欧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联邦德国赢得了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从而得以从东欧国家那里榨取可观的让步。虽然右翼人士把“新东方政策”条约谴责为“绥靖”政策，但维利·勃兰特保证“通过接近促进演变”，希望东德独裁统治会从内部逐步削弱，被迫做出更多人道主义性质的妥协。

对于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权，右翼人士批评其增大国家在经济上发挥的作用，以及与共产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等政策。而在左翼人士看来，社会福利改革还太微弱，“新东方政策”迈出的步伐还太小。这毕竟是一个奉行中间道路的政府，因而既无法让右翼满意也不能取悦于左派。越来越多的议员放弃对联合政权的支持，加入了反对派。1972年8月，勃兰特政府在一次不信任投票中涉险过关，但已失去了在议会中的有效多数。

在1972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民党获得45.8%的选票，基民盟/基社盟获得44.9%。不过，自由民主党的成绩相当不错，得到了8.4%的支持率。这样，以勃兰特为首的联合政权重新赢得了有效多数，得以继续推行“新东方政策”。围绕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的预备磋商从1972年11月开始，到1974年夏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后正式成立（《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正式称谓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应为1975年8月 311

310

维利·勃兰特

维利·勃兰特1913年出生在梅克伦堡。由于在社会民主党中积极从事政治生活，纳粹统治时期被迫逃出德国，前往挪威。为逃避盖世太保，他加入了挪威军队，曾在挪威度过一段短暂的战俘生活。此后，他逃至瑞典，当上了新闻记者。1957年，他在原任(西)柏林市长去世后接替了这一职务，并于次年竞选连任。他强烈支持德国全面参与西方联盟，因此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意见相左，但这也使得他在该党经过改革抛弃过时的意识形态束缚，成为"人民的党"之后，成为该党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之一。

1960年，勃兰特成为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他年轻、充满活力，深得人民喜爱。由于他在1961年柏林墙建造前后的危机中能高超驾驭局面，声望得到了进一步的上升。阿登纳未曾去过柏林，而且在提及勃兰特这位竞选对手时，使用的是他在挪威时的化名"勃兰特先生，化名弗拉姆"，暗指他曾是一位叛国者。基民盟/基社盟围绕勃兰特不合法的出身大做文章，还若明若暗地指责他在战争期间曾"向德国人开枪"。

勃兰特知道，德国不能单纯依赖美国人，而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占据一定的主动。他与其亲密助手埃贡·巴尔一起，逐步制定出了"通过接近促进演变"政策的具体方案。1964年，他成为社会民主党主席，并于1966年在"大联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一职。这曾使其在党内的左派人士深为不满。他倡议在外交上承认东德，承认奥得-尼斯河作为波兰西部边界线，活力四射地投入到"新东方政策"的制定工作中去。

1969年，勃兰特成为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总理。他承诺"为民主冒点风险"，改革教育制度，降低选民年龄限制，改革婚姻与家庭法及刑法，增进社会福利，在企业中促进劳资双方合作，并尽一切可能避免两个德国渐行渐远。他的"新东方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他本人也于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很快他便遭到了有关指责，认为忽视自己作为党的主席的职责，忽视了国内问题，听任"新东方政策"随波逐流，失去方向。1974年5月，他假借自己的亲密助手京特·纪尧姆系东德情报局间谍一事，辞去了总理职务。

此后，他作为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1951年在法兰克福成立的各国社会党的联合组织——译注)主席、名为"勃兰特委员会"的国际开发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仍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位知名人士。1992年，勃兰特去世。

任何人都无法像维利·勃兰特那样在权力诱惑下永葆自我。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虽然过着良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却从未失去平易近人的品格。他的真正力量就在于，他从不扮演什么政治强人，而是寻求在不牺牲自己的原则的条件下达成妥协，对空洞无物的宣传口号和意识形态上的矫揉造作嗤之以鼻。他对祖国的爱，根植于他对宪法所赋予的各项自由的热爱，他为自己每每被人引上歧途的同胞，树立了什么是真正爱国主义的榜样。



1972年，时任总理的维利·勃兰特(1913—1992)发表讲话。

1日在签署——译注)。此后,联邦德国开始向民主德国提供经济援助,民主德国因此必须对人道主义问题和人权给予更多的重视。

东西方关系“缓和”在军事技术领域的体现,是1973年秋在日内瓦开始的“共同均衡裁军”(MBFR)谈判,但由于华约集团决意保持其对北约的优势,谈判未取得任何成果。1979年底,北约警告说,如果苏联拒绝减少其在欧洲的中程导弹数量,美国将在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国领土上部署同类武器。1981年,美苏两国在日内瓦举行核裁军谈判,但最终劳而无功。美国遂在德国部署了“潘兴II”式导弹。这一举措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联邦德国许多社会阶层人士均参与其间。

1974年5月,维利·勃兰特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京特·纪尧姆系东德间谍一情被揭露出来后,他宣布辞职。当时,西方正倾力应付1973年石油危机带来的巨大困难,所以他的辞职也标志了一个充满自信、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的终结。在勃兰特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接任总理职务。担任外交部长的自由民主党人士瓦尔特·谢尔被选为总统后,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接任外长。施密特政府奉行务实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政策,努力克服极为严峻的挑战,但在维持业已取得的成就方面成效不大。要求实施更大幅度改革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满足于此,而自由民主党对国家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也日益不满。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及越来越活跃的环境保护运动,构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反对力量,而这些人以往都曾是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在1976年和1980年大选后虽得以继续执政,但其分崩离析,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1982年9月,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中的四位自民党部长为抗议他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宣布退出内阁。尔后,自民党与基民盟/基社盟举行了结盟谈判。10月,施密特在不信任投票中下台,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被任命为新一任总理。

第十三章　德国的重新统一

[312] 曾几何时，人们曾寄希望于苏占区能够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而发展出具有其特色的某种社会主义形式，但随着时光进入1946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强制与德国共产党合并，组成统一社会党之后，这种希望便灰飞烟灭了。不久，反法西斯政党统一阵线于1946年7月组成，作为推行共产主义政策的一枚橡皮图章发挥作用——这一阵线中的形形色色的政党，当年曾经作为享有一定平等地位的伙伴，共同反对法西斯势力。到1948年时，统一社会党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斯大林主义政党，而它却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严格遵循马克思和列宁创立的基本理论，是一种“全新类型的党”。该党向“大农场主”或“富农”宣战，其界定标准是拥有20公顷（相当于50英亩）土地，并加大了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力度。德国统一社会党对自己在苏联面前的绝对屈服地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宣称：“向苏联学习，便是取得成功之道！”斯大林对铁托的殊死打压，以及其后对各国共产主义的本民族特征进行的打击，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凡此种种，已使得东德不可避免地沦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统一社会党从他们的苏联主子那里学习到，如果想在一次选举中检验一番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将是政治上愚不可及的蠢举。1946年秋，在还算自由的地方选举中，该党还能够努力赢得大多数选票，但到了1949年，便已失去了大量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全国阵线”于1949年5月应运而生，被用来选出一个“统一的、正义的、和平的”人民议会，从而令选民只能走走过场。人民议会任命的人民委员会，负责为新生国家制订一部详尽的宪法。1949年10月7日，人民议会易名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议院”。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特沃宣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表现了“德国人民民主力量决心战胜国家紧急状态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当然，在二战结束后最初几个年头，并非所有重大步骤的出台，都违反了人民的意愿，例如国家对大企业和大银行的没收——纵便是资产阶级中的反法西斯人士也认为，这些垄断企业和银行当年在纳粹独裁统治下获得了极大利润。在萨克森，百分之77.6%的选民在1946年6月的公民投票中支持夺取“纳粹活动分子和战争罪犯”的财产，很多人还赞成1945年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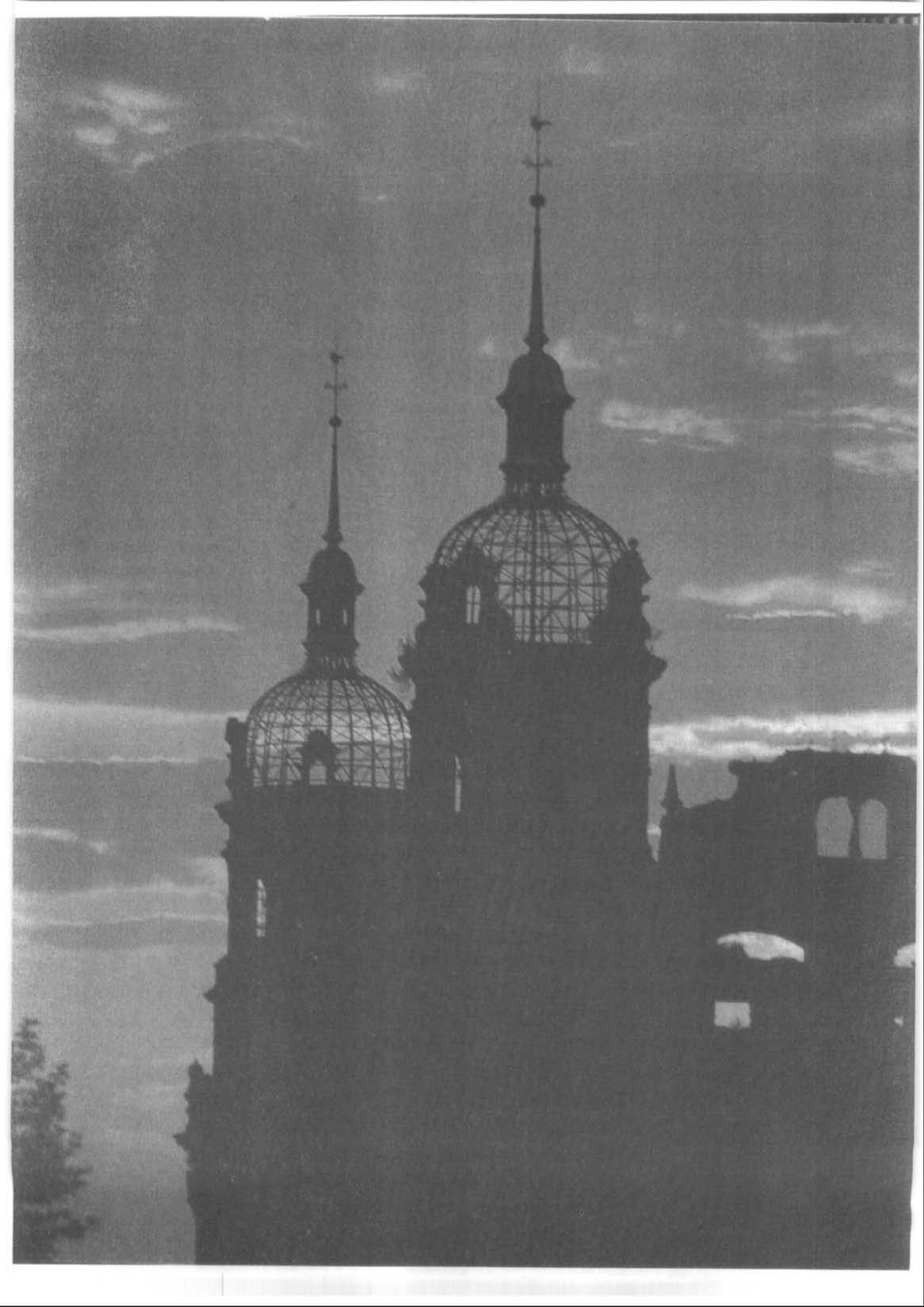


东德人民军阅兵式。虽然官兵们的正步姿式会让人很不舒服地联想起纳粹军队，但其实这种动作要领是从苏联红军那里搬过来的。

土地改革——通过改革，面积大于100公顷(247英亩)的庄园均被划分为若干块，转至农民和难民名下。不过，后者无法长时间地把分到的地产归于自己支配，因为新获得土地的这50万人中，大多数人不久便被强制性地赶进了 313 集体农庄。由于“纳粹活动分子”的标签被不厌其烦地大加使用，而且当局很快又祭出了操作性同样灵便的“美国间谍”法器，贵族和资本家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了，成千上万的不幸者被赶进了集中营，而且许多人在那里被谋杀。在这一方面，苏联占领当局丝毫不想舍弃纳粹分子修建的集中营——布痕瓦尔德(位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的一村庄，1937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在此设立集中营，屠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且常常留用训练有素的纳粹暴徒作为看守。值得一提的是，布痕瓦尔德后来被改造成了一处反法西斯纪念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新生国家迅即组建了国家安全部，管理数不胜数的特工和告密者。与之相似，司法系统也按照马列主义原理，被改造成为政治工具，法官们如今变成了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为了消除各地区由来已久的强烈的地方主义传统，先前的州被废弃，代之以14个专区。由此，历史上的联邦制度告以终结，虽然它在纳粹独裁时期也曾得到了维系。民主德国变成了一个单一制国家。

1948年，国家提出了一项两年经济计划。195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宣称将大幅度促进工业增长，但实践证明，其规定的目标太高了。从1950年起，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财富收归自己名下，从而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并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这些举措引发了广泛的不满，而且斯大林式的



片面强调重工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陷于严重混乱、劳动者的劳动价值遭到残酷剥削、消费品长期出现短缺。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终无法得到明显提高，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灌输、始终存在的秘密警察、日常生活的了无新 315 意，致使人们对调门越来越高的关于为社会主义明天作出无私牺牲的宣传，丝毫不感兴趣。

相当数量的著名知识分子，当年在纳粹统治期间曾流亡国外，如今被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反法西斯的德国的可能性所吸引，自愿回到了苏占区，其中包括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阿诺德·茨威格。但用不了多久，随着斯大林主义文化政策的出台，“形式主义”、“颓废主义”、“世界主义”都遭到了尖锐的抨击，而现代艺术的大多数成份，都可以被罩上这类大帽子，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终于灰飞烟灭了。如今的时代艺术主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局所崇尚的画作是亚麻色头发的妇女在集体农庄的耕地上开着拖拉机，是肌肉发达的钢铁工人努力完成生产指标，虽然它们会令人回想起纳粹时代的所谓艺术。无独有偶，无产阶级的进行曲，听上去也颇似党卫队行进时使用的音乐。至于号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其冗长乏味与第三帝国时代的“铁与土地”小说（“铁与土地”原为纳粹分子的口号，这里指纳粹思想——译注）相较，可谓不分伯仲。尽管大众普遍希望欣赏爵士乐和美国流行音乐，但当局却严格禁止它们的传播。

看到西德人享受着朝气蓬勃的文化和日益增长的财富，东德人的目光中充满了羡慕神情。肉类、黄油和糖的配给制，一直持续至1958年，而柑橘类水果和巧克力在东德，基本上就没有供应。当局号召人民勤俭、保持警惕，号召人民做出更大的牺牲，人们稍有不满和批评，便会被当作叛国惩处，而微不足道的过失，便可能被视作颠覆罪行。那些在斯大林去世后呼吁施行更大民主的党员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清洗和处分。

1953年5月，柏林爆发了一系列自发性的罢工，原因是工人对国家提高建筑业的生产指标极为不满。不久，罢工活动蔓延至其他城市，并波及其他行业。罢工风潮既已出现，除了工资问题、每周工作时间问题和计件工资率之外，斗争的目标很快又指向了政治领域。6月1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个城市、各大工业区，出现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暴动。苏联人迅速对此做出了反应，于6月18日、19日两天，对暴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但直到秋天，东德境内零星性反抗活动仍未完全平息。

1953年6月17日的暴动，突出地昭示了当局之不得人心。执政者不仅对治国方略缺乏必要的认识，而且如果没有苏联坦克的支持的话，甚至无法施行统治。当苏联领导层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朝摆脱斯大林主义迈出最初的步伐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层对于如何应对，完全是手足无措。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国家总统威廉·皮克等人，都是虔诚的斯大林主义者。虽然迫于时势，也在表面上对自己当年心目中的伟大人物的错误教导进行谴责，对个人崇拜现象进行批判，但内心深处却不清楚

第306页图：东德城市德累斯顿的宫殿虽得以幸存下来，却依然能看出当年被轰炸后的毁损情况。为了使这座城市重现其巴洛克风格的壮丽景观，东德曾付出了巨大努力。

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方向将对现实政策造成哪些变化，而且他们还担心对斯大林的批判，将发展成为对他们的政权的抨击。

虽然领导层深深希望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讨论能到此为止，划上一个句号，但知识分子却渴望更多的公开性、更充分的探讨，渴望马克思列宁主316义那双僵化的手，能减轻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禁锢，渴望统一社会党对意识形态的主宰能寿终正寝。哲学家沃尔夫冈·哈里希周围聚集了一帮知识分子，他们倡导“第三条道路”，即：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同时也要摆脱共产主义经济计划的僵化。这些人有关“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呼吁，赢得了广泛的反响。究其原因，就在于建设一个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迄今为止都未曾建立的、乌托邦式的更美好的世界，这种思潮始终具有群众基础，因而从来没有消失过，虽然这种思想在现实条件中很难真正实现。哈里希团体在统一社会党内也享有一定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斯大林去世后解冻时期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重要人士。而且，他们的想法在一段时间里，还得到了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的支持。但到了 1956 年 10 月，匈牙利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后，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丝幻想也被击破了。从此，乌布利希再次牢牢掌握了政权，而政治方向也回到了旧有轨道。

1957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次年，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号采用了“迎接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次大会宣称，为了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赶上西德的发展水平，甚至到 1961 年超过后者，必须使经济进一步社会主义化，必须更富计划性，必须施以更严格的控制。哈里希的改革显然被拒绝了，他本人于 1956 年被捕，经过 1957 年 3 月的“橱窗式审判“（指为宣传目的而对政治反对派等的所谓公审，通常判决已在审讯前决定——译注）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后来于 1964 年获释。值得一提的是，到了 1990 年，为哈里希平反，将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上



德国煤炭工人。在东德 1953 年的暴动中，煤炭工人是最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成份之一。暴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东德领导层宣布将生产指标提高 10%，而此举的实际后果将是降低大多数工人的收入水平。虽然当局也曾试图安抚愤怒异常的工人们的情绪，但在 6 月 17 日那一天，仍有 30 万至 40 万名工人在全国各地的 270 多个地点，参了游行示威。面对示威开始走向失控，苏联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使用坦克驱散人群，造成了约 200 名平民丧生。

诉法院履行的最后几项案件之一。

对改革派思想观点的摒弃,突出地体现在农业领域。1956年,东德70%的农业产量来自私营土地,而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农业集体化之后,到1961年时,国家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农业产出中所占比重便达到了90%。与之相似,此前仍掌握在私人手里的一些工商业,在这段时间里也交到了国家名下。重工业虽然占用了资本投资的绝大部分,但却未能像所预期的那样产生效果。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联邦德国,赶超的希望已愈益渺茫。

总统威廉·皮克1960年去世后,这一职位便被取消了,而他的权力则交 317 给了由瓦尔特·乌布利希任主席的国务委员会掌握,即实行集体国家元首制。乌布利希的另一项职务是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由此,他成为权力无人能及的独裁者,虽然东德名义上也宣称采取斯大林去世后的集体领导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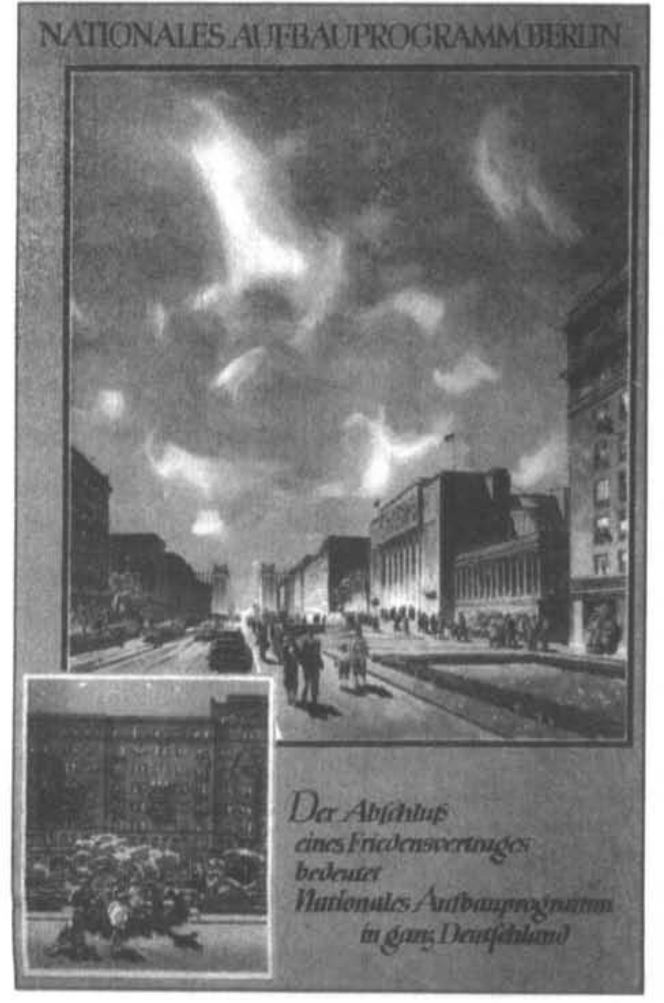
民众这时面前仍然还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抛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背井离乡前往西德。据估计,从1949年到1955年间,约有50万东德人去了西部,这些难民中有一半人年龄不到25岁,2/3的人拥有一定技术和知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失去它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到了1961年上半年,逃往西德的人数大幅度上升,东德人口中的后备力量严重流失。这时的东德,如果要出版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的话,必须对其内容作一番修改啦——白雪公主只剩下三个小矮人了,因为另外四个去了西德。

1961年8月12、13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东柏林举行会议,讨论目前局势后,决定在这座城市的中间线上筑墙以关闭边界。8月13日,这座臭名昭著的"反法西斯的保护墙"连夜开工修建。这是对东德共产主义政权走向破产的又一次宣告,也是为苏联式共产主义走向失败建立的纪念碑。这道柏林墙矗立起来之后,东德公民再也不会面临这样一个痛苦的抉择了:是留在家乡,还是逃往西方?留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那便是回归现实,惟一的选择是,要么避开世事纷扰,在家人和朋友的小世界里寻找宁静(但很多年后人们才发现,许多人都成为国家秘密情报机构的告密者),要么使自己寻求与当局的妥协。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一代人逐渐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产生了认同感,对自己的国家似乎是共产主义集团中最繁荣的一员感到自豪,并为本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的精彩表现欢呼雀跃——东德于1965年加入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了使柏林墙这枚苦果变得稍微甜蜜一点,当局一方面对斯大林主义作了一些空洞无物的批判,另一方面在1963年推出了"关于经济计划与指导的新经济体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需求较以往稍稍给予了更多重视。工人们不再被视作政治上万人一面的"基础力量",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为实现大体上相同的经济目标而组成的一个群体。党的一位宣传工作者使用与马列主义观点很难合拍的语言,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作了注释:"一个人的政治觉悟高低,取决于他完成了多少生产

指标。”

由于经济体制更加灵活和务实，也由于劳动力不再因为移民西方而流失，东德在1961至1970年间，取得了颇为可观的经济增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虽然与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人民的生活仍显得单调乏味，但按照共产主义阵营的标准看，则已不啻于是一项经济奇迹。但到了60年代中期，乌布利希再次祭起了赶超西方的念头，决定大力强调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由于东德不存在支撑这些产业的基础条件，重点发展高技术的政策酿成了灾难：它浪费了发展前途似乎不那么宏伟的经济计划 318 所急需的资金，而东德又缺乏高技术产业所不可或缺的专门人才。因此，它威胁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东德的称谓不那么直白，而是含蓄地将之称作“社会主义福利”。

东柏林的斯大林大街。该大街建于1949至1960年间，原称法兰克福大街。这张绘制于1952年的海报上的文字是：“柏林国家重建计划。和平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整个德国的全国重建计划。”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理念，越来越与苏联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双方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却是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乌布利希对缓和不感兴趣，而莫斯科却准备与波恩进行直接谈判，因此，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对乌布利希的地位构成了威胁。这位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位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僚，这位忠驯地听命于莫斯科的看门人，这时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与主子的想法大相径庭。1971年5月，时年78岁的他，在重病之下被迫辞职。1973年8月，乌布利希去世时，人们几乎未进行多少悼念。接替乌布利希执掌东德权柄的是埃里克·昂纳克。此人是一个毫无色彩、思想保守的庸俗之辈，虽然也像前任那样绝对听命于莫斯科的旨令，但又实用主义当头，不愿费时费力地操心乌托邦式的未来，而是更在意现实中的问题。昂纳克的主张集中体现于他概括得不无道理的一个概念：“现实存在中的社会主义”，这被视作通向“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他认识到，空谈“社会主义福利”并不能掩盖民主德国是一个等级制社会的事实。因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阶级社会”这一奇特的概念，认为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应该特别重视满足劳动阶级的需要。1971年，国家用于生产和服务行业人员的粮食、工业品和工资补贴达85亿马克，1988年则高达500亿马克之巨。当局的着眼点已经改放在代价愈益沉重的福利国家上，而不是理论家和知识分子们所醉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梦幻，虽然直到1975年，这个“迎接社会主义的胜利！”的党内部，仍不时传出一些充满激情的探讨。

统一社会党在1971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统一”的方针。要解读这项政策，必须考虑到共产主义各国局势日益动荡这一背景。例如，波兰1970年12月爆发了波及许多地区的骚乱，民众因不满于

319



东德制造的"特拉班特"牌小汽车。该款汽车故障率高，安全性差，造成污染程度高，可以视作东德经济失败的象征物。图中这辆汽车抛锚在东柏林通往莱比锡的公路旁。

物价上涨纷纷举行抗议，而这离"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仅仅时隔两年。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住房问题被当作头等考虑的大事，数量众多的公寓楼建成投入使用，虽然大多数楼房质量都极其低劣。虽然此前仍留在私人手中的工厂和店铺这时大多数都被收归国有，但它们的所有者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这份"幸运"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教育领域，就像 20 世纪 50 年代一样，工人阶级出身和社会"表现"仍然比学业成绩突出更加重要，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一半人是工人和农民的后代。

党的八大上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社会福利政策，要付诸实施势必将占用大笔开支，因而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而到了 70 年代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又遭受了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影响。原材料价格火箭式上涨，而工业品的价格上升幅度却颇为有限。从 1970 年到 1981 年，工业品出口价值提高了 130%，但与此同时，进口的原材料价值却上升了 300%。当局不愿意提高食品、住房等日常生活需求的价格，担心这样做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便只得让汽车、洗衣机等产品提高价格了，虽然它们本来便已贵得离谱了。究其结果，便是回归到早些年的那种极度节俭的生活方式。

到 1982 年时，东德当局对局面的把握能力，似乎已经得到了恢复。这既有世界经济形势得到好转的因素，也是因为僵化的计划工作也有所调整从而更为灵活。1981 年，统一社会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着重强调，必须在技术和科学发展方面避免落后于西方，必须广泛利用现代技术节约劳动力和原材料。这时，昂纳克也很快被超级现代化的经济前景迷住了，因而犯下了与其前任一样的错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高技术上，而没有意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高技术的条件很不充分。与乌布利希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

他也开始与其在莫斯科的掌控者难以步伐一致了。

赫尔穆特·科尔的德国

赫尔穆特·科尔政府于 1982 年上台时，根本无法想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陷入到何等难以为继的困境之中，也无法设想东西德关系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在他们看来，昂纳克似乎牢牢驾驭着东德的局面。世界上存在两个德国，联邦德国无论怎样坚持这两个德国构成了一个民族，都无法 320 掩盖上述事实。赫尔穆特·科尔 1982 年发表施政纲领时，下述讲话也能反映出他承认这一事实："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是破裂了，但德意志民族依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要结束这种分裂，需要若干个历史时期。"埃里克·昂纳克对波恩进行国事访问时（昂纳克访问西德，系1987年 9月——译注），科尔总理在欢迎晚宴结束后的讲话也大体遵循同样思路："德国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就现在而言，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世界历史议程之中。"对此，昂纳克表示赞同。

（华约与北约集团）在中程导弹方面的军备竞赛，引起了东、西德两国公民的普遍警惕，这令两国之间取得和平谅解的必要性大增。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 1981 年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时，便发出了这一信息，而赫尔穆特·科尔政府继承了他的政策。1983 年，巴伐利亚州州长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东德进行正式访问，受到昂纳克的欢迎，虽然施特劳斯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向被作为超级反动人物予以抨击。施特劳斯访问期间，与一位名誉极其不佳的东德官员举行了



德国总统赫尔穆特·科尔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1983 年 4 月 22 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长时间的会晤，他便是在经济部和秘密警察机构均担任职务的亚历山大·沙洛克·戈尔多夫斯基。此人通过暗地里操纵货币交易和经济出口交易，使自己发了财，也为自己在党内最高层的保护人赚取了大笔金钱。通过施特劳斯的活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获得了一笔20亿马克的信用贷款。当然，这笔钱最终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落入了柏林墙两边的某些私人的手中。为得到这笔亟需的资金援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它向边境上的卫兵发出的命令仍然有效，那就是，向任何企图逃离东德的人开枪射击。对本国公民出国旅行的严格限制也未解除。因此，西德方面付出了如此之巨，却未得到对方什么像样的回报，很快便令施特劳斯遭到了抨击，甚至包括他所在的党即基督教社会联盟。

但是，核军备问题又为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统一社会 [321] 党政权一方面对西方的和平运动慷慨地提供经费资助，另一方面却听任秘密警察机构对付抗议苏联导弹发射活动的本国公民。此外，东德一些生态学家们抱怨联邦德国把危险的废料倾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对核电站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却被指责为“敌视政府”。至于教会，由于它们往往对反核人士持同情态度，这时也遭到了严密监视，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也频频遭到逮捕。尤有甚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庇护和训练，其中一些组织在西德频频开展活动。科尔总理愤于此行，于1987年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斥责为一个用监狱和集中营维系在一起的极权主义国度。这种说法当然也可以说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但对改善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怕是于事无补吧？

无论是联邦德国还是其西方盟友，都未能及时认识到，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是日薄西山，时日无多了。这时，东德领导人年事既高，与人民群众联系已名存实亡，而无论在统一社会党党内还是党外，反对派的实力和自信心都不断得到增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3000亿马克之巨，根本无望摆脱日益沉重的债务重担，所以可以说，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走向破产。

1983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大选。政府为迫使总统解散联邦议院，采取了一个罕见的举措，即动议对自己进行不信任案投票。表决结果出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获得了巨大胜利，得到了48.8%的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因为选民不相信它能克服当下的经济问题，只获得38.2%的选票。在这次选举中，绿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部分党员得以进入联邦议院。不过，绿党虽然得以成功地把一些重要的生态问题列入了政治议程，但同时却也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分化，组织上趋于松散化，“现实主义者”与“教条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辩论成了党的生活的大部分内容。

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得到了巴伐利亚州60%选民的支持，继续在慕尼黑担任州长一职。他组建的州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联邦的一个“影子政府”，班子成员比起波恩的那些毫无生气的技术官僚，似乎更加充满



里根总统和科尔总理1985年造访比特堡的一处军人墓地，引发了很大争议。

活力和干劲。但他对德意民主共和国的那次出人意表的访问，以及他毫不避讳地鼓吹大规模军整军备，令自己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既迷惑不解又大为不满。施特劳斯大叫大吵了不少话，也大把大把地花了不少钱，但除了给竞争对手赫尔穆特·科尔添麻烦之外，正面作用倒真的没起到多少。他那些言辞，倒挺能激起某些人仇外、反动、偏执情绪，而且也确实得到了这些人的强烈欢迎。

在整个80年代，联邦德国的声誉和重要性得到了稳定的提高。卡林顿爵士于1987年退休后，北约真诚地邀约一位德国人出任秘书长，赫尔穆特·科尔成功地使自己的国防部长曼弗雷德·福纳担任了这一职务。西德与其主要盟国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在科尔和副总理兼外长根舍任内，均得到了加强。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对西德的访问，受到了报业的大量报道。此番出访中的一个败笔是，里根前往比特堡的一处军人墓地，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表示悼念，但那里埋葬着相当多的党卫队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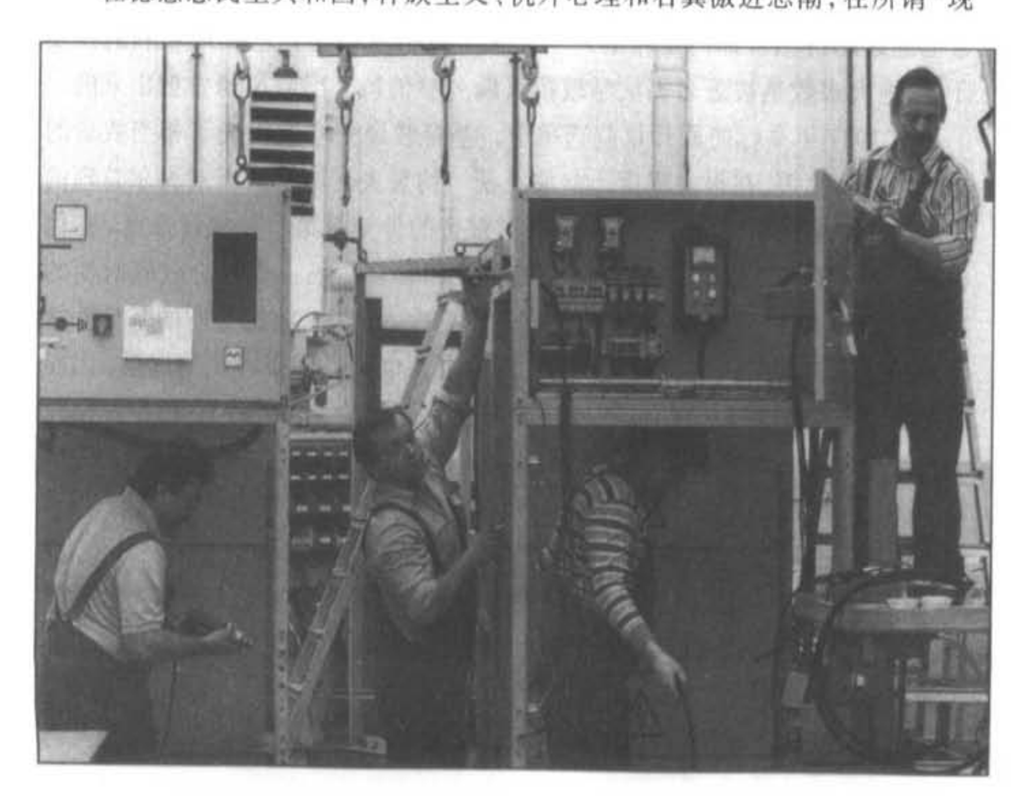
322

里根总统的此次比特堡之行，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西德人对纳粹统治历史所作清算程度的争议。报刊杂志对不肯改悔的纳粹分子的具体数量，作了大量的报道。由于个别思维方式怪异的考据家们试图把鲁道夫·赫斯刻画成一位殉道者——赫斯生前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后来于1987年自杀——令新闻界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读者也激起了相当大的兴味。1983年，一本伪造得非常蹩脚的“希特勒日记”出版发行。从这件事上，人们分明可以发现，“元首”的身世仍然令如此之多的人们怀有浓厚兴趣，而且这还不仅限于德国人。

形形色色纳粹主义小团体、准军事化组织、光头党，可能会让人觉得体现了社会稳定存在问题，但它们并不是只存在于联邦德国，而且对民主制度尚不构成严重威胁。但这些派别的犯罪分子实施的血腥暴力行为，仍激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怒。可笑的是，一些高傲自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公众的这些情绪只是装装样子，做做表面文章。但不管怎样，这些事件的发生，已经足以迫使联盟党改变现状，转而主动打击右翼恐怖主义了。

社会秩序面临的更加严峻的威胁来自共和党人。共和党是一个内部组织颇为严密的右翼政党，类似于勒庞在法国组织的“国民阵线”，不过影响面要小得多。共和党成员一方面小心地免于触犯有关禁止新纳粹组织和种族主义活动的法律，另一方面却又成功地挑起了民众对外国人（尤其是土耳其 323 人）的反感情绪。在他们的鼓动下，成千上万的寻求政治避难者和难民也遭到了冷遇——这些人多半来自东欧，大多数人所持理由是编造的，旨在获得地方政府和联邦的慷慨支持。随着失业率变得异常之高，尤其是在 1989 年后的德国东部地区，兼因住房紧张日益尖锐化，感到原有主要政党对此无所作为的人们，纷纷被共和党所吸引，在这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地区尤为明显。共和党人遂在若干个州以及柏林的议会中夺取了部分席位，不过在不远的将来，似乎还无法在联邦议院占据一席之地。由于从外国前来寻求庇护的人流被掐断了，共和党也就失去了宣扬自己主要观点的条件，而且该党还陷入了严重的分裂。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尊重，而且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层，共和党很难对德国政治生活产生有力影响，但它的存在，已足以推动原有主要政党因担心失去民众支持而不得不进一步右倾。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右翼激进思潮，在所谓“现



德累斯顿通用电气工厂的工人们。这家工厂的现代化改造项目，获得了 3400 万马克的资金投入。

实存在中的社会主义"中日益蔓延开来，但由于当局口头上还在宣扬反帝、国际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空洞口号，所以这些思潮还只能处于地下状态。对比之下，联邦德国为教育自己的青年一代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罪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鼓励人们对近代史进行活跃的辩论，而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清算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共产党和苏联当初扮演的角色很不光彩，应该是原因之一吧。统一社会党把自己说成[324]是德国共产党反法西斯战士的继承人，始终宣称一切旧纳粹分子如今都生活在联邦德国，后者在新的却又是邪恶的伪装之下，正在继续贯彻法西斯主义的一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德国法西斯分子是德国资本家的马前卒，而这些资本家在东德已被悉数消灭，而在西德却仍在不断壮大。

在联邦德国，人们对民主制度的责难，一大原因在于官员们利用公职之便谋求个人利益，使政党及其官员损公肥私。例如，政党会隐瞒不报外界捐献给它们的资金，在申报税收时存在欺诈行为。1984年，弗立克公司被揭发出，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前任主席、1983年当选为联帮议院议长的赖纳·巴泽尔提供资金。弗立克是一家大型国际康采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曾做过类似的不法勾当。1985年，经济部长兰布斯多夫伯爵以欺骗手段转移自由民主党有关款项以逃避税务机关监督一事，遭到媒体曝光。即便在被宣判罪名成立之后，兰布斯多夫仍然作为该党领导人留在政治舞台，甚至还就政治道德问题，作了不止一次的言不由衷的讲演！

除了高层政治领域有关政党资产和腐败事件不断被揭发出来之外，人们还逐步发现，无论是在联邦还是州一级，政治家都在用数额之大令人咋舌的工资、补贴、额好处和税收减免，把自己的腰包撑得鼓鼓的，而且他们的退休金也远远超过私营部门工作的人士。关于政治家们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翔实证据，绝大多数是被著名宪法学教授汉斯·赫伯特·冯阿尼姆发掘出来的。

在1987年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丢失了相当数量的选票。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科尔总理的政策过于左倾的攻击有关。施特劳斯对根舍的外交政策也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根舍只不过是继续推行社会民主党和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时期的"东方政策"罢了，依旧是在讨好别人。在这次大选中，施特劳斯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支持者们仍支持该党，但自由民主党也赢得了很可观的选票，因而能够令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再次获胜。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州长约翰内斯·劳所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成为输家，原因在于选民们对该党驾驭肆虐全德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能力，丝毫不抱信心。由于合作连锁商店普遍管理不善，欺诈成风，建筑和住房业问题成堆，而这一切都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掌管有关，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自由民主党便利用这些问题为口实，向选民表明社会民主党根本不适合治理这个国家。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联邦德国，能够基本认同"东方政策"的人仍

然只限于部分热心人士，因此谈论德国统一问题，只能算作言之无物的东西。人们觉得，出于西德安全考虑，完全可以把东德人对自由的渴望忽略不计。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曾为“东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的社会民主党人埃贡·巴尔，公开表示苏联人完全有权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以使波兰继续 325 留在华约集团。

东德崩溃

由于苏联逐步走向瓦解，民族问题再次走进了现实议程。在西方各国，政治家们却迟迟未能把握住这一变化所蕴含的机遇，这当然是令人痛心的，同时也表明，一向自矜于世的情报机构，其实未能有所作为。截止 1981 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西方国家欠下的债务达 100 亿美元以上，要减少其债务总额，只能有一种办法，即大幅度减少进口、加大出口，并需要从联邦德国取得大批贷款以缓解还款压力。这些措施给普通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痛苦，不过由于当局有限地允许私营企业的建立，使经济获得了某种推动力，稍稍舒缓了这种痛苦。

如果只是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相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然可以称作消费者的天堂。以人均占有量计算，东德的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苏联高出一倍。然而，它的许多产量都是不知羞耻的捏造。1988 年，昂纳克亲自把 1971 年开始实施住房计划以来建成的第 300 万座公寓的钥匙交给了一对幸福的夫妇，但事实上，自那时起总计只建成了 200 万座，而且先前建造的一些楼房这时已经摇摇欲坠了。

在 1986 年的统一社会党第 11 次代表大会上，出台了新的五年计划，再次把着眼点放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上。大会用一些有关经济增长率的真实性颇堪怀疑的数据作为证据，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在此后的几年里，事实却证明这些宣传只是没有真实根据的牛皮大话：经济陷入了停滞，东西德之间的技术差距在不断扩大，而污染程度更是达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虽然当局声称，生态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昂纳克依旧在吹嘘什么高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确实愚弄了相当一部分民众，但这项五年计划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人民的不满情绪已到了危险的程度。

1989 年 4 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基督教团体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次例行会议，但就在这次会议上，却发出了使选举法更加民主、不要继续篡改选举结果的呼吁。1989 年 5 月，东德举行地方选举，但却被揭露出充满了欺骗行为。当局公布的数据显示，98.85%的选票投给了官方的国民阵线。由于国民阵线在 1984 年的地方选举中获选率为 99.88%，经验丰富的观察家意识到，统一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一定遭遇了重大的失败。和平与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些观察家估计，至少有 20%的选民实际上反对国民阵线，遂对选举中

的舞弊事件展开了法律行动。此后，莱比锡及其他许多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活动，数百名人权活动分子遭到逮捕。

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以及统一社会党拒绝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后尘，像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一样开展改革，更是令人们对选举舞弊的愤怒情绪火上浇油。1989年6月，北京血腥镇压抗议运动事件发生后，东德政权表示[326]支持，进一步疏远了群众。使用“改革”和“公开性”作为口号抨击现政权的一些人士遭到逮捕，罗莎·卢森堡的名言“自由，永远是有所区别的自由”也被当局看成不能接受的言论。1988年下半年，苏联杂志《旅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遭到了禁止，其他一部分苏联期刊也需要经过审查后才能发行。

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开放了其与奥地利的边界。同年8月，180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联邦德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空地上安营扎寨下来。在得到红十字会提供的文件后，这些人得以逃至西德。此后，数以百计的东德人涌向与匈牙利的边境地区，或者前往联邦德国驻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大使馆以及驻东柏林办事机构，寻求政治避难。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允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自由通过其与奥地利的边境。截止9月底，已有2.5万名东德人利用这一通道，出逃到了联邦德国。

在游行示威浪潮的鼓励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反对派力量愈发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但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下定决心，不对反对派作任何妥



1989年10月16日，12万人在莱比锡举行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游行示威，最终迫使政治局采取行动，解除了东德领导人埃里克·昂纳克的职务。

协。6月，昂拉克的妻子、教育部长、顽固至极的斯大林主义分子马戈特发表公开演说，把反对力量称作“反革命分子”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命令教师教[327]育年轻一代做好准备，在必要时与武装部队一起保卫社会主义。同年9月，许多示威者在莱比锡遭到逮捕，其中一些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从1989年7月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内开始组建一个名为“社会民主党”的新政党。8月，该党印刷并散发了结束统一社会党政治垄断地位的呼吁书。9月，名为“新论坛”的强大反对团体宣告成立，旋即被当局宣布为非法。新论坛号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到了10月份，另一个团体即“民主觉醒”作为一个政党宣告成立，并成为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团体的集合体。此外，反对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于这一年的9月成立了“联合左派”，呼吁实行政治改革。10月，绿党也在民主德国宣告成立。

1989年10月2日，2万人在莱比锡游行示威，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两天后，当运送7600名寻求避难者从捷克斯洛伐克开往联邦德国的列车驶经德[328]



布里吉特和马丁·马钦斯基－丹宁霍夫创作的钢铁雕塑《柏林》，作品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分裂状态。照片背景上出现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威廉二世为纪念其祖父而于1891年至1895年建造——译注）被毁损的钟楼，会使人们想起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累斯顿时，约有3000名东德人试图登上列车，遭到安全部队的镇压。10月4日，反对派呼吁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并号召结束统一社会党的独裁地位。次日，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的游行示威，遭到警察的暴力驱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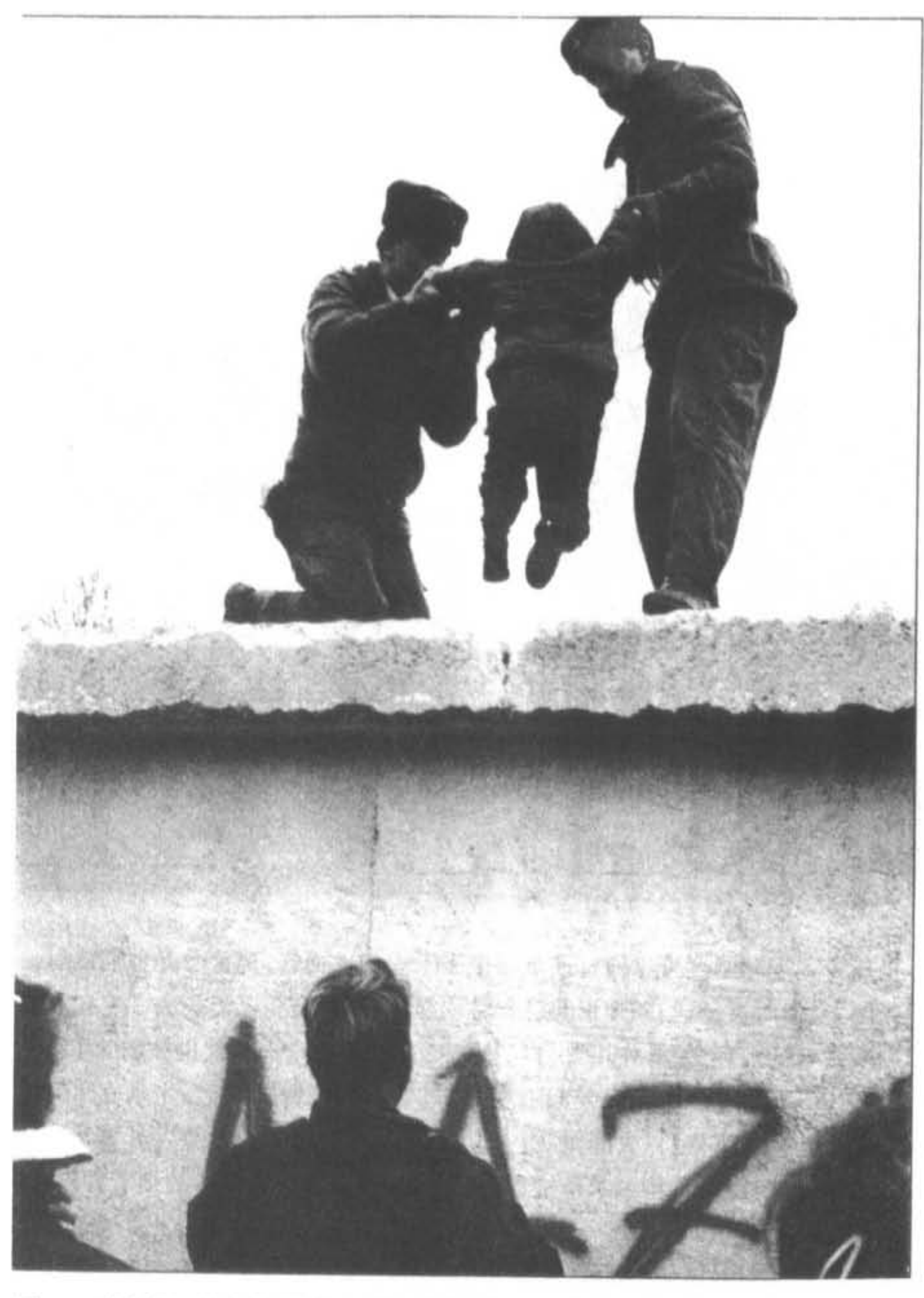
10月6、7日两天，超过1000名示威者遭到逮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纪念活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戈尔巴乔夫访问东德，脸色阴沉地出席纪念活动，并督促东德政权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戈氏说了这样一句话："谁采取行动太迟，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然而，簇拥在病态奄奄的昂纳克身边的那群老人，似乎仍然不为所动，尽管秘密情报局报告说局势已极其危险，尽管普遍的不满情绪甚至已经波及到统一社会党内部，尽管党员纷纷宣布退党，尽管全国的政治稳定已经陷入极度危机之中。

40周年国庆的纪念活动结束后，全国形势在数日内急剧恶化。成千上万的人经由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逃到了西德。10月9日，7万人打着"我们就是人民！"的口号，在莱比锡举行示威。有关迹象表明，昂纳克准备效仿他所异常钦佩的北京当局那样，动用暴力手段对付游行群众，但苏联人拒绝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头脑冷静一些的领导人决定与示威者进行谈判。参加谈判的人员包括莱比锡市市长、三个区的区委书记，以及管弦乐队的指挥库特·马苏尔。

要求实现激进变革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既有宗教界和知识分子，也有新近成立的各个政党和反对派，更有大规模游行示威的群众。10月16日，12万人在莱比锡举行集会，最终使政治局下定了采取行动的决心。第二天，政治局就是否需要解除昂纳克职务展开讨论。会上，部长会议主席兼国务委员会主席维利·斯多夫告诉昂纳克，党已不再信任他。昂纳克辩解说，自己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一直生病，对事态的发展一无所知。10月18日，昂纳克辞职，由埃贡·克伦茨接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并兼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克伦茨曾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一书记，是一位口若悬河却华而不实的党务工作者。虽然10月23日那一天，30万人在莱比锡举行"星期一大游行"反对政治局的这一步骤，但人民议院仍然批准把党和国家大权集中到克伦茨一个人手中。显然，领导层完全脱离了事态的真实情况。克伦茨自以为，只要进行一些调整，国家便能重新步入正轨，虽然不对整个制度作出根本性的改革，大多数人民仍然会感到满意的。

克伦茨10月26日与科尔通了电话。双方同意，两个德意志国家将继续开展合作。五天后，克伦茨访问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一道宣布，德国统一问题"不在议程之内"。11月4日，约有100万人在东柏林游行示威，要求得到选举自由、言论自由、旅行自由，以及不受限制的集会权利。在民主德国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示威活动。11月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解除了一些重要人士的职务，其中包括维利·斯多夫和秘密警察局首脑埃里希·米尔克。次日，统一社会党开放了与西柏林的边界。至此，矗立了近30年的柏林墙倒下

[329]



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于1989年11月9日开放后，整座城市陷入了狂欢状态。图为两个月之后，东德边防兵把一个小孩拎到墙上，让他看一眼西柏林市景。

了。一时之间，整个柏林陷入了狂欢状态，人们因为局势突然发生如此之大的转折难以自已。科尔总理、维利·勃兰特、西柏林市长汉斯·莫默帕都加入狂欢人群，发表了讲话。

对于大多数东德人来说，只要去一趟西柏林看一看，便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了，那就是，改革已无法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赖以为继的良方。克伦茨必须让位。这样，在上台50天之后，他于12月6日宣布辞职，而随他一同离开政治舞台的还有统一社会党的整个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德累斯顿市委书记汉斯·莫德罗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此人没有多少政治色彩，昔日曾因为经常批评官方政策而被昂纳克将之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对于那些

330



东德的贫困景象。尽管当局不遗余力地为国民提供消费品，尽管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比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都高，但它仍然无可挽回地远远落在了西德的后面。

仍然希望现存制度可以通过改革而维系下去的人而言，莫德罗是他们最后一张牌了，但时过境迁，如今形势已非常明显：统一社会党已经失去了它在宪法中所规定的那种"领导作用"。12月1日，宪法中的这一条款也被删除了。

统一社会党为求自保，试图把一切过错都归咎到昂纳克、米尔克和经济专家贡特·米塔格"三人同盟"头上。为此，当局公布了昂纳克及其妻子马戈特，以及经济专家贡特·米塔格贪污腐化、过着极端奢侈生活的细节材料，但人们已经看清了，社会统一党主宰的这个国度的整个结构都已出了毛病，党的精英阶层普遍腐化、堕落，甚至可以说已沦为犯罪分子。统一社会党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因而再也不能继续发号施令下去了。武装护厂队拒绝向游行群众开枪，后来自行解散了。国家安全部宣布撤销，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忙着掩盖其罪恶的档案了。

12月8日，统一社会党召开"会议"。之所以只称作会议而不是"大会"，331 也许是因为讨论的议题太过于令人伤感了吧！1990年2月，会议代表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并选举格雷戈尔·居西担任党的主席。居西是一位高明的律师，曾经为许多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作过很富技巧的辩护。民主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机构由100人组成，大多数成员都未曾与昂纳克政权发生过太过密切的联系。居西的上台，不禁使人们回想起了沃尔夫冈·哈里

希，想起了他当年提出的所谓“介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与跨国垄断制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居西宣布，民主社会主义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党，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党，并承诺推行民主、保护环境。他大声疾呼“团结”和“社会主义多元化”，但能够理解他的这些呼吁的人，怕是没有几个吧！留在党内的人只剩下了70万，不久，更是剧降到30万人。

重新统一

1989年12月7日，统一社会党及作为其仆从的其他小党，与各种派别的反对派、示威团体，举行“圆桌”会谈，着手起草一部宪法草案。等到草案于1990年4月起草完毕时，事态的发展已令这项工作不再具有多少意义了。统一社会党这时还希望能维持工会、青年联盟等群众组织，但这些组织的成员正成批地宣布退出。游行队伍中的口号也不再是“我们就是人民！”，而是换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12月15、16日两天，洛塔·德梅齐埃领导的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通过了新的党纲，宣布接受市场经济，呼吁实现民族统一。

要求实现自由选举和民族统一的呼声越来越大。11月28日，科尔总理向联邦议院提出了《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计划》。12月19日，科尔前往德累斯顿，与莫德罗举行了会谈，详细讨论了签订一项“合作与睦邻关系”条约事宜。1990年1月中旬，莫德罗强调指出，两个德意志国家的“重新统一问题提不到日程上来”。虽然莫德罗及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仍企图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但“圆桌会议”要求人民议院选举工作从原定的5月6日提前至3月18日。1月底，莫德罗访问莫斯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后者表示他原则上不反对德国重新统一。这时，莫德罗才提出了自己的《通往德国统一道路的方案》，并在内阁中吸收了8位反对党人士。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了选举，这也是这片土地上近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德国社会联盟(DSU，这是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东德版)和“民主觉醒”组成的德国联盟(DU)，获得了48.1%的选票，社会民主党(SPD)获21.8%，民主社会主义党获得16.3%，而由这场和平革命的领导人士组成的“90联盟”仅获得2.9%。在此之前，大多数专家都预测民主社会主义党将获得胜利，但结果却是为民族统一而努力的各右翼党派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基督教民主联盟与民主社会主义党联合组成新一届政府，洛塔·德梅齐埃被选为部长会议主席。新政府上台后，立即着手与联邦德国签署国家条约，以全面解决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问题。1990年5月18日，两个德国 [332] 的财政部长签署了这项《国家条约》。这时，实现统一的难题也非常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德人希望能按照一比一的比率，把自己已不值分文的货币兑换成联邦马克，而慷慨的联邦德国提出的比率是二比一。经过一番漫长的、常常是很不愉快的谈判，达成了下述协议：民主德国公民在一定限额内

的积蓄按一比一兑换，其他款项则按二比一兑换。

现在，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取得二战时期同盟国的首肯。科尔总理2月10访问莫斯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后者告诉他，苏联将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位苏联领导人希望藉此确保从德国获得大笔援助，以帮助自己的国家克服经济崩溃局面。5月，两个德国和苏、美、英、法的代表开始在波恩举行"2+4外长会议"。由于国际上的缓和气氛，由于科尔总理和根舍外长很有策略地同时也很有力度地驾驭着事态的发展，也由于苏联正处于极为虚弱的状态之中，外长会议得以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并迅速达成了共识。6月，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和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分别通过决议，保证波兰西部边界不会更改。7月14日，科尔和根舍对苏联进行访问，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后者表示，苏联不反对统一后的德国继续留在北约联盟。"2+4外长会议"9月12日在莫斯科结束，各大国均承认统一后的德国拥有完整的主权。10月2日，在柏林的盟军司令部正式宣告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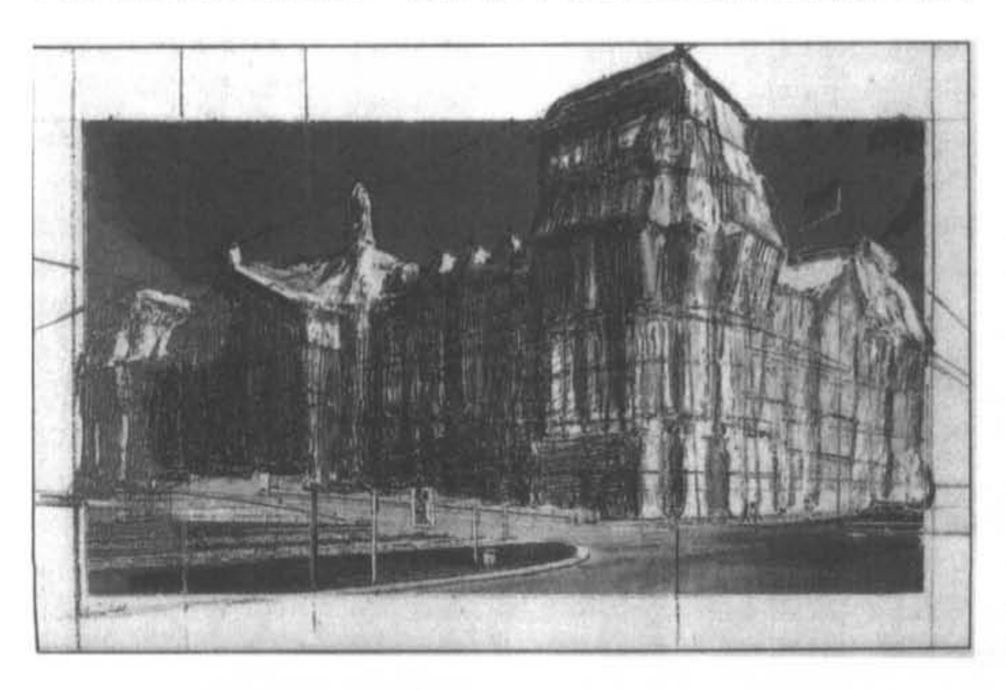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统一进程也在德国内部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摩擦。以德梅齐埃为首的联合政权开始分崩离析。在西德，民众越来越担心实现统一将付出的天文数字般的财政代价，而商界人士也不愿意在东德这个破产了的国度投资。而在东德，人们开始抱怨西德人傲慢自大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会失去就业机会，失去东德过去大作吹嘘的社会福利。8月31日，两德在柏林举行《统一条约》的签字仪式。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存在了。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萨克森等5个专区(州)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统一后的德国第一次联邦议会选举于12月2日举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都声称统一是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并借此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因就在于该党领导人奥斯卡·拉方丹曾正确地警告了国人统一将带来的经济问题，虽然科尔总理对此类问题轻描淡写，而且看上去对民族统一很不热心。在拉方丹看来，对于统一的欧洲来说，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开始过时了。选举结果出来了，东部和西部大体一致：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西部获得44.1%的选票，在东部获得43.4%。自由民主党在西部获得10.6%，在东部则稍多一些，为13.4%。社会民主党区别大一些：它在西部获得35.9%，而在东部仅获得23.6%。在东部的选票流向中，民主社会主义党占9.9%，"联盟90"和绿党组成的联盟获得5.9%。由于宪法法院裁定，关于[333]联邦议院席位分配的"5%条款"应分别在东部和西部选区适用，所以"联盟90"和绿党得以在联邦议院中占据了8席，民主社会主义党占据了17席。如果把全德作为整体的话，这三个党派都将因所获选票不足5%，而无法在波恩拥有立法代表。

德国的政治统一基本上是顺利实现的，但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仍旧存在着。不久以后，人们便可以清楚地发现，科尔政府严重低估了统一所需付出的代价。至于东德地区经济的可怖形势，此前更是几乎没有人能

够预见到。对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来说，他们当然希望从此能像生活在西德的同胞们一样，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又不能不痛苦地看到两个社会之间又宽又深的鸿沟。在那些自视清高的西德知识分子们看来，东德人素质低下，头脑里满是肮脏的物质利益和庸俗的等待施舍的念头。置身于西德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充满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东德人要想靠自己的双手站稳脚跟，实在是太困难了。工人们缺乏必要的培训，人口中没有企业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管理人士对自由市场经济缺乏哪怕一丁半点的了解。西德是一个与全球各地有着紧密联系的、摆脱了民族主义禁锢的社会，而与之相较，东德虽然自我标榜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但却依旧是一个思维狭窄、民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既不能对当年纳粹统治历史做出清算，更无法正视自身那段斯大林主义经历。随着秘密情报局昔日活动纷纷大白于天下，随着当年统一社会党反对派中一个个重要政治人物都曾担当秘密情报局告密者的劣迹被曝光，整个社会更是充满了不信任气氛。根据1993年4月的一次民意测验，只有22%的西德人、11%的东德人，觉得"德国人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在绝大多数东德人眼中，统一社会党政权早已完全破产。他们急切地盼望早日成为联邦德国的一分子，并藉此分享这一自由、繁荣社会的福利。正因为这一原因，统一社会党反对派中那些颇具政治原则的人士，以及西德的一些信奉"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寻求一条有别于共产主义独裁及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左翼知识分子，如今都极难获得民众的支持。例如小说家君特·格拉斯认为，德国的分裂是它为"第三帝国"犯下的罪行所遭受的应得的惩罚，但像他这样的人、这样的言论，人们只会觉得荒唐可笑。年事已高的阿登纳主义者担心，统一后的德国可能变成欧洲这块舰船甲板上的一具脱开绳索的大炮，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共鸣，但这些人显得过低估价了德国



克里斯托（克里斯托·亚瓦切夫，1935—，保加利亚人，艺术家——译注）从1961年起，就筹划对某一重要公共建筑进行包裹，从1972年起便为包裹国会大厦描绘了草图（包裹，是大地艺术学派的创作形式。所谓大地艺术，是利用大地材料、在大地上创造的、关于大地的艺术。它在英文中被写作Land Art、Earth Art或Earthworks——译注）。当时，人们大多会认为，这幢建筑物再也不会成为德国国会所在地了。这幢大厦建成于1894年12月，1933年2月毁于一场大火，时至今日，这座历经劫难和炮火洗礼的建筑，已成为德国民主的象征和德国重新统一的丰碑。1995年6月，对国会大厦的包裹最终得以付诸实践。

334

勃兰登堡门

1788年，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把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端点处的城门推倒重建。建筑师卡尔·戈特哈德·朗汉斯以雅典古希腊柱廊式城门为蓝本，设计了这座勃兰登堡门。这也是德国境内第一座古典风格的建筑物。城门旁侧建有卫兵室和礼宾室，坐落在通往皇宫的大道顶端，是一座凯旋门式的城门。

勃兰登堡门1791年建成后正式开放。1793年，顶上装饰了由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雕塑的巨型青铜像：四匹飞驰的骏马拉着一辆双轮战车，战车上站着的是"胜利女神"。1806年，拿破仑在勃兰登堡门举行了入城仪式，得到了菩提树下大街两旁民众的欢迎。后来，他返回巴黎时，也把战车拖到了法国。

当民众转而反对法国人，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之时，这辆战车遂成为民族的象征，而勃兰登堡门空空如也的顶端，时时刻刻提醒德国人所遭受的可耻的失败。1814年，这辆战车终于被六辆巨型马车拉回了普鲁士，沿途受到民众忘情的欢呼。1814年8月7日，腓特烈·威廉三世和布吕歇尔元帅举行凯旋仪式，率军队通过勃兰登堡门。为了纪念打败法国人，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改称"巴黎广场"。



水彩画：卡尔·戈特哈德·朗汉斯1788至1791年建造的勃兰登堡门，F·A·卡劳作于1805年。



勃兰登堡门与柏林墙

1864年、1866年，普鲁士军队打了胜仗后，都从勃兰登堡门下凯旋而归。此后，这座城门已不再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纪念物，而变成了普鲁士军事威力的象征。1871年6月16日，4.2万名士兵列队走过勃兰登堡门，87岁的冯·弗兰格尔将军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刚刚镇压了1848年的柏林起义，跟随其后的依次是俾斯麦、毛奇和罗恩，尔后是德皇。从此，勃兰登堡门成了新帝国的凯旋门。

1919年，艾伯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迎候战败的军队，不禁让人想起了昔日的征伐战功。1933年1月30日，党卫队手举火把，列队穿过勃兰登堡门，庆祝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1939年希特勒50岁生日、1940年打败法国时，这里都举行了游行规模宏大、场面热闹异常的大型游行活动。

1945年，取得战争胜利的盟军列队穿过这座遭受严重破坏的城门。被某些人视作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象征的勃兰登堡门，落入苏联集团掌握之下。此后，勃兰登堡门进行了修缮。东德称之为"和平之门"，而在西德，它则是国家分裂的象征。1989年11月9日，城门重新开放。如今，它已成为德国统一的象征。

对欧洲、对西方联盟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的东德人在反抗统一社会党政权的斗争中，表现了可贵的勇气、理想主义和团结精神，但愿他们在建设新德国的历程中也能保持这些品质，而不要被犬儒主义、宿命论、无休止的暴力所攫取。东德人要想真正告别自己近几十年的历史，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他们生活在西部的同胞此前已经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反省历史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这不仅是因为要解剖共产主义政权，而且还要反思每个个人在其中扮演过的角色，对一个个不会令人愉快的问题做出回答。归根结底，独裁统治并不纯粹是专制政治体制，并不纯粹是高层权贵们实行险恶政策的结果，往往还 335 要考虑到普通民众的顺从，考虑到投机分子、野心家逐渐习以为常的道德背叛。

德国重新实现了统一，它所凭借的不是铁与血，而是高超的民主的程序。无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拥护这一过程，相信还有别的方法的人寥寥无几。显而易见，东西部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将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到那时，德国才能真正融合为一个整体。这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西德人不仅需要在物质上，也应在精神上付出极大的努力，以重建新近加人的五个州。东德人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逐步适应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从而真正成为欧洲的一员、西方的一分子。赫尔穆特·科尔下定决心，付诸行动，终于把这个分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其功绩当然值得大书特书。也许，人们确实不应对前方存在的问题患得患失、无谓抱怨，但虽然科尔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真正实现德国统一的重任未必便能变得轻松起来。

尾 章

[336] 关于“德国问题”，不仅德国人自己会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论及它，而且其他国家的人士也要就他们眼中的“德国问题”花费大量的笔墨。要论述这个问题，必须把它看成是由一系列复杂事项组成的集合体，包括：什么是德意志人？应不应当有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疆界位于何处？德意志国家能够以和平方式建立，还是只能通过战争途径？它应采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政体？它的邻国会产生何种反应？近些年来，上述这种范围广泛的问题，似乎都可以包容在另一个话题之中，那就是：这样一个拥有高度文明和先进文化的民族，当年怎么会委身于纳粹党人的统治下，对全人类犯下那两桩骇人听闻的罪行——一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项是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如果把德国问题与欧洲其他国家问题作一比较，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彼此的差异？世人可能脱口而出，那是因为德国地理位置特殊：它位于欧洲的中央部位。因此，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无论在陆上接壤还是海上相望，都不会像它那样邻国众多。由此，也导致德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相比，具有更强烈的大陆强国属性。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地，其中既有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也有野蛮东方的文化。先是由欧洲南方向北方、尔后是由西方向东方的文明化大潮，都要经过德国中部地区，这虽然会创造出丰富而类型多样的文化，却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动荡和冲突。直到今天，德国北部和南部仍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性，而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别更加大上许多。甚至在苏联帝国崩溃后，德国东、西部之间的这种差异依旧存在着，构成了欧洲历史上一个似乎一成不变的现象。

居于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在心理上也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德意志人曾一直觉得自己在文化上逊于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而在物质生产和政治制度上则比不上英国。与此同时，他们又觉得自己绝对优越于斯拉夫人。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既源于其对自己心中认为优于本民族者的仇恨，也来自他们对目中的劣等民族的轻蔑。虽然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情绪都产生于仇外、自大和不安全感，但德意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很难客观地对本民族做出恰当的估价。今天，当一个德国人说某种事物是“纯粹德国才有的”时，他的看法绝对是负面的。

一个民族、一个帝国，都无可避免地有其兴衰的过程，但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不会像德国跌宕起伏如此之巨。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于12世纪崩溃后，德国经历了长达七个世纪的力量真空，直到俾斯麦在1871年提出“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后才得到结束。1918—1919年时，这个国家几乎到了分崩

离析的境地,但仅仅到了 1938 至 1942 年,其势力就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此后,它又一次崩溃,在随后的 45 年时间里分裂成为两个国度。1989 至 1990 [337] 年,当苏联帝国突然瓦解,全球进入关系缓和、政治动荡期之际,德国又实现了统一。

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把 1871 年建立的第二帝国视为德意志历史上的顶点:普鲁士终于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使它无与伦比的强大陆军、忠诚而高效的管理阶层、欣欣向荣的经济尽皆效力于德意志民族。而左翼批评人士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赞同戈培尔的论断:阿道夫·希特勒继承了腓特烈大帝、俾斯麦和兴登堡的衣钵。

无论西德还是东德,都无法从历史中找到适当的归属,都无法与过去建立明确的关联。东德的宣传家们声称,他们的国家是德国历史上最进步的,是一切国家形式中的范例。历史学家们被责令修正传统上对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俾斯麦、毛奇的僵化论断,把这些人物说成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先圣。至于希特勒何以会上台掌权,也不难做出解释: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因此与他们毫无干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遗产仍然存续于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而东德则承继了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传统。当然,共产党人在 1939 至 1941 年那段时间与纳粹党人亲密相处的历史,他们是必须三缄其口的。

而西德的历史学家,要么把"第三帝国"说成是无法预见的一种偶然,要么把它说成是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根据后一种说法,俾斯麦通过其自上而下的革命,扼杀了民主运动和解放运动,并通过实现民族统一、建立徒有虚名的议会,使自由派从此更无异动。他使得贵族和大地主组成的普鲁士精英阶层与自由派的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妥协,在此基础上对天主教中央党的公开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均予压制。根据这种理论,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痼疾,因此它在 1945 年被同盟国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诚如此,任何关于重新统一的念头都必须放弃。

而在左翼一方,也认为德国在战后被肢解,意味着德意志民族国家已走到了尽头。按照他们的说法,德国将成为"告别民族因素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认同的是他们所在地区,并把未来寄托于欧洲联盟。至于国家,不过是一种收取税收的机构,以及足球队需要借用它的名义去世界杯赛场争夺桂冠。这种观点乍听上去似乎极其自负:德国人已经形成了非民族化的意识,相较于那些仍然执迷于业已过时的初级民族观念的、开化程度甚低者,自然是大大领先了潮流。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当德国人在 1989 年突然间需要应付重新统一问题时,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理论上,都显得准备不足。虽然外国人在德国目睹光头流氓们和啤酒馆煽动家之后,不免会对德国民族主义的复活忧心忡忡,但实际上,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恰恰在于德国人实际上已抛弃了民族意识。第三帝国时期暴力肆虐的历史,令大多数德国人都成了滴酒 [338] 不沾者——只喝茶,而对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行为,也会对其危险性产生切肤

之痛。

有人希望,德国的重新统一将为欧洲走向统一的征程增添新的动力。如果这种期望在日后化为现实,那么,有关德国历史的许多著作,便可以不再重点记述德国如何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了,而是把笔墨集中用于对其各个地区的研究,以及它在欧洲产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帝国的往事将退出德国史的中心位置,不再被视为其高潮阶段。但不管怎样,这段历史都不容许从人们的记忆中溜走,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会对我们的历史观构成挑战,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人类会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过。另一方面,虽然第三帝国那段劫难主要归咎于德国,构成了德国史中最可怖的一个篇章,但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必须将它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外国的同情者、绥靖者、合谋者、吉斯林们(卖国贼)以及主动予以支持的人,也绝对不能逃脱他们在这桩人类最血腥的罪行中的责任。如果只是简单地把一切罪责推在希特勒、希姆莱以及他们的助手头上,甚至仅仅加诸于德意志民族,或者把"最终解决方案"仅仅看作德意志民族与犹太人之间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无法从历史中汲取那宝贵的教训。

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重视欧洲,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比德国更适于在推动欧洲联合的道路上扮演关键角色。然而,欧洲的联合之路,远远不是一帆风顺。对于很多人来说,欧洲只不过意味着在布鲁塞尔设立有一个庞大而充满官僚主义气息的机构,并由一帮姓名不详的技术人员负责其运转;一项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条约,威胁着要把一切民族特性尽皆消除,用一个与各民族没有任何关联的怪物来代替从古就有的民族国家,届时,并无约束力的欧洲议会也只能听凭它的支配。

人权、自由、民主等,可谓欧洲最值得珍视的传统价值观,但要真正建立一个遵循这些价值观的欧洲,西欧人就其心智来说已不完全合乎要求。究其原因,在于多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已使西欧人把个人权利放大到了极端自私主义的地步。而政治精英们以及来自美国的文化影响,也鼓励他们奉行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把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义务、贡献尽皆抛诸脑后。与此同时,政党也走向了腐败,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夺取政权和维护一己私利。在宣称意识形态已经走向终结之后,这些党派只满足于对反对派进行一些空洞无物的指责,却再也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观点。有鉴于此,尽管也有不少政治家在认真工作和付诸努力,但仍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对政治家们产生了厌烦心理,要么不再主动涉及政治生活,要么转而支持一些边缘团体,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西欧还要面对一些由来已久的外部问题的困扰。在后殖民地世界、在后共产主义社会,欧洲的价值观未能扎下根来。那些国家陷入的悲惨失败境地,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谋求到欧洲改变生活。作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德国自然是这些人的一个理想的目的地国家。而在东德,一方面要饱尝非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和持续多年的失业、未来生活缺乏保障等折磨,另一方面又迎来了西方人在这块土地上倾倒的成千上万的寻求避难者,因此发生了

339

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的大爆发——先是1991年在霍伊尔斯韦达，尔后是次年在罗斯托克。而东德的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团结的展示，得到了西德新纳粹暴徒的热烈响应。

面对外来避难者问题，人们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关闭求助之门，断绝外界人员对欧洲财富与文化的贪图念头，二是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但前一个方案太不人道，而后一个则等于把整个世界的问题和苦难都引向了欧洲，反而令欧洲无法在克服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多少作用。

人们可以相信，民主的、联邦制的德国已充分意识到了它对于创建一个民主的、人道的欧洲，对于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发扬欧洲传统上的优秀价值观，应发挥关键的作用，因为这是它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自由和民主不是人类生活的奢侈品而是不可或缺的要求。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切，德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必须充分汲取历史经验，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真正认识到他们的共同使命。旧式的民族国家观念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价值，民族主义如今已经蜕变成为消极的、返祖性质的部落主义。虽然民族和国家现在和将来仍将对发展人类文明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我们有理由期待，它们在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心中，将不再占据中心位置。

作为德意志民族最杰出的一员，海因里希·海涅曾经这样分析道："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源于心灵的硬化，它就像皮革一样，在寒冷之中会收缩起绉。德国的爱国者仇视一切外界的东西，不再是世界的公民，不再是欧洲人，而只愿意做一个狭隘的德国人。我们业已目睹了（民族主义鼓吹者）赫尔·雅恩的理想主义的蠢举。他对德国所发展起来的最绝妙、最神圣的思想方式展开了粗陋、刻薄和愚笨的攻击；他的行为，等于把自己推向了人类、普世博爱、世界大同主义的对立面，而这些恰恰是一向为我们最伟大的心灵——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让·保罗——以及所有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所尊崇的思想观念。"

谨以海因里希·海涅的这段话结束全书。因为，最伟大的德国人，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欧洲人。愿他们的精神生生不息。

索　引